

AGNES SMEDLEY

史沫特莱文集

CHINA FIGHTS BACK

CHINESE DESTINIES

4

史沫特莱文集

中国在反击

陈文炳 苗素群译 王聘余校

中国人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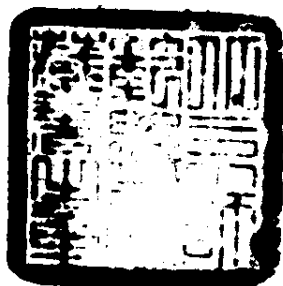
孟胜德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5318

4



新华出版社

1065318

1210:64/13

出版前言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一九二九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一九五〇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在一九五〇年她缠绵在伦敦病榻的时候，还在深情脉脉地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新闻战士终因忿忿成疾，贫病交加，溘然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国。她在给友人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在这个努力中，我已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方面的

成就。我将多么愉快地看到中国大使的到来，在我的遗体旁唱中国的国歌——起来！

“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史沫特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和支持被压迫的人民求解放的一生。艾格尼丝于一八九〇年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在她幼年的时候，家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在给人家洗衣服，做杂工；父亲则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这贫困潦倒的一家人，依靠史沫特莱一个当妓女的姨妈的帮助，才免于陷入绝境。

贫困和苦难早就在史沫特莱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在茫茫黑夜中追求真理，她向往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她憧憬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在她十六岁的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这使艾格尼丝十分伤心。为了摆脱那吞噬了她母亲的青春和生命的厄运，史沫特莱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艰难的岁月里，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居然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一所师范学院，并以优异的写作才能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后来经常为进步报刊撰稿，写了不少抒发正义、揭露黑暗社会、同情劳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作品。

一九一六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开始投身于火热的政治生活。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

斗争。由于她积极参加这些进步的政治活动，一九一八年三月，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捕。根据“反间谍法案”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直到一九二三年，联邦法庭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才正式撤销。出狱后，根据她亲身的经历，撰写了她的第一部文艺作品《铁窗难友》。这时她获悉，她的一个弟弟已被送往欧洲战场去当炮灰，行前，他曾要求见一见被无理关押的姐姐竟不能如愿；她那当小工的弟弟也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死去。史沫特莱义愤填膺，严酷的现实使她的思想更加激进了。因此她出狱不久，就积极投身于支持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她编辑新闻通讯《印度新闻》，担任“自由印度联谊会”的执行书记，并为该组织筹款、撰稿。后来由于接连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她才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

在德国期间，史沫特莱除了继续支持印度的民族革命外，还积极参加了争取男女平等权力的活动。她与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山额夫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于一九二七年请山额夫人来德国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一九二八年，她在柏林开设了一个节育诊所。此外，史沫特莱还在柏林大学教授有关英美的课程；同时，她又劝说校方同意，作为一名学生攻读印度历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用德文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写给学术性刊物，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显而易见，史沫特莱还是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她同德国著名的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成为好朋友。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在头版连载了她的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一九二九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她一到上海，就被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所感动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的著作中，对史沫特莱作过一段逼真的描述：

“她看到在夏季炎炎烈日之下，一伙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突然，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印度巡捕出现了。为了给一辆里面坐着一位傲慢的外国官员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小轿车开路，他竟然毆打工人们汗水淋漓的光脊背。那时，她感到警棍好象打在自己身上一样。看到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如此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她不禁感到耻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胆识的人，在这块大地上一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她当时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坚定地表示了要献身变革这一制度的伟大革命。”

当史沫特莱初到中国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共产党人和其它进步人士，横遭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史沫特莱，对旧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黑暗腐败的种种状况深为忧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深表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为了把中国革命真相向全世界传播，她决心长期深入生活，和中外进步作家、新闻记者一起，“搬走这座封锁中国的大山”，打开世界人民的眼界，使他们对战斗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尽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但她毫不畏惧，勇敢战斗。她不仅用自己锋利的笔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文章，揭露黑暗，歌颂光明，首次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江西苏区情况传播到国外去，而且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

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朋友，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暴政。为了支援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进步作家的斗争，她曾暗暗地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信联络点和聚会场所。一九三一年二月，青年作家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要求译成外文送到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毅然担负起这一工作，终于把这篇战斗的檄文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

抗日战争前夕，一九三四年底，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她虽然重病刚愈，却毅然前去中国西北采访。一九三六年，她在西安期间，亲眼目睹了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她把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真实情况用英语向全世界作了广播。一九三七年初，她到了延安，访问了许多革命战士和干部，并同朱德总司令作了频繁接触，要求为他写传，介绍他的生平。史沫特莱认为，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者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朱德同志把身世告诉她，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阶级所最关心的事情。为此，她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在战斗中实地观察达一年之久，为日后写朱德传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的安危，随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她以道劲感人的通讯促使中外记者和进步人士去延安亲眼见识那里的火热革命斗争。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她不仅用她那锋利的笔锋抒发着她对

浴血奋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深厚同情，而且还到处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国外募捐，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医药界朋友的巨大援助，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她还动员和组织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身着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当敌寇对新四军驻地狂轰滥炸时，叶挺军长劝她离开目标较大的军医院，她坚决要与战士在一起；当斗争形势日益残酷时，朱德总司令也劝她转移到敌后较安全的地方，她执意不去，她说：“为什么和我谈死亡的危险，你们不是也经常面临着死亡吗？让我也跟你们一样生活吧，我不想死，我也尽力做到不死。但是，如果我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城市象污水坑一样，我生活在那里就感到痛苦以至病倒。但是你们的部队却恢复了我的健康。这是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情才平静，我的精神才振奋。”她还说：“你们的人民也是我们的人民，因为我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史沫特莱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胸襟来看待和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

究竟什么力量使史沫特莱嫉恶如仇、追求光明和奋不顾身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呢？她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她为什么不忘自己的阶级出身。她从不忘记她辛酸的童年

以及她难以忍受的逆境。这也是她为什么远离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来到陌生的中国，并把她的整个后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真正原因。当她预感到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时，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来。

史沫特莱认为，她在旧中国的一切行动中心，“在于要预告中国革命的发生”；她认为她自己全部历史的任务，在于挖掘和发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潜流”，并且观察这一潜流究竟要流向何处？经过十年的观察和深入调查，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他们队伍中忠诚的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到绝大部分的指战员，他们都是全人类中出现的新人，是在旧中国具有全新思想、在当今历史中具有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史沫特莱十分振奋地写道：“在他们身上，一个全新的成份进入了中国社会。”而且她还坚信，这不仅是中国的希望，而且这是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

正是基于这一远见卓识，她以惊人的毅力排除万难，致力于介绍中国。她在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数量约达二百万字。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史沫特莱对于她的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感到莫大的骄傲与欣慰，虽然她受着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但她仍把所得到的一切稿费和讲演费拿来救济中国战区和灾区的孤儿。就是晚

年在贫病交加、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她仍在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一罪名使她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她几乎没有栖身之地。到处都是关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或是“卖国贼”的传闻。所有这一切，使她不可能找到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剥夺了她集会、讲演甚至出书的权利。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曾经和她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的美国一家出版社，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意见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表现了宁死也不弯腰的革命精神。

但是，就在她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她从广播里听到了她曾经致力于奋斗的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她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给她来中国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多么遗憾啊，就在她在伦敦停留期间，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对于史沫特莱的逝世，中国人民是十分悲痛的，为了实现她生前的愿望，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元帅亲笔书写的金色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史沫特莱文集》。这套文集含有四卷，主要搜集了史沫特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中国的见闻，真实地记载了她在革命圣地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和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报道了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生动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此书自一九四三年在美国出版后，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

第二卷收有《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和《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两部著作。

《中国红军在前进》又名《中国红色风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人民为谋求统一团结、和平奋斗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同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奋起作战，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五年建军史诗。这部书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以后在西方连续再版。

《大地的女儿》是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生动翔实地描述了她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和父母的悲惨命运。最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参加了工人运动，变成了勇敢的革命者。又经过刻苦自学，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这部书是她来中国的前一年即一九二七年写成的，一九二九年初版，以后连续再版。

第三卷《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所走过

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这本传记著作具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逼真地记述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这本书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世界各地又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成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名著。

第四卷收有《中国在反击》(China Fights Back)和《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

《中国在反击》是一本日记体、书信体的书，记下了史沫特莱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到一九三八年抗战初在华北地区的生活和经历，她不畏艰险，深入前线和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书中主要反映了当时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该书一九三八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该书在一九三三年先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后又再版过。

《史沫特莱文集》除《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两书在国内出版过外，其他均为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次出版

时，对《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某些译文又作了润色和校订。

《史沫特莱文集》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这些记述了中国人民和其它被压迫人民历尽艰辛和英勇斗争的书，既是极好的纪念品，又是激励人民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坚决战斗的重大动力。重温她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切有志之士可以更好地学习她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学习她热爱人民、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学习她毕生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互助的高尚理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

史沫特莱和斯特朗、斯诺一样，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在黑暗的中国点燃起信息的火炬，而这火炬又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真正是国际新闻界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正如邓颖超同志一九八四年九月致三S研究会的信中所说的：“三S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三S从三十年代起就热爱中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断地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以及在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更加兴奋，不知疲劳地为新中国服务，直到他们的生命终止，还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多么感人，又激励我们热爱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的永恒动力啊！三S为中国各族人民所作的贡献是难能

可贵的，也是难以估量的。我们要向我们三S的老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他们学习！”

我们愿三S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愿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演奏出更加雄伟更加庄丽的《中国的战歌》！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中国在反击

献 给

我亲爱的兄弟和同志们——
八路军（红军）英勇牺牲的先烈
和不屈不挠的战士们

序 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这场战争是人类的五分之一为保卫民族独立——生命、自由和幸福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饥饿的、只有半半拉拉武装的中国农民，也同样是为了你和我，而站到了人类进步的前列，向那威胁着亚洲、美洲和世界和平的帝国主义发动进攻。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跟随中国的八路军辗转各个战场。八路军在这场战争中举足轻重，并不只是因为它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那支已经改编了的红军。改编这个事实表明了中国这十年来在相互交战的军队之间已出现重新和好，一致对外的新的团结局面。八路军之所以举足轻重，还因为它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创造出了某些战略战术，而中国其它方面的部队以及中国政

府，为了赢得胜利，也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些战略战术**。取得农民的紧密合作，迅速满足农民的要求、有效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以对付侵略者，这些都是中国在优势的日本武装力量面前而要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在结束这场长期战争之后，不仅能够从外国侵略者手里赢得独立而且也能赢得国内民主——即赢得统治自己国家权利的保证。

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地错综复杂的战争。中国人口众多，而绝大部分人口也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吃苦的农民。他们世世代代与自然奋力拚搏，才得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但是，亚洲土地上蔓延不断的荒沙，汹涌澎湃的洪水，年复一年地使千百万人于饥荒中丧生。只要那种原始落后的生产工具和陈旧过时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天，中国民众也就无法摆脱他们苦难的命运。广大的民众处于愚昧无知、迷信落后、耳目闭塞，与世隔绝的状态。地主、放高利贷者、大批贪官污吏以及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都在欺压劳苦群众，使他们处于愈来愈加悲惨的境地。

尽管来自工业化西方国家的影晌使古老的中国人向前飞跃了一个世纪，可是这同时却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剥削形式和新的希望。外国帝国主义还在威胁利诱，并以钱财和武力腐蚀要挟中国的统治者。为此，自太平天国至今，争取民族独立、社会变革的浪潮持续不断地席卷全国，日益深入人心。一九一一年，清王朝覆灭，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壮志已酬，扬眉吐气；可是，盗匪、内乱又随之而起，百姓叫苦连天。因此，在国民党、共产党的联合领导之下，各阶级的爱国运动，于一九二七年迅速地发展到整个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

新的政权。但是，十年的纷争和内战使这些新的希望遭到了破灭；与此同时，以上海银行家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镇压工、农组织，企图统治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向它发动进攻，于一九三一年侵占东北，进而渗入热河、察哈尔，并对南京的中国政府软硬兼施，使其处境消极被动。接着，日本进入中国长城界内，夺取古都北平，袭击华东大口岸上海，并向内部推进，攻下首都南京。无数老百姓，不堪日本人的烧杀奸淫，纷纷逃往内地——他们身在异乡，四顾茫然，无处为家。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空前的浩劫。然而，面对着这种侵略的压力，中国人民开始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并产生了一个民族的整体观念。蒋介石修路架桥，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中国的力量；这些工作如今都比以前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各省的地方部队。这些地方武装不讲纪律、贪赃枉法，跟打家劫舍的土匪相差无几。中央政府虽然建立起比较好的二十五个师的国民军；但是，跟现代化的日本武装力量相比，国民军的装备就显得太可怜了。有些省的地方领袖，他们手中也掌握着一些精锐部队——其中最著名的是桂系部队。这支部队曾在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山东战役中击败过日本军队。中国的士兵在白刃战中曾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淞沪之役，一个营一个营的战士宁肯壮烈牺牲而绝不离开阵地。这些壮举固然可歌可泣，但是，军人的职责并不只限于为国英勇捐躯，而是去夺取胜利。

处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立场成为促进中国团结的首要因素。而十年来，南京政府一直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进行内战。一九三一年，日军侵略满洲之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先呼吁停止内战。他们认识到日本侵略者是今后中国广大人民前进的主要敌人，也是他们国内和国际方面事业发展的主要威胁。他们最后从团结抗日的利益出发就在自己所控制的区域内采取了某些让步政策。他们还把红军置于政府的领导之下；当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就立即进入晋北，并在敌人的两翼和后方开展了运动战。

八路军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战术是它在十年内战中付出巨大代价学来的。八路军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游击战士；他们学会了怎样在农民的密切配合下，发动突然袭击，击溃敌人的优良装备。由于八路军自己非常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所以他们就能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给群众以希望，使群众学会保卫家乡的战斗方法。这就是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首要因素。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通过八路军在晋北最早进行的几次战斗中遇到的一些细节问题来介绍八路军的。这头几仗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也给中国各条战线提供了新战术。通过这部书，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中国农民的贫困、愚昧的程度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面对着那些早已领教过的军阀部队又是多么恐惧。我们还能够看到松松垮垮的地方军在向后方撤退的场面；但是这回他们比过去可大有进步了，因为他们好歹并不象过去打内战那样，谁打赢了就跟着谁跑了。我们在这部书中可以看到农民出身的八路军指战员又是多么勇敢、坚定，然而也还有不少地方表现出幼稚和无知。他们第一次碰到火车就大惊小怪，看到美国电影后便为之惊愕；他们把几万元日本纸币付之一炬，竟不懂得它们是能够当钱花

的。但是，他们却懂得一件事：即怎样去团结民众，反对日本侵略者。我们看到他们把民众组织起来，也看到由于农民的惧怕、省里官员们的妒嫉以及那些稀里糊涂的盟友利用八路军名义去解除其它政府军队的武装。他们的组织工作因而受到了阻挠。总之，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在中国农村里的众多混乱情景。尽管如此，但由于八路军对人民的极大耐心，对人民利益的忠心耿耿以及对忠实地保卫自己家乡的广大老百姓的高度信任，他们终于赢得了胜利。

本书堪称一部伟大的著作。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多年来倾注在中国普通民众身上的挚爱。她是一位终生不遗余力地支持着被压迫民族权利的美国作家，她曾为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事业奋斗了许多年，后来于一九二九年，以《法兰克福日报》——这是在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不过，从她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她就为中国的被压迫阶级义务工作，这比她花在自己职业上的时间还要多。

她在中国和孙中山夫人一起为争取民权、争取工人、农民、共产党人的权利而努力，许多年中间，她几乎是上海唯一的一个能听到中国苏维埃内部情况的外国人。因此，她才写下了《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这两部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它们在当年被看做几乎是唯一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国外报道。报道里面的材料是由那些被悬赏通缉的人士通常在晚间偷偷地送给她的。她自己也经常身居险境。由于她和中国红军关系密切，所以她一直受到监视，而苏区之行也因此多年未能实现。

最后，当她一旦有了机会进入中国苏区时，她就抛下一切，毅然前往。异日能否返回，则毫不介意。日本、中国开战之时，她已是身临其境了。在那里，她毫不吝惜自己，虽然病魔缠身，仍然决定跟随已经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部队走上前线。本书中辑录的日记、信件就是作者在前线各地行军途中，忍饥挨冻和不顾背伤的折磨而匆匆写就的。不过，她总是那样一贯尽心竭力地为八路军工作，而常常顾不上自己的写作。当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汉口最后见到她时，她正在日夜为中国北方农村的民兵筹款购买药品和棉衣，却没有时间去完成应写的那几十篇文章。

中国的局势发展迅速，没有哪本书能及时反映它的变化。战争所要严峻考验的已经不再是书本中所讥讽的那些旧式的地方军阀的武装了。一切中国军队的整编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也正在被其他部队所采用。由于八路军驻汉口代表、自二月份以来又担任全国军事委员会“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大力协助，组织农民的工作也在所有的战场上开展起来。八路军精心发明的运动战与作者认为尚未完全过时的出色的阵地战已经结合了起来，从而产生了人们所称的“弹性战”，即在运动中袭击摧毁敌人的交通线，以大举进攻来消灭敌人。这种结合的过程进展得如此迅速，这在华北——实际上在所有中国各个战场上，都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

自序

(转录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一封信代序)

我将陆续给你们寄稿子。不过，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写东西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的背痛得很厉害，我得忍着疼痛工作。况且，我们从来也不在一个地方驻扎两天以上，部队总是在流动之中。一整天我不是走路就是骑马，到了晚上，又得开始工作。如果部队要是在一个地方只呆一天或一个晚上，那么，我常常就要通宵达旦地写东西，根本顾不上把稿子润色一下。我疲劳不堪、疼痛难忍，实在无力把稿子用打字机重打一遍，有时候，甚至连错处也顾不上改正。所以，请帮我把文字修改一下，把稿子重打一遍，把重复累赘的地方删掉，作些必要的编辑加工，再把稿子卖给无论是哪家杂志社，然后再用部分稿酬付给打字费。如果我的身体好了起来，并能在一个地方多呆

些时间的话，那么，我自己也是可以做些编辑加工的。

在我们现在通过的这个地区，甚至连普通质量粗劣的纸张都买不到。这一带没有铁钉、没有食油和猪油，没有盐巴，也没有烧柴。我以后在隆冬腊月中写稿子也不会有火取暖。甚至（这还用得着告诉你们吗？）连吃的也都不够。即使现在是秋天，我们吃的主食不是大米就是小米，外加一样菜。今天，我们吃的是胡萝卜，昨天吃的也是胡萝卜。有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菜吃。这一带来了许多队伍，所以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还缺少。糖，压根儿没有。

我所在的部队以及其它中国部队的困难处境是你无法想象的，日本人有卡车、飞机和别的高效能的运输工具。而我们只有毛驴、马匹，几头骡子和人员。我们所有的指战员几乎都是靠两条腿走路。我们没有机械化部队！

我有一匹马和一头骡子帮我们驮东西。我们一行中，除我自己外，还有另外两名记者和三名警卫员。但我们很多人自己的东西都得自己背着。因此，我不但要背着自己的公文包、照相胶卷，还得把打字机用绳子捆好背在身上。万一我的马和骡死掉的话，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身上带着不到一百元的中国钱，这还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的，而大部分都是用来天天给马、骡买饲料的。每周两次，我们一行要买只鸡改善一下伙食。跟我一起的其他同伴则身无分文。有了这些借来的钱，我也算得上是部队里的最大富翁了。不过，我必须用这钱去喂我那两只宝贝牲口，以便帮我们驮行李、打字纸、胶卷、打字带。我有一套军装、一件棉大衣和几件冬天穿的内衣。我有两双鞋子。跟我一起的其他几个人都只有穿在脚上的那双鞋，而

且已经开始破口了。我不知道在哪儿能买到新鞋子。部队里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穿袜子。

我向你们谈到的所有这一切情况，毫无抱怨诉苦之意。相反，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希罕那个“文明”所能给予我的一切。我喜欢工作，喜欢拖着这受伤的脊骨骑着马辗转在各条战线上。而我这背伤，即使卧床休息也得六个月才能痊愈。可是，我喜欢这样下去。我所担心的只是我的伤痛会影响我的工作，而且也已经影响我了。所以，我恳求你们帮我把我的手稿整理一下——不过，请你们也别把它改得“文绉绉的”。

目 录

DD 64/13

序言

自序

- 一、从延安到西安…………… (1)
- 二、从西安到前线…………… (34)
- 三、跟朱德的流动司令部在一起…………… (61)
- 四、战斗在敌后…………… (102)
- 五、和八路军总部人员在一起…………… (127)
- 六、战况、新闻、采访、炮击…………… (177)
- 七、一次喘息和一次转移…………… (197)
- 八、新的一年开始…………… (230)

一、从延安到西安

陕西 延安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当你收到我这篇通讯的时候，我已经跟正在中国西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原中国红军）在一起了。再过几个月，主要的战事将在这一带地方以及绥远省和察哈尔省进行，因为日本人早就打算在这里设置封锁线，以便在中国和苏俄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他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邻近热河的察哈尔省，并且继续向绥远省纵深推进。他们使用了自己的兵力和一些“满洲国”的伪军来参加战斗，但主力还是华北和西北一带的蒙古族人和汉族人的土匪武装。

在这篇通讯还没有到达你手中之前，你就会听到日本人在沿北平到张家口和归化铁路线上所发动的新的、强大的进攻遭受到重创的消息。在长城的南口，日本人最近已伤亡五千之众。这一胜利是在延安这里

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的。在延安，所有重大事件都会在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予以宣布。天津和北平失守时，这里也召开了大会，让大家知道这一失败的消息。延安每天都有“号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里“人民大学”的学生，捧着自已绘制的中国地图，与农民们坐在一起谈着，讲着。这里的很多农民并不知道北平、天津、上海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回事。自从八路军在西北这一大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以后，他们便对农民不断地进行教育。

每天晚上，成群的男女都拥在这儿的广播站里，静静地收听着来自南京、上海和其它地方的消息。对于胜利的喜讯，他们并不大喊大叫或欣喜若狂，而是细心地、不间断地听下去，接着就进行深入地讨论。

数周之前，当日本人袭击北平附近的卢沟桥时，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主要演讲人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家要时刻作好奔赴前线的准备。要求上前线的人特别多，而如愿以偿的并不很多，因为后方还有工作要做，总得有人留下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学里各式各样的学生以及其它方面持有各种信仰和观点的人们，都在走向前线，并且也都是抗日军队的某个部门里工作着。在这里，民族战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现实。

作为一名记者，我将跟他们一起上前线去。不过，由于我的脊梁骨受了伤，我得坐着担架去。六个星期之前，我的马跌倒了，它从我的身上踩了过去。大家希望我的脊骨能够在途中好起来，但在尚未痊愈之前，我就只好在担架上写我的战场报道了。这里没有X光机，也没有透热器械来检查或治疗这种伤

痛。我们都希望在行军途中能够找到一个治病的地方。由于这里连石膏绷带也无法做，我的伤势在这里是不可能好起来的，所以，我才坐着担架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了。这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即便是个最弱者也能为它作一点点工作，或者能在某个地方，在某个时候为它出一把力。

我们在绥远和察哈尔将怎么打仗呢？要寻求这个答案，请看一看记者对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访问报道。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两次谈话。一次是去年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另一次是今年年初和我的谈话。过去的红军，如今与国民革命军联合后改称八路军的这支部队，在跟比自己力量强大百倍的敌人进行战斗中，经受了十年战术上的锻炼。它决不只打阵地战。它有每天行军二百里的本领——相当于七十英里——也许是世界上行动最快的部队。它的战士都是一向惯于吃大苦、耐大劳的工人和农民。八路军在政治上也训练有素，它坚强、团结、遵守纪律。我相信，它是一支不可摧毁的部队。从前线的战士到后方的小鬼，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理解到他是在为谁打仗，他为什么要打仗。

我的小鬼就是个典型（他看来几乎象我的儿子）。他大约有十二岁，是四川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我那两名警卫员也都是来自四川的农民。每天他们都去上政治课和文化课。当我刚决定要随部队上前线时，我问过两名警卫员是不是也愿意去。他们高兴极了。至于我的那个小鬼，我认为他可以不必去了，况且在目前这种条件下他去也没有什么要干的。这位农民出身的孩子却人小志大。他在苦水中泡大，参加过红军的“长征”，多次在枪林弹雨和炮火纷飞之中出生入死。于是我忍痛

决定把他留在延安。这个决定真的伤透了我的心。他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面前，两只眼盯着我，坚决要求去上前线。他的面孔和神态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智慧远非出自一个象他那么小小年纪的孩子。

我没有答应他，就这样整整拖了一个星期。他却象一头受了伤的动物，坐卧不安。最后，我让他去找一位主要的领导人。他象一个成年人那样前去找领导，提出他的理由，获得了领导批准。所以，他也将和我一起上前线了。我们将合骑我的那匹马，等到我们从日本人手中再缴获了马匹之后，我们两人就都有马骑了。由于我开始一段时间要坐担架，所以基本上马归他来骑。这下可乐坏了他。他很喜欢我这匹漂亮的小马，这匹马还是贺龙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缴获的呢。

这一来，我和我的“儿子”，还有那忠心耿耿的警卫员可能会在一起挨炸弹了。

我们和战地服务团的三十个人（二十六个男的，四个女的）一起行动。著名女作家丁玲是这个团的组织者。我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演剧队，由来自北平的年轻女演员吴光伟（译音）负责。她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演员。整个冬天，她都在延安演出并且还在大学里学习。战地服务团里也有几名记者、几名宣传员和一位短篇小说作家。

服务团就象是一支飞行宣传队，当部队一停下来，他们就要在营地、村头、镇上或在其它部队驻地演出。服务团还要深入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发动他们起来战斗。在那里，他们还要演节目、作演讲、收集素材、撰写报道。服务团在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忙到半夜。如果我的背伤还不好转的话，以后大部分时

间我都会跟服务团在一起活动。我要到处去发掘新闻，寻找事实。

演剧队夜以继日地在进行排练。他们准备好了六个剧目，而丁玲和其他两位却还在搞新的创作。现成的剧目已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这两个剧是写东北的事情；《森林哨声》写的是东北义勇军的事；《女侦察员》讲的是一位爱国女子化装成间谍，最后干掉一个大汉奸的故事；哑剧《最后的微笑》，写的是农民抗日的故事，还有以高尔基《母亲》为主题改编的一个关于北平附近卢沟桥战斗的节目。

演剧队还在想方设法挖掘新颖的主题，以便更能受到群众的欢迎。我建议搞些集体朗诵或大合唱，遗憾的是谁也没有本子，而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兰斯顿·休斯^①写的“在‘斯科茨博罗’列车上。”^②不过，我们身临前线，而且还有前方的战斗；这些都将激发服务团，使它产生很多新的创作。在行军途中，我们还要出版一份叫《前线》的小报。

八路军的每个单位都设有政治部，下属戏剧小组、宣传员和组织员。因此，我们这个战地服务团不过只是这许多同类小组织当中的一个罢了。八路军本身实际上就是一支进行战斗、组织、宣传、写作、演讲和动员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庞大的队伍。

陕西 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

部队已经上前线了。我却因背伤依然躺在延安的土炕上。

① 美国诗人和作家。——译注

② 指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黑人遭受迫害的事件。——译注

我早就盼望能到西安的医院作一次X光透视，认真治疗一番。即便我能经得起路途的艰辛，但眼下秋雨连绵，我也无法成行。

自六月至今，雨水不曾断过。有时倾盆而来，哗哗啦啦，有时则一连数周不绝如缕，凄凄惨惨。现在正是收割季节，如果雨水不能很快停下来的话，整个庄稼都会完蛋，我们也将遭受又一次饿殍遍野的大饥荒，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的。这一带的大小河流全都注入那条老百姓恰当地把它叫做“中国的祸害”的黄河中去。此地周围全是肥沃的黄土，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木。黄土松散异常，稍遇雨水，就会被冲走。因此，河水上涨时水色浑黄，含沙量极大。它们日夜不息地把黄土冲进河中，注入大海，要不然就是洪水泛滥，使几百万中国人丧生或失去家园。

说起黄土高原来，我真可以写出一部书！谁要是没有亲眼见过，确是无法相信。黄土的土质疏松，渗水性强，里面找不到一颗石子，一根骨头或一粒贝壳。对黄土高原地貌的形成，科学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但一般认为这里的土壤是从中亚和现在叫做戈壁沙漠那一带地方刮来的。几千年前，中亚地区和戈壁滩日渐干涸，大风把干萎的植物和表土刮到了中国的大西北。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岁月，中亚地区的表层土壤就逐渐在中国的大西北形成了黄土高原。今天，华北地区还同样地在遭受着来自戈壁沙漠的狂风侵袭。戈壁的表土早已刮光，狂风夹带来的就只有砂石了。黄土高原的土质细而松软，厚达几百英尺，常常整个一座一座的山岭都是由这种黄土积起来的。

对黄土进行一番科学研究倒是饶有趣味的事，但是，碰到

雨季要是住在黄土高原上，那就兴味索然了。雨水很容易渗进黄土，引起大量沉陷。成片成片的山坡一旦崩塌，就会陷入山谷、掩埋道路和房舍，把一切都埋到泥水里去。大量路基倾塌，整个山体崩溃，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我住的就是一眼黄土窑洞，水从洞顶上渗了进来，把洞里样样东西都搞得湿漉漉的，洞顶、洞壁也慢慢地向下剥落，常常搞得我满嘴都是黄土。此刻，我躺在床上，聆听洞外日夜不息的雨声和山谷里河流汹涌的咆哮声。我眺望山谷对面的丘陵，只见大部分已经陷入山谷和河道，连沿途的房舍也一起遭了殃。满耳的喧闹声，使我心烦意乱。透过窑洞的窗口，我看到外面菜园的围墙已经倒在地上，马棚也摇摇欲坠。塌下来的断墙压坏了我的菜地和花木。山崖谷底，阴云密布，时而还有朵朵浮云从我的窗外飘过。中国真是多灾多难——洪水、饥荒、旱灾和战争！老百姓饥寒交迫、愁苦难言。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他们尚且不得温饱，一旦战争爆发，何堪想象？！有钱人家也许遭不了多大罪，可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五是穷人。他们就会大祸临头，家破人亡了。

陕西 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

我此刻是在前往西安的途中。十天之前我离开延安，打算到西安的医院里治我的脊骨病。这些天来，我以各种方式赶路，又躺担架，又骑马，或者让人背着走。有时，我自己也走路。我还坐了一阵子卡车，赶了九十里路（三十英里）。我的

脊背比离开延安时痛得更加厉害了，可是现在离西安还挺远呢。今天，我从路过这里北上的人们那里听说，由于雨水过多，前面的河水都涨了。平时从西安到这里坐卡车一般只要四个小时，可他们却走了整整三天。

我本该从这里乘卡车去西安，可是道路崎岖不平，我怕经受不住这三日之苦，即使是一整天的颠簸我也够呛。我必须留在这里几天，等西安的朋友们为我搞到了入城证以后我才能动身。共产党的代表早已参加了南京中央政府的总参谋部，而象我这样一个非党人士，反而连中央政府的地区也还不让进去。此事说来可笑，却是一点不假。我坐卧不宁，担心的是自己的背伤可能根本得不到治疗，而被迫再度长途跋涉，返回延安。

离开延安时，我倒是兴致勃勃，曾打算每天写日记寄到国外去，让读者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形势、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中国军队为什么必须与日本现代化战争机器作战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但是，连日来一到晚上，我精疲力竭、背痛难熬，无法提笔，也无法休息。有无数个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由于神经紧张而通宵不寐。我自己带有安眠药，即便吃下几颗也只能勉强地睡上两、三个小时罢了。

我永远也难以忘却我离开延安的第一天。那一天，我们刚走了大约三十里路，就听说前面的道路一团糟，牲口也很难走过去。或许人还能凑合过得去，但是马匹、驮骡就很成问题了。于是，我们一行分成两组。二十来个人步行前进，驮东西的牲口和躺在担架上的我，则改走山上的羊肠小道。从山崖上走了四、五个小时之后，我躺在担架上抬头四下张望，峰峦连绵，点缀着火红的红叶。我们走过的地方到处都是灌木丛生，鲜花

盛开——有圆叶风铃草、白雏菊以及各种各样黄色和紫色的野花。

我们在途中只碰到过一处简陋的泥草棚，里面住着两个农民，他们卖给我们一堆小甜瓜。这就是我们离开延安后唯一能够吃得到的东西。从延安出发时，我本来还带着一些食物，准备给警卫员和小鬼吃的，可是，驮东西的骡子却走在我们前头老远老远的地方。给我抬担架的人也没有东西可吃。他们翻山越岭，累得气喘吁吁，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根本不习惯让别人抬着我走路。

有一次，我把眼光从远处移到担架边上，才发现身子底下竟是万丈深渊，峭壁巉岩。我赶快把头转了过去。谁料到另一边也是山势陡起，深不可测。走在这样的险地，我觉得似凌空而起，头晕目眩。亏得身前身后走着两位抬担架的人，这才使我意识到下面还有一条土路。我合上了双眼在等待着，过了一会，当我们开始下坡时，我才能重新睁开两眼，向着后面瞭望。

我们穿过了两条深谷。它们中间只有大约二英尺宽的羊肠小道。一场大雨就会把这条三百英尺长的小道全部冲垮，而两条深谷也就会并成一条了。

再往前走了一阵，我们碰到转回来的人、马和驮骡。他们在途中遇到了塌方，无法继续行进。那批人视察了地形之后，决定从山腰直往下插再回到大路上去。山坡这么陡，我坐在担架上无法被抬着朝下走。马和骡子都是半蹲着顺着坡往下滑了几百英尺，还不时让树枝、草丛给绊住。警卫员和一位抬担架的从两边扶着我，我把胳膊搭在他们的肩上。就这样，我们三

个人跟着牲口往下滑行。在穿越突兀的山脊和水深及腰的泥坑时，我几乎是被他俩架着过去的。最后，我们总算走上了大路，那一大帮早已累得筋疲力尽的人、畜正好也在路边歇息着。

此时已是午后三点左右，但大家都还没有吃过东西。抬担架的人说他们空着肚子，有气无力，抬不动了。于是，我把带来的食物就统统分给了他们，小息一阵之后我们便又上路了。不过，抬担架的人实在太疲累了，他们无力再抬着我向前走去。因此，我试着步行了一阵，然后又骑了一阵马，以便让他们稍事休息。

在我们前面突然呈现了另外一种使我终身难忘的情景：整个山坡倾塌了下来，带着大量的泥土、树木、杂草都一起滑进了山沟；堆在大路上的碎石泥土足有十至三十英尺高，宽度达数百英尺。在我们还没有到达此地之前，有两头骡子试图翻越这堆崩塌下来的泥石，不多时，就陷入齐脖深的泥浆中窒息而死。

可是，我们必须翻越过去。首先，我们从马背和骡背上把东西卸了下来，然后再把重家伙从塌方顶上搬过去。之后，我们沿着最容易下脚的地方再把牲口赶过去。它们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看起来真叫人提心吊胆。我们冲着它们吆喝，在够得着的时候，就用鞭子抽打。当它们陷进泥浆动弹不得时，我们就用长竹竿杵它们。马匹和骡子就这样拼死拼活地挣扎着前进。我惊讶地发现牲口是那样精灵，它们会找到最安全的落脚点，在仔细打量一番之后，就鼓足力气向前闯了过去。一旦陷进泥里，它们静静地呆着，稍隔片刻，忽又挺起身子，一跃而起。在越过了这要命的泥沼之后，都累得站在那边直喘

气。

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我越过那样的地方。所以，我由警卫员和担架员扶着，爬上山坡，从上面绕过这样的大堆塌方。然后，我们再把东西重新驮上牲口，继续前进。谁知前面又碰到了一处塌方。就这样，我们走了不过十来里路，而遇到象这样的塌方竟有六堆之多，而且似乎是一堆比另一堆更糟。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说，“根本没法走，没有路呀！”大家都站在那里，瞧着前面那一大堆烂泥。然后，大家又分头去观察地形。他们说，“长征时，我们走过的地方有的比这还要糟糕。这条路我们肯定也能过得去。”

我们确实走过来了。可是，每次我们总担心马匹和驮骡会陷进泥泞，死在那里或者腿部受伤，无法行进。有三匹马连马掌都走掉了。牲口疲累不堪。我的背部痛得相当厉害，每爬过一堆塌方，我总要在担架上躺一会儿，等着后面的人赶上来。有一次，一位担架员由于劳累和饥饿，突然病了。他就倒在路边湿淋淋的草地上。我赶快打开急救箱，给了他几片阿斯匹林想暂时止住他的头痛。此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在这条泥泞溜滑的路上吃力地走了好几个小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想，这样下去我大概要吃不消了，可是，我们却还照样前进。当我们越过第六堆塌方时，天色已近黄昏了。当地一位农民告诉我们说，前面就有好路走了。我骑的那匹马困乏不堪，走不动了，两个警卫员只好一个在前面拉着，另一个在后面用鞭子赶着。我们一个个又冷又饿，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疲惫不堪。我们路过几家农民住的土窝子，可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卖给我们的，连热水也没有。走在我们前面的那批

人，早就把这里的東西给买光了。

我们曾在一个地方向一位年迈的老农讨一点热水，可我们的话，他连一句也听不懂。山脚下，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过来，看样子是这位老农的儿子。他们身材粗短，发长及面。他们背着大捆柴草，腰弯得几乎使整个身子贴到了地面。他们从柴草底下抬起一张黑乎乎的脸，朝我们咧嘴笑着。看到了他们便使我想到过去读过或听说过的中世纪欧洲的农奴来。欧洲的农奴肯定也就是这个样子。这些农民与世隔绝，只会使用自己的方言。我猜想他们所掌握的词汇量最多也不会过百吧。他们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穿的是破布，睡的是土炕，吃的是猪食。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能买到的东西也只是一些干馍和西瓜。我们吃了这样一顿饭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我们又继续赶路。

上午，我躺在担架上依旧由别人抬着走了几个小时。云层正从深谷处慢慢向上腾起。我转眼看看山坡，生长在那里的每一株短树，每一棵青草上面都挂着蜘蛛网。有些网结成一大片，连一缕缕网丝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它们湿淋淋地已被周围浓厚的山雾裹着，但在绿色山景的衬托下，却显得格外干净、晶亮。倏忽间，朝阳冲出云层，山间顿时烟消雾散，蛛网也不知去向了。眼前遍山布满了各种花卉——圆叶风铃草、白色雏菊、紫色或黄色的小花，还有看起来跟美国野玫瑰差不多的那种花卉。这里的景色使我联想起美国西部的群山，只是没有那么多的峭壁罢了。这里的山全部都覆盖着松软、透水的黄土，很少有险峻的悬崖绝壁。

我们一整天就在这些山沟里行进。走了还不到几个小时，抬担架的人就再也没有力气抬着我走了，我只好下来骑着马走路。我们队伍中虽说一共有五位担架员轮流抬我，有时两位马夫也来帮忙，但由于没有更多的东西可吃，他们也都抬不动了。

傍晚，我们到达一个小镇过夜。我也开始了我一天的工作。有位担架员的脚部受了伤，他来到我跟前让我给他消毒、包扎。他走后，又来了一位担架员和马夫。他们不是这儿碰坏了，就是那儿受了伤。有一位的脚被割破了，疼痛难忍；另一位腿部正在化脓；还有一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我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之后，他们才走开了。

走在前头队伍里面的几个人又转了回来让我给他们看病。另外，在去延安的一批人里也有两位要我帮忙。他们不是头痛发高烧，就是闹痢疾。接着，又来了几位当地的老乡。其中一位抱来一个嚷嚷着头痛的娃娃，另一位是个淋病患者。一位八路军战士也来了，他是因蛀牙而引起的头痛。

天黑以前，竟有十五至二十来个人登门求医，我都打发走了；但对其余的五、六个病人，我说，我只不过能对付一般的小毛病，对于象牙痛、淋病之类的病，我则无能为力。我自己随身带着的是治痢疾和其它肠胃病的药品。但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当中虽然有几位知识分子，他们在离开延安之前，可谁也没有设法给自己带些药来。

从这个村子开始，我就每天照例要给我们的队伍和路上碰到的别的队伍里的人员以及当地的老乡们看病。每天傍晚队伍驻定之后，我就开始工作，常常要花一、两个小时。就这样，

我竟变成一名巡回医疗队队员了。有时，我躺在床上，由警卫员协助包扎跪在床沿上的伤脚。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得起身弯下腰去为他们包扎。由于背痛，我要继续干下去是有困难的。在一个村子里，一些患寄生虫病的农民前来找我看病。可是，我没有药。后来，我从一个比较大些的镇子上买了些药，寄给他们了。

在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农民孩子的脚伤势严重，而且已经开始了血中毒。我虽然不是医生，可是了解情况的危险性。我尽力为他消毒、包扎，并嘱咐他应该注意些什么，这才离开了他。可是，那天晚上我非常担心，后来一连好几天，我也一直在想着那个孩子血中毒的事。

有一次，我跟我的翻译谈起了我的心思，这却使我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翻译是个知识分子，在北平当过教师。我对他说：我担心那个孩子会血中毒而死，所以我真想能多给他一些帮助才是。不料，他却对我说：“同情老百姓管什么用。老百姓多着呢。”

“你是说我不应该帮助那个血中毒的孩子吗？”我问道。

他说：“那没有用。”

于是，我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我说，我给孩子看病只花了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可是我们每天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的时间比这要多得多。要我眼看着一个病成那样的孩子而不闻不问，这象什么话！我们是八路军的人员。这样一个军队和领导这样一个军队的共产党的力量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军力，主要是因为它们和老百姓之间有着紧密的、有机的联系。它们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办事。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可

能，我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老百姓。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应该做的是在老百姓身上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思。

我对此感到恼火的是，这位翻译的态度完全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那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我明白，我满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许许多多要做的事情；一头扎进去，什么也不必去管。但是使我惊愕的是在我们中间居然还能找到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可他自己呢，一路上也生过病，而且直截了当地向我要药吃。他那样做似乎觉得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要给贫苦的农民看病，他却认为是浪费时间！对于他这种态度我曾多次向他表示过反对。

跟八路军普通战士相比，一路上我可算是个老爷了。人们想尽办法，处处优待我。我有一副担架，五个人轮流着把我抬往西安。我有两个警卫员再加上一个小鬼。我还有一匹备用马，连我的翻译也有马。他的津贴也高于一般人。警卫员、担架员他们步行，我们骑马；他们吃硬馍冷水，我们吃热饭佳饈。所有这些优厚的待遇就意味着我担负的责任包括我的翻译的责任都要比他们重过百倍。这种不平等常常使我感到苦恼。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那时我是个有钱人身边的穷佣人。因此，在我心里，我总是把自己跟在我身边步行的那些人联系在一起。我有了钱，就跟他们分着花。我跟他们吃同样的东西，绝对不躲开他们独自一个人享受。难道这就意味着我是在滥用中产阶级的同情心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毫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让他去说吧。如果以为给工人、农民帮点忙就叫做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就让它永远如此吧。对我自己说来，离

开了他们，我是生活不下去的。

陕西 西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现在，我终于走完旅程的第一段而来到了西安！

沿途所见所闻使我了解到普通中国老百姓是愚昧到何等程度。他们连最普通的防病常识都不懂，因此，在中国农村必须有巡回医疗队和卫生人员。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曾在其控制的区域里开展过广泛的卫生保健运动。西北地区现在也已经有了许多医院。但是，一离开红区，就好象是掉在一口大黑井里。譬如，我想在一个村子里买点干馍，可是那些干馍上面却叮满了苍蝇。店主走了过来把苍蝇统统轰走了。我发现面团里早已沾着苍蝇，并且已经和馍馍蒸在一起了。我对店主说，我不想买他那苍蝇叮过的馍馍。一听此话，店主人捧腹大笑。他回过头去把里面几个人都喊了出来，并对他们说我要买的是没有苍蝇叮过的馍！他们一听全都笑开了。我再一次感到自己是回到了中世纪时代。我想，这也许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听说还会有人不要苍蝇叮过的馍吧。我是个外国人，所以，他们觉得我的行动是出于洋人的怪癖，跟他们或一般中国人倒是毫不相干的。在延安，商人则必须在食物上面盖上食品罩。红军上街巡逻，是要监督他们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的。就这样，延安的人懂得了很多东西，而别的地方的人仍旧是老样子。

我就这样继续向前走着，间或步行，间或骑马，穿过了整个的中世纪。我们走出山谷后就进入了高原。那里使我想起来

国西南部宽敞的台地，极目四望，高原之颠大部分早已被雨水冲刷得光秃秃的。不过，这和美国西部情况还有所不同，这里的山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梯田，而且大多数梯田里都已种上了庄稼。可有时候我们走了整整一天，却连梯田的影子也见不到。它们都已被大雨冲垮，野草丛生，荒芜久矣。

整个农村凄凄凉凉，人烟稀少。偶尔我们碰上一座小村落，里面也仅仅是几间土房和一些衣不蔽体的农民。此景此情使我回想起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间中国西北地区的大饥荒，饿死了九百万人。其中就有不少人是死在这一带地方的。此外，这一带还经常发生回民起义和侵扰。而且，几十年来，中国的军阀到处鱼肉百姓，官吏们横征暴敛，真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军人们在各地横行。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梅毒带到哪里，生下来的孩子也难养活。在西北一些地方，人们很难看到十岁以下的儿童。这是在中央政府下面已经改组的西北特区新政权，即从前的苏维埃地区的政权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里的医院正在给梅毒男女患者加紧治疗。要防止梅毒传染给八路军则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凡有梅毒的人是不能参军的。八路军一旦发现梅毒患者，就必须实行隔离，并认真给予治疗。所以，八路军是干干净净的。何况，由于八路军基本上是一支禁欲主义者的队伍，梅毒传染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八路军纪律严明，侮辱妇女是一桩最坏的行为，要受到严厉惩处。

在我进入西北，甚至是走在这条通往西安的大道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捉摸：八路军战士们甚至连细菌是什么也还不懂，那

为什么各种病菌没有传播到八路军里面呢。我常常看到，在路边的一些小吃摊上，侍者用又黑又脏的抹布擦筷子。接着又用它擦碗，又擦脸上的汗珠。擦桌子还是要用它。这块抹布肯定是沾满了亚洲各种各样的病菌了。但是，战士们拿起用这块抹布擦过的筷子吃饭，连洗也不洗一下。每逢开饭，我都要从警卫员那里拿出自备的筷子，用开水在上面冲一遍。战士们对此都感到纳闷。可我没法给他们解释什么是细菌。即使我讲了，也拿不出证明来。当然，他们会客客气气地听我讲，但在他们之间总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古怪。

在我躺在担架上赶路的途中，脑海里总是盘旋着这些事，往往思绪万千。譬如，我捉摸着怎样才可能防止西北地区这一带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被黄河冲刷而流失到大海里去；用什么办法能够防洪排涝。我还想到了西北地区大面积的果园和松树林。啊，我还想到了在封建主义消灭、民主建立以后还得一百多年才能实现的那些事情。在我周围，老百姓衣衫褴褛，满身污垢，难以名状，而我们自己的战士也吃的是硬干馍，喝的是生水，偶尔才能吃到少许蔬菜。他们夜里经常席地而卧，下面只是垫着一件布衣，上面什么盖的都没有。他们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整年饥肠辘辘，他们对于吃饱肚子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或者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得而知。中国的老百姓是什么都需要——粮食、房屋、教育和医疗。国家也是什么都需要——人们能够想到的一切东西。

晚上，我们若是在老乡家里过夜的话，警卫员和小鬼总是睡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或木板上。有时，没有房子给我们过夜，我们就睡在马棚旁边的小窝子里。晚上，狗叫马闹，而我旁边

却是鼾声如雷，我常常难以入睡。

有一天晚上，我和警卫员、担架员，还有马夫，大家都睡在马棚的门口。我睡的是自己的折叠帆布床，一个警卫员睡在担架上，其它人就睡在我们两边的地面上。后来又有一次，我们也是这样过的夜。当时还有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也是席地而睡。我觉得又累又痛、神经紧张，好几个小时都不能入眠。吃几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就又醒了过来，瞧着躺在我四周的那些人，只是一片黑乎乎的身影。

他们躺在那里，接连几个小时，却一动也不动。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大部分人在睡觉时都要来回翻身。我自己就是这样，睡觉时很不老实，走路也爱蹦蹦跳跳。但是，这些中国工农躺在那儿好几小时却安安静静、纹丝不动。有的整夜都是如此。我跟他们挤在一起已经睡过许多夜晚，却没有看到有谁翻过身。

我躺在那里，我瞧着他们，我心里不停地在想：在其它任何国家，我都不可能象在中国这样和男人们同吃同住而根本不用担心个人的安全问题。在这里，我感到比呆在西方国家紧锁着的屋子里还要安全得多。他们有的背着我蹚河，有的搀扶我下山。一路上，有的采些野花插到我的担架上，或者送给我看，有的走到担架旁帮我盖好被子。我要换着骑马时，他们就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放到马背上，以免再扭伤我的脊骨。他们有了一点点什么吃的，也总要给我尝尝。一名担架员买到了一颗石榴马上就给我送来。真是礼轻情意重。这颗石榴起码要花一角钱，这对他来说就是很了不起的一笔开支啊。我为此深深地感

动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能把递给我石榴的那两只手紧紧地握在我的手中。

晚上，我就和他们这些人躺在一起。我却从来也不曾体验过象这样一种不带个人成分的相互友爱和相互体贴。我也知道，如果我把这些情况讲给任何国家的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听，他们准会对我嗤之以鼻，冷冷地瞪着眼瞧我。他们之间准会叽叽喳喳地说：“她在跟一群苦力和马夫一起睡觉！”

不错，我是在跟苦力、马夫以及中国的劳工、农民一起睡觉。他们就躺在我的周围。我懂得，他们在保护着我，他们给我力量。对他们，我是永远信得过的。

我的一位警卫员是个四川青年农民。去年冬天他得了肺炎，晚上睡觉就不如其他人睡得那么踏实。他很是敏感，稍有响动，就会翻来覆去，睡不安宁。如果有马嘶、狗叫，他就会彻夜不能入睡，而别人可大不一样，睡在那里象是“放在久已死去的一个死人身上的一块石头，”那般模样。

这个警卫员确实不适合上前方去。整整一个冬天，我一直护理着他，照顾着他。我渐渐地觉得他跟我那“小鬼”同样讨人喜欢。我们三个人关系很是密切。相形之下，另一位警卫员却不知怎的，关系要疏远一些。至于那位翻译，就更加疏远了。我们三人之间就象是一个姐姐加上两个弟弟，因此，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

我们一离开延安，我那“小鬼”就象是一只出笼的小鸟。虽然他过去生活艰苦，但身体还算壮实。几个月来他休息得好，也吃得好，体力得到了恢复。现在，他身体可棒了。从延安出发那天，他把那件红色的卫生衫、手电筒还有绑腿往我的担架

上一扔，就一溜烟地跑开了。

有时候，我看见他走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好象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就要到达西安似的。有时候，我却看不见他。突然间，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手里捧着一大把鲜花给我。对那些无论是走在我们前面还是走在我们后面的队伍，他都要打听一番。一路上，他也要到处看看。有一次，当我们抵达同铺（音译）这个不算太小的镇子时，我想起了“小鬼”还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呢。暮色降临，我倒为他担心，我不住地打听着他回来没有。最后，他拖着疲乏的身子终于回到了队伍。

事实是，他到达同铺的时间比我们大伙要早得多。因此他便一个人到戏院看热闹去了。警卫员们当然批评了他，一来他不叫大伙省心，二来大伙认为他不怎么太顶用。不过，他毕竟是个孩子，偶尔能去玩一趟，我也替他高兴。我在揣想，他将来会长成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喜欢开阔的大路和到陌生的地方去。这些年来，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肯定他会在军队里长大成人，一辈子除了打仗而外，可能其它啥也不懂。只要我在八路军里呆一天，我就要设法让他跟我在一起，尽力关照他。有时候，我要想走路时，他就会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一起走，那位警卫员也会走上前搀着我的胳膊，半扶着我。我们就是这样一块向前走着。他们教我说四川话，这跟北京话差别很大。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四川话或北方话来聊家常或讨论问题了。

在离开延安的第十天，我们到达三原这个大城镇。从这里坐卡车四小时即可进入西安城。三原由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师守卫。我们在我军司令部的一个干净的大屋子里过夜。警卫员和翻译睡炕上，我自己则跟往常一样在屋角支起行军床。我们

在这里度过了两个夜晚。

到三原的第二天，我即拜访在当地传教的英国牧师，还买了些驱虫药捐给前几天在路途上遇到的那几位老乡。贝尔先生夫妇异常热情好客，我在他们那里呆了半天，并跟他们一起用了午餐。贝尔先生的思想非常开朗，对共产党也非常友好。他说，八路军是他在陕西所见到的最好的一支军队，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

向贝尔夫妇告别时我答应他们说，如果第二天不去西安的话，我一定再去看望他们。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出发了。

那天是九月十八日，是日本入侵满洲的六周年。我们的卡车只好等在三原，以便让第十七师的几千名战士们开过去以后再走。战士们是前往参加九·一八的群众大会的。他们全副武装，向前迈进，炮车上拖着一门大炮。他们的红、蓝两色的旗帜在阳光下迎风飘扬。后来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最偏僻的小山村里，群众也在举行大会。手持梭标的农民和军人一起列队站在会场里。

到西安后，我住进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教会医院的塔特大夫和梅杰小姐给我的背作了一次X光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我没有骨折，只是肌肉严重扭伤和一根骨头的骨膜受到破损。所有在西安这家医院里工作的英国医生和护士那天上午都来看我，请我喝茶，还跟我一起谈了谈延安、陕北以及其它地区的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情况。他们还问到了教会在陕北的房产。我告诉他们，在那里的教会房产完好无损，连挂在墙上的画都依然如故。

今天，日本飞机正向西安飞来。一听到防空警报，我们都钻进地下室，警报解除后再出来办事。

在西安我无法镶牙。这里有一位中国牙科医生，如果你到他那儿去，他可以当场给你的任何一颗牙齿镶上金齿冠。至于那些蛀坏腐朽部位，他却连清理一下都不管。他是专门镶金牙的，其余则一概不管。

我希望最迟能在两个星期内动身上前线去。陕西省政府已经给我发了特殊签证。有了它，我可以走到西北任何地方去，也可以长期居留西安。

我想，如果我遵照医院的治疗安排，那么在这里调养两个星期也满够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可以躺在办事处里。这个地方很大，每间屋子都住满了男男女女。由南京和苏州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很多就住在这里，准备转往陕北。每天，都有一部分人从这里出发。

由于我和这场斗争距离太近了，所以我想自己也许对其重大意义反而会认识不足。我们所在的办事处干净整洁，住着许多爱国人士，充满着爱国的事迹，它是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地方。这里住着一百多名获释的政治犯，还有从各地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这里的一架收音机整天响着。就在我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还听到外面正播放着南京的新闻广播。由于日本人进行电波干扰，人们很难听清楚广播的内容。一旦我们从南京台新闻节目的频率上拨开，就可以清晰地听到日本人从北平播出的新闻、音乐，或是听到上海夜总会“送你一朵兰花”那样令人作呕的乐曲。处在死亡和破坏之中的上海却竟然出现了一支兰花！先生献给女郎的并不是一枚杀

敌雪耻的炸弹，而是一朵温情脉脉的兰花！

西安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警卫员和小鬼在西安城中的一些故事。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他们四个小伙子花了不少时间对西安这个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真实的大都市的现代文明和新奇事物进行了一番研究。这四个小伙子中间，除我的“小鬼”和我的四川籍卫士外，还有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江西籍警卫（他担任最近刚来到西安的我的一位外国妇女朋友的警卫）和另一名给那位同我一起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中国妇女当警卫的四川青年。这些年轻的农民跟着红军走过了万里征途，他们跋山涉水，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西康“草地”。很多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当我们进入西安，碰上现代世界的真实情景时，这四位老战士却是眼花缭乱，惊愕和欣喜不已。

首先碰到的是各种卡车。当然，他们是见过从外地到延安的卡车的，不过，他们从来却没有乘坐过卡车。有一次，在我们离开延安的那漫长而又乏人的旅途中，一队卡车把我们带了大约三十英里的路程。我的两名警卫员就坐在发动机旁边，他们用手死死地抓住卡车，张望车外至少以时速十英里的速度向后闪了过去的景物。他们相互看看对方，咧嘴笑着。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乘坐卡车，兴致勃勃，激动不已。等车子开到一个村口停下来以后，他们轮流坐在方向盘后面，把它好好抚摸了

一番。

是的，他们很快就看惯了卡车。后来，他们即使是坐在司机旁边再看到来来往往的摩托车、私人小卧车也就不象当初那样大惊小怪了。只是在我们到达西安后，他们才真正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其实，西安也算不上是个象样的都会。那些两、三层高的店铺里堆满了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的商品。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么说过：“日本货质次价廉，中国货质次而贵。”可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二十五万人口、商店破破烂烂的西安城，在这些小家伙眼里却算得上是个充满新奇的大都会了。

当我们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时，我已精疲力竭，所以很快就跑进自己的屋子里躺下去休息了。突然，房门口站满了人——他们不是来看我的。他们象蜜蜂般地熙熙攘攘，把门边那个电灯开关围了起来。他们挨个儿把那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就这样，每人试了好几次。每次当一个人打开开关，抬头瞧那吊在天花板上的灯泡时，下一个就会迫不及待地推开他的手，自己试了起来。

当小伙子们习惯了电灯以后，也觉得没啥稀罕了。过了不久，他们也就跟使电灯的老用户一样，随手开灯，随手关灯了。他们不喜欢有人注意他们的这些动作，不愿意让人家看作乡巴佬。他们觉得延安已经把他们变得“高明”起来了。刚到延安时，别人就说过他们是乡巴佬。在共产党到达之前，延安是个不足一千人的冷落小镇。一条大街两旁只有些低矮的店铺。即便如此，对红军小战士来说，延安已经算是个偌大的镇子了。那里的商人可以把他们哄骗得一愣一愣的。那种经历使他们受到了不少的教训。因此，这回他们来到西安就要精明多了。

他们在西安的所见所闻我并不完全清楚。刚到西安的头几天，他们一出去就是好几个小时，从城的这头走到城的那头。可是我知道，有一回警卫员买了一只小皮包，洋洋得意地返回住地。谁料小鬼第二天上街只花了一半的价钱就买到一只质量相同而且还要大些的皮包。这件事叫警卫出了丑，为此，他和小鬼吵了一架。可是过了两天，他和小鬼一起出外时，他第一个看到了火车，这下可给他争回了点面子。不过，他们俩为此又吵了一架，把那小鬼急得直奔火车站去。到了车站，小鬼却不懂得要先买站台票。列车员不让他进站看火车。再过了几天之后，小鬼才真的看到了火车。不过每想到进不了站台的事，他心里免不了要不大痛快。

有一回，当我们一起上街时，正走着，那两个小伙子停步不前，指着一家现代化的理发馆让我看。他们以为我过去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理发馆。在八路军里，理发师都是自己带着理发工具在部队里流动干活的。

又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西安一家现代化的旅馆看望我的一位外国来的女朋友。这家旅馆相当考究、地板擦得光亮，过道里摆着有护罩的家具，餐厅里有各色电灯、窗帘和雪白的台布，凡此等等，样样俱全。我那位朋友住的客房还带有浴室。小家伙们全都拥到浴室里去看那白磁砖、镀铬水龙头、玻璃和镜子。他们打开热水、冷水龙头，试了试洗脸盆，又冲了几次抽水马桶。最后，他们站在大镜子前面满意地把他们自己的模样看个不停。

他们后来又几次到那家旅馆去看浴室，直到完全明白为止。可是，有一样怪中之怪的东西他们却到底搞不清楚——电

影！在从延安来的路上，我试图向他们解释电影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不明白我的话。因此在我们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去看电影了。这一看使他们感到非常新鲜有趣。第二天早晨电影院还未开门，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等着开映了。他们晚上看的是部动物片。回到驻地后，那奇妙的镜头还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告诉我说看到了狮子、老虎、大象，还有看起来象人样的一个全身长毛的东西。虽然他们过去在旧画片上看见过老虎，但谁也没有真的见过这么多野兽。也许，他们在经过四川和西康时，曾经看到过老虎或豹子。不管怎么说，老虎那时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

他们可对电影入了迷。三天后，他们说要去看一部外国电影，并要我跟他们一起去。我跟他们去了。他们把我带到一家电影院，门口贴着一些华丽而又俗气的广告。当时正好上映“戴蒙德·吉姆”。一见到这个名字，我心里就凉了半截。谁知电影内容更加糟糕，从头至尾，我坐在那里丢尽了“面子”。小家伙们把电影里什么东西都说成是美国的。一开始上来的就是戴蒙德·吉姆，这位高大肥胖，挺胸凸肚的傢伙（就算是位“美国工人”吧），正脱下工作服，换上燕尾服。以后，电影里所有的男角色全穿的是这种服装。所以，小家伙们就认为燕尾服是美国的普通服装。戴蒙德·吉姆还给自己别上钻石钮扣、别针，戴上戒指。但是小家伙们不懂得钻石这个东西，所以也就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情节。影片中每一个妇女都穿着考究、华丽的长袍，因此，小家伙们就认定美国所有的人都是那个模样。影院里挂着不少巨大的枝形吊灯，四周陈列着精美的家具，还有酒吧间。小家伙们也不知道酒吧间是个什么地方。

他们一本正经地看着电影，影片中有个“坏人”正赶着一辆轻便马车闯过沙龙的大门，直达酒柜前面。但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沙龙，所以也就看不懂这个镜头意味着什么。他们还看到股票交易所的场面：一个破了产的投机商坐在行情自动收录器前，手里捧着烈性酒。这种镜头真叫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出现的另一个热闹而俗气的婚礼场面也是如此。

电影里面有四个镜头他们还能看懂。一个是赛马，他们很感兴趣，一个是戴蒙德·吉姆和三个朋友在九十年代初出外骑着一辆四人自行车的镜头。当他们看完电影走在街上路过一家自行车商店时还停下来指着自行车哈哈大笑。这些自行车只能由一个人骑，可是在现代化的先进的美国，一辆自行车竟能坐上四个人！

还有一个镜头大概拍的是一八六五年，里面有一列老式原始的火车。不过，小家伙们当时在西安还没有见过火车，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把这看成是美国火车。最后是好莱坞电影那种必然少不了的恋爱镜头。一位男演员把女主角紧紧地搂在自己壮实的胸前热烈亲吻。当这个镜头刚刚开始时，我那警卫员正在地板上寻找丢失的票根，可那个江西的小伙子瞪着双眼，重重地拍了一下警卫员，叫着：“快看！”还弓着腰的警卫员抬起头看到那个镜头后简直给惊呆了。他张开嘴巴，盯着银幕，直到那镜头结束后才把腰直起来。

江西小伙子倒比较镇静一些。他惊奇地瞥了我一眼，看看我对这种有伤风化的场面有什么反应。可是当我看了看他和另一位警卫员后，这位江西小伙子很快就不好意思地把头摆了过去。但是，“小鬼”却看得出了神。他觉得这部电影和上次看

的那部里面有浑身是毛、长得象人的动物的片子是一个样的。在中国，男女拥抱、亲吻这一类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夫妻的卧室之内。

当然，铁路、火车和引擎才算是这帮小家伙们在西安城的经历当中最有趣的见闻。当我的那位朋友离开西安时，除“小鬼”不知去向而外，我们都到火车站为她送行。这些小伙子们把火车里里外外看了个够——特别是每节车厢尾部的厕所更是看得仔细。过了几天，他们又跟“小鬼”一起翻过车站周围的界墙，跑到里面把火车看了个够。他们看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回来后，“小鬼”对火车却只字不提。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有一列火车被日本人炸坏了。

后来，我去医院看背伤时把“小鬼”也顺便带去看了看病。从医院出来后我发现他很不高兴。他愤愤地对我说，医院要他交五角钱，可他无钱可交。他在红军里已经呆了三年，从未听人说过看病还要交钱。后来，即使把那笔钱交了，病也看了，药也取了，可“小鬼”对那家医院仍是耿耿于怀，恨得要命。

还有一件事讲起来也让我发笑。有一天，在红军里曾当过班长的那个江西籍警卫员跟我一起去到前面提到的那家高级旅馆的过厅里提取一张行军床。这位长征班长是个粗汉子。他的背部轻度弯曲，眼睛从两道浓眉底下直往上瞪。他只会讲江西话，很少有人能够听懂。他是个出色的战士，但站在豪华的旅馆里光滑的地板上却显得一筹莫展。

因此，当我们走进旅馆的门厅，一见到许多穿戴考究的绅士淑女们半坐半躺在沙发和睡椅上时，班长低下头，朝着门厅

对过服务台上的茶房们大声叫喊：“我们的行军床在哪儿？”

他笔直地穿过光滑、干净的地板向茶房们走去。可是，茶房们站在那儿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所以，走了几步之后，他又大喊一声：“我们的行军床在哪儿？”

这些茶房是很有教养的上海佬，身穿西装革履，可连半句江西话也听不懂。况且，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红军班长会从门厅那头直冲过来，命令他们举手投降的那种情景。当时可真把我乐坏了；江西班长当时是本能地带着敌视一切的满脸怒气，而茶房们又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于是，我上前向他们说明我们是来取行军床的，他们这才不声不响地把床递给了我们。

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对着茶房说：“请别见怪，象他这样的人是能够打败日本，拯救中国的。”

班长把行军床举上肩头，走出了旋转门和铁栅大门，很快就到了街上。

在西安，小家伙们学到很多东西。譬如，他们参观了发电厂，并花了两个多小时聆听了关于发电的知识讲座。他们围着巨大的发电机转了又转，看了又看。在此之前，他们见过的最大的机器只是卡车上的发动机。我多么想听听这帮小家伙将会怎样向他们的战友们解释发电的道理。

在街上的时候，他们都不开腔——大概怕人说他们是乡巴佬吧。但是，如果遇到朋友，他们的话就多得没完。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统统都要说出来。回到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就算回到了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那种最典型的真实生活要算是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召开的那次群众大会了。恰好在前

一天，林彪指挥的八路军那个师在山西北部的长城脚下和日本军队遭遇。这一师战士绝大部分来自江西。他们采用了举世无双的新战术从日本军队后面包抄过去，把日军一个整师的兵力给击溃了，并抓到许多俘虏、缴获了大量重炮、炮弹和五十辆卡车、五辆装甲车。日本军队横扫华北，一直所向无敌。如今，他们刚跟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交锋便吃了个大败仗。

我们在西安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在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了一次大会。我是从床上起来就去会场的。办事处院子里所有的人，首长、炊事员，以及厨房帮手全都出席了大会。会上有很多从南京、苏州监狱获释的政治犯，由北平、天津去延安途中的学生，从延安到各地去的政治干部、八路军战士、警卫员、“小鬼”和两名外国人。其中有我自己，另一位是新西兰记者。

大会气氛热烈，群情激昂。发言人刚一宣布华北战场的胜利，他的讲话就被响彻云霄的口号声给打断了。周恩来的妻子主持了这次祝捷大会。那位新西兰记者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新西兰毛利人的土风舞，我也献丑唱了两支歌。一位从日本回来的学生唱了一支所谓的日本情歌，叫我听得心里直发麻。一位红军战士给大家讲述了长征中的一件事——红军怎样不畏敌人的枪林弹雨而强渡大渡河。他刚讲完，周夫人就站起来唱了一支很动听的长征歌中的两段。曲调借用的是古时孟姜女哭长城的旋律。孟姜女是古老的秦朝人，她比基督还要早二百年。周夫人唱道：

五月过了泸定桥，
刘文辉部下望风逃。
大渡河天险从容过，
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八月继续向前进，
草地行军不怕冷。
草地从来人少走，
无坚不摧是红军^①。

这段歌曲听了使人久久难以忘怀。接着，北平来的一批学生唱起了一首爱国歌曲《打回老家去！》。一位江西籍红军战士则唱起了另一支很奇妙的歌子，我可从未听到过。我想这可能是他长征经过西康时从当地土人那里学来的。歌声粗犷、激越、响亮、急促，富于战斗气息而令人热血沸腾。然而，它并不是土人的歌曲，而实际上是江西红军战士喜爱的一支江西民谣。

我们又唱歌、又讲话、又跳舞，最后大家起立，举起拳头，在高呼“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这些赞扬八路军的口号声中结束了大会。

四个小家伙，三个警卫员和那个“小鬼”，都坐在我的身旁，边笑、边唱、边喊。他们处此场合，真象如鱼得水一般。他们是在斗争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清楚，他们每个人今后所想到就只有斗争了。中国的独立确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

^① 这段歌词原载于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未公开发行）。歌名是《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译注

他们即使活到五十岁，也将为争取中国的解放而终生战斗不已。

西 安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

今晚，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给我看了几则有关八路军的最新报道。报道内容如下：

十月十日，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了涞源这个河北省西部的战略中枢。

十月十二日，八路军一个旅袭击驻守崞县（今原平县——译注）的日军，使敌人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但战斗尚未结束。该旅缴获了十二辆装运汽油和弹药的载重卡车，卡车已经被毁。此外，该旅还歼敌五十至六十人，缴获步枪五、六十支。

十月十四日，八路军收复山西北部重镇守武府。

原平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日军仍据宁城内。

二、从西安到前线

去北线的途中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我们乘坐的火车被耽搁了两次，今天上午十一时才离开西安。我们一行中，有两位中国作家周立波和舒群，他们作为记者跟我一起去前线，还有护送我们的一位同志和我的两名警卫员。由于列车将驶往战区，所以，就连我们所乘的三等车厢也一点儿不拥挤。昨天我曾看到成千上万的贫苦的难民走过西安街头。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农民。他们肩上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袱——那也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许多妇女还缠着脚。看来，她们好多天也没有梳洗过，头发上挂满了尘土。

前往潼关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对我的警卫员来说却是一桩难得的经历，因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乘火车。下半晌，我们到达潼关，检查哨反复检

查我们的军事通行证和我的护照。我忙向左右两边的人出示证件。那位负责检查的官员向我微笑着，对于由此而给我带来的麻烦，他表示歉意。

我们坐上人力车，差不多走了二十分钟后就来到潼关这座四周有围墙的古城。它被命名潼关也正好表明它是通往中国西北地区的关口。在古老城墙的大门口，我们再次受到盘查之后才得以通过。潼关城并不大，街道两旁都是常见的小店铺。当我们蹒跚地穿过街道时，从后面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回头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有几千人在那儿游行。队伍的前面是一面中国国旗。游行队伍中有当兵的，也有学生。他们在行进中唱的都是中国最流行的歌曲。但是，游行队伍很快就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我们走过另一道城门，直奔黄河而去。我们将从这里过河，晚上住宿在对岸的风陵渡渡口。我的四川警卫员从未见过黄河。另一名新来的警卫员，他在江西时当过指挥员，还担当过我一位朋友的警卫；两年前，红军渡过黄河时，他就跟着红军一起进入山西省。那时候，他们在行军时唱的就是一首有名的红军歌曲。这首歌的调子原是陕北的一首古老的情歌。歌词是这样开始的：流云笼罩着山峰，倒影映在黄河水中。“钢铁般的红军”越过了黄河。它接着用讽刺的词句唱着山西省的省长，唱着那一切“汉奸卖国贼”。如今，这首歌已有了改动。八路军早已不发一枪一弹越过了黄河，歌词颂扬了抗击侵略军的统一战线。

我们乘着一艘大渡船渡过了水流迟缓的土黄色的黄河。天色已近黄昏，夕阳躲进了飘浮在蔚蓝色的、向西逶迤的群山之上的云层里。很快，我们就再也没有心思去观赏周围的景色

了，因为，我们船上有两个刚从北线下来的东北骑兵。一位年岁大一些，另一位只有三十多岁。看看他们身上披着的羊皮袄就知道他们来自寒冷的地区。年轻的那一位一听说我们是从八路军那里来的，他便与我们热情地攀谈开了。他神情严峻、没有笑容，他说：“要是中国的军队都能象八路军那样，中国早就把敌人打跑了。”他跟我们谈起了八路军最近所取得的胜利，特别是两次大的胜利——九月二十五日在长城线上的战略要地平型关大捷，和在平型关西北约一百五十里的清平镇大捷。他说，清平镇战役取得了非常辉煌的胜利，打死打伤和俘虏的日军有一万人。

他告诉我们说，当贺龙的师（原来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前线时，他和其它东北军战士一起去忻县欢迎他们。在当晚十一点举行的欢迎会上，贺龙讲了话。几千名老乡也赶来欢迎贺龙的队伍，掌声热烈，经久不息。当我们问到他对贺龙的印象时，他猛地一摆头说：“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我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

他还谈到了目前在平地泉地区、北平——绥远线上——守卫着绥远省省会归化大门的东北军。他说，东北军已改编为六个军，都分布在各条战线上——平汉线（北平——汉口）和津浦线（天津——南京）。在平地泉地区的骑兵有二万人。他是刚打那里来的。他紧咬着嘴唇、痛苦地望着黄河说，部队在那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吃够了日本人空袭的苦头。他说，有一次他们到太原东南方的一个名叫榆次的地方，再往前走就进入轰炸区了。日本人每天都来轰炸榆次的北边。他们专门轰炸后方的老百姓。对前线的轰炸倒还不那么厉害。他们想扰乱民

心，使老百姓陷于混乱，所以，成片的村庄和城镇都被飞机炸毁了。

他痛苦地摇着头说，“汉奸卖国贼太多了”。我们问他指的是些什么人，他说主要是二流子和土匪。

他还跟我们谈了一些有关东北骑兵的情况。他说，一九三二年在北满著名的嫩江地区击败过日本人的马占山将军不久将指挥这个骑兵部队。马将军目前在归化，骑兵很快将组织起来打游击战。这事看来是受八路军影响的结果。

他说，绥远省的人民组织得很好，正在帮助军队。但是，日本人有机械化部队，日本飞机也特别厉害。每逢战斗结束，人民都要帮着救护伤员。整个晋北地区的群众组织得最好，那里也正是八路军作战的地区。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在太原的中央政府军的情况和日本飞机每天对太原轰炸的情况。“我们也有飞机，”他说，“但不够用”。

我们的大渡船到了黄河对岸的泥滩上，前面就是风陵渡口那个凌乱的村庄。别人给我们拿着行李，我，周立波和另一位八路军同志落在后面。这位同志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加入我们一行。（我们也是在逐渐地扩充着我们的队伍！）我之所以落在后边，是因为紧靠黄河的泥滩上有一排排的伤员。他们就躺在地上，既没有毯子盖，也没有任何人照料。这些渡船将把他们送过河去，再乘火车去西安或洛阳的医院。但是，这些渡船首先装载的是箱子，运伤员似乎是次要的。伤员们穿着褪了色的灰蓝色制服，也有的穿着羊皮袄。他们中间有的人伤势很重，伤口已发生坏疽，活不了多久了。他们的绷带上尽是血污。我们与他们谈了谈，方才知道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就有五、

六百名伤员等着送往医院。这些人都是九月底在平型关地区作战时受伤的。他们都是阎锡山的部队，是用农村的大车由平型关穿过山西省拉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路上走了快一个月，从九月底以来就没有得到过任何治疗。这里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也没有急救人员来照料他们。他们只能自己照料自己，或是从把他们用大车送来的农民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不难想象，途中会死去多少人！

由于停下来与伤员谈话，我们就与队伍失散了。在这成千上万集中在这里等待渡河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们无法找到队伍。我们挨着一个个又小又脏的旅馆打听，还在街上到处寻找他们。有三个男子在街上把我们拦住，跟我们聊了起来。其中一位是汉口一家有名的中文日报《大公报》的记者，他正要去前线。我们就决定一起走。这位记者能讲一些英语，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又活跃的人。他和其他两个人，还有我们几个人都分头去寻找我们的队伍。我与周立波、一位八路军战士和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学生同行。天渐渐黑了下來，我们到每一处有人家的地方，都要打听部队的下落，可还是打听不到。后来，我们越过田野，打算到离这里六里地远的一座新建的火车站去看看队伍是否在那里。原来的火车站被日本人炸毁了，后来建造了一座新的。由于我的背仍然有伤，我们遇到了一辆运送伤员后返回来的大车，赶车的农民就同意让我搭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车站。可我们的队伍又不在那里。一轮圆月高悬在天空，浮云不时从月下飘过，整个夜空忽而昏暗无光，忽而清明透亮。我听见车站后面有人在唱歌。唱的是一首中国歌曲。这是从四川来的一个团——因为刘湘的川军部队已经来到

这里。我们在月夜里向前赶路。从日本回来的那个学生告诉我，日本的书店和许多日本工人家里都挂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朱德和毛泽东的照片。

我们走遍每一节棚车、客车和每一间小屋，去寻找队伍的下落。后来碰见了也正在寻找我们的一个同志和我的那两个小鬼。于是我们就往回走，又回到那座被炸毁的车站时，才发现我们的队伍。所有的行李都整整齐齐地放在站台上。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去找旅馆。我真想挖苦知识分子太无能。于是我们赶快离开车站去到城里找旅馆，但那位《大公报》记者倒不是个无能的书生，他很能干。后来，我们被安置在前线服务团租下来的一所简陋的旅店里，大伙就挤在两间房子里。我铺上自己的行军床，与我同行的那五个人则躺在从房间这头到那头的一个长长的土炕上。现在，我们又添上了那位《大公报》记者，还有其他三位，他们是到前线去做政治工作的。

我困乏已极，难以入睡。我的背痛也在发作，叫我难忍。我辗转不寐，服了一些溴片。我身上带的钱也只够买一管溴片。

舒群也睡不着，他的脚受了伤。不过，他失眠并不是因为脚伤，而是因为我们渡黄河时在船上与那位东北骑兵的一次谈话。舒群也是东北人。今晚，他躺在炕上想念着家乡和年迈的双亲。他已经五年没有听到过他们的音讯了。五年来，他从未给他们写过一封信，他不敢写信。他当过民兵，又是一位革命者、爱国者，因此，他不敢给他的父母写信。然而，每当夜阑人静，他常常因思念着亲人和故乡而彻夜不能入睡。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

早晨我们起床后动身，八点钟就到了车站。虽然别人都得坐棚车，而我们却找到了一节带座位的漂亮的车厢。车厢内的凳子全都破破烂烂，地板上的污垢足有一英寸厚。但车厢本身倒很讲究。正当我们安排好准备坐两天的火车去太原时，突然列车上的乘务员告诉我们说这辆车不走了，我们必须马上换乘前面那辆车。人们叫了起来：“快点！快点！”于是我们每个人开始把包裹、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递出车外。我们抓起所有能够拿动的东西，急急忙忙朝前面那辆车跑去。那是一辆闷罐车，里面已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坐在他们的背包上。我们找地方也坐了下来。八路军的一位女同志跟我们坐到了一起，她是我朋友的一个朋友。她是第一师政治部文工队负责人。她刚生完孩子，就把孩子寄放在西安的姐夫家里，现又重返前线了。顺便我想告诉你们一下，我还教过她避孕的方法，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好象对此一无所知。

虽然我们赶上了这趟闷罐车，而且现在我就在这趟车上写作，可它却前前后后地调头，一直折腾到十点钟后才开始慢腾腾地向北行驶。透过车门，我看见黄河对岸那连绵起伏的雄伟群山逐渐变得朦胧不清。群山的西边就是中国五岳之一的华山。远远望去，那些山峦或拔地而起，或险峻峥嵘，确实异常壮观、异常秀丽。有些山峰顶上早已白雪皑皑。

我的警卫员把两只箱子摞在一起，在车厢的一头为我搭了一张“书桌”，我便坐在“书桌”前的背包上写作。坐在我旁边的是周立波，他正在为上海一家报纸撰写通讯，报道我们刚

经过的风陵渡口的那批伤员的情况。这车厢里坐着大约二十到二十五个人，其中有的年岁不小了，长着一副典型的、我常称之为“八路军”的面孔。这面孔显示出他们头脑清醒，既有生气又有才智。那位《大公报》记者坐在车厢的中央正与一位跟我们一起的铁路工人交谈。坐这节车厢的人全都不用花钱。我们都有军事通行证。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抵达太原。

典型的那种山西、陕西两省的景色从闷罐车门外徐徐逝去。黄土高原上筑起了许多梯田，有些径直修到了山顶上，这跟我们经过的黄河对岸那种雄奇突兀的山势地貌迥然不同。平坡上的农田里都种着棉花和糜子。各个村庄的房子都是黄土坯砌成的，房顶上铺着瓦片。这一带树木成林，山河秀丽，阳光和煦，令人开怀。

我们朝北行进时，遇到了许多满载伤员的列车。我们向一位车站站长和一些铁路工作人员打听，据他们说，这条铁路线上每天都要往南运送一千名伤员。其他许多伤员则由大车运走。每天一千人——一个月就是三万人！这还只是晋北的伤员数字。它并不包括八路军，东北骑兵或绥远部队，也不包括其它许多正在北线作战的部队的伤员。中国的人力消耗确实巨大。我听到不少悲壮的故事。整整一个东北军和平汉线上坚持战斗，直战到最后一个人。由于力量悬殊，由于抵挡不住使用重型炮、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日本机械化部队，因此，一个军全部阵亡了。这是以血肉之躯和争取自由的意志，来抗击以全部现代化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场战斗。

我和一个朋友到一个车站时下了车，火车前面挤着一大群镇上的居民，中间站着几百个男女童子军。他们站在那里，痛

苦地望着伤员，伤员们也望着他们。人们一言不发，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我见过的最为意味深长的一个场面。我和我的朋友绕过长长的一队伤员才进了车站。伤员们忍着伤痛在车站候车室里临时搭起的一张台子旁挨着次序耐心地等着给他们包扎。那台子后面站着一个大伙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身上系着护士的围裙。他全神贯注地在工作着。在他身边的一只柳条箱子里只剩下少量绷带和药品。伤员们都在瞧着那只宝贵的柳条箱子。但并非他们的伤口全都能被包扎起来，因为剩下的药品和绷带已经不多了。这位热心工作的年轻小伙子每当弯腰去拿那些珍贵的绷带时，嘴里总是唧唧囔囔的。谁要是没看见今天山西这成千上万的伤员，他也就无法理解这些药品和绷带有多么珍贵。我们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说，药品不够，绷带缺少，没有医生，难见到护士。这列火车上虽然有差不多四百名伤员，可在这位小伙子护士身边却连一个帮手也没有。

站台外面，成群的学生和老百姓仍站在那里凄惨地望着伤员。我们在他们面前走过了好几次。我觉得伤员们从周围那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目光中好象是得到了安慰。然而老百姓却异常沮丧。我们的火车很快就开走了。我从车厢里往外瞧，看见那群人仍站在那里瞧着、等着。我相信，他们会站在那里等着直到因为保卫他们而负伤的战士们离开，也许在伤员离开之后他们还会继续盯着那条铁轨哩！

昨天夜里，我被一些人谈话的声音惊醒。在闷罐车敞开着门道之间，皎洁的月光轻泻着银波。月光是如此明亮，在我周围熟睡的人们的身影都映在一片黑暗之中。就在这清明的月光下，有三个人正在那里交谈着。其中一个穿着咔叽制服的战士

我曾在我们车厢里注意到了他。他的皮肤与他所穿的咔叽制服的颜色几乎难以分辨，他面孔清癯机警。可他的衣服很破，也没有背包，到了晚上睡觉时，连一条毯子也没有。看来他也没有钱。当我们分些东西给他吃时，尽管他双眼盯着食物，饥肠辘辘，却总要推让一番。白天，他就坐在门边的一只麻袋上。他气质纯朴，近乎谦卑。开始，他没有插话。但这时，他站在月光下，我听到了他的声音，非常悦耳。他讲的是北方话，字字句句都象铃铛那样铿锵有力。他讲的话我大部分都能听懂。接着，有人用节奏很快的南方话回答他的问题，他却听不懂。那南方人还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给他听。南方话我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说话的是湖南人。这位战士讲到八月在南口关的战斗和他参加战斗的情况。他说，在那场战斗中他负了伤，象我们见到的其他伤员一样，都从这条铁路线上撤回后方。

我站起身前去参加月光下这几个人的谈话。手表的指针正是凌晨二时。在我们这辆车旁边的轨道上还有一辆满载伤员的列车。包在伤员们头上的白色绷带在月光下显露着微光。车厢内由于狭窄拥挤，身子躺不下来，伤员们一个个几乎都在那里坐着，似乎还没人入睡。我们也就与他们谈开了。他们是阎锡山将军的部队，曾在太原北部与日本人作战。他们说，他们倒不怕敌人的机关枪或步枪，但敌人的野战炮却很厉害，因为他们无法接近。在太原时，他们的伤口曾得到一些医治，但缺少药品和绷带。

我回到了自己的那张帆布行军床。一位女同志在上面睡觉。我无法再睡。装运伤员的列车正向南行驶，我们的列车正北上。穿咔叽制服的战士仍然站在月光下。刚才与他交谈的

那位湖南人已回到自己的地铺上，正在哼着一首抗日歌曲。他看来想舒舒服服地躺一会。我则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昨天晚上，车厢里所有的八路军战士都怀着神圣和坚定的信念高唱爱国歌曲。那位女同志和我一起合唱《国际歌》，她用俄语，我用英语。一位男同志用中国话也与我们一起唱。接着，我们三人还是用三种语言又合唱了法国的《马赛曲》。车上的其他人都在凝神静听。我的两名警卫员唱了一首著名的钢铁红军渡黄河的歌曲之后，整个车厢响起了“九·一八”这首歌来。

在我的对面坐着两个中央政府军的军官，身边是他们的一名勤务兵。他们是昨天夜里上车的。他们没有跟大家一起唱歌，其中有一位很想远远地躲开我们。

今天早上，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中学教师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现在，我们这节车厢里有三十五名乘客了。这位教师想参加八路军，正准备到太原去接头。他对我谈了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南京）沿线的战况。他所描绘的是一幅惨痛的图画：日本军队完全压倒没有重机枪和飞机装备的中国军队。一整师一整师的中国军队都在坚守阵地，奋勇作战，最后与阵地同归于尽。现在，华北人民必须尽快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否则他们只能在路旁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侵占城镇和村庄，而束手无策。这位教师说：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华北老百姓为什么应该起来抗击日寇。结果，我们正在丢掉华北。我认为要打日本人，唯一的办法就要用八路军那种打法。我就是准备前去投八路军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教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八路军是毫无疑问地会吸收他的，因为八路军欢迎一切愿意抗

日的人。

今天早上，我跟那位穿咔叽制服讲一口漂亮的北方话的战士进行了交谈。他名叫朱奋台（音译），是中央军十三军二十师四连的战士。下面是他告诉给我的他的身世：

“我是河北省人，是个农民。三年前我加入第十三军。我兄弟本来在满洲长春工作，日本人打进来以后，我们回到河北并参了军，希望能打日本人。参军不久，我们却都被送去打山西的红军，而不是去打日本人。”

一位中央政府军军官这时起身走到车厢的门边听他讲话。这位战士接着说：

“十三军的许多人都象我一样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是想让中国繁荣强大起来。但是，在部队里时，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这些事。”

“你在十三军受的是什么教育呢？”我问。“士兵们学文化，受政治训练吗？”

那位军官弯下身子替战士回答说，“是的，和平时期我们那么做，但到战时就不可能了。”

这位战士镇静地望着他回答道：“不，只是偶尔有人给我们讲讲罢了，我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这些。他们讲的东西也很浅，只是讲日本人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必须抗日，但我们从来也不了解中国本身的情况。”

我请这位战士给我讲一讲从长城通往内蒙的南口关的战斗情况。

他说：“大约四个月以前，我们部队驻扎在南口。我所在

的那个连队有九挺机枪，当然，也还有步枪。我是一名机枪手。”他拿过我的铅笔在布满尘土的车厢地板上画了一个草图；在南口的南边画一个小方块，就接着说，“我在这儿，在一处高地上。我们知道日本侵占了北平。在北平作战的二十九路军的一部分正守卫着从北平到绥远的铁路线。不久，高桂滋将军的八十四师也加入了南口的防卫。我们估计日本人会顺着这条线来。日本人的飞机来过这里侦察我们的阵地，随后就飞走了。

“大约在两个月以前，我们看到有差不多一百个外国军人从后面过来。我开了枪，仗就打起来了。很快，一大帮日本军队投入了他们的先头部队，飞机也开始向我们的阵地进行轰炸。

“在第一次与敌人遭遇时，我打了一天一宿，没有休息也没吃什么东西。日本人使用野战炮，我们却弄不清楚他们的炮位在哪里。我们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并抓了些俘虏。他们都是日本学生，有的年纪只有十五到十八岁。第一仗打过之后，我们只是守住了阵地，后来就给打败了。我们失败的原因是只打防卫战而不发动进攻。

“我在那个阵地上战斗了二十个日日夜夜。经常是除了老乡们送给我们的一点白薯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吃。我们劳累困顿，筋疲力尽。二十天以后，我们还跟敌人打过几次肉搏战。有一次，三个鬼子朝我一个人打来，我握着一把刀，砍死了两个，赶跑了一个。但他们也打伤了我的脑袋。喏，就在这儿，他们还打穿了我的脚踝。”他给我看了他头上的伤口，那是两条很长很宽的伤疤，从太阳穴一直到后脑勺。

“我受伤后还跟他们拚。后来，我感到站立不住，鲜血直

流，流遍了我的全身。我眼前几乎是一片漆黑。我们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我开始沿着山坡滚下去寻找自己的同志。咳，战地上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也没有救护人员。我们只能够从老乡那里得到一些帮助。甚至正在战斗中，老乡还给我们送白薯、粮食，或是送水。他们送来木板或门板把我们的伤员运走。在他们没来到以前，我们都用绑腿来包扎伤口。

“等我爬到山下，我发现眼前都是日本军队和几部装甲车。于是我又爬回山上。最后，碰到两位抬着一扇门板的农民，他们把我放到门板上，抬到后面的火车站，以后，我被送往一家后方医院，再接着往南就到了河南开封。

“现在我的伤长好了，我要去太原。我想参加八路军。”

这就是那个战士所讲的情况。

我们在介休县城停了下来，有一位空军军官走过来同我握手。他英语讲得挺漂亮。他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与我边走边谈。他是准备去太原的。他向我们打听八路军的情况，还向我索取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地址。到了下一个车站，他又来找我们谈，并且说他想参加八路军。我们当中的一位同行者说，现在好象人人都希望参加八路军了。

我在介休城时，城防司令向我们介绍了北方前线的情况。他说，八路军又获得两次新的胜利，还在一个地方截获了日本人一百二十节满载给养的车皮。刘伯承的部队——八路军的一个师——九月底曾经路过此城。他说，他还参加了欢迎刘伯承部队的大会。他带我们看了看涂写在火车站和邻近建筑物上的标语。火车站那条大标语写着：“欢迎八路军！”附近的一些标

语写的是：

“起来，不愿作日本奴隶的人们！”

“支援为救国而战斗的军队！”

“协助军队为民族自由而战！”

“人民必须配合军队共同消灭入侵之敌！”

当地军事院校的一些学生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和军事训练的情况。他们都在接受着军官训练。在太原时，他们听过八路军的一位代表在给他们上课时讲到如何去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正在着手武装这个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武装学生和工人。

我们离开了介休，黄昏时分到了下一个站。西边的天空正映着落日的余辉，最后一缕晚霞还萦绕在东边的山顶上。今冬落下的第一场雪覆盖着山顶。冬天已经来临。

我们亲眼看到了要把中国人民发动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我们后面两节空货车厢那里走过来二百个手里拿着旗子的年轻农民。旗子上写着：“抗日先锋”和“还我国土”的字样。还我国土在中国已是一句老话，可以追溯到蒙古最初入侵中国的时期。这些农民大约五十人一组，都排列在站台上，等待着。不一会儿，又是一批接着一批的农民从苍茫的暮色中汇集到车站，最后达到三、四百人之多，手里都拿着旗子。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背着小包袱或铺盖卷，大多数人光着头。有的则把小小的洗脸毛巾也包在头上。手里象是刚把犁头、骡子、毛驴安置在圈里以后才走出来似的。他们是开往军事训练营去的，那里接待和训练新兵。这些农民都是志愿兵，有他们自己的领导。

他们离开后，我们发现站台上摆着几个大筐，都装着北方人常吃的那种圆的干烙饼。附近还有几个盛满开水的大水缸。据说这些食物和开水都是为从北方前线下来的八百号伤员准备的。这里有一处临时后方医院，有十名大夫为这八百名伤员看病。但是，除了当地老百姓自愿帮忙外，却没有护士。到车站来接伤员的人们共有七副担架，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药品很少，这么多伤员，连解决半数人的药品都还不够，至于后到的伤员那就只剩下绷带了。

我们离开了车站。车厢里点的是我拿出来的仅有的一支蜡烛。有一位军官象变魔术般地拿出一个蜡台。车厢边上坐着两个军官和他们的勤务兵，其他的人都在他们的身旁坐着。其中一个军官讲起故事来，周围的人都探着身子，听得津津有味。摇曳的烛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面部轮廓时而鲜明，时而阴暗。他们有时候放声大笑，露出了亮晶晶的牙齿。这位军官说，八年前他在十八师当兵。在一次战斗中，他们师被红军俘虏，师长张辉瓒给处决了。红军当时告诉这位军官说，他可以留下来参加红军，也可以拿三块大洋作盘缠回家去。

“我拿了三块大洋，”他笑着说，“但是给钱的人对我说，‘你拿了这些钱今后要再回来的话可得给我们带回几枝好枪呵！’”

车厢里哄堂大笑。红军过去总是把国民党的军队说成是他们的“运输大队”。

另一位军官感到他不得不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护。于是他说：“呵，是呀，你们说我们是你们的‘运输大队’，可是，有一次我的师抓到了你们一个参谋长，还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说完这番话后，四周没有人吭声。每个人都在瞧着他。他垂下眼睑就再也没有说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自从我前几天来到太原以后，我一直忙于工作和研究这里的局势。我既要采访、参加讨论、作报告，又要帮助照顾几千名伤员，所以，我简直没有时间动笔。十九日早晨四点，我们的列车开进了太原城。穿过静悄悄的街道，我们来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由于大家都盼望在午夜前能抵达太原，所以昨天晚上谁也没有睡觉。每到一站，我们不厌其烦地下车去逢人都要问一问，或相互打听看，我们究竟何时才能到达太原。我们到达办事处时都已疲惫不堪。但大家立即在分配给我们的大房间里搭上木板床，并拖来桌子、椅子坐下开始工作。我们这几位都是作家和战地记者——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写作。所以，当天亮时，我们都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埋头写作。我比起中国同行来要优越一些，因为我有一部打字机。送来的早点，是米饭和咸菜。吃完饭后，我们又继续工作。

我们必须采访太原的主要人物，并对医院和各种防御设施进行调查。人们告诉我们说，太原的公众生活基本上全是在晚上过的，因为白天老有空袭。一到白天，马路上如同死一般寂静。只有到了下午四时，人们才开始走出来活动。不过，在政府和军事机关供职的人则全天要坚守岗位。我们可能会遇到麻烦，因为每天敌机要来五、六次进行空袭，警察要把人们从马路上轰进防空洞里去。由于这里的防空洞比比皆是，因此公

园、花园、住户和城市街道上面的泥土和垃圾堆积如山，有时使得交通非常不便。这里的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夜间活动，对频繁的、尖锐刺耳的警报声也已司空见惯了。不久，我便了解到许多人对警报声根本就不加理睬。在到达这里的那天凌晨，当第一遍警报声响起时，我们都抓起自己的大衣一直奔向办事处下面的防空洞。可是，我发现，大多数人差不多都是等到敌机在建筑物附近扔炸弹时，他们才考虑是否钻到防空洞里去。自那第一次钻防空洞后，我也对好多次防空警报漫不经心了。以后，我只进过一次防空洞。那一次，我正在省政府对阎锡山将军进行采访。我的两位朋友，他们都是中国记者，和我都在聚精会神地读着那一批阎将军刚交给我们的、从日军俘虏那里缴获的日记，笔记本和文件。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大作，隔了不久，第二次提醒人们危险即将来临的警报声又响了起来，于是，我们带着日本人的日记等物钻进了防空洞。

这些政府衙门（办公大楼）下面的防空洞真是实实在在的地下陵寝。我们同省府的几百个官员、建筑工人和各级军官一道一直往下面走，转了几个圈，然后又下了许多台阶，然后又绕了几圈，最后才到达一处很深的地方，外面的声音一点也透不进来。然后，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和阎将军的两个秘书在水泥地面上坐了下来。我们在中间点了一支蜡烛，利用这段时间翻译和阅读日本人的日记。我得到一份一位学过英语的军官的日记，上面有他抄写的几首美国流行歌曲，比如《蓝色的夏威夷》和一些我不知道的新歌。他还记录了在上海和横滨市的一些日本和外国妓女的地址，并对她们每个人都有评语。

一位已死在战场上的下级军官的日记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同

行立波。这位下级军官描绘了中国人民的贫困。有一段日记记载着日本军队怎样侵犯一个中国村庄的情况。他闯到几户中国农民家里去。这些农民除了一点点粮食之外，别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在提到他们极度的穷苦处境之后，他写道：

“当亡国奴真是太可怕了。”

一位旅长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着：

“红军使我头痛。我们日本人只能在白天作战，而红军却不论什么时候都能打仗。

九月二十九日：从我现在呆的这里，我明白，共产党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共产党的影响是抗日思想的基础。红军已炸毁了我们约一百五十辆卡车，并消灭了我们五十——六十名弟兄，其中就有我们一个连长。在这附近，甚至连中国的妇女也投入了战斗，她们还扔手榴弹。上级已命令我务必把这个地方的人全部杀光”。

立波读着这些日记，每一篇、每一页都使他感叹、激动。他又拿出另一篇好象是一位下级军官的日记唸了起来：

“我累极了。在这种时刻，当大家都累成这个样子时，我们军官们也就无法指挥队伍了。我们有的部队把他们的东西，甚至是些不必要的东西都往马背上堆。他们也甩了不少东西。他们不愿意挖战壕，所以，我们的防御相当薄弱。我们常常只有泥浆水喝，中国的烙饼是一种很方便的食物，可我们的食物对一支作战部队的要求来说却很不方便。在前线，我们需要火柴和蜡烛，但这些东西都很缺。一到晚上，我们便得分外当心，因为如果我们要向中国老百姓打听什么事，他们总是不讲实话。中国士兵，即便负了伤也不下火线。他们等我们靠近时，

便用刺刀杀死我们。他们有的人在手枪里还要留下一发子弹作自杀用。虽然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是伟大的人。”

立波大声地唸着，防空洞里的人都挤到我们周围。他们蹲在地上，眼光从立波的背后望过来。我抬头一看，只见我们的头上面有十几张脸围在一起。他们那一张张深深为战士们的英雄主义打动了的、又真切又庄重的面庞，在烛光的照耀下发着亮光。

另一个高级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官兵朝思暮想，一心想占领保定。菩萨保佑，我们终于把保定拿下来了。目前，我们正向着石家庄挺进。有人以为我们占领保定后，战争就能结束。他们错了。我们必须把中国军队赶过黄河才能结束对中国的惩罚。有些人满足于小小的胜利，这是日本军人的弱点。日本国民的情绪就是容易忽冷忽热。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弱点。当前我们所打的这场战争，目标就是黄河——黄河！”

日记中的另一段这么写道：

“保护我们辎重的石原（音译）连今天走过一座村庄。我们抓了些中国苦力来搬运这些辎重，可就是在这个村子里，他们造反了。他们没有武器，但他们从我们队伍手中夺走一些枪，用这些枪来打我们。他们不会打枪，所以只能把枪当棍棒使用。我们三个兵被他们打得半死。

“有时候，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引人注意的迹象。墙上、树上或石头上画着十字。一旦看到这些标记，我们立即意识到中国枪炮就埋伏在这一带地方。”

我们一本又一本读着日记，日本人的飞机也正在城市上空进行轰炸。在一份截获来的日方文件中记载有日军进攻、占

领太原的详细计划。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份文件，因为最高军事指挥部正在研究它。这份文件表明日本人企图在国联开会讨论中国问题之前打下整个山西省。正如他们在满洲所干的那样，日本人企图在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然后才说：“你们看该怎么办吧？”

我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吧。两位同伴和我不顾空袭警报，来到省政府衙门里采访阎锡山将军并会见军方卫生部主任，以便讨论进一步照料伤病员的问题。我们在与阎将军简短会晤以后，就与卫生部主任鲍大夫谈了起来。阎将军年事已高，但公务繁忙。我们问他打算如何保卫太原，他回答说他也说不准，但中国人是要抵抗到底的。中国人抵抗日军不仅仅是为了山西省或太原，而是为了整个中国。我们问他北线的战况如何，他引用了俘虏来的日本军人的日记中的话来回答。他说，整个地来看，这些日记暴露了在日本军队下层中间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跟我们一起坐在桌子周围的军官们也都谈起了这些日记，我们可简直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再说些其他方面的情况。两天之后，我见到了傅作义将军。傅将军因去年保卫绥远省有功而声名大振。我询问了他有关北部战线的形势以及中国能否抵挡得住敌人的问题。跟阎锡山将军和阎部下的官员几乎一个样，傅将军也引述了缴获来的日本军人的日记中的话来回答我。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也许这种印象并不可靠——这两位将军都期待着日本军人起来闹哗变，以此结束战争。傅将军还谈到日本人民的反战情绪，看来他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告诉他说，虽然日本士兵和日本老百姓反对战争，但这无济于事。日本士兵只是奴隶，一切都得听从长

官；日本报纸又充满了大量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老百姓对中国的真相一无所知。他们所听到的是中国人在杀日本人那一套宣传。除此而外，他们对中国人也是不大清楚的。

还有一次，我跟一位最优秀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在一起谈了话。很明显，他是我在太原遇到的所有人士当中最讲求实际、最精明、最会办事的一个人。他风度翩翩，博学多才。他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其他一些八路军、共产党领袖一样，都是一批中国最杰出的人才。他问了我各种各样的事情。当我说到我跟阎锡山将军、傅作义将军谈过有关日本军人的日记的事，而且我还感觉到这两位将军估计日军里面可能会发生哗变时，周恩来不动声色，直等到我把话讲完。我对他说，也许我的感觉不对头，但这种估计看来是一种幻想，就跟五年之前有人相信国联或其它列强会让中国收回被占去的领土一样。周恩来急忙把头一甩，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在阎锡山的省府里，我跟西北军卫生部主任鲍大夫聊了聊。他谈到山西的伤病员的情况极坏。医生、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不足半数。药品不足半数，绷带不足半数。医疗部门没有X光机，也缺乏许多最基本的外科手术设备。他告诉我们，在北边的战场上，沿途百里之内，只有七辆卡车在运送伤病员。剩下的伤病员只能由农民用木板抬到很远的医疗站去接受治疗——有的一直要运到太原。他说，山西省有十八所医院，可容纳六千病人，可现在这些医院里住有一万五千人。他交给我一份他所说的紧缺药品、器械的单子。后来，我把这单子寄给了很多人，要求他们给予帮助。

鲍大夫很好，他让我们参观了太原的一家医院。这是第十

基层医院。此外，太原还有四家基层医院。这家医院目前住着一千三百名伤病员，整个太原有七千名伤员。光这家医院上月就接待了五千名伤员，本月又接待了五千名。带领我们参观的大夫们跟我们说起了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这家规模很大的医院里只有二十名医生、八名护士。每个医生要管很多个病人。除此之外，他们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他们没有输血装置，所以医院里很多病人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他们没有抗破伤风血清，很多病人就死于破伤风。

我们参观了一间重病号病房，那情景真叫我心里直发凉。一名年轻的战士坐在床上，不断地叫喊，用手指划着自己的脸。他的下脸颊整个都用绷带包扎得严严实实，我完全可以想象出绷带下面的伤口是什么样子。各家医院里都没有止痛药，所以这位伤员跟其他伤员一样，整天疼痛难熬，哇哇哭叫。他向我叫喊，向医生们叫喊，用手指着自己的脸，但说不出话来。其他的病人躺在那里，发出来的是低沉的、连续不断的、极度痛苦的呻吟声。他们的两只眼直愣愣地盯着远处。我们抚摸他们，他们既不看我们一眼，也毫无感觉。不过，他们还是清醒的，只是他们的心都被绞在痛苦里面了。我们站在病房里，看着一长排的伤员，听着他们呻吟、哭喊和咕哝。我整个的心和整个的生命，都充满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这一切，是他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是他们在折磨和屠杀中国的人民。

当我们在医院里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出了医院，我们碰到了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服务团正给医院里的病号和各军的战士们演戏、唱革命歌曲。女作家丁玲是服务团的负责人。在

他们的舞台周围分别坐着好几百名伤势好转，能够走动的伤病员。我没有观看慰问伤病员的舞蹈、戏剧，因为我一直在盯着伤病员们的脸色。他们一个个都被演出给迷住了。我瞧得最仔细的是站得离我很近的那两个人。其中之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庄稼人，大约三十岁刚出头。他身旁站着一个人十八岁左右的战士。年岁稍大的那个就象是在跟自己的小弟弟讲话一般。

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些演戏的人是八路军。你懂吗，就是红军。他们军队里头有许多俱乐部啦、文工队啦、学习班啦。”

那年轻的战士只管好奇地瞧着舞台，什么话也没有说。而那个年岁稍大的又不厌其烦地接着说下去：

“八路军是咱们中国组织得最棒的部队。我们的机枪连在贵州的时候跟朱德、贺龙手下的红军打过仗。可红军真厉害，我们就是对付不了他们。”

第二天，我到太原一家教会医院去治我的背伤。由于那些中国伤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我就问那位给我看病的女医生她的医院里是否也住着受伤的军人。她说，她医院里有伤员——不过只有二十人。接着，她又说，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不多，因为日本军队一来，中国军队就逃走了。

听到此话，我又气又恼，简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有的教会人士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但对中国仍然缺乏了解。由于我是个外国人，他们对我非常客气；但在思想、信仰以及他们所谓的文化这些方面，我与他们则毫无共同语言，甚至格格不入。

二十一日晚上，我写了一个通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奔

赴前线。周恩来终于挤出一点时间让我采访。我们的谈话从午夜后开始，一直谈了两个小时。谈完后，我便开始写稿、打字。

次日清晨八时，我去采访傅作义将军。我们的卡车准备十时出发。由于九时以前傅将军都有约会，所以我们只有半小时的时间交谈。他告诉我，归化城已被日军占领，因为驻守该城的中国军队兵力不足。日本人使用了野战炮和坦克，中国方面无力抵抗，尤其是当日军进攻时上面还有飞机配合扔炸弹，所以中国军队更加抵挡不住。绥远铁路的终点站包头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守的。中国军队的两个团已撤出包头，朝西转移。傅将军原有三个旅的兵力，而今只剩下一个旅。他目前是晋北战线的三大指挥官之一。

傅将军是个使人感到十分亲切的人。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朴实坦率，是西北地区最会用兵的一位军事领袖，也是一个思想最开明，胸襟最坦荡的人。他是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领。前天，当他派来英文秘书向我借阅从上海邮来的最近的外国报纸和杂志时，我真的大吃一惊。他的秘书向我谈起傅部可能从北部和东部前线撤退的事，我不清楚他讲的究竟是谁的想法。不管怎么说，秘书已经规划好了撤退的路线，但却没有提出反击敌人的路线。我问秘书，为什么他只谈撤退，为什么他不和别人一起学学红军的经验呢？红军在江西十年之久，不但保住了自己，而且还扩大了苏维埃，坚持自己的阵地，向百倍于自己力量的敌人斗争。那位秘书说，情况不同啊！今日的敌人是拥有摩托化纵队的日本。我说，情况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当年南京政府也是出动了飞机、野战炮、卡车和坦克去攻打只有步枪和机枪的红军了啊。

傅将军对撤退一事闭口不提。在我们短短的交谈中，他提到了日本侵略军中的反战思想，他对讨论国际形势还更感兴趣。但他的的确确告诉了我中国军队从日本人身上缴获的密令和文件，其中有日本指挥长官板垣于十月四日签发的攻占太原的密令。他对我谈了日本军队如何灭绝整整的一个又一个城镇和村庄的事，其中有个村子里的两千多口人全被杀光，甚至连婴儿也不能幸免。关于灭绝村庄的事，日本军官们的日记中已有记载，后来，八路军也找到了这些遗迹。

傅将军还谈到了中国的外国朋友。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自豪，因为中国得到了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他说，所有中国的老百姓都会特别欢迎外国的技术援助。

我回到办事处。在我返回办事处的路上，又响起了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能再走动了。但是，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没法把傅将军的谈话从邮局里发了出去。这次空袭很厉害。四架日本重型轰炸机的蓝色钢铁机身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以威胁的姿态隆隆地飞翔在太原的上空。我们从建筑物的屋檐下看到它们向下扔炸弹，从城市中心和商业区传来一阵阵炸弹爆炸的声响。飞机朝着我们这个方向飞了过来，开始投掷其致命的、毁灭性的炸弹。人们要我们立即进入防空洞。我缓慢地走着，愤怒地望着空中那死亡之神——日本飞机。正象上次在医院那样，我感到仇恨之火烧遍我的全身。有人在后面一直推着我走下台阶进到防空洞里去。可是，在洞门口站着的那几个人，也跟我同样感到愤慨。我们不想进去，于是大家又从洞口走了出来。我们站在树下注视着那帮空中的刽子手们在向着这座秀丽的古城投下死亡的炸弹。城市中心有多处火光熊熊。我

们回去继续工作，不多一会儿，高射炮的轰鸣声和机关枪的嗒嗒声便渐趋平息。飞机飞走了。高射炮弹在空中爆炸后还残留下了一朵朵硝烟。但它们没有打落一架敌机。今天，所有的中国飞机都在前线作战，日本人便利用这个空子轰炸了太原。

这次轰炸是日本人在遭到失败后所采取的报复行动。三个夜晚之前，八路军的两个连队在忻口日本防线后离阳明堡五里路的地方向日本人的机场发动突然袭击。那里停放着二十四架飞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这两个连队从山上直冲机场，趁日本人还没有醒过来，就炸毁了二十一架飞机。另外有三架未毁，这是因为一个连队由于兴奋过度而没有执行命令。命令要求一个连站岗放哨，掩护另一个连去炸飞机。但是当执行放哨任务的连队看到这些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飞机时，他们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们所担心的是那个负责爆破任务的连队在日本人反击之前来不及把飞机全部摧毁，于是也冲上前去帮忙。结果日本人来了，剩下三架飞机还未被炸毁，但他们却不得不撤走。

今天，日本人从远在东边的河北省保定派四架飞机来轰炸太原，作为报复。

空袭过后，我发走了采访傅将军的报道稿。我们把行李搬上卡车，开始向北部前线进发。实际上，就在日军的防线后面，有着广大的地区控制在八路军手中，八路军的总部就在那里。那也就是我正要去的地方。

三、跟朱德的流动 司令部在一起

五台山某地 晋北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是从八路军总部给你们写东西。八路军总部设在日本人战线后面的群山中的一个地方。离总部二十至三十英里的地方就集结着日本军队的主力。在日军集结点南边的四周山地里，有山西地方军和中央政府军的阵地。

我们昨天下午乘卡车离开太原，驰过太原北边的平地，向前方进发，然后再穿进一个个四周群山环抱的峡谷。一路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日本轰炸机滥炸后的痕迹。公路被毁坏了，北边的铁路线也被毁了。昨天晚上，由于写了一个通宵，感到疲乏。两名中国报纸的记者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所以，现在我们全都睡了。我不时醒过来，看看我们并没有被炸，我们仍然在这周围全是大山的深谷里坐着车滚滚

前进。夜幕来临，我们也没有停车。因此，我们在途中与一辆辆载着中国士兵的卡车相遇。他们象是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兴高采烈，显然不象是吃了败仗的样子。可以肯定我们遇到有五十辆这样的车子，里面都挤满了武装人员。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们打哪儿来，到哪儿去。不过，我觉得，象这样的夜间行车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一长串车头灯光在几英里外都能看得见，如果日本飞机要来炸他们则是易如反掌。后来，我听说前天晚上日本飞机就是由于发现了车头灯的亮光，而轰炸了两辆装满汽油的卡车的。卡车的隆隆声使司机无法听到飞机的声音。我们在路上还遇到了许多步行的人员，长长的一列列驮着行李的骡子、马匹。他们全是从五台山地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八路军。

我们到达五台山里一个有城墙的小镇时已经是深夜了。日本轰炸机天天来光顾这个镇子。一个名叫“前线动员委员会”的组织为我们安排住宿。年轻而热情的八路军人员在这里担任负责工作。他们告诉我们，三个星期之前，他们开始组织这里的青年农民，准备参加游击战；现在，这里已经有差不多一千五百人参加了游击队。他们在接受两个星期的游击战术训练之后，前几天已经被送到前方去了。新的自愿参战的人每天都接连不断。他们全是种地的。他们没有编入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他们在农忙季节仍然种他们的田。这里有很多游击队员是典型的北方人；他们时常走进屋里，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笑眯眯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第二天大清早，为了避开敌人的空袭，我们没有拿行李，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镇子。镇上很多房屋都已成了废墟，城墙

上有多处断裂，镇内镇外的无数大洞表明都是曾经轰炸过的地方。我们听说，近两个星期以来，这儿有十多个老乡和三十多头耕畜被炸死了。不过，大家都已经挖了防空洞，来对付敌人的飞机。

我们沿着石头小道，开始登山。这段路走起来很远。在沿途的各个集镇和庙宇的墙上，在那些早已湮没在风沙之中的城镇的古老的拱门上，写有八路军的口号和张贴着宣言。在一座庙的外墙上，我看到下面这几句口号：

“不做亡国奴！决不当汉奸！”

“抵制日货。”

“乡亲们，组织起来，武装自己。”

庙的院里还贴着一张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发的布告。布告文句浅显，粗通中国文字的老百姓都可以看得懂。显然它是写给农民们看的。布告上说：

“我们八路军遵照上级命令，开赴前线为拯救民族而战。我们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为了全国人民的合作团结而努力，为了法国、苏联、英国、美国人民的团结合作而努力。我们要保卫华北、保卫西北。我们将继续战斗，收复东北。我们将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已经制定抗日救亡的纲领，并将为此而战斗。

我们八路军按市价购买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八路军人员用老百姓的车辆运送东西，强迫老百姓无偿地给我们干活。我们军人不拿人民的东西。我们的军队是一支保卫我们同胞的军队。

任何人充当汉奸都要受到军法制裁。

我们希望全体同胞都能参加民族救亡工作。

抗日战争一定胜利。”

走过了这座庙宇，我们就沿着一条多石的盘道往上攀行。一路上，两位同行的人开始向我打听关于朱德和彭德怀的情况。我说，他们也会象毛泽东那样，有朝一日会成为亚洲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彭德怀也会成为亚洲的一个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正当我说到彭德怀身体壮实，精力充沛的时候，我们停住了脚步。前面的路上有一匹军马，有两个人正在马旁站着谈话。其中一个人满面笑容。他身着蓝色军装，嘴巴笑呵呵张得格外大。在整个八路军里就只有这么一个长着大嘴巴的人，他要是笑起来两边的嘴角都能扯到耳朵根。此人就是我刚才说过会成为亚洲未来最伟大的军事领袖的彭德怀。我还忘记告诉同行的人，如果有机会比赛的话——彭德怀还能当上咧嘴大笑的冠军呢。这时候他站在那条小小的山径中间，背对着光秃秃的山岭，身躯魁梧，就象一头公牛似的。他一条胳膊挽着马缰绳，举起另一条胳膊向我们打招呼。

看看彭德怀，再听听他的讲话，那你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北部战线正处在日本军队的威胁之下。他还没有向我们打完招呼，就说话了：“咱们的军队真棒。咱们已经收复了平型关、雁门关、阜平、忻口、宁武。五天以前，我们毁掉二十一架敌机；这几天，我们天天缴获敌人弹药，简直多得运不完。我们还收复了……”，说到这里，他一连串说出了晋北和冀西好多城镇的名字。他高兴地笑着说，“蒋介石将军刚给他的军队发出要坚守北线的命令。谁后退，就枪毙谁。”

彭德怀要到太原去。他说过两天他就回来。话音刚落，他就沿着山路向前走了。他身边跟着警卫员和马夫。南京政府已经任命彭德怀和朱德为上将，但他并没有佩带表示军阶的肩章。八路军里也没有哪个军官佩带表示身份的标志。他们都是“同志”，今后也仍然是“同志”。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之后，遇到了我们的朋友——《大公报》记者。他刚刚结束了对前线指挥部的三天采访，正在归途中。我们象是分别多年的老朋友那样相互致意，他就离开了。他正前往甘肃的兰州，准备观察整个北方和西北方各条战线的情况。有些中国报纸和有些中国新闻记者在世界上也完全能数得上是第一流的。

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来到了八路军总部。一走进院子，就看到了第一师师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站在那里跟八路军政委任弼时和他的助手邓小平在讨论问题。我们把各地来的一捆捆的报纸、杂志交给了他们。其中有一摞莫斯科的《消息报》，有人把它拿了回去。此外，还有很多份《莫斯科新闻》、纽约出版的《新群众报》、《新民族报》、《共产党人》、《亚洲》和一份布拉格出版的法文杂志。我们同时还带来了一捆在上海出版的外文、中文的报纸、杂志。因此，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受欢迎的人。大家不光是欢迎我们这些人，还欢迎我们带给他们的宝贵资料。我们马上开始从这批报纸里挑出一部分重份来再送到靠西边的贺龙指挥部去。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从外边听到的消息。其实，有的消息指挥部也都已经知道了，因为这里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机。不过广播总是不会那么详细。他们也给我们介绍了前线的情况。他们

说，昨天晚上，徐海东在某地袭击日军运输部队，截获了十三辆装满给养的卡车，其中包括过冬的大衣、食物和汽油。

指挥部的人员让我们参观了他们缴获的战利品。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了带兜帽的冬大衣；有的人还拿出一些很好的日本自动手枪给我们瞧。他们还抓到许多高大的日本战马。明天，徐海东又要送来一批大衣。

从八路军的工作方法可以看出它仍然是一支工人、农民的队伍。它武装战士和武装华北民众的办法就跟它当年在南方武装工、农一模一样。它把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的步枪、手枪、机关枪、卡车、坦克、衣服，用来武装自己和北方人民。

我因为太累，就没有到朱德的总部去看望他。明天，我再去看那里。不过，他的夫人康克清前来欢迎我们。康克清一见到我们就笑嘻嘻地走过来。这位朴实、精干的江西农村姑娘，如今已成为整个八路军里培养出来的一位最优秀的妇女。她刚刚从陕北的延安抗大来到这里，不久将参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她是个很好的妇女，还不到三十岁。她告别走后，我就睡觉了。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今天凌晨，月亮还高高地挂在半空的时候，我就醒了。从窗外院子里很旧的瓦房顶上面，我看到有一些亮光。我耳朵里还听到有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一会儿响几下，一会儿又响几下，仿佛有乐队在大清早进行演奏似的。但是，我弄不清这些

声音来自何方，也懒得一大早爬起来吸取晨霜寒气。然而，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阵异常美妙的声音，却令人心旷神怡。于是，我就坐在床上，竖起耳朵仔细倾听。

又过了一会，我干脆下了床，披上大衣，拖着鞋子，向屋外走去。此时，天色渐渐泛白，但是月亮仍然高高地挂在空中，它倒显得苍白无力。我们院子里的一圈房子都建有滴水嘴的瓦顶。院子外面，那音乐声仍在响着。我离开院子，走过站在院门口的哨兵之后，就顺着幽静的小巷走进了前方的一处树林里。在这里，我才找到了“乐队”的所在地。这是拂晓之乐，它在迎接新的一天的来临。林中，各种飞鸟伫立枝头，啁啾百啭，尽情歌唱。片片树叶轻轻抖落，瑟瑟作响。两只山鹑，你啼我鸣，引来多少同伴的和应。远处隐约夹杂着汪汪的狗吠声和母牛轻细的哞哞声。这些就象是从乐器上演奏出来的旋律一般。万物正在大地上苏醒过来。整个树林和林间的生命正在活跃起来。我惊异地静立在那里，凝神听着乐声，这样美妙、这样无法形容的乐声。接着，就在这微弱、既可分辨又难分辨的音乐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这第一声军号吹响了。军号婉转、悦耳，好象在轻轻地推着战士们的肩膀，告诉他们：“该起来了，起来吧，请你们快起来吧！不要贪睡，你们瞧瞧，天都亮了。”

这样的起床号常常使我眉开眼笑。它好象母亲在跟自己的孩子们说话。起床号以后的号音就是在下命令了。可这一声号角却充满亲切、慈祥的柔音。

正在睡觉的人们一听到起床号响，一个个从炕上坐起身子，下炕穿鞋。他们大多数人睡觉时都不脱衣服，只脱掉鞋

子。我没有看到他们起床，但我知道他们全都起来了，因为晨幕已经打破，白昼已经来临。周围的山色已在旭日下变为青蓝。我回头走来，停步看望我那匹心爱的小马。我叫它“云南”，马厩就在小巷的那一侧。它住的地方很舒服，整个马厩里只有它和另外一头骡子。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小傢伙挺厉害，见到别的马，就要打架。可别的马也不相让。它们个子比它大，抢它的料吃，常常弄得它要挨饿。所以，昨天晚上，朱德无可奈何地把它送到我这里。我过去把它送到前线去，朱德自己却把它带回到这里。我原来想过，如果朱德喜欢这匹马，那我可以送给他。谁知，我竟做不到这点！所以，现在云南和我又站在一起。尽管它已经把我给忘了，可我仍然喜爱它。它个子小，但轻巧快速，跑起来四蹄腾空，快步如飞。看起来它象是匹小型阿拉伯良种马。虽然它生长在老远老远的南方，可现在就象蒙古马那样，身上正在长出一层厚厚的长毛，以抵御北方的严寒。

我到朱德那里去拜访他。他正好坐在总部里的台阶上，理发员在给他理发。他起身向我致意，肩膀上还围着毛巾。开阔黝黑的脸庞上堆满了微笑表示对我的欢迎。朱德的大名使敌人听了胆战心惊，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我觉得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和蔼、最温和的一个人。他为人质朴坦率，绝不傲慢自大。他虽然已经五十开外，但头脑仍很机敏、活跃，他好学心切，逢人不耻下问。在任何情况下，他处处大公无私，不为个人利益所左右。这些品德为他赢得了他所统帅的八路军全军的爱戴。

他坐着无拘无束地跟我们聊了好几个钟头。他别的不谈，

只谈打仗的事情。每谈到八路军，谈到八路军连战皆捷，取得不断胜利的时候，就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可是，当我们谈到八路军的作战，谈到日本人、谈到日本侵略者整村整村地屠杀中国老百姓的时候，从他的身上表现了一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神态。坐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讲话的这个人是一位战士、一位中国的爱国者、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脸庞，他的声音，他全部的生命都表现出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他看过缴获来的日军官兵的日记，但这些东西并没有使他产生过日本军队会起义的幻想。他告诉我们说，日本军人根本不愿意当俘虏，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投降。

“不过”他说，“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英勇无畏，而恰恰是由于他们胆小怕死。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俘虏他们之后，会杀掉他们。他们自己枪毙俘虏，残害农民，奸淫妇女并杀人灭口，他们甚至连我们的婴儿也不放过。所以，每当我们把他们包围起来之后，他们总要拚命挣扎，认为反正免不了一死。”

朱德对朋友、对同志温和、亲切。可是，在战斗中，他确实是个严峻、无情的斗士。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彭德怀走了进来。他咧开嘴笑着向我们介绍前线的情况。蒋介石将军已经向所有的部队发出命令，要求它们巩固防线，再顽强坚持一个月。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总部的人员详细地讨论了中央政府军和阎锡山将军的山西军的前线防御情况。朱德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仔细在听着别人的发言。他的眼镜快滑到鼻尖，双目从镜片上方向外张望。他把帽子推到了他那光头的后脑勺。他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听

着、思考着。

接着，朱德转过身子，向我们讲解起军用地图上的情况。他身后两间屋子的整块墙上和屋子的一部分顶棚上都贴满军用地图。彭德怀则介绍了八路军缴获的一份流传在日军士兵中的宣言。宣言的三个要点如下：（一）日本侵略中国犯下了罪行。（二）中国不是日本人民的敌人，日本军阀才是日本人民的敌人。（三）全体日本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军国主义者。

朱德批准了我们上前线，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可以跟一个战斗部队一起去。我们离开了总部。总部的人员围在一张桌子旁边，正忙着为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发动一场新的攻势而制订计划。明天有个交通员要离开这里，我们可以托他寄东西。所以我们都回到自己屋子去写东西了。

时间已经快到半夜。今晚，我们一直在写东西。舒群还要干下去，可周立波已经顶不住了。他躺到屋子那头的炕上睡着了，我们的警卫员就在旁边安详地打着呼噜。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今天早饭我们除了大米和蔬菜之外，又加了两样东西——一听菜肉罐头和一包饼干。这些都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总部已经收到许多箱战利品。一箱大衣也已运到，还有一批从日军死亡人员身上捡到的勋章、肩章等物。贺龙还要把一些日军俘虏送到这里来。在昨天的一次交火中，贺龙手下的一支游击

队打死了六十名日军士兵，游击队只牺牲了一个人，这支游击队全是附近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每天都有人到我们的院子里来报告最新消息。有时候，一天就要来好几次。譬如说，一支游击队在一个地方打死二十名日军，在另一个地方打死四十名，在另一个地方又打死六十名；游击队截获了十五辆敌人的运输车，又截获五十辆运输车，又收复了一个城市等等。这样的消息源源不断，我不可能把它们全部加以列举。但是，八路军没有真正的前方，它的战士到哪儿，哪儿就是前方。因此，我们可以说八路军的“前方”北起察哈尔省，到大同，然后往西延伸到绥远，往东延伸到平汉铁路。它在成百个地方可以同时进行战斗。对于他们的战斗方法、战绩和伤亡，我打算在近期内作一次评论。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我们原来计划要在昨天夜间越过正太铁路。但是总部改变主意，决定先到离铁路十里（大约三英里半）的一个村庄里，待明天晚上再越过正太线。如果我们今晚过铁路线的话，那就得进行艰苦的急行军。从这个村庄到铁路线大约有八十至九十里路，队伍和驮着沉重物资的牲口要从夜半到黎明赶完这段路程，那可是太艰苦了。

今天早晨，我们三点多钟就起床；当四点半钟的时候，我们已经慢慢地沿着村中狭窄的街道前进了。月亮没过多久就已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借着星光和手电筒照路。村中窄小的道路上挤满了行人和牲口，各种声响乱作一片，难以描述；骡子、

毛驴粗声大叫；马儿不住地嘶鸣、踢脚；赶大车的老乡鞭子甩得象鸣枪似地啪啪直响。与骡子的号叫前后呼应的是车把式的骂声。他们冲着那些不听话的牲畜大声吆喝着：“妈的狗屁”！这种亚洲古老民间的咒骂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可是，就从这一片乱哄哄的吵嚷声中，又传来了歌声。在离开我们较远的那边，有很多人齐声高唱着“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歌子。歌声有时听起来很响亮。但是歌声一落，人们的耳边又响着那嘈杂的咒骂声、牲口的叫声和蹄子踩在路上的咯噔声。这嘈杂声时高时低；所以我们一会儿能够很清晰地听到歌词，一会儿却又只能依稀地听到几声音调。

最后，我们终于向前出发了。道路两旁是高高的土墙和泥草房子。我们沿途还经过几处寺院古刹，都是掩映在松柏的浓荫之中，苍松长得盘旋曲折，遒劲挺拔，与古代中国艺术大师所绘制的绢画几无二致。清晨的寒风，吹过松枝，发出阵阵海潮般的响声。我回忆起儿时在美国西部松林茂密的山间情景。阵阵松涛曾使我心中忧伤不已，叹息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今天，我在这些苍老而默默地生长着的松树前面经过的时候，儿时的景象又全部涌现在我的面前。寺庙顶上瓦片成行，滴水嘴饰分布四方，勾画出一幅微暗而美丽的轮廓。

我们走出村子以后，就朝南前进。大家都把双手伸进袖管里面，借以取暖。天已破晓，原来低垂在远处山间的云层开始升起，挂在天空。这是个寒凉、阴沉沉的早晨。我们都感到心绪不佳，就跟这令人烦恼的冷冰冰的早晨一样。带队的人今天早晨给我们加派了一头骡子。立波和舒群几乎都不能走路了，他们双双脚受了伤，还打出了许多水泡。我们对分配到的这头

骡子感到很高兴——谁料到昨天晚上跟我们同住一个院子的几个前红四方面军的人员把骡子拉去自己用了。他们说我们想多分一头骡子，实在太不应该；如果我们有多余的行李，那完全应该自己背着走。我的一名警卫员拿我作为理由去跟他们交涉。警卫员说我是个外国朋友，背受过伤，所以我们需要这头骡子。红四方面军的人回答说，即便如此，要多分一头骡子也是错误的。骡子就这样跟着他们走了！

我们两名警卫员是红四方面军来的。其中一个听话、谦恭，大概过去在哪个军阀部队里干过。还有一个常闹脾气，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火。不过，我无话可说，因为我自己也是那个样子。我们都要向我的那个江西警卫员郭生华学习。他本来是红一方面军的，属于老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他原来当班长，后来被培养成警卫员。他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江西农民，已经成家，妻子儿女都在江西。他在好多方面都干得满出色。他嗓音宏亮，可以在露天里向一个军的人讲演。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他起的作用，使我特别敬佩。我们行军九十里，抵达一个村庄，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准备到了半夜再继续赶路，以便天亮之前越过铁路线。白天，我们多次听到日本飞机从头上隆隆飞过。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帮我们运行李的老乡们想回家去了。晚上九点，他们才前来说出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主意。他们不承认中途退回是由于感到害怕；至于我们能给多少脚钱，他们并不计较。他们说，牲口已经走得太累了。这倒是真的，不过，哪个牲口不累呀。当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字。只有郭生华听到他们过来的声响；还没有等他们走进屋里，他已经从床上起来，站到了他们的面前。老乡们把

为什么要来找我们的道理讲了之后，郭生华并没有训斥他们，甚至连一点急躁情绪都没有。相反，他告诉他们说八路军是工人、农民组成的队伍，正在上前线去打日本人。他们自己就是农民，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一家人。老百姓和八路军一定得站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战斗。老乡们是不是嫌脚钱太少？不，他们不嫌脚钱少。老乡们是不是不明白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不，他们是知道的。郭生华把他们带到院子里来，我听着他们在那儿谈了有一个来小时。后来，他们就出去了。一个钟头之后，郭生华回来了。他找到了另一批牲口。那些老乡们确实是害怕日本人的飞机而不愿再跟我们继续往前走了。

接着，郭生华又想到他在上床睡觉之前，还得安排好明天的中午饭。他找到房东家的主妇，向她买了些面粉，请她帮着烙些死面干饼，以便我们带走。郭生华把这一切安排妥当，房东大婶也在忙着烙饼的时候，他才回来。可是，他在睡觉之前又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放在我的打字机旁。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他才去休息。白天，他不停地在行军，半夜我们还要继续上路。即使这样，郭生华毫无怨言。他为人正派，从不盲从，政治思想先进。在军事方面他也是受过训练的，他背着的那支毛瑟枪并不是一件装饰品。他属于那样一种共产党人：坚强如钢；在关键时刻，个人必须挑起整个斗争的担子。自从他到了西安跟我们相处的时候起，我一直都在观察他，常常感到我身边有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靠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的敬重也与日俱增。每当敌人飞机隆隆地从我们头顶掠过时，他会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它们朝哪个方向飞去。毫无惊恐的表情。他站在我旁边，不慌不忙地叫我把马骑到别处去或

叫我下马，到附近隐蔽起来。

每当我对别人感到厌烦时，我就想到了郭生华。

时间慢慢地过去，太阳又出来温暖大地了。我们骑着马不断地上着山坡，翻过起伏的山岭。有些山间的梯田，几乎快修到了峰顶。山坡上布满大片大片的羊群，有黑色、白色的绵羊，也有许多山羊。我们走的是一条宽阔但尚未铺修好的汽车路。走在这样的土地上，我们一下子就联想到为什么日本人要侵略中国的一个理由。财富就埋藏在这绵延的山脉里。我们脚下的路就常常从厚厚的煤层中穿过。在路边有一些地方，石油就从地里面往外渗出。这一带到处都有铁矿。在我们眼前，就流淌着一条红色的小河。那小河的整个河床延绵几英里都被铁锈染成了红色。河水中尽是红色矿砂。抬头望去，我们面前呈现着一座又一座的矿山。

此种情景，不能不激起我们心中的怒火。多少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他们深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绘制地图、拍摄照片、探明进犯的路线、寻找那些最适合的地区以实现他们征服亚洲计划的第一步。山西省煤、铁、石油蕴藏丰富，所以它就成了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整个中国境内，只有苏区、由红军防守的地区才没有留下日本人的足迹，他们无法进去勘测。几年前当红军撤离江西时，就是那个驻守上海的日军参谋部要求给予他们派遣“新闻记者”去江西采访的权利。这个“权利”他们得到了——“记者”们带着照相机去了。其实，这些“新闻记者”就是军事间谍，他们到了江西之后，其所作所为和他们在中国别的地方干过的是一模一样。

如今，日本侵略军遇到的就是这支军队——它在中国最憎

恨的敌手——红军。至于红军改名为八路军一事，这对他们倒是无关宏旨。最最使他们感到可怕的事是中国经过极大耐心和努力之后建成的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人向全世界宣布说，他们到中国打仗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可是，全世界也都知道日本人无论如何总是要发动这场战争的。他们要迫使中国政府铲除红军和共产党，那样他们最后就能更顺利地征服中国。目前八路军还太小，还没有充足的时间动员民众和武装民众。八路军正在争取时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武器对付敌人。有些军阀仍然害怕八路军去动员民众和武装民众。不过，要拯救中国，使它免遭日本人的肆意蹂躏，舍此而外，是没有其它道路可走的。

我们在越过高低起伏的群山之颠以后，就开始下坡了。这里山泉清澈，煤、铁矿脉已不再见，代之而来的则是布满山坡的梯田，再不象北部那样还有很多荒地了。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完毕。金黄色的玉米穗高高地挂在每户农家门前的杆子上。高粱穗已经砍掉，留在地里的只有那些还带着片片暗红色叶子的高粱秆。谷子都是连根收走的，高高地堆满农家后院的墙角。村里的男男女女操着木制农具在打场脱粒。毛驴或公牛套着眼罩，驾着大磨盘，不慌不忙地在那里转圈磨面。在老乡家的墙上和一些寺庙的外面，写着大幅标语：

“改善群众生活！”

“人民要和军队联合起来打日本！”

“减租减息！”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我们决不当亡国奴！”

“武装起来，战斗到日本人全部滚出中国去！”

“军民团结起来！”

所有这些标语都是八路军写的。我们目前在晋北的一些地方活动。这里三十个县的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都是由八路军负责进行的。

我们在翻过了几个小时的山岗之后来到一片开阔的台地。四周全是有梯田的山坡和世界上最肥沃的黄土岗，开阔的台地和一望无垠的梯田使眼前变成一片灰色。农田已经翻过，有的已经种上了越冬的作物。山顶上有些地方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一股刺骨的寒风就从那里刮过来。四野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树。路，就是几千年来人类从深深的凹洼里用双脚踩出来的。这儿的一些洼地不到一人深，我骑在马上可以看得很远。可是在其他地方，有些洼地很深，左右两边都矗立着黄土陡壁。偶尔，我们的道路可穿出凹洼，通到平原。一路上，我们三次听到了日本飞机的嗡嗡声，就停步在陡壁下面躲藏一会儿。

行军的队伍里有歌声也有笑声。那些小鬼们从队伍里跑出来，在地头上你追我赶，跌跌撞撞，就象小木偶一般。他们行军一天，走的路程却比别人要多一倍，因为他们一路上不停地相互追赶，蹦来蹦去老在闹着玩。

我对飞机的声音变得特别敏感，甚至夜里都会突然醒来，好象听到了军号声发出敌机飞临的警报。今天，在一个小时内就响过三次警报，所以无论听到什么声音我都会站起来。有一次，队伍来到一处平缓的山坡下，前面大路上全是行军的队伍。突然，我听到山顶有一阵奇怪的叫喊声，前面的队伍开始向我们冲了下来。我停住马，看看四周有没有一片小树林、一

堵黑乎乎的土墙或一条夹在深洼里的小道，以便跑过去躲一躲。然而，我定下神来，才发觉并不是飞机来临的警报声。相反地，有一只长耳朵兔子正从山上飞奔下来，朝我们这边来逃命呢。很多人，还有一只狗正在后面紧追着它。兔子跑起来比谁都快，当它快跑到我们眼前时，我周围的人也一齐跟着追了起来。我们是要上前线去打日本人的，但是这会儿大家却都追起一只兔子来。那只小小的兔子转到旁边一条小路上逃掉了，只有那只狗还在紧紧追着不放。

立波和舒群到了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引得大伙都笑个不停。不过，警卫员倒没有笑。严肃的郭生华说他抓兔子为的是改善伙食，听到他的话，我也笑不起来了。警卫员们都尝过连续几天、几周、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滋味。在八路军里凡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的指战员都体验过那种挨饿的艰辛，所以他们也常以军马、毛驴、狗、猫乃至老鼠来充饥。他们常常连什么吃的东西都找不到。所以当他们翻过雪山，进入甘肃之后，成千上万名红军战士已是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精疲力竭，气息奄奄。每到夜里，大家就睡在路边，紧紧地偎依在一起以抵御寒冷。就是这样，这支由中国工人、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继续前进，战斗不息。所以，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者也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剿灭”。但是，红军在经过一番休整，取得了较好的给养之后，现在又上前线跟侵略军作战了。正如一名日本军官在日记里开头所写的那样，“红军真叫人头痛。”谢天谢地，这个日本军官已经死去，是不会再头痛的了。

我们快到正太铁路了，但见日本飞机沿着铁路来回不停地

巡视。我们随即听到远处有爆炸的声音，我们在一个四周筑有围墙的城镇休息，城内有一座很宏伟的佛寺。一棵棵古老的松树向下弯着，覆盖在寺院的琉璃瓦屋顶上面，饶有风趣。这个镇和别处一样也已经建立了游击队组织。游击队员们都已经上前线去了。

我们继续前进，来到一个半荒废的村庄，就在这里过夜，同时准备在今晚就越过铁路线。那位给我们小组忙着安排住处的农民面带笑容，兴致勃勃地走来走去。他给我们送来一只南瓜和一些大蒜，但不肯收我们的钱。他又给我们拿来两棵很大的洋白菜。我们不能接受他的东西，除非他收下我们的钱。后来，他总算勉强地收下了一些。他还进屋子里来帮我们把火生好，以便警卫员过一会烤东西吃。警卫员们买来了两只鸡，他们高高兴兴地杀鸡、褪毛。事后，康克清告诉我们说，她听人家说起过：那时我从炕上爬起来，把外衣脱掉，赶忙去洗鸡、开膛的事。

立波把这称为“战地头号新闻”。

我们准备半夜后继续行军。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我们两点钟起床，三点钟就借着星光出发了。一弯月牙在天边照着我们。晚风吹来阴冷刺骨。冰冻的大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每片草叶子上也都洒满了霜。

最后，我们抵达一座象死一般寂静的大城镇。城镇周围是高高的、成锯齿状的城墙。绕了一段路之后，我们就从外面来

到这个镇的大街上。这儿的居民已经走光了，只见两个战士站在一座建筑物前面的灯旁。街道挺长，一眼好象还望不到尽头似的，我们从老远的地方，就已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铁道离我们不是很远了。可我们还在走个不停。我们忽而遇到先头部队的人，正匆匆忙忙地返回来。原来他们迷失了方向，无法从那里走过铁路。前头既无路可走了，我们也就跟着他们返回，又从刚才走过的街道再往回走。但是，我们谁也不清楚该走哪个方向。有几人停了下来，向站在灯旁的两个战士打听。他们说，八路军一个很长的队伍在两小时之前就是从这条道上走过去的。于是，我们转过身，又往回返了。后来，我们在路上和十字路口的地方都发现一张张的小白纸条，上面画着箭头之类的标志，给我们作指南。我们按照这些标志前进，不久就来到铁路旁。铁道是单行窄轨。

东方拂晓。我们紧张地望着天空，两耳仔细听着每一处声响。我们沿铁路线分成两个纵队行进，时而跑步，时而慢步，整整走了有四十分钟，希望在赶到下一个火车站之前，不致被日本飞机发现。在远处的铁道上，我们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最后，我们终于走近了火车站。在铁轨中间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大片大片的血沿着枕木淌了长长一截。有一顶农民戴的那种草帽扔在不远的地方。很明显，这个人在临死前的一刹那是跑了很长一段路的。往前面走不多远，我们又看到两具尸体，其中一具已经粉身碎骨，不成形状，脊骨裂开，两腿一直折到了后背。据说，日本飞机是经常用机枪扫射老百姓的。另外那一个农民的尸体是被火车碾过的，因为，他想躲开日本飞机的扫射，而火车头也正在飞快地开过来。

我们碰到一些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其中还有伤员，有的人还正在跑着。我们来到火车站，看见一些车厢里有穿军服的士兵。前面车站上的铁路工人好象是持枪站在那里，火车头正忙着调来调去拉车厢。日本人至今还没有轰炸过这个车站，他们打算先把它占领，然后再利用它。

六点三十分——我们正在迅速地向南和东南方向行进，穿过黄土峭壁。哪有日本飞机？天色已经大白，但日本飞机并没有来。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队伍中没有汉奸，老百姓也没有出卖我们。

我们向前走了大约四十分钟，队伍的尾巴肯定还正在沿铁路线走着。这时候，我们正好听到了飞机的隆隆声。大伙迅速找地方隐蔽。不到一分钟，那条从飞机上一眼就能看到的白色大路上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了。人们全都躲进了树丛、草堆、麦子高粱垛里和黄土山坳边。人们看到两架日本飞机沿着铁路来回搜索着，它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的队伍。等日本飞机飞走后，我们又前进了，而且走得比刚才要快得多了。可没过几分钟，日本飞机返了回来，我们再次找地方隐蔽。过了片刻，我们又开始前进了。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以后我们就不再隐蔽了，因为前面左右两侧是很陡的黄土岗，道路从山壁之间穿过，正好以山壁作为掩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飞机在很远的地方仍然在沿着铁路飞行。有时候，一架飞机想朝着我们这边飞过来。这时，我们那些用玉米秆、杂草、树叶伪装起来的驮子就停止前进。我骑着我那匹小马就跑到小松树林里，从树下注视着袭击我们的日本飞机。

飞机过后，我们继续前进。一路上，我们谈工作，查看地

图，找一个指挥部很快就能进驻的地方。在我们所经过的各个村寨里，我们都想方设法要买些蜡烛。但是一根也买不到。住在这一带的老百姓使用的都是灯草小油灯。这可怎么办！朱德告诉过我们，不久以后我们得在晚间工作、打仗，白天睡觉。我们向领队的打听是否能设法弄到一些蜡烛，他说他也无能为力。不过，他说他可以给我们弄一个大碗来盛油点灯。我们听人说，离此地比较远的地方有个大镇，也许那儿会有蜡烛。明天，两位警卫员可以骑着马到那里去买回一些来。

我们来到一个村庄，准备今、明两天在这里休息。我那位骑骡子跟我一起走的警卫员发现了一架日本飞机，径直朝我们这边冲过来。我们连忙向村子奔去，躲到一块空地中央的一棵大树底下。那飞机嗡嗡地掠过上空，霎时就看不见了。

在这村庄里，总部整个都要停留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我的两个同行、三个警卫员和我本人被分配住在一个清代旧官僚宅邸里的一间屋子。这座宅子是挺有气派的。男的都在屋子那一边的炕上休息，我的行军床则在屋子的这一边。宅邸华丽，有镂空瓦当，前庭后院，四周都是花格子窗户；庭院中央，草木青翠，颇为悦目，我们屋子里摆着几件桃花心木衣橱，足有半堵墙那么高，靠屋子那头是一排雕刻精细的条案，还有衣柜、桌、椅和木凳。家具上都装着厚实的黄铜铰链和黄铜锁，桌子边沿上也都雕有各种花卉图案。炕周围的三面墙壁上全涂着真漆，头一道是朱红宽条，带着黑色装饰；接着是一道青绿色，勾着细致的图纹；四周都是涡形边饰；最后一道是绘着绿色图案带着黑色宽边。挂在墙上的还有古色古香的中国画轴。

我们兴致勃勃地仔细打量这间屋子。从室内的陈设上就可以判断出主人是个大地主，放高利贷者。屋子中央悬着一副用来称钱的盘秤，盘架下面的抽屉里放着算盘。一只皮盒子里放着许多大铜板，显然是挑出来比分量的。

在那一排高大的衣柜上面和衣柜后面的小房间里都堆放着各式各样用以盛谷物和过秤用的竹筐之类的量器。跟其它公馆一样，这里的地上全都铺着光滑洁净的大青砖。我们的院子后面还有院子，那里是主人家的粮库和马厩。

我们相互议论着象这一类人家会给农民造成多么大的负担。肯定是非常大的。那位官家的后代因为害怕日本人都早已经跑光了。有几个远房穷亲戚留下来帮他们照看宅子。不过，这些穷亲戚家里的女眷和孩子们也跟此地的许多老乡们一样都已经逃走了。

晚上九点——我们发现村里有一件怪事。从本村和邻近村子逃走的大批农民又纷纷涌了回来。老乡们奔走相告，说是已经来了八路军。于是他们就背起行李，或用毛驴驮回家来了。这天晚上，一个群众代表团到我们的军事指挥部，对于八路军来到此地表示感谢。他们请求八路军留下来保护乡亲们。今晚，正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照管住宅的一位老乡的妻子，后面跟着一群孩子，给我们端来一碗黄澄澄的豆馅卷饼。她恳求我们收下卷饼，还说村里老乡全都欢迎我们。她那三个娃娃就站在她身旁，手抓着她的黑色裤子。她希望我们能留下来。我们想吃鸡吗？她不要我们付钱，要送给我们一只鸡。我们感谢她，但没有收下她的鸡。我们若是拿了鸡，那我们就必得给她钱。她倒是真心真意地要送我们鸡吃，但我们还是诚恳地谢绝了

她。警卫员跟她走到外面去，好说歹说劝说她收下我们的三角钱。她收下了，可一会儿又退回我们一角。

政治部有个人今天晚上跟我们谈了话。他说：“我们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游击战术的训练。我们已经向阎锡山将军提出要求，请他赶快再发给我们新枪。我们要把老百姓武装起来，他们就能够保卫自己，打击敌人。我们今天在这儿开始工作。以后，政治部就会在这里的每个村庄都有工作人员。此外，我们还做了别的工作，我们还给山西和四川的各个部队都派去了人，而且也派到孙连仲将军的部队里去。我们的宣传员将深入到军队中去，给战士们做工作。首要的和最紧迫的工作是向他们宣传，要保护老百姓。谁也不许抢百姓的东西，妇女姑娘们再也不应该怕当兵的，而是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保卫者。从这儿往东这一地区，八路军已经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了。”

日本军队沿着正太铁路已经到达离我们总部不很远的阳泉车站。有的中国部队吃了败仗。黄绍竑将军指挥的部队还在阳泉作战。据说他是个很能干的指挥员。由于八路军的劲旅来到此地，所以，就有希望制止敌人前进；对于那些仍然顽强坚持在这儿战斗的中国军队来说，也能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日

有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村子里搜索到八包很好的大蜡烛，并且拿到我这里来，我全部买下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够用一个月。可价钱比西安卖的甚至还要便宜。

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呆在这里，人人忙着工作。

从阳泉往西的正太铁路沿线正在打仗。今天清晨刚刚拂晓，战斗就开始了。可是直到现在这个时候，战果如何尚不得而知。战场离此地很近，日本轰炸机整天就在四周侦察，搜索有没有前去增援的其它中国军队。这些轰炸机在我们村子上空嗡嗡响了一天。我到外面走了一走，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得在门口躲三次。我们走到村外，在那儿碰到两批正在回村途中的老乡。他们是一个星期之前离村的，当时把能带走的全带走了。他们一听到八路军来村的消息后，就都赶快回来了。成年人个个都背着被子、小包。日本飞机在上空隆隆飞过，他们跟我们一起躲进了门洞。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

昨天的战斗结果是，中国军队沿着正太铁路从阳泉阵地向后撤到张琴镇（音译）。日军现在主要集中在娘子关到太原中间的平定州。

我跟朱德谈了话。他精神振奋，泰然自若。他说，中国军队（不是指八路军）昨天吃了败仗，那个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日本人想开到太原来，那就随他们的便，”他说，“到那时候，我们可以切断他们的后方，破坏他们的全部交通线，把他们打散之后再吃掉他们。中国军队比日本军队要多得多，我们可以从四面包围他们。眼下，中国军队都集中在寿阳。”

前天，我们就是在寿阳越过铁道的。昨天，从早到晚，有六架日本轰炸机仅仅从“天上一擦而过”，想寻找刚刚开到这里

的八路军。日本人知道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可他们没法搞清我们到底驻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两个部队已经在阳泉打过日军的侧翼，刘伯承指挥的那个部队则在山西—河北交界处破坏了很长一段铁路线。日本人短时间内难以修复这段铁路；即使修好了，我们也会在那里或在其它任何地方把它切断。有消息说，日本军队已经疲乏不堪，难以前进。这倒不是主要问题。因为日本士兵只知道服从上级的指挥，上级要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就只能照办。主要的是现在位于他们后方的正太铁路两翼全是八路军，日本人就只能向前推进，不能后退了。八路军正在运用著名的侧翼包抄和攻打后方的战术。

日本人目前正由山西省三个不同的方向向东线进逼：沿铁路往西，不过，铁路已被切断，八路军又正在骚扰它的侧翼和后方；有四个旅从平定州向西南进发；两个旅——约六千人——沿山西、河北边界附近离铁路五十里左右的一条公路向阳泉进逼。可见，日军还在利用各条公路要深入山西省。

在阳泉附近具有战略意义的东鹰头山（音译），八路军指挥员陈赓带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刚刚修筑好了防御工事。八路军某部前天抵达平定州南面的马大岭（音译），正好与从马大岭方向来的的敌方四个旅发生遭遇。战斗持续了昨天一整天，我方打死敌军约一千人，并缴获大量给养。

前天，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别发表致日军士兵宣言，号召他们停止这场由中、日两国人民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强盗战争。中央政府的飞行员（这地区有一些）很热心地飞上天空，在日本防线上空散发了宣言。

到了这个时候，日本人才明白八路军已经来到了这一带地

方，他们也已经尝到了滋味。他们清楚，八路军不但到了铁路线南面，有的也到了铁路线北面，正以钳形运动逼近他们的后方。他们从后方铁路线被切断和昨天战斗所损失的一千人当中，业已感觉到了。再加上，有的中国军队战斗顽强，决不退却。还有，从天上落下来的那两份宣言。所有这一切都使日本人明白八路军已经来到了这个地区。

在北线——日本人可高兴啦！他们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八路军从那里撤到东线去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日本人就想要把他们的各种给养物资运到主要集结点的忻口。驻扎在忻口的山西和中央政府的军队正在阻击日军主力，天天用大炮轰击他们。日军觉得他们现在总可以把炮弹、弹药运到忻口去了。所以，他们派出七、八十辆军用卡车，满载炮弹和其它各种弹药和给养。两百名日军官兵象老爷似的坐在车上，飞奔前进。贺龙某部，在游击队的协助下，对这批日本军车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们用手榴弹炸坏了六辆，接着在战斗中又摧毁了十辆。他们还破坏公路，使其余的车辆也动弹不得。那两百名日军官兵全数报销，其中包括一名连长和一名副连长。中国方面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包括两挺轻机关枪、步枪、手枪和其他许多东西。日本人试图找到另外一条公路运输东西。可是，八路军和游击队组成的小分队在那条公路上埋下了地雷，十一月二日有两辆敌人军车被毁。

在中、日双方之间多次易手的浑源城又被八路军收复了。浑源城地处北线，在长城之外。它是在十一月一日从日本人手里夺过来的，还消灭了一批日军。

中央军仍在忻口截击日本人。那里的形势没有变化。敌人

希望能突破坚守在北边的八路军部队，并能支援他们在忻口的队伍，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太原进发了。

我们现在正在铁路以南的一个小村庄里。昨天晚上，有人得到通知让作好准备，要在午夜出发到达此地。我们按照通知办了。但是，那个领队大概肯定我们会碰上日本人，所以他在十点钟，我们刚刚上床才三个小时，就把我们唤醒了。我说还不到十二点，可他说我的手表有毛病。所以，我们就起床，收拾东西。到十一点左右，我们已经准备就绪，等待出发。可是，整个指挥部人员还没有起床呢！一个小时以后，才听到起床号，过了一会，早饭号，又过了一会，听到准备出发的预备号。到两点钟，出发号吹响了。因此，最后那一个小时，我们是站在村外路上一群群牲口和一行行的队伍中间度过的。跟往常一样，路上熙熙攘攘，毛驴、骡子的叫声、马匹的嘶鸣和人们的吵嚷、唱歌声交织成一片。但是，等队伍出发之后，一切都恢复宁静，只有从崎岖不平的山径中发出的格登的脚步声。那些无拘无束、喜爱打闹的小鬼们这时候也不敢高声讲话，生怕被三、四英里外的日本人听见！队伍中没有人高声讲话。上面还有命令，不让打手电筒。我们是借着幽暗的星光在行进。我发现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就在我的左后方，下面的那颗星就是北极星。有时候，北极星转到我的正左方，有时候又转到我的背后。我们在行进途中，眼睛也就逐渐适应了四周的黑暗。

那些道路实在太难行走，我简直不敢骑在马上。所以，靠着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警卫员的协助，我翻山越岭，首先穿过冰水翻腾的山涧，再爬上怪石嶙峋的蹊径，接着又是上下行进。就这样，我们走了整整一个通宵。两边隐隐地显现出黑糊

糊的山影。前面手电筒的亮光偶尔还在闪烁着，那是先头部队正在寻觅道路。几个小时之后，队伍走散成几个小股行进。我们注意看着路边，想找一些给我们指路的小纸条。这些小纸条上常常写着——三十、二十、十的数字——以表示我们还要往前赶多少里路。那些宽阔的冰河上并没有架桥，所以大家几乎都得打湿自己的双脚。但是，谁都不声不响地蹚了过去，继续向前赶路。快到天亮时，我们都已走得精疲力尽，有的已经一瘸一拐，寸步难移了。队伍却仍坚持往前走，有时我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歌声。我骑在马上走了很多路，跨过不少的溪涧。所以，双脚起码是干的。后来，我发现立波脚底下的皮已经裂开，露出了鲜红的肉。他一声未吭，只是偶尔放慢步伐。他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说：“这算不了什么。”

在黑暗之中，我多次丢了马。倒是它发现了我。有两、三回，我听到它发出轻微的咕咕声，这通常是马表示满意而发出的声音。我还感觉到它在用鼻子轻轻地碰我。每当这种时刻，我就想用双臂搂住它的脖子。然而，等天一亮，我骑着它走在平坦的大道上时，就对它开始拼命地吆喝了，因为它拔腿飞跑，搞得尘土飞扬，“想去找姑娘了。”在我们队伍里有一匹栗色的小母马，得意地由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小战士牵管着。我那矮种马“云南”喜欢这小母马，并对它作出粗野的求爱动作。小母马飞起后腿，猛地踢了“云南”。它背上驮着的东西也都掉了下来。为了对付母马的进攻，“云南”就围着它转圈，想以此刹刹它的傲气。虽然，我还骑在它的背上，它全然不顾这个。它什么都不管了！那位牵着小母马的战士手里准备着一根木棒，是为了对付“云南”的。刚才，我差不多一阵一

阵地快要睡着了，可这会看到那位朝着“云南”走过来的小战士瞪着的两只大圆眼睛和满脸的怒气，我就完全清醒过来了。眼看一场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我调转了马头，走进队伍中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我记得有一本印度古书，书名大概叫做《羯磨瑜珈》。书里写的就是所谓男女“寝合”之道。其中有一节说道，男女双方相悦于歧途之上，是谓不吉不利。岂止不吉不利！甚至十分的危险呀。今天，我想到了那本古书。

将近上午九时，我们的小分队人员把我们带过了一条小溪。那河床里的石头跟刀子一般锋利，象是有人专门消磨过似的。再往前就是村庄，我们的总部将在那里宿营一天。过了一会，我们发觉从东边的山沟里慢悠悠地走来一列长长的队伍。那一帮人走起来无精打彩，好象昨晚已经走了一个通宵似的。我们停住脚步，看着队伍；我还拍了几张照片。这原来是在前线打了败仗下来的第三军，他们正往西边转移，以便整编后再返回前线作战。他们队伍里没有驮运东西的牲畜，武器、弹药全得靠人背着。他们走过的时候，队伍中间就有人大声叫嚷。我们听到他们在叫：“我们没有大衣！我们没有大衣！”前面村里的老乡们都站在石头墙上观望着他们。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似乎是在冲着早晨的空气伸冤诉苦。接着，他们的上级发布休息的命令。战士们一个挨一个地把“休息”、“休息”的口令传下去。可他们并没有停住脚步，因为休息的地点还没有到达。这时候，又传来了那种奇怪的叫唤声：“我们累坏了！我们累坏了！”

人们都说，这第三军是中央政府最精锐的一个军，士兵们

很能打仗。可他们背上没有行装，身上没有大衣。我在纳闷他们怎样睡觉，怎样御寒。当他们看到我这个洋人时，谁也不出声了，惊奇地瞧着我，有几个面带笑容，停下来让我给照相。

我们来到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荒村，在一户中等农户家里找到两间空屋子。这家房子有三扇门全都用中国老式的铁锁和铁链锁闭着，所以我们就进到那两间空屋里，休息了下来。后来，我们见到一位住在那上锁的房子里的农民。他的老伴和女儿全跟着别的妇女们一起逃到山里去了。他跟周围的老乡们一样，也是个穷汉。村里的男人们好奇地跟我们聊了起来。我们劝他们把老婆、姑娘们叫回村来。可他们害怕当兵的。可见，总部的政治部还需要拿出一、两天的时间给村里老乡们做工作，使他们相信八路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到那个时候，村里的妇女也会跟邻近地方的妇女一样，很快地返回来了。跟在别的地方一样，我们还让村上的男子们把大伙组织起来，武装成游击队。在前面一个村里，我们只住过两个晚上，可还是留下了两名武装人员。那是群众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还派代表到我们指挥部里来过。

明天上午，我们将离开这个村子，到一个新地方去。

我真不理解中国人。他们吃的就是小米、大米和一样蔬菜。今天，我们吃大米、胡萝卜；有时候吃南瓜或土豆。大家就靠这些东西过日子，没有脂肪，没有糖，一连几天吃不到一点肉。我身边还有一点钱，这是为准备这次随八路军采访向一位朋友借的。所以，偶尔我还可以买一只鸡。我们小组六个人都吃这一只鸡。就靠着这个，我们能摄取一点点蛋白质和脂肪。警卫员们的鞋子马上就要完蛋，但他们就只这么一双，也无法买

什么。这一带压根儿没有什么卖的东西，整个地区穷得要命。群众吃的是小米、高粱、南瓜和一些只不过象胡桃那么大的土豆。周围甚至连鸡也很少见到，要有也是瘦得可怜。我们今天买了一只鸡，可它连一点油气都没有。我们还从一户贫农那里买了一只南瓜。这地区又来了很多军队，我在纳闷，到了冬天，群众怎么过日子。我们吃的东西全是买的，其中许多大米还是用毛驴、骡子跟着我们一起运来的。从这儿到太原要翻越几天的崎岖隘道，因此冬天一到，部队在此地的粮食、衣着简直是个不可设想的困难问题。此地没有公路——也不见卡车。村里的老乡谁也拿不出来一块钱的现金。今天下午，我们买了一只鸡，卖主没有零钱找给我们，所以我们只好再买一只鸡、一只南瓜和一些喂马、骡的玉米。我要用剩下不多的几个钱买点饲料，喂好牲口。如果它们死掉一个，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们以后的路程非常艰难，大部分时间里我也得步行。

今天，两个同伴和我把行李精简到最低限度。我们每人有一套外衣，都已穿在身上。有一双富余的短袜和一双富余的鞋子。我们这双富余的鞋子是在西安买的，这说明我们还有点钱。我的行李主要就是打字机、打字纸、复写纸、照相机、胶卷和打字色带。我甚至连急救常用药品也得精简掉。我把行军床给了这里的一位农民。这行军床对我非常有用。我可以一个人单独睡觉，免得招上虱子。穷老乡家的炕上少不了虱子。今天上午，当我们到达此地时，我就看到有些战士正坐在门口，光着身子，在衣服里面抓虱子呢。他们身上已经长了这玩意儿。可是截至现在为止，战士们还是没有出过什么毛病的。在北方的冬季里，虱子传播斑疹伤寒。打仗的时候，有虱子，就会

有传染斑疹伤寒的危险。中国的北方人得了此病不一定会死亡，他们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但是，八路军的大部分指战员都是南方人，我担心他们会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受到斑疹伤寒的严重威胁——这意味着大部分人会因此而死亡。我们买不起预防斑疹伤寒的疫苗。每一个预防注射疗程需九美元。我自己也还没有注射。一年前，我打了一针预防针，差点儿因心脏病发作而送了命。

总之，我是不能带着我的行军床了——我只有睡土炕。从现在起，我只有一头毛驴和一只小骡，来帮我们小组六个人驮东西了。我的东西最沉，有打字、照相用的各种器材。在这些地区里，我们什么纸张都买不到。其它需要用的东西，也都得自己带着。

附记：今天那两位住在上着锁的屋子里的农民回来了。其中一个穷得一文不名。他恭恭敬敬走进我们屋来，却又低声下气地向我们讨东西。我们根本听不懂他的土话，谁也不明白他讲些什么。最后，他壮着胆用手一指，我们才看到是指那根吊在门背后的旧绳子。他想要回他的绳子，但是又不敢走进来自己拿走，也不敢指给我们看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警卫员都带着枪呢！他知道跟带枪的人打交道是怎么回事！看到了这种情景，我们就笑了，并把绳子递给他。他的头上有一道血斑，正流着血，象是摔伤的。我用碘酊给伤口消了消毒，他说一定要付钱给我。既然他有了这种表示，我们也就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分文不收。他大惑不解地瞧着我们——这真是一支特别的军队，不要老百姓的绳子，还免费给看病。十分钟之后，他又回来，请我们再把他的脚上的伤给看看。这倒难住了我。他

的布鞋破了个窟窿，脚就是在窟窿里被磨得皮开肉烂的。他需要换一双新鞋子就行了。可我们自己也都快没有鞋子穿了。于是，我那个警卫员就把他领到医生那里。医生把他的脚包扎好之后，并告诉他回去把破鞋子补一补。

村里男的都回来了——但是妇女和姑娘还没有回来。中国面临着多少问题啊！几千年的一切问题似乎统统都落到人民头上来了。中国军队正是为了争取人民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的社会权利——民族解放而战斗。不过，这场战斗仅仅是一个开端，甚至连中国军队要取得战斗胜利的先决条件还不具备——即，采取民主的社会、经济、政治措施，使人民群众真正感觉到他们有能为之而奋斗，为之在必要时而献身，首先是能为之而活下去的目标。在行军的时候，我也经常深深地思考，那些具体体现在八路军身上的原则将同样会指导中国、拯救中国，并且能够给亚洲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以最大动力，同时也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生的原则。我这个信念给我带来了平生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最大的内心宁静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

我刚刚发出今天的日记，朱德就来看望我们了。他忧心忡忡，平日那种热情劲不复再见。他告诉我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寿阳。寿阳是通往太原去的正太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之一。昨天上午，正当我们行军往这儿来的时候，日本人把寿阳占领了。我们就是从寿阳车站穿过正太铁路的。从寿阳到太原只有一百八十里路。寿阳下面的一个战略要地就是正太铁路

和横贯山西省南北的单轨线同蒲铁路的交汇点——榆次。驻守寿阳和这一带其它防线的四川军和中央军看来并没有进行过顽强抵抗就撤退了。眼下，这个地区里除了八路军还在作战以外，看来再也没有别的部队了。有些打了败仗的部队经过集中和改编后，又开到了榆次，准备迎战。朱德的希望是，四、五天之内，汤恩伯第十三军和刘湘川军的增援部队能够赶到这里。他估计川军会派来七个师增援。汤恩伯的部队会打仗。他们在南口的那一仗，虽然犯了战术性错误，但打得很出色。至于刘湘将军的部队，那就不怎么样了。两年前，他们跟红军有过交锋。红军轻而易举地就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师。有两位多年前当朱德还任滇军旅长的时候就认识他的川军将领拜访了朱德。八路军来到这一地区打了几个胜仗，使这一带的友军都受到了鼓舞。此事使朱德感到自豪和欣慰。

但是，朱德仍很担心，默默不语，因为日军第二十师的九千名人马正由平定州出发，沿正太铁路向西南推进，已经进入离我们总部不到三十里（十英里）的范围之内。八路军在那个地区只有一千左右的兵力来对付日军。林彪是前线司令员，陈赓负责战场的指挥。八路军现在所采用的是人所共知的战术——大范围的、有组织的游击战。就在我们北面的那个地区，今天下午已开始打起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战斗的具体情况。

不管怎样，我们总部准备在明天早晨破晓时转移。但是，从这里逃出去的老乡们还没有全部返回。回来的只是一些男人，他们想先看看敢不敢把家属也接回来。女人和用来驮孩子、拉铺盖等物的毛驴、骡子全都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就找

不到更多的牲口帮我们运粮食和行李。整个政治部只有五头毛驴，而且必须运走我们从雁北带来的粮食。我们真不知道怎么走法。跟我们住在同院的那位农民已经答应帮我们小组运东西，还答应再找几个人来一块帮忙。即使这样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村长就进山去并到邻近村庄去把乡亲们和牲口找回来。但是，当大伙知道我们要转移时，他们连村长的话也不听了。如果我们留下来的话，那他们才会回来。可现在我们要借用他们的牲口向别处转移，因此他们就更呆着不想动了。村长回来向我们汇报情况时，还流了眼泪。因此，明天上午，我们自己都得象牲口那样驮着行李行军，有不少东西只得留在原地。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交谈，象老朋友似的。我们跟他可以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尽管这几天来谁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闲扯。今天，朱德心事沉重，郁郁不乐。我们在谈话时，他常常要停下来，仔细听听东北方向日本大炮的轰隆声。朱德走后，我们几个人坐了好长时间，都在听那边的炮声和偶尔一起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机关枪声。那边战场上，日本军队的数目是八路军的九倍，他们的武器装备是八路军的一百倍。我们很可能会打败仗。八路军还有一些部队也正在其他地方作战，刘伯承部队在我们的东边，还有林彪指挥的部队在我们北边和东北的战场上。这是他指挥的著名的江西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这支部队现在已经编入八路军，他们几乎全是江西的工人和农民。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也已编入八路军，目前正在山西省北部敌人后方——也就是处于敌人两条战线之间。前红军参谋长刘伯承现在指挥的是红第四方面军，即

曾经由徐向前指挥的红军第四军团。徐现任副司令。林彪部队和刘伯承部队目前正在我们的东北方向的正太铁路两侧。林彪部队中还有一支小队伍正在山那边与日本人周旋。负责指挥这部分力量的是陈赓。陈赓出身湖南一户农民家庭，参加过游击队，后来成长为红军中最坚强的指挥员之一。

立波和我告别朱德之后，我们又到别的部门去看看。我们看到政治部下属的“敌工部”人员正在研究日本人的文件。这个部门的人员都会讲日语，有的还是日本留学生。其中有台湾籍的蔡程（音译）。他们负责处理一切缴获的日方文件、日记及其它资料；他们也负责管理敌军俘虏和对敌宣传工作。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久前对日军发表了两份宣言。之所以发表这两份宣言是由于看到了日军俘虏、阵亡士兵的日记以及许多日本士兵口袋中藏着的一份很长的日本共产党宣言。宣言号召日本军队不要打中国人，还告诉他们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蔡程给了我一份八路军宣言。宣言写道：

“亲爱的日军士兵、官长们：

让我们高呼口号，以便你们大家都能听到：

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二、决不要上资本家、地主、军阀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当；
决不做他们的牺牲品。

三、你们的父母和妻子正在为你们流泪，希望你们能活下去。努力争取返回家园。

四、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军阀和法西斯主义者是日、中劳动人民的公敌。

五、日本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团结在一起反对战

争。

六、中国八路军是全世界人民民主的武器。

七、中国八路军是日本劳苦大众的战友。

八、中国八路军不杀俘虏，八路军优待俘虏。

九、日军士兵们，你们必须和中国军队一起为世界和平而战。

十、不要杀你们自己的兄弟：中国的工人和农民。

十一、调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

十二、为一个民主的日本而战。

十三、建立日本人民战线。

十四、世界各国的工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

十五、日本工人和中华民族万岁。

中国八路军政治部”

跟敌工部的人员谈话之后，立波和我来到这小镇的街头。这个镇比村子大不了多少。在街道两旁房子的墙上贴满了标语口号和一些新宣传画。有的是黑白宣传画附上一些简单的文字说明，让人们知道日本人怎样侵占东北和华北长城以南地区的事实。另外，还有由朱德、彭德怀联合发布的告人民书，就是我们在晋北一个小庙外面第一次看到过的那一份。在一幢房子的整面墙上还贴着十幅附有简要说明的黑白宣传画。这十幅画介绍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十项原则。现在，各村各寨都在用各种形式宣传这些原则。它们是：（一）对日作战，收

复一切失地；（二）没收日本在华财产，用于国防；没收汉奸一切财产，救济难民和贫民；（三）努力防止发生饥荒和水灾以提高人民生活；（四）取消一切苛捐和重税，整顿国家财政，发展贸易、工业；（五）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生活条件；（六）实施普及、义务、强制性的教育；（七）解决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八）政府要进一步推行民主政治原则，释放一切政治犯；（九）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保护华侨生命财产；（十）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包括朝鲜人民，台湾人民和一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与一切同情中国的国家实行合作，对一切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

沿着逐渐暗下来的街道往前走，我们看到有些人围在一个正在讲话的人的前面；我们听见那个人仔细而耐心地在讲着话，他不时地问周围的人们：“你们听懂了吗？”大家回答他说：“听懂了。”走近一看，我们才发现这群人是三十多个八路军战士，他们都没有携带武器。那位讲话的是他们的排长。此刻，中国无数的问题当中的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个排长对战士们说的是他知道他们和其他人当天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各单位必须自带口粮；有的单位口粮不够，许多人只好饿肚子。排长说，部队走了那么长的路，已经把随身带的大米、小米都吃光了。现在，部队买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很多牲口帮着运东西。我们已经派人到别处去买小米，但这些人还没有回来。八路军可决不能去找村长要粮食。村长只能在有关我们总的防御计划方面的大问题上帮助我们，我们自己的问题，还必须我们自己解决。

接着，排长又讲了一个问题，他说，战士们都懂得八路军

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项注意是每个战士在任何地方都必须遵照执行的。军人必须打扫干净老乡家的屋子，临走前要保持干净。他们睡的门板和柴草堆，临走前必须归还老乡。军人借东西一定要还，遗失、损坏东西一定要报告连里，以便赔偿。军人不得调戏妇女，不偷不拿群众的东西。军人必须使用老乡的厕所（挖在地上的方坑，上面架起木板或石条）或自己在地上挖茅坑，临走时要填平。这是保持群众和部队健康的根本措施，军人必须予以重视。

“你们明白了吗？”战士们回答说：“我们明白了！”

接着，这一排人开始唱歌。他们唱的是那支共产党、八路军走到哪里就唱到哪儿的歌——三八作风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配上了乐谱，听起来非常好听。今天晚上，当这些空着肚子的战士们唱起三八作风歌，当他们回到铺在地上的稻草堆或玉米秸上躺下来的时候，他们的歌声在我听起来比过去的意义就更加深远了。他们的歌声在夜空里就象回荡的弦乐。我今天是已经吃过饭的人了。我觉得我永远也不能懂得那蕴藏在这些工人、农民心里的为中国的解放而斗争的全部含义，也就是中国的解放斗争的真谛。我依然是中国解放斗争的一名旁观者，有我特殊的立场。尽管战士们常常挨饿，可我总不用为吃的发愁；尽管战士们会受冻，可我总会有衣服穿、有热炕睡。他们将要参加战斗，许多人还会倒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可我还是一名旁观者。我看着他们渐渐地消失在街道的一片黑暗之中。他们却还在那里唱歌。我渴望能有一道幻觉之光，帮助我洞察他们的心灵深处，形象地描绘他们忠于这一伟大的斗争，心甘情愿地为之不只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那样一种精神世界。

大概是为了能宽慰我们自己的心，立波和我二人信步来到朱德的司令部。日本大炮的隆隆声正从山那边传来。朱德和任弼时向我们表示欢迎。一位脸带笑容的警卫员用那种人人都有搪瓷杯给我们沏上了茶。任弼时对我们说，我们刚巧没有碰到二百名由平定州来的矿工。平定州现在已成为日本军队在正太线上的重要据点。前一阵，当日军还没有进入平定时，那里的有钱人家就逃跑了，后来城防守军也跟着跑了。可这批矿工并没有跑，他们从当地的小兵工厂里拿来枪支，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他们多次去埋地雷，毁铁路。他们是正太铁路上组织起来的第一支民兵队伍，一开始就与晋北的八路军有联系。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继续战斗，到八路军总部时光着脚板，或是鞋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饭，有时简直什么也吃不上；他们没有过冬的棉衣，仍然穿着夏天的单衣。我们有几双富余的鞋子，都给了他们；我还给他们食物和其他我们现有的东西。这批矿工前来是请示总部，他们是加入八路军呢，还是继续作为民兵战斗下去。就目前说，他们还需要继续进行游击战。他们在今天晚上离开了总部，到铁路线上另一个地方去伏击敌人了。

任弼时接着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了民兵的情况。他说，游击队是由八路军组织起来的。它们归八路军领导，是八路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山西北部、察哈尔和绥远的日本占领区里有五、六千民兵。他们所处的艰苦的战斗条件是人们很难想象的。他们冬无寒衣，食不果腹，又没有钱。虽然，很多民兵队伍是由共产党派出的人员组织起来的，可它们在组织系统上跟八路军并没有关系。

四、战斗在敌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今天，我们的总部没有转移。清晨四点三十分，军号把我唤醒。军号跟往常一样，听起来很微弱低沉。所有的军号好象都在响。没过一会儿，有个小号手似乎心里想出了什么高招儿，开始吹起了一支很好听的曲子来了。他吹了一遍又一遍。这是老红军部队庆祝胜利的曲子。我的警卫员听到之后，从床上跳下去，象箭似地跑出了院子。十分钟之后，他回来了，口中高喊：“大胜仗！大胜仗！”人人都从床上蹦起来，听他说在山那边的林彪部队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军队；九千日军从平定州分几路向前推进；八路军退到广阳之后，就进山埋伏起来。八路军切断了日军纵队，用强大的炮火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还歼灭了后面的大约一千名日军。八路军缴获敌人五百匹军

马、驮骡和大量的物资，另外还抓到一大批俘虏。

我这些情况不全是从警卫员那里听来的。舒群跑到敌工部去，他听说敌工部正准备到前线去，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走。他就上朱德那里去请示，我们是否也可以去。朱德高高兴兴地批准了我们的要求，还亲自来到我们的屋里详细地给我们介绍广阳战役胜利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一定得小心，因为许多日本飞机还在那个地区上空不断盘旋呢。

半小时之内，大家就已经出发了。我们只带了些卧具，我还带着自己的打字机和照相机。又过了半小时，我们就看到了第一架在我们头上侦察的敌机。我们紧贴着山岩伏倒，远处隐隐传来总部的军号声。我们始知战斗仍在进行，日军已经分成小股，分散在整个山里。总部给我们派来一个特别武装小分队作护送，担心我们在路上会遇到敌军。此地群山逶迤，一直连到我们的总部。山顶上建了不少临时瞭望台，上面坐着我们的哨兵。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健壮、精明的青年农民，他正急急忙忙地向总部赶去。我们清楚，他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正给我们送消息呢。

大约走了三个钟头之后，我们来到一个村子，此地离战场只有三、四里路。我们同行的人中，有一个比我先到村里。他把武装小分队带走了，也没有等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呆在村里，而无法上前线去。我骂自己运气不好。不过，我们倒可以在这儿看看。小村子里到处都挤满了日军俘虏和缴获的敌人物资。几百匹战马和驮骡，背上装着日军弹药、服装、帽子和药品，正准备往后方运去。在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一名日军俘虏，跟他说上了话。他是大阪来的报务员，还会讲几句英语。

他看起来并不沮丧，看管人员给他做了些工作，还给了些东西吃。他说，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军队要跟中国打仗——他自己参加了军，所以就只有服从命令。

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我们发现有三十八个满洲来的农民。他们是日军通过汉奸搞来的。那帮汉奸欺骗他们，说什么要他们去干几个月的活，还付给他们工钱。所以，这些农民就相信了汉奸的话。但是，后来他们才知道自己是在侵华的日本军队里当苦力。他们不但拿不到工钱，而且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到了夜里，日本人怕他们逃跑，就用链条把他们的手和马腿锁在一起。

这些满洲来的中国农民看起来非常可怜。我们一走进去，他们就站起身来，脱下那破破烂烂的帽子，向我们恭恭敬敬地鞠躬。日本人平时就强迫他们要这样做。他们瘦骨嶙峋，精神萎靡，身上有不少因经常挨打而留下的伤痕。我看着他们排成两行，准备后撤到离这里四里左右的一个村庄去。我们也都要迅速转移。日军正在附近山里行动，他们随时都可能袭击这个村子。我看到这些站成两行的满洲农民，在听一个八路军给他们讲话。这位八路军说，他们现在是跟他们自己的同胞在一起，这是一支跟他们自己一样的工人、农民组成的军队。从今以后，他们就都是同志了，因此希望他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打敌人，为全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而斗争。他们愿意吗？这两行衣衫褴褛的队伍中间发出一阵叽喳声，接着有人开口道，“请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告诉我们怎么办呀？”其他几个人也一齐跟着问道。看到这种场面，我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转身走开了。后来，我看

到这些满洲的农民全成了八路军的担架员，帮八路军抬运伤病员了。八路军给他们发鞋子和老乡的衣服。有一回，我正好碰到他们几个从山上下来，担架高高地抬在肩上。其中两个一前一后抬着担架，另外两个在伤员身边急急忙忙地跟着走。他们焦虑地在瞧着伤员，瞧得那样仔细、那样关切，生怕担架员走下陡坡时，会把伤员给摔下去。他们那种特别认真负责的神情令人深为感动。他们的脸上发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跟一个伤员谈了话，这个伤员就是那四个满洲农民给送来的。

不过，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一种语言可用来形容这位伤员呢？这位八路军战士本是湖北省的一个庄稼汉，现在大约有三十来岁。早在红军刚刚成立的年代，他就参加红军了。他负过七次伤，他身上的几处伤疤我都看到了。这一次，他的右臂和右胸被机关枪打伤。我说他是个庄稼汉，并不是说他是笨、动作缓慢、头脑迟钝的人。他脸上的皱纹很深，身子很单薄。但他有着一种机智、敏锐的神态，令人喜悦。他有两只大眼睛，眼珠是深褐色的；当时正充满着痛苦的表情。他讲话慢条斯理，讲几句停一下，眼睛在打量着我们每一个人。队伍里没有药可以帮他解除病痛。他问我们还有没有药？我身上带有一片安眠药，就给了他。

在这位战士的身上有一件事叫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开始当我们问他在前面什么地方受的伤时，他说他不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的身份告诉了他，并且向他保证我并不是敌人，而其他人谁也不会暴露秘密，这样，他才给我们说出了他受伤的地点。因为，就是在那个地方，他的战友们还在继续战斗呢。很快，那些被解放了的满洲农民就把他抬到肩上，直接送往后方

医院。

我们向后方的一个村子赶去，路程只有四里——也就是一英里又三分之一。可是，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虽然那一长列运送战利品的牲口走路太慢，可并不是它们耽误了我们。在路上，我们还看到一头又高又瘦的日本军马，背上驮着两个大箱子，带着红十字标志，这是药品。有几匹骡子驮着弹药全都走得很慢。但是却不见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这倒是个奇迹。因为此地山路狭窄，两旁没有可疏散的地方。左边是悬崖，垂直而立，右边是峡谷，水流湍急。

我们在一英里又三分之一的路程上所以走了这么久，是因为沿途的山沟、道路和河床里到处都走着八路军一个师的部队。他们这一个师，正在赶路上前线去增援林彪的部队。我用“赶”字就是赶，毫无夸张之意。他们以千人为单位分成小队前进。他们健步如飞，就象清早刚从床上爬起来的那种劲头。其实，他们几乎已经走了一个通宵了。他们肩上扛着步枪，有的一人还扛着两枝，还扛着拆卸开的机关枪和铺盖卷。他们队伍里的牲口为数有限，只有那么几头骡子驮着不少武器和弹药，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后面。当这一大队战士象潮水般地拥来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把路让给他们。接着，我们再走一会儿。可没过几分钟，我们又得给后面的部队让路。有时候，当我们停下来时，会发现老朋友在那个队伍里，于是就赶紧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张开双臂小跑过来，跟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上几句话就赶快走了，因为后面还有黑糊糊的人流正在向着我们涌来呢。部队一下山，就开始小跑；在后一段时间里，行军的速度变得相当快。部队有那么一种热情，一种兴高采烈的热

情。这种热情在笑声中表达不出来，尽管人们偶尔也可以听到笑语，有时候，也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歌声。我们还看到一营一营的八路军战士穿着日本军大衣，有的穿着日本军服。他们足有二、三千人——我们知道，一件军大衣说明打死了一个日本兵。八路军把取得这个胜利的标志戴在身上！这些日军大衣确实不错，颜色几乎跟秋冬的大地一样。如果飞机来轰炸，穿着这种军大衣的人只要站着不动，就不会暴露目标。有些战士的背上不再是那种质地粗劣的灰布棉被，也换上了暖暖和和的日本军用毛毯。八路军头上戴的全是中国军帽，脚上穿着布底鞋，打着绑腿。他们帽子上的帽徽有的是青天白日，有的是红色五角星。他们不少人仍然戴着红军的红五角星帽子，也仍然穿着有红星领章的红军军服。

我看到又有一队人马飞快地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个人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并向前跑过来。当他跑近一点之后，我才认出他是陈赓。他是个年轻、出色的指挥员，原属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又当过第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后来又当过陕北延安抗大的大队长。他已上了前线，现在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一名指挥员。他是从东面昔阳附近的阵地上过来的。我马上就要求他让我们跟着他的部队一起前进。他不知道这该怎么安排。他说，刘伯承师长也要从这里经过——我们应该问问他。陈赓走了，快步赶到了队伍的前头。我们停了下来，等待着刘伯承。最后，我们看到了刘伯承和他的随从人员。我们提出要上前线的要求，这使他感到为难，不知如何解决才好。他说，他不大清楚前线的情况，也不知道怎样能保护我们；最好，我们还是到那边小村子里的政治部去等等看。

事后，我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听了刘伯承的话，而不转身直接跟着他走呢。我们都清楚，那天夜里在那个地区将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都渴望着能亲临战场。谁也不愿意坐在这个离战斗只有二、三里地的后方，竖起耳朵来听着那轰隆隆的炮声。

设在这小村子里的政治部乱得不可开交。政治部有两名负责人，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中一个正在忙于处理缴获的战利品——军用地图、日本旗帜、日本妇女为兵士们缝制的防弹的“千针衣”和祈求菩萨保佑的护身符。可惜，护身符并不灵验。八路军把佩戴它的主人们杀得落花流水，战场上躺着长达数英里的日军尸体。这位负责人还在检查着一大堆的日本钞票，共有四千四百元。他给了我们几叠。他说，这些玩意儿根本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只用中国钞票！在晋北的平型关，八路军把一堆堆的日本钞票烧掉；在这儿的战场上，他们又把成千上万的日本钞票撕碎，任它们随风飘荡。我问，八路军很想得到日军的子弹、药物、军衣和食品，可为什么要这样来处理日本钞票呢？负责人回答说，钞票没有用处。于是，我坚持要他们设法从每个人手里把日本钞票都收集在一起，然后加以整理，送到八路军总部，再转到陕北延安毛泽东那里，把它们加以兑换。听到我的话，大伙都感到惊讶；他们高高兴兴地按照我们的话做了。后来，我看到有人从身上拿出日本的钞票来，把它们送到八路军总部去。

今天晚上，一名新俘虏过来的日军连长被押到此地。他的名字叫佐佐木，原来在大阪做生意。他九月十三日离开大阪，经过朝鲜，进入满洲，在锦州呆了十天。十月十日，他抵达北

平附近的丰台，接着又到了保定、石家庄，穿过正太铁路到达平定。我问他为什么要跟中国人打仗；他说因为中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杀日本人。他说报纸都是这么宣传。此外，中国也十分动乱，所以日本人的日子就无法安宁。可惜，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日本和其他外国人屠杀中国老百姓的事。我告诉他，他到中国来打仗，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杀日本人；他来中国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想强占中国广大的财富。不过，他自己或者其他普通的日本老百姓是根本不会得到这些财富的。他们只能充当协助统治阶级攫取这些财富的愚蠢工具罢了。他说，对的，他认为日本老百姓是不会从中国得到什么东西的——只有那些大人物才能捞到好处。

他又说，日本军队是为正义而战，不要很久，南京就会求和。他说，他相信日军必能取胜；一旦中、日两国按照东京的条件媾和之后，中国就会出现和平。我们对他说，只要日本军队还留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就不会有和平——俘虏他的八路军、中国其它军队和中国人民大众都将战斗下去，直到把一切日本军队全都赶出中国为止。听完我的话，他笑了一笑，好象我们都是小孩子似的。他对日本的战争机器信服得五体投地，并不怕暴露他的真实思想。

后来，林彪跟他谈了谈。他告诉林彪，根据日本军法，他既然当了俘虏，也就永远不能再回日本了。他要求发还给他一枝枪或一把大刀，这样他或许还能回到军队去重新打仗，保住自己的荣誉！后来他和另一个被抓来的日本工人以及其他俘虏一块都被送往八路军总部。我听说，那位工人将被留下来，接受八路军的教育；这个军官则发给路费，遣送回国。这

个人不仅做生意；还靠银行存款的利息生活。因此，要想使他这样的人悔悟自新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所有当兵的都灌输了这样一套谎言：中国人抓到了俘虏都要统统杀掉。因此，日本军人在战场上就宁死也不当俘虏。

我对跟我在一起的人说，那位被俘的日本工人看起来倒是挺单纯的。他们就把从他身上搜到的日记拿给我看。下面是日记中的一段话：

“松下日记：

十月二十九日。我们出发之前，连长告诉大家，驻吉洪镇（音译）的皇军遭到敌人的袭击。我们一定得多加小心。二十五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那里也是我团跟敌人首次交锋的地点。周围的老百姓非常可怕，所以我们杀了三十多个青年男子，随后就离开了。没走很远，我们就停下来。今天，我们吃的是黄豆煮米饭。很好。”

“周围的老百姓非常可怕，”所以日军就把抓来的三十多个小伙子，统统杀掉了。对这种行径，日记里没有表示“恐怖”的字眼。

我回到今天晚上要过夜的那间屋子，发现黑暗的角落里有两株玫瑰，全都枯得半死。可是，在一根枝上还孤零零地残留着一个红红的花苞，颜色象血一般鲜艳。这朵花苞高仰着头，在玫瑰的下面堆着破破烂烂的家具什物。我就睡在旁边一个窄长的矮柜子上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

我们正跟敌工部一起前往林彪的前线指挥部。指挥部的地点是保密的，但由老乡们带路，我们才能找到那里。村子里有位团代表交给我们一张条子，让我们到前面另一个村子去，到那里之后，一个年轻的农民出来给我们作向导。村子里的墙头上都张贴着口号、标语和八路军的声明。其中还有共产党的十大原则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致民众的一张特别声明，阐述了八路军的方针政策，并呼吁群众配合行动。声明上这样写着：

“日本军队在侵掠中国。他们抢劫、奸淫、放火烧房，企图以此来征服和毁灭我们的民族。东北已经沦亡，现在，华北、沪、宁也正在遭受野蛮的进攻。

我们八路军已经开始反击日本。我们一定要打败他们。我们无所畏惧。我们与日军势不两立。八路军有严格的纪律。我们决不强迫老百姓为我们运送东西，我们决不拿百姓的钱。我们以市价进行交易。我们不打人，也决不强迫别人为我们干活。我们希望同胞们不要害怕我们，我们八路军战士和人民大众将团结起来，一块上前线作战。我们号召大家组织起来，由我们发给他们武器。我们一定要把汉奸和敌人的密探统统抓起来。我们一定要在各地设立岗哨。乡亲们，大伙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参加伪政权的人员必须向人民自首，交出政权。有武器的人员必须加入战斗。我们必须开展游击战争，切断敌人交通，袭击敌人车辆。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胜利是必然属于我们的！”

在村里，我们见到了那位武装护送人员，他是由我们当中一个人带到前线去的。那人是杨虎城将军的部下，这时已经从

前线回到村子里。他告诉我们，战场上躺着一堆堆的日军尸体和打死的骡子、战马，足足有一英里长。他还在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上找到几份秘密文件。

我们爬上爬下，左转右拐，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馒头形状的山岗。我们经常能看到上空的日本飞机。到黄昏时为止，我们全天总共见到十三架敌机。有一次是三架组成的队形，另一次则是五架。它们飞得比平常要低，在四处搜索我们的部队。我们蹲下身子，藏在山岩边，等着它们飞过去。但是，我的那匹“云南”矮种马却不愿意往下蹲。这给大伙带来了危险。驴子、骡子和别的马匹全不声不响地停住脚步，原地等待，可那匹要命的矮种马却又跳、又踢，还用后腿站立起来。敌机来要发现了它的话，不用机关枪扫射那才怪呢。一路上我们还碰到许许多多老乡，在八路军人员的保护和指挥下匆匆撤离。他们是从日军作战的地区逃出来的。有一次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我们正好遇到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当中有男、女、老、少，还有各种牲口。这样，双方都很难通过。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听到飞机的吼叫声，还发现有五架飞机正对着我们这边俯冲过来。能快跑的人全都躲到安全一些的地方去了；只有一些牲口和一些老乡还在原地停留不动。飞机过去之后，我回到小道上。有几位缠着小脚、满脸皱纹的老太太骑在驴子背上，一动也不动。在这批逃难的人群后面，紧靠石壁站着三个大约有四至六岁的小孩子。他们彼此紧紧地拉着手，呆在那里，挤作一团儿。他们大睁两眼，显出一副惊恐的神态。这批逃难出来的老乡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都带出来了——被子、破衣服和种种用具什物。

我们经过步行、骑马，翻山越岭，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终于来到林彪的战地指挥部。他昨夜通宵未眠；这会正跟几个指挥部人员在一间挂着军用地图的小屋子里的炕上睡觉。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所以他起来之后，我就躺到炕上。从炕上，我看着他们在工作。这一带附近拉着很多电话线，有一条线就通到了林彪的指挥部。徐向前从广阳打电话来，报告日军正以强大的兵力发动了攻势。林彪命令广阳的八路军可以稍向后撤。后来，他又一次命令后撤，并仔细地在地图上标上撤退的路线。八路军正准备大打一仗。但是，日本方面来了增援部队；这时候他们远远不止九千兵力，也许超过了两、三倍。林彪和他的部下对此却处之泰然。“我们不跟他们公开打，”他对我们说。“敌人太多了。我们要打游击战。我们愿意在哪儿打，就在哪儿打。”因此，八路军就先要后撤，观察动向，等待时机。至于这一仗什么时候能打响，那就很难预料了——也许是今天晚上，也许是明天白天，也许是明天晚上。我们说不准。

我要求到刘伯承的战地指挥部去。林彪说别去，那太危险了。日本军队多得很。如果我要跟别人一起去，我就得跟着行动非常迅速的游击小分队一起走。可我走不了很远的路。因此，我只好躺在炕上，听着偶尔传来的大炮声。“他们要干什么？”我问。“不干什么，”林彪说。“日本人在乱放炮。由于我们没有‘阵地’，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干的。所以，他们就干脆放放炮，鼓鼓他们的士气。”他冷冷地笑了一声。几架飞机嗡嗡地在我们指挥部上空飞行，它们没有发现目标，接着就消失了。

指挥部里拥挤不堪，比沙丁鱼罐头还要厉害。这儿总共只

有七、八间屋子。我们一行占了一间“屋子”——黄土崖里的一眼山洞。炕上一头睡的是我的两名警卫员和我的两名记者朋友，我自己睡在炕的另一头。敌工部的蔡程睡在炕下面靠门边的地方。再往洞里走去，就有十来个，或者说十几个人都睡在地上，他们身子下面只铺了些稻草。大家觉得这样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有点反常。

我们当中有一位到邻村去看望朋友后刚刚回到这里。你们知道他带回些什么宝贝吗？——两把很好的日本手枪、一些硬块糖和浓缩食品。他还带回一些开水。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准备尝尝这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东西。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玩意儿。这东西倒真好吃！如果我们八路军也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那该多好。接着，大伙吃硬块糖——那糖一进嘴里，差不多谁都长长地噙了一口，因为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糖吃了。

敌工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广阳回来了。他上广阳是为了领两名日本俘虏回来。在路上，他看到有一个连的敌人走过来了，所以他不得不绕个大圈子，然后再把队伍带过来。这时候，那个地方肯定在战斗。

下午九时，有一个人跟我谈起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并且要我加以证实。我当然有很多可以证实的东西——因为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透过纸窗上的窟窿，我望到皎洁的新月，刚从远处的山顶上升起。月亮旁边有两颗亮晶晶的星。窗口外面，我那匹矮种马大声地咀嚼着已经切好的玉米秆饲料。这里买不到玉米。我想起了林彪送我一匹马——一匹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军马。他还送给我三件军大衣，让我的警卫员穿。他又送来两匹马给我们一块儿来的同伴。这

样一来，我们一行要行动起来就有排场了。我躺在这里，周围响着那几个一倒下就入睡乡的人们发出的哼哼声和雷鸣般的鼾声。我打算跟作战部队上前线去。我此时此刻的心事就是对这件事究竟应该怎样作好安排。

前线指挥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被日本大炮的轰击声惊醒过来。在很短的一会儿时间里，一连响了六次爆炸声。我从炕上起身，走向屋外。月亮已经消失，天空只挂着几颗星星。广阳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我坐在炕上，身边点起一支蜡烛，一直写到了天亮。

六时，全体人员都已起床。山洞里热闹起来了。一个充当日军翻译的中国学生被抓住后送到了这里。他说，他是日本人在沈阳办的一所警察专门学校的学生。他还“看管”过被日本人抓去的中国同胞。他正在受审。他不时为自己申辩。他坐在炕沿上，我们的几个人也坐在炕沿上。我躺在那里，倾听他们的谈话。这位可怜的大少爷是被“强迫”着去给日本人当翻译的。日本人对他逼了又逼，逼了又逼！说到这里，他哭了起来，以表心迹。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可有个人头脑非常简单。他对我说，“这个学生政治上愚昧无知”。

“政治上愚昧无知，不见得吧！”我这样回答他，“日本人为了防止农民逃跑，都把他们锁到马腿上。可这个老兄并没有被锁到马腿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周围十几个人都同意我的

看法。蔡程的脸上则怒气冲冲、冷若冰霜。

从我们的北面和西北方向偶尔传来了大炮的轰隆声和飞机扔炸弹的爆炸声。

敌工部又从日本人那里缴获了新的文件。其中有两份是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机密文件。这些密件上详细地说明了南京的军事计划、全部兵力、驻扎地点、各个阶段的设施以及南京的防御计划。里面还附有各种地图。这些文件是昨天晚上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我们手里拿着的是从中国的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南京方面最机密的文件。

前线指挥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今天黄昏，当天色渐暗，条条沟壑变得象一个个漆黑的深渊时，我停立在一座梯形的山岗顶上。一条到处都是嶙峋怪石的狭窄盘道，由山脚下那幽黑的长山沟往上盘旋，沿着石头的梯形山坡，左右盘旋，直爬到我站着的山峰顶端；翻过峰顶，盘道又笔直垂落，直下到山北坡的沟里，通向另一条大峡谷。这条峡谷东西走向，二万日本军队正由此西进直指太原城。

狭窄的盘山道上，长长的中国战士的队伍正在行进，步伐之快，令人吃惊。他们身上穿的是平时那种灰蓝棉布服，脚上穿着布底鞋。也有不少人穿着用绳子和布条打的鞋子，几乎没有一个人穿着袜子。他们背着步枪，刺刀高高地从他们脑袋后边伸出来。有几个扛的是机关枪。吃力地跟在后面的是一些驮

着沉重的弹药的骡子。每个人腰间口袋里都装着手榴弹，背后是小小的灰布方块行李卷。这是两个营的江西老红军战士，他们正迅速地奔赴前方，参加战斗。他们行军的速度是每天二百里，可以说是天下无双。他们准备从侧翼对快要到来的敌军进行包抄。

夜色越来越浓，盘山而行的人影逐渐和背后沟壑的黑影合而为一，混成一片。战士们一个接着一个从黑影里走了过来，穿过小路，接着又没入黑暗之中。每隔三、四秒钟，就有一个战士从我眼前闪过去。他向我转过脸来，可一句话也没有说，象是一个影子一晃而过。战士们穿的是布底鞋，走路没有一点声响。他们背上的步枪和铁锹偶尔倒会相碰一下。在黑暗中，战士们有的走得很吃力，他们的脸上挂满了汗珠。但是，谁也没有放慢那种坚定、敏捷的步伐。这样的行军速度比起一般军队的行军，要快出两、三倍。

战士们由黑暗中走过来，从我前面通过时，我能看清他们的脸庞和身影。他们的脸型是在千百次战斗中铸成的，象钢铁一般的坚定，沉着，严峻。可是，他们既不冷酷，也不愚蠢、呆板。相反，从他们的脸上透出一种活生生的神态，当他们发现有我这个外国人站在他们队伍后边时，就流露出惊讶的神色。他们心里都明白敌人是到不了这儿的，所以很多人对我微笑着表示欢迎，但是没有说话。战士中有些人身材高大，不亚于西方国家最强健的军人；也有些短小壮实，就跟为八路军驮弹药的军马那样有力气；也有些人瘦削而结实。他们不少人已到了中年，该已有妻室儿女，有的二十来岁，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光芒，前程无量。

一支队伍过去之后，我面前的小路上就空无一人。刚过一会儿，从黑暗中走来一个老乡。他和其他农民一样，身上穿着蓝色斜纹布衣服，头上缠着一块毛巾。毛巾的两头在他的前额上打了一个结，所以看上去就象是两扇小翅膀。在每个八路军队伍的前面总要有象他这样的农民来作向导。八路军跟老百姓的关系亲密无间，他们完全听从向导的指挥，他们被带到哪儿，也就跟到哪儿。作向导的老农有时也会看我一、两眼，然后他们就回过头去，继续迅速向前走去，很快地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我觉得我也正在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刻。有的场面看来令人很难相信，可它们就跟这块石壁一样真实无疑。钢铁般的中国人民大众，是命定地将要决定整个亚洲，而且在很多方面，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从黑暗中匆匆走来，又匆匆走去。一个大个子战士打我身边过去时，我肯定高声脱口说了些什么，所以他才转过脸来朝着我哈哈大笑，直到他消失在黑暗之中。

战士们一队一队的身影打我面前通过。我心中异常兴奋。我想跟着他们，跟着这些命运的主人一起前进。夜已经很深了，可我还仍然停立在这里，瞭望着，等待着。队伍已经走完，我独自一人站在山顶上，向脚下黑糊糊的沟里瞧着。一名警卫正从山路上急急忙忙地跑来，一边喊我的名字，一边四下里寻找我。他到山顶之后，我们俩就肩并肩、手拉手地从另外一条山路下去了。这条山道的下面也是一个深谷，刚才八路军就是从这个深谷走进来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我们爬到远处稍高一些的山脊上，也仍然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

听不到。这时候，我的另一位警卫员也赶来了。就这样，我们三人迅速地往北走去，翻过了一个个山脊，就远远看到下面的峡谷，日本侵略军正向这谷里走过来。我们前面耸着一面陡峭的山崖，上面长着一片松树林子。我们快步向那山崖走去。突然，有人过来问我们口令。警卫员回答之后，那人就说“通过”。我们绕过松林旁边的山尖，看到一大队武装人员，静悄悄地站在那里。队伍后面，有几个没拿枪的人踱来踱去，注视着下面山谷里的动静。

林彪跟他手下的人员就在这山上。参谋长向我走过来，拉起我的手，领着我绕过山坡，来到下面一个不太高的泥土掩体旁边。我们蹲下来之后，就只有脑袋露在掩体上面。山崖之下，就是那条很长的峡谷，日本军队正从谷底过来。我们看不到人影在下面移动；如果有人影的话，那肯定是日本人。远处的城镇、农村都在燃烧。广阳一片火海。东北的上龙镇（音译）和下龙镇（音译），西边的孙达，也都在燃烧中。从山脚底下往东，时而火光熠熠，时而寂静无声，时而又响起炮弹的爆炸声。两门日军大炮正对准远处的山坡轰击，指望能轰到什么东西。峡谷东头响着单调的机关枪的噻噻声，有时也夹杂有零星的步枪声，好象打枪的人在仔细地寻找射击目标似的。但是，从刚才长长的八路军队伍往前走去的方向那边，没有听到声响。八路军要在日本军队赶到之前穿过峡谷，转入上龙镇背后东北面的黑谷里。四千日军已经进到我们脚下的峡谷里面，总共有两万人正向这里集结。日军的兵力是我们的四倍。林彪和他的部队小心翼翼地爬过山坡，朝着远处一片火海的广阳前进。

那么，这些贫穷的小镇和村庄里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焚烧

的呢？房屋全是泥巴和石头盖的，屋里的炕也是泥土砌的。只有家具如柜子、椅子、桌子可以烧得起来。当然，更能烧着的就只有粮食。老乡在自家房子屋顶上堆放着他们一年的收成，有黄苞谷、小米、高粱、冬天用来作牲口饲料的玉米秆等。此外，上面还堆着从山里捡来准备越冬作燃料用的木棍、树枝。所有这一切都在熊熊烈火之中。日本人在抢走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抢走了老百姓的劳动果实之后，就把剩下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这使我想到了当年在鞑靼人铁蹄之下，中国城池乡村横遭蹂躏的那幅惨状。

“我们不能跟日本人拚，”林彪昨天这样跟我说。“他们人太多了。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兵力相对说来就比较少。在这一地区以及整个晋北，我们的部队是唯一的一支敌后部队。光晋北的忻口，日本军队就有二万多。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敌人力量分散开来，然后再加以歼灭。我们可以进行骚扰，切断交通线，叫他们得不到增援部队，得不到粮食和任何物资供应。我们已经在这一带的很多地方，切断了正太铁路。日本人正设法改建这条窄轨铁路，把轨道放宽，以便平汉线上的列车也能在这里行驶。他们也还在北边的大同试图改建铁路。但是，此事谈何容易。他们修多少，我们就破坏多少。”

我们回到指挥部时已经很晚了。除过另外也上了山的那三个人以外，其余全都已经入睡。我们走进来后，他们有的下炕，有的就坐在炕上，询问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东西。三个人走出了门，准备夜间在那儿观察战斗。但是，今晚不会大打，因为四周一团漆黑，不易分清敌我。

前线指挥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

我们有些人本来希望今天晚上能打个大胜仗，以庆祝十一月七日这个日子。但是，并没有什么战斗，我们的队伍利用夜晚进入了新阵地。早晨，日本人的炸弹声和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把我们吵醒了。刚吃过早饭，我们彼此就商量到外面找个位置，观察战斗。

我们早就想上战场，这回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战场来到我们的跟前，日本人的炮弹落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站在院子里，手里端着小米稀饭。这时，突然一颗炮弹在离我们几码的地方炸开了，一头骡子被炸上了天，很多很多的泥土飞入空中，高达一百英尺。起先我们以为这个炮弹是偶然落下来的。可接着在指挥部外面又飞来了第二颗炮弹。这回，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是有目标地开炮的。我们还听到了爆炸时空中的嗖嗖声。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们回山洞去吃早饭就是了。早饭不能不吃。否则，如果敌人的炮弹没有炸死我们的话，那我们不就亏了一顿早饭吗；反过来，如果我们被炮弹打死的话，那么，对八路军来说，损失一点做早饭的小米则是无关宏旨的。所以，我们就只管吃下去，当第二颗炮弹在指挥部外面附近爆炸时，大家相互一笑了事。蔡程睁大了眼睛向我问道，“你想上前线吗？”

我的确感到没有必要大声嚷嚷，所以我又吃了一口菜之后，略微点了点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到野战炮的轰击，说实在

的，我心里有点紧张。人们都在议论着日军开炮的原因。他们认为，这事不存在有什么奸细的问题。在我们指挥部外面高高的掩体上，曾站过一排排非战斗人员——警卫人员和战士，朝着大炮和机关枪发射的方位观望。显然，日本人早已发现了这批人，所以才向这里开了炮。

没过多会儿，一名哨兵磕磕绊绊地来到我们的院子里，鲜血从他的嘴角和鼻子里直往外淌。弹片穿透他的大腿，他摔倒在地上面又碰伤了脸。他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不到十七、十八岁的样子。手痛得直打哆嗦。就这样，我在队伍里开始搞起一些急救工作。正当我忙着搞急救时，又传来了林彪的命令：全体人员向后方撤退。这块地方很快就要变成战场了。接着，林彪亲自来了，他让我们返回八路军总部去，因为八路军部队正在指挥部背后的沟里往山上爬，围着沟沿转圈子，以便把日本军队引进来。这一带将要打一场游击战。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态冷静，脸上只露出一丝笑容。

很快，我们就由指挥部后面的小路向上攀登，途中遇到一队匆匆向战场赶去的医生、护士和担架员。这些医务人员原来都是工人、农民，当年在赣南瑞金附近的红军医科学学校里受过训练。不过，近两年来，有不少青年人到过陕北的红军医科学学校接受训练。在我们背后的小道上挤满了匆匆赶路的部队和牲畜。我军一个团正在向新的阵地转移，他们赶上了我们，我们就合并在一起了。他们停止了前进，在我们前头山沟的一个冲口处进入阵地。老乡们正从附近村子里涌向前来，个个肩挑手提，拿着一大堆东西。这些逃难的人大部分是老弱妇孺。一位指挥员告诉我们，四千名敌军正向这条山谷开过来。

我发现有敌机正好在我们前面几码远的上空。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架飞机。当它嗡嗡地从低空掠过我们头上时，我们都已隐蔽起来。我们必须服从命令离开这里，但又很想留下来，看着这场真正的战斗，所以心里很不踏实。有几个爬上了小山顶，向下眺望，可是连敌人的影子也看不见。第二架飞机接着又嗡嗡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而飞机里面的敌人显然没有发现什么目标。于是，我们大伙就飞机与野战炮比较哪个更危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飞机来到之前，人们总可以听到响声；可野战炮的炮弹却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到你的跟前。好象是为了给我的发言提供旁证似的，一颗炮弹正好在山脚下轰地炸开了。

不久，我们又骑马、又步行地翻越了一座山坡上下布满了梯田的峰峦，然后径直向南行进。我们的左右两边是望不到边的梯田海洋。一路上，有的地方的土壤呈现红色，也有的是蓝褐色或绿色，到后来遍地都变成极其漂亮的乳白色。梯田缓缓伸展，看上去就象微风吹拂着的湖面。我们周围的一些梯田已经播上了越冬的庄稼，有些也都翻过，准备冬季作物。不过，这一带人口稀少，要是日本军队入侵的话，到明年此时就免不了要闹饥荒了。

在我们到达马方镇（音译）之前，天空出现了两架敌机。几天之前，我们的指挥部曾经在这个镇驻过。飞机过去后，我们就进了城门。城里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马蹄踩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发出答答的声音，街道两旁的屋子里也都空空荡荡。贴在墙上的各种宣传解放的布告、标语、口号，倒显得冷冷清清。有个孤零零的人从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走了过来；我们向他打听居民的动向。他说他们都跟八路军走了。战斗离此地很

近，所以我们的指挥部一撤走，居民们也就不再留下来了。

我们继续前进。我发现我的矮种马记性真好。它自己一拐进那条小巷子，就直接朝着它以前呆过的马厩奔了过去，我紧紧拉住缰绳也没有用。

我们在城里还找到八路军某连曾经占用过的一间屋子。该连已作为先头部队离开了此地。所以，我们一行，包括我们的马匹，就在这儿歇下来，煮点小米饭、胡萝卜吃。休息之后，我们就骑上马，沿着一条河的岸边继续前进。河中水流清澈，奔腾翻滚，从河床一块块石头上飞泻而过，激发出响声。我思忖，这条河要是在平时一定很美丽。可在这时候，它的流水声反而妨碍了我们听辨飞机的动静。太阳光洒在峡谷上面；但是，河边已经上冻，山中一条条流向峡谷的小溪在未到达谷底之前早已结上薄冰。遇到河流，马就踩着一块块石头之间的冰块走过去。这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炮弹的爆炸声也传不进来。在我们两边的一些山岭上乱石成堆，土地荒瘠。但是，这儿的老乡还是想方设法，不辞辛劳，在乱石之间垦出了成块成块的梯田。这些梯田是他们精心地挑选出一些长方形的石条，在山坡边上建起八到十英尺高的石阶之后才造成的。老乡们世世代代的劳动都深深地渗透在这些梯田之中。

夜幕降临，可我们仍在赶路。我们责怪自己在马方镇停留的时间过长。随着天色逐渐转暗，气温也下降到寒风刺骨的程度，要骑马前进就会相当困难。当我们来到一家农民屋里休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我们认为，既然要休息，就不必着急。所以，大家都爬到热乎乎的炕上，或坐着，或躺着；一边在等着主人为我们做小米饭，一边就谈论着战争。主人家里

一点蔬菜也没有，只有几颗很小的土豆。他们把土豆洗了一洗，连皮也不刮掉，就扔到开了锅的小米里煮在一起了。整个村子里没有盐巴、没有猪油、没有鸡、也没有蛋。老乡们向我抱怨说，前几天，这里来过一帮人，自称是八路军。大伙就给他们粮食吃，可他们走的时候，连钱也不付。老乡们受了骗。他们说，这些人是游击队，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当然，游击队和八路军相互关连，游击队是由八路军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常常穷得一文不名。既然这样，我们就代表我们的同志给穷苦的老乡付了钱，并趁着黑夜继续前进。村子有两个年轻的农民跟我们一起出发，为我们作向导；前面的路越走觉得越远，象是没有尽头似的。到半夜，我们到达离八路军总部只有几里路的一个寨子。我们的情报机构就设在这个寨子里。他们把我们几个人安排在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住的是一间小屋子。我们象沙丁鱼那样头对脚地并排躺在一条很小的炕上，有几个就睡在铺在地上的玉米秆上面。

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周围寒气袭人。这个寨子实在太穷，连一点牲口饲料也找不到，我的军马和骡子，还有别的一些牲口都没有吃的。它们只是嚼了几根干玉米秆；寨里既然没有马，所以也就没有马厩；我们的几匹马只能呆在院子里。这使我回忆起曾在北平看到过的一次情景：有几个士兵牵着他们的军马驻扎在瑰丽的古建筑天坛里面，当时，我感到万分惊愕。现在，我不知道如果我们遇到同样紧急情况的话，是否也会这样干呢。我们不就曾在一些农民的屋子里喂养过马吗？我们之所以心安理得，是因为农民欢迎我们，在他们屋里养马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违反常理的地方。老乡们家里能吃的东西只

有小米、南瓜、大蒜头。他们没有盐巴、没有任何油脂，可能一辈子也不曾尝过糖的味道。这里的一间屋子里住着一对农民夫妇。当我到他们那儿时，他俩正在一间屋子里找什么东西。他们那个正要找的东西是扎进泥墙里的，可就是找不到。所以，他们俩伸手在一面墙上一英寸一英寸地仔仔细细地摸过去。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个东西——一根针。这家的女人仅仅只有这么一根针！我瞧了瞧这根针。那是一根土制的针，又长又粗，不过能造出这样的东西来确实也难能可贵。我从胸前翻领旁的口袋里抽出一根很好的针，把它送给了这位妇女。这可是件了不起的礼物啊，她把隔壁的女人叫过来，让她看了又看。我也就送给了那位妇女同样一根针。就这样，我跟她们成了朋友。她们一定要让我跟她们一块吃小米粥早饭。后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她们俩把我们领到寨子外边，还给我们指了路。很快，我们穿过寒凝的大地，踏着披霜的劲草，返回我们的八路军总部。

五、和八路军总部人员 在一起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

这一地区正在组织游击队。离八路军总部四里远的一个镇子上已有了三百名游击队员。在另一个方向，离这里五里远的那个村子里则有一支二百名阳泉矿工组成的民兵。我跟警卫员们一起上那个村子去给矿工们照相。我们的八路军给他们提供军装、鞋子和袜子。游击队自己有枪。他们的年龄有大有小，最小的大概只有十八岁，手里只拿一把大刀。其余的人大都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年纪很大的为数极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严肃认真、志向坚定，富有理想，沉默寡言，但对人和善。

离这儿几里远的地方还住着八十名满州的义勇军战士。他们全都是从北平来的学生。我计划近期内去采访他们。眼下，这个地区总共有了两千多名游击队

员，大部分都是在一个月里组织起来的，有些还是在我们八路军总部搬到此地后才组织起来的。

由著名作家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已经来到八路军总部。服务团在群众和战士中间开展各式各样宣传工作。他们演剧（演剧组水平最高，人手最多）、教唱爱国歌曲、作报告。服务团里有些人还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编写故事和文章。

丁玲给我们讲了服务团从陕西北部南下到铁路线，再到太原，然后到晋东一带的所见所闻。他们有七头驴子驮着被褥等卧具、剩下的行李全靠自己背。他们没有牲口骑，从这村走到那村，一直在不停地演出。他们曾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们给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发表过演讲，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外界传到这里的消息非常零散。我们听说日本人已经由山西北部的忻口向前推进。在那里作战的中国军队已经后撤。我们从活动在忻口地区的贺龙部队那里听说，不知是日本军队还是中国军队把大量的步枪、机关枪和各种类型的子弹丢在那里。但却不知是谁丢下的。幸好，八路军已经检收了这批武器和给养。贺龙司令部里也经常传来八路军天天打小胜仗的消息——某日截获日军卡车数辆、某日击毁日军卡车数辆、某地歼灭日军数百、某地又歼灭日军数百等等。但是，八路军主力从忻口地区撤走转向东部战线之后，确实削弱了北部战线的实力。只有一部分八路军还留在忻口，分成小股，在广大地区与敌人作战。因此，它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战果。游击队人数已经过万，虽然组织和训练工作尚不足一个月。一万名游击队并不算多，

而且其中半数以上还没有武器。从山区到我们刚刚离开的前线之间的广阔地区每天都有战事。日军正在学习八路军的战术！八路军想方设法要包抄到日军的后方，但日本军队也想包抄到八路军的后方。他们不敢象我们这样以小股部队作战，而总是以纵队方式行动。每当上万的日军强行通过了广阳附近的峡谷时，八路军就不得不经常派兵进行阻击。那里虽然没有打过大规模的决定性战役，但双方兵力各有损失。八路军死亡人数不多，但伤员不少。

我们还听说榆次附近有战事、日本军队包围太原以及日军飞机连日轰炸太原的消息。太原城是一片废墟，十室九空。到那里采访的几名记者连充饥的食品都很难买到。任弼时今天告诉我们说，如果有更多的兵力，有稍微象样的武器的话，太原还是能够保得住的。

日本军队已经侵入厦门，并开始了占领整个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大规模行动。南京城里冒出一个鼓吹中、日“媾和”的亲日派。中、日媾和恰恰是日本人一向努力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南京拼凑一个日本走狗的傀儡政府。亲日派的奸计有可能得逞。这是一个危险。

我们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讨论了九国条约成员国会议的情况。正当九国开会之际，日军就发动了侵占华中和华南的一场新的攻势。我们希望本周内能看到报纸和杂志，但它们往往要迟几个星期才到我们手里。

今晚，战地服务团在街头演出。服务团把一个城门口当作剧场。他们在城门口修起一个六英尺高的舞台，拉起红色帷幕，

并公布上演的剧目。城门前的街道上和稍远处的十字路口都挤满了群众和我们的战士，周围屋顶上也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舞台上的灯光就是两盏古旧的挂灯。

服务团的演出可真是呱呱叫！他们把中国古老的说唱和现代戏剧的构思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活象中世纪游吟诗人以世间时闻为题材的歌手。这些中国现代的“游吟诗人”在弦乐、铜鼓和竹板的伴奏之下，用歌声表达时事政治和歌唱抗日战争。

一个演员，手打竹板，出现在帷幕前面。他运用那种传统的说唱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十大原则。他用韵文把十大原则讲完，然后再逐条加以发挥。他的表演使观众们不断发出阵阵笑声。下一个“节目”是一位手执乐器的盲人。他来到一户人家，给大伙唱了中国各条抗日战线的战况。他说，他还给大伙带来了八路军，也就是“朱一毛红军”的消息，也有阳泉矿工游击队的消息。他还唱出了他们跟日军交战的场面。

今晚，有两个人从满洲学生所住的村庄里来到八路军总部看望我们。这批学生都是从太原来的，沿途步行着寻找八路军总部。他们听说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河北交界处，所以他们找遍了晋东一带地方。他们想参加八路军，去打日本人。我跟这两名同学谈了谈；不过，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八路军。这些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衣着讲究，政治上比农民还要落后。我问他们打算干些什么，其中一个回答说，“有人准备参加八路军，有人准备搞政治！”这些话听起来跟某些美国政客的演说如出一辙。我接着又问他在什么地方读的书，他说在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的确，美国式的教育给所有学生都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这种学生盘算的就是怎样赚钱，怎样投机，连起码的真

诚的政治理想也没有。他们说什么“准备搞政治。”那好吧，只要他们在八路军里呆一个月，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民族斗争、什么是中国问题，同时也就会懂得在这些问题面前他们是何等的无知。我怀疑这批有钱人家的孩子会有几个能够在八路军里坚持生活一个月。只要看看立波那双由于长途跋涉而血流不止的伤脚，他们就会明白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接受什么样的考验。

晋东 石拐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们听说日本人今天攻占了太原。傅作义将军和他的六千名士兵防守太原。可至今尚未得到有关傅将军及其部下的消息。我们担心他们会全部阵亡。阎锡山将军的部队伤亡惨重，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他的财产已化归乌有。日军击破阎锡山的部队，就象他们击破打阵地战的中央政府军队一样。日军炮击忻口附近中央军阵地使用的炮弹是他们从阎将军部队那里缴获来的。我们过去驻扎过的广阳周围的日本军队主力有二万人。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日军无法通过广阳的峡谷，而改道走北面的小路。日本军队有大炮和飞机作掩护。八路军根本没有这种武器，连一架可以配合作战的飞机也没有。

昨晚，林彪和刘伯承抵达八路军总部，出席一次会议。明天，我们又要行动了。八路军正在重新部署兵力。八路军已经作出决定，决不退过黄河，要跟华北民众一起留下来，组织民

众，武装民众，把日本人赶出去。

日军占领太原时，发现他们是攻进了一座空城。日军兵力八万，正在抢占同蒲铁路及其沿线的大小城市。但是，这些城市里以及周围的老百姓基本上已经走光。日本军队是靠中国养活的，他们到处在抢劫，到处要粮，但却找不到哪个中国人去帮他们。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军队作出各种评价，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日本人投降。有些部队常常不战而退，但它们并没有象东北军在一九三一年那样倒向敌方或束手就擒。

今天，我又去采访了矿工游击队。我跟三位在广阳镇协助八路军打击日军的矿工谈了话。其中有个人给我谈了谈他的情况。他曾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里当过兵，后来进了河北唐山的开滦煤矿当矿工。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他失了业。后来，他在山西大同的一家条件特别恶劣的煤矿里找到一份工作，每天只挣二、三角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共产党开始把矿上的工友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就被逮捕，被判十二年徒刑，并且被关进了太原的一座监狱。由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和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获得了自由，并由上级派到正太铁路的阳泉去组织矿工游击队。阳泉矿这时已经关闭，但二百名工人仍在矿上。他把这些矿工和阳泉的铁路工人一起组成了一支游击队。为了阻击日军前进，游击队炸毁铁路；他们还跟着八路军到其它地区去破坏铁路交通。最近，他们参加了十一月二日至四日的广阳镇（阳泉的西南方向）战役，在十一月四日下午和晚上跟八路军一起夺得了胜利。

游击队都跟他们的家属在一起。立波和一名游击队的老母亲聊了聊。这位老妈妈今年六十一岁，头发灰白，身子硬朗，

富有战斗精神。她告诉立波，她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这里的游击队员，还有一个是民兵。她告诉儿子们，“不要老惦记着我，你们去给我打鬼子！”她现在跟大儿子住在一起，还尽量帮别的游击队员缝缝补补。她真是全队的母亲。

矿工们从阳泉来，沿途看到惨遭日军杀害的许多中国青年人的尸体。在不少地方，日军从每家抓走两、三个人并加以杀害。也有的时候，他们干脆把整个村庄里的年轻人全部杀光。他们把这些人用绳子先捆起来，然后用刺刀劈开受害者的脑袋。按照他们的理论：那些活下来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非常危险”。矿工们还说，许多老乡过去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日本人前来进犯。但现在他们汲取了这血的教训。他们现在尝到了日本人侵占中国的滋味——他们正在反抗。

除了语言不同而外，我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跟中国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交谈。全世界各国的矿工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他们都有一双让煤灰搞得乌黑粗糙的手。人们都这么看待他们：态度严峻，但心地善良，富有智慧，令人起敬。虽然中国矿工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比起美国矿工来要大得多，但却都面对着几乎是非常相似的同类问题，即：悲惨的生活状况、艰苦的工作和坐牢、遭受折磨等等。如今，当日本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之际，他们就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跟别国受压迫的人们相比，中国矿工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有工农组成的八路军来帮助他们，训练他们，吸收他们到部队里去。

我们碰到一批武装矿工，正在护送又一批妇女到后方去。这些妇女大概是矿上美国和欧洲籍职工的妻女。每个人脸上的表情跟他们的男人同样冷漠——也许更甚一些。她们的头发有

点发粘似的贴在脸上。她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双手叉腰或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跟这些矿工分手之后再一次感到自己不过是个作家，一个写文章的旁观者而已。我眼巴巴地瞧着他们那青筋鼓起的大手，那破破烂烂的鞋子，那赤光的双脚和那沾满污泥的衣衫。我明白了我将永远也不能理解，也无法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我只能是个讲故事的人或是一个能够描写并没有切身经历过的那种生活的作家。中国真正的历史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农民自己去写。今天，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跟我一起的几个人虽然都是中国人，但他们还写不出中国民众斗争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跟我一样都是脱离群众的。其中有个叫舒群的作家，他首先感兴趣的是“艺术风格”。如果你就某一著作向他请教，他要讲给你的第一条就是那本书的艺术风格如何如何。然后，你才能从他的谈话中窥测出一些有关的内容。不错，立波倒是注重文章的内容的。但目前的生活这样艰苦，他常常因过于疲累而无法利用自己的经验。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得到锻炼而能够适应目前这种艰苦生活的。至于我所能写的东西，算不上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本质。它们只是一个观察员的记录。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们正在向南和向西挺进，每天行程七十至九十里。今天早晨，我们在晨光微曦中出发，把“我们的”那个村子让给从正太线战区转移过来的刘伯承部队。刘部将留在晋东地区，组

织群众，武装群众，跟群众一起在各地向日本军队展开游击战争。八路军其它各部仍在晋西北、晋东北、冀西和察哈尔、绥远地区作战。另一支部队将占据晋西并在那一带组织和武装群众进行持久战争。今天，我们在行军途中碰到了陈赓团长。他和战士们一起行军，见到我们后他以微笑向我们表示致意。他领着队伍从一个村庄的大道上走过去。我们从另一条路走来。路上到处是穿灰蓝色衣服的人群，时刻在响着人、畜沉沉的脚步声和金属碰击的咣啷声。村子外边就是遍布在各个山谷里的云杉林。云杉已经落叶，冰霜也已覆盖着大地。

我们后来停下来休息了一下，以便让那三百多匹缴获的日军战马通过。有的战马倒是膘肥体壮，驮着大批战利品。但也有为数不小的战马又病又残，瘦得不成样子。这批马大部分是东北马，是日军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从马匹的外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日军对它们是多么残酷；有的快要累垮了。我们一行也有两匹病马帮我们驮行李。它们随时也都可能死掉，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无济于事。它们背上的东西虽不算多，可对它们说，仍是沉得要命。

每过一个村庄，老乡们都要出来看我们。我们向南行进，就逐渐进入了八路军从未到过的一些地区。当人们一听说有军队要开来了，很多人就纷纷逃走。因此，我们的部队每到一地，就要召开群众大会，讲明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它的政策是什么，同时要大家把出走的家人找回来，八路军是会保护他们的。

很多外逃的人已经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在路边用泥土和石块筑起火灶，上面放着盛开水的大铁壶。火灶前面，

摆着小桌，上面是他们家中最象样的陶磁碗，凉着开水，每个人都盛十多碗开水。我们队伍路过时喝完一碗，他们就会马上再斟上。老乡们站在路边，双手给我们送上一碗碗的开水。这场面确实叫人感动。有好多次，我们刚拐了弯，还在离村口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得到村里飘扬着一团团的热气了。群众就在前面等候我们。有些地方的群众还为我们用大桶装着煮熟的玉米棒子。他们把什么都给我们送来，却从不收一文钱。

我们走过了崎岖的道路，跨过了半冻的河水，傍晚时到达一个村庄。我们住进一户农家，这家农民好象有点害怕我们的样子。他们自己留一间屋，全家妇女都集中到那里。当有个男的给我们送开水来时，我从门缝往里瞥了一眼。但是，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跟那个男人讲了讲，让他告诉家里人不要害怕八路军。但是，我们的话不管用。到了晚上，这家一个男人走进我们的屋子，说他一定得睡在我们这里，而另一个男的则睡在隔壁。我问他是什么原因，我的一个警卫员就冲着这个人说，“你要睡在这里，是怕我们偷你的东西吧。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我们不偷东西。我们是保护老百姓的”。

警卫员还在往下讲，可这个老乡仍是半信半疑。他估计我们不会付钱，所以鸡、蛋、蔬菜什么也不卖给我们。他还以为我们不讲信用，也不肯把骡子、毛驴借给我们用，却统统赶到山上去了。有位警卫员催他把毛驴借给我们，让他跟我们一起走。他找到我，说如果我们硬逼他干的话，那他就准备跟我们走。我们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为了借用他的毛驴，我们愿意预付租金，不过我们并不是非租不可，没有毛驴，我们是照样可以行军的。

这些老百姓在他们的“保护人”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之所以如此，说明他们过去吃的苦头太多了。可是，今晚日落时候，有人在村子里一边敲着盘子，一边高声叫喊：“开会！开会！”我们房东家里有两个男的没有出去，呆在屋里照看他们的妻女、姐妹，其余男的也都去开会了！八路军准备留在这一带组织游击队。八路军要求农民成立小组，帮助军队把伤员送到陕西去。朱德夫人康克清对这项工作非常积极。老人和小孩参加自卫团以保卫家园和村子，青年人则参加游击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天气非常寒冷。我每次只能骑几分钟的马就得下来走。我们的全体人马组成几路纵队，走在开阔、灰色的山沟里。远看是一片缓慢地挪动着的蓝灰色的人流。马蹄的咯噔声听起来仿佛是飞机从远处飞来的轰鸣声。战士们边行军，边唱歌，每到山沟狭隘处，歌声分外嘹亮，直上云霄。

牲口在蹚过小溪之后，腿毛上面都结成了冰。我自己感到又累又困。大地冻得冰冷，河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冰茬。清晨的寒风刺骨。队伍里的歌声，也没能使我打起精神来，因为我身上长了虱子！昨晚，我就抓到一只，觉得身上还有的是。只要毯子动一动，我就会浑身发痒，难以成眠。我历来特别厌恶虱子这种东西。记得贺龙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身上不长虱子，不发痒，那就决不会成为一名“老红军战士”。我跟他争辩说，我跟警察、暗探都打过好几年的交道，难道他们还比不

上虱子吗？但是，贺龙认为光有跟警察、暗探打交道的经验还是不够的。今天早晨，我才觉得自己终于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对虱子也变得宽宏大量了。我想，既然别人都长虱子，为什么我就不能长呢？

今天，我们停下来休息了整整一个小时。战地服务团离我们很近，有几个团员开始给大家表演中国舞蹈。旁边的一位吹起口琴来就是乐队了。接着，丁玲和我教给我们周围的十几个人跳弗吉尼亚乡土舞。他们放下背包、枪支，就跳起来了；他们两腿前后欢跃，身子上下弯曲。不多一会儿，路面上尘土飞扬。人群的喊声和笑声在山谷两侧的岗峦上迴响，周围簇拥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拍着手给他们打拍子。那个伴奏“乐队”的乐声全部给淹没了。

接着，我们出发继续前进。晚上，我们赶到榆社休息。到达榆社之前，队伍穿过一条山径，两侧峭壁高耸。正好在峭壁的边缘，我们衬着天空看到站着两行长长的深色人影。他们是游击队员，跑到山里来观看我们部队行军的。我们还能看清有一个人站在队伍前面，举起手跟大家讲话。

榆社是个有几千人的县城，城里有两条长街。一条街的尽头是宽敞的文庙。街上张贴着不少布告，通知人们去文庙参加群众大会。很快，几百名全副武装的人员从邻近一个小镇齐步来到文庙。其中有位个子很高，身体壮实的年轻妇女。在县城的小邮电所里，那位所长说起朱德和八路军来，简直是热情洋溢，滔滔不绝。他曾经在路边迎接过八路军，跟朱德本人讲过话。至今，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朱德如何跟他并肩而行，朱德如何跟普通人一模一样，朴素、坦

率、真诚。

我想往欧洲寄一封航空信，这一下可把小邮局给折腾坏了。正在屋子外面观看部队的那个邮局办事员也被叫了回来，商量办法。开始，他们肯定没有办法寄发航空信；后来又说明航空信是可以寄的，但要三元钱的邮资。站在我身边的立波嘘了一声，似乎要打退堂鼓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寄一封信要那么多钱，所以嘴里不断地咕哝着：“三块钱，”“三块钱。”

邮局翻箱倒柜，找出了我寄一封信所需要的三块钱邮票，此外只能再卖给我们两块钱的邮票了。一会儿，小个子邮政局长到群众大会会场找我，诚恳而又急切地对我说，航空信没法寄，寄平信只要五角钱就够了。立波听后松了一口气，小个子邮政局长能为一位“中国的朋友”节约些钱也很高兴。“中国的朋友”是小个子邮政局长与别人交谈时对我的称呼。

邮政局长这种对待“中国的朋友”的友好愿望以及我身边的人们的同样心情都使我过意不去。但是，朱德的到来使我难过的心情顷刻烟消云散。朱德还带来了两名日本俘虏。当朱德从人群闪让开来的地方向前走的时候，全场的人们全都站起来，高唱中国歌曲。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是怎样受到人们热情欢迎的场面。当地的和邻近城镇的游击队、县城的警察、山西军的一个连、当地的救国会以及全体居民都在欢迎他。小学校的学生集合在一起，高声歌唱，看起来象是好几百把小提琴在同时演奏。

这时候天色渐暗，我们只能看到朱德灰褐色的身影。日本俘虏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县长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很多年来大伙就听说过朱德，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今天，全城都

在欢迎朱德本人的来临。

接着是朱德讲话。他的声音不很洪亮，常常有人听不清。但他的话却充满赤诚，伤感和爱。他说，在当前艰难的形势下，八路军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帮助真是莫大的幸事。

他说：“我们在晋北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能够打败入侵之敌，取得胜利。八路军需要人民的帮助，人民也需要八路军的帮助。他们彼此相依为命。如果他们能一起工作，一起战斗，那他们就能够打败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如果把群众组织好，武装好，那么群众就会帮助我们破坏铁路、破坏公路，使得敌人的装甲车、坦克车和卡车寸步难行。”

然后，朱德介绍了八路军和其它部队在山西北部各地的战斗形势和建立各地游击队以及武装它们的有关情况。

他说：“在民众的帮助之下，我们军队已经摧毁了敌人一百多辆军用卡车和装甲车，二十一架飞机（在雁门堡），我们已经在战场上击毙三千多敌军，俘获一千匹战马以及大炮、机关枪、步枪、大量的子弹、军装、粮食等。我们还俘虏了日军官兵，其中有两个现在就坐在我身边。我们已经收复了很多被敌军占领的城镇。”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连续作战，直到我们的国家取得自由，所有的敌军撤离我们的国土为止。同时，我们必须有人民的支持——也必须有日本群众的帮助。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地主和银行家才要打仗……，日本的百姓并不要打仗”……。

讲到这里，人群中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大家也都跟着喊起来。

朱德继续说，“你们光赞扬八路军还不够。你们要积极地帮助它。为了胜利，我们都应该有必胜的信念。人民还必须懂得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军队。你们必须懂得怎样破坏公路、铁路、装甲车、卡车和坦克。你们必须懂得怎样彻底毁掉日本摩托化部队能够通行的一切道路。你们要把这些道路平整成土地，再种上小麦和玉米。决不能给敌军留下能够通行的道路。”

“中国人民千千万万，日本军队就那么一些。如果我们人民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并把自己武装起来，那我们就能打败敌人。中国是个穷国家。处在这种形势下，全体民众必须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上前线的都上前线。有人会说日本人比我们有钱。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一架飞机起码就要五万元。在晋北的雁门堡，我们一夜之间就解决了二十一架敌机。我们如果每天能坚持歼灭日军和摧毁他们的武器，那么我们就会使他们越来越虚弱，直到最后战胜他们。”

朱德还讲了世界形势。这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他就站在黑夜里讲话。会场上人人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他说，从一些战死的敌军口袋里还发现了日本共产党的声明。这份声明向日本士兵指出，中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得到许多国家和很多日本人民大众的支持。“有了这样的帮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而且必须打败敌人，赢得胜利。”

朱德讲话结束之后，群众就开始高唱民族统一战线的歌曲。唱完了歌，那位大阪的日军报务员接着发言。他讲的话叽哩咕噜，大家无法听懂，所以就小声地议论开了。日军报务员

发言完后，中国人把他的话说翻译出来，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个军人，但我从前是个工人。我是让日本军国主义者逼着到中国来的。我接到军部的动员令后，我无法违抗命令。所以，我无可奈何地到了中国。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打仗——普通老百姓不要打仗。我们日本士兵不要打仗，我们不习惯过异国的生活，包括食物和风俗习惯。”

“在我被八路军俘虏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人是这么善良。八路军待我比我的战友还要好。以后，我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这位日本军人的话讲完以后，会场里各种声音都有，越来越响。有的高喊：“中、日人民团结起来！”可是，另一个却大叫“枪毙他！枪毙他！”紧跟着这个“枪毙他！”的喊声之后，一个八路军战士跳上了主席台。

他高声叫道：“不能枪毙！那是错误的。”群众听着他讲下去。他再次高喊，“这个日本军人不能枪毙。打仗不能怪他。日军士兵没有什么罪。犯罪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想侵略中国，奴役中国。这位当兵的跟我们一样是个工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一定得好好地对待他。我们八路军不伤害俘虏。如果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被迫跟我们打仗，那我们就向他们解释解释，开导他们。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我们有日军战俘和死亡军人的日记。日记中充满着对这场战争的仇恨，渴望能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与家人团聚。从一些日军尸体的衣服口袋里，我们还发现了日本共产党的宣言，它号召日本士兵掉转枪口，对准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要杀兄弟的中国老百姓。同志们，兄弟们，请听我说：过去，我们可能错杀过我

们的同志，这简直是太可怕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定得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向日本军人已经发出很多宣言，呼吁他们跟我们一起、跟他们的中国兄弟一起共同结束这场战争。”

群众全神贯注地听着。两名日本战俘黑色的身影在茫茫暮色中靠近桌边站着。群众被这位八路军战士的讲话深深地感动了。他们高呼：“日本工农万岁！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万岁！”

这两名日本俘虏把脸转向大家，听一个中国人翻译群众的话给他听。其中一名俘虏当过连长，自被俘以后他慢慢地起了变化。八路军待他那么好，常常使他十分感动。现在，他脸上再也没有那种严厉、冷漠的表情了。小个子的报务员脸上表情严肃、沉着。他已经采取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步骤，很明显，他是不会再走回头路的了。

文庙前长长的石头楼台上挂起了灯和深红色的大幕。战地服务团表演一出日本剧。之后，又演出两幕中国戏。一位演员装扮成盲艺人，手捧琵琶，由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带着走上舞台。他在鼓上敲了几下后，操起琵琶，用细长的手指弹拨了一阵。

然后，他开腔唱道：“说新闻来道新闻，新闻出在上海、厦门、天津、北平、绥远和大同！我要唱，八路军遍布在山西，奋战在河北和察哈尔。我要说，游击队和民兵里的大新闻。”

站在一旁的那个穿破烂衣服的小孩，在坚硬白色的鼓面上不停地敲着，发出“咚咚、咚咚”的响声。盲艺人细长手指弹弄着琴弦，嘴里唱着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各条战线上的新鲜事。

今晚，八路军政治部向日本侵略军官兵发出两份小传单和一份长篇宣言。它们都是日文的。其中一份传单只有普通的书本那么大，上面写着：

“我们八路军是日本劳动人民的同志。我们不杀日军俘虏。我们优待俘虏。兄弟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八路军指战员欢迎你们。”

那份长篇宣言由朱德、彭德怀共同签署。宣言如下：

“日军士兵们：

你们或许已经听到过中国红军的名字。我们八路军就是红军。正如日本的报道写的那样，它也是共产党的军队。

今天，我们用枪炮跟你们在战场上打仗。这是很遗憾的。你们日本军队和我们八路军都是些工人和农民。你们是被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逼得穿上军装，离开家庭和故乡，来到中国战场的。我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今天和你们是相会在战场之上。我们必须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不是日本工人、农民的敌人，也不是全体日本人民的敌人。我们随时都在准备着跟日本的工人、农民携起手来，团结在一起。日军战士们，请你们想一想！

你们日本的工人、农民被送到中国来为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卖命。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吗？你们什么也得不到！日本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在战争中死亡，捞到好处的是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日本的统治阶级用压迫中国工人和农民的

办法巩固他们的权力。一旦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也将为进行反抗的日本工人和农民所摧毁。到那时，日本的人民群众将获得自由，你们就可以很快地回到你们的家庭，和家人团聚。到那时候，你们就可以和你们国家的工人、农民团结起来，为你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日本士兵们，把你们的枪口转向军国主义者，和我们联合起来吧！为了日本人民的自由，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战斗！团结起来！今天，死在战场上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工人、农民。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残杀，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

日本士兵们！充当这种炮灰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国家的工人、农民并不想杀害他们的中国兄弟。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并不要你们跟中国人作战。如果你们继续跟中国人打仗，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会恨你们。你们必须想一想这个问题。

跟你们打仗的中国军队是在为中国的自由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而战。如果我们因此而牺牲，那是光荣的。全世界将会鄙视日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会赞赏中国的人民。整个世界人民都会支持我们。

日本士兵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会优待你们。我们不杀你们。我们欢迎你们。我们都是兄弟。我们必须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你们如果要回家乡，我们可以帮助解决。你们不先开枪，我们也决不开枪。我们根本就不想伤害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的日本兄弟。请你们想一想吧！

日本士兵们！请跟我们一起高呼：

不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

不要为无用的阶级去伤害自己有用的躯体。返回家园去，

联合日本的工人、农民共同起来造反！

日、中战士们联合起来，制止战争！

日本士兵们，支持中国人民的自由运动！

不杀自己的兄弟、中国人民！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工人、农民自由万岁！

榆社各处的墙上贴出了正式布告。布告由林彪签署。一群青年围在布告前，其中一人大声唸着。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了一阵，然后又回头去看布告。布告说，下个月，晋西将成立一所新的军事、政治训练学校，学习期限为半年。学校将招收一千至一千五百名学员。入学考试于近期内在武乡（榆社南面六里）镇举行。希望男青年到武乡应试。新学校的课程有：

军事：游击战争；炮战，地形学；兵器学。

政治：社会科学常识；政治工作；中、日关系问题；中国解放斗争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们正向武乡进发。今日晴空万里，因此我们分开行军，以防敌机来袭。我前面走着六位年轻的指挥员，听他们正在谈论八路军的“薪俸”问题。朱德每月“薪俸”六元，彭德怀五元！连长每月二元。朱德最近又得一坐骑——是从日军手里俘获来的。马儿又大又壮，象座小山。

我们走进一个村子以后，就与这六位指挥员分开了。我们

在一户人家屋外的条凳上坐下来休息。里面走出来几个人，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跟着他们穿过一个院子，走进屋子，靠里面是常见的土炕。我们说，如果他们愿意收钱的话，我们准备吃些东西，如果不收钱的话，我们就不吃了。不一会，屋里聚了十多个人，跟我们谈起八路军。他们说，前几天，汤恩伯将军的第十三军刚从这里过去。汤部有上万人马，足足过了四、五天。部队在墙上贴出了许多事先印好的标语，“用粮食、牲口支援军队，给军队送信，当保卫。”汤恩伯部是南京中央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它在南口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仗。

我们周围的这些老乡各人情况互不相同。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是长工，一年只挣二十块光洋。他住在东家地主家里，吃的是东家的，衣服自己管。他一生没有成过家——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挣够娶媳妇的钱。

其他几个每人各有二十、三十亩地（六亩等于一英亩）。可是，这点地哪够养活四口之家。为了活下去，他们就得借钱。债务月利在二分到十分之间，到期无法偿还就得典卖家当——一头驴、一匹马、一个女孩或者一亩地都行。自己没有地的老乡就得从大地主那里租地。大地主一般都拥有千亩以上的土地。佃农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作地租交给地主——老乡们说，附近这一带都是这个规矩。这里，十家倒有八家自己没有土地而要租种地主家的地。

我们接着又跟其他人聊了聊。有个佃农租了一百亩土地。他一家十口人，全都下地干活。在这一带贫瘠的山区，十口之家就需要一百亩土地。农民自己有土地，那每亩就得交三角钱土地税和另外三种常年税和几种杂税。此外，卖驴卖猪也要交

税，还有什么运输税、生产税、进出口税、屠宰税等等。他们说，农民并不反对交土地税，可那些层出不穷，突如其来的各种杂七杂八的税叫他们受不了。在这个村里，只有三、四个吸鸦片的。

我们跟这些老乡聊聊家常，花了两个小时。所以，当我们快到武乡时，月牙儿已经高高地挂到了半空。我们沿着那条蜿蜒于荒山之中的羊肠小道前进。山下是开阔的河谷，弯弯曲曲的鬼河就从谷里穿过。这里的一些地名几乎总是跟地图上标出的不大相同。下面这条河农民就叫它鬼河。

在我们来到宿营地之前，我们还穿过了几个村子里又窄又脏的街道。这些村子看起来跟中国这个国家本身同样古老，特别是当月光照在孤零零的几座寺院的屋顶时，给人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在窄窄的街面上形成深深的车辙，只有在陡峭的山边上才铺了些石子。村里村外，各种路径全都由细黄土铺成，在月光下面，看上去象是一条条白色的沙带。就在这些白色“沙子”的带上，有我们的部队走过后留下的千千万万双脚印。当我们在这些路上前进的时候，我想这里正在发生着一种无法形容的伟大事业；为了广大工农群众、为了受压迫人民谋求解放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而进行斗争的这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双脚正从这里踩了过去。这一场斗争还得继续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这场斗争的开拓者、先锋队，尽管衣衫褴褛，装备很差，可他们的形象却无比高大，意义无比深远，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牛马的生活，他们已经站起来了。在这里，他们的双脚就从这古老的庙宇和劲挺的青松旁边，从小道上雄赳赳地向

前迈去。这里周围的茅棚土屋不知经受过多少风风雨雨，民间的辛酸却依然在重演着，直到来了八路军。从此以后，乡村大变样，从前祖祖辈辈过着的那种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来到宿营地之后，大家已经精疲力尽，但还是有事要做，立波和我还来不及吃饭就骑马奔向另一村庄去采访彭德怀，请教他八路军今后将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我们在总部吃晚饭，跟彭德怀就一般国际、国内形势谈了几个小时。

彭德怀说，八路军要把山西、河北以及整个华北的群众都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八路军都将坚持战斗到底，不离开华北人民，不西渡黄河。即使日本军队占据大城市和铁路交通，八路军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一起也要破坏铁路、公路，牵制敌人，坚持不懈地对敌军展开游击战争。日军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山上还是河谷，他们都会遭到来自大规模的或分散的、零星的袭击。彭德怀说，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的工作开展得非常迅速。八路军在过去的六个星期之内已经把两万人组织成跟八路军有联系的游击队。目前，他们只有半数人配备了武器。在冀西和察哈尔，八路军部队已经与两支民兵结合起来。这些民兵大多是工人、农民或学生，他们参加过战斗，缴获过武器。他们是中国人民新型部队的骨干力量，他们具有与一般军队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是从人民中间来的，他们是志愿军。

我们骑马回到住地时已是夜阑人静。一路上，不时遇到步哨要我们回答口令。我实在太疲倦，在马背上打起盹来。我的马很机灵。它有好几次不辨方向而停蹄不前，我睁眼一看正好走到了十字路口。我故意不动，看它是否还记得怎么走。可是，

每次它都能找对路子，然后就慢慢地前进。但是，我们进村以后，问题又来了。马儿在那条路上只走过两回，我自己也糊里糊涂，不知该往哪拐。正当此时，马儿突然仰头长嘶一声，接着就拐进一条小道，朝着我们住过的屋子一直奔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朝西向着青青的吕梁山脉缓步前进。一个月以前，我到太原去的时候，就从吕梁山脉西边的山脚下走过。可从那时候到现在似乎已经过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带的景色很美，吕梁山顶的冰雪在阳光下闪烁着。树木、庄稼满眼金黄。我们一定得在一个星期内翻过这些峰峦。在周围一片片的土地上白雪尚未融化，给人以荒凉阴冷的感觉。

我们翻过了茫茫的黄土高山。这些山岭是由坚实的巨大土块堆积而成的。它们使我想起了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此地不少老百姓也是在黄土山坡上挖出洞穴，作为安家落户之处。不过，在不少地方，老百姓还是住在泥土或石头修造的房子里，形成一个个村落。有时候，我们就在山谷中间蜿蜒向前，两旁都是几丈高的峭壁。周围尽是黄色的土壤，别无他物。我们经常几路纵队并排前进，马蹄声和官兵的脚步声听起来隐隐约约象是飞机从远处飞来的隆隆声。不过，这几天倒没有敌机来给我们捣乱。正如彭德怀昨天说的那样：“八路军好比是鱼，老百姓就是水。我们就在老百姓中间活动，日本军队是听不到任何消息的。我们队伍里面没有叛徒。”

中国老百姓那种忠诚老实的秉性真令人惊叹。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在各地活动着。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贴宣言布告，在

山坡村头张贴口号标语。他们一路行军，也会丢下些纸片什物，给我后面的人指路。所以，大家以为日本人随时都可以知道八路军在哪里。其实不然。日军从来不知道我们的行踪。甚至那么多架次的日军飞机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找八路军，即使飞机来了也不会发现八路军。

今天，我们在路上碰到一队队身体壮实的农民，里面偶而也有几个年岁稍大的。人人手里拿着棍棒和绳子。我们向他们打听是哪个村的，上哪儿去。他们说他们是去把受伤的八路军抬回来，还说八路军已经在他们村子开过群众大会，号召大家自告奋勇把伤员运到陕北去。群众大会一结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棍棒、绳子，向很远的地方走去。没有八路军人员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只是照着别人指点的方向出发，翻山找伤员去了。

今天，我们路过了好几个坐落在黄土山上的小镇子。有一个镇子两侧是高耸的山壁，中间架着一座挺漂亮的石桥。桥上站着几排身穿深色衣服的人，瞧我们从这里通过。从那个人群后面传来了几千人高唱爱国歌曲的声音。我们的队伍在听到那边歌声结束之后，也就唱了起来。我们并没有停步，继续走在坚硬、潮湿的小道上。此刻，两部分中国人，互相还看不到影子，却用歌声交流起来了。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镇里唱歌的人是几天前刚从太原迁来的一所规模较大的军事学校的师生。军校有一千多名师生，他们当时正在唱着歌欢迎朱德、彭德怀来到镇上给他们作报告。

郭镇（音译）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在淅沥的细雨里赶路。雨水把周围的一切都淋得湿漉漉的，干松的黄土已经变成了溜滑的泥浆。道路两侧生长着绿油油的冬小麦。

第一一五师的一部分人员今天走在我们左边那条沟里，正好同我们并行。他们那条路也偶而与我们脚下的这条路交叉在一起。这时候，我们的队伍就停下来，给他们让路。他们队伍里有很多是新来的民兵，有农民、工人和学生。这些人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有的背上背着铺盖卷，其他人什么也没有背。他们多数还没有武器，只是个别人手里拿着枪。

傍晚时分，我们路过一个村子，里面住着林彪的部队，准备在当地过夜。有一个人从房子那头跑来，向我高声叫喊。他是我的朋友，汤恩伯第十三军里的一名伤员。上个月，他和我乘坐同一节棚车到太原。他是个机枪手，在南口战役中受了伤，到开封医院养好伤之后，又奉命返回部队。当时，上级只发给他军人身份证和铁路上使用的军事通行证，但没有发给他饭钱。他没有铺盖卷，晚上就只能蹲一会，站一会，这样既不会受寒又能打会盹。他说，他正要返回部队去；不过他说他情愿到八路军里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我在棚车里从睡梦中醒过来时，敞开着的车门处传来了外边月光下的讲话声。其中就有这位军人。他满口北方话，声音特别洪亮清晰。

我们把他带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并交给那里的负责人。不到五分钟，他就变成八路军战士了。跟我一起的人都送他一些钱，我给了他一条毯子和一些水果。然后，他就搭乘八

路军的军车，上前线去了。他只就心一件事：不知会在什么地方，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将军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挡住卡车；把他从车上拉下来，叫他返回第十三军去。

他这次见到我后，就跟在马的旁边小跑着。我弯下身子，握住他的双手。他由于情绪激动，说话急促——就跟穿过山谷急速奔流的河水一样。他对我说了些事情，还说 he 要去我们住的那个村子。不过，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我跟着队伍前进，又要骑马；又要在泥泞道上走路，浑身疲劳不堪。可是，当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睡，等着他来。但他却没有来。他现在编在第一一五师，肯定参加了广阳的战斗。以后，我得注意着他。今天，他非常高兴。我真捉摸不透他这一个月都经历了些什么事情。

今天我们还看到一件既有趣又动人的事。指挥部的一个人腿部受伤，可我们没有担架。村里的两个老乡，带来一个很大的圆箩筐，里面铺着柴草。他们用一根很粗的绳子兜住箩筐底部，绳子另一端套在一根长长的棍棒上。他们叫那位受伤的人坐进箩筐，然后他们就跟平时抬着鸡、猪上集市那样，抬起伤员跟着我们一块出发了。我们向他们微笑。他们也向我们微笑，还说：“这就行啦！”那位伤员强忍着痛，也笑了起来。

中 阳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今天，我们在大雨之中翻过了吕梁山脉的一面山坡。当我

们进入当地大县中阳城的时候，街上有数千居民，手里拿着旗子，欢迎我们。中午时分，我听到敲锣声，还有人高喊：“开会！开会！”这种会是大多数县城在八路军到达之后一般都要召开的欢迎会。朱德又要发表讲话了。其他人员正在小饭铺里休息时，我趁机会到会场去看了几分钟。只见朱德站在一所古庙的大门口，向群众发表演讲。听众大部分是游击队员，也有救国会和其它爱国组织的人员。中阳城里已建立了很多比较大的爱国组织，甚至连那家小饭铺的两名伙计也都参加了爱国团体，对八路军非常了解。其中有个人对我也非常了解，因为他看过我发表在太原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我认识你，”他对我说，还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赏。

朱德今天的讲话，使我感到好象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似的。也许，是满街的旗子、欢迎的口号以及全神贯注的人们把他给感动了吧。因此，他讲话的声音、言词、举止、神情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呀！听众歪着脖子静静地听着他讲。多少只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脸，想把他说出的每个字都牢牢地记住。这就是当时的场面，至于当时的气氛，那就非言语所能形容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用笔墨无法描述的。可它们又常常涌上心头，令人难以忘怀。人类的词汇不够细致精炼。而这样的情景必须身临其境，才能有所感受。我猜想，语言加上乐声也许能够表达我所说的某些东西。当着雨水如注地落在一张张朝向朱德的脸庞的时刻，全场屏息静气，鸦雀无声。这正是我今天看到的会场上情景。

大会结束，警卫员和我买了些干饼子后就向村子出发了。山路很滑，我们走起来东倒西歪，你扯我拉的。在路边，我们

发现一个病倒的八路军战士，症状好象是急性阑尾炎。我们把他扶上我的马，由一名警卫跟着他一起往前面的村子赶去。可还有难题！我们自己的人不会动手术，身边只是一名护士，并没有医生。医生和伤员们都远在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我不知道后来这位病号的情况如何。我们把他跟护士一起留在指挥部。

我们今天翻越的那座山有十里高。从顶上下来又滑溜了十里。当我们进到下面的山沟时，朱德由后面赶了上来，跟我们一道往前走。快到村头时，我们听到敲锣声和经常听到的那种“开会！开会！”的叫喊声。八路军正在叫老乡们去参加群众大会。可是，有的农民停在路上不动，有的往这边跑了过来。他们想瞧热闹——那就是我。因为我是他们从未看到过的洋人。他们真叫我哭笑不得。有些人在相互议论，说我是日本俘虏。我反复向他们作解释，我不是日本俘虏。作这种解释的时候，我的中国话也讲得蛮流利。真有意思，到后来我简直不想再重复那番老话了，所以我就改变了说法：

“我不是日本俘虏。那个人才是。”

说着，我转过身子，指了指朱德。周围的老乡马上把目光盯住朱德，并且向他挤近了好多。可是，在旁边的八路军说了实话，告诉他们说，他是八路军的总司令！这样一来，大家觉得挺逗乐。街上就立刻传开了刚才闹的笑话。我们进村子后，只听见到处是一阵阵的笑声。

今天早些时候，我曾向一批老乡斩钉截铁地说明白我不是日本俘虏。警卫员郭生华当时正好站在我的后面。我对他们说，他是日本俘虏。郭穿着一件日本军大衣，头戴日军兜帽，看上去有点古怪。人们都用手指着他，说他准是个日本俘虏。郭并

没有否认，但却使用了最富有戏剧性的手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妈的狗屁！”他用手指着一个农民，冲着他一声吼叫。这种以别人的母亲为对象的典型的亚洲骂人方式真是妙不可言。它解决一切问题；怀疑、怨恨顿然消失，气氛立即改善。当郭生华一张口骂人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全都明白这一下可捅了个大漏子了。

武 阳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临近傍晚时分，我已经走了七十里路。七十里路只有二十三英里——但这就跟罗马商神墨丘利心头的伤口一样，伤口不大，却叫人够受的了。我们在中义镇(音译)呆了两天两夜，等待暴风雪过去。可是雪却下个不停，把这一带所有大大小小的路径都浸得泥泞溜滑。但是，我们还要翻过山岭，穿过同蒲线，到达新司令部。今天，我们翻过了吕梁山。我们没有爬上高峰，而是选择了最容易通行的路径。其中有一座山从山脚爬到山顶要十五里(五英里)，走下来也是十五里。后面一座还要高三英里。今天的行军真够艰苦，至少一部分人有这种感觉。但是，今天有很多事又颇有意思，给人以美好的感受。在林木茂盛的山沟里，在陡峭的顶峰上，还长着很多云杉，上面有青翠的针叶。大风雪中，青翠的针叶被打落下来，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上面。我从来也不曾知道它们会是这般的美！

吕梁山上到处都生长着稀疏的松树林，很多才长了几年，看起来却郁郁葱葱。每个树枝，每根松针上都压着沉甸甸的白雪。很多地方的积雪已厚达六英寸到一英尺。四周大雪弥漫，我们常常不容易看清山谷另一边的景色。有时候，我们刚爬上一处高坡，迎面就刮来一阵狂风。我们的军马顶着狂风大雪艰难地向前迈进，大家走在它们后面，用手使劲地推着它们。有几匹军马多次滑倒，因而背上的东西也就得多次卸下来，又装上去。我就心会摔伤，所以就没有骑马，一路上全是步行。

湿雪合着尘土、泥巴，搞得路上泥泞不堪，粘粘糊糊，寸步难行。泥浆溅到我的鞋子上面，慢慢地把我的鞋里也灌得满满的。起先，我觉得特别不好受。不过，渐渐地我也就能忍住了，这就跟前几天我刚招惹上虱子时一样。既然我能除掉虱子，那么，在每天行军以后难道不能照样从鞋统里倒掉泥浆么。不过，最主要的，我之所以能够忍受下来，还是因为周围战士对我的影响。他们大都是赤着双脚，踩着雪行军。他们根本没有袜子可穿。我看到，他们用脚把冰踩开，蹚着冰水过河。他们背上都扛着沉重的行装、枪支，有的还要扛一把铁锹、铁镐。但是，他们照样迎着漫天的大雪，在凛冽的朔风中迈步前进。

今天，从早晨出发到晚上宿营为止这一整天的行军途中，我听到指战员们一直在唱着歌。他们以连队为单位齐唱，歌声此起彼落未曾间断。有时候，战地服务团也参加进去。在这样的气氛里，难道我能由于鞋统里一些冷冰冰的泥水而感到不愉快吗？退一步想，我脚上不还穿着鞋、袜嘛！

今天，在翻山的时候，我还见到一个会吹笛子的战士。他是步兵，走在我们后面的队伍里。他背着背包和步枪，头戴日军的钢盔。他低着头只管吹他的笛子，所以我没有能看清楚他的脸。他吹得非常认真，笛声优美悦耳。这是一支富有柔情的民间曲子，歌唱一个遥远的山村，那里繁花满村，小溪潺潺，也许还有依依不舍的爱情。走在他前后的人都默默地聆听着他的笛声。

后来，我又一次听到了这支曲子。我们走在后面，那个吹笛子的战士好象是走在我的前头。雪花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不到这位战士。但是，颤动、幽咽的笛声在大雪纷纷中飘来，里面包含着多少美好的怀念。这曲子在吹笛子的人的心头又会唤起何种回忆呢？可能，他这时候正在思念着江南水乡，也可能正在遥望那四川的农村。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在冰天雪地之中人们心头的回忆罢了。我曾经跟八路军这一支中国人民大众的队伍里的许多战士谈过话，我知道在十年内战期间，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有的一家兄弟五、六个全都死于战火，父母双亲、妻子儿女也全遭杀害。有的无家可归，一辈子当雇农、长工、苦力、游民，天涯海角，四处漂泊。因此，这支优美的笛曲也许只是一支穿过中国人民心田而流过来的传统文化的涓涓小溪——这条小溪有朝一日终将变成波澜壮阔、洁净清澈、激动人心的巨流。在广大的中国普通人民中间，这条文化小溪依然源远流长，不曾受到象上海那种冒牌西方“文化”的污染。在上海，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中产阶级人物，对民族文化既表现无知而又瞧不在眼里。

警卫员走在我的身边，牵着我的矮种马，嘴里哼着曲子。

他经常就是这样边走边哼。我觉得，所有的八路军歌子和所有的中国民歌，他都懂得，他都会唱。每听到一支新曲，他就要学，清早一醒来，他就要哼几句，接着一整天里，直到晚上睡觉前，他总是不自觉地在唱着，就象他不自觉地在呼吸着一样。但是，如果他发现你正在听他唱歌，那他就会立刻中断，感到不好意思再唱下去了。

今晚，我睡在一家制毡子的老乡家里。他把漂亮的大毡毯借给了我们，铺在我们的炕上，不过，我心中有数，炕上的虱子肯定少不了，因为这位小个子的制毡工很穷，土炕也破破烂烂。我心想，从这里过往、曾在这个炕上睡过觉的士兵总有千把个。小个子制毡工对八路军一无所知，对八路军的原则更是一窍不通，但是他对我们讲的东西倒是很感兴趣。可惜，我们也实在太困了，没有给他讲多少话。我们用松树枝在室内中间的石头地上架起一堆火，把脚上和鞋上的泥巴洗刷掉，暖和暖和身子，就准备这样捱过凛冽的寒夜了。

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村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昨夜是我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睡过了大半宿。夜里，我醒过来之后以为已经天亮，还起床去看了看。外面是一轮圆月，映照着一片茫茫雪原。景色宜人，难以形容。这个贫穷村子的破烂外表被大雪掩盖起来了，一幢幢农舍都有着亮闪闪的白屋顶和灰褐色的墙，里面我真说不出栖身着多少不同命运的人。我回

到凉冰冰的炕上，梦遊了庞贝遗址。一连好几个小时，我仿佛置身于庞贝古城的街道、房屋之中；在它的废墟上，我发现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古代象牙制品，我还见到了巧夺天工的青铜器皿。正当我向一个满藏文物的黑乎乎的洞口探头张望时，军号声把我从梦中吹醒。我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凌晨四点，队伍很快就要出发。可我还躺在那里，回想我那个梦境。梦里，我徘徊于自己一生中各样悲欢离合的境遇之中。它使我颇感沮丧，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仿佛是一座堆满古董的废墟，而值得抢救的珍品则寥寥无几。

“我梦见了庞贝城，”我告诉同伴说。

他们带着茫然的神情看着我。然后，其中一个问道：“嘿，是吗，我在上海看过那部电影。”

我回答说：“不对。我说的是真正的庞贝城，不是一部美国电影。”

另外一个接着问我庞贝是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了他。后来吃早饭时（小米稀饭，大白菜），我们又谈起了当年庞贝城的景况，今天残存的遗迹和人们可以从它的文明中学到些什么。我们一边谈着，逐渐把话题转到了中国的两个朝代：周朝和汉朝。我说，我参观过在西安西北方向的周、汉古墓，看起来跟埃及的金字塔同样雄伟；还有长城修造者秦始皇的陵墓，以及其它的有关情况。

我敢于臧否人物，对古人也不例外。秦始皇就是我所推崇的一位中国历史人物。他一生追求进步，胸襟宽广。他的功绩可以长城为证。几个月之前，我到过他当年那个伟大首都周围的不少地方，西起咸阳东至西安。我还从西安穿过，再渡

有名的渭河，一直到临潼郊外他现存的陵墓。我的一位中国女朋友，有一次还曾经把我带到据说是秦始皇活埋了几百名儒生方士的地方。她把秦始皇叫做“大暴君”。其实，秦始皇“坑儒”，是因为儒生们要维护他要消灭的旧制度。

我必须申明，当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又眼见儒家思想对人民的祸害之后，我是同情秦始皇的。尽管“坑儒”的做法毫不足取，但我认为除掉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更可行的办法应该是把他们送到修工队里去，让他们开凿闻名于世的秦渠、修筑栈道和建立至今尚存的石桥。他完全可以让其他许多有用的人才活下来，让儒生们去修筑长城。

后来，在行军途中，同伴们对我先前说的那些想法觉得可笑。不过，他们也觉得我的想法多少还有一定的道理。正当我们穿过一个村庄时，一阵骚乱使我们又回到了眼前的现实生活之中。一群农民站在一间房子的门口，一边用拳头敲着门，一边嘴里吆喝着“开门啊！”在农民背后站着几个带枪的八路军战士。

可是，门没有开。八路军战士就从那些急忙给他们让道的农民当中挤上前去，用枪托砸门。里面仍旧没有反应。于是他们就用肩膀去撞门，结果门被撞开了。不到几分钟，八路军从房里走出来，还带出来一个身穿便衣的人。农民告诉我们说，这家伙跟其它三个原先都是当兵的，在前线吃了败仗之后就当土匪了。他们四人结成一伙，抢劫乡亲。那三个家伙已被先我们到达此地的八路军部队抓住了，但这个家伙却逃跑了。人们发现了他藏身的地方之后，就请八路军帮忙。这四个匪徒全带有枪。不过，这家伙的子弹早已用光，他用枪杆

逼着老乡给他换上便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怀疑他，他也可以流窜到镇上去了。

今天，我还看到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八路军十一月四日在广阳镇里抓到一个给日本占领军充当翻译的满洲人。今天，这个人身上被绳子捆着，背上有一把铁锨，正跟我们一起走在队伍里。当他刚被八路军抓住的时候，痛哭流涕，说是日本人“强迫”他当了翻译。八路军里很多战士和指挥员都深深相信人心向善，特别是中国同胞的一片善心。朱德是个软心肠的人，看到了伤心事就容易受感动。因此，当这个满洲人掉过几滴眼泪之后，大家就开始议论这个人决不会是个很坏的人，我们不能再叫他“汉奸”。

我说：“你们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叛徒的嘴脸，一张名副其实的走狗脸。”大伙同意我的说法，不过又觉得人不可貌相，只要我们好好地对待他，他会改变过来的。因此，一连几天，他在我们部队里可以随便走动，可以东张西望，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回，他发现我正在注意着他，于是就从衣袋里摸出一本笔记本，在上面飞快地写了起来。他写了一页又一页。我看他已经写了很多。我心里明白他究竟是在干些什么名堂：他有意写些好听的话——因为他知道过了不多久，八路军就会把他写的东西要过去加以研究的。他一边写，一边不时稍稍把头转过来，用眼角瞟我。接着，他又弯下身子使劲地写了起来。“这条癞皮狗！”我心里这样嘀咕着。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因为八路军是不靠直觉办事的，对我这种直观的想法也不会发生兴趣。

但是，今天我说话了。我说，“不是吗？我早跟你们说

过！”这个满洲人打算逃跑，结果被抓了回来，身上用绳子捆着。在行军途中，每到路面糟糕的地方，他就得铲土垫路。他再也不必在他那个小本子上写这写那了！他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向前走着。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卑鄙之徒。

今天，我们还经过了一个到处是石头的村子。村子西侧是光秃秃的山岩。偶尔也能见到一、两块比较肥沃的土地，山脚下是一群群黑色、白色的绵羊。在一处山坡上，到处都是绵羊。沿山坡而上，则是一个小寨子。寨子高踞在那里，它的底基都是用石块砌成的护坡。那一块块小石头全是圆形的，好象是经过特别挑选出来的。寨子看起来象是个中世纪的城堡。后来，我在另一处看到的又一个建在高山顶上的寨子，样子则更加象是中世纪的城堡。

修建在这里和晋西一带山腰间的那些碉楼，今天看起来倒挺有意思。这些都是在一、二年之前为了对付当时的红军而修建起来的。有的外面还贴着反共标语，今天在微风中依旧啪啪作响。我看到一个碉楼里已经驻扎着的一支八路军连队。碉楼外面的三面墙壁从上到下都刷着巨幅的标语，另一面墙壁上画着一幅宣传画，告诉红军战士，只要能抓来红军指挥员，不论死活，都可以得到一大笔赏钱。墙上的标语是“消灭红军！”，“奖赏前来投诚日军的红军士兵”等等。我问周围的八路军战士知道不知道这些标语写的什么东西。他们点点头，一笑置之。有几个跟我一块站在那里，看着标语便放声大笑。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标语刷掉？”有一个回答说：“咳，标语有啥要紧。”

今天，我们在安泽停留了几分钟。安泽是个县城，人口有

好几千。有很多人都围拢来看我，比看马戏还热闹。他们有的说我是日本俘虏，有的说我是俄国飞行员，也有的说我是八路军的俄国参谋长。他们为了弄清我是男还是女，争论不休。有一部分川军要在安泽过夜，所以这里的情况就显得特别有趣。

我听到他们很多人在议论着：“准是个俄国人。”“八路军参谋长就是俄国人。”

我对他们说：“我是美国报纸记者！”这叫他们大吃一惊。接着，我又加了一句：“我是个女人！”这更使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一路上，我们碰到了整整一个师的四川兵。川军军容整肃，装备精良，体壮膘肥的驮骡和军马拉着军官们的行李。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我们跟几千名川军正好迎面而过。四川兵真是棒小伙子。他们的个头比八路军一般战士要高些，多数只有二十来岁，气宇英武，身强力壮。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挂着六个到十个手榴弹。

八路军里也有成千上万的四川籍战士。所以，川军过去以后，我不知道他们跟我们的战士交谈后有些什么感想。我的一个警卫员就是四川人。他在休息的地方跟几个川军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告诉我，这五、六个连队的川军原来属于在正太线上娘子关曾跟日本军队交战的那个师。该师在战斗中遭到日军的沉重打击后，只剩下了六连人马。其中有一些战败后溃散到山西各地，士气不振，开始抢劫。现在他们这六个连在南移后，经过整编和补充，正准备再次开赴前线。

今天晚上，我们到达索埔（音译），当地老乡叫索巴克。镇子相当大，有二、三千户人家，绝大多数是农民，也有少

数的买卖人。我们在一个穷苦的酒家过夜。很快，我们屋子里就进来一大群男女老少，都是来看我这个外国人的。我们跟他们一起聊聊天。他们向我们说出自己的难题——都是同样的难题——贫穷。他们说，这个地方是个穷地方，最大的“地主”也不过只有一百来亩土地（十八英亩）。大部分庄稼人一无所有，都租种地主的地，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交地租。农闲时节，他们牵着小毛驴出去给别人干活，这样才能维持生计。大约在两年前，红军进入山西时，这个乡镇上有六个人参加了红军。今年，镇上有近六十个人到陕西去参加了红军。大部分小伙子现在都要求参加游击队。

当他们知道八路军就是从前的红军，并且正要向这一带开过来，于是，就派代表到八路军指挥部，要求我们的部队留在当地。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部队正在向新的抗日战场转移。他们说，要是老百姓希望我们留下来，那我们准能留下来。我们告诉他们，那是做不到的，因此他们必须把游击队组织起来才对。跟在别的地方一样，我们也会留下一小部分人，帮助他们训练游击队。

为了今天晚上能暖和一些，我们向对街的一位店主租了两条被子。他把被子抱了过来，但不肯收钱。后来，我们都笑了起来，因为这是准备给死人用的，所以被子很薄。我的一个警卫员在那月店里还买了双寿鞋。老乡们让他别穿这种鞋，不然他要触霉头。但是，这位警卫员哈哈大笑，说鞋子穿起挺暖和，对他的脚很有好处。他还告诉大家，他常常穿这种给死人用的寿鞋，可自己一直活着，还挺健康；相信迷信是没有用的。其他在场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参加了议论。老乡们从八路军

里又学到了新思想。这件事，他们回到自己家里以后准会聊上一个星期！

索 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是在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同伴们说我落在时间的后面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知道每天早晨什么时间军号响——或者半夜一两点钟，或者凌晨四点钟。我也清楚哪天是满月，哪天又是上弦和下弦。但是，有些晚上，云层遮住月亮，天空漆黑，那样我就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我心里明白，冬季已经来临。但是，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公文包里有一本小日历却没有被利用起来。不过，在目前日期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

今天，我们的两个同伴在别的地方听到了几条无线电广播新闻。不过，听到的新闻也已经过了时。新闻报道了瓦西里·康斯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最新的声明。他号召苏联远东地区的人民时刻准备着保卫苏维埃。将军说，日本军队正在把华北建成对苏联作战的基地；因此，苏、日之间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广播指出，很清楚，日本的新军政府不仅要进攻中国，而且还要进攻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

我们从在晋北作战的八路军部队那里获悉：十一月十九日，八路军一支骑兵部队占领了平汉铁路线上的重要车站临城，从而切断了日本占领军的后路。

我们还了解到，日本军队在山西和河北的处境非常困难。

这两个省的游击队和民兵发展十分迅速。一个月前，八路军总部撤离晋北五台山的时候，那里还只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名游击队员。可今天，游击队人数已增加到一万，他们在各处抗击日本军队，使敌人很难把各种后勤物资运送给驻守太原及其周围各地的部队。日本军队也物色不到汉奸，来替他们统治乡村地区。他们采用过去在满洲和内蒙古使用的办法，也在山西、河北组织伪军，但收效甚微。因此，他们必得采取一些新的军事措施。这段时期以来，川军和第三军继续向北移动，准备迎击日军，林彪的第一一五师已经在我们前面跨过铁路线，正从西边向日军开火。各地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

晋南 同蒲线西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昨天下午，我离开索埔，向同蒲线上的大站洪洞前进。雄伟壮丽的吕梁山脉高高地耸立在我们的背后，坡上白雪皑皑，山顶上冰棱闪闪发光。我们走的是狭隘的山道，两旁是突兀陡峭的黄土岭。我抬眼望见了象压在我们头顶上的山峰，登上去之后发现有一座古代显贵人物的坟墓。坟堆前面是一条长长的“甬道”，两旁分列着巨大的石人石兽。

我们快走到洪洞城高大厚实的城墙时，夜幕已经降临。立波和我，还有一名警卫员，在后面慢慢地走着；进城时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本来，我们应该是绕着城边走的。可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从城门进去，就直接走在开阔的土路上，很快就到

了一条两边挂着灯笼的街道。这里，各种食物小摊买卖兴隆。我们买了一些大饼、栗子、糖果，还买了两只烧鸡储备起来，因为晚上我们还有三十里路要赶。天空黑蒙蒙的不见一丝月光，我们三人又跟大部队失掉了联系。

我曾经读过一位英国诗人的一首咏吟骑手的诗，里面几次出现“骑手月夜催马行”这么一句。我不知道诗人在写这行诗句的时候，他脑子里到底出现过什么妙境。今晚，我又背诵了这句诗，才明白那位诗人也许根本就不懂得对骑马的人说来在月黑风高之夜匆匆催马的心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周围漆黑一团。我们三个人急急忙忙地奔走在陌生的村子里。我们从一座铺着玉米秆的木桥上跨过了宽阔的汾河，然后穿越满布车轮印迹和千百万人踩过的脚印的田间小路。很多队伍都从这里经过，你来我往，成千上万。西北战区指挥部就设在从这里沿铁路往南一带地方。所有准备出发向前线的部队也都在这里集中，然后再从这里开拔。吃了败仗的部队也是先回到这里整编，然后重返前线。许许多多的部队都在这里交汇，相互接头，这情景就和我们今天白天在路上遇到的长长的灰蓝色的万人长龙一模一样。在这旷野田间，我们摸着黑闯了几个小时。借着手电筒的光，我们有时突然会发现一、两个人影——是跟我们同样与大队伍脱节的八路军战士。我们遇到过三个战士由一个农民和一个孩子带着向前赶路。那个孩子看起来有点象猫似的能在暗中活动。他们走得十分急促。我们跟着他们走了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已经体会到当年中国红军一天行军二百里是个什么滋味了。田野里实在太冷，我不能骑马，只能步行。大地已经上冻，汾河的边上有了冰碴，那些小沟小溪早已

冰封。我们踩着冰排闯了过去，幸未湿脚。寒风凛冽，砭人肌骨。

没过多久，我们发觉农民向导正把我们领往一个八路军并不准备去的小镇。我们被拉在后面了。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村子，希望能到那里打听路径，找一个带路的人。我们只要发现能走的地方就往前闯，就这样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回头路。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田野寂静，不见人影。

象这样的情况，我在中国已遇到过好多次了——我常常会走在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地里，突然却会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我真不明白这些人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或许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吧。他们土里土气，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今天晚上，我们就用手电四下照射，也不见人影。可谁会料到，就在我们的右边，却笔直地站着一个人，双眼望着我们。时间已是午夜，可他居然就站在那里。我跟他打了招呼，问他往前路怎么走。他依然动也不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答道：“八路军。”

他表示不相信。于是，我们就得详细地跟他讲清楚我们要上哪儿去，又是怎么会走到这里来的前后过程。听完之后，他觉得可以相信。他这才告诉我们是走错了路，他可以把我们带到我们打算去的那个村子。

这样，我们又走了两个钟头，来到这个准备过夜的镇子。路上虽然走得飞快，但大家还是全身发凉。谁知指挥部已经搬走，究竟搬到哪里，我们谁也不清楚。我们东寻西找，想发现一些小纸片之类的东西，那样就可以知道指挥部的行踪。可是，我们没有找到。跟我们同样走迷了路的其他人员也一批一批地来到镇上。很快，我们的队伍人数就又很多了。我们派出

一个警卫员，骑着我的马，到附近村庄里去打听指挥部的去向，大家就都站在门口，等待回音。

那位给我们带路的老乡心中非常不安。他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深更半夜从家里出来，带我们走了有几个小时，但却帮不了我们多少忙。他觉得很不好受。所以，在等待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攀谈起来。他对我们讲了讲他的困难。他跟别的农民一样，也是个穷家，租了地主二十亩地，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上交给东家。土地肥沃，每年能收两熟，但日子还是那样艰难。他唯一的一个兄弟不久前刚去世，而现在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还要他养活。他想参加红军——他把我们叫做红军——可没人帮他照料母亲。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理所当然必须服侍母亲，养老送终。他说，大约在两年前，红军来过此地。他还帮过红军的忙，就是因为有老母在堂，所以无法跟红军走。

突然，我们听到夜空中有军号的响声。大家都惊呼着跳了起来，仔细听听，吹的是“前进”号。“妈的狗屁！往哪个方向前进？”我们中间一个人这样大声骂着。没过一会，派出的警卫员骑马飞奔而归，他让我们从刚才来的方向往回返，到一个离此地八至十里地的村子去。指挥部正从另一条路也朝着那个村子走呢。

这时候，月亮已经从云层里露了出来。我们走上了白色的羊肠小道，旁边是一畦畦的冬小麦。同伴们个个都已精疲力竭，我自己也很疲累。但景色美丽如画，皎洁的明月，轻泻在银白色的小路上，绿油油的麦田也不时闪烁着微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一户较富裕的农民家里，我们受到了上宾的礼遇。全家老少为了欢迎我们，都通宵达旦，整夜没有合眼。主人烧起了火，把屋子、土炕都烤得暖融融的。他们同时也准备了开水让我们喝，让我们洗；他们还包了饺子，准备了菜餚。他们都来到我们的屋子里，又说又笑，热热闹闹，真是宾至如归，大家都忘记了疲劳。

这家的户主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老伴是个小脚女人，但体格健壮，性格爽朗，她说如我有什么事情要她帮忙的话，她都可以帮我干。这家有三个儿子，老大二十七岁，老二二十三岁，最小的十九岁。这几个儿子都是典型的北方人，身高体壮。他们跟别人一起都进屋来欢迎我们，有的给我们拿来煤块，有的帮我们搬行李，料理牲口。

同伴们和房东一家热闹地聊着天，吃着热乎乎味道鲜美的饭菜。我有点倦意，便离开他们，刚躺下来，就很快睡着了。两小时之后，我醒了过来。我躺在炕上，一直望着月光下那纸糊的花格窗，窗上显出一幅巨大的蛛网似的黑影，直到天明。我精神困乏，然而正象这如水的月光一般，我身心通泰，清澈见底。

房东一家不断地给我们送来各种饭菜，而且都是特别准备的。当我写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不让那些好奇的人们走进来打扰我。但等我稍有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带着邻居一起来到我屋里，叫我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事情，虽然房东家有个儿子还在太原上过中学，可是，看到我的打字机，他们都感到非常新奇。既然我的打字使他们感到新奇，我讲的话也就更加有趣了。还有，我的一位英国朋友、新闻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先生给我带来了信件，带来了“外界”的消息。确实是这样。我

们在这里除了偶尔听到一星半点的消息而外，实际上是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他给我们介绍了远东会议（即九国会议）的情况，还说到了上海和其它地方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村子，向八里路以外的另一个村子转移。我们住的是一所穷苦老乡的房子，冻得人都打哆嗦。

朱德在访问地方部队司令部之后也回来了。他带回来几十封全国各地寄给八路军的信，还带回由个人和团体赠送的一大批礼物——袜子、肥皂、毛巾、手套、绒衫、毯子和上海妇女救国会送的一万五千双鞋子。已故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小儿子也送来了一份礼物。鲁迅逝世后，朋友们凑了一笔钱给这个孩子作学费。他拿了这笔钱后，买了一百五十只手电筒和七十五打电池，送给八路军。妇女们还在手绢上绣上口号，送给军队，也有人送来专门绣有“民族英雄”字样的袖章。另外还有一封蒋介石将军写给朱德的信。

朱德告诉我们有消息说，日本军队已经从北线后撤。撤退的确实原因还不清楚。我们认为有三个可能的原因：（一）加仑将军最近的宣言；（二）日本第五师损失惨重，必须加以改编；（三）日军在山西处境困难，因为八路军，游击队在山西北部对他们发动了广泛的、无情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开展，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使它无法取得后勤给养和人员补充，因此日军目前打算“撤离”晋北，特别是游击队主要基地之一的五台山地区。

贝特兰昨天说：

“我个人相信，不要很久，山西除了八路军而外，就不会再有别的部队了。其它部队将会大吃败仗而退出山西，只会留下八路军一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这样。据我所知阎锡山将军现在只剩下一万人马了。但是，由于我们八路军领导不断地进行劝说，他已经答应放弃原来那一套战略战术，而采用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了。这是这位老牌军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这表明他有决心与日军战斗到底，也表明他的头脑倒是能够接受一点对他来说是极不习惯的思想和办法的。

八路军领导人的态度赢得了我由衷的钦佩。他们以整个身心来保卫国家。他们的原则是联合所有一切愿意抗日的同胞——不管是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他们头等关心的大事。对任何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愿意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人，他们都不反对，也不攻击。他们通过耐心的说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为此进行解释，以期人们能够接受下来。

他们一连几个月在反复申述应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道理。可是，别的部队不以为然。山西地方军和中央军在雁北战略要地忻口失利之后，匆忙撤退，在当地丢下几千枝步枪和机关枪。事后，贺龙部队把这批武器抢了回来。当时，我就对朱德说：“这下你又可以武装一万多人了。”朱德看了看我，没有作声。后来，我听别人说，八路军把那批武器全数送还阎锡山将军。阎锡山又把它们发还给吃了败仗的川军的几个师。八路军指挥员主张，对吃了败仗而又斗志消沉的部队必须从政治上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军队的根子要扎在群众之中；同时，还必须使他们认识到军队是群众的保卫者，军人务必与老百姓，

也就是自己的兄弟们并肩战斗。

我还看到了八路军领导人是怎样对待日本俘虏的。对在山西抓到的大批战俘，他们都发了钱，并向他们说明全中国和八路军为什么要抗战的道理，然后就释放他们。让他们回日本去。可我的看法是，这些战俘回到日本军队之后，不是让军官们枪毙掉，就是被重新派到中国来打仗。朱德说，如果军官们枪毙这些获释的战俘，那么别的士兵也就会闹起来，并且他们也会了解到中国人对战俘是很优待的，还把他们释放回去，如果他们回军队后再来中国打仗，那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经验和所知道的情况告诉给自己的战友。

不过，战俘们不愿意回去。这是因为日本的军法规定，任何被俘者不得重返日本。有一个年纪稍大些的日本战俘，他是个军官，刚被抓获时对给他的优待发生误会。中国指挥员走过去跟他谈话，他拒绝起立；而且还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他傲慢地要八路军给他一匹马，每天给他吃鸡、大米饭和鸡蛋。他觉得自己是在跟奴隶打交道。

中国人对他说：

“不要把我们对你的好意搞错了。我们对你客气，这并不表示我们低你一等。日本军队是那么教育你的。可是，你在这里可不是指挥别人的。我们给你吃大米饭，我们自己吃小米。我们给你的各种食品，我们自己都是吃不起的。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们听说，几个农民去看你，你却打了他们耳光。我们不会因此就枪毙你——不过，我们必须告诉你，如果你再打人，我们也要打你。”

从那以后，这个军官的态度有了改变。有一回，我还看到

朱德让他骑上自己的军马。那个小个子日本工人也有了马。慢慢地，他们的态度完全变了。现在，有人跟他聊天，他也说说自己的看法。他说，日本国正在失去全世界的友谊，这完全是由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他说，必须有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来改变目前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说，在中国跟中国人民一起过新年很有意思，虽然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

这两名日军战俘既然不敢回国，也不敢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因此，他们就被送到延安去了。

我又从各方面进一步观察了八路军领导的工作情况。这就只能更加激起了我对他们最崇高的敬意。昨天，在我们将要离开那一户把我看作亲人般的富裕农民家庭时，三个儿子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参加抗日战争了。两个弟弟要去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大哥参加了游击队。

年迈的双亲骄傲地听着儿子们说话，带着满面笑容转向我们。这两位老人是把自己的儿子，自己所有的孩子都交给了八路军啊！

在中国八路军这支军队里，不光有穷苦农民的子弟，也有一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地主、官僚子弟。甚至有些领导人还是出身于旧统治阶级的。

那位老父亲、老母亲和他们的三个儿子站在一起让我给照了个相。他们幸福地笑了——可是，我却象骨鲠在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为了掩饰我激动的心情，我跟他们也一起笑了起来——可惜，声音过于大了一点，这也许是人们在这样的时刻往往总是这样的吧。

六、战况、新闻、采访、 炮击

平阳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离开八路军已经好几天，来到这个古老的城市，想了解一下我早已听说过的或者我还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听说有一批八路军伤病员要向西转移，我本希望能在他们离开之前赶到这里。可是，他们已经向西转移了。本来他们是住在此地北面几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当我刚到平阳府的时候，他们就已离去。我没法弄清他们现在情况如何。不过，我知道八路军里药品非常缺乏，大家最紧急需要的药品几乎没有。即使这样，八路军伤病员的状况比起其他部队的伤病员来还算不错呢。我们要运送伤病员，就会有成百成千老乡从各村各乡自动出来帮着抬担架。医疗部门派出人员，到运送路线沿途各处设立伤病员夜间休息站。医生、护士们也随着伤病员转移，有些则在休息站等

待，以便护理新来的伤病员。我想起了两、三个星期之前我曾在那里停留过半小时的一个村子。几百名伤病员已经在当地住了好几天。村子里外都极其整洁。火炕下面烧着火。那天正要来几批伤员，因此每家农户都准备好了开水。

可是，要是去看看其它部队的伤病员情况，就会令人寒心。在可能的条件下，伤病员们被放进运货卡车，拉到山西南边去。路上没有医生、护士相随，而很多人已经在路上走了几个星期了。在没有条件的地方，伤病员们就成百成百地卧在铁道两旁，谁也不把他们拉上车；或者他们自己摸索着往南走。我们的部队在沿铁路东侧由晋北向南转移时，就碰到过很多其他部队的伤病员在沿途徘徊。他们脸色苍白，身子弯曲着；夜里连条毯子都没有。我找到了其中一个伤员跟他聊了聊：他在装备最好的第三军当兵，可他不敢骑马，因为他从来也没有骑过。他从我这里拿走了点吃的，也拿了点钱；那天深夜来到我们住的村子，要求参加八路军。后来，我又从另外两个跌跌绊绊的伤兵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起先，他们连自己所属的哪个部队都不愿意说，反过来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过一会儿，他们说他们也是八路军的！我们经过盘问之后，才弄清他们并不是八路军。他们自称是八路军，其目的是指望得到我们的照料。其实，不管他们是不是八路军，我们不会不管的。还有一些伤势较轻的人员一直跟在八路军后边，半夜里来到我们的住地，要求参加我们的部队。我们也没法甩掉他们。沿途，老乡们也都愿意照应他们，让他们伤愈后再走。但他们不乐意呆在农民的家里，总是追赶我们的部队，到晚上就来找我们，一再恳求我们准许他们参加八路军。

在八路军里，每个战士都是宝贵的财富。他们经过多年的训练，在政治上已成长起来。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了他们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因此，整个八路军对损失任何一名战士都会感到痛心。

我希望能和平阳府附近见到我们的伤病员，那样，我就可以了解到他们最需要的是些什么药品。我问了一下指挥部，他们回答说：“我们什么都需要。”八路军里缺血清、疫苗，消毒剂，药棉、纱布，其它战时特别有用的医疗用品也都不够。在所有的中国军队里，包括八路军在内，给病人输血一事更是梦想。

由此往南十里路的地方有一家医院。此地另有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常到那个医院去看病或给病人做手术。传教士们告诉我说，虽然有命令，要医生们一律留下来工作；实际上中国的医生统统逃出了山西。只有一名教会医院的中国医生留了下来。

平阳府也叫临汾，目前是山西省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凡从北线败下来的军队都需要来此地整编，然后再返回前线。新兵也得经过此地才到前线去。日本人通过他们的间谍网，对这些情况是很清楚的。但是，日本人尚未破坏临汾。

用日本侵略者的眼光看，临汾是个进行大屠杀的好地方。城里住满了居民和军队。街道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军用运输车辆，骆驼队和人员。从早到晚，带枪的或不带枪的军人在街上来往不断，从他们身旁时而擦过的骑兵则高声吆喝着给他们让道，发出一阵阵令人心烦意乱的嘈杂声。有时候，一辆大车往往在狭窄的街道中间发生故障，这下整个临汾城里的交通就要跟着堵塞，直到大车修理好为止。街上的行人们常冲着

那倒霉的车夫大声骂娘，什么脏话也都脱口而出。那赶车的也就转过身来对着他的骡子骂不绝口。不过，牲口可不听他的，自己也伸长脖子吼叫起来——中国这些粗野的下流话，人听了也许当成耳旁风，但是，我确信，骡子听了可无法忍受，街上，骡吼马嘶，跟那些动弹不得的军用卡车发出的愤怒的喇叭声混成一片，震耳欲聋。

摆在狭窄街道两边的是许许多多小桌子、吃食摊和其它卖货的挑子。在这里，你能够买到被卖主吹得天花乱坠的破手电筒和废电池；也可以买到质量再次不过的棉纱袜子，看来很象是日本货；也可以买到洗脸毛巾和洗手肥皂。虽然，这里有许多缠小脚的妇女，整天沿街坐着缝制鞋垫，可你却买不到一双男人穿的布鞋。这些妇女笑话我没有缠脚。可是，看到她们那一双双小得象山羊脚似的金莲，我浑身只觉得发麻。

那些没有盖的大铁锅里煮出来的东西就是这里的小贩能够卖给你的最佳食品了。从早到晚，满街上尘土和马粪一起飞扬，而这些脏物又落到饼子、麦芽糖和一些正在烧煮着的食物上面。那铁锅正在煮着的东西，既可以是新鲜猪肉，也可以是什么死骡、毛驴或死狗的肉。如果你有斗胆敢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上面有细菌的话，那么他们会把整个街上的人叫来瞧瞧你这个闯进临汾城里来的大傻瓜，而且会笑掉了牙。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吃不到的东西大部分中国人是根本不相信的，我问过立波，他将怎样向人们解释什么叫细菌。他说，那很容易做到。我问他，“怎么做？”他说，“咳，我可以告诉他们细菌是一种会让人生病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我反驳他说：“那他们会认为你说的是鬼怪。”我倒有点怀疑，立波他自己懂不

懂得什么是细菌，所以我也就不再吭声了。

我想，临汾这座古城目前的景况要是跟历史上尧帝时期的景况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临汾早在中华民族发祥时期就已形成，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帝王的首府。它的另一个名字即使在当今也依然含有“尧都”之意。五、六千年的时间对于中国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临汾南十里的地方有一座尧庙，相传尧帝即出生在那里。我打算到尧庙去，如果这座由后人修建的尧庙里有些值得看看的东西的话，我倒是很想去参观参观。我知道，我们的部队正走在人类最古老的一处文明遗址上面。古往今来，无数的军队为了抗击野蛮的入侵者都曾在这一带进行过战斗，而我们的八路军也只是这样的一支军队罢了。有时候，我感到我自己也正是置身于这“风尘仆仆的勇士行列”之中，在中国历史的征途上行进。

实际上，今天的临汾有着很多现代化和令人鼓舞的气息。很多现象说明：民众毕竟是被唤醒了，也已经动员起来了。八路军在城内各处墙壁上用黑色、红色、白色的颜料或白灰涂上各种反对日本的口号。其他部队也带来他们在大城市印制的一些标语和宣传画，贴在墙上。不过，在农村里几乎到处都涂着八路军的口号。这些口号出自战士们的心底。连我的警卫员们也不停地在各家的屋外涂写标语口号。在临汾不少房子的墙上可以看到高大的人像，画的大都是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虽然画得不好，根本不象他们本人的样子。但这并不碍事，我觉得这样倒挺好。

另外，临汾还成立了许多新式的、充满新的世界眼光的群众组织，如前线动员委员会、敢死队、青年先锋队和牺牲救国同

盟会等。这里也有游击队。其中有些组织在八路军还没有到山西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党员帮助恢复起来的。共产党员还从政治上、军事上训练它们，以准备参加抗日战争。几百名从北平学生会来的学生不久前到这里要求参加八路军。现在，他们正在接受训练，很快将作为游击队员走上战场。今天，我还听说有八十多名东北（满洲）学生作为游击队员已经参加了实际的战斗。这些学生大多数比较富裕，几个星期之前到达晋南的八路军总部。他们此时在八路军带领下已经跨过正太路两侧的日军控制区，向河北西部进发。

现在是夜晚。我离开平阳府，走了二十五里路来到这个村子，想找一些八路军的伤病员。但是，他们已经向西转移了。

在这个村里，我第一次遇到自愿到西北来工作的外国人。他是个年轻的南斯拉夫学生，两个星期以前，随着二百名北平、天津的学生一起来到这个村，想当八路军。他们现在每天都在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再过一个星期，他们将要拿起武器，奔赴前线，先作为游击力量参加战争。

这位年轻的外国人要我不提他的名字，因为他母亲住在日军占领区的一个城市里。他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不象其他外国人那样自以为比中国人高一等。中国就是他的家。他在中国读书，与许多中国学生成了朋友。因此，他要拿起枪杆，保卫中国。临别时，他对我说：“我一定好好地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这个村子里设有一个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起码对我来说——就是当今荒凉苦难的中国这块沙漠中的绿洲。你走过中国的城市、乡村，到处都可以碰到来来往往的军人、伤员或贫困难熬的农民。他们瞅你一眼，似乎你是从动物园里刚刚跑出来的怪物；除此而外，他就再也没有时间理你了。如果你是八路军，那他们就可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给你一个村一个村地领路。突然间，你自己都还没想到，却已来到某村某镇八路军办事处的院子里。很多人走出来欢迎你，个个笑容满面。办事处的人会给你安排床位，点起取暖的火盆，即使是深更半夜也会给你端来饭菜、开水。你就这样回到“家”了。你由于在冰冷的、印满车辙的道路上颠簸几个小时而带来的疲累困乏也会一扫而光。

在这个村子里，我碰到一个人。他给我讲了太原失陷时的情景。他讲得非常逼真，好象他本人当时也就在现场似的。他讲……当然，他讲的情况并非太原防守和陷落的全过程，而只是一场悲剧中的片断，一种个人经历。

那时，日本军队正从太原北面的忻口和东面的正太铁路沿线向太原围攻。北线的日军大约有二十七个团，六、七万人，炮火力量强大、飞机也不少。但对付日军的中国军队只有三万左右，其中包括山西省的地方军和高桂滋将军冯钦哉将军等人的部队。东线，日本的军队在山炮和飞机掩护下，以三十余万人的兵力向前推进，他们在攻破正太线上娘子关中国守军的防御之后，就快速向前追击，常常使用大炮和飞机把中国整团整团的兵力击溃。中国军队没有飞机作掩护，大炮数量也不多。一

个月前，八路军派一支队伍到东线作战。这支队伍在人数和武器方面都不及日军，但是刚到东线一个星期，就在娘子关南面重创日军，击毙五千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装备。

十一月初，八路军总部跟该部一支队伍一起由寿阳站跨过正太线，向前进发以阻止前来进犯的日军，可是在八路军跨过正太线的同一天，日本军队在寿阳击败了中国守军，开始向离太原很近的榆次进犯。八路军在接到向铁路南面前进的命令时已经太晚了，因此他们连阵地还没有进入，日本军队就已经向太原扑过去了。

十一月四日，八路军以八比一的优势跟日军遭遇，击毙敌军一千多人，截获大量武器。但是，这对正在向着太原进逼的日本军队并没有什么影响。也就在这一天，驻守北线忻口的中国军队开始向南全面撤退，阎锡山将军也把他的指挥部撤出了太原。为了给撤退一事辩护，北线总指挥卫立煌将军说，既然日本军队已控制了正太线并切断了他们，那么，他们的撤退是符合战术原则的。他还说，忻口一带是山区，驻守在那里的中国军队几乎找不到粮食，帮助他们的老百姓也为数极少。但是八路军指挥员贺龙和他的部队的条件就更差了——他们被夹在大同和忻口的两支敌军之间，他们却留在那里并不撤退，而且还取得了老百姓的全力支持。他的部队的粮食就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卫立煌是一位有指挥才能的将领。不过他也阻挡不住防守忻口地区的中国军队如此狼狈地向南溃退。要是说单纯溃退，那还好说，事实是：好几千名当兵的却是争先恐后，丢盔弃甲，他们恨不能插翅而飞。可是贺龙的部队在卫立煌部刚刚撤

离忻口之后，他们就及时赶到那个地区，抢救了上万枝步枪和大批机关枪。

在东线，日本军队继续向太原逼近；驻守榆次的中国军队竟望风披靡，不发一枪一弹。这些军队中有川军、湘军各一个师。十一月五日，正当八路军与日军在广阳镇交火之际，沿正太线前进的日军就已经到达离太原二十里（不足十英里）的一个火车站。在这一段时间里，日军派出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的机群前来轰炸太原，摧毁大片地区，炸死几千人员，太原的北城门和周围的城墙均被夷为平地。

傅作义将军一年前因保卫绥远有功，曾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一个月之前，他被任命为太原的城防司令。在最近这一次日军大规模进犯期间，他的六千人马几乎全部覆灭。他这六千人马是从忻口转移到太原的。当日军分兵两路围攻太原，而中国军队又在撤退的时刻，他和他那六千人马就留了下来，变成了太原的守军。

十一月五日晚，日军离太原尚有二十里路，太原即开始全面疏散。疏散刚开始，就从忻口前线正好涌过来三万部队，还有他们的行装、马匹、大炮。疏散的主要路线都在太原城墙外边向西流去的那条汾河的对岸。汾河上有四座桥，其中两座桥要往北走很长一段路，往南那一座是木桥。就在这南北几座桥之间，又新建了一座桥。不过很少人注意到它。

十一月五日晚，天色完全黑了下來，日本飞机也无法对太原进行轰炸。这时，城里的人们跟潮水一般，成群结队，开始从南门口蜂拥而出，纷纷奔向南面那座汾河桥。那北面的两座桥上更是乱成一团，全部都是撤退的士兵，你推我搡，又喊

又叫。老百姓们是根本挤不上去的。跟着当兵的一起上了桥的伤病员们简直被挤得倒在地上，有些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就从他们身上踩了过去。这两座桥上走着许多车辆、马匹，有时候交通严重堵塞。人们争先恐后，各不相让，从太原城里都能够听到他们发出的一阵阵叫骂声。

八路军驻太原指挥部的四十名人员也跟着这巨大的人流撤离太原。他们那七辆卡车上装着电台、文件，地图和行李。其中三辆从增设了路障的太原西门出城。西门有两扇沉重的大铁门，还带着铁链条。这三辆车在驶过汾河之后，就在对岸等待着另外四辆。另外四辆卡车却只能跟着老百姓一起慢慢地爬出南门，打算从南面的桥上驶过汾河。可是，在南面这座桥上，却有一辆发生故障的坦克，正好停在桥的中间，它的两侧只留下刚刚够一个人通过的窄缝。卡车和牲口就都被堵住了。顷刻之间，在桥头和岸上竟是人山人海。其中有从忻口前线过来的骑兵、卡车，私人小汽车、驴子、骡子、马匹以及各式各样的车辆。男女老幼，人人都在提着或背着自己的随身用品。那些瘦弱和年迈的，因体力不支被挤倒在地，有的被人群或牲口活活踩死。人群中你推我搡，哀叹声、怒吼声，响作一片，妇女中有人昏厥过去，儿童拼命哭叫。八路军那四辆卡车连一寸也挪动不了，只好停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之中。

时间已是晚上十一点钟，周围夜色沉沉、人群缓慢地从桥上往前挤着。军队和军车、马匹则由北面的桥上过了河。其中不少是北线下来的卡车和坦克，也有一些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大炮正在被拖过桥去。

坐在四辆卡车上的八路军人员懂得，天亮之后，日本飞机

准会来轰炸桥梁和逃难的人群的。他们是非过汾河不可的，但起码还要等待好几个小时。因此，他们丢下卡车和全部行李，把无线电、电池、地图文件盒都捆在肩上之后，就开始向前挤去。有几个人在凌晨三点钟就过了河，但是不见其他人员过来，其中有他们的首长、八路军北方指挥部门的代表周恩来。于是，有一个人脱掉衣服，准备从冰冷的汾河中游回对岸去——谁料到，他根本不用游水，完全可以蹚着水走过河去！

这个情况一经发现之后，一位八路军人员就给逃难的人们，包括骑兵、步兵在内，充当指挥，组织他们和一切能够自己行动的人员涉水过河。刚才还是群龙无首，乱糟糟的场面，可这下子男女老少全都乖乖地听从指挥过河。于是汾河里响起了千军万马的哗哗溅水声。

八路军还号召那些身强力壮的人一起过来把那辆出了毛病的坦克推下河去。很多群众都表示愿意出力。但能够挨近坦克的也只有少数人。他们使劲地又拖又拉，坦克却一动也不动。换上了又一批人继续使劲。就这样，差不多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也无济于事。坦克混身钢铁，实在太沉，没有机械的力量是弄不动的。大家只得作罢。妇女、儿童和老人就一个个顺着坦克车两边的空隙挤着过去。

这位八路军“指挥员”走向北边去察看情况，他看到了早已过河的那三辆卡车。他叫卡车开到南面那座桥头去等候其他八路军人员，他自己则继续朝北走。东方拂晓，天色渐明。借着朦胧的晨曦，他发现了汾河上新建的一座木桥！在淡淡的晨曦中，桥上竟空荡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赶快折回，叫疏散的人们从这座木桥上过河。于是，人群就象洪流一般向前涌了过

来。这位“指挥员”才又回到三辆卡车等候的地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体同志都已经到齐。这样，他们就朝着西南方向的路上出发了。天色已经破晓，他们想返回去抢救那另外四辆卡车，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刚刚走了几里路就进入一个村子，这时，敌人的第一批飞机已出现在太原上空，开始轰炸河上的桥梁，它们在许多还来不及过河的部队的头上，来回盘旋着。

卫立煌将军来到太原城外继续指挥还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军队。这批军队全都是山西人。他和山西军的指挥员迅速把从北线过来的队伍集中起来，对前来紧追他们的日本军队进行迎击。双方在太原的西城墙边打了一仗。中国方面兵力较少，又没有机关枪。他们寡不敌众，渐渐后缩，沿着同蒲线向南撤退了。在太原城里，傅作义将军指挥他的六千名士兵从城墙上和其它阵地上向进犯的敌军开火。

黎明时分，在太原城的另一个地方，川军师长邓锡侯师损失四千人，只剩下三千。邓将军命令这一部分队伍先进太原城去增援傅作义将军，他自己也紧接着进了太原城还以为他是后卫，——岂料他那些当兵的谁也没有进入太原！三千人马各奔东西，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在太原城里，傅作义将军和他的六千名部下坚守着阵地。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的白天和六日、七日的晚上，他们跟日军短兵相接，片刻未停。城墙上鲜血淋漓，一批批守城士兵的尸体就堆在机关枪的旁边，为那些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战友们充当了掩护体。

身材魁梧，为人坦率诚恳的北方人傅作义将军在战士们中间来回走动。据说，他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人已变得苍老。他

彻夜不眠，疲惫困顿，双眼充满血丝，浑身衣裤又破又脏，血迹斑斑。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已经损坏，无法跟各处的指挥人员进行联络了。他们以为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下已全数被歼灭了。

到十一月八日傍晚，傅作义部下的六千人中四千已经阵亡，受伤者不计其数。就在那天夜间，傅作义将军带领部下，包括伤残人员，不知用什么办法离开太原，日夜兼程赶到了西南面的汾阳。

我们不知道日军什么时候进入了太原。太原城外所有的道路都布上了地雷，因此，日军进城时一定损失不小。不过，他们最后还是进去了。但见太原城墙上凝满了卫城烈士的鲜血。冻僵的尸体横陈在那里，一个个朝向苦寒的苍天——表情冷峻，含恨而终。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太原的情况——它还有待以后再作补充。

平 阳 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昨天晚上，我们回到平阳府。当我们能望见平阳府雄巍的灰色城墙时已是暮色苍茫了。凛冽的寒风刮着光秃秃的云杉树枝，满地衰草低伏，瑟瑟发抖；一片片田里的庄稼零落、焦枯干裂。驮着军用物资的骆驼，连成一队，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向前；肮脏的小冰柱依然挂在它们的腿毛上面。

立波离开我们立即到西安去了。他去那里准备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筹集资金，支援敌占区的民兵。两位警卫员和我自己都没有赶上八路军总部的晚饭，所以就在我住房前面的小贩那里买了些食物，吃完后就上炕睡觉了。

到了夜间什么时候，我唤醒了两位警卫员，告诉他们我难受得厉害。我浑身冰凉，心里惊悸，脉象激烈，脑袋里嗡嗡作响。我想到了中国常见的种种疾病，如斑疹伤寒之类，又想起了这个月里我有两天被虱子咬过。总之，我冷得全身发抖，脑袋象要炸开来似的，心里又突突直跳。我知道这种现象说明我是中毒了。当我躺在那里痛得要命的时候，又觉得一阵恶心。警卫员半搀扶着我刚一走出屋外，我就吐了。我有点迷迷糊糊，警卫们把冷毛巾贴在我的脑门上。我听到有个警卫员也在外面呕吐；之后，他摇摇晃晃地回到屋里，昏昏沉沉地就倒在炕上了。又过一会儿，另一个警卫员也开始发起病来。我意识到我们几个人全都中毒了。

整个平阳城异常寂静。我们的屋子跟八路军的一个主要办公室在一幢房里，只隔开两个门。我们谁都很难站立起来。我不敢让警卫员到办公室去，我自己也不敢去。

整夜，我们三个人呕吐、腹泻不止。我的心脏开始时跳得象根捣东西的杵锤，后来稍微慢了一些，象是快要停止似的。我没有咖啡，也没有任何药品。我不断地从炕上爬过去，摸摸两位警卫员的脉搏。他们躺在那里，处于半昏迷状态。八个小时之后，我最难受的时候算是过去了。不出所料，那位爱唱歌、爱清静、爱干净的警卫员是我们中间病得最厉害的一个。另外一个警卫员和我就烧了点开水给他喝，可是我们仍然没有

办法使他从半昏迷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那位江西籍警卫员跑到街上，找来两辆人力车。我们把那位病得最厉害的警卫员抬上车子之后，就往医院去了。到了医院，我拿了些药物。大伙把车上那位警卫员抬下来。给他吃过药之后，就把他抬到了床上。很快，我自己也好起来了，就去找一位教会医生，还看着他给那一长队的伤病战士打针吃药。这家医院里每天都有大批伤病员进来。医生办公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份日历，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我知道自己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这次我多记了一天日子。

十一点钟，我把两位警卫员带回住地，他们就上床了。我和卫立煌将军还有约会。

办公室里有人来准备陪我前往。我告诉那位说：“我病了，不想去了。”

他说：“嗨，谁都有病，我自己也头痛。”看来，即使我告诉他两名警卫员和我因为食物中毒，昨天夜里差一点就会死掉，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我就前去采访了。不过，我脑袋仍是痛得发木，心里上下不定。我感到狼狈、疲惫、怪可怜的。

就这样，我邋里邋遢地走去采访卫立煌将军了。卫将军是中央和山西军的司令长官，也是太原以北忻口的原忻口前线司令。如果在其他情况下，我是不会进行这次采访的。可现在是战争时期，与日本作战的中国全体军民处境比我更为艰苦却仍在奋战，病号和轻伤员也都还能继续战斗，那么，我只要动动嘴还会有什么问题么。不料，病魔依然在纠缠着我，体内

的毒素看来还是在干扰我的思路。

一踏进卫将军的指挥部，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部下那种堂堂的仪表。他们全都穿着上等的冬季军装和大衣，不少人还有皮帽子，皮领子，擦得如同明镜般的皮靴。我再看看自己破烂的护腿和那褪了色的旧鞋子，不禁有点自惭形秽，越发觉得自己象个乞丐似的。

卫将军自己有翻译。这位翻译以挑剔的眼光接待了我。他打量我的军装、绑腿和鞋子，明显地表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过不多时，卫将军就走进来了。他示意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自己也接着坐了下来，目光直射在我的脸上。他对我身上的旧衣服连瞧也没瞧一眼。我觉得他依然还是个年轻人，三十刚出头，最多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身材短壮，留着一小撮黑黑的胡髭。他的军装、大衣是用上等毛料做的，领子，和帽子都是皮货，靴子擦得光可鉴人。

卫将军性格开朗，为人温厚，明显地给人以处事干练之感。他周围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所处的领导地位。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他表现愉快、乐观。

他对山西省的局势十分乐观。他说，大约六万至七万的日军主力目前正集中在太原。在西北战线，敌军原来有二十七团，可是其中一半已经损失掉了。他说，就在山西这一仗中，日军大约死亡三万人。目前，日军在太原城里有一大批伤病员和其他疲劳不堪的官兵，因此他们处境极为困难。敌人占领太原的意义并不象他们向世界宣传的那样重大。他们无法取得增援部队和粮食；由于中国军队（八路军部队）在北面作战，所以日本军队的一切物资都无法通过那里的交通线。

卫将军说，日军刚攻占太原的时候，他们还打算要继续南下，占领整个山西省。他们的确也攻下了平遥和太谷等地，但是他们后来又撤了回去，只有在太谷留下部分兵力。现在，太谷也叫中国军队给包围起来了。

卫将军指出，中国军队撤出忻口是必要的，因为日本军队能够控制正太铁路，由东面向太原逼进，这样就切断了忻口中国守军的后路。驻防忻口的中国部队曾经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作战的：他们不象日军那样有大炮、飞机配合作战，他们的阵地都在山里，很难得到粮食供应，其它方面的援助更是少得可怜。

我问卫将军，为什么日本军队现在就要撤回去。他回答说，他认为原因有三：（一）日军在交通运输，特别在北边的交通运输方面有很大的困难；（二）日军的战线拉得太长，如果现在遇到中国方面有力的反击的话，就可能被冲垮；（三）日本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极需加以补充，可眼下又难以办到。

卫将军说：“我们可以守住山西省。”我就问他，既然中国部队连续吃了败仗，又怎么能守住山西呢？对此，他回答说：“要靠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听到此话，我大吃一惊。他的话跟八路军的话一模一样。

我接着问道：“在这方面你做过哪些工作？”

他说：“我们还刚刚开始。”然后，他就回答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说他们有大量的枪支可以用来武装民众。

听到这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我想起了八路军。几个月来，八路军一直在耐心细致地呼吁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他们早就开始这样宣传了——可他们就是苦于得不到足够

的武器，我还想起了在我们一路上经过的村子里所召开的许多群众大会，想起了朱德冒雨站在会场上给大家发表演说的情景……，人们身子前倾，急切地想听清楚朱德讲的每一个字……，他们脸上的表情紧张、严肃、热烈，周围的一切生动而有力地显示了深深蕴藏在中国人民心底的决心和意志……。大雨如注，可人们一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们的眼睛一分钟也没有离开朱德的面孔……。

这些令人伤心的回忆向我一阵阵袭来，我简直忘记了我该怎样继续进行我的采访工作了。

翻译一直站在那里。他看到我默不作声，就表现不耐烦了，问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要提。我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想设法提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我还没有开口，有一个卫兵走来站在门口报告：“飞机来了！”

卫将军把身边的文件纸张收拾起来之后，就让我跟他走。我们刚刚跨出指挥部，就不能再往前走了。防空洞在操场的那一头。卫将军看到几个人正向防空洞奔去，就大声叫喊，让他们立即停下来。他把我拉到一座小庙的屋檐下面。

他一边拉我，一边喊道“瞧！”我们仔细张望那两架正飞在我们头顶上的飞机。它们向前飞了一段，接着就听到——

轰！轰！飞机开始往下扔炸弹了，而且正好落在指挥部外面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卫将军向地面紧紧地俯下身子，我也就在他的旁边。我们周围和城里的高射炮、机关枪全响开了。飞机继续向下投炸弹，我蹲在那里，心里想不知道这回来了多少架飞机。整个平阳府已变成一个战场了。

我们看着飞机慢慢地飞离平阳府上空，轰炸停止。我说：

“飞机走了！”

卫将军说，“没有走。它们还要飞回来的。”

我们大家全都很快地奔过操场，进到防空洞里。平阳府真的又一次在炸弹的爆炸声中震动起来。

防空洞挖得很浅，我们蹲伏在洞口，往外观察飞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卫将军开始询问我国外是怎样看待日本对华战争的。我对他讲了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苏联等国的人民运动情况，还告诉他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来的电讯。这一新闻使得他激动起来。他向我周围的人把这事重复讲了好几遍，生怕隆隆的炮声使他们没有听清楚。

卫将军问我自己对八路军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对八路军充满了最深切的钦佩之情。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场面。卫将军诚恳热烈地赞叹说：“八路军是一支好队伍，纪律严明，英勇善战！”

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我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才是这个——”，他边说边把拳头从地上举起，伸出了大拇指。这表示“顶呱呱！”

空袭结束之后，我们爬出防空洞，正好碰到一个连的山西战士刚刚向我们旁边的那个防空洞跑步过去。跟他们一起跑的还有一个穿卡其布制服的军官。刚才，一颗炸弹就掉在他们连队附近，弹片把军官的大衣崩了许多窟窿，崩坏了他的帽徽，还把他的帽子从脑袋上崩了下来——可就是没有伤着他！他跟卫将军谈起这件事，无可奈何，只是苦笑。

我的采访时间已经结束，告别卫立煌将军等人之后，就来到街上。但见街头挤满了一大群人。炸弹就落在这里。那些被

炸死和炸伤的人就在人群的中间的几处地方。回到八路军驻此地的办事处后，我了解到大约有一百人遭到伤亡，其中大部分是普通的老百姓。傅作义将军的几名卫兵当时正好在街上，所以也挨了炸弹。

我不想去看那些伤亡人员血肉模糊的身躯。一辆卡车正等着要把我拉回八路军总部。司机不停地催促我们加快行动，因为敌人轰炸机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飞来。我让警卫员从床上爬起来，把他们连同我们大家的铺盖卷都塞进卡车，准备停当，只待出发。实际上，我们又等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出了城。我们退进一条小巷子，先让装着军用物资的大车长队过去。大车的两个轮子都是硬木制造的，外面包着铁圈。有的车还用牛在拉着走，慢慢悠悠，不慌不忙。

见此情景，我嚷嚷道：“飞机来了怎么办？”

司机对我说：“老百姓不管这些。在任何情况下，老百姓都不着急——有飞机也罢，没有飞机也罢。”

我们的卡车走上了灰色的平坦公路之后，就加快马力，紧着往前赶。但是，路上我们还停下来两次。有些人就站在道路当中，向我们挥动手里的枪。

“你们是什么人？”司机问道。

“八路军游击队……，请让我们搭车吧！”这是些青年农民，约摸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他们身高体壮，脸上充满青春的朝气。

司机看着他们说，“那就上来吧！”说完，他冲我一笑，“真够意思吧！”

黄昏时分，我们到达洪洞。在这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会

碰上舒群和丁玲。舒群到洪洞来是想找个澡堂洗一洗。他找到了一个——不过，那池子壁上的污垢足足有一英寸厚，四边围着好几百人。他只好作罢。我就在街上告别了丁玲，然后，警卫员们和我一起又出发了，我们还得赶二十来里的路程，才能到达总部。

公路已经走到尽头，卡车没法再开了，所以那位司机就看着我们步行前进。可是，我们刚走了几里，就听到后面有卡车追了上来。司机说，在这样的漆黑之夜赶路，常常会遇到拦路打劫的，因此他要想办法跟我们一起开到总部去。

司机辛苦了三个钟头。在一个村头，他好不容易开过了两道狭窄的小径，可是再也无法往前开了。因此，他不得不往后倒车，退了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之后，上了一条比便道宽不了多少的小路。老乡们都从屋子里走出来给我们指点方向。村里的妇女是破天荒第一遭看到卡车这个玩意儿，老人、小孩则堵在路口，目瞪口呆，指手划脚。后来我们到了另一个村子，人们又不得不从家里拿出镐头、铁锹，帮我们铲平土埂，让车子通过。

我精神困乏、身体不爽。在寂寞的寒夜里，我不禁自言自语道：“我的天哪！这些人见到卡车竟是那样大惊小怪——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打日本呢！女人们缠着小脚，头发散乱，满脸污垢，娃娃也脏得要命。他们在车灯前龇牙咧嘴，简直跟白痴一样！”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又告诫自己：“嘿，怎么没信心了！”我脑子里接着又想起了八路军的历史……，想起了一个月来我们在山西东部各个城镇、村乡中的所见所闻。其实，当年的红军战士不也是来自象这样的穷乡僻壤吗！

七、一次喘息和一次转移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

今天，对敌工作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叫我上他们的办公室去。一名日军俘虏已经早去了他们那里。舒群跟丁玲到几里以外的一个村子去了，所以我就单独行动。

在对敌工作部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的男人，正跟其他人在认真地交谈着。开始，我不知道他就是日本俘虏。因为八路军里有不少人也穿着日本军服，我心想他大概也是中国人。从外表看，他是个中国人——虽然有那么一点我也说不清楚的差别。不过，当他站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我才认出他是个日本人。

他的面部表情和言谈举止特别和气。他很年轻。他说自己二十七岁，原是长崎的建筑工人。当他还刚刚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工了，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他已经成家，有一个孩子。

他坦率直爽，没有一点傲气。他讲起话来实实在在——因此也常常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们。没过多久。我们全都跟他谈得来了。我们谈目前的战争，谈中国和日本、谈日本军队、谈他在日军中的经历、谈八路军。他对我们提的问题全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自己也毫不含糊地询问我们的生活和其它方面的情况。

他是十一月四日在广阳镇战斗中被林彪部队俘虏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脖子。受伤以后，八路军把他从战场抬回来。途中，他从刀鞘中抽出尖刀，企图用割断颈动脉血管的办法自杀。

他说：“日军司令部和所有的日本报纸都说中国人杀俘虏。我心里想你们一定会先折磨我，然后再砍掉我的脑袋。所以我一开始就打算自杀……。我出血过多，很快就累得不能动弹了……你瞧。”说着，他撩开外衣，贴身穿着两件洗得干净的中国蓝布衫。但是，他的短上衣里面却有一大块血迹。当时，鲜血还浸染到他的大衣上面。脖子上的伤口损坏了一根神经，所以他的右胳膊不怎么听使唤。

后来，他被送进八路军医院。他说，医生们不但给他认真治疗，还对他十分体贴。周围的八路军伤病员告诉他说，八路军是根本不杀俘虏的。八路军总部还来过一个人，跟他谈话，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情况，并向他指出八路军把日本的工人、农民都看作自己的兄弟。

在场的一个人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在医院里给他做工作时，他哭了。”

现在，他的情况大有好转。他能走路，能说话，虽然右胳膊恢复得比较慢些。他觉得寂寞，又没有人能跟他说话，因此

就把他送到八路军总部来，这里有不少会讲日语的人。

他说，绝大多数日本军人都反对战争。他们厌恶打仗。但是，他们的上级命令他们到中国来，他们也就来了。如果谁敢违抗军令，轻者判刑，重者处决。日军中纪律非常严厉，所以他觉得要想搞什么反战运动都是不可能的事。日军士兵还听到各种宣传——什么中国人怎样屠杀日本人，中国人怎样砍掉全部日军俘虏的脑袋等等。所以，日本士兵一上战场就要拼命，他们心想跟中国打仗反正都是死。

我问他是否看到过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场面。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但是，他们的师部穿过河北省南下到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附近时，他看到在路边躺着许多被害的中国农民的尸体。他们的双脚被捆着，是让人用刀砍死的。他从他们部队里其它士兵那里听到，这些中国农民是他们师里的军官们屠杀的。中国妇女被抓来以后也没有好下场，弄去供日军玩乐——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干，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表现严肃认真，还在尽量回忆那些他看到有中国人尸体的村子的名字。他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来，就象是跟自己的好朋友谈话一样。

我们还谈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日、中两国的工人、农民都能够当家作主，而且也能象兄弟一样互相合作。他同意我们的想法，还接二连三地问了一些有关红军历史的问题。他说，前几年他在日本报刊上曾读到两、三篇关于中国红军的文章。现在，他想了解红军的整个历史。他的身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聪敏而好学。他会使你感到任何事情你讲给他以后，他总是记得牢牢的，而且都能起作用。实际上，我们所谈的就

是这些：日本工人将来能做些什么，他本人又能做些什么，我们大家共同能做些什么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他告诉了我们他能够做的和今后打算做的事情——这是他在被俘后的第二天开始一直思考着的问题。那天，有人向他讲解了中国军队打仗的目的、八路军的性质。他也已经在考虑自己将来的工作——不过，那是属于他个人的问题。

有时候，他痛苦地低下脑袋、弯下身子。他的胳膊叫他受了不少罪。我们问他我们能帮他些什么，他说最好能想办法减轻他的病痛。因此，我们在一边想办法的时候，一边帮他把上身脱光，设法用毛巾给他热敷脖子、肩膀、胳膊——这样做居然非常奏效，大大地解除了他的疼痛。

他说，“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你们待我简直比我的妈妈还好。你们千方百计地替我着想。你们给我治病、帮我洗澡、给我零钱买东西吃，还派来警卫员照料我。我什么也不缺，可叫我怎么谢你们呢？”

“你不用谢我们。你是我们的兄弟，因为你是工人，你不是要来打仗的。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努力，制止这场战争、制止一切战争。”

“对，”他说道。他微微低下脑袋，脸上显出一副认真思考的神情。“对，回到日本后我要向所有的工人讲一讲我在中国学到的东西。”

今晚，我带着传教士在洪洞借给我的那批外国报纸，到朱德的住地去。任弼时跟另外两位同志也在那里。我们一起看报、谈论时事。任弼时给我念了来自上海的无线电广播新闻，

其中特别有一条消息说日本军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马路上耀武扬威，殴打了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我们谈到了军国主义者在日本扶植起来的反英运动，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中国提出关于建立和平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意味着对中国的全面征服，因此值得抄录下来，传之后世。它们是：

- 一、承认“满洲国”，建立中国——日本——“满洲国”三国集团；
- 二、在华北和内蒙古建立一个反共的自治政府。该政府接受日本的保护，税收和海关概归自理；
- 三、日本向中国海关派驻总监，向各省机构派驻顾问；修订中国税则，以促进日本产品和中国原料之间的交换；
- 四、蒋介石将军让位，由日本人担任总统；中国参加反共集团；
- 五、中国不得拥有军队或军用飞机；成立维持和平部队，由日本方面安排一切商业航空运输并提供飞机。

我把外国报纸上这些条件念下来，朱德用中文都记在小本子上。当我念到第四条关于要由一名“日本人当中国总统”时，朱德听不明白，抬头望着我。我重复了一遍，他脸上顿时显出一种令我难忘、但又形容不出来的表情。任弼时和我都笑了，朱德这才意识到我是在念日本人提出的条件。于是，他也跟着我们一起笑了。不过，他的笑声里没有欢乐，而是充满着愤怒。

朱德还记下了日本方面就上海公共租界问题提出的要求。他和任弼时两人都问我认为英国人、美国人会采取什么对策。

我说，如果英、美方面能够想出什么办法保住面子的话，那它们就可能会接受日本的要求。不过，最近出现日本军人在租界逞凶，拳打英、美公民的事件之后，眼下他们大概是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条件。

朱德又问道：“从现在起到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能有多长时间？”

我认为不会很长。任弼时说，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南京，并开始把所有英、美在华利益——包括在上海的利益——逐出中国之后，形势可能会起变化。

我们谈到了日本人在太原筹组的伪政府。那位外表看起来有点象半个蒙古人的王英当了个“政府”的头目。另一个名叫南桂楠的汉奸和名叫文作川（音译）的家伙也都混到了里面。文作川的老家离我们这儿不远。他是个有钱的地主，阎锡山将军的得力人物。

这个汉奸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处抓中国女人，送给日本军队，供他们取乐。日军提出要三千名。他们还向中国各个部队投放传单。他们的第一句口号是“消灭共产党”；第二句是“皇军给东亚带来和平”；第三句是“山西的中国军队打不过皇军，中国的老百姓也打不了皇军，所以，他们必须听皇军的话。”

任弼时告诉我，日军现在正采用游击战术跟八路军和其它中国军队作战。他们不敢出动小股力量，而是派大队骑兵出来活动。

我们几个人一直谈到深夜。朱德为大家煮咖啡——我喝过之后，通宵非常兴奋，所以我才能够坐在这里，冒着寒冷来写

这篇稿子。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几天来，我们呆在这一个地方没有动。对此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样我可以借此机会就八路军九月初开始的对日军作战情况作一回顾。

在华北和西北的整个部队当中，八路军逐渐承担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责任。今天，日本太原驻屯军司令永田武雄向居民发布的公告表明了日军对八路军的仇恨。

公告上说：

“鉴于南京政府已经与共产党、苏联联合起来，并正在破坏、毁灭中国以及远东地区，因此天皇陛下特派来军队，拯救中国。”

“皇军业已占领南京（这不是事实——史沫特莱注）。目前共产党的幽灵还在骚扰我们的王道乐土，等待皇军去消灭。”

公告要求居民跟从前一样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一旦发现有任何暗藏的赤色分子，则须立即向日军司令部报告。日军将会给予金钱奖励。下列三种情况都可得奖：

- 一、取得红军有关文件者。
- 二、取得任何与红军有关的消息或情报者。
- 三、取得有关红军内部情况及其下落者。

我们是今天在八路军总部看到这份公告的。任弼时看了以后满脸怒容；而朱德那慈祥、友善的脸上更是怒不可遏。我看

着朱德，觉得他真是一位多年来叫那些压迫穷人的家伙一见就丧胆的英雄。我意识到自己对他这样的人物根本就不了解。在延安，我看到他的时候，那是处在和平环境。当时，他天天给抗大上课，要不就钻研我们从上海带去的新书或者去我那里给我讲讲他的生平。在那样的情况下，很难说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作为我的同志、朋友和老师，他友善文雅；作为一个人，他心地善良，待人接物直率坦白，虚怀若谷。可是，今天当我们在读到日军的那个布告和前几天读到日本提给南京方面的媾和条件时，我简直不认识朱德了——但见他怒火中烧，勃然变色。这使我想起在过去十年之中，他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人、农民而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人英勇奋战的情景。今天，我所看到的朱德正是当年的那个朱德啊。

几天之前——十二月八日——我到司令部去，有人给我看了一份蒋介石签署的文件。这是一份正式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换言之，八路军改名了，它不再是哪一个“路”方面的军队了，而是一支正式“军”了。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八路军发展迅速的原故。我不大懂这种军事技术方面的东西，不过人们告诉我，“路”军只能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行动，而一个正式的“军”就不受这种限制了。

我们对改名字的事付之一笑。现在，“八路军”三个字已经深深地铭记在人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不会由于改个新名字而发生变化的。

蒋介石将军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他委任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人在中国各地加紧行动，破坏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最主要的借口就是叫嚷

“共产主义威胁论”。他们准备跟南京方面媾和，如果南京同意跟中国的共产党人决裂，并加入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反共集团的话。这件事本身意味着南京不但要对八路军作战，也要对苏联作战；此外，这还意味着国际强盗们准备打一场重新瓜分弱小民族及其自然资源的世界大战。

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博士正在极力引诱蒋介石跟世界强盗国家同流合污，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西班牙式的战场。南京也有一批人物主张接受日本、德国的建议。他们宁肯牺牲整个中国，也要保住他们私人那些可怜的产业。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肯出来支持那些敌对分子而已。

不要多久，一旦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南京会有人出来成立傀儡政权。德国人几天之前在汉口召集会议，一位“发言人”就作过这个预言。外国报纸还透露了德、日两国驻华大使之间以及德国大使与日本特使之间的秘密谈话。

前线有很多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不知道是哪个部队的飞机目前正在轰炸石家庄的日军。石家庄是平汉铁路和一条通往太原的窄轨铁路的交叉点。几个月来一直在沿着平汉线南下的日军现正向北撤退。我们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说，在太原的二万至五万日本军队已经（十一月十七日）缓慢而无可奈何地沿正太线后撤到北平、天津地区，其中有不少人已经返回本国。

这二万至五万伤病残废日军人员，属于太原的日本占领军部队。几个月来的战斗使日军处境极端困难。日本方面否认这一事实，还极力在中国装出一副兵强马壮的样子。然而，这是

假象。日本军队已经疲惫困顿，无心作战。日本军队伤亡极大。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他们派出巡逻队到乡下去抢粮，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把粮食藏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为此，太原驻军往往要派出一半人马到农村里去抢东西。

日本人在拿下太原之前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打八路军后方，无法象他们所吹嘘的那样做到要“把八路军赶出华北和赶出西北”去。现在，他们正在开展一场新的攻势，企图达到这一目的。

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了晋北、冀西以及察哈尔南部的许多重要城镇。他们夺回的城镇太多了，我们无需在此一一罗列。其中最重要的有：晋北的灵丘、广灵、浑源、五台、盂县；河北省的涞源、沿平汉铁路往南的整个冀西地区以及北平以南铁路沿线一些城市；察哈尔南部平绥线以南的阳原和蔚县。八路军多次破坏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切断日军供给线，干扰、拖垮入侵之敌。

在山西西北部、绥远南部和大同的西沿，八路军从日军手里收复了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和乡镇，其中包括平鲁、宁武、清平镇和绥远、山西两省交界处的右玉。这样，八路军就把大同和忻口（太原的北部门户）之间的主要交通线彻底割断了。八路军还在山西北部交通线上的朔县、古县等地与日军重兵交战。由于敌人装备有大炮、飞机，所以未能克复这些地方。同样，在山西北部，八路军还彻底摧毁了由北平至忻口、太原的其他主要交通线。日军的卡车，常常由一百五十辆至二百辆组成车队，在这一带的公路上疾驰而过，神气非凡。每个车队一

般由二、三个连队担任护卫，那些日本军人坐在卡车上面，洋洋得意，咧嘴而笑，就好象乡绅来到了他们的新领地一般。不过，有个日军团长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这两条交通线上一千多辆日本军用卡车的遭遇。这个团长是在九月底的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击毙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红军在此地摧毁了我们一百五十辆卡车，打死了六十名官兵，其中还有一名连长。这一带的女人也参加了战斗，扔手榴弹。我已接到命令，对这一带的老百姓格杀勿论。”

八路军不但成百地击毁日军运输车辆；他们在十月十八日夜还袭击了日军的阳明堡空军基地。基地上共有二十四架轰炸机，其中二十一架被毁。十一月底，八路军从敌人手中缴获一千多匹驮骡和军马，几百枝步枪、大量弹药、近五十挺机关枪、几门重炮、许多药品和其它军用品。他们歼灭日军约一万名，还把几万个农民组织、训练、武装起来，对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在山西的中国军方人士说，日军在西北的战役中大约损失三万人。西北战役包括正太线地区和忻口地区的战斗。

日本人原计划要在十月三十日占据太原，然后再沿同蒲铁路南下，攻克山西全省。事实上，他们是在十一月九日才拿下太原以及太原东侧和南侧包括平遥在内的几个城镇的。日军在平遥的所作所为充分反映了他们在各处的行径。他们一进平遥城，就用枪托砸老百姓的家门，挨户搜查钱财、食物和女人。他们在城里四处打劫行凶——虽然大部分居民早已逃跑。他们奸淫妇女，还把年轻的姑娘押送到太原，供那里的日军作乐。这些事情是一位亲眼看到这个场面的外国人告诉我的。

但是，没过多久，日军就从平遥和太原附近他们所占据的

地方撤离了。在此之前，已经有二、三万日军从这一带撤到了华北和日本。十一月二十八日，当我在平阳县（临汾）时，卫立煌将军就跟我谈起过日本撤军的事，并且知道了事情的原因。

这些行动实际上只是准备对八路军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战役的序幕而已。这场战役将在从山西北部到河北西部的平汉铁路线和察哈尔南部这一大片宽广的地区进行。首先，日本重新派出一万兵力沿平汉线南下，以防止八路军及其所领导、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对它的袭击。其次，他们已向由平汉线往北到雁北的这一地区派出了八路纵队的兵力；向晋西北和他们的据点大同以西派出了六路纵队的兵力。日本方面吹嘘说，他们要把“红军从晋北、河北和察哈尔全部消灭。”

日本每个纵队大约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人，有些有二千至三千人，个别的只有七百人。每个纵队由坦克、飞机掩护，纵队都配备有大炮。在察哈尔和冀西作战的纵队里还有骑兵。这十四路纵队中有二万至三万名新兵。有八个纵队从十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开始向八路军进攻；另外六个纵队则于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对八路军采取行动。

这些纵队中，有的主要集中在某一个范围内作战，有时三个纵队也同时配合攻打一个由八路军控制的点——譬如河北西部的涞源、阜平或察哈尔南部的蔚县（蔚州）等。

目前，这场战役正处在高潮之中，整个晋北、冀西、察哈尔和正太铁路沿线都有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八路军运用的是他们十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战术。首先，他们扎根于群众运动之中。他们把普通老百姓动员起来，加以组织、武装、训练，

因此常常是整个城镇的群众，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拿起武器，跟敌军周旋。八路军人数不多，但由于群众一致拥护，它的力量得到很大的增长。

我们几乎能够了解到各地的情况。其中有一件事听起来就跟红军当年在江西作战一样。说的是一路二、三千兵力的日军纵队在重新夺取平汉线上的易县之后，依仗有三千预备兵力留在定县，就单独往西迳直扑向由八路军控制的两个重要镇子。八路军不想硬拼，所以它事先撤离这两个镇子。当地的群众挑着粮食、衣物，赶着猪、羊等牲口跟八路军一块撤离。八路军、游击队和老百姓在路旁伏击敌人。他们一等日军过来，就拿着步枪、手榴弹、棍棒、长矛、石块一齐拥上来。他们先占据道路两旁的制高点，狠狠击退了敌军，甚至还缴获了日军五辆坦克当中的一辆。河北西部的曲阳也有同样的情况。曲阳的老百姓至今仍坚守着县城，没有向日军屈服。当日军的一路纵队向察哈尔的蔚县进攻时，蔚县的八路军和群众也采用同样的战术。日军穿过一大片平地，向蔚县进逼，因此它的大炮、坦克、骑兵和飞机可以发挥很大的威力。但是，蔚县的军民等到晚上才跟敌人交火。他们等在附近的山里伏击敌人。那些出城想找粮食的日军，都被迫回到了空荡荡的城里。

另外有一路日军纵队在十二月初从正太铁路的寿阳出发，往北向盂县进攻。七百名民兵，仅有二百枝步枪。他们与这路敌军纵队遭遇。战斗结果，敌人死亡一百名，民兵死亡五人。第二天，八路军又打死近二百名敌人，自己损失四十人。

十一月下旬，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纵队向晋北的浑源进攻。当时，八路军的一个连驻扎在城里。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

一起撤离了浑源，给日军只留下个空城。八路军和老百姓在郊外遇到正赶向浑源来增援的七百余名战友。于是，两支部队联合起来，隐蔽到一座叫乱石岭的山岗里等待敌人。十二月一日，他们碰上了日军。双方战斗了一个通宵。日军损失极其惨重，八路军牺牲了四十名战士。八路军受伤人员中，有二十人的手在那场恶战中因受冻而腐烂、坏死。

从大同往南到忻口的公路上，八路军共歼灭一、二千日军。

日军驻扎在这条交通线上的朔县和古县的大批部队正采用新的战术对付八路军军民。日军沿着一些河边设置强大的炮兵阵地，同时又派出巡逻队到周围村庄去抢东西、杀人、奸污妇女。这一带的游击队跟日军进行过猛烈的战斗，几次三番把敌军打回城里去。所以说，这一带到处是战场，人们整天都在打仗。

至于其他地方，日本人搞了一套美其名曰“政治”的手法。他们穿起中国式的服装，头戴中国帽子，左胳膊还佩上八路军的袖章。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他们跑到许多村子里去肆虐。他们打家劫舍，残害生灵，奸污妇女，把年轻人抓走。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破坏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信任了。可是，日本人大部分都不会讲中国话，个子又矮，而中国北方的人却身材高大。加上，八路军根本不带袖章，穿的军衣一般也都很破旧。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把伪装的敌人辨认出来。如今，有更多的青年，成千上万的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此外，日本人还忙着搞其他的“政治”活动。在日本人控制的大城镇里，他们总要唆使一些有钱的地主、乡绅（他们大

都是亲日派)出面拼凑傀儡“政府”。但是,所有的穷人照例都是要逃走的。因此,这些所谓的政府甚至找不到群众来给他们纠合的“维持会”捧捧场。

通过这类汉奸政府,日本人开始对一切抗日分子和一切其他拥有资产已引起日方注意的人士实行恐怖统治。他们下令全体居民必须在指定日期之前向有关当局登记所有财物、资金,否则,即按抗日分子名义予以没收。他们还实行一系列新的苛捐杂税。他们得不到群众的帮助,也搞不到粮食,因此就派出人员到各地进行抢劫。十二月初,日军一营出来抢东西,在太原南面碰到了八路军的两个连。八路军迅速疏散开来,把日军引入包围圈内,当即打死一百名日军。敌人逃跑时还抬走了不少受伤的人员。其他一些跑出来烧杀掠抢,胡作非为的敌人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战争正处于高潮之中。日本人声称他们要“消灭赤色分子。”在山西他们对中国军队又进一步重复了这类叫嚣。他们派出飞机到各个部队和城镇,乡村上空撒放传单,宣称日军到山西来只是为了消灭共产党,“以建立东亚的和平。”他们在传单里说什么,既然中央军和山西地方军都叫日军打败了,因此老百姓就不要指望他们还能作出别的什么;还说,共产党宣传说他们要打日本人,那是在哄骗老百姓;“即使共产党能够成功,可最后他们仍然是要没收你们的财产的。”幸亏,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一贫如洗,没有什么财产去让人没收。因此日本人的这些说教也只不过能打动占中国整个人口大约百分之一的有钱人,广大的老百姓当然不会理会他们这一套的。

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运动……

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搜索我们的行踪。日军开始派飞机在离我们不远的村子上空飞行，汉奸们正在积极活动。太原伪政府里就有一个老家在这一带的有钱地主。这几天晚上月亮很好，飞机可以借着月光进行轰炸。今晚，战地服务团在村里演出。大会开始不久，我们就听到飞机的嗡嗡声。这时候朱德正在讲话，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在前线的战斗情况。

当飞机还在老远的地方，我就听到它们朝我们这边飞来的声音。但是，我没有提醒大家，生怕万一有误。我猜想也许是无电台的声音。但是，飞机越来越近了。别人还是没有听出来。我就示意站在讲台上的朱德把挂在他头顶上的那盏灯熄灭。朱德没有领会我的用意，看了一眼周围后没有明白，又继续讲下去。我对身边的人说有飞机正往这儿飞来。可是他们回答我说那是电台的声响。没多一会，飞机就已经到了我们的附近，在空中隆隆作响。站在屋顶上看演出、听朱德报告的人们就高声叫喊飞机来了！这时候，大家才把所有的灯火熄灭。

今晚的观众主要是一批八路军战士、总部的全体人员和好几百个老百姓。他们都集中在一所庙宇的大院里，大殿当作舞台。大院只有一个出口。看到这么多密密麻麻的人群，我心里很是担忧。有人叫喊着要大家不用着急，不要乱跑，就地等待。人们也就都在原地等待，一动也不动。我从人群里挤过去，到院子外面，看到许多人正朝着北面的天空张望。飞机在我们附近的几个村庄上空打转。我们听到它们渐渐飞走的声音，越来越远。于是，我又回到院子里，在黑暗中继续听朱德作他的报告。人们也都回到了大院里，静静地听着。

八路军对空袭已经习以为常，我以为自己也已经如此，其

实不然。今天晚上如果一个炸弹下来，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完蛋。可见，我们总是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中。在过去十年里，八路军这支队伍曾经战斗过千百次，也一直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中。就是在今晚这样的黑暗之中，他们依然在继续向群众发表讲话，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训练群众。他们立场坚定，作战英勇。正是因为八路军有这种精神和它带给人类的信息，我才懂得了跟他们一起站在今晚这个有死亡威胁的阴影里是一种光荣。当我过去呆在那些生活上所谓“正常”的城市里时，我老是担心自己在没有找到八路军，也了解不到它的生活，思想之前就死去。我那时候并不想死。现在我也不想死。但是，人总是要死的。如今，我跟八路军在一起感到心安理得；如有必要，我很乐意死在这里而不愿意死在别处。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从不作这样的打算。我要做的事很多，我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一些，能亲眼看到一个自由的中国、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的人类社会。

大地的气息多么新鲜，人间世事却又是何等凄凉！今晚，我踏着月光，返回我住宿的那个古老的村子。月光下，村里到处影影绰绰，奇幻迷离。屋子前那条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小庙。过去，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可今晚，它在月光之下显得朦朦胧胧，异常优美。屋顶檐沟瓦楞间生长着的片片衰草忽明忽暗。……我院子门前的两棵大树，叶子已经尽落，剩下的仅是颗颗干豆荚。大树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引人惆怅，却也让人深切地意识到这美好的大地。

晋南某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上了年纪的传教士一边看着手里的书，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时代的变化有多大呀！”他手里拿的是一本中文书，书名为：《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老人中文程度很高，可以流畅地阅读各种书刊。他手里还拿着一封朱德给他的信，信末有朱德的签名。

在这位老人收到《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的前一天，他对我说不知道朱德是否喜欢他想送给他的《新约全书》。那本《新约全书》是他非常珍爱的唯一的一本圣经中译本，是多年前别人送他的生日礼物。朱德知道此事后，告诉老人他要先谢谢老人准备送他的圣经；同时朱德回赠他一本书。这就是今天老人手中的那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时代的确起了变化。这位年老的传教士和他心爱的妻子都已六十五岁，两人在中国度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起义的纷乱。他们曾躲在西安某处观望过清皇室准备还朝北平的场面，还透过窗户，端详过那位老态的慈禧太后和不幸的光绪皇帝。清室由西北回北平的道路，经过精心的平整修治，简直是一马平川。在途中，他们还取道山西，向那些“异教徒”布道。

后来，老教士又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迁——辛亥革命、军阀的连年战争、西北的大饥荒和水灾、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国红军已经完成了“长征”。除了成吉思汗的远征而外，这是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红军到

达山西之后，正好包围了他传教的那个城市。这只不过是两年前发生的事情。他亲眼看到南京政府的飞机俯冲下来，向红军狂轰滥炸。此后，他听说过中国结成了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又回到山西来抗击日本。红军现在战斗在山西各个地方，晋南、晋北、晋东、晋西。因此，平民百姓都对他讲，红军打仗如何勇敢，灵活机动的战术使日本人穷于应付；红军纪律如何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红军如何扩大了队伍，吸收了许多年轻小伙子，等等。连一些年轻信徒都把眼睛盯在这支信仰共产主义、不信上帝的军队上。他们对一位教士说：

“你总是让我们向上帝祷告，可日本军队还是霸占了上海、南京和华北。”

传教士回答说：“祷告吧，孩子们。别的不用去想它。”

但是，八路军却号召他们，“要动脑筋想问题，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战斗！”

确实，不少神职人员对他们一向恐惧的八路军竟是大惑不解。多少年来，他们笃信只有基督教才教人以怜悯之心，照顾伤者，对人温柔体贴，容忍、博爱。可是，八路军也同样照料伤员，对人温和、善良、耐心，而且还教育、保护人民，同时对残害百姓的人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

我对一些神职人员曾谈过我亲眼看到的有关八路军的事迹。其中有一位惊叹道：“但他们是不信教的人！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不信教的人也会照顾受伤的人。”

于是，我就请这位想想克里米亚战争以前和美国内战以前伤病员们受到的那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她主要是没有历史地看问题，而只是从她自己的信仰方面来考虑，因而也就无法理解不

信教的八路军怎么也能够如此善良。倘若八路军能够皈依基督教，那该是多末完美的一支军队！

至于这位老教士夫妇俩内心是怎样考虑这些问题的，我不清楚。他们久经沧桑，深明哲理，待人宽厚。他们自己个性中的某种因素使得他们得以摆脱宗教的狂热感。他们后来曾给八路军医院送过钱。那位觉得八路军“不信教”的女神职人员也给伤病员送过钱和手套之类的东西。因此，这位老人也就把他心爱的圣经中文本送给了朱德；而朱德也送给了他那本研究法西斯主义本性的书。

你们看，时代在变化着。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呢。

我在这位老教士夫妇的家里度过了两个晚上，等候着前往另外一个城市去，那里有他们的教会医院。我去的目的是希望该院能卖给我一些药品，供八路军使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老教士也就跟我同行。那家教会医院曾经给为数上千的中国伤员进行过治疗，但是八路军仍然需要更多的药品供应。因此，希望医院无论如何能够想点办法。他们也确实想过办法。这件事我以后还要另行报道。老教士、医院院长、警卫员和我等人在医院的仓库里花了好几个小时，先把各种药品找出来，计量、装瓶、贴上标签，然后小心翼翼地再一一捆好，准备运回去。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八路军军车，所以回来时还把一位女神职人员带出了这个常常遭到日本轰炸机袭击的城市。

我们回到老教士夫妇的家之后，又在那里休息了一个晚上，准备长途跋涉返回八路军总部。那天刚吃过晚饭，教堂院子里就响起钟声。老太太微笑着对我说：

“该去祷告了。”

我没有参加祷告，只是在旁边听着。他们全都跪在椅子前面或低头坐着，双眼紧闭。我不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们都在祈祷些什么。

第一个做祷告的是圣经学校校长。他的祈祷带有政治色彩，尽管他不一定同意我这种看法。他祈求上帝结束战争，把中国引向自由、独立、和平和繁荣；他祈求那些“当权的人士”能足智多谋，把中国引向独立和繁荣；他祈求上帝保佑在山西各地布道的传教士。

老传教士虔诚地跪下去之后，双手捂着脸，央求上帝谴责日本人，摧毁那些轰炸中国百姓、使中国百姓蒙受苦难的日本飞机。他也祈求那些“当权的人士”能有胆有识，把中国带往和平、独立和繁荣；祈求中国老百姓有勇气经受得住大苦大难；祈求上帝庇佑他的全体教会的同事们，庇佑正在危险地区进行采访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先生以及“我们家里的客人。”他祈求神灵保佑朱德、毛泽东，让他们高瞻远瞩，把他们的人民带向和平与独立。同时他还为中国的伤病员祷告。他祈祷时，别人在旁边都喊着“阿门，阿门。”有一位妇女还伤心得呜咽起来。

在老教士的声音逐渐低下去之后，他的夫人开始为病人祈祷。这位老太太悲天悯人，有一副菩萨心肠。她祈祷说，伤病员没有药品，很多人得不到照料；她祈求上帝大发慈悲，让他们能得到药品，让交通恢复，能够把药品送来。

“神圣的圣父，庇护八路军吧，庇佑主所悯念的八路军伤病员吧。让他们能得到药品，让他们在战斗中勇敢、机智。”

“阿门！”在旁边的人们随声应和着。老太太信奉上帝，

诚心诚意，坚定不移。

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教会人士都称呼这位老太太为“以色列母亲”。也许，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在异国过着一种背井离乡的生活，虽然衣着打扮跟中国人差不多，可在家庭、饮食和道德、行动准则方面仍然保持着本国的标准。但是，这位老太太几乎已经全部断绝了跟自己家庭和自己国家的关系。她把中国视为自己的故乡，操一种汉语和英语混合起来的杂语。

有一回，当我们谈起她的中国话时，她高兴地对我说：“我讲的是一种老年妇女的话，因为我主要是跟她们一起工作。我的语言也是宗教语言。更重要的是，凡是中国的东西我几乎都学到了——除去骂人的话而外。”

“我可以教你骂人的话，”我满有把握地对她说。她一边笑着，一边谢谢我。

她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医，可会接生，常常跟临盆孕妇的丈夫们一起给孩子顺顺当当地接生。妇女、小孩不管生什么病，也都来找她帮忙。她在中国一些穷乡僻壤生活了四十年，研习各种医学书籍，已经是一名乡村医生了。她教我怎样把普通棉花制成消毒棉花，怎样使用某种眼药。她还告诉我说有一种树上结出的象豆荚似的果实（皂角，可以洗衣物——译注），可以用来当肥皂用，等等。

她虽是基督教徒，但她在很多地方跟别的教徒不一样。她果敢、坦率，不假作正经，也不恣意狂为。当大家谈起中国一些部队的伤病员情况时，我说我常常在路边碰到他们，并征求她的意见应该怎样处理和包扎外阴部伤口。因为我曾经给一

个伤员检查，还给他消毒、包扎，可对他外阴部的伤口很难处理。我的话刚说完，一位教会的女士很不以为然地说：

“唉，你为什么非要干那个？让男的去干吧！你不应该干这种事情！”

我问她：“那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伤员是个男的，伤口又在外阴部，我们就可以置之不理吗？”

“确实”，“以色列母亲”听到我的话后大声说道，“我会跟你一样做的！为什么就不呢？伤口在什么部位我是根本不不在乎的。只要他有伤，我们就一定得帮助他。”

老太太稍有空闲或跟朋友聊天时，手里总要不不停地给孩子们编织毛袜子。教堂院子里住着一大批日军占领太原时逃出来的难民，有的还在这里生了孩子，接生婆就是“以色列母亲”。她织的这些毛袜也是为送给新生儿用的。至于这些小孩的妈妈信不信基督教，老太太并不在意。她那样笃信基督教，因此她无需经常把它挂在嘴上，说个没完。有一天上午，她正在织袜子的时候，两眼透过眼镜片看着我，跟我谈起了上帝、天堂和地狱。她谈得兴致勃勃，看得出她坚信上帝的存在就跟我坚信八路军的存在是一模一样的。

“我可不想给你灌输什么宗教，”她愉快地微笑着对我说。“我只是告诉你我信仰什么。我感到，上帝就跟我的丈夫、或在这屋子里的我的朋友们一样，都是实际存在，千真万确的。我相信有天堂，也有地狱。我相信我自己死后是会进天堂的。喔，当然，我相信上帝是出于我的诚心诚意，并非因为别人信我也信。我还认为，等到基督的最后审判日来临之时，我们会发现许多教士和许多教徒并不名副其实。”

当她这样谈着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她在天国里跟上帝谈话的情景。我是个不信教的人。可她相信基督，她有跟圣父谈话的权利。我想象她正在跟上帝谈着我那失去的灵魂。她会乞求救世主伸手于茫茫的无穷处或是地狱的烈焰之中，抓住我那迷途的灵魂的脖子，把它猛地拉回到上帝宝座前面她自己的身边。我想，她对八路军，包括朱德和毛泽东在内，也会同样这么做。然后，她会兴高采烈地向我们宣示：

“嘿，我不是老跟你们说过有上帝、有天堂吗？这回你们该相信了吧？”

事实上，她今天就乞求过上帝来保佑我。她是依靠着上帝这样做的。

“妙”，我乐呵呵地对她说。“你信赖上帝，我信赖八路军。我们八路军将尽一切努力在这里保佑你。”

她突然对我说：“行，如果日本人来到这儿，我坚决不挂日本旗，我决不背叛我的国家。”

她说“我的国家。”我相信她指的是中国。因为，除中国而外，她不知道自己还属于什么国家。她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中立。我们当然不中立！我们要依靠八路军帮助我们继续在中国生活下去，工作下去。”

我接着就对她说：“八路军肯定不会使你失望的。”

她说，“对，他们都是好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不过我想见见朱德。”

时代是起了多大的变化呀！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几天之前抵达八路军总部。他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前来，并很快要到前线，到西北地区最危险的地方去。日军派出三路纵队正向他要 去的地方——五台山——集中。五台山地区以及卡尔逊上尉准备通过的一些地方都有激烈的战斗。八路军总部不让他去冒这个风险，告诉他说八路军不能为他的生命安全负责。万一他给日军打死的话（那是可能的），日本方面肯定会造谣说是八路军打死了他这个美国人，并以此混淆视听。为此，卡尔逊上尉给美国驻华大使和八路军一式两份保证书，声明他自愿到前线去，万一他在前方被打死的话，八路军和中国政府概不负责。

我跟卡尔逊上尉一起呆了不少时间。他在八路军总部也座谈过多次，了解八路军的军事组织及其战术和训练情况。他看了从日本方面缴获的大量文件、资料，其中有日记、日军在西北各师的组织系统、地图和作战计划等。卡尔逊上尉为这些东西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从来没有哪支军队能缴获敌方这种材料。他看到许多八路军人员穿着日本军大衣，脸上轻轻地笑了一下。后来，当他得知我们截获四千件日本军大衣、几百匹军马、几百头驮骡和大量的战利品时，他则大吃一惊。

不过，使我吃惊的倒是卡尔逊上尉身为武官却竟从未研究过八路军近十年来一直在使用着的游击战术。现在，他才真正相信，游击战术对于中国各个部队来说，是一种共同的战术。八路军的教育情况，即人们所说的“政治训练”也叫他感到诧异。

他过去从未看过哪支军队会对各级官兵进行国内外形势方面的教育；战斗之后，不论胜败，都要叫他们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原因。人们告诉他八路军各个战斗单位，在打仗之前都要开会讨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战斗失败会造成什么结局。人们还告诉他八路军各个战斗单位经常在战斗之后都要开会研究，分析战况、找出错误、肯定成绩。听到这些情况介绍之后，卡尔逊非常惊讶。当他得知各个战斗单位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开会分析战况，发现错误，加以承认，同时还肯定成绩时，他的反应同样是惊叹不已。至于八路军自觉地遵守纪律这一点，就更使他目瞪口呆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已经见到了，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观察。

卡尔逊先生和我每天都要散步，走很长的一段路，骑马到很远的田野或进行几个小时的谈话。我们谈八路军，谈同目前战争有关的各种情况。我很久没有见到美国人了，所以这回碰到了卡尔逊先生，我是很高兴的。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典型的美国人的特点；他在技术方面受过很严格的训练，但在政治方面却几乎一窍不通。他出身贫苦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在军界站住脚跟。他几乎是无庸置疑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全部观点。在他看来，八路军里的教育、自觉的纪律以及它的行为是属于“理想主义。”他跟他的许许多多美国同胞一样，追求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正直的君子”，他为美国占领尼加拉瓜进行辩护——他曾是美国在尼加拉瓜占领军中的一名军官。他说他自己曾在那里做过不少好事，还对那里的腐败现象予以清除。他对那些激励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的一些基本原则毫无所闻。他对八路军的各个方面都表示赞赏；实际上，他所赞

赏的这些东西并非出自几个领袖人物的“理想”，而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当然，八路军总部不会跟卡尔逊上尉讨论这类问题的。总部只是向他提供他想知道的一些事实。倒是他跟我谈到了阶级斗争，只是因为国际局势方面要讨论的问题太多了，所以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就没有能够谈多少。

作为一个女人，我一定得向他讲一讲八路军是怎样对待妇女的。在这个问题上，哪怕是八路军的死对头也不能不承认八路军是无懈可击的。所以我问卡尔逊上尉，难道是“理想主义”才使八路军循规蹈矩的吗？不是，根本不是。主要原因是八路军来自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人、农民家庭。他们是工、农的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他们通过教育，懂得了自己作为工人、农民的子弟，就是老百姓的唯一靠山。这样的人能奸污、玩弄自己的阶级姐妹吗？她们实际上不是自己的姐妹、妻子、母亲，就是周围同志的姐妹、妻子或母亲。八路军到哪儿，都有人参加进来；因此，每个部队里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士。谁要是胆敢威逼妇女，调戏妇女，那么连他自己身边的同志都会极力反对，因为这些同志要不是这些妇女的兄弟，就是她们的儿子或丈夫。自古以来，军队从不怎么敢欺负富家女子，倒霉的总是工人、农民的妻女。因此，谁侮辱工人、农民家庭的妇女，谁就是犯了八路军的大忌。

那么，八路军官兵对性的需要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需要没有在生理方面去找出路。不过，八路军稍有空闲时间，就要进行教育或开展娱乐活动。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八路军官兵又是工作，又是娱乐，一直忙个不停。因此，卡尔逊上尉说八

路军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能自我克制，最讲自我纪律的军队。”

有一天，我把卡尔逊上尉介绍给几个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似乎非常担心，因为我和另外五、六个妇女住在八路军里面。可卡尔逊上尉却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无论哪个女人在八路军里根本不用担心他们会遭到欺负。我相信，它是一支世界上最能自我克制、最讲自我纪律的军队。我在八路军里亲眼看到的就是这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当然，卡尔逊上尉听我给他讲述八路军的情况时，并不是没有一点疑问的。有时，他还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提醒我说我跟八路军的关系太深了，难免有点当局者迷，而对它有所偏袒。对此，我回答说：

“当然，我并不是那样公正无私，也不假装成公正无私的人。但是，我不撒谎，不歪曲事实，也不颠倒黑白。我只是把亲眼看到的事物和每天的感受告诉人们而已。这是事实。至于我怎样会到八路军里来，而不到别的军队里去呢？因为我清醒地坚决地相信八路军有着崇高的奋斗目标，它是一支出色的军队。我知道，从上海到南京一直跟日军作战的其他中国军队也是非常英勇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在八路军里生活和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几天过去了，可我一直没有时间写东西。卡尔逊上尉在配有轻机枪的警卫班保护之下已经上前线去了。他带着立波作他

的翻译。他们还用几头骡子把我们所有的那些药品、棉花、绷带之类的东西也都装走了。可怜得很，他们带走的药品太有限了。棉花也没有脱过脂。大概只有一、两箱药。假如我们能多带去一些药品，那该多好啊！

卡尔逊一行要越过日军的防线前往五台山。在未到达五台山的前一段路程，他们还要穿过敌军控制区。不过八路军和游击队在那个地区非常活跃，尽管正太铁路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可我们的队伍却能够在不同的地段横穿过去。

我想跟他们一起到前线去。就这么个事情，八路军总部却闹得象开了锅似的。没有一个人不反对我去前线。知识分子警告我说到前线去有“危险”。可是，说到危险，何止我一个人，谁去前线都会有危险。说起我的力气——我比立波大。当然，他是非去不可的，因为他要担当翻译，别人替不了他。要论打枪，我会；在他们要去前线的人中间，有几个还不会打枪呢。论骑马，我可以跟男子一样。争论的结果是——大家觉得八路军总部之所以不让我去前线，是因为考虑到我是个外国人，又是妇女。于是，我反驳他们说，我可以给美国大使写个书面声明：万一我死在前方，应由日本人负责。至于说因为我是个妇女，所以不能上前线，这才是荒谬绝伦。总部对上述两个理由全部予以否定。朱德说总部是想让我留下来工作，而不要到五台山去牺牲。我问他，中国人不就是在五台山那里牺牲吗？他实实在在地回答我说：“那是没有法子的事。”

后来，任弼时让了步，他说“行，那就去吧！”朱德加上一句：“我们要派重兵保护你。”

谁知，到了这个时候，我却打起退堂鼓了。我明白因为我

要去前方，八路军就不得不从其他重要的地方抽调兵力来保卫我。我不愿那样。所以，我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我的计划。眼下，八路军和成千上万武装起来的农民正在五台山周围发动一次对中国说来是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我本来是想去那里亲自看一看的。卡尔逊上尉答应在他回来之后原原本本地给我作一番介绍。这样做当然不如我亲临其境好，不过那也是有用的。所以我就勉强答应留下来，待以后再设法到别处前线去。

卡尔逊上尉想安慰安慰我。他说，他体格强壮，他经历过二十五年军事方面的训练。还说，当然谁也不是在战场上出生的，谁都需要亲身经历战争才能适应战争环境。不过，五台山周围一带战斗非常激烈，每个人都得自己背着铺盖卷和枪支，不停地进行战斗，常常跟红军那样一天要行军二百里……。

当卡尔逊上尉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正在卡尔逊的屋子里修理他的手表。八路军里什么行业的人才都有。卡尔逊上尉的警卫跑出去找来一位会修手表的战士。这人一进屋子，就把手表打开来，从口袋里掏出几件小小的工具，很快就把表给修好，还给了主人。我也把手表给他，请他修理一下。他把我的表摆弄好之后，对我说他还会修照相机、手电筒，如果我的打字机出了毛病，他认为也能修好。我们很高兴他有这么灵巧的一双手。可他有一只眼睛瞎了，不过修表倒是不成问题的。他告诉我们说，他原来是河南的工人，参加红军已经有七年了。

好了，他们已经去五台山了。昨天，我骑马到八十里路以外的临汾去拔了一颗牙！在八路军里，我们连一件牙科器械也

没有；牙科医生更是谈不到了。所以，我只得走很远的路到教会医院去治牙。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点钟了。夜空里阴云密布，没有一点月光。最后十英里路，我全是走着回来的。我感到筋疲力尽。可见，我在总部这样住下去就吃不了苦了。

在临汾，教会医院的大夫们告诉我说日本的轰炸机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袭击了临汾和洪洞。轰炸机在临汾上空投下十颗炸弹，炸死八只羊。日本人大概把它们看作马和人了。

飞机还轰炸了没有空防的洪洞。一颗炸弹炸死了三个小孩，另一颗炸死父女二人和一只毛驴。另外有五名士兵和一些农民受伤，其中两名士兵和两个农民已于昨天死去。

轰炸的前一天，日机在临汾上空撒了传单，威胁说如果阎锡山将军在年底之前不把部队撤出山西的话，日军将继续进攻，把他的军队赶过黄河去。至于八路军呢——日本传单说，十二月三十日之前会被消灭掉！

“十二月三十日前消灭八路军！”这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吹牛说大话。他们要消灭八路军，谈何容易。他们根本无法消灭八路军。而且，形势将很快发生巨大的变化，八路军将更加壮大，要夺取许多新的地区。蒋介石将军和最高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各个部队都采用运动战，日军在沪宁地区以及铁路沿线不得不跟快速部队作战，以致它的重武器失去威力，而快速部队却可以对它进行骚扰，逐步消耗它的力量。日本军队原来打算用速决战的办法叫中国“屈膝”，可现在日本天皇却不得不警告他的战争机器说，日本军队必须准备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战争。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一队队自愿参加八路军的新战士穿过田间的小路来到我们八路军总部或者到离这里很近的第一一五师司令部。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也有些是工人。今天，警卫员跑进来喊我赶快到街上去看看一个团的新兵。他抓起我的照相机；我俩跑步赶到村里那条大路上，然后又跑到村头。那一个团正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缓缓前进。他们很多人已经穿上军装，有的仍旧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全团只有二百来枝步枪。有几个在腰间的袋子上挂着手榴弹。他们差不多全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有几个稍大些，个别的年轻一些。他们脸色黝黑，身体结实，满手老茧，一看就知道是干庄稼活的出身。他们大多数背着一条从家里带出来的棉被，有几个还带着一些零星的东西，用手绢或破布包着。队伍里打着两面旗帜，在清晨的阳光之下红艳艳的。它们是统一战线的旗帜——国民党的白日满地红……。

从村外回来，我看到一个场面，这只有在八路军里才能看得到。一名军官正走在街头，有个战士迎面走过来。战士在别的部队就是列兵。“列兵”停住脚步，向那位军官行了一个礼。军官还了礼。然后，两人转过身子，搭着对方的肩膀，边聊天边向前走着。他们低着头，看起来聊得相当亲热、愉快。他们笑声朗朗，其中有一个话说得象连珠炮似的。

当我正在写着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那两名警卫正坐在一条长板凳上。他们俩相互搭着肩，正谈论着法西斯主义问题。他们刚从学习班回来，学的功课一定是有关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他们在谈话中，很喜欢骂人，动不动就把法西斯敌人的老娘大骂一通。他们谈到那个帮助日本人干事的意大利天主教牧师。牧师住在东二谷（音译），离太原很近。他多次到太原散布谣言，说什么有一个叫做吴阳贵的八路军团长到他的教堂索取十万元钱和一万双鞋子。牧师还对人们散布说，“八路军是土匪，日军来是要消灭土匪，给中国带来和平。”

“妈的狗屁！”警卫员们骂着。

他们还对我讲过许多给日本人帮凶的意大利人的事情。他们说，意大利飞机驾驶员和教练在南京的时候，把长江口到南昌的整个地区都拍了照，拼接成镶嵌地图。这份地图后来不知去向。可是在被中国飞行员打落的日本飞行员手中却发现了这份地图的复制品。一切军事、政治机构，外国使馆和所有的大、中、小学校在地图上都明显地标出，以作为袭击的目标。他们对我说，意大利人在长江流域这么干，德国飞行员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是这么干。他们绷起脸就不再往下讲了，跟刚才一样又顺口骂起法西斯主义“妈的！”来了……

八、新的一年开始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新的一年已经来临——它对中国来说是困难的一年。各条战线都有消息传来。几天之前，天津落入敌手，杭州沦陷。日本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为期三、四个月的攻势，拿下广州、拿下汉、广铁路、拿下汉口和平汉铁路。我们能收到汉口来的英文报纸；从上海、美国寄来的一些过期报纸、杂志也收到了。汉口来的报纸都晚了一个星期。我们从收音机里只能听到一些最重要的新闻标题。

昨天晚上，我带上汉口、上海的报纸、小开本的十月号《纽约》杂志、《今日中国》到总部去给朱德和其他人介绍最新的情况。跟往常一样，朱德拿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这里面他记着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重大事件。翻译和我把报纸和杂志的内容讲出来，朱德则记下那些重要的东西。看着他写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他对于国际上声援中国的运动情况

听得特别仔细，几乎一字不漏。他记下了十月一日在纽约墨迪逊广场公园召开的声援中国的群众大会的种种细节，以及大会筹集资金，为中国购买药品、衣服，向中国赠送资金等方面的情况。纽约电台关于中国的广播以及美国、法国、英国和印度抵制日货的运动等都可以从他的笔记本里找到——这些材料以后会出现在八路军的出版物中或被引用来向军队和群众作报告。比较长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则翻译成中文，以便在部队教育中全文加以引用。

朱德还记下了有关日本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每一个重要的片断。他把报上发表的日本天皇告诫其军方和人民，说对华战争将长期继续下去的讲话也给抄了下来。朱德还让我们把《今日中国》所刊登的一篇关于日本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的具体材料的长文章全文翻译出来交给他。他对书评也听得很有兴趣，还能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原书。他详细地询问我们刊登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系列论述几年前中国苏维埃情况的文章，还问到了《太平洋问题》季刊上的各种文章。他对日本人打沉长江里的美国、英国的炮舰后，美、英方面的反应则特别发生兴趣。我们谈到了刊登在上海发行的一家英国日报上的文章。文章劝告南京政府听墨索里尼的话，应与日本媾和。朱德听后，脸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纹，充满着憎恶的表情。文章说什么，既然中国人已经对日本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跟日本人讲和，而无需有什么屈辱之感等等。

任何有关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点滴消息都必须翻译成中文。美国国会议员的讲话，不论是亲日的，还是反日的，他都

要专心地听一听。总部的其他人还跟他研究这些讲话的含义。

我的新年除夕之夜就是在八路军总部里这样度过的。

今天，从早晨到晚上，我干了不少的事情——给很多人写信，说明八路军需要药品的情况；完成了几篇文章，傍晚，我又到敌工部参加欢送舒群的晚会。舒群即将到西安去，可能再也不回来了。总部里无论谁走，都要另外做些饭菜，表示欢送。过元旦时，还邀请了整个村上的老乡吃饭。

在欢送舒群的晚宴上，敌工部的人员准备了一杯白干。白干看上去不怎么样，可酒劲跟伏特加不相上下。我们十来个人喝了大约半品脱的白干。八路军里平时从来不喝酒，所以这半品脱白干就不算少了。没过多一会儿，酒劲上来，大伙就嘻笑欢闹开了。中国人喝酒时常常要做些游戏借以助兴，输者罚呷一口。起初，大家高声猜拳；其中有一、两个输了，比别人多喝了些酒。

我们接着玩另一种游戏。我们拿出一根筷子，在它的一头卷上薄纸条，把纸条两端再合在一起，就做成了象指针一样的东西。然后，玩者蒙上双眼，让他合掌搓这根筷子。他不停地搓，筷子迅速地在他两手掌之间转动。突然，有人喊一声“停”！指针对着谁，谁就该喝酒。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搓筷子的人睁眼一看，指针正好指着他自己。我们有了一点白干，玩这种游戏，确实非常有趣，逗得大伙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吃完饭，白干的劲头早已消失，我们也恢复了常态。从政治部来了六、七个人，有的坐到炕上，整个屋子挤得象是个沙丁鱼罐头。我们抽起了从当地能买到的廉价香烟，屋子里气氛则更加活跃。这些香烟的烟丝就象干草似的，刚吸完一口，它

就熄灭。我们还是用刚才那根筷子作指针，轮流着唱歌。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大家用四种语言唱了很多很多支歌曲。主人是敌工部人员，都会讲日语。敌工部部长来自台湾，所以既能唱日本歌、中国歌，也能唱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的歌曲。政治部有一位在法国学习过几年，他会唱法国古典歌曲和大革命时代的歌曲。这些歌曲他学得很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唱得这么美妙的法国歌剧咏叹调。顿时，中国西北落后农村中的一间黑暗窄小的屋子里充满了法语歌声，既有情歌，也有悲调。

有几位则引吭高唱中国的民族革命歌曲。我们四人用中文、日文、法文、英文四种语言合唱了《国际歌》。唱完后，我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接着，我和其他二人用法文、英文和中文合唱《马赛曲》。我还唱了两支古老的黑人圣歌和一支现代美国南方的佃农歌曲。我们还听了几首日本情歌、民歌和一首海盗号子！一位中国人接着表演了一段明朝古戏清唱，另一位则哼了一支流浪者的小曲。我们大家合唱了几年前的中国红军歌曲和目前的民族解放歌曲。

我们在这里唱歌，连队的演剧小组正在村子另一个地方给老乡们演戏。我们没有去看戏，因为那里已经是挤得水泄不通了。彭德怀在演剧的场地上给大家讲了话。他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在晋北、冀西、察哈尔南部、绥远直至晋东的战斗形势。他告诉大家，战争很快将在晋南地区展开，战争的胜负既取决于军队，也取决于每个男女老少。以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里，如果战争不停的话，那么八路军和老百姓必须钢铁般地紧密结合在一起。老百姓和军队联合起来，老百姓组织起来，中国就能够取得胜利。我的一位警卫员到过会场，是他事后向我转述

上面这番讲话的。

今晚，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利用这个时间跟政治部来的一个人交流了情况。他跟其他二十个工作人员刚刚由晋西和黄河地区回来。他们在那里组织群众，建立游击队。第一步，他们让农民参加农民协会。然后，从农民协会中挑选青年人参加武装的游击队组织。但是，工作非常难做。那个地区经济落后，群众都是过着穷日子。人们的民族观念很弱，谁也不愿意离开家去参军打仗。他们担心参加游击队以后，会被派到前线去。给他们做工作的人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没有反对的表示；可是，最后，他们总要说：“咱家还有老母亲和老父亲呀，”“咱有三个娃娃呀，”或者“地里的活还要我去干呢。”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的村子，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一部分青年人参加了游击队。不过，他们人数不多。所有的青年人倒都乐意加入农会。他们参加农会，也是为了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日子艰难，劳役杂税沉重，每年得把收成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作地租交给地主。因此，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同时又能使一切愿意抗日的各阶级维护统一战线。在日军这样不断占领中国领土、侵吞中国资源的形势下，能够减轻群众的赋税吗？共产党认为，有钱人不仅应该免除群众的苛捐杂税，还必须把自己的财富捐献给政府，用以保卫国家的自由。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到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此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今后谁都必须贡献出他们的资产、作出他们的努力。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这些基本社会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日本人还会继续在中国打胜仗。因为，

目前还没有任何力量会促使劳苦大众奋起为国家去战斗。这个国家眼下还是属于大地主和官僚的。穷苦百姓似乎还认为大地主和官僚是会为国家出力的。

今晚，我搞清楚了昨天来到此地的那一团志愿参加八路军的新兵是政治部从汾阳招来到西北去的。他们全当过游击队员，大都是庄稼汉，也有一些是工人。汾阳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地区，在那里要组织游击队并不太困难。现在，这一团新兵住在离我们这里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接受训练。

新年就这么过去了。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

日本在正太铁路沿线各地增派了一万兵力。在太原，日本早已有了增援部队。日本计划发动一场新的攻势，我们已为此作好准备。近期之内，八路军各方指挥员将召开会议，就一系列问题作出决定。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沿海的主要城市。因此，中国各个部队将要进行整编；我认为还要进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八路军的运动战术正在其他部队中加以推广，目前整个沿海地区也都在运用这个战术。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巨大的变化正在中国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民族统一战线正更加巩固起来。许多八路军指挥员已经到其它部队，对他们进行游击战术的训练。很多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人物已经到达新的全国中心——汉口。八路军原来在延安出版的那份日报也将在汉

口发行。

在山西，日本人打算从整个晋东地区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晋东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大公路，日本人想从这两条公路上向前推进，同时再派出一支队伍沿铁路线直接进入山西省中部。他们的这种行动有好几个目的——试图清除所有可能破坏平汉铁路的中国军队，并对中国军队搞一次大规模的迂回包围。他们认为日军能够从晋东地区南下，直抵黄河，从侧翼打击整个中国守军，并把他们赶过黄河去。当然，这只是日本的如意算盘，未必就能够变为现实。此外，日本人还采取各种“政治”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汉奸。他们已经把一百多个汉奸派到了太原的南边——其中有二十七女的。

今后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山西省将会发生非常残酷的战斗；我们已经得到通知说八路军总部很快将实行经常性的转移。战地服务团准备到别的省份去。民族斗争在逐步扩大着。

在离开山西的火车上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

昨天，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找我谈话：

“我们希望你能到汉口去。你在那里可以一个人做许多这样那样的事情。”

我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回答了他们。语言虽然不一样，但意思却是相同的。我说：

“恳求你们别叫我离开，别叫我离开，而不让我跟随你们。”

不管你们到哪儿，我也要去；不管你们住哪儿，我也住哪儿。你们的人就是我的人，你们的上帝也就是我的上帝。

“你们死在哪儿，我也死在哪儿，埋葬在哪儿……。”

对我的话，他们回答说：

“我们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一场新的战役正在开始。我们要不停地东奔西跑，一刻也无法休息。我们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弄不好你还有可能被打死。我们不想让你为我们而牺牲，我们倒希望你生活下去，继续工作。”

“为什么要跟我谈起死的危险呢？你们自己不也是整天面对死亡而在生活下去的吗？就让我也这么生活下去吧。我并不死，只要能不死，我就不要死。但是，假如我非死不可的话——这是早晚的事情——那就让我死在这儿。如果我去汉口，死的危险在那里也不见得比这里要小。汉口会叫我在精神上死去。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看到城市里都是乌烟瘴气的污秽之地，这使我心里充满痛苦因而体格不健。可是，来到你们的部队之后，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这是因为我相信八路军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因为你们的军队灵魂纯洁——请原谅我使用这个字眼——目的明确。在八路军里度过的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过的幸福的日子。只有在八路军里，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死去。”

他们耐心地、亲切地、体贴地规劝着我。他们态度越来越是亲切，我的心也就慢慢地软下来了；后来我哭了。“走吧，”他们说，“以后再回来，用不了很长时间的。”

“既然你们把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那我也只好走了。”

“再多呆上几天吧；我们要把附近的部队召来欢送你。我们八路军喜欢你。”

“别再叫我更难过了吧。我要走心里已经够难受了。临走之前要再看着八路军战士，那我感情上会更加受不了。”

说完，我走出门去，穿过一片片冬小麦田。此刻，我头脑里出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就象在梦境中漫游。我不停地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场梦啊。不用多久，我就要醒过来了。”此刻，我想到了汉口，想到了其它城市，心中一阵不寒而慄。

我漫无目的地向前走，来到一个村落。这里一千名八路军新战士正在接受训练。我心里极度痛苦，转过身子就往回走去，到了一座坟墓旁边，我躺下歇了一会。接着，起身继续向前走，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

我回到村里时已是暮色苍茫。我深深地沉浸在痛苦之中，警卫员郭生华和王世富走进了门，我也没有觉察到。我对他们说，“别管我。”可他们站在那里并不走开。于是，我又重新在夜色中走出了门。他俩跟在我的后面。我转过身来，看见了郭生华，生气地命令他回去。可他仍然跟着我。我第二次再命令他回去，他这才慢慢地走到后头。我想这可就我一个人了；但是没走多久，我听到后边有了脚步声，一回过头去就看到另一个警卫员王世富。我叫他也回去，可他不听。我发了火但没有用。他怪可怜地站在那里央求我说：

“回去吧！别再走远了！我不能一个人回去。我若是一个人回去的话，总司令准得批评我。”

经他这么一说，我返身跟着他一起回去了。两个警卫和我

三个人站在屋里。我心里非常生气。王世富低着头，在那积满灰尘的桌面上画小人头。郭生华开腔道：

“我们跟你已经很长时间，有好几个月了。王世富跟你已经有一年了。我们现在不想离开你了。就让我们跟你走吧，上哪儿都行。你对我们好，咱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的火气消了。他们说：“恳求你别叫我们走开。”我的一部分痛苦也跟着消了。

翻译和郭生华去请示朱德：警卫员们是否跟我一起走。王世富和我等在屋里。他一声不吭，愁容满面。

翻译回来了，告诉我们说：“总司令说郭生华可以走。我们现在经费很少，所以两名警卫员一起走，旅费就有困难。”

王世富呆呆地站了一分钟，接着就悄悄地离开了这黑洞洞的大厅，回到他自己的屋里去了。我从床上可以看见他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上，双手把脸捂起来。这个孩子就象是我的儿子似的。有一次他病得非常厉害，是我照料他，给他治病，把身子养好的。我几次重病，也都是他照料我的。

我从床上起来，跟郭生华一起走去，来到王世富的床边。

我说：“朱德同志认为郭生华可以走，那是因为郭生华当时正好在旁边。如果你们俩人要求改变这一决定的话，我可以写个条子。”

他们都不作声。我就问郭生华，“你有意见吗？”

“我希望我们俩人都能走，你到哪儿，我也到哪儿，”郭生华这样回答我。

可王世富还是一言不发。虽然我反复问他，也没有用。

郭生华对我说：“那由你决定吧。”

听到此话，我的心头就沉重得象压上铅块似的，因为我喜爱王世富，就好象我是他的母亲一样；但是，我也喜欢郭生华。他这个人性格坚强，办事牢靠。我心里反复寻思：“我这是在做一个恶梦啊！很快，我将苏醒过来，发现这全是梦。”

翻译是位刚从“外头”来的学生。他不理解怎么会出问题的。他对我说，“那还不简单，你只要带上一个警卫就行了。”

最后，我说：“郭同志，你讲的江西话，我很难听懂。可我能听懂王世富的话，因为他讲的是四川话。我觉得最好还是让他跟我一起走。”

这是实话——可也不全是实话。我之所以挑选王世富跟我走，是因为他比起郭生华来要年幼些、弱小些、天真些。

翻译向我宣布说：“朱德同志说，你可不能把枪带走。”

我在注意着王世富对此有什么反应。警卫员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枪，白天背在肩上，晚上枕在头下，一刻也不离开枪。他们跟其他军队里的勤务员可不一样。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后才当警卫员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管首长的生活起居的。

听完翻译的话之后，王世富就站起来，摘下那装子弹夹的黑色皮带和那枝毛瑟枪，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交给了郭生华。

突然，我感到一阵眩晕，两腿发软，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躺下去，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还没有合眼。随后，我们全都起床，到洪洞去搭火车。郭生华过来对我说：“我也要到洪洞去，我到那里跟你告别。”

凌晨四点钟，我们在四个骑兵的护送之下出发了。我那匹心爱的云南矮种马走在我的身边，直往我身上靠，想吃点东西。

天空没有月亮，星星向寒冷的大地闪着微弱的光。

我好象是在向这块土地告别似的。我们穿过了一垅垅的冬小麦田和一片片光秃秃的白桦树林。我向前走着，脚下象是发出“再见！再见！再见！”的声音。我精神苦闷，心里难过。

现在，我们正乘一辆红十字会的火车离开山西。在临汾，火车停了一天。借此机会，我到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看了看，打听他们需要些什么药物。整个列车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医生们负责，我了解到现在车上有八名医生，照料、治疗伤病人员——这比以前已经有改进了。天气非常寒冷，可车厢全部没有暖气，灯也不开。我们坐的那节车厢运送的是轻伤病号。

贺龙第一二〇师的一个女干部跟我们乘坐同一列车。她从西北下来。她在那里做“地方工作”，组织民众，进行抗日。她不知道山西的西北地区究竟有多少游击队。我问：“一万吗？”她答道：“远远不止。”那个地区的妇女很落后；不过她领导的小队在一些地方还能设法把妇女们组成各种小组，帮助游击队和部队缝补、浆洗、编织。这位女干部现在生病，要去西安的医院治病。她身上那套蓝颜色的制服已经褪成了土灰色，随身带着一个不大的灰布包。

这位女干部、我的警卫员和我三个人跟一名受轻伤的战士聊了起来。我们站在一扇开着的车窗口，落日的余辉正好洒在同志们的脸上。他们都很年轻、机智、沉着；谈话完全围绕着中国的现状和前途。这位受伤的战士属第四十五军。他是河南人，在长城要塞之一雁门关附近打仗。

跟我同坐一列火车的还有一位“井冈山红军战士”。普通的老百姓不懂得那是怎么回事，可八路军就明白他可是一位老红军啊。中国南方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的井冈山是中国红军的第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是“五个苏维埃区”的中心。井冈山的红军歌曲美好动听；它们唱出了那山峦的雄姿，令人神往。

这位同志九年前在井冈山参加了农民武装，很快成了红军。我问他，这九年里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滋滋地从牙缝里往外呼出。

“我可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打的仗太多了，我哪里记得住。”

“那你身上有多少处伤？”

“六处，这事我能答上来！”

我又问他现在八路军里还剩多少井冈山年代的人。他说，不多了。战争中打死了那么多，活下来的几乎全都担任了领导职务。他自己就是一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在旅途中 山西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

列车缓缓地向前开动，不紧不慢，悠然自得。昨天深夜大约一点钟的时候，火车停了下来，直到今天下午三点才继续前行——整整等了十四个小时。列车每到一站都要停车；然后，火车头甩开车厢，自个儿在轨道上好象是欢快地跑上一阵。我们弄不懂火车头这么跑的目的何在。

今天早晨，我们走出车厢，在下面跑了一阵，想以此来暖和暖和身子。我们用的水都是火车头里的废水。我用毛巾接在蒸气机排出来的热水下面，就这样洗了洗脸。我们花钱买了些开水和一些“烧饼”当作早饭。

晚上冷得厉害，车厢里只有人的身体还能散发点热气。大家站在那里，整夜不停地跺着脚，以此取暖。有四个人就站在我座位边的走道里，整个晚上都在谈论政治、军事问题。其中一个山西军队里的下级军官，另外两个看起来象是其它部队里的小军官，还有一个穿着军装，可外面套着一件老百姓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他们把国际联盟批了一顿，摆了摆美国、英国的政局，又特别详细地谈论了苏俄的情况。他们还不断地提到日本轰炸机和它们给中国各地城乡带来的灾难。他们说，八路军有办法对付日本人——游击战、运动战……中国就得这么干。

今天一清早，有个乘务员模样的人走过来推了一下我的肩头——我想他是出于好奇吧。他问我是什么人，打哪儿来等等，向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

我困顿地回答他说：“八路军记者——没有问题吧？”

“好！好！”他惊讶地大声叫着，面带笑容地走开了。

我们正越来越接近黄河边上的风陵渡。再过一会，我们就可以渡过黄河到达潼关，然后向汉口前进了。一张山西的小报上说，三十架日本飞机昨天空袭汉口，炸死了许多工人。

潼 关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

昨天晚上，我们抵达风陵渡。风陵渡和潼关这古老的战略要塞位于黄河的两岸，遥遥相望。风陵渡城里到处是军人和难民。我们还算幸运，找到了两间很小的屋子——它们在一个窑洞里。其中一间里面没有别的，光有炕，上面刚好可以挤下三个人。我们一行五人，所以另外两人就睡在隔壁一间小屋的木板床上。我们都是八路军——两个女的和三个男的。我们在火车冷冰冰的又窄又硬的座位上凑合了整整一个晚上，现在要是能够伸开腿脚睡个觉，那算是一种十足的享受了。

今天早晨，我们在一个很小的用土坯围起来的露天摊子上吃饺子当作早饭。之后，大家背起行李卷，向黄河出发，准备渡过黄河。河面不宽，泥沙淤积的浅滩很干，有的冻得梆硬，但河水仍很湍急，上面漂浮着转动着的冰排。岸边站着几千名准备过河的军人。一连连、一营营的士兵带着他们全部装备，枪支架在旁边，等候分批上船。他们把驮东西的牲畜从半冻不冻的河边赶往河中的浅滩上，那里停靠着许多渡船。岸上还码着一堆堆的后勤物资。小贩们忙着叫卖各种吃食，他们的挑子上喷发出一团团的热雾，飘散在这阴冷的空气里。

人们要上船，都得走过一条条的跳板。这些跳板也是零零碎碎地架在那临时打在水中的木桩上。跳板很窄，一直连接到比跳板还要狭窄的船舷上。背着沉重物资的军人和伤病员都得从船舷上通过。在上渡船之前，他们都左摇右晃，小心翼翼地走完四、五条这种跳板。轻伤病号由同伴们搀扶着，在跳板上面一拐一踉地前进，重病号则躺在晃动的帆布担架上由别人抬

着走上等在河中的红十字会的渡船。

我们等了六个多小时之后，才得以上船。等船的时候，我先在人群里转了一会；很快，我就全力以赴，忙着去帮助那一批批的伤员了。他们躺在网状或布制担架上面。担架直接停放在冰冷的地面上，等待几个小时之后才能抬上有救护设施的渡船。有的伤员身上还穿着夏季的单军装。还有的既没有盖毯子，也没有盖大衣，他们连最普通的棉制服都没有。他们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低声呻吟。有两个除了伤口疼痛以外，又得了肺炎。他们的担架边沿上粘满了一片片咳出来的粘痰。其中一个还处于半昏迷状态。

警卫员和我花了点时间，给伤病员们送些稀粥、开水。他们还没有吃过早饭呢。抬担架的人跟着我们转来转去，可他们要帮助战友，手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因此，我们买了些吃的之后，他们就帮着拿，然后喂给伤员。他们还到每个伤员的担架前走走看看，帮那些有大衣的伤员把大衣盖好，工作非常仔细认真。

当伤病员们被送上几只有医疗设备的渡船时，人们已通知我们一行上另外一条船。我看到伤病员们被安顿在渡船的甲板下面，以避开那阵阵冷风。摇摇晃晃的跳板上走着一长串的伤员，有的躺在担架里，有的由战友半扶着。这些战友对待伤病员真有那种当母亲似的菩萨心肠。伤员走不动了，他们就用胳膊把他们抱起来，让他们在自己的肩膀和手臂上休息。这确实是一个动人的场面——穷人帮助穷人，身体好的帮助身体差的，战友帮助战友，彼此相互体贴，互相友爱。

另外一个场面也不时地引起我的注意。有头高大的骡子的

一条前腿给打断了。那条快要断下来的腿看起来就象一截木头或一块冰似的，只留下一小条皮肉还跟躯体连在一起。这牲口的半边身子浸在冰冷的黄河里，另半边还在泥岸上。它快要死了，静静地把头从地上抬起来，放下去，又抬起来，又放下去，一直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它就在人们通过的跳板下面一点一点地逐渐死去。然而，谁也没有对它的头部开一枪，来结束它的痛苦。大家都看到了它垂死的惨状。但是，人类的痛苦是这么巨大，所以没有人会停下来，也没有人会为此发出一颗子弹。

我们是早晨七点钟到黄河边的，我们的渡船旋转着渡过汹涌的黄河时已是下午两点了。我们沿着土坡向上爬，就望见潼关四周古老、雄伟的城墙。潼关依山筑城，是通往西北的隘口。这时候，我用照相机拍摄了脚下滚滚的黄河，山顶古老的城墙，还有那城墙边上一排新坟。到处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在做好各种准备，以全力固守潼关。

城墙脚下那一排新坟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消失。这大概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士兵阵亡之后，一般都是集体埋葬起来，并不立个墓碑的原故。可是在这里，每个牺牲的战士都有一小块葬身之地，坟头上还树着木牌，写明死者的姓名，生日，阵亡日期——还写着“民族英雄”四个大字。一名普通的士兵，最后为国捐躯，他就是一位“民族英雄。”

我们在潼关车站候车的时候，一名铁路宪兵检查了我的护照和军事通行证，看了看我周围的人以后对我说，我不能跟他们一起等在这儿。于是，他把我带到一间陈设得很象样子的特别屋子里，让我远远地脱离那些粗俗的老百姓！能到这样的屋子

里来我很高兴，里面还是暖洋洋的；但是，仅仅是为了要把我同中国老百姓分开才让我进到这屋里来，却实在使得我十分不快。

在车站月台上，我们看到另一个铁路宪兵正在那里踱来踱去。当我们走过去想打听一下有关火车运行情况时，他正好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他个子很高，三十四、五岁的光景，穿一身黑色的制服，背着一枝上着刺刀的步枪。他看起来人很聪明，态度友好。我们站在那里，相互笑了笑。

“你们是八路军？”他问道。

我们说是的。

“我听说，八路军打仗可厉害。”

“没错。非常非常厉害。”

“他们特别勇敢吧？对老百姓也特别好？”

我告诉他这是真的，八路军打仗很勇敢，对老百姓很好。我们站在那里，相互微笑着，心里都很高兴。我们跟他又聊了一会，然后，就一道走进了候车室。我们笑着，站在一起，简直不想分手了。

到汉口之前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

昨天晚上，我们在陇海线上的郑州站换车。在快到郑州之前，我们在各个车站的站台上看到许多标语。一条写得很醒目的口号是：“万众一心，奋战到底。”华北和西北是有不少的部队，可郑州附近简直到处都可以看到军人。有四分之三的人似

乎都已穿上了军装。

郑州车站上有很多难民。他们把全部家当——包括草耙、饭碗等都装在手推车上。难民中有一些男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在昏暗之中，他们或坐或站，许多人一动也不动。我看到有两个男的站在那里，就跟两尊塑像那样安静、呆板。他们身上披着长长的白被子。他们这个样子使我想起了美国的印第安人。就在他们的脚边和整个站台上，到处蜷缩着一堆堆身上裹着被子的妇女和小孩。但是，其中有许多人连被子也没有。

我们向难民们打听一下。他们全都是河北西部某处的农民。八路军、游击队在他们家乡那一带跟前来扫荡的日军纵队作战。我们还跟一位瘦骨嶙峋，性格倔强的老妈妈进行了一番令人难以忘怀的对话。这位老人身上没穿御寒衣，也没裹被子。她布满皱纹的皮肤跟羊皮纸一样，说话的声音又沙又哑。

“游击队正跟日本人在冀西打仗吧？”

“没错！”她用了象上冻的河水那种冷冰冰的声音回答我们。

“老乡们可遭大罪了？”

“没错！罪遭大了！”她表情严酷，似乎再要多说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废话。

“您老多大年纪啦？”

“七十二。”

“您老是怎么从冀西到这儿的？”

“走来的——打十一月底开始。”

确实，她的言语、她的声音和她那一动也不动的身影让人

感到她具有一种无法描绘的倔强而严峻的性格。到了七十二岁的古稀之年，她还得上北方的冰天雪地里徘徊着。苦难剥夺了她的一切，甚至使她连话也不想多说了。

我们在一个裹着被子的妇人跟前停住了脚步。她胸前的被子里面有婴儿在哇哇地哭号；被子边上坐着一个缩作一团的孩子，看上去还不到两岁。我弯下身子，把这小女孩抱到被子里面，还给她裹了裹。这小家伙仰起脸来，冲我们笑了，笑得跟大人一样，充满着感谢之意。她的小脸蛋很嫩，虽然已经冻得够呛，可一声也没有吭。

“今天我们还没有吃东西，就喝了点热水，”一个逃难的农妇对我们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吃，请你们给我们点钱吧。

我只带了六块钱。凭我们的军事通行证是否能搭上去汉口的快车还很难说。万一要我们自己花钱买票的话，这六块钱是不够的，我还得向比我稍微富些的同伴借些钱。所以，我不能给他钱。六块钱——要分给几百个人！真是杯水车薪。就这样，我象个吝啬鬼似的，揣着这六块钱，向难民们说明为什么我没有东西给他们。

这些天来，在中国要想挤进三等客车就需要有周密的计划。

“让咱们筹划一下咱们的行动吧，”我们当中有人带头谈起来了。“火车一来，咱们就把王世富举到肩上，让他从窗口爬进去。然后，咱们再把行李交给他。你帮我从窗口钻进去，你自己到最后再从车厢头上的门口上车。”

火车来了，车窗比我们的头顶还要高。每节车厢的两头挤满了你推我撞，相互不让的人群。要挤进这样争先恐后的人

群，搞不好就可能被挤伤。所以，我们就把人举到肩上，把他们从窗口塞进去；我自己则等到最后才从车厢头上的门里进车厢。车厢里就跟战场一样，乘客人数比座位数要多三、四倍。走道被乘客、包袱、箱子、盒子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得从堆得象一座小山似的行李上面爬过去，可这些东西的主人对此也并不在意。车厢两侧长长的行李架上早已放满了东西——有的东西上面还直挺挺地躺着人。

就在这人群之中，由当兵的开道，走进来一户有钱的地主家。这一家子大约有五、六个女的，七、八个小孩，正好都坐在我们位子的对面。那个地主看起来就象个跟皇后坐在一起的土耳其皇帝。当兵的把地主家的行李搬了过来，多得不得了。他们把行李架上别人的东西全都给推到一边或给挪到过道里，把地主家的用品、卧具、衣服、筐子、包裹、箱子等十几件东西一一放了上去，过道空间有三分之一被这些东西堆得满满的。所有的空地堆完之后，地主就吩咐当兵的把剩下的其他东西塞到乘客的座位中间去。接着，他们连招呼也不打，就开始在我的脚上堆起了包裹。至于我们的脚往哪儿搁，他们根本不管。

我站起身来，提起放在我脚上的包裹，使劲地往走道那边摔过去，落到了地主婆娘们的脚上。真是岂有此理！这下子把她们搞得惊呆了，因为她们从来也没有料到竟会有这等事情！可是，这并没有使这家人有所收敛，他们回过头把气都撒在其他乘客的身上。乘客们却都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就好象命中注定要遭受一场黄河水灾似的。

地主家正在往后方撤退。但是等将来战争结束，穷苦的农民和士兵把日本人打败之后，他们就会慢慢地转回来，想法收回

他们的田地——还会想法让农民把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谷子交给他们。

坐在这直挺挺而又狭窄的木板位子上谁都无法入睡。车厢里的空气有时候叫人感到恶心。所以我就干脆观察着旁边的乘客，听听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在我们面前的高高的位子靠背后坐着几个军人，正在那里聊天。其中有一个是下级军官。他们谈的是中国政府由汉口撤往四川的问题，以及这件事应该如何安排，等等。

警卫员对我说：“他们光议论撤退，也太悲观了。他们为啥只谈撤退，而不谈前进呢？”

我听到我背后有人用亲切的声音在说话。我站起身子，回过头去看原来是一个男人正抱着自己的孩子，跟他在说话呢。这孩子刚刚牙牙学语。他爸爸教他的第一句话是：

“打倒日本人！”

孩子学着用细小的声音重复着：“打倒日本人！”

“打倒汉奸！”

“打倒汉奸！”孩子的嗓音听起来很尖。

再往前，我看到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这位母亲真狠。她不断地大声责骂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整个车厢都听得到她的骂声。她有一副冷酷得发青的面孔；我看到她照着孩子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三、四下。她打得太狠了，所以坐在过道对面的一个男乘客伸手把小孩抱了起来。可这位凶狠的母亲追着不放，还直往小孩的脑袋上揍。当男乘客用胳膊护着孩子时，她就打那支胳膊。小家伙哭得非常伤心。

这是我第一回在中国见到有这样凶狠的母亲。在中国，做

妈妈的对子女一般都非常温柔，有的甚至还近于溺爱。所以，我想这个女人大概神经不正常，要不然她也许是个后娘。

在我们背后的另外一个间隔里，有位中国妇女开始向周围的乘客传布基督教。她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世界的末日快要到了；当前这场战争就是苗头。可是，周围的人并不以为然。于是，她就搬出人死后要下地狱、遭烈焰等等那一套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这些话也未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她又把话转到洋人身上，说什么洋人不让中国人信基督啦，什么洋人千方百计阻挠中国老百姓领悟基督教义的真谛啦，等等。她说到这里，我发现有几个男的笑了笑，打个呵欠，到一边缩起身子，打起瞌睡来。这位信女的兴致被旁人那么冷落了一番，也就只好闭上嘴巴，不再往下说了。

中国人是不大热心信仰宗教的。只有到了水灾、饥荒的年头，给那些“诚心相信老天爷”的人们赈济粮以后，再向他们布道传教，才有可能看到成效。今天车上的信女在战争年头向同胞们宣扬基督，可又不拿出救济粮之类的东西来。因此，这些能坐得起三等车的同胞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可能理会她那一套的。

今天午夜，我们抵达汉口。拉黄包车的苦力为了多赚些钱，把我们拉在街上转了两个半小时。他们知道我是生人，不认得汉口的街道。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来到八路军汉口办事处。这里原来是日本租界，后来由中国人收回。我们走进一间空房间，在地板上铺上褥子、被子，就睡觉了。

汉 口

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

今天早晨，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使馆报告了武官卡尔逊上尉赴晋北前线的情况。美国大使约翰逊先生没有穿西装而穿一件皮茄克接见我。因此，他向我表示歉意。我也请他原谅，因为我身上穿的是军装，下面还打着护腿，一件本来非常漂亮的大衣也显得又破又脏。跟大使一起参加我们谈话的还有停泊在汉口附近长江上的美国舰队司令佩克生、一位领事官员和一位武官。

约翰逊先生询问了有关八路军的情况以及八路军采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情况。我们谈到了八路军抓到的日军俘虏情况。我们还介绍了八路军敌工部的工作，对日本俘虏的优待和日本士兵的精神状态。我说，有些日本战俘是非常正直的人，并不愿意打仗。我还叙述了从阵亡的日本军人口袋里或日本战俘那里缴获的日记内容。约翰逊先生听了很感兴趣。

约翰逊先生接着向我介绍了中国军队在淞沪附近抗击日军的英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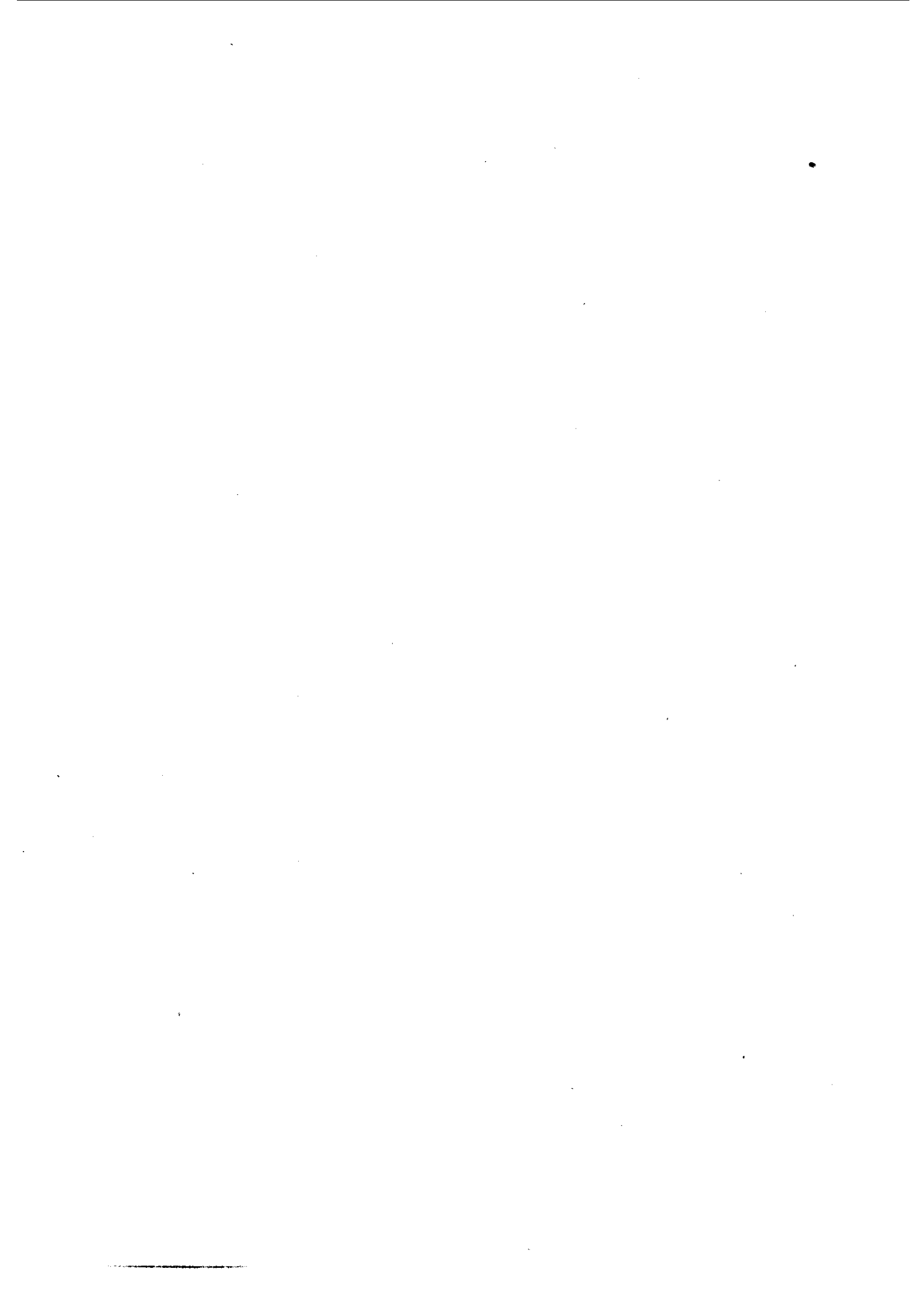
一个上午就这样在谈论八路军的情况中过去了。我们只剩下很少的时间来探讨中国的一般形势。之后，我询问大使，美国政府对日军击沉班乃岛号军舰采取过什么措施。他说，这件事已经解决，日本人满足了美国方面的条件。

从美国驻华使馆出来，我在汉口各处转了转，希望能找到

国际红十字会，以便为八路军、游击队申请些药物。可是我没有找到国际红十字会，却来到了中华内地传教团。我向 他们 出示一些在山西传教的朋友为我写的介绍信。传教团的刘易斯先生马上就陪我上国际红十字会。不过，红十字会星期天不办公，所以我们又返回来喝茶。在这里，我碰到了二、三十位传教士，并给他们介绍了八路军的情况和所需要的药品。这些传教士很多都热心于救死扶伤的工作。他们全都是中国的朋友，深切地同情中国军、民的斗争。有一位上了年纪的韦布小姐告诉我，她是从芜湖逃到这里的。紧接着，她很肯定地对我说，她可不是因为害怕日本人的飞机才撤离芜湖的。她说，芜湖一带到处都在打仗，中国老百姓也开始撤离芜湖，她不愿意别人误会她是因为害怕才离开那里的。“我要跟中国人在一起，”她说。“我们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现在正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至于芜湖那边，中国人自己都已跑了，所以，我也就不必留在那里了。”

的确，现在正是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在汉口这里我会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中国人的命运



目 录

- 一、 儿子反抗老子…………… (259)
- 二、 旧式妇女苏美玲…………… (266)
- 三、 上海剪影…………… (272)
- 四、 中国的农民和地主…………… (285)
- 五、 共产党人姗菲…………… (293)
- 六、 强盗、土匪和军阀…………… (300)
- 七、 献身革命的女战士…………… (325)
- 八、 “我们大家都是穷人！” …… (345)
- 九、 失去灵魂的女人…………… (352)
- 十、 在中国的外国人…………… (365)
- 十一、 鲜明的对照——
 花瓶和革命女性…………… (372)
- 十二、 湖南的矿工起义…………… (376)
- 十三、 “蚊子”小报的游击战…………… (393)
- 十四、 贵初的故事…………… (401)

十五、	“不贪财，不怕死”	(415)
十六、	一支红军队伍	(423)
十七、	在广东农民之中	(431)
十八、	澳门——“东方的明珠”	(445)
十九、	沈阳的妇女	(454)
二十、	五卅示威游行	(461)
二十一、	贫贱者粪土不如	(471)
二十二、	五年中的变化	(476)
二十三、	“升官发财之道”	(489)
二十四、	烈士的遗孀	(494)
二十五、	广州的气氛	(511)
二十六、	士兵们的遭遇	(521)
二十七、	拿活人当靶子	(534)
二十八、	南京的现实和梦想	(540)
二十九、	攻克上埠	(548)
三十、	凄凉悲切的歌	(567)

一、儿子反抗老子

我们从厨房走进一家老式的山东饭馆。这是山东馆子的习惯，因为这样顾客一进门就能看到炉灶上在做的菜肴。这种做法说明烹饪在这个国家已成为一种艺术了。随着跑堂高大嗓门的迎客声，我们来到一间大餐厅。这里迎接客人不是一般的叫喊，而是一个身强力壮的跑堂扯着嗓门大叫。他迎着我们喊道：“三位驾到！”这也是满洲饭馆里的习惯。

我们刚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的跑堂就喊开了。我们走进一个中间用木板在半腰里隔开的小单间，跑堂给我们送来了擦手的热毛巾。这时又进来一批客人，他们互相打招呼，说话嗓门之大连房子都震动了。在满洲的山东农民互相见面打招呼，直话直说，不讲客套，不象其他地方比较讲究文明的中国人那样点头哈

腰，拱手作揖，老于世故，善于应酬。他们不是斯文之辈，不懂得拱手作揖，只是用大嗓门叫唤，倒也不怕人家听见。

“喂，沈保英！”或者说：“嗨，沈保英——你这回进城来口袋里又装满钱了吧！”他们互相说话从来不用“请”字，只象男子汉那样有话直说，不兴拐弯抹角。卖掉一车小麦或大豆后，他们说起话来就更加痛快了。然后上饭馆，花它一元大洋喝杯热酒，吃顿好饭，诉诉各自的苦衷，吹嘘一番他们在这个第二故乡新弄到手的财富。

饭馆里又来了一些客人，跑堂的喊声为他们开道，这伙人进来时我们从中间隔开的墙板底下数了数，一共是六双脚，个个都穿着黑色毡靴，脚管上严严实实地扎着棉布裹腿，从我们身边走过时，羊皮外套的下摆迎风飘动。他们在隔壁房间坐下，用大嗓门说着生硬的山东土话。

他们先是谈论当年的收成；然后谈到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赶车运粮的艰难和市面上的粮食价格。

“来，不用客气！”然后有人对大伙说道。我们知道这时有一个装满菜的铜火锅端到大圆桌的中间来了，大伙就伸出筷子到火锅里去夹菜，开始吃饭了。

“味道不错，”沉默了一会儿后，有人说了一句，“我们这辈子也只能到城里来吃上这样一顿好饭。”

“咱们农民进城得小心，”另一个说道，“城里人都是骗子。”

“可以去叫警察。”

“不，警察也是骗子。他们更坏。”

然后其中一个开始诉说他的难言苦衷。

“我想让我的儿子成婚，”他说道。“他已经二十多岁了，还不肯结婚。你看，我送他到城里上了三年学，他学了一些时新的想法回来，并说还要去上学。我对他说，也跟你们说说，在这些时新的城市学校里，他们整天打球、唱歌、画图画，做作业什么的。我对他说，当农民不用会画画，也不能整天唱歌。他对我说，一个健全的人要有优美的情操。娘的，他竟学会说这类蠢话。”

满桌上发出哄堂大笑。

“我对他说，也说给你们听听，我挣的钱够一辈子花的。我有那么多钱还用他去念什么书？他理应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但他说什么也不肯从命，死也不肯结婚。你们看这怎么办？”

“要我就给他当头一棍子，”一个农民给他出主意。那个当父亲的带点得意的声音说道：“我敲过他的脑袋，给了好几棍子，打得他一个星期都起不了床。”

饭桌上又发出一阵满意的笑声。

“就得这样！”有人在一旁鼓劲。

做父亲的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用一种忧虑而又有点不光彩的声音说道：

“用棍子敲脑袋也不管用。他变成个新式读书人了。他说他不认识那个姑娘！我说认识不认识也得同她结婚！我一想到他这样不孝顺，真想再揍他一顿，但揍也没有用。所以我就把村里的长辈请来开导他。长辈们都劝他说，结婚吧，要听你爹的话。那姑娘家都生气了，也要为那个姑娘顾顾脸面。你如不跟她结婚，她的一生就给毁了。再说，对你爹的名声也不好听。”

但他还是不肯。他只对他们说，“那我怎么办？我爹干吗要毁掉我的一生呢？”你们听听，我生了这样一个孽种。年纪比他大三倍的老人说的话他都不听！

我最后对他说，“你不结婚就甭想吃我的饭！”但他顶嘴说，宁可饿死也不结婚，那我也甭想有他这个儿子了。现在我明白过来了，不给他饭吃这话说错了，是个大错。我不该那样说，这样反而使他想到可以用寻短见来要挟我。他混过了一个星期，有天他来对我说：“给我钱去上学，否则我就不吃饭了。从新年起我就绝食，直到饿死为止。”新年很快就到了，大伙都高高兴兴要过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儿子却威胁要绝食，你看怎么办？

这伙农民沉默了好一阵子，考虑如何对付这个儿子采取的严峻步骤。对他们来说，这倒不是个新问题，但这种对策似乎是新的。他们的儿子也都不听话，也想法儿明里暗里地违抗父母之命。

最后有一个人说话了：“我的邻居也有这样一个儿子。他也不肯结婚。他的父亲训斥他，说不结婚就宰了他，或老头子自己一死了之。结果他儿子跑了，写了一封信说他再也不回家来了。”

“我的邻居，”另一个声音说——人们怀疑“我的邻居”是否就指的是他自己——“揍他的儿子，揍到他答应结婚为止。可是，当所有参加婚礼的客人都来了，礼也收了，但在婚礼上却连新郎官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这种丢脸的事多着呢，”又一个开始说道。

“我的儿子一开始二话没说都听从我的，作了结婚的各种

准备。但他一见到新娘，当着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面当场就象小孩一样哭了起来。当着大伙的面他一边哭一边说新娘子太丑！他呜呜地哭个不停，怎么劝也不听，要不是他的新婚日，我就揍死那兔崽子。”

墙那边传来两人的咳嗽声，声音很大咳个不停，好象在那苦恼的父亲面前想竭力忍住不要笑出声来。但那个做父亲的，眼看新年一到儿子就要绝食，深深陷入他自己的苦恼之中，别人怎么说他也听不见了，只是无可奈何地诉苦：

“我一向祭祖拜佛，想托福生个好儿子。但你们看，我生了个什么样的儿子啊！我只有这么个儿子，这样一个孽种！我修行不好！前世做了恶事，来生可能还要变成狗和羊。我的儿子要能结婚，给我生下一个孙子该有多好啊！但他同驴子一样憨。我要揍他，他就逃走。我不揍，他就不结婚。如果我不给他钱到新式学堂上学，他就要当着我的面绝食饿死。如果我让步，他就不结婚。我的命多苦啊！”

“现在的儿子都是不听话的，”一个粗哑的声音劝慰说。

“不象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孝敬父母。如今，儿子都有他们自己的主见。他们上了那些新学堂，学了一些坏思想。我有三个儿子，有一个甚至问我为什么要从佃农那里把粮食收成的一半拿过来。我有三户佃农，他们都同其他佃农一样向我交租，但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吃我的饭，花我的钱，倒来问我，我们的土地为什么比别人家的多，为什么租子要对半分？”他说我们把穷人的血汗都榨干了。他还给起了个新名词，叫什么“剥削”。我对他说，你这个奶臭未干的毛孩子，敢对你爹说这些个？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馊主意？你拿这些新名词来咋呼什

么？他正要说话，我的另两个儿子来了，其中一个对他说，

“弟弟，咱们走，”他们找个借口把他带走了。一个小时后在开秘密会的那三个兔崽子都给我逮住了，跟他们一起的还有邻居的一个儿子和两个佃农的儿子。我走过去，他们都不吱声了，有一个还装模作样的编了谎言来蒙我，“我们想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高粱！”他们以为我是个傻子！我对他们说，“一粒高粱也长不出来，如果土地落到我那些废物蛋儿子手里说的话！”

从隔壁进来一个人说：“是的，现在的孩子真不好。你们听说过上星期在海拉尔吴作林儿子的事吗？脑袋都给砍了，说他是个共产党！不过，有人说他不是共产党，只因为爱上了一个歌女，想从‘窑子’里把她赎出来。正巧警察局长的儿子也看中了这个十六岁的漂亮妞，不让她离开那家‘窑子’。那姑娘想嫁给吴的儿子，为此两个男的就大吵了一场。吴的儿子说他宁可倾家荡产也要赎出这个姑娘，但他还没来得及办，警察局长的儿子就把他当共产党逮走了，然后在闹市上给砍头示众”。

“对，是这样，但我听说他是个真共产党，”有人插话说。

“是真的又怎么样？”有一个问道。“就一定得砍头？”

那个有三个儿子的人又说：“上天保佑，我的儿子是共产党就好了呢！……”但他不再讲下去了。另有一个人说：“听说还有女的……”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好象踩着地上什么危险的东西。

外面声音嘈杂，饭馆里又来了新的顾客。跑堂的喊叫声很快就将隔壁房间的谈话给淹没了。过了一阵，稍微安静了点，跑

堂的又站在台阶下喊开了，“六位付了六块大洋，三毛小费，再见！”六双农民的脚踏着毡靴从我们房间门口扬长而去。

从隔壁房间里，一个在收拾碗筷的招待员对另一个说：“嗨，他们把白糖都抄走了！”

台阶下面的一个跑堂又在送客：“三毛酒钱已付，客人再见！”

二、旧式妇女苏美玲

苏美玲是一个旧式的女子，有着旧式女人的弱点和长处。她是在旧教育的熏陶下长大的，能读会画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女红刺绣，管理家务也是个行家里手。

她只有三十岁，但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不过她看上去仍很年轻漂亮，细嫩的皮肤白里透红，中国的女子只要不是做粗活的工农，皮肤都是这样白净细嫩，一头乌黑的头发从那漂亮的前额整整齐齐地往后梳，在脑后打了一个蓬蓬松松的发结，发结上还常常插上一朵香气扑鼻的鲜花。她那高领的绸子旗袍上没有任何点缀，没有一丝褶皱，长长的下摆垂到脚腕，淡淡地衬托出她那苗条的身材，配上脚上的那双平底软鞋，显得非常朴素大方。

她长得娴静美丽，但一走起路来就难看而不自然了，仔细看去你会发现她的袜子里面缠着裹脚布。她那双脚已经变形，至今仍是半裹着的。她出生在中国内地，从小裹足，好好的一双脚硬给裹成了残废。后来掀起了反对缠足运动并且开始了革命，让所有三十岁以下的妇女都放脚。南方和华中的妇女会派人挨家挨户宣传并发动反对缠足和留长发的运动；有时一些保守和迷信的妇女不肯照着办，那些现代女性就亲自动手把她们的长发剪短，强迫放脚。

苏美玲也放了脚，放脚时的痛苦也同裹脚时一样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人的苦难真如中国俗语所说的，“三寸金莲，眼泪洗面。”她的脚放了，但已经残废，只能穿一种半大不小的鞋子。

美玲比他丈夫大五岁。她的丈夫从小就读教会学校，后来又在一所教会大学里毕业。他崇尚现代生活，尤其崇拜美国的时尚。他会唱美国歌曲，了解美国的历史，读过美国文学著作，他的英文写得比中文还要好。他说起英语来总是带着鼻音。他的梦想是到美国的福特工厂去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回国充当福特汽车公司在华的代理人。因为他没有钱去美国，只好在上海一家银行里当个职员。出于一些荒唐的想法，他把美玲和孩子也从内地迁来上海，并决心要把他们也培养成象他自己那样具有现代思想的人。

他把那种结构杂乱无章，琉璃瓦屋顶，花格窗子的旧式中国房子和设计古怪的中国雕刻家具，统统看成是应当摧毁的东西。他是一个现代派，所以在一幢新式楼房里租了一个小套间。这里的窗户是方的，白色的墙壁，闪闪发光的电灯泡，在

白色的搪瓷灯罩（就象西方人在他们浴室里用的那种，）下大放光亮。

他在房子里布置了几件廉价的家具以及传教士家里常有的那种小摆设。他不喜欢挂写有至理名言的中国对联和画有劲松翠柏，梅兰竹菊的长条国画，却爱买现代的，用色华丽的月光下的德国和瑞士等西洋风景画。他把这些画镶进大镜框里挂在墙上。但他最珍惜的是纽约中央大火车站的一幅照片。

此外他还有一部留声机，外加许多美国爵士乐的唱片。他那只有八岁的小女儿能跳查尔斯顿舞并且跳得非常好。这是一种天赋——在这点上，他一向是宽宏大量的——他没有强迫美玲去学在中国的女传教士的那种打扮，戴上一顶后面象鸭尾巴那样翘起来的一八九〇年式的外国帽。

美玲生活在这套怪诞的房间里就象处身某个早已被人遗忘的中国古战场上一个幽灵。她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式妇女，喜欢中国古老的东西，她沉默寡言，端庄稳重。但她无知而又迷信，对男女之间只知道有一种关系。上海的环境对她来说无异是个灾难。

她的丈夫整天说的都是现代派的新鲜事，而妻子听从丈夫的意志难道不是一种美德吗？所以她也就同意住在这套房子里，也不去反对那些爵士乐唱片，而且还曾一度同她丈夫每星期去看二、三次电影。她看到的电影都是男人睡在女人大腿上之类的镜头。在电影里她十分震惊地看到那些袒胸露臂的外国女人毫不害臊地拥抱亲吻男人，所有电影似乎都是讲男女偷情之类的事。她再也不敢去看这类电影了，即使引起她丈夫的不满甚至发脾气也无法使她改变这个主意。因此她的丈夫渐渐地就

把她留在家里看孩子，而自己出去同朋友们消磨夜晚的时间。

后来他同一个白俄舞女鬼混在一起了。她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头卷曲的长头发，是上海的一个酒吧女郎。苏美玲得知这个女人时，起初她只是拉着丈夫的衣服不让他晚上出去。

“苏美玲吃醋了”她丈夫的那伙朋友开着玩笑说。“她是个旧式的女子，也老了。”在中国，人们把一个年过三十的妇女就看成是老了。

美玲只会很少几句英语，即使她能说流利的英语也不会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那些爱管闲事的朋友。但她的丈夫同大多数职员一样爱好摩登，思想空虚而又浅薄。他的心里有个什么想法或有点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吵吵嚷嚷，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我同她的结婚不是出于自愿，”有一次他尖刻地谈到美玲。“她是个无知无识的旧式女人，没有任何思想。我得不到她的任何帮助，我准备把她休掉。”

“把她休掉是老式做法，”我表示不能赞同，“那孩子怎么办呢？”

“这不是我的过错！她喜欢孩子，可以把孩子带到我父母家去住。她可以把我在老家的所有财产都拿走。”

“这个俄国姑娘怎么样？”

“她是个摩登女郎，不会妨碍我升官发财的，她也想去美国。”

“或许她是想到美国去才爱上你的吧。”

我对她毫无所知，他自我辩解道。但他说的不对。因为有一次苏美玲曾带我去过那个舞女所在的酒吧。要知道她是怎样

的一个女人，不一定要对她本人有所了解。但美玲希望看看这个女人，要搞清楚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把她的丈夫给勾引住了。我们走进酒吧，在一张桌子旁坐下。美玲怯生生地坐在一把椅子的边上，两只眼睛在这五光十色的大厅里搜索。她那对乌黑的眼睛目光锐利，这样的眼睛可能比摩登女子的眼睛看得更透澈些，她从头到脚打量着舞厅里的每个女子以及她们的穿着打扮。美玲聚精会神地看得发了呆，但那双眼睛象是在燃烧。一个中国的爵士乐队奏起了索尼娅的曲子，接着就唱开了：

我伤心，我悲伤，
因为你不再爱你的尼古拉！

日子一如既往地一天天过去，美玲的丈夫越来越坚决地要把她“休掉”。她哭得更伤心了，夫妻俩的争吵更频繁了，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也更多了。

后来美玲不再哭泣了。有一天她把头发剪短，然后又烫了发。她那朴素大方，庄重娴静的本色消失了，而成为同一个头脑空虚的舞女争夺一个头脑同样空虚的丈夫的可怜女人。此后不久我去看她时，她穿的那件长长的漂亮旗袍也剪短了，剪成象中国摩登女郎穿的那样短得快到膝盖了，下面是她那双用裹脚布裹得严严实实，行走不便的脚，那双脚过去只要不走路还是看不出来的。

有一天她打开了留声机，脸上流露出渴望和可怜的样子，不好意思地恳求我：“教我跳个舞吧。”留声机唱片开始尖声怪气的唱起来。她还买了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吧里听到的那张唱片。

但到那里去跳舞必须心情愉快，腿脚要轻巧灵便。美玲的

心象铅一样沉重而她的那双脚从小就裹成残废了。摇摇晃晃跳了几步后，她突然在房间中央停住了，用旗袍的袖子遮着脸哭得象个泪人儿一样。两个孩子站在门口，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看着母亲，背后的留声机高唱着：

“腊月里来，我猛喝伏特加，

唷！啊罗唷！

那时，我是多么想念你呀，索尼亚！

三、上海剪影

一个中国的胖娃娃同一条小黑狗在上海的马路上赛跑。时值夏天，那孩子身上只系着一个红兜肚。那小狗原先蹲在垃圾堆上，胖胖的小腿上系着一条绳子和一个小铃铛，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小铃铛。两个小家伙开始在一家花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赛跑，从一根电线杆到另一根电线杆来回跑着。两个小家伙真是天真可爱。小狗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但看到它的小朋友没有跟上来，就停下来往后看。那个孩子发出象小狗腿上的铃铛一样清脆的笑声，跑到前头后，有时也停下来等它，然后一起跑，小狗奔跑时，那两只大耳朵上下不停地扇动，小孩高兴地笑着。孩子的小脚和小狗的爪子奔跑在人行道上发出轻轻的拍打声。在整个亚洲没有什么比这情景更美的了。

• • •

宴会结束了。这是一次体面人的宴会，男的穿着夜礼服，女的穿着袒胸露臂下摆拖得长长的裙子。这时先生们聚在俱乐部的酒吧间，有人向身边的一个人问道：“昨晚你干什么去了？”那人竭力支吾其词为自己开脱，贼头贼脑地眨巴着眼睛。酒吧间角落里有人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用那种上流社会的士绅或放牛娃都会的传统方式破口大骂。这种咒骂颇具亚洲色彩、专门骂人家的娘，姥姥奶奶，直至祖宗十七八代。

* * *

参议长对上海已经厌烦。但他仍要去夜总会同一个年轻的舞女跳舞。岁月不饶人，他开始慢慢地老了。他一圈圈地跳着老式的华尔兹舞，闭着眼睛回想起那些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年轻的先生坐在两边的桌子旁谈笑风生，舞女们纷纷来到他们的桌子跟前，同他们眉来眼去卖弄风骚。

• • •

早晨五点钟，工厂的汽笛发出响亮而又刺耳的鸣—鸣鸣叫声。天刚蒙蒙亮，大街上的人群已熙熙攘攘，有小孩，有疲劳不堪的妇女和男人，有的去上班，有的干了一夜重活后回家去休息。儿童的手小巧玲珑，但他们那没精打彩的黑眼睛——眼神里充满着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苦难经历。

* * *

在外国势力庇护下的夜上海灯火辉煌，沿街站着一排排卖身的小姑娘和妇女——价格是两三角钱一小时，五角或一元钱一个晚上。不少姑娘只有十三、四岁，都是些半成年的孩子。近处站着年纪大些的妇女，是他们的主子或监护人。这些姑娘是

奴隶，许多是卖身为奴的灾区农村妇女和姑娘。现在他们要为主人挣钱。有时她们自己同男人讨价还价，有时年长的妇女替她们讲价钱。

一个身材苗条约摸十六岁的姑娘，穿着一件灰色的长布褂子，每晚独自一人站在一个老地方，旁边没有跟着年纪大的妇女。她的身边总是站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手里摆弄着橡皮筋上的一只小木鸟。这孩子可能是她的妹妹，或是在见习这种行当的一个小奴。年纪较大的那个姑娘低着头温柔地看着那个孩子。过路的男人停下来同她讲价钱，那孩子就在一旁听着。另一些男人同站在附近等生意的女人讨价还价，然后总会有个姑娘象狗一样低着头跟随男人而去。

* * *

两个身材魁梧的工人从街上走过来。一个年纪大的妇女叫两个小姑娘，其中一个只不过十二、三岁，前去拉客。两个女孩上去拉那两个工人。那两个男人粗暴地把她们摔开，大声嚷道：“你们找错人了！”两个姑娘往后一个踉跄，满脸羞愧。那个年纪大的女人又对她们说了些话，两个小女孩就过去抱那两个男人，但又给使劲地推开了。

* * *

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力车夫，低着头一个劲地拉车没有注意交通信号。过街时，警察并没有逮捕他，而是用棍子往他肩背上狠狠敲打了一通。那苦力象条狗一样畏缩着身子任凭抽打，然后低着头拉车跑了。他的一只眼是瞎的，一只腿有毛病。他的破裤腿上挂着一大块大补钉，当他拉着人力车奔跑时，那破布也就迎风飘扬。

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偕同夫人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喝茶。

“不，”他说道，“我不看书。你们知道我是一九一三年毕业的。”

“我的藏书也过时了，”他的夫人说道，“我是一九一五年毕业的。”

另一位官员说：“不用读书我也知道我们中国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教育。如果这三十年来不是把钱花在战争上，而是把它用在教育上，那我们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了。当务之急是停止战争，要使人人都能上学，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连苦力和乞丐也都能上学。我在大学就写过这方面的论文，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主张。”

一个在国民党里很活跃的妇女插话道：“我认为读书只会搅乱人的思想。保持头脑清醒的最好办法是把你的所有思想都说出来。”

一个中国作家坐在桌旁默不作声地听着。

过后他走在街上，一脚踢开路上的一块小石子，狠狠地骂道：“这就是我们的统治阶级。二十年来他们没有考虑过新思想；它们从未去想过——假如曾经思考过，那种思想也是不值一提。”

一个德国商人在餐桌上问道：“你们连人力车夫也要解放吗？”对这种思想流露出一脸嫌恶的神情。“苦力只能算是半个人，”一个有钱的法国医生扬言道：“我的中国病人也是这样说的。”——一个大腹便便的美国编辑满脸恼怒地宣称：

“妈的！我最痛恨落后衰弱的民族！”……一个有着一张马脸的英国编辑则在历数英国为中国作出的无数牺牲；而一个日本的编辑说日本在满洲是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一个在哈佛大学受过训练的中国金融家则在解释中国不应当发展国有化工业的原因。“看看美国！”他振振有词地说道：“中国的问题在于，”他抱怨地说，“没有人愿意作出牺牲。中国需要一位甘地，只满足于粗衣淡饭。中国需要那种不计较金钱的人。”他一边说着，一边钻进车门上标有他的姓氏字母的高级轿车扬长而去了。

* * *

在舞厅里，一名美国水手打了日本舞女一记耳光。她就朝他脸上泼去一杯水，然后躲到一个角落里。人们围拢来出面干涉，那名水手怒不可遏地高声叫嚷着：“我是个成年的白种人，懂吗？哪个亚洲黄种女人也不敢对我这样放肆！”一名海军陆战队的警察来到现场。他的脸象个土豆，歪带在光头上的小白帽快盖上他的眼睛了。他用棍子狠狠地往那水手的头上敲打了一阵。然后喝了一杯啤酒说道：“啊，我揍他们并不过份，如果我处于他们那种地位也得挨这顿揍。”

* * *

从法租界监狱里透露的一则消息说，四名工人在严刑拷打下死去了。来自这个城市的中国军事法庭的消息说，一名女学生以共产党的罪名在女青年会被英国警察逮捕后也在惨无人道的刑讯中被折磨死了。她的一只手给烧烂了，但她仍然不肯说出她的同志的名字。

刑讯是秘密进行的，但他的哥哥暗地里找到女青年会的一

个外国女人，托她把他妹妹的一个箱子拿出来交给他。这外国女人把箱子交给了他，但对他说：“你要小心，我看过里面的东西，你妹妹是一个共产党，那箱子里都是文件材料。”那青年回答道：“我知道——把箱子交给我好了！我的妹妹已经死了。他们是用严刑拷打把她折磨死的。”他提着那个箱子消失在上海的街头。在那繁忙的生活洪流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有的被杀害了，但是一个人倒下，又有千百人站立了起来。

* * *

一名有轨电车上的罢工领袖被捕了。他是一个正直的工人，不怕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的匪徒们的恐吓。法国人的法庭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判他十年苦役的刑罚。“你是一个共产党，”法官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共产党？”他抗议道。一名侦探被传到证人席上，拿出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那侦探说，他是从这个罢工领袖的房间里找到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我房间里从来没有这种小册子——这是栽赃陷害。”那工人愤怒地反驳着。“十年苦役！”法官一声宣判，这名工人就再也无法呆在上海了。

* * *

五名朝鲜革命党人被捕后将送交日本人手里。汉奸们利用被捕人家属的焦急心情对他们的妻子、姐妹或女儿说：“拿出一千元钱，我就有办法把他救出来。”这些女人就拿出她们辛苦积攒起来的所有积蓄，甚至到处借债凑钱。可是汉奸钱一到手，连影子也找不到了。那些犯人最后还是送交日本人。受此沉重打击，那些脆弱的女性几乎痛不欲生。

* * *

一个人力车夫跪在街中心向警察求饶。警察把他赶到路边，那苦力又惶恐地跪下，双手合掌向一小群围观的人求救。一个工人向人解释道：“他是个农民，新来乍到不了解上海……他触犯了规矩，警察把人力车的坐垫给拿走了。他得付五角钱才能拿回，可是他又拿不出五角钱。”

* * *

街上过来三个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那男的穿一条蓝布工装裤，肩上挑着一对沉甸甸的竹筐子。那男的一面走一面有节奏地哼着：“嗨唷，嗨唷！”那小孩抓着后面那只筐子也奶声奶气地跟着喊：“嗨唷，嗨唷，嗨唷。”那母亲看着他眯眯地笑着。

* * *

一个德国人叙述了一段他自己的故事。他在中国的三十年里，曾有十七年都打算过要回国去，但一直也没有回去。他每天晚上都到跳舞厅去喝酒、跳舞，同日本、朝鲜、中国或白俄的舞女鬼混，把钱花得精光。“很久以前”，他说，“我们还知道什么是堕落……可现在我们已麻木不仁了。”

* * *

一名外国女旅游者站在一家最豪华的外国饭店门口同一个中国的卖花小贩在讨价还价。她想买一束石竹花，那小贩要价二角钱，外国女人只肯给一角，双方谁也不肯让步。那外国女人曾听说在中国买东西必须讨价还价，因此她不愿受人欺生，而上当受骗。

消息传到上海说，印度出现一股新民族主义浪潮。印度商人关闭了商店，一连几个小时地做祷告。外国人嘲笑，而英国人则说：“让他们不停地做祷告吧！”南京路上出现了用印地文书写的标语。一名英国警察没法刷掉一条标语，嘴里嘟嘟囔囔地骂道：“这些狗杂种又要闹事了！”

一个白俄烂醉如泥地躺在马路上。一群中国人在围观，其中有一个伸出腿去踢了他几脚。一个德国人停下来看了看说：“他是一个白种人，我真为他难过，不过我一个铜板也不会给他。”这个白俄转过身来口里喃喃地说着胡话。

白俄大多混迹中国沿海地区。他们乞讨，抢劫，偷盗，绑架，充当各国在中国的奸细；有的还走私鸦片，伪造文件，干谋杀的勾当；有的则破坏罢工以反对中国工人阶级而成为外国警察的走卒。上海还有穿着英国军装的白俄部队。他们列队行进唱着沙俄的歌曲。法国侦探队里也有许多白俄侦探，这些白俄奸细每天向他们的主子写汇报以便得到几个赏钱。

白俄的妇女不愿在苏联从事低贱的劳动而宁愿在上海的妓院和夜总会里卖笑为生。她们同亚洲的妓女竞争皮肉生意。她们之中有的成为军阀的妻妾。上海马路上的中国苦力会跟着男人后面轻声问道：“你要俄国姑娘吗？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白的黑的随便挑。”

其他外国人抱怨白俄毁了白种人在亚洲的声誉。但他们又利用白俄充当破坏罢工者，当娼妇娼妓，当雇佣兵和奸细，因此白种人也就更加声名狼藉。

一个中国的纨绔子弟坐在旧戏院里朝着过道那边的一个人恭敬地拱手作揖。“他是谁？”有人向一个青年富豪打听。青年回答说：“那是上海的帮会头子——绑架大王，不，他自己不去绑架，但他是后台老板，当然也从中渔利。”这年轻人说他的名字叫杜月笙——这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官员。

一个老派的中国人走进戏院，对那位帮会头目点头作揖，然后在他身旁坐下，亲切地交谈。“那是谁？”又有人问那青年富豪。“那是商会会长，他是那帮会头目的莫逆之交。”“这个帮会头目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吗？”

那年轻人回答说：“政府里身居高位的部长和司令都是他的朋友。他有好几个官衔。他是镇压上海共产党的反共头子，也是贩卖鸦片的大亨。”

* * *

一个女人给了一名人力车夫双倍的车钱。他感激不尽地点头作揖，连声说着：“谢谢，太太，谢谢您！”他身材高大，是刚从农村来的。他曾在工厂找过工作，但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同其他进城来的农民一样也只好成为拉人力车的苦力了。到了夜晚他们在这个城市的人行道上，黑暗的角落，随遇而安；或者就蜷缩在人力车的踏脚板上过夜。上海对他们来说曾经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但如今已是个令人万念俱灰的城市。

* * *

几个外国女人懒洋洋地一面喝着茶，一面在闲聊天。有个女人说道：“是的，中国如果不属于中国人，那将是个多么可爱的国家。”其他几个点头表示赞同。

另一群外国女人也在喝茶聊天。有一个很快要生孩子了。她是一个中国人的妻子，在场的其他两个女人也是中国人的外国老婆。

“你分娩时谁来照料你？”有人问那快要生孩子的母亲。她说出一个外国医生的名字，并解释道，“象分娩这样的喜事，我可不能去找一个中国的医生！”

* * *

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把上海称作为“城市中的一颗明珠。”根据上海报纸的报道，一九三〇年从上海街道上拉走的尸体有三万六千具，而一九三一年有三万二千具，上海有一辆专门在市内各处拉尸体的救护车。因为上海是“城市中的一颗明珠”，死者的尸体总不能这样横七竖八地躺在各区的马路上。

报刊简要地指出死者中有父母养不起的弃婴和冻死饿死的成年男女。

* * *

外国和中国的阔佬们沿着沪西大马路，在深宅大院里造起了花园别墅。当天气不是太冷时，这个城市里的许多穷人就睡在这条马路上。夜晚人们沿着大街散步时得随时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踩到躺在黑暗的人行道上那些劳动了一整天，精疲力尽的人的身上。他们之中有的把那唯一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工具垫在脑袋底下就睡着了。

住在深宅大院里的富豪之家，高级轿车从大铁门里进进出出，他们通宵达旦地赌博，跳舞或大摆筵席，而喜欢在白天睡大觉。那些受剥削者则流落街头，他们身上的血汗都被榨干了。这些受苦者建造起深宅大院和花园别墅，其实，上海的一

切财富都是从这些人身上榨取出来的。

大墙上常常写有这样的标语：“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参加工农红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在豪门巨宅的围墙上也写着这类标语口号！外国人和中国的阔佬们怎么不惊恐万状呢！

* * *

上海市里还有另外一些深宅大院。高墙后面是女修道会，修道院和穿着黑色长袍的牧师和修女。围墙朝街的一面，警察或有关人员在那神圣的墙上用法文写着：“此处禁止小便！”但中国的穷苦人没有地方可小便，他们只好向壁方便了！这或许可以证明中国人是不信宗教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神圣的墙和世俗的墙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 * *

上海有一个区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混杂而居，他们之间还没有达到怒目而视的程度。外国人控制的租界和中国人控制的市区之间也没有筑起一堵互相分隔的墙。一个日本人走出三步踏入中国的市区，脸朝着墙随地小便。一群中国人在这关键时刻抓住了他。那日本人高喊救命，一个警察跑过来解救了他。

“你们为什么要抓他？”那警察高声吆喝着。一名苦力充当发言人自豪地往前走了几步，代表中国提出起诉。“为什么他不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而偏偏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小便？”

那日本人记下这次事件，这就构成所谓“日本”受到“中国”侮辱的三百多条罪状中的一条。

* * *

这里说的是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德国富商。他拥有

一座大花园洋房，通向花园的铁门上刻着他的大名M·K，两个缩写字母。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在他的房顶上则挂着德国旧君主制时代的一面旗子。他长得又矮又胖，鼓着一个大肚子，脖子上的一大堆肥肉连领子都给盖住了。他的头上油光滑亮活象一个弹子球，那张绯红的面孔象是刚挨过打的孩子的屁股。每逢炎夏酷暑，他在房子和花园里走动时，身上只穿着一条紧身的游泳裤。短裤上突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肚子，脑袋上戴着一顶硬草帽。

他经常回德国度一年假期。作为一个强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认为理应如此。但任何人在德国居住六个月后，就得付税。这个挂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富翁总是在德国住满五个半月，然后宣称他要去瑞士住一个月，这样就不算连续居住六个月了。然后他再回到德国又可享受免税待遇。他说要不是税收太高，他会常住在德国。

因此，他决定住在中国，在这里他实际上什么税都不用付。这个法西斯爱国者如果在中国或德国发现一个穷人偷了一块面包，他就会首先起来把他当作一名破坏法律的贼送进监狱。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坚信“法律和秩序。”

* * *

上海华人区的马路上，一个约摸十二岁的男孩吓得魂不附体地飞奔着逃命，在后面紧追不舍的是一个满脸杀气的男子汉。那孩子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象个小苦力。那汉子抓住了他，将他按倒在地，正要动手谋害时，有人过来把他拉开了。这是卑劣而毫无人性的一幕。这里的周围环境是些用旧洋铁罐，破蓆子和小块石头横七竖八挡着的小平房和商店。街上拉

起了绳子，上面挂着破衣烂衫。这条街以谋杀出名，这里只有谋杀才能生根发芽。

* • *

深夜，在法国租界里，一个拉人力车的苦力无意之中违反了一点交通规则。虽然街上除了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外，看不到一个人影，那警察举起棍子以警察惯有的脾气狠揍那个苦力。那对外国男女看到这种粗暴的行径就出面干涉。那苦力看到有人同情他，就用他的一只光脚去踢那个警察。于是那条“法律之臂”就象一头野兽拿着棍子雨点般地往那苦力身上猛打，好象是在打一条狗，打得他头破血流然后以“违反交通规则”的罪名加以逮捕。

那对外国男女随同那苦力和警察来到了法国警察署。他们为苦力打抱不平。一个又矮又胖、玩世不恭的法国警官听后说道：“这个警察只是履行他的职责！”当他们提出强烈抗议时，那警官又说：“你们看，这警察是中国人，他知道如何对付他们的同胞。事关法律，你们何必如此温情主义。”

离开警察署后，那个女的一边走一边愤愤不平地说：“我要离开中国，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但是受压迫的芸芸众生是没法离开中国的。他们只能忍受挨打或者象奴隶那样被人拉去枪毙，要末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牺牲。外国人可以离开，那些留下不走的，有的还参加了打人的勾当，至于参加被压迫者队伍中的外国人还不到总数的十万分之一。

四、中国的农民和地主

中国贫苦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的你死我活斗争，我们是在无锡市第一次实地亲眼见到的。一天清晨，我们一行五人乘火车从上海出发，到了无锡后改乘小船，又经过四个小时才来到北乡。那里的阶级斗争非常残酷，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有上千名农民起来造了大地主的反。农民的造反失败了，有四十个农民惨遭杀害。

无锡一带河道纵横，我们坐上一艘小轮船驶往地主居住的上乡。那里的地主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住在深宅大院里，门口还有卫兵把守。但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却一贫如洗，悲惨情景和中世纪的农奴不相上下。这里的农民已组织起共产党，虽然参加共产党会有被杀头的危险。

我们坐的那条小船挤满了乡下来的农民。他们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低声地议论着。突然，一个高个子中国人走上我们的小船。他看来有五十岁上下，身穿灰色绸子长衫，脚上穿着一双平底中式布鞋，头上戴着一顶小圆黑瓜皮帽。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带着国民党帽徽，穿着卡叽布军服的一名贴身保镖。据说，这位高个子中国人正是我们要去访问的那个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朱姓豪门地主的族长，远近闻名的“杀害共产党的刽子手”。因此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必须由一名武装保镖跟随左右，唯恐那些看上去憨厚的农民或船夫突然动起手来送他上西天。

他用一副惯于指挥别人的神态邀请我们上他家去住，并由他的家丁负责保卫我们。中国很多农村里是没有客栈的，如果我们拒绝，不住在他这种有钱有势的人家而到其他地方投宿，那么我们将横遭猜疑，还可能被抓起来。所以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上他家去住。不过，我们心中明白：从此时此刻起，人们已经把我们当作农民的敌人了。

朱家的这位族长告别了，把我们交给也在这条船上的他家的一位年轻人来照顾。他长得端正英俊，穿着一件高级毛料的长衫。

我们的小轮往北驶去，坐在角落里的一名士兵不停地拉着二胡。透过琴声我们听到这位年轻的主人同他妻子关于他同他父亲在无锡买来一批新步枪的谈话——现在他将这批枪运回家去。地主可以有，农民不能有。

傍晚，我们来到了安城小镇。一排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默默地站在河边看着我们上岸。一个老人身上只穿着几条破布，

一看就知道是个鸦片鬼。在我们上岸的地方又增派了两个士兵，我们穿过街道被带到中央政治局。

街道很窄，我们如果把手伸直，两边都可碰到房子，伸手往上可以摸到屋檐。同中国其他城镇里一样，商店整天都开业，里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这些商店里站着一排排的人看着我们经过。一群儿童从小巷里跑出来，街上很快就挤满了围观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的人群。小街上我们的皮鞋声，小孩光着脚丫，和士兵们穿着布鞋行进的声同看到我们经过鸡飞狗叫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地方上的乡绅显贵们在重兵护卫之下前来迎接我们，向客人献了茶，然后我们离开了小镇，步行了半个小时，来到僻远的以朱家命名的朱宅里村。这里没有大路，都是羊肠小道，大家迈着印第安人那样的步伐一个跟着一个鱼贯而行，首尾都有当兵的。夜幕开始降临。前面几英里远的地方绵亘着高高的山岗，右边则是一大片黑魆魆的竹林。

当兵的告诉我们，农民白天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就到山里去秘密集会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我们左边的那片竹林就是武装农民袭击朱宅里村之前的集合地点。当兵的继续说道，每天朱家和他们的家丁都要抓住几个他们怀疑或肯定是共产党员的农民。就在我们来到这里的两天前，他们还抓住并枪毙了两个农民。前一天，正当朱家又要去抓两个农民时，一位衣衫褴褛的船夫私下里向他们通风报信，让他们逃跑了。最近，从城里来了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帮助这里的农民。眼下朱家正在乡下各个角落搜寻这个人。但当兵的说农民是机灵鬼，把他藏了起来，怎么也找不着。

当兵的打开话匣子说个没完，而且对我们的问题，有问必答。他们不是本地人，也不会说当地方言，对农民也没有什么感情。但他们自己也出身农家，每月八块或十块大洋的军饷还要寄回到居住在江苏最北部，甚至山东的贫穷的老家去。

这些士兵属于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谓的“志愿团”，是由地主和商会组织的。这些团队取代了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成立后的白色恐怖中被消灭的革命农民协会。所谓的“志愿团”实际上不过是大地主的雇佣军，其性质可从这一事实中看得很清楚，即这些卫护我们的士兵不是驻扎在朱宅里村，而就驻在最有钱的地主，朱家的右侧厢房里。

朱宅里全村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地主。朱家是个没有分立的大家族，一家二十五口人都住在一起。朱宅里的房子耸立在一马平川的乡村里非常引人注目，三面设有窗口的白色围墙，宛如中世纪高大的城堡，另一面则由一条开阔的水渠把房子和外面的道路隔断。整个村子周围是一道带刺的铁丝网并有武装士兵把守。当我们穿过大门时，我们看到铁丝网圈子里面已经挖好了士兵可以卧倒射击的战壕，每所房子沉重的木头大门上也都做好了供射击用的枪眼。

穿过朱家房子的大门，我们来到了一个长长的宽敞大厅。大厅就象中世纪欧洲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粗大的红漆柱子支着屋顶，上面没有天花板。经过八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上洗手间或稍微休息一下，就被请到大厅中央的一张方桌上坐下用茶，气氛庄严隆重，令人难受。那位五十多岁、身穿蓝色缎子长袍的朱家族长亲自为我们张罗。他站起来，给我

们斟上由佣人们端来的茶水。事后，我们知道这位族长还是政府在该地区的政治代理人兼官方的收税官。经过这样一解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南京政府的手也伸到了这里。

大厅里光线昏暗。四周没有窗口，只靠敞开的门里投进来的光亮。墙上挂着华丽的大红绸子对联，上面用金粉写着中国字。这些装饰的开销足够一户农家吃几个星期的。这些对联是四天前用来庆贺东家一位少爷的婚礼的。佣人们拿来了大红蜡烛，并把它们插到那些做工精巧的大青铜烛台上。烛台摆在紧靠墙壁的长方形雕花红木香案上。新郎约摸有十八岁，穿着一身西服走进来和我们会面。他能讲英语，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我们的邀请下，新娘也来了。她是个年轻姑娘，似乎比丈夫稍大一些。她毕业于无锡的一所师范学校，以后一直在幼儿园当老师。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目前要想统治中国的所谓“现代中国”的两位有着封建背景的代表。

年轻的新娘和我们一起吃饭。茶水撤走，饭菜上来，还是那套毕恭毕敬的规矩。我们想方设法要在其他人面前显得有话可谈。朱家的男女老少、许多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加上他们的家丁都到大厅里来围观，听我们说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得体的话头，所以就设法跟新娘谈教育。新娘严肃而又谦恭地对我们说：中国人生来就不如外国人！

在一位同伴的指点下，我终于也敷衍一番，起立向新郎、新娘祝酒。正当我们大家站起来举杯祝酒时，从大厅的一角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镣铐声。我们周围站了很多人，烛光又暗淡，所以无法看清远处。过了一会，我们陪同这对夫妇进他们的新房。房里一色桃木家具，显得富丽堂皇，在那里我们

又吃梨、喝茶。然后，我们返回大厅和家丁们聊天。

家丁们告诉我们，刚才的镣铐声是又抓到了两个农民。这些农民不送到监狱，就关在朱家。为了证实他们所说的话，家丁们端起两支蜡烛，把我们领到朱家房子前面的一间空屋里。这间屋子紧靠着大厅，里面又黑又冷，空空荡荡。在墙角一堆肮脏的柴草上，躺着两个衣衫破烂、受苦受难的农民，手脚都被捆绑着。其中一个大约四十岁光景，瘦削的脸庞上显出敏捷、机智的神情；另一个可能只有二十岁，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愚蠢。两个人都脸朝天躺在那儿，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我们却在大吃大喝！”我用英语感叹了一句。

同行中有一个人拉了拉我的胳膊，说我们应该出去散散步，随即就把我带出了屋子。外面皓月当空，银波轻泻，大地万物沉浸在一片洁白静谧之中。这里是一片稠密的竹林，远处是沉睡的群山，是农民们夜间集会的地方。

一个朋友悄悄地对我说：“你正在体验历史。”我回答说：“历史没有谈起来那样轻松。”

接着是一个不眠之夜，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晨光微露之中我就起身了，拉开我们内院同其他房间隔开的巨大木头门闩，走进大厅。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强壮有力的人在大厅里整理队伍，他那灰色长衫上挂着一排子弹带，腰间插着一支毛瑟手枪。过了一会，这个人叫当兵的去把一个农民带进来。

当兵的带上那个有点愚蠢模样的年轻人，拉起他的袖子，铐上手铐，然后放下袖子，就好象双手笼在袖筒里取暖似的。另外一些人全副武装，但把枪藏在里面，外面穿着普通工人的衣

服。然后他们带着这个年轻人在前面带头。据说这个年轻人已经答应出卖一个农民领袖，此刻他就是带这伙人去到那个农民领袖所在的村子。天蒙蒙亮他们就出发了。那个年轻人象一头没有头脑的动物，垂头丧气地带着路。我们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办法使他肯这样干的。

这一天，我们走访了七个村庄。这些村庄位于朱宅里和周围的山峦之间。几个家丁和朱家的两个人陪着我们。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见到我们就停下活默默地看着。有好几个村全是朱家的佃户，连村名都带朱字。只有一个村庄例外。那里住着二十九户人家，生活还算过得去。其余的都贫困不堪，一片民生凋敝、疮痍满目的景象。

佃户们就住在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地上的滚地龙里。床是用破坛旧罐支起来的一块铺板，上面铺的单子破破烂烂。有一个五口之家的佃户，夫妻俩加三个孩子。他们以前的三个孩子都在不满一岁夭折了。现在母亲怀里的那个也骨瘦如柴很难养活。这家佃户种了两亩半土地，收成的一大半要作地租交给地主。他们在一年中有好几个月要依靠东家的恩惠才能活下去。他们借了东家还不清的债。因此他们也就永远成了东家的奴隶。这家佃户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农民逐步完全被土地所控制的一个过程。

主人大概有点觉察到我们无话可谈，因此他自己开始数落起农民的狡猾之处了。他说，农民特别不老实，每到收割季节，他总得派家丁下去监视他们，不然的话，农民就会把一部分庄稼藏起来据为己有。拿剩下的一点再和他分。农民们实在太穷苦，就连种地所必需的一些最原始、简陋的农具都没

有。

我们到处都看到奴役盛行使人心碎；有的农民穷极潦倒，简直无法形容。在操有生死大权的朱家人面前，他们强颜欢笑，毕恭毕敬，有时甚至苦苦哀求。有的抱来一捆捆稻子让人看那毁掉一年收成三分之一的锈病；另些农民则抄着手站在那里默不作声。当我们问他们问题时，他们一声不吭，只是用充满着仇恨的黑眼珠直愣愣地看着我们。从别人那里我们了解到，虽然这一带没有报纸，但是我们刚从无锡上船，这里的男女老少，哪怕住在最遥远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来。当我们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时，他们也事先知道了。这不免引起我们的深思，说明中国的这种组织能力也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还了解到，在更偏僻的一些村子里，人们的生活状况比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还要糟糕——糟糕得连搞造反的人也无法立脚。不过，朱宅里这一带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富于战斗性。他们正在筹集各种武器，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捐献几个铜板去买枪支，个个都有献身精神。他们动不动就被本地区权大无比的朱家象狗一样抓去枪毙。我们不应忘记朱家只不过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

朱家向我们显示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以及他们的几千亩良田，这些土地原先都是农民的财产。但是带着王冠的头脑里也有着不安——朱家的人每走一步都得提心吊胆。他们谁也不敢在没有家丁护卫的情况下独自到各村去。每日每夜，朱家的生命财产必须得有人保护。而且，四周那些农民晚间集会的群山似乎也离朱家越来越近了。

这就是中国今天在谱写的历史。

五、共产党人姗菲

这里说的是中国湖南一个有钱地主的女儿，姗菲的故事。她过去是穿着绸子旗袍，挂着一枝钢笔的学生，但后来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同一位农民领袖结了婚。在以后的年月里——不过我得把事情从头讲起——

故事还得从她的母亲讲起。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一个旧式的女子，缠着小脚，对她那个封建头脑的丈夫百依百顺。不过她也曾有过反抗精神。她看着她的儿子们长大了，上了学，带回来新的思想。有些新思想同妇女有关，说有些妇女不缠足，同男人一样上学，并且只同她们中意的男人结婚。

儿子们在谈天说地时，做母亲的就坐在一旁听着，眼睛凝视着在摇篮里踢脚蹬腿的小女儿，姗菲。她

陷入了沉思。她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她最终是为了女儿的自由而牺牲的。

这场斗争是在她家那个四周筑有石头高墙的深宅大院里展开的。敌对的一方是她的丈夫及其兄弟们。这个做母亲的武器是受人摆布的女人拥有的古老武器：眼泪、哀求加上计谋和狡诈。开始时她的要求几乎都得到满足：她的丈夫同意让姍菲去上学，条件是老师必须是个老派的人，只请他到家里来教中文。但姍菲的脚必须裹上，必须按照古老的规矩由父母许配成亲。所以这孩子的脚给裹起来了，并把她许配给有钱的邻居家一个体弱多病的少爷，而那个儿子的父亲则是一个有着许多妻妾的老色鬼。

姍菲的父亲是个暴君。但到她十一岁那年，他突然去世了。或许这是自然死亡。或许是姍菲母亲的真诚眼泪感动了老天让他早日归西。但是丧事未完，她就把小女儿的裹脚布给去掉了，墓土未干就把姍菲送到一百里外的学校里去上学了。

虽然裹脚布去掉了，但那双裹了五年的小脚已经伤残，那些失去知觉裹断了的脚趾成为这个女儿的终生残疾。

不管怎样，脚布已扔掉，一种奴役性的象征也随着清除了。不过还没有摆脱许配给那富翁儿子的婚姻。这种许配婚姻在中国是有法律效力的，可以对毁约一方的父母向法院起诉并将受到重罚，就好象他们犯了危险的罪行。姍菲母亲的那种倾向被有封建思想的人称之为罪大恶极。因为她被怀疑是阴谋破坏这一婚约的人。

更糟的是，谣传她不是劝导姍菲象个女孩子那样顺从听话，反而鼓励她争自由，要反抗。当消息传来说姍菲在学校里带

领学生罢课反对腐败的学校当局时，这一谣传更是如火如荼，不胫而走。那时她快十六岁了，正到了该结婚的年龄。然而她被学校可耻地开除了，但回到家里还趾高气扬，若无其事。她的母亲非但不责怪她，还偷偷地同女儿商量，把她转到遥远的长江沿岸武昌的一所更具现代思想的学校里去就读。那里又传出谣言，说她当了学生运动的一名头头后，也是声名狼藉。更有甚者，在武昌男女学生都在一起学习。

事情越来越恶化，最后那有钱的地主向法院控告了姗菲的母亲，指控她阴谋阻挠这桩婚姻。但这老太太非常机智地为她自己辩护，甚至使法院也相信她只不过想把这桩婚事往后拖延两年。

她说服了法官，但说服不了那个地主。照老规矩，他求助于村里的武装乡绅，打算趁姗菲暑假回家时，强行抢亲。但他们未能得逞，姗菲逃跑了，又去武昌待了一年。当她再次回家时，又要来绑架她。在她母亲的帮助下，她再次逃跑了，躲在农民的家里，沿着另外的一条路线返回武昌。

当她到达武汉时，得知她母亲已经去世。这或许是自然死亡，也或许不是。姗菲说她母亲是由于长期苦斗和家庭争吵的痛苦给折磨死的。“她是为我而死的”，她说道。她没有伤感地哭泣，只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自豪。

姗菲学校里的同志们曾设法不让她回去参加丧葬。但去世的，不仅仅是她的母亲，而是一位为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先锋战士。姗菲年轻而无所畏惧，对她两次逃脱旧势力感到自豪，并认为她能再次挫败他们。为了以防不测，她同学生会的同志制定了计划，如果她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返回武昌，他们就应开始

寻找，并设法去营救她。

她母亲的尸骨未寒，姍菲的老家就被武装人员包围起来了，她被强行抓到她公婆家，关在那套新房里，要她回心转意。但她没有改变主意，而且还绝食了一个星期。她的绝食斗争只是这个地主家又出现了一个反抗的女性时才取得胜利。

这个妇女是老地主的原配夫人。中国人管正房叫“母亲”以有别于他的小妾。这位老夫人耳闻目睹这个奇特而有反叛精神的富家女子，以及多年来围绕着她种种斗争，就运用女人古老的计策使这个姑娘获得自由。地主赐给她的自由只有在家里和庭院里走动的权利，不能越出深宅大院之外一步。不过在中国，什么秘密也保不住，新闻到处都是不胫而走。或许这就是一个女学生和两个男学生从南昌到这里来的原因。他们买通了一个仆人给姍菲送进去一封信。最后，一天深夜，姍菲想办法爬上了那垛高墙，消失在墙外的黑夜里。那天晚上她同几个朋友披星戴月骑马逃往武昌。

时值一九二六年仲夏，革命之风正席卷着整个中国。不久南方的军队包围了武昌。姍菲放弃了学业投身到群众中去。她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在工作中她爱上了一个深受农民爱戴的农民领袖。她不顾把她许配给那个有钱地主儿子的旧习俗，宣称要同自己心爱的人自由结婚。从那时起直至今日，她的生活深深地同故乡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她过的是最穷苦工农的生活，吃、穿、干活都同他们一样，并且在许多战场上同他们一道面临过死亡的威胁。甚至在她怀孕和流产时，她也是全力以赴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后来她生了孩子，就把孩子背在背上继续工作。

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姗菲是个非常活跃的女革命者，被派到她的故乡担任国民党妇女部主任。她还是革命法庭的一个成员。革命法庭负责审讯革命的敌人，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土地分给贫穷的农民。她把自己家的土地和她从前公婆家的土地都没收充公了。

当革命成为一场社会变革时，国共两党就分裂了，并出现了可怕的白色恐怖。军阀和封建地主重新掌了权。姗菲的娘家和婆家都要求国民党将她逮捕法办。当局终于下了逮捕令，这意味着姗菲和她的孩子都将被处决。同她一起工作的两名妇女和三个男的也被逮捕了。那两个妇女被割去了乳房，这五个人都要当众游街后砍头。但工人们在棺材里打了几个通气孔，把姗菲和她的孩子装进棺材，抬着他们通过警卫森严的城门，来到城外的墓地。姗菲又从这里逃往武昌。有一次她因留着革命党人的短发而被捕，但竭力辩解自己是个有小孩的无辜母亲而被释放了。

她到了武昌后，党立刻又叫她回到湘西秋收起义的激烈斗争中去。湘西的农民武装起来拒绝交纳租税，并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姗菲白天同他们在一起；夜里就睡在深山密林里，同她在一起的也是一些不敢在家过夜，对现实不满的人。后来派来军队攻打他们，农民被打败了。几千人被杀，其余的被缴了枪。

这样，姗菲又回到了武汉，并再次被派回去参加战斗。这次她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一个由军阀控制的城市去工作。城外都是农民的武装；在城里姗菲以国民党妇女部主任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暗地里她在军队和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个城市里的司法局长是个富有的军阀，对姗菲一见钟情。她一本正经地听着他的谈情说爱，但没有忘记向他打听关于镇压农民的计

划。他毫无保留地都告诉了姗菲，她就将消息送到城外的农民军队里去。城外军队里的一个领导人就是她的丈夫。

最后，农民攻打了这座城市。姗菲在军队里的宣传鼓动工作过于明目张胆，终于被逮捕并判处了死刑。她托人找来爱上她的那位官员。他听信了她矢口否认的辩解，就释放了她，并让她离开这座城市。农民军终于被击败了；那些活着的人中有她的丈夫，最后在武汉找到了她。

姗菲后来又负责党的排版印刷等技术性工作。她把孩子放在身边的桌子上，一面哼着哄孩子的曲子一面工作。有一天，她的家被军队袭击了。她的丈夫碰巧不在家，她也只是军队来搜查前几分钟才离开家。她从远处看到有士兵把守着她的家门口。几小时后她溜进家里去找她的孩子。士兵已把那孩子扔进一个水桶里给淹死了。尽管她同丈夫百般设法照料，也没有把这个小孩养大。夫妻俩抱头痛哭了一场，姗菲又得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生活中有些事情是很奇怪的。有一天，姗菲碰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天她去拜访她从前上学的那所学校的校长并决定在那里住一夜。第二天清晨，她被嘈杂的喊叫声惊醒了。在那些喊叫声中她似乎听到有她丈夫的声音。她坐起来侧耳倾听，清楚地听到有人高声喊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牺牲！革命万岁！”她的朋友用一个枕头捂住她的耳朵，并对她说：“他们每天都要砍头或枪毙一批共产党。那块空地就是他们的刑场！”

远处响起了一排枪声，喊声消失了。姗菲起身摸黑来到刑场。士兵排成长队走了，只剩下一小群人呆呆地看着好几排死者的尸体。姗菲在一个尸体身上绊倒了，翻过来一看竟是她那

被处死的丈夫，身上还有热气呢！

白色恐怖之网收紧了，这时才下令让姗菲离开武汉。她从长江沿岸的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在工厂里劳动并从事组织妇女和儿童的工作。她从未有过较长久的的工作，因为她脚有残疾无法使她在机器旁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

一九二九年夏，她又同武汉的农民在一起了。有一天，她被派去长沙，她同两名男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是农民领袖，一起被捕了。她坐了六个月的监狱，后来新军阀推翻了旧军阀，只是为了报复对方才释放了许多犯人。但他们不释放那个农民领袖。姗菲买通了一个监狱看守人员，得以在离开前见了他一面。他的脖子上、腰里、双手和双脚都带上了镣铐，并用铁索连在一起。中国的这类犯人据说只能活两年。姗菲自己倒没有被铐上手铐和铁链，但她在狱中得了皮肤病、胃病、肿瘤，她的皮肤由于贫血而苍白。她出狱后身体十分虚弱，然而她又回到了农民中去，继续参加战斗。

一九三〇年春，她作为一名代表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朋友们把她送进一家医院，开刀切除了那个肿瘤。在此期间，她在枕头底下放了些研究马克思的译本，有一次她说：“现在我有时间学习理论了。”

有人会问：“姗菲年轻漂亮吗？”

姗菲二十五岁，黝黑的皮肤，开阔的脸，高高颧骨上面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似乎能看透中国象黑夜那样无比深沉的黑暗。她的身体象农民那样壮实，很难把她推倒在地。她深深地扎根于土地，就象是土地的一部分。她美吗？我不知道——那你说，土地美吗？

六、强盗、土匪和军阀

土匪小梦有许多难忘的往事。其中有一桩是他还是个六岁的胖小子时遇到的。有一天，他跟着他那个当铁匠的父亲悠闲自得地从一条山间小道往下走，他父亲身上带着一枝枪和一把刀。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两个光着脊背的台湾土著山民。这两个土著身无凶器，看上去也很和气，同平原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那铁匠二话没说，举起枪就击毙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山民冲向他要讨还血债，他又抽出腰间的那把刀结果了第二个土著的生命。

小梦吃惊地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他的父亲剖开死者的胸膛，掏出心脏，用树叶和青草包好后就下山回家了。铁匠回到家里又把心脏煮熟吃了。

小梦的父亲就这样为他死去的父亲报了仇。他的

父亲是大约十年前被台湾山上的土著人所杀害的。

在同一年里，小梦还见到另一件奇事。一个身材颇长，白皮肤，白头发，脸上长着象猴子那样白毛的人来到镇上。这个人的眼睛与众不同，不是黑的，而是蓝色的，穿的也不是文明人的衣着，而是一套滑稽可笑的衣服。但最最奇特的是他的鼻子：那鼻子不象普通人那样端庄大方，而是一个高高的鹰钩鼻子。

小梦无论从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或者有关神鬼和龙的传说里都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怪物。这个人只有一点和大家相同，那就是他也会说中国话。镇上的许多人对此感到是种奇耻大辱，这样一个怪物居然也能说中国人的语言。大家都装作听不懂，即使他讲完后问他们：“现在听懂了吗？”他们也摇摇头说，“不，我们不懂！”

这个人刚刚到镇上时，小梦同几百个小孩一道在街上尾随着他。大伙你推我挤，悄悄地议论着，偶尔有胆子大的会冲上前去骂他一句或扔过去一块石头子。这时，那人就会转过身来，使他们惊奇的是，他非但不发火反而很和气地同他们说中国话。这样闹了一段时间后，大伙也都散了，但小梦仍跟在后面。这个小家伙有无穷的好奇心。这个圆脑瓜剃得干干净净，只留着一条拖在背后的长辫子的胖娃娃，象个影子那样老是跟在这个陌生人的后面。小梦后来解释道，“他长着这样一个高鼻子，我得好好看个够。”

这个人经常消失在城郊一幢新建筑的圆洞门里，那楼房的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有一次这个小家伙大着胆子往圆洞里面张望，后来还跟着这个人走了进去，沿着两排长椅中间的通道一直往下走，这个人没有把他抓住吃掉，而是把书里的图画翻

给他看，这孩子的恐惧心也就完全消失了。小梦回忆起给他看的第一张画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半裸体男人，长着一双中国人的眼睛和一条长辫子。这个人是外国的一个上帝，他的名字叫耶稣，这个白人告诉他说。

小梦说这幢楼房是一座寺庙，但没有金面佛身的大菩萨，也没有罗汉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里敬奉的有各种各样的上帝，但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名字和敬奉的方式。有一个很象观音；那个叫耶稣的其地位类似菩萨，他的周围有许多小天神，叫作圣徒。他们受一位年长的上帝掌管。人们祈求上帝，也象中国人祈求古老的菩萨那样，盼望赐给饭食，虽然外国人是祈求面包；祈求风调雨顺和好收成，或为你在福建或南京的亲友祈祷。祈求的方式唯一不同之处是中国人要下跪三叩首，而新的外国方式只须下跪，免去磕头的礼节。但新的传教士——这个陌生人就是个传教士，忌讳并诽谤中国的菩萨，把他们自己信奉的一套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小梦是第一个皈依这个新宗教的人。因为这个大鼻子是教他读书识字，教他英文的启蒙老师。但最主要的是他在这个外国教堂里学会了弹钢琴和唱歌。他最喜欢唱歌，至于唱些什么或者信仰什么都无关紧要。很久以后小梦在回忆他皈依基督教时的情况说：

“那时我很年轻，脑子也简单。但我喜欢那音乐，同时我学会了读书写字。所以我就说我是个基督教徒了。我的父亲开始不喜欢，但后来他说：“没关系，如果想有出息，信的上帝越多越好。我一辈子相信古老的菩萨也没有发财致富。”在说这些话时，小梦的神情很严肃，然后补充说：“但有了新的上帝

我的父亲也没有富起来。他始终是个穷人。上帝也不帮忙。他们只帮那些牧师和传教士使他们富起来。你看见过吗？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变得非常富有，到处都有宽敞的房子，过着军阀官僚那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 * *

身材矮胖结实的小梦是他父亲的独生子，十四岁那年，他跟母亲回到福建山区的老家为他那去世的铁匠父亲举行丧葬。他和他的母亲也准备在那里生活下去，小梦这个独生子为他父亲的亡灵举行完了最后的葬礼，并把牌位安放到祠堂里。

那铁匠父亲过去经常谈起的这个山村使小梦感到迷惑不解。或许是因为时间和距离冲淡了他父亲曾经用既热爱又抱怨的口吻谈到的那种生活现实；或许是这个村子如今确实变得赤贫如洗了。这里无疑是个极度贫困而荒凉的地方。全村大约有四百口人，都是小姓家族人，生活在古老的几代同堂的，大大小小的家庭里。

这些人当中只有两个家族生活过得好些，他们高人一等，同那些穷亲戚不来往。他们拥有这个村子附近的几乎所有的土地，而作为佃户租种这些土地的穷亲戚要把收成的一半用于交租。除了要把这辛勤劳动所得的一半收成交给地主外，他们还要给那有钱的亲戚额外送礼。佃户们给这两房大户人家送去鸡、蛋、水果和编织的筐子。在年成不好，急需用钱时，他们就卖儿卖女。这两房大户人家的那些女仆人都是从村里穷苦人家那里买来的。

小梦这个皮肤黝黑，圆脑袋，精力充沛，毛手毛脚的孩子对贫困的诉说听得多了。但这里是无穷无尽的这类谈论。福建

在他过去的想象中是一个奇妙的世界。然而当他从他的山村老家外逃到山上流浪时，他发现各地的村庄都同他的家乡一样，连混口饭吃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村子里唯一使这个青年感兴趣的是关于山上土匪的谈论。小梦的一个叔叔是土匪，跟他在一起的还有本村和邻近村子里的许多人。他们隐姓埋名，神秘莫测。

小梦的这个叔叔有时回到村里来——都是黑夜里回来，天亮以前离去——使家里人又惊又喜。更重要的是他给家里留下了钱和财物，有时是少量的，有时很多，使得这一家人免受极端贫困生活的煎熬。这样回来几次后，这个叔叔的妻子就心满意足了，而家里的男人说这种新的收入，如能长此以往的话，总有一天会富裕起来的。这个叔叔以土匪为生还是不久前的事。

山上的土匪都是象小梦的叔叔那样穷苦的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散兵游勇。他们要末从军混碗饭吃，拉人力车或在沿海城市码头上当苦力，或移民到南洋，在那里，一百万人里可能会有一个发财致富，但其余的都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或者上山为寇，这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充当“劫富济贫”的行侠。这些人结成小股土匪或大队人马。他们不到自己的本村去抢劫，但对那些没有他们的亲属居住的陌生村镇，则会毫不犹豫地去抢劫放火。小梦本村的那两户富有人家尽管有武装警察守卫，据说这两家还是定期给远处的土匪秘密纳贡，只有如此，这两家才能平安无事。但这种贡金到头来还是靠搜刮村里的民脂民膏来补偿。

小梦的叔叔夜间下山回到村子的次数多了，家里突然发现已有足够的钱可以实现他父亲多年来积攒每一个铜板要想完成的计划——送这个年轻人去沿海某地上学。小梦早已被他的家里看作是将来当官的材料；因为他不仅能读会写本国的语言文字，而且还在台湾学会说日语，至于他从大鼻子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英语虽然简单，但在村里人的眼中已是了不起的成就。铁匠生前积蓄的那笔小钱，如今又加上了当土匪叔父抢劫来的那部分钱，所以小梦给送到沿海的一所军校，指望他日后不久就会提升为一名将军。这样，他的叔父选择走向权力和财富的是一条路，而有许多梦想的这位年轻人则给送上另一条道路。

* * *

小梦说他的学校生活是无组织、无纪律、毫无意思的。他的思想是一种大杂烩，既有三国演义里英雄好汉的丰功伟绩，也有基督教中圣德创造的奇迹，加上民间传说中的神鬼妖魔和他那山大王叔父更为生动具体的事迹。此外，他不喜欢干任何工作，但却有无穷的幻想，加上生性暴躁好奇，就经常产生一些严重的越轨行为。

在沿海军事学校七个月的训练还未结束，小梦的好奇心就消失了，而他对学校里的纪律和日常课目已感到厌烦。他并非年幼无知，而是很快就明白渴望当上将军同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无关，而是靠财富、权力或影响，没有这些因素，一个青年只能象他那个上山为寇的叔叔一样，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开辟财源。

小梦不仅想要出人头地，掌握权力，扬名天下，而且还有一种要想见识见识世界的好奇心，他终于离开那所沿海军校来

到了北京。这个城市里最光彩夺目的地方是当时知识界文艺复兴的中心——北京大学。他以迷惑不解的眼光看到学生中的动乱和中国封建、腐败、没落的社会制度正在受到的挑战。他考入一所中学，徘徊在这个城市知识分子的黑暗生活之中。很久以后他对一个朋友说道：

“学生们吵吵嚷嚷，喋喋不休，又是开会又是罢课。他们谈论自由思想，共产主义，但看看今天！相信这一套的学生也没有成为大人物。他们只是些小人物，或者已经脑袋落地了。这种自由思想，这种共产主义有什么用处？现在我的脑袋没有掉，将来有朝一日还会成为一位将军呢。”

他轻蔑地说到那些敢于向不良的旧制度挑战的愚蠢青年。因为即将降临的新世界的曙光从未照进过他的思想，所以他保住了脑袋。因为象小梦这样毫无头脑的人在今日中国是平安无事的。

* * *

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小梦就被北京的这所中学开除了。他根本不做功课，只是整天瞎混。但在给家人写信时，他则把学业成绩和认识许多大人物等情况吹得天花乱坠，从而可以不断得到家里给他寄来的小笔汇款。开除以后，他在北京流浪了一阵子，然后回到福州。在福州，他通过构成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找到了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古老的封建秘密组织。

这个组织是太平天国著名的三合一会的残余。一个多世纪之前，这个组织就作为帮助穷人的一个慈善机构而存在了。后来自然发展成为一个同压迫和腐败的清廷进行斗争的秘密政治派别。但现在所有没落和反动的势力都结合在一起了，并为保

存他们自己和反对社会革命而战斗。现在只要有钱，他们什么都干，贩卖鸦片，走私军火，绑架，恐吓，贩卖奴隶，或者就干谋杀的勾当。据说十五名首领中的每一个都吹嘘自己是太平军首领的直系后裔，作为这个政治派别或那个军事集团的工具，其效忠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所付金钱的多少。但是这些首领们只对一种力量不断地发动战争，那就是社会革命，因为它威胁要消灭中国的封建、腐败和寄生的阶级。

那个生性好奇，爱冒险，放荡不羁的小梦参加的就是这类组织。他在这种组织里感到如鱼得水，很适应。他加入该组织先当了六个月的徒弟，该组织的上级是福州的一个师长，他对这位上级和该组织保证严守秘密，赤胆忠心，死心踏地，永不变心。

虽然保证严守秘密，小梦并不能做到始终守口如瓶，有时当他远离福州时，不免自我吹嘘一番，夸耀他们组织所取得的成就。有次他说道：

“我的叔父现在也是我们组织里的一名成员。我们土匪控制着好几条河流，我的叔父占据着一条主要河流的一段。船只通过时必须付钱；如果不付，我们就扣留他们，夺走大米，放火烧船，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弄到很多钱，有些归我们土匪，有些归我们在福州的首领。”

“真的土匪吗？”小梦的朋友惊讶地问道。

“当然啰！”小梦对这种无知的问题感到吃惊。对其他一些问题，他更为诧异了，他两眼盯着他的朋友问道：“你们以为是什么？”他说这些人真愚蠢。“你们可能以为政府里的将军同我们土匪不一样？你们可能认为他们会征求中国人民的意

见，他们是否有权统治并拿走他们的钱？土匪和政府将军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我们土匪还没有弄到足够的枪支和金钱。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钱……在福建的一个大城市里，我们的人控制了三个城门，一旦我们控制住第四个城门，我们就会占有整个城市，那时我们就能爱收多少粮就收多少粮，爱抽多少税就抽多少税。我们还会拿下越来越多的城市，然后是整个福建、江西以及其他地方，同时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中国政府。我会使我们的所有官员对穷人亲善友好。”

小梦在福建山上打仗的土匪队伍和福州之间来回往返。作为一名交通员，他跑遍中国沿海一带的地方，每跑一次，他总吹嘘又结识了一些“大人物。”几个月后，他从福建山上下来，他的肌肉就同一头野兽那样发达。有一次他吹嘘：“在山上现在我手下有八百名土匪。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人！什么？你说我们劫富济贫——是的，不过我们也经常孝敬福州的大人物。”

“现在我们的队伍人多势众。增添了许多新人——农民，是的——从农村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的。我们坐在山上聊天时，我就告许他们应当怎样干。他们对我言听计从。他们认为我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什么都懂。有时我给他们谈谈我在上海、香港、广州的所见所闻。有一次我给他们表演上海穿西装的中国人怎样在夜总会里跳舞——你知道，他们怎样穿着紧身西服一圈圈地转着。”小梦又矮又胖，身体结实穿着一套紧身的西服，开始在房间里跳起来，一只手好象搂着一个姑娘，另一只手伸在一边。他轻飘飘地旋转着，仰起头开心地笑着，发出滑稽的尖笑声。

“当我表演给我的那些土匪看时，”他说道，“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甚至扒在地上……有时我跟他们讲我读过的一本书，他们就书里的事情展开争论。我还教他们唱我从上海的留声机里听来的关于一个瑞士姑娘的歌；这个姑娘坐在山顶上几十年，终年唱歌，盼望她的情人……那是一首很好的歌。有时我教我的那些土匪唱基督教歌曲，那是大鼻子传教士在台湾时教我的。”

或许小梦在撒谎，或许他讲的实有其事或部分是真的——或许他把事实真相同胡思乱想混为一谈了。他说他到过从新加坡到东京的许多城市。在新加坡，他说，他和一个朋友在街上走，两个人都没有钱吃饭。他身上只有一个小硬币，但也不够吃一顿饭。这两个人在新加坡没有认识的人，感到走投无路。后来一个老头走到小梦跟前来求乞。“因为我的心地善良”，小梦就从口袋里拿出他唯一的硬币给了他。

“以后怎么办呢？”他激动地对他的朋友说。他们走了几分钟来到一家很大的中国饭馆。他们看到什么了呢？在一条街的黑暗小角落里，他们看到一个样子古怪的罐子。小梦弯下身去拣起来一看，里面装满了银币！他讲起这段故事时，那双神秘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那是一个鬼影！”他解释道。“他要试试我的心是好还是坏。但当他看到我给了他一块银大洋，他就把那个罐子摆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如果听众中有人表示怀疑，那只会促使他再重复一遍那个故事并一口咬定他在福建的山上经常看到鬼。鬼有时变成一个乞丐，有时变成郁郁寡欢，忧心重重的女人。

意外得到这罐子银元后，小梦和他的朋友在新加坡过起达官贵人一样的阔佬生活，经常到一家中国大饭店里吃最精美的食品。后来他是爪哇反对荷兰人的民族起义领袖，其地位仅次于头号领袖！他来回踱着方步，象大人物那样发出短促的笑声，谈到他怎样去的爪哇，如何使当地的革命者懂得应当发动革命去争取自由。他们都听信他的话，后来就开始了⁶一场起义。他们战斗，再接再厉地战斗，小梦在前面领导着他们，由于荷兰士兵人数过多，他们不得不逃往山上。在战斗中，有的逃跑了，不少人被俘，小梦本人这个头头也被俘了。

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并不担忧。他是怎样逃跑的？啊，那是秘密！小梦把荷兰人捉弄得晕头转向。你看，他出生在台湾，从小就会说日语。他甚至样子也象一个日本人。所以他对荷兰人说他不是个卑鄙的中国人而是一个日本人，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他们就信以为真，因为他说话非常机警，也就没有把他当中国人那样加以惩罚，只是把他装上一条船运往台湾或日本。但他们不知道是在同谁打交道！到了香港他就从船上逃跑了，回到了福建的山上。他在结束这个故事时，兴奋地高喊道：

“啊，多么美好的故乡，我们的福建，我多么高兴能回到你的怀抱！我的人马能再次见到我应有多么高兴。当我对他们说起我的所作所为，他们开心极了。将来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福建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家园！”

后来小梦还到过东京、横滨、大阪、长崎，但他没有发现需要他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或许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有关革命起义的书或小册子，而他所谓的革命起义只存在于他的想像之中

或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的那种事情。尽管没有革命，日本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但要了解日本光走马看花是不够的。

“多么美丽的城市！多么漂亮的女人！她们无论坐在家里或起来走动，你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虽然中间只隔着一堵纸墙。她们简直安静得象个耗子！”

当然他是朝鲜民族主义起义运动中的一个领袖，他奇迹般地逃出来了。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宣布：“我同荷兰人打过仗，同日本人打过，将来我还要到印度去，教印度人去打英国人。我将对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亚洲人必须团结起来。我可能不久就要去……那时我将能见到所有的大城市。印度都有哪些大城市？加尔各答、孟买——还有哪里？好——我都要去看看。现在我要回到福建山区——啊，多么美丽的家乡，我的福建！”

他停下来思考了一会，然后开心地笑了。“当我说福建话时，除了福建人以外，谁也听不懂！在南京、上海、汉口、谁也不会说福建话！在上海，现在我有个表亲——你知道，他同我们的组织保持关系。我同他用福建话说，谁也听不懂。”

“你指的是什么关系？”

“你们知道——指同这里的土匪保持关系。是的，你们称之为匪徒。我的表亲住在这里。他有一个很小的房间，有时替我去同大股土匪接头。我不能告诉他去接头的目的，因为那是我们组织内部的秘密。有时他干了些蠢事，我就说他是我背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如果他再干出愚蠢的错事，我将把他送回去，换个更好的人来。我们在上海的关系网是很重要的。”

* * *

他在长江沿岸的多次旅差中有一次从福州来到上海。在九江，有次我去看一个同我共事过的将军。他的士兵——你们知道，他的警卫——不让我进去。但后来我脱掉我那顶外国帽，就象这样，我笑着说：“你认识吗？”那几个士兵笑了并向我敬礼，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去了！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大人物呢。”

小梦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就好象是对着警卫脱下了帽，不禁失笑，在房子里大摇大摆地走着。当听的人没有听懂他讲的意思，他就采取全中国都很普遍的一种习惯，用一个手指在另一只手掌里把那个字写出来。“警卫”，他嘴里念着，同时在他手掌里比划着“警卫”两字。

“在汉口我们的队伍很穷——我们只有七十五枝左轮手枪。我到了九江对那位将军说：“如果你要我们的人去杀蒋介石，必须给我们钱。”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七万五千元！”

“‘杀蒋介石要用七万五千元，太多了！’那将军说。”小梦学着将军的那付惊讶状态。

“但我对他说，不能少于七万五千元，因为如果我们的一些人被抓或被杀，必须给他们的家属一笔钱。我们还要组织力量。我们的人不会无代价地为这个或那个将军去卖命！他怎么想的——以为他是我们的老祖宗吗？”小梦带着一付无辜受害者的表情。

两天以后，小梦偷偷地走进他寄住的一个外国朋友的家，后面紧紧跟着两个身材瘦削的中国人。这几个人溜进了那座房子，穿过走廊，也顾不得东张西望，轻轻地象猫一样进到了小

梦的房间。小梦关上了门，然后溜进他朋友的房间，脸上发出神秘和喜悦的微笑。

“你知道吗？”他悄悄地说，“他们是我的福建朋友！你还记得上个月蒋介石的一名将军在福州给打掉了一只耳朵的事吗？是我这两个朋友干的！子弹没有打准，那将军跑掉了。现在我的朋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把他干掉。他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不要杀掉这个将军，而是把他绑架走。如果我们杀掉他，我们只能得二万元钱，要是我们把他绑架走，他的家里可能会给我们二十万元。你觉得怎样——是把他杀掉好或是把他绑架走好？”

那外国朋友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小梦高兴地继续往下说：“我认为绑架最好。然后我们把他藏在我的房间里，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把他藏在一个外国人的家里！”

那朋友吃力地坐下。小梦很高兴地转过身，他的朋友听到他穿着一双中国布鞋走出房间，穿过走廊，然后进入另一个房间里去。

“我的上帝！”那个吓得发呆的外国人喊了一声，紧跟着走了过去，坚决反对那个要危及他家安全的灾难性计划。

* * *

此后过去了大约九个月，土匪小梦的影子也见不着了。一个晚上那外国朋友很晚才回家来，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朝向走廊的不通风的小行李室。房间里面的一堆箱子中有一张旧沙发，只见小梦躺在上面打呼噜。他蓬头垢面，从衣服到鞋子，浑身上下都是泥污。你摇他，推他，喊他都弄不醒，他只是一个劲

地熟睡着，吼声如雷。那朋友把沙发拉到走廊，也就让他睡着。他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他满身污泥，蓬头垢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地，他说：

“我累了。”他解释道，“我很久没有安稳地睡过觉了。你看，我的腿上挂了花。”他卷起裤管露出一块还未痊愈的大伤口。

“我将睡在你的家里，直到我从蒋介石那里得到钱再走，”他冷冷地说道。

他的朋友吃惊地问是怎么回事。

“我在福建山上打共产党有很长时间了，”他苦笑了一下解释说。“现在我来向蒋介石的人要钱。”

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那钢铁般的双臂和背部肌肉裹在那套紧身的西服里，犹如一头猛兽。尽管他受了伤，他的行动仍和猫一样敏捷。

“我上次见到你时，你是在同蒋介石的朋友打仗，”那外国人提醒他说。

“啊，是的，”小梦欣然回答道，“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闽西山区的红军变得非常强大，而且还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你知道吗？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写出‘苏—维—埃’三个字。”七个月以前，组织派我到闽西去同朱德谈判；你知道他是红军的总司令，当时毛泽东也在场。我对他们说，哪些县，哪些区归他们，哪些地方归我的人马，他们不得攻打我们，或者通过宣传把我们的人挖走。我想同他们订个君子协定——你懂吗，订一个协议，因为现在他们变得很强大了。我告诉朱德我现在有八百人，我的叔父有一千多人。我们在福建的全部

人马大约有五到八千人……

“朱德和毛泽东同我谈了很长时间。不，他们不肯同我订协议！他们只对我说，他们的苏维埃政府不支持土匪。他们不是象我那样的一个秘密组织，而是一个工农的政府——他们管它叫无产阶级。他们说他们将建立一个没有地主、资本家、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国家，建立一个只有农民和工人等劳动人民的国家。他们同我谈了又谈，说我的土匪队伍中也都是穷苦的农民或士兵，他们别无他路，就成了土匪。然后他们说土匪不管用，我的秘密组织也不行，所有的穷苦人要团结在他们的红旗下……你知道，他们把红旗给了我，在旗角上有个标记，他们说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标志。”

“后来怎样？”他的朋友问道。

小梦默不作声，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他的朋友很了解他，一看那表情就能猜出他的思想；这说明苏维埃领导人拒绝了小梦想成为一个“大人物”或当一个领导大批人马的将军这种野心。小梦听了他们的想法，认识到那是一个对他不友好的世界，那是一个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要守纪律的世界。任何使穷苦人成为他们自己命运主人的组织，而不是他那种思想混乱的乌合之众，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朱德是否答应给你一个司令当当？”他的朋友冒昧地问了一句。

“他什么也没答应！”小梦伤心地回答道。“然后我回到福州，我的组织从蒋介石代表手里领到枪支和金钱。蒋介石给我们弹药，并说如果我们消灭掉红军，目前红军和他们的苏维埃政府占据的闽西地区各县及其税收都归我们……接着，我同

其他人回到福建山区，同红军艰苦奋战了七个月。”

然后他用玩世不恭和洋洋自得的腔调说道：“有时我们拿下好几个村庄，把村里的人都杀了！红军就赶来打我们……他们打得很顽强——我不知道他们如此善战。我们总是不得不撤离。到处都有他们的奸细……甚至儿童也替他们放哨，我们一到就去报告红军。有时我们进入村子，除了老人和几个小孩，什么人也看不见。所有人都参加了红军投入战斗！我们把老人和小孩也都杀了，因为他们都是奸细和赤色分子！我们烧掉所有的房子！红军回来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但是蒋介石给我们的弹药和钱都太少。红军把我们赶了出来，夺回了所有的县！所以现在我们的队伍境况非常困难。许多人离开我投奔红军去了——我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经常对他们说，我们将建立起自己的政府，比红军还要好的政府，但他们不听。后来有人给了我这一枪！”小梦摸了摸腿上的那块伤口。

“是谁打的？”他的朋友小心地问道。“是红军还是你们自己的人？”

小梦站在那里，眼睛凝视着窗外，脸上流露出痛苦和嘲弄的表情。他只是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听上去就象一声轻蔑的笑，接着他就默不作声了。

* * *

小梦在等着蒋介石给钱，这期间他经常一瘸一拐地在他朋友的房子里来回走着，回忆在山上的那些神秘经历。

“有一个晚上我们在山上艰苦奋战。睡觉时我们都不敢躺下，因为我们实在太累了，一躺下，甚至红军来了也醒不过来。我们就这样背靠背地坐着打个盹，因为我们随时都要准备

打仗或逃跑。我们把枪拿在手里，脑袋这样耷拉着……知道吗？有一晚我们拿下一个村子，但几乎所有人都跟红军跑了。我对一些卫兵说，“你看好这边，你守着那边，其余的睡觉。”我走着走着，碰到了一个箱子，我想这是个睡觉的好地方。我就躺到箱子里很快就象个死人一样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发现身子底下有个东西，站起来仔细一看——底下是一具尸体！我摸了摸我的背——硬梆梆的，因为，你知道，那死人的血流到了我的背上，我的上衣给凝固住了！”小梦对自己的这场闹剧不禁放声大笑，并一再说道：“我杀了一个人然后又睡在他上面！我把那个人翻转过来，但看不出他是一个士兵还是将军；因为，你知道，红军里的军官穿着和生活都同士兵一样！但看到自己杀了一个人而又睡在他身上时，真叫人好笑！”

……他回忆的另一段经历是：“有个晚上我们战斗后拿下一个村子。村里只有一些老太婆和小孩。我们累极了，也顾不上去杀他们。我的人马都睡在屋子里或树底下。我发现一座空房子，就从门里走了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好象从来没有人住过似的。我倒在一张床上睡得死死的。

“半夜里有个东西把我弄醒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睁开眼看了看，对面站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美貌姑娘。她哭呀，哭呀，哭个没完。我起身问道，‘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但她不回答。我搂住她，象个父亲般地安慰她，然后我让她睡到我的床上。整个晚上我都哄着她。早晨我醒过来，那姑娘不见了。窗外站着我的部下和一些老太婆。我问道：‘你们张口结舌地怕什么？’我的部下告诉我，听老人说这座房子里

有个鬼——你知道有个‘鬼’，他们说很早以前这座房子的墙脚下埋着一个女人，从那以后，谁也不准到那里去睡觉了。如果有人去睡，就会被那女鬼卡死。”小梦的两只手卡住他自己的脖子做个样子给人看。然后他放下双手胜利地笑了：“但这个女人没有卡死我！因为我有一颗好心肠，整夜我都安慰着她！”

* * *

一九三一年，政客和军阀在广州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府并威胁要进军南京，小梦参与了这个阴谋活动。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毛料西服在炎热的广州街头上奔忙。他的一件中式白布褂子送出去洗了。他买这套西服是为了同官员和军阀来往时给人一个好印象。这套西服是按照一个同他一样高，但胸围不一样的人定做的，因此上衣前面的钮扣总是扣不上，而袖子则太短。头上的那顶草礼帽对他来说也太小。一根手杖是花了五角钱买来的，这样他从头到脚都有一套打扮了。

“我穿上这一身象个资产阶级，”他对街上碰到的那个外国朋友解释道。“我的那套中式服装拿出去洗了。现在我只得穿这身衣服，要等那套洗好后才有得换。”

小梦的朋友跟着他一起去到他住的那个又脏又黑的廉价小旅店里。这里连吃带住一天只需八角钱。他的房间里，一条长椅上挂着一双短袜和一件衬衣，那是他自己洗完后挂在那里晾晒的。那张木床上铺着一张席子，放着一小堆书。

小梦信任他的朋友，把这次他来广州的目的都同他们说了。他说他同那位“左派”政治家汪精卫和一些军阀举行过好多次会谈，并提出组织绥远的土匪去骚扰蒋介石。为此他要求

拿到五十万元钱。

绥远是中国北部靠内蒙边境，位于北京以北的一个小省份，小梦代表他的组织愿去那遥远的省份，利用土匪制造麻烦，这样当广州的军阀进军攻打南京的军阀时，统治北京的军阀张学良将被迫派部队去绥远，其余部则要守住华北。这样，张学良就不可能到南京来援助他的盟友蒋介石了。计划就是如此。小梦说汪精卫只肯给他五千元，他拒绝了，说这点钱连他到绥远的路费都不够。

小梦很了解广州的一些政客，尽管他们威胁要进军南京，暗地里却在同他们的南京对手讨价还价。这些广州的政客也知道小梦的组织在同南京的蒋介石讨价还价，看看他要他们去给广州的集团制造麻烦肯付给多少钱，小梦的要价比他的组织提出的高两倍，如果他能拿到这个数目的四分之一就算幸运了。大家都在搞阴谋，互相之间都在威胁和讨价还价。小梦怀疑他是否能拿到一个铜板，因为他预计广州和南京的两个对立集团在他染指这笔钱之前就会达成一些交易。

他坐在旅馆的房间里同朋友们聊天。他抱歉没有威士忌可供招待，因为他了解所有外国男人都喝威士忌就象中国人喝茶一样。他给那女人一杯茶，并以抱歉的心情也给那个男客泡了一杯茶。

他的女客看了看他床上的那堆书。一本是玛丽·斯托普斯博士的《婚后爱情》的中译本，另一本是克鲁泡特金论无政府主义的翻译小册子，其他是些中国的言情小说。

“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对性爱等等感兴趣了呢？”那女人问他。

小梦天真而直率地回答道，“是的，现在我对这事很感兴趣。我发现了一个女人，我很爱她。但我很沮丧，因为她在遥远的地方。她每晚都来托梦，对我哭个没完。我醒过来就夜不成眠。我知道她遇到很多麻烦，但她只能在梦里来对我说。当我拿到那五十万元钱时，我将寄给她很多钱。然后她就不会再哭了。”

“做梦不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说道。

小梦竭力争辩道：“那末为什么那个姑娘来向我托梦哭泣呢？”他说：“我不写信给她，她也不写信给我。我在梦中为什么看不到她笑，而只见她哭！这意味着她遇到很多痛苦的事。”

“当我拿到这笔钱时，”他继续说道，“我将寄给她一些，给一些我的部下，其余都归我。我要去周游全世界。我将学到有关女人的多方面知识。我将同德国、俄国、法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女人相爱。那我就什么都懂了，还能学会用她们的语言说话！”

他用好奇和惘然的眼睛盯着他的女客，直接了当地问道：“我想可能你知道外国男人的一切，你同许多国家的男人生活过吧？”他随口举出一些国家的名称，“德国？英国？美国？法国？你同这些国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过吗？法国？你没有同一个法国人在一起睡过觉吗？”那女的笑着摇摇头，小梦很不以为然地说：“在沙面就有法国人……在上海的法国公园里也有法国人——你知道吗？军官和士兵都有。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找一个法国人？我听说法国人对性爱特别感兴趣！”

他的朋友们笑声未止，他就高声说道：“但是我敢打赌你

从来没有同一种人在一起睡过！”

“什么样的人？”那女的问道。

“爱斯基摩人！”小梦得意地高声说道。“你们知道‘爱斯基摩’吗？他们居住在北极，个子很矮——只有这样高！但终有一天我要同一个爱斯基摩姑娘同居！我想广州没有爱斯基摩人——这里太热了。上海可能有！在上海，你为什么不要象外国人那样在报纸上做广告：‘需要一个爱斯基摩人？’”

他的朋友们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小梦奇怪地望着他们“你们笑什么？”他迷惑不解地问道。“外国人笑这些奇怪的事情！”他严肃地补充道。

他拿起克鲁泡特金论无政府主义的那本小册子。“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他的朋友宣称道。“我读过这本书。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回到福建山区重新带领土匪时，我将教他们懂得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他们都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你能把他们召集回来吗？”

“如果我能弄到钱，”他回答道。“如果广州的人拒绝给我这笔钱，我们就可以从南京方面弄到这笔钱。因为现在红军很强大，广州和南京都害怕。要我们打红军，两边都得给钱。无论从广州还是从南京拿钱对我都一样。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广州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两边的穷人都受苦。”

“如果你想帮助穷人，为什么你不参加红军呢？”

小梦耸耸肩膀，坦率地指出：“我参加了红军就得不到钱，什么也得不到，广州和南京的军队将会来打我。但现在无论是军界还是政界对我都很好。我到处旅行也没有人会把我抓去砍

头。但如果我加入了红军，他们就会攻打我们并砍掉我的脑袋。我现在很好。有时我有很多钱，有时又象目前这样穷光蛋一个。如果我参加了红军，我将永远是个穷光蛋。但现在，你等着瞧，我终有一天会发财的，还有可能当上一位将军。等着瞧吧！”

在日本侵略期间，他浪迹满洲，忽而投靠这个中国将军，忽而依附另一个将军。日本人开始攻打上海时，他就跑到该市日本人的区域里去，那里日本浪人充斥街头，手里不是拿着刀就是剑，见到中国人就杀。

小梦冒充日本人，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在日本领事馆专为浪人开设的饭馆里免费用餐。小梦看见到处都有谋杀，但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已经见过许多谋杀，他自己也曾经象日本人现在干的那样杀害过许多无辜的男女老少。他从日本租界回来后总要谈谈那些个人冒险的故事。

他总是干笑着说：“日本人把我看作是浪人，我走进他们的免费餐馆坐下就吃！看，我也从他们在抢劫的那家商店里拿来一顶新帽子，昨天我还拿了几双新鞋子。我并不想要这些东西，但人人都在拿，所以我想我也得拿点。”

在此期间，小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为保卫上海提供武器的爱国华人委员会的名单上。有些武器是向一家日本公司购买的，小梦也参与了洽谈。后来他又插手另一笔大买卖，因而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钱。这是美国赠送给遭受长江大水灾难民的一批面粉。他们那个委员会从掌管这批面粉的中国政客那里拿了过来，转手以高价出售给保卫上海的中国军队。这笔面粉的付款早已在他们的手中，因为世界各地

的华人都为中国的保家卫国者寄来捐款，不过那些钱都装在远离前线的“爱国”委员会委员的口袋里。

小梦他们那个委员会里有势力强大的上海地痞流氓、工业界巨富、如造船大亨、煤业大王、粮食大王、家财万贯的银行家、职业政客、将军、教授，人人都想从中大捞一把。每个有势力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帮小“走狗”。这个委员会里还有一些人在无锡、上海一带买了大批粮食，然后以高价出售给日本侵略者。

在此期间，小梦投身于这场抢夺之中，虽然他抢到的比梦想中的要少得多，但仍比他以往任何阴谋争斗中所获得的都要多。他同军官、政客、流氓头子一道坐着豪华的汽车在上海滩上招摇过市。但那坚实的肌肉，现在变得又松又胖，他那双小眼睛在发胖了的脸上几乎都看不见了。过去那个福建山区年轻土匪的身上唯一没有变的是他那猫一样的走路姿势，土匪的封建思想，以及同他的外国朋友谈话时毫不隐晦他所干的勾当那股爽直劲儿。

有一天他的一个外国老朋友问他：“小梦，想必现在你是个将军了吧！”

“还不是。”他回答道。

“那你肯定是个国民党吧？”

小梦轻蔑地噘起了嘴。“为什么？国民党得听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听他们的！你认为怎样？”他对玷污他的荣誉大为不满。

“那么请问，你是否也曾经以劳动为生呢？”

小梦哈哈大笑，笑得连眼睛几乎都看不见了。“劳动？你

认为我是个傻瓜？看看那些工厂和机关里的工人，他们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十六个小时，而挣的钱只够买点猪狗食。有时我停下来看看那象牛马一样干活的苦力，心想他们一个月可能只能挣上十块大洋，也可能还挣不到这么多。他们过马路不小心还要挨警察的揍，终年劳动还是要挨饿。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干呢？我告诉你，中国的工人愚蠢，太愚蠢了！”

小梦轻蔑地翘起嘴唇，大不以为然地笑着。他最后补充说：“很久以前我曾对你说过，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可能当一个将军，或许是福建省的一个大官。你以为我在工厂里干活能成为大人物吗？不！我告许你——等着！再过一年我可以给你很多钱，就象这样一大包。”这时他从桌子上拣起一堆纸象扔垃圾一样扔到地上。

七、献身革命的女战士

中国革命的巨大历史舞台上反复出现着一个妇女的形象。

起初，这个女人看上去弱不禁风，那双纤细的手就象孩子的手那样娇嫩；但你仔细一看，那个身材苗条，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性格坚强不屈，一双手由于终年劳动而变得瘦削。象迷人的夏夜一样乌黑平整的头发，有时梳成男孩的发型，有时留得长长的，在脑后盘起一个发结，插上一根绿色的饰针。有时，这个人物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有时候穿着普通妇女的棉衣，在某些场合则穿上统治阶级妇女那种非常讲究的绸缎旗袍。

这个窈窕淑女，这时穿着一件绸子旗袍，潇洒地从脖子一直拖到脚腕，朝我们转过脸来。这脸容使

得那华丽的旗袍也相形见绌，因为这不是洋娃娃那样平淡无奇的美，也不是统治阶级妇女特有的那种矫揉造作，自私自利或残酷无情的形象。相反，朝我们转过来的这张脸上容光焕发，那双眼睛和整个容貌都给人一种青春的魅力，充满着炽热的信仰。这是聪明智慧的脸。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洞察一切，理解一切。她的一举一动，她在这巨大的历史舞台上所说的每句话都表达了两种力量：一是爱和激情；一是坚定不移的信仰。

这个女人能为她自己说话，就象中国封建旧舞台上许多演员走到舞台亮相说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那样。最好让这个女人赶快说，以免被悲剧所吞没而使之永远沉默下去。所以，就让她自己来说吧：

* * *

“我的名字叫张小红，一九〇二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豪之家。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财富是我的祖父积攒起来的，他早年是一个英国企业家的仆役。

“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几年里，被迫同意让鸦片运入中国，支付大量赔款，割让土地，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这个英国人愿意给我祖父一笔钱和贷款，如果他能帮助他剥削这块新的殖民地。我的祖父接受了这笔款子，几年以后，他在该企业中的份额已值一千两银子，其中包括土地，房屋，货栈，商店，码头，赌场和鸦片贸易。

“我的祖父出身贫寒，未曾受过封建教育；由于他经常接触西方资本家，深受资本家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在社会习俗方面他保留着许多封建的传统，他把这种习俗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相结合使他能对遇到他手里的每个男女劳工榨取血汗以增添

他家的财富。

“由于他的财富，他深受华南老人的尊敬和钦羨，但也有许多人不赞成他的新思想，例如把他家的女孩子送去上学等等。我的姐妹和我都有幸能得到上学的机会，我们家里有些男的还到外国去留学。但这类自由思想只局限于我祖父自己的家里，从来没有扩大到其他家庭或人民群众身上。他也同那个英国合伙人一样用鸦片去毒害群众，出卖男女奴仆。

“我的祖母是一个非常狡黠而能干的老派女人，尽管家财万贯，她总是贪得无厌，总想有更多的钱源源流进她家的钱柜。推翻满清之前不久，我的祖父就去世了，我的祖母成了我们家里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因为我的父亲，作为长子他本应享有家长的地位，但沉湎于吸鸦片，除了个人花天酒地，别的什么也不管。我的母亲是一个大盐商的女儿，为人能干还有雄心壮志，她是我祖母的一个好帮手。

“我有两个姐姐，四个哥哥，但我母亲更喜欢我这个最小的孩子。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我是一个女儿。人说一个瘸腿的儿子也比一个品德胜过十八罗汉的女儿来得宝贝，而让一个女儿上学，那无异把肥水流到外人田。

“当我六岁那年，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个男人从国外回来，在香港开办了一所男女混合学校。他劝说我的母亲和祖母让我去上学以便为女孩子带个头。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一场风波，因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允许有男女混合学校。

“我的家庭在某些方面渗透进一些现代思想，但在其它方面仍然是一个封建和殖民地式的家庭；而且完全扎根于那种唯

利是图的经商思想。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爱钱如命，只对财神爷五体投地恭而敬之。唯利是图就是一切，生活中的其他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最早记忆里的一件事是我祖母参与的一次贩卖奴隶的勾当。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对钱财贪得无厌的女人。她贩卖的奴隶通常都是小姑娘，美其名曰丫鬟，而中国和英国的辩护士们仍为了美化她们的身份就伴称为“养女”。

“这是中国的一种花言巧语。这种丫鬟就是家奴，可以用金钱买卖，而她们的主人对她们拥有生杀大权；她们的主人可以随时随地将她们转卖给别人；也可以将她们送到工厂里去当工人为老板挣钱；也可以让她们去当娼妓；也可以卖给有钱的好色之徒当外妾。这些女孩子是华南一些省份里穷苦农民的女儿，这些农民穷得连把她们养到可以出嫁的年龄也养不起。

“在华南和香港，甚至中等家庭里也多半雇用一两个使唤丫头干繁重的家务劳动。漂亮的女孩子通常都以高价卖给有钱人当小老婆。有些则卖到歌舞厅里当妓女，或者卖到“花船”上，即广州、澳门、香港或南洋各城市的妓院里当娼妓。上海和中国北方城市里的有钱人也很喜欢买漂亮的广州姑娘当外妾或妓女。

“我们家里的活计都落在这些女仆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佣人都是丫头。此外，我们还买进一些女孩子专门倒手出卖给有钱的男人。这种买卖由我祖母管。我还记得小时站在我祖母的身旁，看着一些男人前来挑选女孩子时的情景。有时来的是广州的一个肥头大耳的官员，或是一个商人，或是广州或香港的官僚或富贾巨商家的花花太岁。他们都是来挑选小老婆的，找

干家务劳动的女仆的人不多。当这些身穿绸缎长袍马褂的人上门时，我的祖母就叫人给他们沏茶送水，问候他们府上的人身体健康，祝贺他们恭喜发财。

“最后提到来访的目的时，就把女孩子带了上来，这时一个个都穿上了漂亮的衣服，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但买主是非常狡猾的商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他们总是要撩起女孩子的长袍或肥大的裤脚管露出大腿看看皮肤。有时他们会拿块布，蘸上点水，擦掉那女孩脸上的粉，看看皮肤是否真的细白娇嫩。有时他们还在女孩子身上东摸西摸。

“买主看中后，就会走近那女孩，轻佻地拧一下她的脸蛋问道：“你愿意当我的外妾吗？”那女孩子则把头低到胸前，害羞地回答一声：“愿意。”接着就泪如雨下，悲伤的脸上挂着长长的泪痕。然后那女孩子退下，买主同我祖母开始讨价还价；买主往往坚持要证明他买到的是个黄花闺女时才肯付清全部价款。如果他在第一夜发现买到的不是一个处女，就可把那个女孩子退还并要回所付的钱。

“有人会说纳妾是为了找个‘情侣’，虽然大老婆是负责管家和传宗接代的，纳妾制度含有爱情的因素。但我要问——爱什么人呢？小老婆是一个可以买卖的奴隶，她的主人可以凭一时心血来潮，或在他穷困潦倒需要用钱时就可以把她转卖给别人。有权势的主人也可以把她当作礼物馈赠给他的部属。爱情！有钱人买进这种孤苦伶仃的穷家女子，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把它称作爱情。那些花钱买这些女子的男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性慾而已。

“你以为我是在说过去的黑暗年代，或是二十五年以前当

我还是孩提时的事情——那些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旧习俗吗？不，我说的是现在的事。因为今日中国到处都有女子出卖为奴的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贫穷，越来越受人欺凌，贩卖女奴的陋习也就根深蒂固了。无论在广州、南京还是北洋政府里，达官贵人和军阀，个个纳妾成风，甚至外国人十分崇拜并大力支持的蒋介石也‘离过’四个‘老婆’而同一个可以利用她的关系作为他个人政治资本的女人结婚。

“我是一个富家女子，从小娇生惯养。我的母亲十分宠爱我，袒护我，为我的未来幸福作安排。但是，即使在孩提时代，我就想过，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里或其他贫苦家庭里，命运又将如何呢？很可能也会象在我们厨房里干活或经我祖母的手出卖给别人的那些女子一样。即使当时年纪很小，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答应‘愿意’嫁给有钱人的女孩子满脸泪痕的情景。我在孩提时代就幻想我将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为解放所有女奴而奋斗。

“我小时还听说过贩卖男人当奴隶的事，许多人是被绑架走的，有的是在各种蛊惑人心的幌子下运往国外的。其中的一种借口一直沿用至今，即所谓的合同工。穷苦的农民，工人，华南的散兵游勇，在高工资和能发大财的诱惑下，或者只不过答应给他们吃饱肚子，就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劳工到英国、荷兰或法国人在东南亚，即他们称作南洋的殖民地的庄园和矿山上去工作。

“人们常常听到‘移民’到南洋的中国人发财致富的传说。确实有少数人积攒了财富。但是在成千上万人中即使有这样一个发财致富的人，那末大多数人往往都在残酷无情的工头

的皮鞭下死于贫困和绝望之中。不少人把钱寄回老家，一年里总数也有几百万元。但是我国有几百万人背井离乡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去谋生，如果他们从那微薄的工资中每日能汇回三、四元钱，合起来也有上百万之巨。但对每个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十分可怜的一点钱。

“现在我可以详细地对你讲讲这些劳工是如何送往欧洲人殖民地的庄园和矿山去的情景。在香港有一个荷兰大贸易公司的分号。它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锌矿提供劳工，这些矿坐落在非常有害健康的地方，去那里劳动的工人只能活上短短的几年。然而，这个荷兰公司每年两三次派人到广东省来招募华工，对那些想去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人大加渲染发财致富的海外奇谈。负责招募华工的人每招到一名可得几块钱，而他就从中拿出一些钱用于贿赂中国官员以便为他招募劳工和签发护照大开方便之门。

“招募来的人分成几百人一批，运往香港，先由荷兰公司的人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看看胸脯、身体和四肢是否壮实有力足以承担那种荷兰东印度公司里的人谁也不会去干的苦活。然后再从香港装进连牲口也无法忍受的货船里运走。到了荷兰东印度的一个港口后，劳工们一上岸就给关在栅栏里，每人都得在一份用荷兰文书写的文件上签字画押。这些劳工连本国的文字都大字不识一个，更不用说荷兰文了，至于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法律文书更是一窍不通。他们被迫在那个文书上按上了一个手指印就把十年的自由给断送了，甚至连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这份文书就把他们禁锢在锌矿里当劳工了，并在以后的十年中，只能拿到荷兰人规定的工资和在奴隶般的条件下出卖

劳力。在中国招募时，这个文书没有同他们见面，那时他们或许还可以另有选择。但现在，如果他们拒绝签字画押，就必须归还该公司把他们运到这个他乡异国来的路费和伙食费，并须立即离开这个国家，要自己花钱乘船回中国。如果他们还想争辩，那末等着他们的就是荷兰新主人的靴子和皮鞭。在绝望中大多数人只得签字画押，因为他们既贫穷又无知；而那些反抗者——有时少数几个曾经当过兵的会采取反抗行动，荷兰人把这些人叫做‘坏分子’，最终也只得签了字，因为“斗争就自取灭亡，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然后他们就给运到铔矿去，矿上死人很多，以致每年都得运两批新人来补充。那些设法逃跑的人，被抓住后就带到法庭上去受审，他们受到的惩罚除了一顿鞭子外还要延长当奴隶的合同，因为那里的法官都是矿上的经理人员。

“今天，南洋的奴隶主不只是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了，其中还有中国的百万富翁。这些人有的是继承了他们父辈的产业，有的是靠自己辛劳一辈子，或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现在他们加入了白人庄园主和矿山主的阶层。种族的界线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阶级界线，他们的财富是从南洋劳工的生命和鲜血的基础上积聚起来的。

“……暂且不谈我个人的往事。但我想有关人们如何充当奴隶的这个故事将会使你感到兴趣；因为这是无数受压迫人中的一个具体实例，正是这种压迫唤醒了我的责任，也使我看清了统治阶级的真实面孔。

“我对你讲过我的家庭是封建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混合产物，而当这两种剥削方法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从它们所掌握的

人身上榨取大量的财富。由于命运让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能够上学并享受到从前中国其他地方的女孩子享受不到的许多权利。在我孩提时，满清已被推翻，各种新思想潮水般涌进我们国家。男的剪去了辫子，那屈从的象征，积极投身运动的妇女也不再缠足了。我的脚就从未缠过。

“但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当时我是十六岁。我那几年前已结婚的一个姐姐，当时住在广州，她的丈夫是一个高级官吏。她很幸运，因为她丈夫的老家在汕头，在广州有她自己的家。但她也很不幸，因为她要没完没了地生儿育女。她现在已有七个孩子，每年都要生一个，弄得她身体虚弱，陷于深切的失望之中。她的丈夫很少在家，不是出去同官僚们欢宴，就是去赌博或同歌女在一起瞎混。

“我母亲答应我去广州上中学，学习期间就住在姐姐家里。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发起‘五四’运动时，我住在广州。他们举行反对凡尔赛和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表面上装作是中国的的朋友，但在社会上却同意日本人侵占中国的领土，也附和日本人强加于腐败的北洋政府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团退出了和会。

“但是对中国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来说，‘五四’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政治上的范畴。‘五四’运动是紧接着俄国十月革命出现的，它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各种社会价值；对知识青年中的封建思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广州的学生中要比在英

属香港地区的学生更自由活跃，我对这场运动无比兴奋。它好象是吹进那陈腐发霉的旧房子里的一股强劲的清风。

“北大的一些著名教授和学生出版了一份《新青年》杂志，把文艺复兴的思想介绍给中国。这个刊物的主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通过这份刊物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认真研究起社会科学。当时我是广东学生会的一个成员，这个学生会是很激进的，我成为该会的领导人之一。

“那年我们广州的学生为穷人的孩子开办起学校，从那时起，我不仅懂得要同情穷人而且还将我的知识去为他们服务，因为我的一切生活来源都是他们劳动的成果。在此后两年里，我在广州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工人夜校当老师的工作上。我从不感到疲劳，因为前来参加学习的工人们总是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知识。

“这个时期我的生活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有着伟大的目标，与此同时也同我的家庭进行了重大的斗争。除了我的两个姐姐（她们婚后都不幸），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几乎每个人都想迫使我结婚。不仅我的母亲泪流满面地恳求我，还有我的叔伯姑孀，以及各种各样的亲戚，总共不下一百人，为了把我从‘危险的倾向中’解救出来，都劝我同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结婚。我一再拒绝结婚，而我的母亲只得又去找一个她认为可以使我称心如意的年轻富豪。我每次回到香港的家里，心中都充满了悲哀和斗争；我的亲戚每次到广州我姐姐家的来访，给我写来的每封信，都使我充满了新的痛苦。

“但是我坚决拒绝结婚，决心专心一致地学习，成为一个医生为中国的工农服务。我同家庭的这场斗争是我同封建势力

的第一次重大较量，这是一场从四面八方向我围攻历时两年多的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十八岁那年，我的大姐偷偷地寄钱给我，要我从广州逃到北京去找她。我大姐嫁给了北洋政府的一个大官。一天，我离开广州去香港，然后乘船北上了，家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多少年来，我都没有再回家。我从北京给母亲写了封信，要她给我寄钱，以便在北京学医，并威胁说，如果她不给寄钱就再也不回去看她了。最后她对我的爱占了上风，终于痛苦而茫然不知所措地屈从于我的意志。

“在北京，我成为著名的学府——北大的一名学生。我在学医的同时，也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我读了许多书，短篇小说和其他有关文章，也读了许多翻译作品；我同《新青年》和上海共产党知识分子创办的创造社的作家们有了亲密的交往。我在北京学习期间过的是一种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生活；我学医时间越长，越看清了许多疾病是社会原因所造成的，在一个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类疾病根本就不会产生。

“‘五卅’运动开始时，我在北京已经学习了五年。这场运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国警察对上海的学生和工人实行大屠杀后发动起来的。这次大屠杀比‘五四’运动更清楚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是阻挠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我们决心要打倒帝国主义。这次事件后，我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席卷全国的反英抵制运动中变得很活跃。但在第二年又有新的反对中国进步的势力抬头了。三月十八日，中国警察在北京屠杀了许多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而举行游行示威的学生。中国的统治者对最后通牒俯首帖耳，但却枪杀了那些敢于起来提出抗

议的人。

“屠杀开始时，我正在游行队伍中。警察举起枪开始向集结着几千名学生，包括小孩在内的群众大会开枪。当群众从雨点般的子弹中逃生时，警察从背后向他们射击。我站在那里一时惊呆了，看到警察举起枪向纷纷逃奔着的青年背后射击，还发出笑声；笑声过后接着又是一阵射击。他们枪击一个人就象打死一只鸟一样，其野蛮和毫无人性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对这种情况我当然是无能为力的。

“于是我转身走开了。但我给绊倒了，跌倒在一个女子身上，她的脖子上还在不断地流血。接着又有个沉重的东西倒在我身上，使我动弹不得，只听见压在我身上的人在痛苦地呻吟，在挣扎，发热的鲜血流过了我的全身，透过我的衣服，流到我的脖子和脸上。远处我听到砰砰的枪声和男人、女人的惨叫声。我呼喊救命，但身体动弹不得，陷于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一些急促的声音唤醒了我，才睁开眼睛，看到我宿舍里的女同志们在替我洗去身上的污血，一位医生在检查我的身体。

“在这次大屠杀中，是同学们的身体救了我的命。我只是在手臂的上部中了一颗子弹。我甚至没有感到自己受了伤。但是这次大屠杀在我们面前暴露了另一个阻碍中国进步的敌人——军阀和官僚。

“同年春天，在北京学习了六年后，我成了一名医生。原先我计划到国外继续我的学业，但革命运动正处于高潮，革命军队正准备离开广州，北上攻打北方的军阀。所以我急忙离开北京，来到广州这个中国的革命中心。

“我离开广州后，发生了香港工人大罢工，使港英陷于瘫痪，显示了香港工人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使命。这次罢工引起了全中国统治阶级和在我国主要城市里称王称霸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极大恐慌和仇恨。罢工期间工人们在广州及其周围建造起不少马路，使得这座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我发现整个广东省的千百万农民也组织起自己的农会，粉碎了地主、高利贷者古老的封建锁链和军阀官僚铸造的更为现代化的枷锁。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但这种革命由一个革命政党来领导并拥有一个明确的社会纲领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奋斗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把工人和农民都组织起来，并在两年前同国民党实行了联合。

“这些事态的发展使我认识到我儿童时代幻想领导一支军队去解放奴隶的想法，确实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梦想。因为这是在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一种为解放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制度。我曾经渴望要为之解放的那种女奴，现在已经被当作人看待了，贩卖女奴是一种要被判处死刑的犯罪，男人也不再签字画押把他们的生命出卖给殖民主义的庄园主或矿山主了。

“在此期间，我路过香港时抽出几个小时回家探望。我在广州四处奔波，深知革命面临着多么可怕的危险局面。因为工农组织年轻而武器不足。封建商人阶级、旧官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要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权力并力图粉碎方兴未艾的群众革命。

“我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于我本人的愿望和党的指

示，我参加了著名的铁甲军下面的一个医疗队。剪短了头发，穿着一身军装，我成为从广州进军到长江平原的一名革命妇女。

“我们这些经历过中国大革命的人决不会忘记千百万艰苦奋斗的工人农民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和他们的希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多少世纪以来受压迫的千百万农民已经觉醒，挺起了腰，开始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他们在革命军队里参加战斗，充当向导，在行军经过的沿途一连几小时地站着等候为我们的部队负责提供茶水和食物。他们开始了减租减息，取消一切非法的税收，在许多地方还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并把反动的土豪劣绅扫地出门。除了直接帮助革命军队外，农民们还在整个华南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赤手空拳同旧军阀势力，地主和土豪劣绅进行战斗。他们并不是坐等革命军队的到来，但得知我们的消息后，他们就开始举行会议，展开了反对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

“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我所在的著名的铁甲军是一支共产党军队。我们的指挥官中，有些是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并成为当今华中工农红军中的领导人。我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有着光荣的历史，在群众的支援下，我们所向无敌。我们参加了夺取汉口和汉阳并包围了武昌一直到打下武昌的各个战役。我的身体现在坚强有力，工作起来有无穷尽的力量，无论在检疫所或激战后抬担架抢救伤兵，什么都干。我亲手把几百名英勇牺牲的中国青年闭上了眼睛。我看到为革命献身的男男女女，更坚定了我的信仰。我不再流泪了，而是要充分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我们的军队向南昌挺进，正当我们在南昌时，爆发了反

革命政变并开始了可怕的白色恐怖。军队里的军官都是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儿子，或者是出身于职业军人或城市资产阶级的家庭。从一开始他们就害怕并痛恨工农政权，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得到了解放，这些军官就同地主、土豪劣绅以及城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力图维护旧秩序并且要把新生力量扼杀在摇篮里。

“在我们军队内部，军官们尤其痛恨给予普通士兵以人权待遇的政治委员会。当这些军官被迫参加这种每周举行的，士兵和军官一起参加的会议时，普通士兵有权提出经费开支的情况或要求公布帐目；或者提出为什么军官不把士兵应得的军饷发给他们等等问题。军官藉以发财，沿袭已久的贪污特权给扫除了。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反动力量和革命力量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上海，蒋介石大批屠杀工人和知识分子从而揭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后来这种恐怖也降临到那些敢于起来斗争的农民头上。新组织起来的，武装很差的千百万工人农民惨遭屠杀。各种封建反动势力纷纷出笼，中国的土地上血流成河，尸骨遍野。

“但是革命的力量为保卫革命而奋斗。在南昌我们反对反动势力的起义失败了；在共产党军官的领导下，我们的部队穿过江西到了汕头，希望能攻克该市，后来又到了广州，我们希望广州会再次成为革命的堡垒。但是革命力量太年轻，反动势力太强大，这时又得到城市帝国主义者的增援。汕头之战，我们失败了，在这次战斗中我感到必须放下医疗包，拿起我的枪。我们到了华南，我觉得自己知道反动派的各种所作所为，他们贩卖奴隶和鸦片，无恶不作。因为我出身于反动统治阶级，虽然我

要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但有时就不可能做到了。因为我要战斗，满腔仇恨地去战斗。

“但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们的部队往后撤，分散了，有的去到福建和江西。我们则来到广州。我乔装打扮成一个时髦的阔太太，在广州住下了。有时我难免要动摇，仍然认为人民大众和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在粉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之前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广州公社被镇压，对我脑子残存的一丝幻想是个致命的打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工人农民几乎没有发生流血就建立起广州公社。躲在中央银行里的几个士兵在负隅顽抗，为了把他们赶出来就把银行用火烧毁了，周围的一些房子也着了火。接着公社开始组织起一个革命的工农政权，中国人民新的自由社会的中心。

“三天以后反动军队伙同一批外国人，在一些中国最封建的军官领导下攻占了广州。他们还得到停泊在珠江口的外国炮艇的支援。公社被推翻了，对人民的大屠杀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时，或许也出现过这种互相残杀的现象，但几个世纪以前，对起义农民的屠杀和成吉思汗蹂躏别国领土时的屠杀都不及在封建军官指挥下的白军对广州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来得凶狠和残忍。

“广州城内，大片大片的地区都在战火下被夷为平地，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妇女和男女学生惨遭杀害。白军的军官见到劳工和学生都格杀勿论，有时喝令他们站住，然后开枪打死；或者把他们逮捕，强迫他们跪下，然后砍头，甚至把他们肢解成碎片。抓到留着短发的年轻姑娘，就把衣服剥光，毫无人性

地加以轮奸，然后把她的身体从下到上一劈两半。这种年轻姑娘往往不过十五、六岁，而军官在回答来自香港的英国记者时说：这种留短发的姑娘最坏；她们态度傲慢，出言不逊。我们要杀掉她们几百个。

“那些被杀害者的尸体就象宰完的猪一样堆积成山。有一天，四千名犯人解出城外，用机关枪给扫射死了。帝国主义领事馆的官员们对这种场面笑逐颜开，他们还以尸体为背景拍照留念。苏俄领事馆的五位官员被逮捕后给押着游街示众。他们身上的钱全给抢走了，连他们的鞋子也被脱下来，然后遭到杀害。该领事馆的一名妇女被人用一根大棍子从她的下身捅进去给活活整治死了。

“四年以后我在上海默不作声地听着一个美国军事情报官员的妻子对人在说这个苏俄妇女是怎样被杀害的并拿出被捅死时的一张照片给人看。这个官员的妻子说完后，还自以为是地说道：‘但你知道我一点也不同情这些女人！’我终于明白，即使以前我不知道，美国的统治阶级并不比中国的封建反动派更为人道。一旦美国工人起来开始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奴役下求得的解放而斗争时，他们也会面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那种可怕的恐怖局面。

“经过几天屠杀之后，广州的有钱人开始上街了。我穿上一件绸子旗袍乔装打扮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贵妇也走上街头。只有这样打扮我才是安全的。如果穿得象一个贫穷的妇女我会被人杀害的。这时我沿街看到被刀砍伤或中了枪弹而气息奄奄的工人。我还看到资产阶级妇女在街上看见受伤和快要断气的工人时，就拿起石块或木头击破他们的头颅，使得脑浆横溢。无论

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里，所谓有教养的统治阶级妇女的人道主义都以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我听说有些贵夫人用小刀从苏联官员的尸体上割下肉来以发泄仇恨，然后把他们葬在万人坑里，这就算是广州革命烈士的安息之地了。

“资产阶级和军阀的政权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所有工会都被解散了，除了那个半官方的黄色机械工会之外，因为它的工会头头曾帮助过反动派。广州商人组织的志愿武装队曾被革命政府，甚至被几年前的孙中山所解散。现在又重新全副武装地组织起来了。全省各地的农会被粉碎了，几千名农民在这场斗争中被杀害。

“广州封建资本主义的旧秩序又重新建立起来了。鸦片烟馆又兴隆起来了，鸦片成为进出口的主要买卖；赌博、宴请、嫖宿娼妓又成为达官贵人的主要娱乐。贩卖女奴的行业又兴旺发达起来了，在此后几个月里，我又亲眼看见把女孩从农民的家里买来转手倒卖给商人和官僚阶级充当佣人或外妾。

“新政权又回到古老的掠夺制度，对农民课以重税，授予投标最高的人向农民收租的权力。这些投标中奖者，为了得到这种权力愿向政府付出几百万元钱。然后他们带着自己的武装人员，向农民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他们按原先规定的数额向政府交税，余额部分都流入他们的私囊。新政府对这种余额未加限制。这些私人收税人员就象兀鹰一样，把农民的血汗吸干。农会曾经赢得的一切人权，他们的全部希望和梦想都被新成立的商人、政客和军阀政权所粉碎了。广东和全中国的天空上又是一片乌云。

“我见过中国的统治阶级，这意味着我也见过帝国主义国

家的统治阶级。因为在中国重建反动统治的过程中他们曾象亲兄弟一样合作无间。他们对残暴和惨绝人寰的种种罪行是无所不能的。这个阶级不会对中国干任何好事——除了赤贫和奴役，除了腐败和压迫外，什么也不会提供。

“当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渴望广大劳动群众能获得自由并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的这种权利，千百年来被人剥夺）。象我这样的人，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呢？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在华中的工农队伍里工作，我们在华中建立起一个中华苏维埃政府，从而为一个人道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地区里，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公共卫生工作者；所有这些技能是我作为特权阶级的一个成员所享有的权利而学习得来的，现在我把它贡献给了工农群众。

“我们赤手空拳，面对那残暴无知和压迫人的古老制度；今天我们建立起学校、医院、俱乐部、戏剧社——劳动者能无偿地得到土地，还有各种政治军事机构。我的足迹遍及这个地区的四面八方，建立卫生机构，给人上公共卫生课，教妇女如何护保自己的身体和照料孩子。我长期以来都把目光注视在千百万受压迫，渴望求知的人身上，现在我更不可能对他们弃之不顾了。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给他们讲授知识，不得不到上海这种反动派残酷统治的城市去时，这些如饥似渴般的面孔，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面前。

“至于我出生的那个旧封建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黑暗而又可憎的回忆；我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恶梦。我希望如果我终于见到他们及其同类，我会以一个红军的身份去毁坏他们所珍视的一切，把在他们奴役下的人解放出来，使之过象样

的生活。他们曾经想要把我嫁给一个百万富翁，以便让我为他们生养更多象他们那样的败类。但是我选中了一个自己心爱的革命者，我没有去请求牧师或警察为我们的结合祝福，因为他们只为资产阶级的婚姻效劳。我的丈夫在白色恐怖中倒下了。虽然我的心也跟随他进入了汉口的那些无名者之墓，但他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劳动群众而英勇牺牲的，他的死只能使我更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工作。

“你想知道我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只要说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够了，因为这意味着我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后，而我现在所从事的一切，将会由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人继续下去直到开花结果。现在我要走上征途，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能为革命工作多久。因此必须只争朝夕。

八、“我们大家都是 穷人！”

“中国没有阶级。我们大家都是穷人！”

——一位上海银行家的话

我坐在广州一家中国大旅馆的楼顶上观看这个城市里的权贵们纷纷前来庆贺一位高级军官的婚礼。婚礼仪式完毕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光酒席一项就足足花去了几千元之巨。旅馆里张灯结彩，送给新婚夫妇的礼品和鲜花摆满了一大屋子。街上的鞭炮声和军乐队的奏鸣声交织成一片。

新郎是一位师长，不久前同一位桂系对立的军阀打了一场内战后刚从广西返回广州。在中国这称之为凯旋荣归，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他是个安然荣归的将军，但那些农民士兵的尸体却留在战场上，甚至无人给埋葬。他们同对立面将领手下的其他农民士兵打仗，根本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且这场战斗仍以妥协告终。

不过这是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因为在供应武器弹药、粮食布匹的买卖中可以赚到大钱，同时，这位广州将军还在“敌方”的一个城市中占有—些利润丰厚的鸦片烟馆。其实，抢夺鸦片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因此广州的统治阶级都前来庆贺这位胜利者的婚礼。

*

*

*

我停步看着一大队人马从广州的大街上走过，他们从江边走过来，大约有一百人，都是穷苦汉，身上被捆绑着并用绳子串在一起。有几个人穿着草鞋，其余的都光着脚。只有少数几个人穿着破褂子，大多数都光着脊背。头上带的草帽都是生活稍好一点的人用了几年后扔掉不要的破草帽；在破草帽下面露出受人驱赶者那种表情发呆的脸孔。他们不抗议、不斗争，只是垂头丧气地走着，旁边还有押送的武装士兵。

这群人不是罪犯，而是从江边被抓来的工人。军阀要打—场新的战争，需要牲口为他们运送军火和粮食供应。在中国几乎很难找到牲口来承担运输任务，至于用汽车连马路也没有。于是，军阀们就在工人或农民聚集的场所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端着枪追赶那些闻风而逃，四处躲藏的人。被抓的可能是带着农产品到市场上来出售的农民；也可能是辛劳了一天的工人；也可能是船民和码头工人。被抓住的人都用绳子捆绑起来排着队伍给牵着走。不管他们是谁，不管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他们被抓后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们都是无权无势之辈。只是靠卖力气为生的芸芸大众。那些想挣扎，企图逃跑的，在队伍里就当场给枪决了，然后割断绳子把尸体扔到路边。

我在广州街头看到的这种场面，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里也都见到过。这些人等于是军队里的牛马，除了每天给几顿饭外，他们分文也得不到。在前线他们挖战壕或者运送供应物资，而敌方的士兵就可以象打鸟一样把他们逐个击毙。他们一倒下就躺在那里没有人管了。到处都有象他们这样命运的人。

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我说：“我的祖父就是这样被抓走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着他。他后来怎样，我不知道——大概是在翻山越岭的路上死去的”。

* * *

一个伤兵只值六块大洋，但一名将军养伤要花掉一万五千元。这有事实为证。

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日本人侵略上海时，我看到从战场上抬下许多伤兵运进医院。他们是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第十九路军的士兵。他们都是穷苦人，有些还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是从外地农村来的农民、工人和苦力，参加军队是为了糊口和答应会发给他们的几块大洋，这点钱对这些贫苦家庭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穿着破旧的军装和不成样子的军帽，脚上穿的是草鞋，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但他们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机器去作战，而日本人拥有的这种装备可使他们以一顶千。他们已有五个月没有领到过饷了，但日本人入侵时，他们仍然坚决迎战，决不后退一步。他们的英雄主义，他们的战斗力使外国人大为震惊，也使日本人闻风丧胆。

抬进医院来的伤兵浑身上下都是泥和血，伤口痛得他们喊天叫地！他们的床底下放着几件可怜的财物——一套旧军装，一双草鞋，一顶帽子，一个水壶，还有点小零碎什物，或许还

有几个铜板。

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为这支军队汇来款子。但这些钱从来没有分到士兵的手里过。款子都装进经手的银行家和政客口袋里了。这些穿着长衫或者西服的“爱国者”躲在远离战场而又安全可靠的外国租界里，利用这些普通人的英雄主义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并以此大发横财。

他们天天不是宴请就是举行招待会或者开赌局。他们的太太穿着绫罗绸缎，带着钻石戒指和头饰，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前去参加宴会或打麻将。他们不让自己的女儿去看护伤兵，因为伤员是粗俗之辈，是中国的芸芸众生。有时这些一身珠光宝气的太太们也会到医院去向伤兵作一番官式访问。她们说是去“鼓舞士气”。她们伸出戴着宝石戒指，雪白细嫩的纤手给伤兵们发糖，同时一面向伤兵自我介绍，“我是某某夫人”，“某某太太”并乘机为自己和她们的丈夫做宣传。伤兵们却回答：“我们的军饷到哪里去了？世界各地寄来的那三百万元钱到哪里去了？”

太太们无言以对匆匆溜掉了。那些无知无识的当兵大老粗竟敢对她们这样说话，而且发生在来给他们“鼓励士气”的时候！

士兵们还组织起一个委员会提出给死难者家属和严重伤残者发放抚恤金，要求把捐献给他们的那笔钱分发下来。于是他们的长官叫来外国警察逮捕他们。外国警察来到医院，把伤兵从床上拉起来，把他们赶出医院，交还他们长官的手里。许多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杀害，还有一些无影无踪了。他们的命运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的长官后来发表了带有警告性的演说。

“战士的职责就是战死疆场。”接着他们又补充说：“我们为每个伤兵拨给医院六块钱的医疗费。这样你们还不满意！”

花六块大洋治疗敢于同日本战争机器作战的人！因为“我们大家都穷。”士兵还敢再侈求什么呢。

* * *

四个月以后我乘一艘长江轮从汉口到上海。在轮船里躺着一位受伤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范绍增，是四川二十一军的军长，坚守湖北沙市有两年之久。

四年之前他是四川的一个土匪，后来被南京国民党的将领收买了。他为国民党守住沙市以抵抗红色农民革命军。沙市是长江上游鸦片交易的一个中心，驻防这里的将军油水很多。

一九三二年七月初，这位将军率领一个师同红军的一个支队作战。他的军队几乎被红军打得全军覆没。红军直捣他们的老窝，甚至把范绍增将军的大腿和右胳膊都打伤了。当兵的被击倒在地，死活随他们自己的便。那些受了轻伤，能够走回兵营去的可以得到治疗。但这位将军则给小心翼翼地抬到一所教会医院里，由最好的医生和护士负责照料。由于这里的治疗条件仍不算好，又被转到汉口的一家医院里去。

腿上的伤口很快就完全愈合了，但右胳膊却骨折了。汉口的条件对将军来说不够理想。因此有一天晚上，上海的一位外国的名医给人从床上叫起来要他乘飞机到汉口将这位将军接到上海的一家医院来住。一个医生还不够，又加派一位中国的名医。

这样范绍增将军及其随行人员一行男女总共十一人乘坐一

艘英国轮船“湖水”号驶往上海。随行人员中有两名国民党政客，一名他的下属军官，一名汉口一家教会医院里的特护，还有他在沙市的十名妻妾中的四位，他的一个十岁的女儿，再加上两名医生，全部都乘坐预订的头等舱。

每天早晨那四个小妾，两位政客和那名军官把一张床搬到甲板上的一个凉爽的地方，铺好床单，然后将军在众人的搀扶下慢慢走到床边，他的躺卧起坐都有夫人侍候，虽然他自己完全能走动，除了胳膊骨折外，没有别的毛病。妻妾们有的拿枕头给他垫头，有的给他垫胳膊，教会医院的护士替他量脉搏。站在一边的其他几个人则给他拍照片——从侧面，从头部，坐着的，躺着的拍各种姿势的照片，还有他女儿跪在他床边的，两个小妾在替他梳头的照片。

当将军感到有点不舒服时，妻妾们竞相争宠，赶忙把他扶着坐起来。然后一个小妾站在他前面喂他水果或巧克力。虽然那位将军的另只胳膊没有受伤，强壮有力，他却从来不动手自己吃东西，所以整天都得由妻妾们喂饭侍候。船上的乘客纷纷投以怀疑的目光，有人就说：“那家伙是真的在战场上受伤的吗？看上去更象是在汉口的旅馆里或沙市的鸦片馆里弄伤身体的。”

用餐的时间到了，两名手下人搀扶着将军走下甲板去餐厅用饭，后面跟着他的全部随从人员。在餐桌上，将军就显得精神抖擞了，挥动他那只强壮有力的左手大口大口地吃下一顿丰盛的美餐，将军的一顿饭足够填饱十几个穷苦士兵的肚子从而使他们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餐后他看上去又虚弱无力了，吃力地站起身来，又有人搀扶着走到甲板，替他安顿在床上，梳

好他的头发，妻妾们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又拍了一阵照片。

到了上海，这位胜利归来的英雄受到一大群政客和帮会头目的迎接。走在欢迎队伍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派两名医生乘飞机到汉口去接这位将军的上海黑社会头目，臭名昭著的杜月笙——他还是鸦片走私，武装绑架的总后台，国民党政府委任的秘密机构“上海剿共支部”主任。在他后面是一大群国民党军政官员。杜月笙这位长江下游的鸦片大王热烈欢迎他的歃血为盟的兄弟，沙市的鸦片大王范绍增将军。他还是一位拥有十名妻妾的南京政府的高官，蒋介石的亲信，湖北红军的死敌。

一辆专用的救护车等着把这位将军送到医院里去，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进救护车，让他躺下。救护车后面尾随着一长排车队。上海各报都刊登了这位将军的照片——这个同湖北红军作战的英雄！

我估算这位南京将军治疗这次右手骨折所花的费用——从他受伤到出院不少于一万五千元。

对一名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受伤的穷苦士兵，发给六块钱医药费——对一个在打红军和革命工农中胳膊骨折的土匪将军要花费一万五千元。

但他们还说，“中国没有阶级！”

九、失去灵魂的女人

I

在南京有一座气派非凡的中国故家巨宅，这是政府上层的一位高官，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的官邸。他的学者头衔在于精通封建时代的诗词并能写出对仗工整的好对联；他的政治家名声在于他甘愿为当权的军阀充当辩护人。他年事已高，但对那些崇尚古训的人来说，他的高龄使他的言行更增添了份量。

他的公馆里住着九个女人，其中八个是他的妻妾，一个是他的女儿。在公馆的各个客厅里，甚至在那些女人日常散步的花园里总是缭绕着一股鸦片烟那种又香又怪的气味。因为他的妻妾个个都抽鸦片，现在连女儿也学会抽了。

这个女儿的名字叫齐游，她并不经常抽鸦片，也不经常幽灵般地出没在那些充满烟味的房间和花园

里。

她一度还是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曾经参加过反对鸦片，反对纳妾的斗争，也反对把年龄和书法看成是政治家和学者标志的种种腐朽的旧思想。那是五年多以前的事了，当时她还是一个身材高大，充满青春活力，穿着一身军装的年轻姑娘，并跟随革命军队从广州进军到了扬子江畔。如今她是一个穿着华丽的绸缎旗袍的女人，旗袍从肩上披到脚踝，衬托出她那竹子般瘦削的身躯。

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这位姑娘同她年轻的丈夫一起去到莫斯科学习。她的丈夫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出身于江西南昌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齐游年轻漂亮，充满着理想主义，她不仅许身给丈夫，同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在思想上也是夫唱妇随。在莫斯科她学习了一门大多数中国妇女，甚至包括共产党人都需要认真一学的课程——妇女也同男人一样有独立的人格，是可以选择自己道路的一种生产力，而不受家庭、父母和丈夫的约束。齐游至少从理论上是学到了。

一九二六年她同丈夫回到中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世界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夫妻之间无比恩爱，并且决心要为解放中国的人民大众而奋斗。他们立即去到革命圣地广州，同北伐军一起进军武汉，投身于席卷整个南方的巨大革命运动中去。在那个年月里，当个革命者并不难，尤其对齐游来说，周围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身边还有她的丈夫，一位农民运动的组织者。

但是一九二七这致命的一年来临了。反革命开始了，无数的工人，农民和象齐游和她丈夫那样的知识分子惨遭杀害，

中国的大地上血流成河。齐游的父亲属于反革命阵营，是南京政府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位具有封建思想的人，痛恨共产党，或许因为共产党人对他所赖以存在的一切都提出了挑战。他是南京政府的一个发言人。

在那残酷的斗争中，会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丧生。但齐游的丈夫在同农民一起的奋力战斗中，总算能死里逃生。有一天，一个留着短发的姑娘在九江，以共产党员的罪名被捕了，在军事法庭里审讯了几秒钟就判处她死刑。那个所谓的法庭没有立即处决，只因为那姑娘声称她是南京一位封建老学究的女儿。判处死刑的审讯暂时中断，以便查核她的声明是否确实，当最后证实她所说的情况属实时，对她的审判就无限期推迟了。

那位老人来到九江，到监狱里见了他那被判处死刑的女儿。因为中国的一切事情都由个人关系决定，在老人家的请求下，法院答应重新审理这一案件。但接着而来的是齐游要面对的斗争，这是比对付白色恐怖更可怕的斗争。离开了革命队伍和始终在她身旁的丈夫，这个姑娘要独自一人去对付她从小受到薰陶的所有封建势力的影响。

每天她的父亲来向她求情，常常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有时甚至向她下跪。他是她的父亲，而且已经年迈。她是他的独生女，是父亲给了她的生命，把她抚养带大，供她吃、穿，而且在家里其他女孩子不上学的情况下供她上学。她是他的女儿，她的生命属于他。他求她答应脱离共产党，并且公开保证再也不参加革命工作。

除了这种请求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齐游从那又臭

又黑，潮湿阴森的监狱里搬了出来，她的其他同志则只有在那里等死。她搬到监狱长的一间舒服的单人房间里看押，她的父亲每天来探望她。在这种气氛中即使加上父亲的请求，齐游似乎仍然还能听得见她的远方同志们的呼唤，她挣扎着要摆脱父亲的影响。接着他又把她转移到苏州监狱，在那里她有一间各种设备齐全的特别房间。在她未改变态度并遵照她父亲的意愿去做之前，她一直要住在这里。为了达到使她转变的目的，那老头常从不远的南京前来探望她。

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过去了。同志们的呼唤声以及他们那关注的目光在齐游的记忆里渐渐变得遥远而淡薄了。当她想到外面的自由和安全，然后又想到有可能自己也被关到同离她的这间房子只有几步远的其他同志们的牢房去时，她的思想感到恐惧了。她父亲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亲切。最后她答应遵照她父亲的意愿去做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

她获得自由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说明她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从此以后她同该党断绝一切关系。然后她跟随父亲到南京并同他父亲的妻妾们住在一起。

她的丈夫，那位农民组织者，在报上读到了她的声明。谁也不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但人们都知道他非常热爱她，并一直为她是个革命的女性而引以自豪。尽管如此，他也知道中国妇女的长处和弱点，他知道她们同家庭、旧思想和过去黑暗的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是个中国人，并且他自己也出身于那个腐朽的旧社会。

齐游以出卖自己换取到自由后，收到过她丈夫的一封信——唯一的、最后的一封信。信写得简明扼要；署名是用的正式

的全称，而不是她所熟悉的那种亲密的称呼。信中指出，她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们值得为之生存或牺牲生命的共产主义；她不惜出卖理想以换取自由，这样她的生命已成为毫无价值和令人憎恶的东西了。她的背叛正是中国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面对着要么解放，要么继续被奴役的这种关键时刻发生的。由于爱情幻灭而产生的无限痛恨，由于毫不动摇的信念所产生的坚强毅力，他把齐游看成是一个革命的叛徒，祖国人民的叛徒，对他来说，她是一个已经死亡了的女人。信里没有丝毫温情或遗憾的心情，而是坚决地同她一刀两断。此后齐游只知道他去到了江西，投身红军，成为帮助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一位成员。

齐游住在南京她父亲的家里，五年来她一直在探讨象她这样以出卖自己所换来的生活价值。在这五年中，她不仅在思索，也在梦想；这些梦想有时也是抽鸦片后所勾引起来的。她丈夫的那一封信五年来一直压在她的枕头底下，她就是躺在这个枕头上边抽鸦片，边作种种梦想。关于她丈夫的情况此后音信杳无。但在官方的报纸上偶而还提到过他的名字，称他为华中的工人农民队伍里的“土匪”头子。

齐游读到这种报道后就一头倒在床上抽起了鸦片。她那曾是强壮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已经消瘦了；那张曾经容光焕发的脸面，如今变成纸一样苍白；那双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象老太婆的眼睛一样暗淡无神。她象个幽灵，有时默默地徘徊在她父亲家里的花园里，有时停下来同他父亲的妻妾们闲聊几句。

在那生气蓬勃的过去和死一般的今天之间，她靠鸦片的烟

雾架起了一座梦幻的桥梁，而这些梦幻中的内容，则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或许那鸦片烟的气味已经使过去的记忆幻灭了。

II

在南京还有另一个曾是革命队伍一分子的女人也处于彷徨徘徊之中。她的名字叫郭南，她和她的丈夫也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她们一九二七年四月回到中国，正赶上反革命的逆流，上海出现了大屠杀。他们刚到上海，她的丈夫就被英国警察逮捕了并迅速转交给中国的反动派，连同一百多名其他男女被解往刑场砍了头。尸体象牲口那样被扔进象战壕那样又长又深的万人坑里。这里埋葬着无数革命青年的尸骨。

郭南得知丈夫被处死后，精神有些恍惚错乱。她不象其他女人那样悲痛哭泣，但两眼发呆，神情木讷地开始到处向人诉说，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她丈夫的生活，被杀害的经过和她丈夫视死如归的精神。

“他们把他的双手反背着捆绑起来逼他跪下……但他仍然高喊：‘共产主义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而我是一名共青团员。”

她这样没完没了地逢人便讲。如果朋友们听腻了走出房间，她也会起身跟在人家后面说：“他们把他的双手反背着捆绑起来，逼他跪下，但在砍头之前，他仍然高呼：‘共产主义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起初，朋友们从不让她自己单独一个人行动，因为她的言行使他们胆战心惊，一不小心她这些话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总是设法让她不要出门或者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如果要想把她锁在家里，她就会用眼睛盯着他们，并讥讽地说：“你们以为我发疯了，对吗？你们想把我锁在家里，因为我的丈夫被杀害了，而我又是一名共青团员！”除非她完全不正常，他们总是安慰她，开出门上的锁，让她自由行动。几个星期过去了，她就进城彷徨徘徊，从一个朋友的家到另一个朋友的家，还是没完没了地诉说。她两眼发愣，硬是拉着人家要听有关她丈夫的生活和被害的经过。有人就说：“她疯了。得小心，不要让她到敌人面前去乱说。”

但是郭南从来不到敌人面前去诉说。她不认识外国人，同时好象出于本能她在陌生的中国人面前总是默不作声，只是专心倾听着人家说的每句话，倾着身子坐在椅子的边沿似乎准备随时向他们扑将过去。

好几个月过去了，她也停止诉说了。她来到了南京。有一天她来到国民党党部的门前对一位官员说：“你们已经杀了我的丈夫。干脆把我也杀掉，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没有用了。干什么也不行了。要么把我杀了，要么给我工作，让我度过这无用的一生。每天让我算账，可以使我不再去思索。”出于某种原因，那位官员将她安排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给她做一些机械性的工作，每月付给她三十元钱，因为她显然精神错乱，不值得为她花费一粒子弹。

郭南在南京呆了五年，这个女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读书，不娱乐也不访亲探友。早晨她去工作，夜间回到她那几乎空空如也的小房间，在汽炉子上做点饭，然后就上床睡觉。她的生活就这样打发过去了。在她床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张明信片大小

的照片，镶在一个廉价的黑镜框里。从这个镜框里，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青年以深切而严肃的目光凝视着前方，在早晨和夜晚睡觉之前，郭南总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凝视着她已故丈夫的这张脸。

有时从前的一个朋友偶而也会来看望她——那些背叛了革命已成为官僚的朋友。郭南总以天真的直率回敬。使得那些朋友又惊又窘，从此也就无人来过问她了。她总是说：“我是一个共青团员，虽然我现在没有用了。如果我锐气不减当年，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对你谈话了！”

当这些朋友恼羞成怒地去向负责她的官员告发她时，那官员总是回答说：“她是一个疯女人，无伤大雅，如果我们认为她有——”他停住话头不把威胁性的语言说出来。

一位革命者妻子的五年日子就这样在南京这个活地狱里度过了。埋葬在上海万人坑里的她那位革命者丈夫的骨灰上又增添了前仆后继的新烈士们的尸骨。

II

世珍扬言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她是一个C.Y.，即共青团员，但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即使她去莫斯科学习过，那些了解她的人也否认她是一名共青团员。她是一个浅薄的姑娘，长着一张空虚的娃娃脸，他们说她总是懒散地同她的情人躺在床上打发时间。

这位情人确实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创始人，或许由于他的个人影响，世珍才有可能去莫斯科。她很少学习，在不装作一名现代女子时，她就依偎在她情人的

身上象许多富有或中产阶级的女子一样百般撒娇。这种媚态据说使女子在男人的眼里显得“娇美”而具有魅力。世珍挂起C. Y. 这个头衔是因为她的爱人是一个共产党员，很象西方的有些女大学生佩带她们情人的大学生联谊会的徽章一样。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女人的看法是在他年轻时的封建黑暗时代里形成的，认为一个女人既是C. Y.，又离开他这个男子汉无法生存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反革命的逆流开始后，无需指点，世珍就抛弃了她的头衔，再也不提起它了。这个头衔在她那个阶级里已不再是时髦的了。经过一阵犹疑和活动后，她的情人也加入了反动阵营并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他有一些离奇的传说。许多人说他仍然是个共产党人，是党秘密派他去从事目前他正在做的工作。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头几年里是真的话，后来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了，因为他不是会放弃权力，舒适的生活，地位和财富去过一种每走一步都可能会导致死亡，甚至比死更坏，要遭到严刑拷打的那种革命生活的人。他对反革命的效劳已习惯成性，再也不会去摆脱它了。

世珍同这个男人秘密同居了一段时间后，就同他结婚了，并搬到南京一座漂亮的住宅里去住。在他们家里每月都要接待到首都来的军阀及其妻室。

虽然时光流逝，岁月蹉跎，但她仍然长着那张空虚的娃娃脸，娇声娇气地同她的丈夫说话，甚至当着别人的面也象孩子那样百般撒娇。

在她丈夫面前她可能象个撒娇的孩子，但在有些情况下，

这种娇声娇气的模样就不见了。当她以一个有钱有势的阔太太的身份出现时，在赌局上大显身手，或者遇见她往日的朋友，并怀疑他们可能仍然是共产党人时，这种妩媚的神态都消失了。

作为一位官太太，一位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夫人，世珍在一些“有益的事业”中，挂上她的芳名，诸如爱国募捐会，但捐到的钱就不知下文了。她有时则作为一所学校、幼儿园、孤儿院或某种慈善事业的赞助人。在这种时刻，她从自己的私人汽车里走出来，由一名穿军装的人侍候着，或由一位带着官员证章的人侍候着，发表了一通“鼓励”她所倡导的事业的演说，并为此可能慷慨地拿出五十或一百元的捐款。

但在南京军事会议期间军阀或官僚云集首都纷纷谋求金钱、权力以及更高的地位时，世珍的表现要算最出色了。在会议期间，她的家变成了那些还不是蒋介石嫡系亲信的军官及其太太们的客栈。麻将 是世珍和她这个阶级的人主要的消遣形式，每天下午和晚上她家的一些大房间里都摆上了麻将桌，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太太们尽情地赌，输赢可以高达数千元。麻将牌的噼拍声甚至在大楼高墙外都清晰可闻。

在赌局上的世珍不再是孩子般那样妩媚作态了，而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南京城里最精明的一个赌徒。但她并不总是赢——因为输赢都是一种高超的政治。如果世珍的对手碰巧是一个态度不太明朗的军阀太太，那末这个女人准会赢，世珍就故意出错牌。不管这些女人的脑子里是怎样想的，但这样一个军阀太太走进房来时，世珍就会停下赌博，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说：

“哟，你今天穿的这件旗袍多漂亮——多好看的皮鞋啊！……你又带了一个新戒指——宝石旁边还有一圈珍珠！你说值五百元？当然，这是不少钱，不过如果要想带这种考究的东西，不但要花得起钱，而且还要有会挑选的好眼光！”

赌伴们到时候得停下来喝茶，晚上则是丰盛的宴会，各种名菜珍馐一应俱全。世珍是个体贴周到的女主人，不停地为同桌的客人夹菜，却很少夹一颗米粒到她自己那玫瑰花瓣一样的小嘴里。宴席上的那些太太们个个也都是非常娇贵，很少品尝摆在她们面前的菜肴，如果她们确实也需要吃点什么时，就装腔作势地用筷子夹起一小点食物送到那浓装打扮的脸蛋面前。

晚宴以后接着再赌，一直赌到深夜。男人们在开完了讨论如何打革命红军的会，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又同从上海高级妓院里接来的歌女们跳一阵子舞后回来了。这类高级歌女每周的“服务”费要花几千元钱，是专门雇来招待那些态度不太明朗的军阀的。

这些军阀的太太们睡到下午才起床，起来后接着又开赌。世珍的家里总是没完没了地开着这种赌局，但有时这些太太们也坐着汽车到城外去兜兜风，或者在玄武湖上划划游船，轻桨泛舟自得其乐一番。在这种时候，所有的游船都给包了下来，不准有其他人来游湖。

世珍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老练而有心计的女人。她过去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生活过的这段经历很适合她从事某种特殊的活动。她认识从前那些参加革命至今一直没有背叛的人的名字和面容。她在上海或南京时常盯梢跟踪这类人并将她所得到的情况向她的丈夫和她的丈夫的主子报告。有时她偶然

碰到一个身份不太清楚的人或是她丈夫或她丈夫的主子认为行迹可疑仍然同过去的组织保持着联系的人，她就会很殷勤地请他或她到家里来喝茶，设法建立友谊。在这类男女面前，她会眉飞色舞地谈起过去：

“我们过去都是C. Y.的成员，对吗？多有意思的日子啊！我仍然对它抱有同情，我并不认为我们错了！”

她从不鲁莽地去问她的客人现在的看法如何，但采取她这类女人惯用的手段，通过旁敲侧击和掌握谈话的方向，最后套出答案。有些客人也同她一样狡猾，会使她一无所获。这种情况她凭本能就可以感到，对这类客人，她会睁着那双又圆又黑，象蛇那样的大眼睛，连眨也不眨一眼地等着对方对她那旁敲侧击问题的反应。

有时她会去帮助营救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判了死刑的人；对那些向她求情或得到她的帮助的人，她表现得仁爱为怀，肝胆相照，有同情心而且慷慨大方。这个案子真悲惨，她会说。这个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的朋友和家庭情况如何——现在住在哪里？她的眼睛盯着客人的面孔一个劲地发问。

遵照她的丈夫或她丈夫的主子的指示，她到处打听，盯梢，然后将她得到的消息向他们报告。这是她听到的有关共产党员的情报；那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这个人行迹可疑；他曾在莫斯科呆过，但现在他有个体面的地位；他说话不多，但似乎知道很多情况。或这是一个可疑的女人：她穿着朴素，也不涂脂抹粉，也不赌博——而知道的情况很多。这些人准是共产党人！

那些被她那带着宝石手镯的白嫩纤手指过名的人，得想尽

一切办法逃脱。一旦被捕，不是坐老虎凳，就是上断头台，或被枪毙，或被关到一间黑魆魆的封建监狱里给活活整死。但世珍则因此得到了财富、权力和地位。

在上海的外国人把她看作是“一位铁腕人物的迷人的太太”。但在南京，这位娇贵的太太甚至听不到黎明时的鸡鸣声；因为她在睡梦中听见的仍是噼拍的麻将声，或处决她从前的同志的枪声。

十、在中国的外国人

我刚到中国时，以为可以通过许多已经在中国住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外国人接触到中国的各种文化和政治运动。或许他们密切地注视着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斗争；或许他们在研究试图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运动，例如民众教育运动，文化复兴，妇女运动等等。

一位在天津住了十五年的欧洲妇女主动开汽车要带我去看看“本地人的市区”——就象去访问贫民区一样。我要她把我带到南开大学去。

“南开大学！你说的是金陵大学吧？亲爱的——那是远在上海附近！”对我的无知，她只是淡淡地一笑。

“不，是南开大学，在天津的一所中国大学。”

“不过，亲爱的，你弄错了！”

争论了半天，她一个劲地说我初到中国——所有新来中国的人都会从外国人那里听到的那种颇带几分怜悯的说法。但最后她还是叫来她的那个“仆欧*”。那佣人说天津附近好象有所什么大学似的。一小时后这位太太把我带到就在天津郊外的南开大学。同时，还说她似乎什么时候曾从远处见到过这些楼房。

在南开大学我找到了一本带点自由主义色彩的美国《民族》月刊，这份刊物在天津的外国人图书馆和书店里都不陈列。

“我们这里不卖这类布尔什维克的东西。”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回答说，有个人很友好地警告我不要问起这份刊物，否则别人会把你看成布尔什维克。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听了我的这段插曲后说道：

“请原谅……你是一个外国人……但你应当了解天津外国人的知识水准并不是很高的。”

在北平我把一封介绍信交给一位在中国已经住了十年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教授。他肯定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学者。我天真地对他谈了我的兴趣。象我在中国遇见的其他许多外国人一样，他似乎觉察到我是在搞什么煽动性活动，也同其他人一样，要“对我施加影响”而且从一开始就让我建立起“正确的观点”。他给我上了足足两个小时的课。

我听他说，中国的学者，除非是在美国出生或培养的，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人物。中国人还由于几个世纪来只尊重知识，不尊重金钱的风气，形成一种“狂妄自大”的恶习。现代的中国人不诚实并且都是无能之辈。中国的情况在俄国的布

* 仆欧——仆人。

尔什维克没有到来之前不一样，现在整个中国都给他们毒化了。大约有六七个布尔什维克在南方落户，但他们要把整个中国抓到他们的手里而且强迫中国人从一个温良恭谦让的民族变成一个傲慢和充满敌意的民族，他们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大街上往白种女人身上吐唾沫。他描述“南京暴行”时的情景，就好象听协约国关于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吃婴儿的蛊惑宣传一样。然后他说到一个他认为能够使我信服的观点：“你知道我们对侮辱我们的妇女多么愤怒……一想到南京我的热血就沸腾起来了。”

让他的热血去沸腾吧，我得去访问另一群美国人。这批人，象其他许多外国人一样，把他们自己说成是“中国的朋友”。当许多人在谈论犹太人时，他们开始说道：

“现在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又说“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他们象蛇一样邪恶，同时又象孩子那样头脑简单。”

从外国人中听到的主要抱怨是中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确保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福利。至于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福利则只字不提。这些“中国之友”的计划是主张派“有头脑”的美国银行家来指导中国人各方面的生活和活动，以推行所谓的道斯计划。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几十亿美元的贷款要付出多少利息，但从他们的态度来看，我推测如果这个计划最终得以实现的话，每一千个中国人里能穿上一条裤子也就算不错的了。

后来我同三位自由派新闻记者吃饭。他们对中国友好，但他们也未能使我同我所要见的中国人接触。他们只是把从中国

和外国报刊或从少数几个中国官员那里得到的消息往外发，有些新闻确实是不错的。中国人说这些人主要是从使馆区的一些情报机构获得新闻的。他们自己也对我说日本人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情报网，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消息。

“当然这是在北方，”他们说。“在南方，英国的情报组织最好。毫无疑问你一到中国他们就知道了而且知道有关你的一切，包括知道你几天换一件衬衣。”

“如果你写有关这里外国人的事情，”其中一位警告道：“他们不会轻饶你的。这些外国人会到处刁难你……他们甚至会把你的开除出俱乐部！”

“多可怕呀！”我嘲笑着说。

“嗯，这是可怕的！”有人回答说：这里的人都喜欢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同中国人接近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中国人压根儿就不喜欢外国人。”

“为什么？”

我刨根问底地问了几个“为什么”，终于引起一场争论。事后他们就对朋友们说我新来乍到对中国一无所知，过一两年后就会回到“和我一样”的立场上来。这指的是主要由企业家和商人组成的一块小殖民地。这些人在欧洲和美国只是开中小店铺的人，但在中国却过着王子一般的生活。

有一天我访问了一个在中国居住了多年的德国人。他是我在华北和满洲遇见过的许多德国人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有的比他更坏，少数几个比他要好得多。他抱怨说，德国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在政治和商业上倒没有

什么损失。那末错在何处呢？问题是德国人在社会上现在属于第二等级——处于和中国人一样的地位，受到其他外国人的轻视，同时也得不到中国人的尊敬。

从他的痛苦叙述中我了解到一个德国人几乎不可能爬上奥林匹克斯高山之巅，坐在顶峰的是英国公使，其他国家的代表都象圣徒围绕着上帝那样拱托着他，它们的地位同各自国家的军力密切相关。仅次于或几乎同英国公使处于相同地位的是美国公使。接下来是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由于肤色和种族低劣的日本人远远地落在后面，同德国人、中国人、俄国人和其它下等民族一起几乎处于最低层！夫人们当然也反映了她们丈夫的权势和荣誉，英国的夫人们为各种社交活动定调子，其他国家的夫人只是跟着这个调子团团转。英国的社会习俗在中国的外国人圈子里占统治地位。英国的夫人们以神圣不可侵犯的优越感考察每个新来者是否值得约见或应邀去喝茶。

我发现在这种拼命往上爬的社会中有一个例外的人。他是一位美国职员，从前在天津当过兵。他站在柜台前象是挂在晒衣绳上的一件破旧衣服，两眼总是看着外面，他所谓的那个“东方的死城”。他对同胞中有“优越感”的那些人持批判的态度，说在天津的外国殖民地唯一有意思的是偶尔可在报上读到在“情场趣闻”标题下有关私生子的新闻。当他烦闷难耐时，就同其他外国人一样——去喝个烂醉如泥。

“但是这里正在展开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我表示很难苟同他的观点。

“什么地方？”他问道。

“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军阀和政客，”我回答道。“甚

至资产阶级的妇女联合会也在提出一桩桩的离婚案，扰乱着中国旧的家庭制度。”

“啊，你指的是中国人！”他感慨地说。“这里谁也不同中国人联系。男的都是我们手下的职员，我们认识的女人只是外国女人想‘同当地人接近’的集会上所见到的。大多数外国男人只认识为我们士兵开设的妓院里的那些中国女人。”

我问一位英国商人，他对中国的形势看法如何。他回答说：“中国佬是好人，但需要有坚强的领导。你现在看到的种种傲慢态度都是鲍罗廷教唆的。那个人有铁一般的意志——你必须承认这点。他对待中国人象是在下棋子；他压根儿瞧不起他们，但他毒化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当我走出这里时，你可以抓住一个中国佬的辫子猛揍他一通……这样他会对你表示尊敬。但现在看他们那个样子！”

一个美国女人在北平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她以浓重的鼻音发表了一通颇带哲理性的讲话：“我们没有把中国人当作一个孩子去对待是犯了一大错误，我们对它应当既仁慈又严厉。”她显然说出了某个美国止痛药片推销商的意见，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用以证明中国人绝对是一个半发达、半开化，只有孩子般头脑的种族。

不过我看到一个美国人，至少他对一个中国人是非常亲切的。那是在沈阳的一个旅馆餐厅里，我的对面坐着两个美国皮货商。刚吃完晚饭，其中一个靠在桌子上，正在用牙签得意地剔着牙。一位穿着军服的中国人进来了，身后跟着两个人。虽然那个皮货商坐在那里没有动，但把牙签从嘴里拿了出来，高声喊叫道：

“嗨，老总，你在这儿干吗？”

那位中国将军欠了欠身，似乎有点惊讶，就走开了。

几天以后我设法见到了中国各式男女人等——但很少发现外国人所说的那种人。我会见的有在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有可能在北方举行一次罢工的铁路工人；有计划为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反对凡尔赛和约和北方亲日派官员的造反中牺牲的四十名同志举行纪念活动的学生们；有计划掀起一个反对纳妾和其他不合理家庭制度运动的妇女；有组织群众示威游行以反对在南京召开的右翼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国民党左派；几位中国女作家，在她们的家乡很活跃，要出来学习西方世界最新思想的几个女作家；有看不到中国的生活出路何在而陷于绝望之中的诗人和学者；有在计划民众教育运动的教师和学生。当时的北平城里到处张贴着标语口号，成千上万工人、妇女和学生的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市中心，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和在三月十八日牺牲的学生举行群众性的纪念会。

在北平的这些活动和游行中，我看到一个孤独的外国人：一位德国旅游者，他碰巧站在紫禁城内一次群众集会附近，同时一个劲地在那里拍照片。

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中国人的一次会议后回来。和我同路的是北平大学的一位中国教授。

“我讨厌走近这个地段，”当我们快到回家时必经之地的使馆区时，他这样说道。他的谈话被使馆区高墙里面的狂叫声打断了。我们驱车经过那住宅区，里面的外国人正在举行一场有奖比赛。我们默默地经过，观众的狂喊乱叫声在两个街区以外都可以听到。

十一、鲜明的对照—— 花瓶和革命女性

我们走进一家冷饮店，陪同我的那个中国青年向坐在房间那头桌子上的一群人点头打招呼。我们坐下，点了冷饮后，他说道：

“你知道同那两个外国人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中国女人吗？她是一个银行家的妻子，那银行家新近又娶了个小老婆。”

我的目光扫向房间那头，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中国年轻女子。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绸子旗袍，高高的领子，扁平的胸脯，下摆一直拖到脚踝，两边开衩一直开到膝盖，露出一双穿着高价丝袜的漂亮大腿，脚上穿着一双外国的凉鞋。她烫着短发，在她的领口和旗袍的一边钉着两颗碧玉钮扣。当她举起香烟时，那只白皙的纤手上露出一只大钻石戒指。她的这身考究

打扮只有中国上层阶级的女子中才看得见。

同我在一起的那个青年继续往下说：“你想想看，她毕业于美国的一所大学，但当她的丈夫娶了个小老婆后，她却只会哭！她可以离开她去当个教员，但她没有这点骨气。她宁愿同小老婆一起共占一个丈夫也不愿自己去独立生活……这是我们中国妇女的可悲之处。”

“你指的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吧，”我反驳道。

“嗯，是的，”他回答说。“但这是我们的现代妇女。她们只是一味学外国女人那套，把电影演员当作自己的模特儿！我瞧不起那些看到丈夫娶了小老婆只会哭的女人！”

* * *

我们在香港见到那个上流社会女子后，赶了一天多的路程来到广东省东南的顺德地区。有一天黎明，还不到五点钟，我站在当地一个小城镇的古老祠堂前面。

只见浩浩荡荡的人流从铺着石板的狭窄街道那边走过来，足有几千名妇女。她们穿着木屐走在石板路上发出的踢蹴声，老远就可以听到了。一批批的人流走过横跨运河的石头拱桥，消失在缫丝厂的漆黑大门里面。她们都穿着当地广东人爱穿的黑色发亮的衣料，上身剪裁得短短的，裤子则长而肥大。象所有其他中国妇女一样，她们也不带帽子。她们乌黑的头发上擦着油，梳得整整齐齐往后留着一根拖到齐腰的长辫子。头上唯一的点缀是在脑后辫子根处扎上一根红丝带或者一条一寸宽的纱带。

每天清晨，几千名妇女穿过大街去上班。只是到了黄昏，劳动了十二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疲惫不堪地回家。她

们每月的工资则还不够香港女士举行一次茶话会的花费。

关于这些妇女在中国有种传说。那些从两性关系看待妇女的男人都说她们是同性恋者。她们不结婚，当父母强迫要她们结婚时，许多人就走上自杀的道路。女人为什么不结婚——除非她们是同性恋者，这些男人说。

然而在这个地区办起缫丝厂之前，这里的女人是结婚的。她们结婚，生儿育女，同丈夫一起在地里劳动或摆摊开店经营买卖，或者帮他们养蚕缫茧。那些被地主、官僚、高利贷者掠夺得一贫如洗的穷苦家庭里的女子就被卖到地主、官僚、高利贷者家里去当女佣，或者被卖到广州、香港或澳门的妓院里去以卖娼为生。

后来缫丝厂办起来了。妇女都去当了工人。这些农民和小商贩的女儿有了这点微薄的工资收入也就获得了独立。她们首先冲击的对象是婚姻。先要在家庭内取得胜利。在贫寒之家，这份微不足道的工资却是一个强大的武器，虽然许多人在斗争中失败了，但成千上万的人取得了胜利。生下一个女儿，人们照例总要叹口气，而现在却感到骄傲和高兴了。儿子不再是唯一的经济支柱。这个地区的妇女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的男人对这种变化总的来说感到闷闷不乐。这些妇女出来挣钱倒没有什么不对，但为什么要这样神气活现地闹独立性呢？是的，这些女人长得高大壮实，也漂亮，但她们有什么权利可以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甚至到城里去看电影呢？（城里每月放两次电影）她们有什么权利讥笑她们的工头和雇主，而男人走过去检查工作时还要噤噤私语妄加议论呢？同性恋者，个个都是同性恋！不幸的是，缫丝厂里需要她们，但都是

些目空一切的放荡货！

在反革命开始之前，这些女子有她们自己的工会。许多人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但现在她们的工会作为违法组织被取缔了，女工们就转而建立起秘密的“姊妹会”。这些姊妹会也受到怀疑——官方说它们一定是共产党的组织。当工厂主以共党嫌疑犯开除女工时，其他女工都团结起来给以声援，或者直接采取罢工的形式，或者工作磨洋工进行消极抵抗。简直无法对付她们！

有些女工后来不得不结婚。但情况又如何呢？家里老人总是逼她早生孙子好继承香火。有些女子受不了家里长年累月的软磨硬压，有时就答应结婚，但婚后要想获得自由得同丈夫讨价还价。有的每个月给丈夫五、六元钱后才能得到安宁；或者要婚后生下儿子，才能得到自由。当丈夫的则甚至可以娶小老婆。在缫丝厂里偶然也可看到结过婚的女人。另外一些拒绝结婚而又很难违抗父母之命的就三三两两结伴去投水自尽。

但大多数人都能战胜而拒绝结婚。政府甚至通过一个法令禁止妇女从她们丈夫那里买到自由。然而许多人不知道有这法令，那些知道的人也只是置之一笑。

看到顺德地区的工厂主和官员对这些妇女的敌对态度是令人震惊的。妇女似乎对他们永远是种侮辱。他们如此敌视，以致我不想让他们之中的任何人给我讲有关妇女的情况。“当我们经过缫丝车间时，你知道她们说些什么吗？”一个年轻的官员问我。我不知道。“她们说我们是资本家的走狗！”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反问她们时，她们只是笑而不答！”

“政府是否有法令禁止她们笑呢？”我问道。

那官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没有作出回答！

十二、湖南的矿工起义

水口山一带山峦起伏，白雪皑皑。山麓处矿工们久经风雨的茅屋顶上也积满了厚厚的一层。一清早，在雾色苍茫中矿工川流不息地钻进阴暗的地洞，到夜幕降临才又象夜出动物一样再从洞里爬出来。他们衣衫褴褛，冻得发抖，可是在多年为争取生存条件——这些条件他们是不具备的——而进行的自觉斗争中所磨炼的双目却炯炯发光。

矿上的女工和童工天天在矿坑里干十二个钟头的苦工，所挣的血汗钱则寥寥无几。他们一个个青肿的眼眶就是遭受苦难的见证。他们偶然抬头凝视四周筑有围墙的那些考究住宅时他们的目光会变得象男子一样地刚毅、冷峻。那围墙后面是矿山经理和工程师们的舒适住家。他们的妻儿老小，养尊处优地生活在安乐窝

里，从未受过饥寒之苦，还有宽敞的学校，可供学习。墙外有警察巡逻，见到他们还要奴颜婢膝地鞠躬致敬。

往南，在矿坑那边，离这些考究的住宅很远的地方是几千所矿工住的杂乱无章的茅舍土棚。除了他们往常的苦难之外，一九二七年又陡然增添了新的灾难。这一年一批又一批的矿工被逮捕，游街然后押上刑场。共杀了多少人？矿工们心里有本账。打从反革命开始到十二月，已有三百八十七名矿工惨遭杀害了。

这些被捕的人被剥去上衣，光着脚，穿着破烂不堪的裤子，两手反绑在背后，被武装军警押送到刑场。可是他们个个昂首阔步，面无惧色，一路高呼：

“打倒国民党！打倒军阀！工人俱乐部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就这样，他们在走向刑场的时刻仍喊出了他们心中毫不动摇的信念。这种血腥镇压后，矿工们就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抗议，接着又会发生新的镇压事件。难道矿工们会忘记这种镇压吗？当然不会：他们决不会忘记他们最英勇的同志横遭杀害的惨剧，他们也不会忘记这十年来的斗争和他们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

他们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六年前在中国举行第一次矿工大罢工了。那次罢工没有在血泊中淹没，而是赢得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和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权利。工人俱乐部一经成立就为工人的子女，也为他们自己办起了学校，甚至还有报纸、杂志和书籍；赢得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另外还强迫矿方废除了合同工的奴役制。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刚一年，水口山党支部秘密组织起来几个月之内取得的。一年后，纵然他们遭到了失败，所赢得的一切也几乎丧失殆尽，几百名同志被杀害，但谁也忘不了这一年他们过上了象正常人那样的生活。

后来成为组织全国矿工联合会巨大推动力的就是这批矿工。一九二六年当南方军队北上，路经湖南时，他们已先行组织起来把北方军阀从他们的家乡赶跑了，于是他们再次过上正常人那样的日子。可是接着又来了反革命，国民党已经出卖了革命的名义而走上了旧军阀的老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地屠杀工人和农民。

在这次恐怖斗争中，矿工们比以往经受了更大的锻炼。不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回斗争的意义，甚至连孩子也早熟了，还没有度完童年就变为成人了。

游工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只有十四岁，可从八岁起就进矿挖煤，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尽管年仅十四，他仍然可以说：“是的，我是一名矿工——一个有六年工龄的矿工。”不过，要是有人发现他认真反对这次大屠杀，他同样有被枪决的可能，就象枪决任何一个成年人一样。有的青年就是这样被枪毙的，为什么不能枪毙他？

然而目前，当血腥的一九二七年接近尾声的时候，矿工们的心坎里似乎有一种激情在燃烧，在坑道里、平炉前、电机房、赌桌边，矿工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随后又立即分散。通过这伙人的活动似乎令人感到有某种保持接触的需要感染了这位身材硕大、骨骼突出的人物——宋铁匠。

人们称他“宋铁匠”，是因为他从衡阳来本矿前干过十年

的铁匠活。现在，当上了待遇优厚的领班，作为工头他可以到处走动，任意找人谈话，可把工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工人们有时围着他，过会又回到各自阴暗的角落。宋可以这样同人谈话，没有人会怀疑领班，因为只有帮助破坏工人协会的黄色工会的头头才能当领班。

这个矿的黄色工会共有会员二百多人，但在全矿二万多名工人中确切了解宋铁匠在目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则有数千。他是当地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并且正在组织起义。但矿工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没有一个黄色工会的会员及其头头，没有一个老板，也没有一个警察了解举行起义的事。这样说也并不确切，因为有些警察还是知道的。这是因为负责保卫矿山任务的一千名左右的警察中，有五十名是在组织里的。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在协助这次起义。

这是信基督教的老板们过圣诞节的时刻。一年前，矿上的外国人已逃离湖南了，剩下的只有中国人，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基督教徒。围墙里边的深宅大院里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矿工们也可以抓住这个时机聚众赌博，手边堆上一些铜钱，还可以乘机相互密谈。圣诞节过后接着而来的是新年，深宅大院里的人仍在欢度节日。

阳历一月三日到了。这天矿山上的汽笛照例在黎明前的雾色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傍晚矿工们又随着汽笛声从坑道里走上来。尽管他们一如常态，可气氛有些不同，因为不少人径自带带着铁镐回家了；另一些人连洗洗乌黑的手脸都顾不上又聚起赌来，或者聚集在伙伴们的茅舍里，及至夜深人静，成百上千个工人的黑影子，经过市镇来到离水口山十几里以外的小山

头。他们三五成群地朝一座小庙宇的方向走去。留在林里的人则耐心地等待着。

游工这孩子也被派往小山去参加会议。他的父亲游明，是黄色工会的会员。这天晚上当他从家里溜出来时，并没有被他父亲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因为他父亲对他夜晚去炉床附近拾煤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一回也象往常一样，他父亲仍免不了要骂他一顿：

“滚！你这个懒散的夜游子！再不学会好好干活，永远成不了气候！”

游工没有答理，他的母亲侧耳听着。这位身材高大，面黄肌瘦的老妇人已在矿前矿后操劳了三十多年了。只有父亲开始动手打儿子时，她才出面干预。每遇到这种时候，她会挺身而出，但也因此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因为她已上了年纪，不如从前那样健壮了，所以挨打受气的总是她。尽管如此，她还是要去袒护她这个唯一活着的孩子。

出了家门，游工并没有朝炉床的方向走，而是径直往一个比他大两岁的青年工人朋友的小茅草房里跑去。随后他们两人又在黑夜里往前奔跑。

小山上一个洞穴前站着黑魆魆的一群人，那里就是集合地点。人们正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洞穴当中有一把火炬在徐徐燃烧，火光中看出宋铁匠及其身边矿工的脸上流露出安然的神态。紧挨着老宋的是矿工老武，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年纪似乎比宋略长几岁，约摸有四十五岁上下，十年前从老家汉口来到本矿。他的深沉宏亮的声音，坚强的信念，对许多矿工来说是并不陌生的。大革命时代他曾当选为矿工会议的代

表。反革命开始后，党派他打入黄色工会，不但保全了性命，还可以将敌人队伍中的许多情况传递出来。

这次会议上主要发言的是老宋、老武和其他十来个矿工。会议讨论了起义的计划和最后的组织工作。代表们就各个细节，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反复探讨，会议进行了整整两小时。

会议决定当夜凌晨一时，矿山的汽笛按时发出第一次信号，人们要闻声而动，立即奔赴指定的集合地点。十分钟后，第二次鸣笛时，要把公安局门口的武装警卫人员干掉并解除武装。同时矿工们要立即采取行动，解除所有警察的武装，没收其武器。对公安局发动的突击必须尽量不露声色以免打草惊蛇。矿工们须用公安局的枪支弹药装备自己。所有警官、国民党员、矿山老板、黄色工会会员及其头头应一律逮捕法办，于翌晨处决。然后起义人员立即朝西南方的小山挺进与红军汇合。

在袭击公安局的行动中，打冲锋的人必须要有武器，而工人们唯一的武器是五枝左轮手枪和宋铁匠打制的五十把大刀，这些大刀已装在铁管里藏在公安局对面的茶馆里。选派去收拾警卫的人就要带上这些武器。有人提议这项任务最好由年轻人担当，可以减少猜疑，但也有人顾虑在实际交锋中怕他们不够坚强。

在这个节骨眼上，游工及其小伙伴站出来说：

“我们都是共青团员，难道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各种斗争中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吗？大伙瞧瞧——我们多么强壮！”

他们伸出胳膊，握紧拳头给大家看。游工向着宋铁匠恳切要求。最后终于决定由游工及其伙伴担任首先发难的先锋队

员。

会议到此圆满结束。于是黑魑魅的一群重又循原路分散走回水口山。然后他们沉静而迅速地将情况传达给聚集在这个或那个茅屋里的工人们。同往常一样，房子里没有点灯，但守候在黑洞里的人坐在长凳边睁大眼睛凝视着漆黑的远方，密切注视着动向，等候指定时刻的到来。他们有人带着菜刀，有的手持铁镐，有的拿着铁棍、桌腿；还有不少人携带自制的铁器，以及古老的铁锈斑斑的宝剑。

游工和他的伙伴急速地朝着一个茅舍奔去，那里有二十名青年在等候他们。时刻一到，他们将马上穿过夜深人静的街道溜进公安局对面的茶馆。该局门前正有两个守卫站岗，中间放着个木炭火盆，有时守卫蹲下来烤火取暖，各自肩上背着那少见的吓人武器——每分钟能连续发射六百发子弹的自动步枪或自动手枪。持有这种武器，只消两个人就能守住一条街，真是以一挡百。

他俩穿街过巷，不一会来到了露天高炉前。从这里窥视守卫，一举一动，清晰可见。但冷风刺骨，他们只得来回跳动，藉以御寒。有时试试铁棍，然后又藏到他们的破衣服里面。

午夜过去了，时针慢慢地在走向一点。这时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的凌晨。

他们颇有点等候得不耐烦了，于是大胆朝那守卫凑过来，悄悄蹲在火盆旁，一面取暖，一面打开了话匣子，数说起这几晚各自拣了多少煤的事儿。守卫倒也并不提防，其中一人竟若无其事地打起盹儿，摇来晃去，一会儿醒，一会儿睡。

忽然间传来一种短促而低沉的鸣笛声，可是只鸣一响立刻

又停住了，好象半夜三更有人拉错了汽笛似的。打盹儿的守卫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这两个年轻人可听到了；但仍蹲坐在那儿，犹如变成了石头纹丝不动。不过他们的眼睛则在密切注视着。

刚才的汽笛声，守卫没有听到，警察没有听到，熟睡在舒适床上的老板没有听到，搂着姘妇睡觉的警官、国民党官僚也同样没有听到。但是，居住在水口山在等待这个声音的每一个矿工都清楚地听到了，只有黄色工会的头头及其会员仍在昏睡中。

茅屋里的人夺门而出，鸦雀无声地神速奔赴指定地点。有的打着赤脚；多数也只穿着草鞋，一身破衣烂衫，破碎的裤子来回飘动；有的衣不蔽体，饱受风寒。平素他们就是穿着这身破衣烂衫干活，如今也以同样装束参加战斗。

霎时间，黑夜里又传来一声嘶哑了的汽笛怒吼，活似一股电流穿过整个水口山一般，公安局门前的那两个守卫也顿时如大梦初醒，紧握住枪，抬头张望，可是没来得及拉开枪栓早已被蹲在火盆边的两名青年用尖刀插进了喉咙。连救命都来不及叫就一命呜呼了。

这时成百上千双轻盈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另有许多人穿街过巷奔往公安局的后门。成群的人从大门蜂拥而入直奔存放枪支的架子。人们从枪架上拿取枪支的碰撞声，惊醒了熟睡的警察。不过为时太晚了，几百名矿工已占领了他们的宿舍；与此同时，另有几百人手持步枪，如飞虎下山般地涌向街头，分头冲进了警官、国民党官员以及老板们的公馆，吵醒了他们的美梦；还有几百人负责解除分布在全城的警察的武装，其他几

百人则在搜查黄色工会会员的住家，以及黄色工会的头头强行霸占的前工会俱乐部。

宿舍里的警察个个吓得惊慌失措，苦苦哀求：

“饶命！饶命！我们都是同志！”

“谁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心里有数！”是矿工的回答。

这话一点不假，他们确实了解警察中他们自己那五十位同志中的每一个人。

一名矿工纵身跳上一张桌子对警察喊话：“我们是来夺权的。要夺回属于我们工人和农民的权力。你们杀害了我们那些为工会和俱乐部而奋斗的同志。不过，我们了解你们中的有些人当帮凶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了骗，你们不了解我们闹革命的意义；有的人同我们一样，也是受压迫的，为了谋生不得不干。我们是干革命的，这场革命，只有工农兵才能领导。我们要在全中国扫除一切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分子。我们要求你们同我们一道起来造你们长官的反！”

接着一个警察也跳上桌子象矿工那样讲了一番。

许多警察也都跟着喊：

“行——我们听从吩咐！”

大家知道，多数人这样说无非是怕矿工会把他们杀了。但有些人则是出自内心，有的还参加了工人队伍。其中包括早已是工人同志的那五十名警察。

在这个宿舍内抄出了一份警官、警察特务分子、国民党员及其长官的全部名单。工人们打开了所有档案，内中居然发现了本周内又有一批新的同志要被处决。

天亮了，水口山已掌握在矿工的手里，二百个反动分子成

了阶下囚。街上的号角吹响了，大家都知道这是行刑前的集合令。七点钟大街上重又响起矿工们沉重的脚步声，这二百个反动分子押在中间，手被绑着，有的面无人色，活象山坡上的残雪；有的歇斯底里，边走边哭泣，其余的人则失魂落魄，蹒跚而行。有个肥头大耳的警官惊恐地乱叫，无人理睬。他们在经过街道走向刑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呼喊“国民党万岁”的口号，当时跟在队伍后面的大约有四百名矿工。

刑场一边站着四个年轻人，手握军号待命吹响执行处决的号令。死囚们依次被押上刑场，有的站着，有的跪着，后面是武装工人行刑队。从犯人中特地挑出五个人作为一组。这五人都曾一度担任过工人领袖，为了几个臭钱竟参加反动派，把原先的同志置于死地。他们当上了工头，也象其他工头一样，手执皮鞭，迫害工人。他们现在被推出队伍，行刑人没有拿枪，只拿着砍头的刀。这个可耻的下场也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曾经背叛了工人阶级。

接着军号齐鸣，枪声迸发，那五把钢刀也白光一闪，随之人头落地，顿时二百具尸体横倒在雪地上的血泊里。

处决的人数实在不算多！因为矿工们处决的只限于那些自觉的罪犯。他们之中既无妇女、儿童，也没有仅仅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而受到株连的。

观看的人并不多。这些人现在急忙回到工人俱乐部去开群众大会。青年号手迈过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急速离开，只有一人停住了，那是游工。

“我的爹！这是我的爹！”他喊着。其他青年围拢来，朝着游工凝视的方向看，地上躺着游工的父亲——游明，黄色工

会的工头，如今已是硬挺挺的一具无头尸体。他一度曾是矿工工会的活跃分子，因而被矿方开除，失业了几个月。可是没过多久，他忽然飞黄腾达，口袋里装满了钞票，不但有了工作，还当上了工头，月薪不再是十七元，而是四十五块大洋了。

游工知道他的父亲是黄色工会的一个头头，但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却没有想到过他。在准备阶段，他也只是设法回避他。游工身为共青团员，他的一切都是听从党的指挥。他对于他的这个父亲一向了解不多。只知道不辞辛苦操持家务的是他那位沉默寡言、面容憔悴的母亲。至于象爱、体贴这类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则是罕见的，或者说压根儿就不存在。他们都在矿山干活，干完活就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回到自家的茅棚，只顾上吃饭睡觉。因此对于游工来说，党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

可是，游工想到他的父亲，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因为是他吹起号处决了他的父亲。要是他事先了解他真不知该怎么办了。也许他不会犹疑不决，因为他是奉命行事的。

同志们拉着他走——就要开群众大会了，矿工们得立刻行动。于是在战友的簇拥下，面色苍白的游工跟着大伙朝工人俱乐部走去。到了俱乐部他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了宋铁匠。跟在铁匠身边转了一阵子，然后一把拉住他的手说：

“我爹，——也给杀了。是我吹的号！”

宋站住，低头看了看那孩子苍白的脸，老铁匠温存地用他那只大手轻轻抚摸着游工的头。那孩子眼神里也报之以敬爱和信赖的目光。

宋说：“不只是你碰到这种事。我们都得牢牢记住，在革命斗争中，我们可能要牺牲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但你是

一名共青团员，你的生命属于党。除了党，你再没有家，没有爹，也没有娘。对不对？”

“对，”游工回答说。

“来，就站在我身边，”宋对他说。在整个群众大会以及准备出发的过程中，游工一直站在宋的身边。宋在会上讲了话，讲到过去的白色恐怖，以及全国各地的反革命。他强调必须粉碎反革命并建立起工农政府；矿工应当马上出发，向西南挺进去参加朱德率领的红军；最后他号召所有矿工要踊跃参加这支部队。

群众大会上男女老少人声嘈杂。妇女和儿童哭哭啼啼抓着他们的男人不放。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则甩开抓着他们的手，加入在街上集合的队伍里。

游工跟着宋往前去，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了他，抬头一看是他的母亲，大颗的泪珠从她的双颊滚滚流下来。

“你可不能跟着红军去打仗。走，跟娘回家去。娘老啦，不能孤孤单单一个人过。”她说。

游工仰头凝视着她的脸。如今她已年过半百，两鬓苍白了。可是宋铁匠的话却牢记在心。“我要跟红军走！”他一面说，一面从腰带的皮夹里掏出所有的钱——总共二元七角大洋统统塞给了他娘的手里。说完头也不回走进了人群，重又回到宋铁匠身边，他娘的哭泣声被人群中的嘈杂声湮没了。

队伍的前头不知谁高高举起一面鲜艳的大红旗，迎风飘扬。旗的正中有一颗黑色大五角星，星的旁边是黄色的锤子和镰刀的图案。旗子的底下写着“湖南游击队”五个大字。站在红旗下面的是身材高大的宋铁匠。

队伍开始出发了。又有许多矿工摆脱开抓着他们的手，加入战友的行列中来，游工也加入队伍中接着就出发了，两眼紧紧盯着远处的红旗。

这支队伍总共有三千一百名工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十二到十八岁的少年儿童。这些工人中有的背着步枪，都是从公安局和街道巡警身上缴获来的；有二百名腰里别着手枪的，其中将近一半是警察。其他人则有的持铁棍，有的肩上挎着宋铁匠造的大刀，也有人扛着铁镐、镐把和竹棒的。游工的手里拿着一把军号。还有年纪比他还要小的孩子，因为许多矿工是带着儿子一起来的，这些孩子有的竟不满十二岁，跟在爸爸的身旁行军。

这次矿工群起造反使饱食终日的湖南官僚十分震惊。电讯联络忙作一团。下令政府军跟踪追击。沿途的政府军都接获命令就地歼灭这支队伍。

矿工起义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江西山区的朱德那儿。矿工们在向东南方的耒阳进发，那里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占领了县城。朱德准备向耒阳进军迎接游击队。

在向耒阳挺进的一个月中，矿工们一路奋战。第一仗是在铜子山同五百名持有机枪的白军的遭遇战，矿工们立即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队遍布山区，战斗不到两小时就活捉了二百名敌人，其余三百名死的死，伤的伤，或向北边逃窜。俘虏们被解除了武装，用缴获的武器装备了矿工——中国的工人武装起来了，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这次战斗告捷，矿工们胜利地占领了铜子山。可是他们不能停留，在街道的墙壁上刷上了“为工农联盟而战，不纳税，不缴租”的大字标语之后又接着

继续前进去迎接新的战斗。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矿工们打了十次小规模仗，但只伤亡了一个人。白军都怕同他们交锋。白军的军官说只不过二、三百个矿工，然而每逢遭遇时成千上万个矿工竟象是从脚底下钻出来似的。矿工们善于奔跑象野兔一样敏捷，他们似乎长有四只手、四条腿，打起仗来简直同凶神恶煞一样，而同凶神作对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每逢交锋，矿工总是首先向白军喊话：“我们都是工人，我们是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打仗的。为什么你们同我们打仗？”

当兵的听这话，不免暗自忖度：“倒也是，打仗为啥？一连七个月的军饷到现在都分文未关！”于是他们对着天空打了几枪就跑了，说同恶神打仗凶多吉少。

矿工们到处同地主的武装民兵——民团拼杀，打败他们后把缴获的武装分发给农会。那些大腹便便、身着绫罗绸缎的地主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逃往省会长沙去了。他们哭天怨地，在长沙，到处哀号呼救，危言耸听地说土匪肆意屠杀了湖南的千百万农民，并胁迫其余农民加入农会，制止他们缴纳租税。

当地主们叫苦连天时，城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忙于重新成立他们被取缔了的农会，用浓茶热饭盛情款待这些所谓的“土匪”矿工，甚至将他们刚刚从地主老财家里没收的长袍相赠。然而这些长袍矿工们都无法穿，因为他们有些饥寒交迫、骨瘦如柴的人，地主的一件宽大长袍足可容下两个人。不过矿工没有被褥，每当被迫露宿野外山区时，可作御寒的铺盖。

矿工们抵达耒阳时，正是阴历正月初——确切地说，是阳历二月八日。耒阳位于山区以东约一百里外的平原上。那里有

一位前黄埔军校的学生名叫吴仲华的领导了这次起义。吴仲华年岁不大，刚满二十三，风度翩翩，如旭日东升。他还是个英勇的战士，杰出的组织者。

耒阳方面特派使者来向矿工祝贺，热诚欢迎他们前来该城。在这里，这批疲惫不堪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款待。然而关于朱德离开山区即将到达耒阳的喜讯则是三个星期后才由使者转告他们的。

全体矿工参加群众大会听朱德作报告，已是二月底了。朱德在作报告前先同矿工们见面热情慰问。在这儿他看到了曾经在严寒季节打着赤脚边战边走在艰苦斗争中经过千锤百炼的三千多名钢铁战士。

聆听朱德讲话的矿工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他呢。从外表看，朱德大约四十五岁，瘦高个子，身体结实，上嘴唇留着一撮小胡子。他不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话讲得不多，但句句都是实事求是的经验之谈。他讲了全国的反革命形势，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联盟；讲了许多城镇工人和乡村农民遭到残酷屠杀的情况。他说未来充满着艰苦的斗争，还要克服许多困难，但是大家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献身于革命事业。

矿工们一面听，一面试试枪、摸摸刀。

朱德接着告诉他们，只有红军才是工农大众唯一的保护人，这一点人人必须牢记。红军战士永远不能拿穷苦百姓的一针一线，不能调戏妇女。所有红军人员，不论官兵平时都是同志，作战时，就得绝对服从命令。只有有严明的纪律才能将反动派彻底消灭。

矿工们不久就同红军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人数不多，只

有三千，农民占几百名，其余的则是曾在朱德领导下受过训练的战士。

这些战士给矿工讲述了许多关于朱德的逸事。他们说朱德在一个叫德国的地方学习过，会说外国话。在北伐战争中朱德当过教导团团长。他的上司就是反动的桂系军阀范舒山（音译）。朱德曾一度当过南昌警备司令。当蒋介石和盘踞在上海、南京的桂系军阀们发动反革命后，随后又在国民党“左翼”领导下蔓延到全国各地，这期间南昌的范舒山接到蒋介石的一份密电，告诫他朱德是共产党，范手下的军官将此事转告朱德，要他严加提防。

不过在还没有同朱德谈谈弄清情况前，范将军也是不愿贸然处决他的。因此他借宴请他的高级部下之机邀朱德出席，再作定夺。朱德毫无畏惧地赴宴了，并且有意地在范的身旁就座。他一面畅饮，一面大谈一名姿色倾城的歌女。他谈得津津有味，甚至提出要向范将军引见，希望将军赏脸。这一说不要紧，乐得范将军喜笑颜开，馋涎欲滴。在谈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朱德坦率地说，他参加的是国民党，他要为党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话里蕴藏着深厚的情感。接着又痛饮几杯，话题重又回到那美人身上，形容她的容貌有如仙女下凡。就这样，他真实地扮演了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使范将军深信不疑，当即决定不予枪决了。

一周后，驻扎南昌的共产党司令员贺龙和叶挺领导了南昌起义。朱德闻讯率众响应。在他部下最活跃的军官里有个连长林彪，后来成了红军的一个司令员。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一团人马南进开始了他同反革命的长期斗争。如今他们终于在末

阳与矿工游击队联合起来。

这就是矿工游击队从新战友，朱德手下的革命军人那里听来的关于朱德的一些故事。

在耒阳期间矿工游击队经过改编，正式成立为红军第一旅，原来的组织机构已不复存在了。宋铁匠当选为旅长。他不需要被人三请诸葛，他根本没有那工夫，也没有为了谦让而谢绝的意图。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洒热血、抛头颅，鲜血染遍了湖南和江西的大小山岭。最后宋铁匠总算在江西建立起第一个坐落在江西西部井冈山红军兵工厂。为了筹建这座工厂，宋从红军中抽调了来自原广州的二十名军火工人和将近一百名干过冶金、修补、制造枪炮的其他产业工人。

目前，宋已是矿工旅旅长，这位身材魁伟的宋旅长率领六千名红军战士浩浩荡荡地开往东部山区。

就这样创立了中国红军的一个支队。这个支队后来发展壮大成为拥有十五万之众的武装部队。

十三、“蚊子”小报的 游击战

“什么时候蚊子不成其为蚊子了？”刁钻的老青蛙问道。蝌蚪无言以对，因为他太年轻，对上海了解不多。“当它是一张报纸时，”那青蛙得意地笑着说——蝌蚪看上去有点泄气。

但也不是真的这样令人泄气。事情是这样的：

南京政府断言它象教皇或墨索里尼一样，掌握真理，全部真理，它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上帝保佑，它就向整个中国新闻界发布这种使人喘不过气来的真理。南京政府还进一步通知新闻界今后所有新闻都要经由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机构——当然仅次于南京政府——审查，并且要以各种形式向它报告编辑方针，凡不发表颂扬政府文章的编辑都将被扣上反革命、反动派、匪帮或共产党的帽子并将受到应有的查

处。

一个德国人有次对我说：“啊，中国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对砍头也不在乎——他们已司空见惯了。”但报纸编辑却不想给人砍掉脑袋，所以恭顺从命并且高喊：“万福，全能的上帝！”

这时正好蚊子进来了。因为蚊子不相信上帝，有的甚至也不相信蒋介石这位所有小军阀的大统领。有了这点例外，因此，当政府对中文报纸施加高压手段时，仅上海一地就有上百份非法小报诞生了；人们管它们叫做“蚊子”小报。

其实这也不是很新奇的事，因为在世界各国这类报纸都是同专制政权共生共灭。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占领上海和其他城市之前，中国就有许多这类报纸了；它们发表了暴露旧封建统治者内心思想的文章。此后自由了一段时间；但现在，这些蚊子又多起来了。这种只有四页的小报，就象外滩上的苦力那样生存毫无保障，以大地为床，蓝天为顶；就象中国古诗上所说的，战乱连绵，无一幸免。

有的报纸只存在几天，有的一周，再长点的几个月。这要取决于它们发表的内容以及应变的能力——变幻莫测则生，抱残守缺则亡。国际租界和法租界据说是“蚊子”小报的老窝，但确切情况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它们有许多不同的名称，用以躲过中国和外国警察的耳目。

中国政府非常聪明，它知道外国警察信奉为了镇压而镇压那一套，一旦没有什么可镇压时就会情绪低落。因此政府就把矛头指向一些冒犯成性的蚊子小报让他们去“镇压”。警察也就一个劲地盯着这些蚊子们。有时警察发现这些小报没有固定

地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大声吆喝着把街上行人包围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搜查。有时他们找到了地址，并以法律的名义庄严地把一两张白纸或者一把旧椅子给抄走。然后他们对新闻界发表长篇声明，说他们已经查抄到大量有高度破坏性的材料，因此，有必要制订新的条例以对付共产党和其他“匪帮”分子。

有一次，他们查抄了里面有把椅子的一个房间后——有人对我这样说——谣言在上海传开了，说查获的文件证明共产党阴谋要建立一个新政府，而我这个写煽动性文章的作家就是被派来为新政权作宣传的。这个新政权的成员据说是由同上海警方和其他秘密组织敌对的人组成。有一个研究劳工问题的被认为是个行迹可疑分子；另一个可疑分子是一份亲华的上海杂志的主编；当然，所有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都受到了怀疑。我们都对安排的工作不满。我至少想要当个国王。

蚊子小报经常受到攻击，但新的揭露仍层出不穷。虽然受到攻击，蚊子小报还是不断出现，因为谁也抓不住它们，或者改头换面继续出版，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一段时间曾发行一份反蒋介石的日报，其出版地点竟写的是蒋介石在上海的官邸。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办法呢？

蚊子小报不断受到打击，但这里给打下去了，在另外地方又东山再起。从警察的角度看，这是令人很泄气的事。警察抓不到编辑，有时就逮住报童大加搜查，看是否带有蚊子小报或其他危险武器。报童常常带有蚊子小报，但有时没有。如果发现报童带有蚊子小报，他就得被罚款或送去坐牢。在法庭上，报童们会说有人塞给他们一捆报纸，说卖掉的钱可以自己留

着。并不是所有人对上海的下层都这样慷慨大方的。

如果你脸上带着急切的神情，问卖报的人有没有蚊子小报，你可以从中得到一次有意思的社会调查。如果那报童用目光迅速地打量了你一眼，然后两眼盯着前面，从嘴角边吐出一个“没”字，你就知道他有这种报纸，但你身后站着一个人。转身仔细一看你会看到一个穿着黑长衫的人，如果晚上在昏黑的小巷子里碰见，甚至你会视而不见。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人把那特务引诱去抽一泡鸦片，然后回到报童那里再问他一遍，就能买到这种违禁的小报了。至于价钱——愿付多少算多少，钱全都归那报童。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报童开始时才从嘴角边说出个“没”字。

有些人说，但可能也是谎言，这种蚊子报的销路不是几十份，而是成千上万份。这很难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只有蚊子报的价格是有据可查的，每份两三个铜板，大的日报每份价格要高四五倍。大多数人一两个铜板是花得起的，但多数人舍不得花十五或二十个铜板去买张报看看达官显要举行宴会的消息或官方新闻社登的那套货色。

甚至从南京来的官员也给服务员一个角子要替他去买几份蚊子小报来看看。官员也象其他人一样想要看到真实的新闻。你走进中文报纸的编辑部、新闻社，或者清晨坐着电车、公共汽车和人力车去上班的人都在看小报。只有外国人看不到这种热门的新闻。他们两眼直愣愣地往外看，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他们不懂中文并以此引以自豪。有些外国人说学中文会使他们的脑力减弱——在上海的大多数外国人当然不会去冒这种险。

大报纸和通讯社不敢发表真相——但是他们如果能弄到真

实的新闻也想看，而且这类小报上的新闻真令人吃惊。在中国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仍然是一种政治武器。所以在小报上你可以读到谁同谁相好了等等桃色新闻，往往还加上几段风流韵事；从中你还可以知道当人民正在挨饿时，这个共和国的阔太太们在穿着打扮上花了多少钱；一方面，几百万人在饥荒中饿死，另一方面，南京市长在招待会上花了成千上万的钱。这种小报还刊登一些艳情秘史，着意渲染。典型的故事是说有个高官的太太在结婚前原来是某某高官的相好。当她还从前的那个情夫来拜访她和她丈夫时，她用英语同他交谈，这样可以避开耳目，因为那位丈夫不懂英语。这种笑话总是能引起读者捧腹大笑。笑和沉默都标明了一种风向。

这可能是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到上海旅馆里过夜或度周末时要用假名的原因。稍不留神，说不定他们一觉醒来就会在小报上发现他们的照片和最新的桃色新闻。有次我问一个中国的编辑，他是否在小报上受到过攻击；他笑着回答说，被抓住过一次——那个女士是一个美国人。有次我同一个朋友去听戏——第二天小报上说人们纳闷为什么那个男的妻子不在场。他们就在这点上大做文章——最后说那位夫人来晚了，但是同另一个男人来的！

有许多小报只是制造谣言。消息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也是个谜。但中国还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新闻可以用流言蜚语的形式不翼而飞；有从旅馆服务员、仆人、职员口里传出来的；有从那人来人往，无所不知的茶馆里传出来的；有来自那些纯粹为了好奇而不辞辛劳去挖掘新闻的人。

也有许多严肃的政治性报纸。上海有份小报，据说每日的

发行量是三万份，至少是那么传说的。前蚊子小报《上海报》或《上海时报》，是一张共产党报纸，经常受到压制并被取缔了一个时期。去年夏天的那篇文章使得英国警察十分恼火，文章谈到汉口的鸦片商同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间的一桩交易。这条新闻不仅来自共产党，也出自其他一些来源。《上海报》给封闭了。紧接着出现了一张同名小报——但这是非常亲蒋的。其他共产党报纸也跟着出现了，如果遭到封闭，又以其他名称出现。最后，又有一张以《上海报》为名称的小报出现了。如果你说要想买一份《上海报》，往往会递给你一份官方的，受人尊敬的报纸，但在许多地方也会给你一份真正的《上海报》。

这类共产主义报纸会使具有国际观点的人非常感兴趣。它们公开讨论取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要求撤走外国军队，揭露贪官污吏，严刑拷打政治犯，秘密杀害被捕的共产党人，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勾结等等新闻。它们猛烈抨击南京政府的每条法令，每个任命，分析揭露其来源和意图。

这些报纸指出孙中山的隆重葬礼只不过是自古以来的专制者蒙蔽人民的一种虚伪手段。正值遍地饥荒之年，政府却花几百万元钱用于葬礼，其目的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悼念孙中山，而是为了提高政府自己的声誉，同时还可以打着孙中山的旗号继续搞白色恐怖。前驻华盛顿公使施肇基在上海发表演讲赞扬美国，接着就被共产党报纸称之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家。至于吴国桢后来得到的名声则更难听了。所谓取消治外法权的训令也受到猛烈的攻击。指出南京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面前的应声虫而已。所谓的权利法案是个极大的嘲讽，同时公布了成

千上万的革命农民、工人和学生被杀害的数字。

小报真正反映了中国公众舆论的呼声。大的商业报纸，主要是上海的《申报》和《新晚报》，在全国的发行量都在十万份左右。但它们通常都是报道商业新闻，实际上根本不刊登劳工和社会问题，也不刊登任何反对南京政府的批评性文章。毕竟那是它们的政府。

但是蚊子小报是群众的报纸。这就是一些高级官员自己也办小报的原因——也说明共产党的《上海报》被查封后，他们就办了一张支持蒋介石的《上海报》的原因。查封和创办报纸都不发表文字声明——在中国不采取这种做法。但是报纸的政策可以清楚地表明是属于谁家的。

官办的小报上，总有一些很典型的反对孙中山夫人的文章。孙夫人作为一位反对南京政府的革命者而深受人们的爱戴。但这类文章都说她要在杭州的避暑胜地购买别墅，还要购买新汽车，但她家里的人想法劝阻她不要再买了，因为家里的汽车已经够多的了。不仅这类小报，连官方和商业性报纸也对孙夫人在国内的活动发表一些故意歪曲事实的文章——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她是一位富有的、爱享受的人，同中国的其他“体面人物”一模一样。还有许多关于她的私生活的新闻，官方并暗示她第二次流亡欧洲主要是为了去同一个情人相会！同西方上层社会一样，在中国官僚们的想象中女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从两性关系的动机出发；或者更可能的是，他们散布这些新闻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仍然存在着的封建偏见。

当然，还有几十家小报主要是报道下层社会的。有些文章是吹捧某些歌星和妓女的，还登有她们的照片、名字、地址、

价格和身世，甚至吹捧她们过去是某某高级将领的情妇等等艳情秘史。这类报纸上的广告多半是登治疗花柳病和治疗阳痿的春药。

另些小报只登点社会小道新闻和发生在戏院里的新鲜事，文章大多庸俗无聊，低级趣味。这种小报加上那些大谈妓女的那种小报，对贫穷、无知和迷信的中国人民无异是精神鸦片。对此，无论是外国和中国的当局都不采取措施加以反对。因为它们有“新闻自由”、“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等等。

但是对革命的小小游击战士，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而战斗的报纸，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个人自由”，也没有“财产权”了。这表明了自古以来的一条准则，即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十四、贵初的故事

当我给一位在北平的教授朋友讲完贵初的故事后，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这个故事平淡无奇。

“这是当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他说。“是爱情毁了贵初。对他来说，个人的感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如此！知识分子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革命无非是一种感情冲动，而不象劳动群众那样把革命看成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贵初不自杀——但他甚至就连自杀的勇气也没有。”

的确，他说得对。我想起了发生在满洲和华北的一些自杀事件。青年男女宁可自杀也不愿放弃他们的爱情。在沈阳，有一天，一个姑娘为了反抗父母强迫

她与一个陌生的男人结婚，宁可投河自尽了。一周以后，在北平有一位男学生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每天都有青年男女为了爱情上的挫折而自杀的。他们太软弱了，不可能向旧的封建家庭进行公开挑战，他们又太糊涂了，不可能冲破令人窒息的家庭束缚并向它展开斗争。于是他们只能以死亡去结束他们的痛苦。

贵初与他们不同之处是他没有自杀，他只是在精神上垮了。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贵初十八岁那年，他父亲替他物色了一个农村姑娘。贵初生在河南，从小受教于私塾老师和一个旧式的小镇学校。违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对于他和为他选定的配偶莲香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

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两人都认为，女人结婚后，住在男方家，象奴隶般地服侍公婆，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运气好有人来帮她干点活，那不过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应该做的事。

就在贵初和莲香结婚后的第三个月，贵初的父亲就送贵初去东京学习了。父亲认为，商业教育将促使他的儿子成为一名比他自己更发达，更能干的商人。虽然他生就一只大鼻子，人人都说男人有这样的鼻子会发大财，而他的岳父母主要也是看中这个鼻子，在他还谈不上有钱的时候，就选他当女婿。但是，即使过了二十年后，他只不过在村里自家门前开了一个小铺，另外，在镇上的一个店铺里有点股权。他常常来往于城镇，使他产生了一些宏大的理想。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受过新式教育后能成为一个聪明机智的商人并在镇上开起自己的店铺。他自己也渴望买一个歌女当小老婆。一旦他有钱，他还可以买好几个小老婆，而且个个都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所以他决计要送贵

初到东京去，以便实现这些宏大的目标。

但是，贵初却更象他那娇小温柔的母亲，对学习商业毫无兴趣。他心情沉重地来到了东京。此时此刻，小莲香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了。自结婚以来，她就在这个家里承担起了儿媳的角色，这份苦役，过去她连做梦也想不到会这样繁重。

她天天忍气吞声，不但要忍受来自婶婶、奶奶、爷爷等老一辈的百般挑剔、抱怨和谩骂，还要设法满足年幼孩子们的要求。公婆都是老派人物，样样都要她侍候。甚至他们吃饭时，她都不能坐下，得站着等他们吃完。有时贵初的父亲在镇上和他的狐朋狗友寻欢作乐晚归时，小莲香还得起床为他准备夜宵，并默默地站在一旁侍候他吃夜宵。每当夜深人静，她常常偎依在贵初的身边，泪如泉涌，苦不堪言。于是有一天，贵初觉得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他到店里去找父亲。老头子正往盒子里装糕点。他把小的和陈旧变质的糕点装在底层，然后再在上面盖上又大又圆又新鲜的糕点。农民都是些老实巴脚的人，只有拿回家后才发现其中的奥秘。那老头听到儿子要同他谈话，就暂时放下手头那桩崇高的事业。贵初恭敬地开了腔。他说莲香由于操劳过度，吃不饱饭，加上天天受气，如今人变瘦了，还得了病。他提出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他的父亲二话没说，转身愤然离开店铺。心想他的儿子竟然为自己的老婆求情，真叫他感到恶心。

凡此种种都使贵初无法在东京安心学业。他的妻子有一次给他写了一封字体歪歪扭扭的信。有时她就偷偷溜出去，付上几个铜板，找一位专门写信的人替她写信。读着这些来信，贵初的眼前便出现了她那屈辱的生活场景，内心痛苦不堪。因为

他对她一往情深。终于有一天，他给父亲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抗议信。但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收到过妻子的来信。他父亲寄来一封简短的回信，说他企图教训亲生父母应当感到羞耻。

贵初从其他同学那儿得到安慰，但却发现他们有着比自己更大的苦衷。他有一个姓李的同屋，也是河南人。尽管只有二十四岁，却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李的妻子是一个愚昧无知，裹着小脚的女人，没有意志，没有思想，也毫无雄心壮志。她就象一头愚蠢的动物，对她丈夫的旨意唯命是从。贵初的其他朋友也有类似苦恼：旧式的妻子，毫无思想，只懂得生儿育女，服侍丈夫和公婆。这些朋友花很多时间探讨和学习世界各国的新思想。从他们那里，贵初第一次研究了本国的革命运动。

国内的情况汹涌澎湃，因为当时正是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中国青年的热血染红了战场，但因此也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人民大众。

中国革命在日本工人阶级和革命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日本也出现了“危险思想”。使贵初感到吃惊的是，他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中国革命对这些日本人来说，比对他和国内许多富裕的同胞来说更有意义。

成千上万的工人举着大旗，在东京街头游行。旗帜上写着“中国革命万岁！”“胜利属于中国革命！”“胜利属于世界革命！”贵初看到警察袭击游行的人群，殴打，逮捕，并将他们关进监狱。日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里被捕了——采取三三两两分散逮捕的办法。公共场所常有集会。贵初曾经到过这类地方，就被警察抓住，搜索，并命令他立即离开，否则就要被

捕。他弄不清楚，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离开。

在其他一些集会上，他悄悄地躲过警察的岗哨，去听日本工人、朝鲜人，还有一两个中国同胞们慷慨激昂的发言。有时，日本的发言人似乎对中国的革命羡慕得有点妒忌了。有次，他听到一个演讲人宣称：“我们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然而，那些有着封建土地所有制背景的中国同志都走到我们的前面去啦！我们真惭愧啊！同志们。”

贵初与许多在东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谈过话。富家子弟仇视这些日本工人和革命学生。他们说，这些人全是些危险的共产分子。危险，对谁危险？这种疑问也慢慢地，模糊地渗入到他的脑海。由于缺乏对革命的了解，也没有一种强烈的需要，贵初的思想总是来回动摇不定。

但是，在他见到了住在隔壁的日本小姐以后，所有这些新思想对贵初来说就更无足轻重了，这全是由他刚来东京时买的那把小提琴引起的。尽管他父亲期待着儿子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但贵初对从商没有兴趣。他买了一把小提琴，他感兴趣的是练小提琴而不是学赚钱的正经本事。一天，他听到隔壁屋里有人在拉小提琴。他停下来听个究竟。隔壁那把琴也戛然止住了。仿佛那个演奏者也在侧耳倾听。他又拉起来，那把琴也响起来了。这件事似乎比整个中国革命都更有意思。每天他都盯着隔壁那间屋子。他从姓李的同房那里得知，隔壁那家有一个女学生。

终于有一天，他见到她了！她站在阳台上，离他不远，娇小、苗条的身材，白皙细嫩的皮肤，妩媚的黑眼睛，还有一条粗粗的黑辫子一直垂到她的后腰。从街上吹来微风，桦树迎风

招展，树枝撩起她那长长的和服袖子，酷似鸟儿的翅膀。这是一件衬有鲜红里子的绿色和服。脖子上镶有一小圈鲜红的领子，贵初凝视着她，觉得这是他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形象。

阳台上的小姑娘看到了他那注视的目光，也羞涩地频送秋波，想必她看到了他身上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所以她没有躲开。相反，她比他更大胆也更现代化，她微笑着说：“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贵初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只是呆呆地望着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此后，他总是有办法见到那个姑娘。那些经过精心安排的街上巧遇，或者，他会突然发现她坐在附近公园的一张长椅上。他不再把心思放在学业和中国革命这些事上，而是绞尽脑汁设法如何同她见面。他终于知道她名叫纪子，很快就要高中毕业了。她的父母得知了他们的会面，对这种交往日益不满。因为贵初是一个中国人，而他们这一阶层的日本人把中国人看成是下等民族。但纪子却不这么认为——不，决不这样看，她是个现代女性！

贵初听着她那甜蜜的柔声细语，脑子里除了她以外，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象几乎所有的日本女性一样，文雅温顺，可是她却背着父母和他私下会面。去约会时他就打扮成日本学生模样，因为一个日本姑娘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常会遭到警察的干涉。

起先，贵初没有告诉纪子他已经结过婚。在那些美妙的日子里，他自己也几乎忘却了这一点。但当他发现自己慢慢地爱上了她——这是一种对小莲香从未有过的爱情——他又想起了他的婚姻。显然，纪子也是爱他的，他曾经考验过她：有时他身

着中国装束，和她一起到公园去散步。有一次警察把他们叫住盘问贵初是什么人时，纪子曾愤怒地斥责他。甚至她对过路人投来的反感的目光也毫不介意。

贵初在其他方面也对她进行过考验。他曾带她去参加过日本人的集会，她怀着很浓厚的兴趣听着并赞同那些“危险思想”。无论他到哪里，她总是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去，对所见所闻，全神关注，于是贵初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们俩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有多好。他们应该双双回到正在发生革命的中国去，但他转念想起了莲香在象奴隶般地侍候着他的父母，渴望着他的保护。

有天傍晚，他没有课，便和纪子在公园的一个老地方会面了。当他面对她时，事先下决心要把莲香的事告诉她的那份勇气又消失了。但他终于说出来了。他说完后，两人默默地站了很久，最后，她微微鞠了一躬，没有说一句话，转身离去了。

此后，几个星期过去了，再也没有那些偶然的巧遇了。他夜不能寐，还常常徘徊在他们曾相遇的公园里；他的琴声也引不起隔壁房子里的反应；他犹如生活在一片贫瘠的沙漠上。他自己祖国的那场革命此起彼伏，而他只陷于个人的悲伤、孤独和绝望之中。

后来，命运之神仿佛为他的生活谱写了一出戏剧，从而使他摆脱了这场困境。他父亲打电报来要他回国，说他母亲病了。反正他没有什么个人志向，就遵命回国了。

到家时，竟是他的母亲出来迎接他。从母亲那里他第一次得知，小莲香不仅病倒过，而且已经离开了人世。她是四个月前去世的，如今，她的坟地上已是春草丛生。他没能及时得到妻

子的噩耗，而现在他的父亲是要他回来办第二次婚事的。因为家里需要一个儿媳妇来接替莲香干的活。这对贵初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想到自己和纪子在一起的那几个月里，正是自己瘦弱的妻子在那粗暴野蛮的父亲驱使下折磨至死的时候。

然而贵初毕竟在东京学到点东西。他严肃甚至痛苦地表达了他的新思想，特别是用这些思想去对付自己家里的人时更痛苦。最后，他终于当面痛斥了父亲，说出了任何一个中国当儿子的都不敢对父亲说的话。他似乎陷入了痛苦生活的深渊，而眼前这个人似乎就是罪魁祸首。最后，他厉声喊叫道：“我不会再娶个妻子给你去卖命了！”

话音刚落，他父亲朝他脸上打了一个大嘴巴，随手操起一根木棍朝他头上狠狠打下去。

贵初醒来时，他看到的是母亲那张温柔、伤心和挂满泪痕的脸。从那以后，他躺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健康。在他能够下地走动后，他又正式向父亲提出请求，让他回东京去。父亲的回答是从店铺的架子上取下一个手巾包。打开来，是一小扎信件。看到那娟秀的日文，贵初立刻明白是谁来的信。所有的信都被拆阅过了。贵初知道父亲一定是请城里的朋友帮助读过这些信件了。贵初伸手去抓，但他的父亲转过身去将信扔进了火盆，顺手点燃，然后站在火盆前，直到这些信件连同两个青年人的珍贵秘密一起化为灰烬。贵初眼睁睁地看着，脸色煞白。然后他的父亲告诉他，要末结婚，否则就不准念书了，更休想回东京去。

一个月后，贵初终于想出一个计划并最终去到附近的一个城镇。他去找了他父亲的两位商人朋友。这两个人都知道这个

孩子有点越轨行为，但仍不失为一个诚实的青年。他开口要钱，说是他父亲要钱用，他们就给了他，他写了个字据。当天晚上，他带着这三百元现款，除了随身衣服外没有其他行李，搭上一列火车坐在三等车厢里，就这样踏上了去东京的旅程。

他终于到达日本，但从姓李的同学那里得知，纪子一家已突然搬迁，没有留下新址。她的父母为她安排了一门婚事，但她拒绝结婚，从而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有人告诉姓李的说，这家人搬到八濑老家去了。

当天下午，贵初乘上去八濑的火车，并在那里花了好几天时间寻找纪子，但最终还是失望而归。回到东京后，他又寻找了数周。他先到警察局，然后又到他曾就读过的学校。他只从一个女学生那里得到一个线索。她告诉他说，纪子从姓李的同学那里得知贵初的妻子去世的消息。她便给贵初写了信，当时她的父亲正强迫要她结婚，而贵初却只字不回。最后，她终于卧病不起，被送进了医院。

贵初找到了那所医院，一个护士告诉他纪子的确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星期，主要症状是精神错乱。她痛哭不止，使她的父母和医生都很震惊，但护士却感到很有意思，因为她常常叫着贵初的名字，还夹着一些只有情人之间才说的最亲密的语言，“啊，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啊！”她哭喊着。但那个护士不知道她们的家搬到哪里去了。她让贵初留下跟她聊聊，因为这是探听隐私的好机会。可是贵初在绝望的痛苦中转身离开了。

此后的许多个星期里，贵初仍在寻找纪子。他抱着一线希望，穿街走巷注视着每一个过路的姑娘。全城的人似乎勾结在一起和他作对，一个中国人，竟想找到一个他心爱的日本姑

娘！他常常看见远处有一个娇小的身影，微风撩起了她那长长的和服袖子，贵初就匆匆跑上前去，到跟前一看什么也没有，又不得不绝望地离开。

希望之泉就象春天的雨水渐渐地在他的心中干涸。有一天，他走进一家酒店，喝得酩酊大醉。此后，他喝酒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他盲目、绝望，痛恨自己以及世界上每个人。他常常醉倒在路边，只有当人力车和汽车横冲直撞向他开过来时，才会清醒。他成天喝得烂醉如泥，蓬头垢面，钱象流水一样花掉。对于他——一个被称为下等民族的青年人来说，什么是人生的目标，全是废话。只有那消失了的纪子才是他的生活目标。

贵初成了一个丢人现眼的酒鬼。每当他清醒时，他的朋友便对他提出劝告。有些人为了他这种毫无理智的爱情感到羞耻，而且爱的还是一个日本姑娘，谁都知道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有的就向他讲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反革命已经开始的情况。在这革命者天天遭到屠杀的时候，难道他不应该结束这种个人问题上的荒唐行径吗？难道他不应该去参加日本工人和学生召开的群众大会，向白色恐怖提出抗议吗？

贵初听着这些朋友的劝告，一言不发。在他那混混沌沌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丝自豪感：自己竟成了同胞和朋友中间的新闻人物！他们都在谈论自己！他的思想和行为一向没有准则，现在，则完全任凭自己的个人感情所支配——直至被毁灭。有一次姓李的同学和另外两个朋友带他到郊外去划船并乘机再次向他提出忠告。他突然从船上站起，二话没说，一头扎进水里。他的一个朋友也随着跳进水中救他。但他挣扎着要去死，直到有人用划桨把他打昏过去，才将他活着拖上岸来。

此后不久，日本军队进入了山东并轰炸了济南府。贵初听到这消息时，神志清醒，他听着朋友们在商谈举行集会提出抗议的事。贵初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正是他们夺走了他的纪子。现在，又是这帮日本人，竟去轰炸中国的一座城市！一种比对纪子的爱情更强烈的感情占据了他。从此以后，他再也不酗酒了，就象一个生了一场大病后忽然痊愈的人一样。

举行群众大会的时候，贵初正在人群中间。大厅四周，甚至主席台上都布满了日本警察。然而，演讲人一个接着一个，先是一个中国人，他把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组织起来，结成了“大联盟”。接着是一个有“危险思想”的日本人发言。然后，当一个朝鲜人发言时，两个日本警察站到他的左右两边，但他仍严肃地对着听众演讲。他很清楚，自己目前的行动和其他发言人一样，在回家途中将遭到盯梢，也许在路上就被打得不省人事，然后被投入监狱。

会议结束了，人群开始散开，这时警察突然袭击会堂。在惨无人道的木棍下，人们向四面八方逃跑，受伤的人躺在街上，鲜血横流。贵初的两个朋友看到他脸颊下面被打开了一个口子，衣服被撕成碎片，挣扎着从人行道上爬起来。两个朋友一面跑一面象拖一袋粮食那样抓住他的两肩，从街旁的树底下一直跑进了一座公园。经过长时间的侦察后，又把他带到一个酒店里去。

“他酗酒了？”酒店老板问。两个朋友点点头，三个人就将他脸上的血洗净，使他恢复了知觉。

以后的一个星期里，这几个朋友劝贵初离开日本。“跟我

一起回国吧，”一个同学催促说。“要在这样的国家学习，我宁可一辈子也不念书。”这样，贵初就和他的朋友一起离开了东京。有一个日本特务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几乎跟踪他们到了北平。

贵初在北平住下，他虽然身体虚弱，文质彬彬，而且有些心灰意懒，但他身上仍然保留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男子汉气概。他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一无所有，他把裤子往下拉长，包住脚，权当袜子；用三块木板钉在一起，铺上一床棉被便成了他的床；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他的同学们也和他一样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几乎不知“享乐”为何物，而有钱乘车，简直就是奢侈。具有“危险思想”的书和杂志在他们之间不断流传。现在他们对这类思想的追求已不是为了猎奇或为满足一时的好奇心，而是出于一种迫切的需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如果被发现，他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贵初常和他的朋友们谈心。他们之中许多人是性格坚强，头脑清醒的人，知道自己所要走的路。然而贵初却不知道自己应走的路。他探着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倾诉着压在他这个年轻人身上的苦衷。

他说：“有时我睡不着觉，我的路太窄，太闭塞了。我看不到出路。我想学习，但没有钱。我什么也干不了。况且，成千上万经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都没有工作……如果我听父亲的话，答应同他为我选择的姑娘结婚，就会得到他的帮助，但我为什么要服从他的意志？我恨这个称做我父亲的人……我们的家庭，就象一个沉重的包袱，把我们青年人压到海底。很多我

认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给毁掉的。你们会说我们活该，为什么不起来造反……但在我们家乡，村里人就连什么是造反都不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

“那就同我们一起打碎这个制度！”有人气愤地打断他的话。

贵初仔细打量着他那双女孩子般纤细的手，似乎在研究它们究竟能干点什么。

“怎么办呢？”他茫然地问道。“我看不到出路。我的路已被堵死了。现在我的脑子也不好使……我的记性也差了……过去的事情对我打击太大，简直要使我发疯，而现在我又看不到出路。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永远也不要再结婚……我必须想些办法只为中国而工作。”

“为中国，为中国！”有人插话道，“你指的是哪个中国？群众还是统治者？人民还是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你仍然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知识分子——不可救药！不可救药！我们的道路很清楚，非常清楚！因为只有一条路。你知道那是什么路——你知道我们不敢把那几个字说出来。还有其他什么道路？你已经走过另一条路——一条陷入了自己感情的歧途。为什么还要继续走下去呢？”

贵初没精打彩地答道：“是的，你是对的，你总是对的，但是——”他的话音断了。他的朋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让他沉浸在他自身的空虚之中。

有时，日本妇女在街上走过，贵初总是紧紧地盯着她们，仿佛仍在寻找着什么。当一个日本姑娘走过时，贵初的一个朋友对他说：“她很美。”贵初似乎从一个坚定的信念中汲取了

力量，回答道：“不！她不美——那是没有生气的美！她的和服也不美。她们有时在里面穿着绿色的和服——袖子是红色的，领口上有一块红色的点缀物。袖子被风撩起来，就象鸟儿的翅膀一样。”

十五、“不贪财，不怕死”

三个衣衫褴褛的人坐在火车的三等车厢里说着话。一个是瞎子，穿着一身破旧军装。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出这三个人都是当兵的。其中两个是逃兵。

其中一个打断了那个说话的人，笑了起来，但他的同伴们没有笑，因为那是令人痛心的事。那个讲着话的是苏州人，不过他说一直住在天津。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失去了母亲。他的母亲和另外三个孩子在一次饥荒中死去了。他的父亲带着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孩子来到了天津。他年纪很小就开始干活了，到了能够挑担子时，就以卖水为生，每天给三十户人家挑水。干的活很重，挣的钱却只够他和他的老父两人勉强糊口。

多年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但几个月前他遇见了

一个有钱的主顾。这个有钱人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穿着考究的绸子衣服，还有自己专用的人力车。他那个人力车夫跑起来就象马一样快，只要他拉着车在街上跑，所有其他车夫都给他让路。

“这个有钱的阔佬还从妓院里卖了一个名叫小青的姑娘弄回家去，”那个人接着说。“我是个笨蛋，挑了一辈子水也攒不够钱买个姑娘。但那阔佬什么时候想要个姑娘，随时都能买来。这是怎么回事呢？长期以来我搞不清楚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替驻防山东的南京军队第二十一师师长刘臣年（音译）招兵买马的人。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的呢？让我慢慢说来，你们好好听着。

“有一天，这个穿着绸缎衣服的有钱王八蛋问我想不想要一个每月能挣十二块大洋的工作。他说现在造铁路需要劳工。我对他说有这样好的差使当然乐意干，并满口答应第二天就到码头去报到跟他一起出发。于是我扔下挑水的扁担，飞快跑回家去告诉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这时已经九十六岁了，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高兴得哭了起来，说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为晚年的生活发愁了。其实我是个傻瓜！我还以为真的每月可以拿到十二块大洋呢！邻居们都来祝贺，说我交上了好运，我高兴得连嘴巴也合不拢了。

“我立刻动身，跑到那个有钱人指定的码头去报到。我去得很早，只怕去的人一多，这种好差使就没有我的份了。码头上已经有四个人在那里了，当天晚上我们五个人就在码头上过夜。天亮后来的人更多了，一共来了六十八个。我们在那里等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那个阔佬才坐着自己的专用包车来了。他睡在船上的客舱里，我们就睡在露天的甲板上。我们心想这也

满不错了，因为他给了我们工作。

第二天我们在泰县的一个小镇上了岸，然后步行到城郊，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干活了。我们快到一个小山脚时，只见周围有许多兵。当我们走到跟前时，当兵的还立正向我们那个有钱的人敬礼。

“‘招来多少新兵？’”一个军官问道。

“‘六十八名。全归你分配了。’”

“开始我还不明白，听说要我们当兵，把我吓得浑身发抖。大伙都哭了。不，我们不是来当兵的，我们是来造新铁路的。但那个穿着绸子衣服的老乌龟说：‘你们现在就是兵了，闭住你们的臭嘴，否则小心挨揍。’

“有几个就下跪哭着求情，但一名军官过来伸腿就踢，大伙也不敢再恳求了。当兵的用绳子把我们的手捆在一起，两边跟着兵，押送到军营里去。然后发给我们军衣、军帽和草鞋，并告诉我们，等领到军饷后要扣还服装费。我就问每月能发到几块钱，他们说可能有八块。”

“可能！”另外两个恼怒地冷笑了一声。

“接着我又问军装要多少钱，连长说总共是四元八毛。后来另一个当兵的告诉我，这还不是全部，每月的军饷里还要扣除伙食费，这又得花去五块钱。这样从一开始我就开始欠债了。连长说，‘下个月你不用领新军装了，所以用不着发愁。’

“后来我们就给带到操场上去接受训练。一名军官过来问我：‘难道你连向长官敬礼都不会吗？’我回答说：‘不会。你做个示范，我跟着你学。’他举起一只手，我也跟着举起了手。但他伸手给了我一记耳光，对我大声嚷道：‘不是举左手，

你这个王八蛋！’

“每天早晨天空里还亮着星星，我们就起床开始操练了，一直练到晚上星星都出来了才结束。每日都有操练，每顿饭后，我还得去厨房帮助洗碗筷。上午我们要到一个大厅里去听所谓的讲课。我们在课堂中学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贪财，不怕死’。

那三个人都低沉地苦笑了一声。其中一个说：“他们开口闭口总是那末一句话，要我们‘不贪财，不怕死！’他们以为这就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也可以使我们家里的人不饿肚皮了。”

第一个讲话的继续说道：“我们操练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累得象死狗一样了，还要上一堂课。军官上起课来滔滔不绝地讲着，似乎永远也讲不完了。最后他又唠唠叨叨地讲什么不贪财，不怕死，还要我们心甘情愿地去为国家战斗。我是苏州，也是天津的一个乡下人，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他们去战斗。那军官是个滑头，他一开口讲话，我就知道一个月十二块大洋的军饷怎么也拿不到手了。我的老父亲快要饿死了。我始终念念不忘那十二块大洋，可能那个有钱的老乌龟把我们每人的十二块钱拿走了，说不定他就是这样富起来的。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

“在军队里我得一天洗两次脸，还要洗耳朵，甚至连脖子根都得洗到。如果我用袖子擦脸，给军官看到就要挨揍。有次我同一个厨子谈话时，曾对他说：“‘我们干吗不逃跑？’我说，‘我不逃离这个地方，家中的老父就要饿死。在这里我怎么也拿不到那十二块大洋了。他们用造铁路的名义把我们骗了

来，但现在连我们穿的衣服，吃的烂面条都得要我们付钱。’

“那厨子说：‘你逃到天边我也不管，但我不跑。我逃出去也是挨饿。我们家太穷了，连他们自己都养不活。你逃跑我什么也不会说，但给他们抓住了，你就得挨揍，甚至要枪毙。你得记住这点。’

“有一晚，我在半夜里起了床，站岗的看到了，我就说要出去上厕所。‘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我说。警卫就厉声喝道：‘去，别废话！’我出去了，但并没有在墙跟前停下来上厕所。这堵墙上雕刻着一条石头大龙，因为这里过去是一个官僚的宫殿。每天我都对着那条龙瞄准——有时还拿它当靶子。这时我急忙爬过了这堵墙，通过军营里的铁丝网，在大豆地里跑呀跑，一直往前跑。

“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连忙卧倒在地，一动也不动。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咳嗽了，真是越想躲避的事情偏偏要发生。你知道当兵的是怎样用吃沙子来止住咳嗽的吗？于是我就从地里抓起一把象沙子一样的东西往嘴里塞。那知土里有草根，草根卡住了我的嗓子眼，结果发出了一阵震天响的咳嗽声。大豆地里的一个人闻声走了过来，带有几分担惊受怕的神色。”

“你是谁？你在这里干什么？干吗躺在我的大豆地里？”他叫喊着。

“我抬头看了看，从黑影子的轮廓看去，似乎不象是个当兵的，可能是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的农民。于是我就站了起来，把事情真相都对他说。他听完我的话就把我带到他家的小土房里去。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就谈起来了。我对他讲了为了十二块大洋和要养活我父亲的事。

他给了我一条旧裤子；一件他自己穿的上衣，我就把那身军装脱下给了他。”

“穿过这片大豆地和麦田”，他说，“你看见过泰县十里以内有人在大路上走吗？没有！四十岁以下的男人统统都给抓去当兵了。现在甚至那些不是很有钱的买卖人也给抓走了。于是我就穿过了大豆地和麦田。”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他还来不及接着往下讲，另个人就讲开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当兵这几年那种苦头。我们不是行军就是打仗，一天也得不到休息。有时同红缨枪队打，有时同一个军阀的部队打，有时去攻打农村。只叫我们去打仗，却从来不发给我们的军饷；还一个劲地唠叨着要我们不贪财，不怕死。

“我们脱下冬天的军服，穿上夏装后，连长就要我们付钱了。一套军装是二块八毛钱，帽子七毛，草鞋五毛。但同样的草鞋，我们到商店里花三毛钱就能买到了。连长从每双草鞋上赚到了两毛钱。他从其他方面贪污到多少我们就知道了。

“我生病了也不让躺在床上好好休息，总会过来一个军官训斥：‘你哪有病，是装的——给我出去！’如果想休息一两天，我得在腿上擦上油，磨得两腿发肿，才能卧床休息。但最后总算爬过一堵墙逃出来了。现在我要到天津去找个工作。”

“可不要再去找造铁路的工作了，”首先讲话的那个笑着提醒了他一句。

那个瞎子急忙插话，该轮到他说。他也在刘臣年的部队

里呆过，也是以“造铁路”的名义并答应每月可发给十二块大洋的谎言给蒙骗来的。他打过许多次小仗，在一次仗中受了伤，双目失明了。此后他就无法当兵了，于是就发给他两块钱，打发他回老家去。但这点钱既不够路费，也不够吃饭，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在阜曲的街头行乞了。

“刘将军却不喜欢看到当兵的到街上去行乞，这有失他的面子，因此他命令把穿军装在街上行乞的都给赶出这个城市。决不能让军队丢脸，他说。但要离开却没有路费。

“我有个戒子，那是在一次打仗时，我从一个小镇的女人手上抢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戒子，当铺付给我三十块大洋。但我走到街上钱就给人抢走了。我就拼命大声喊叫，警察跑过来终于把那小偷抓住了。他们揍了他一通后就放他跑了。接着有个警察过来对我说：

“‘这么一大笔钱，你一个瞎子带在身上可能还会丢失。还是我来替你保管为好。’

“我对他说第二天就要坐船离开了。他说他会把钱给我送到码头上来。我求他把钱还给我，但他只肯给我一块钱。第二天我在码头等了一整天他也没有来。晚上我就睡在那里，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才来，但他只给了我十五块钱。

“‘你留下五块吧！你是个有眼睛的人，我是个瞎子，’我恳求他道。

“‘我活了四十岁了，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公平的事。’他说。‘如果不是我抓住那个小偷，你现在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了。再说，谁知道你这个戒子是从哪里弄来的？你还穿着军装在大街上要饭，那是犯法的，但我没有把你抓起来！’

“这十五块钱归我了，你离开这里吧。”

那第一个讲话的人挖苦地问道：“那个警察是不是也对你说要不贪财，不怕死？他准是这样说了！”

三个人都失声笑了，但那是伤心的苦笑。

十六、一支红军队伍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从上海回到湖南岳州老家过最后一个暑假。他到达岳州几个小时后就被中国红五军给抓住了。他向我谈了这段经过的前前后后。

当他搭乘的轮船到达汉口时，他把书都藏了起来，把那些登有经济和社会性文章的刊物扔在船上。他不是共产党，那些杂志也不是共产党的刊物，但在汉口，军阀即使看到有人读经济方面的文章也会给抓去枪毙。一旦被抓，你如果受到审讯，你宁可承认贩卖鸦片，也不要承认读过共产党人写的或有关共产党的文章。

这个大学生在汉口换船，到了赤里山，船在那里停了几个小时，因为两英里外的岳州枪声迭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他们认为可能是军队发生兵变，或

者新的军阀要来占领这个城市。末了轮船还得开往岳州，一路上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大学生把所有行李都留在船上，把他的几本书藏到一个湖边的草堆里，然后才下船去探听情况。

他在轮船甲板上过了五天，身上又脏又累，活象一个穷苦力，只有他手里的那件长衫还带点斯文气。他走到岳州城门口，遇见一个卖菜的就向他打听情况：

“我想进城去，没事吗？”

“没有问题，你是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吧？”

“不，”大学生吃惊地回答道。“我是从上海来的，刚下轮船。你说我从监狱里逃出来是什么意思？”

“红军占领了这座城市，把所有的犯人都释放了。监狱的大门给砸了个稀巴烂，你应当去看看。真有意思！”

“城里给抢劫一空了吧？”

“抢劫？不！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起初商店都关了门，但现在有些已经又照常营业了。一家有钱人开的珠宝店给捣毁了，但也只是这一家。”

大学生接着用他自己的话往下讲：

“我同那卖菜的说了声再见，就匆忙穿过大街往回家路上走，因为我急于想看到我的老母亲。我见到街上有许多红军士兵。他们都很年轻，穿的军装同政府军的一样，只是左臂上带有一个红袖章。起先他们没有注意我，但后来我穿上了长褂子，几个红军士兵就对我侧目而视，怒形于色。我没料到这件长褂子会使我变成个资产阶级。果真，一名红军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道。

我回答说我刚从轮船上下来。

“喂，伙计，你跟我走！”他说道。

“我不怕，我看到红军还感到高兴呢！但他不了解，只知道我不象工人农民而象个资产阶级。他带我走过几条街，走进一座房子，叫我站在另一个红军的面前，他向那个红军报告：‘连长同志，我抓到一个人。’”

“那军官的外表同其他士兵没有两样，对我说了声‘请坐，’我连忙回答‘谢谢，你先请坐，’我们两人就面对面地坐下了。

“‘你是干什么的？’他开始问我。

“‘我是上海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刚下轮船。’他要我拿出证明，我就给他看了看我们大学的校徽。

“‘你是知识分子阶级，’他说。‘当然你对红军的任务很清楚。你对我们抱什么态度？’

“我向他说了我的想法和读到过的材料，并对他说起我在快到汉口时把刊物扔进长江里，把书藏在湖岸边等情况。我说在我的行李里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可以拿来证明我也是革命的并要求让我回去拿。他说‘好吧！’就拿出一个小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下几行字：

“该学生刚从上海回来，同情我们的工作。请予放行。此通行证有效时间为三十分钟。红五军连长（签字）七月四日下午一点半。

“我急速赶到江边，拿出存放在我朋友处的行李，在湖边草丛中找到我的书，毫无惧色地回到城里。我的朋友陪我同行。我们东张西望，看到街上挤满了小商贩，工人和穷人。他

们不害怕红军。我们沿街走着，一名红军军官过来对我们说：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军队吗？”他问道。

“知道，”我们回答说，“你们是红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

“‘资产阶级把我们叫作共匪——赤匪——你们知道吗？’

“他说话时，目光盯着我们的脸，但我们笑着回答：‘是的，我们都听说过。’我向他出示通行证。他看着笑了，然后同我们一起朝街那头走去。一名红军听到了我们在谈话，也凑过身来听。

这个红军后来宣称：

“‘同志，我看他不是个好人；他穿的是一件长褂子。他不会懂得你说的这些道理。’

“那军官看了看我的脸，什么也没有说。显然那士兵的话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我问了他的名字，也介绍了我自己的名字以及我在上海学习的情况。我把几本书递给他看，以便证明我说的是真话。他翻阅了几页，那士兵也伸过头来看个究竟。另外一些红军也凑上前来，互相传递着看我那几本书。

“‘跟我们谈谈上海当前的形势’，那军官终于说道。

“‘我们的生活很紧张，老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没完没了地打仗。我们看不到报纸。’

“红军士兵都围拢过来了，不一会儿我们就在大街上开起一次小型的群众集会。我把所知道的有关党在上海的工作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上海有相当大的支持红军的运动，但力量还不够强大，因为白色恐怖太严重。我告诉他们在过去两年里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加入左联，他们已组织起来并出版了许多刊物和

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

“跟我们多谈点有关左翼作家联盟的事——你是联盟的成员吗？”有人问道。

“我就把左联及其成员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还同他们谈了社会革命的新工作纲领。”

“‘你知道上海报（一张非法的共产党日报）的情况吗？’那军官问我。

“‘被停刊了，但现在又出了一份《红旗》。’

“他们问我许多有关工人的事情，但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对工厂的情况了解很少。然后那军官同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走过县法院，门前有红军守卫着，看到空空荡荡的监狱，那里的门窗确实给砸得粉碎了。那军官告诉我他们释放了许多共产党犯人，这些人几个月来都带着手铐脚镣，有的在病中和严刑拷打下给折磨死了，这是释放出来的犯人说的。那些释放出来的人看到红军高兴得象孩子般地哭了。其余犯人也给释放了，因为几乎所有被押的都是穷苦人，只不过为了吃饱肚子犯了点偷偷摸摸的小过错。

“‘我的通行证期限早过了，’我对那军官说，‘我可能会遇到麻烦。’他把通行证的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但这已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已经到达司令部。

“红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小学校里。那个‘连长同志’把我引见给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是办公室的一个负责人。他没有穿军装。听了连长的报告后，他好奇地看了看我，然后说道：

“‘你能上大学，至少是个小资产阶级啰。我也是小资产

阶级出身，所以我知道。’

“‘是的’，我承认，‘我是个小资产阶级。’

“我们的谈话更深入了一步。他说我们这个阶级的经济背景同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阶级最多是同情无产阶级而已。

“他说：‘当前这场革命的目的是要把工人和农民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要做到这点，我们首先要推翻南京政府。我们新到这个城市，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把隐藏在这里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和反动派清查出来，你愿意帮忙吗？’

“‘当然愿意，’我说。

“五点钟我离开司令部赶回家去探望我的母亲。这时我才有时间定下心来看看四周围的新气象。城里各处的房门和墙上都用白灰刷着标语口号：‘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买卖穷人的贩子！’‘穷人决不打穷人！’‘保卫工农苏维埃军队！’‘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湘鄂西苏区！’

“只见到处都有这类口号，我就问起一位军官。他告诉我红军下属有一支宣传队，每攻克一个城市，两小时之内必须在城内各处刷上标语口号。

“我回到家见到了亲爱的老母亲。她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了，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今天上午红军在四处开群众大会，’她兴奋地对我说，‘红军向我们宣布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帮助穷人，解放工人和农民，所有农民都分到了田地。不过他们两天内就离开这里了！’我听了十分惊讶，因为我的老母亲上街去参加过群众大会了！

“两天以后红军走了，因为没有多少枪支弹药可以对付前来进攻的白军。他们在岳州时烧掉了两所房子：县政府和税务局，里面的田地契约全给烧光了。俞承清珠宝店是唯一被烧的商店，因为红军要它为革命捐款时，它闭门拒绝。士兵们就把门砸开了并说：‘你不为革命作贡献，我们就强迫要你干！’

“他们对街上的穷苦人说：‘来，大伙到这家有钱人家的商店里去，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这是你们唯一的发财机会，等到我们下次再来之前这段时间里就够你们用的了。’穷人们蜂拥而上，将商店劫洗一空，分个精光。红军士兵守卫在门口，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拿，如果他们去偷去抢就要受到严厉惩罚。

“红军在我们城里的两天里，他们命令要各大粮店把粮价贴在店门上。布告上写着：

中国红五军政治局司令部命令：红军的任务是把群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帮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现在粮食和布匹的价格很高，群众只能忍饥挨饿。特此规定粮、布的价格，希严格执行，违者必究。凡屯积居奇或不按规定，高价出售者立即枪决。

“下面是群众日常所需五种主要商品的价格表：大米、小米、盐、猪油、煤油。大米每担二元；这之前一直卖到八到十元一担。

“街上的行人喜形于色，所到之处我都听到这样的话：‘我打从心底里说，红军真正好。不过他们只呆两天！为什么要走呢？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得吃了，但他们一走，我们就吃不成了！一切都会照旧！’

“街上人山人海，谁也不怕会象政府军来时被抓去当兵。

谁参加了红军就付给一个月的军饷，为他们工作，每天付一块钱。红军不住在老百姓家里，拿走粮食从来不会不给钱。

“在街上我遇见一个从乡下来岳州卖木材的老农。他告诉我红军在他们村里的情况。他们村里有个有钱的懒汉，但他对穷人还不错。红军进村后，这个人被关进了监狱。他的老婆和亲戚到红军司令部请求释放他。红军军官说，如果你们村里有八十个农民出来证明你们说的是真话，并担保他以后也表现良好，就可以释放他。过了一会，真的来了八十个农民，他们证实这个人虽然有钱，也游手好闲，但同其他有钱人还不一样。他经常分粮分钱给穷人，逢到年景不好时也不向他们逼租逼债。红军释放了那个人，并说：‘你的命运决定于穷苦农民对你的评价。’那个人听着感到惊愕，那些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穷苦农民竟有权可以把他释放出来。他双手插着腰站在那里，觉得奇怪地笑着。

“面对武装精良的白军，红军从岳州撤退了，接着就开始了白色恐怖。监狱的门重新修复，里面又关满了穷人。许多人跟红军走了，但留在当地的还是多数。所有的工人农民都受到怀疑，因为他们不反对共产党。军阀们每天用皮鞭抽打在街上抓到的农民和苦力，每天都有嫌疑犯被砍头。商人又重新提价，又是那些有钱的人才能吃饱穿暖。

“红军是走了。但八月底我乘船离开岳州时，城里的墙上仍然刷着他们的标语。白军懒得去刷洗。从湖那头，我从老远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条标语：建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十七、在广东农民之中

早晨不到六点，在广州的一条运河边，我遇到一位年轻官员，并一起上了条小船。这条船顺着运河，驶进珠江，把我们送到一艘奇形怪状的大轮船边。这是权势很大的广州丝绸公会的财产。这艘船是开往东南方向的丝绸中心之一顺德地区的。这艘船和其它三条类似的轮船一起将随着一条拖船穿过三角洲地区纵横交错的河流和运河网驶向目的地。

轮船上装有钢板。船上的一些士兵配备有步枪、机关枪，还有一门大炮。上这条船的人必须持有丝绸商、军阀、银行家、政府官员或其它一些统治广州的反革命显赫人物开的介绍信。

船上所装的货物除了一小袋一小袋的银元外，还有大包大包从江东和江北地区运来的黄色和白色蚕

茧。旅客当中有放债人、丝绸商、掮客、代理商和几个政府官员。有些其胖无比，圆脸上堆满横肉；有些则是典型的鸦片鬼，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手上留着兽爪一样的长指甲。和我一起的那位年轻官员是一位典型的，从美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中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他钦佩这些人及其生财之道，并且愿意继续做使这些人在广东省称王称霸的腐朽官僚机器中的一个零件。

我特别观察了一位身宽体胖的商人。就餐时，他脱掉衬衫，坐到桌前，光着膀子，袒着大汗淋漓的肚皮，成块的肥肉罩在裤腰带上，乍看起来，就象一个大肉葫芦。他边吃边把啃剩下的鸡骨头胡乱地扔在脚边的地板上；地板上被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旅客们弄得油迹斑斑。酒足饭饱之后，他满意地喘了口气，接着一连打了好几个嗝，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到洗脸盆前。一个清瘦英俊的年轻侍者正在往盆里倒水。这位商人洗脸时喷出类似犀牛的声音，然后便心满意足地用手巾把脸擦干。侍者把脏水倒掉，换进清水，招呼下一个人。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擦过脸后各自懒洋洋地回到自己的长椅上，安安稳稳地睡起觉来。

我是船上唯一的妇女而且是唯一的外国人，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洗脸、洗耳朵、洗脖子。于是，我斜躺在长椅上装睡，但侍者可不管这些。他先是喊了一声，见我没反应，就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手臂，告诉我应该去洗脸了。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弓着身子开始洗脸，男人们都看着我，打量着我的腿和腰身，而且交头接耳地在议论。

这些先生们——我们不妨这么称呼他们，一觉醒来，就开

始谈论起市场物价，贷款利息，香港投机买卖和强盗土匪。谈话的主题总是和强盗土匪有关，因为在产丝地区，这类人很多。原来，船上配备的钢装甲板、士兵、机关枪和那门大炮都是用于对付这些强盗的。

“土匪都是些什么人？”我问那位年轻官员。

“农民、流浪汉、失业者和其他一些有不良倾向的人。”他说。

“你认为农民和失业者是有不良倾向的人吗？”

“在中国，他们是这样的人。”

“那么，为什么这些辛勤耕种的农民会变成土匪呢？”我接着问他。

他的回答似乎概括了中国的整个现状，在这个国家里，事实真相是赤裸裸毫无掩饰的，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民主”的虚伪性。这是你到处可以看到那赤裸裸、残酷的阶级斗争，它所涉及的不是全民的生死存亡，而是民众中的哪一部分必须灭亡的问题。

年轻官员说：“农民太穷，所以就去当强盗抢粮抢钱。”

“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有不良倾向的人吗？”

“好人是做强盗的。”

“那么，他们该做什么呢？等着饿死吗？”

我们这样来回兜着圈子地一问一答。

“你认为这条船上的都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被饿死，而且就现状来看，以后也不会饿死对吗？”我问。

“反正，我觉得他们是无可指责的——守法，规规矩矩地做生意，并且还给人们提供就业机会。”

“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放债的银行家和商人。请告诉我，他们借钱给农民要索取多少利息？”

“按照中国的惯例，每月3%。”

“这就是说每年36%，有时会更多。你认为这也对农民有好处吗？”

“这只不过是按照惯例行事罢了。况且，如果他们不贷款，农民还什么都得不到呢。”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农民们一年到头受苦受累，是谁抢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谁也没有，是他们自己胡乱花光了。”我的那位高明的朋友回答道。

在随后许多炎热的日子里，我和这位官员总是在天刚破晓时就离开夜里栖身的寺庙，开始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这个镇子到那个镇子，挨家挨户访问。有时我们也乘船，但除此以外在乡村里活动，只能靠两条腿了。天气炎热，暑气逼人，汗水湿透了我们的帽子，头发紧紧地贴在头皮上，衣服就象戴在手上的湿手套一样紧紧地粘在身上。

我们的所见所闻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而当时的情况和所得的结论却又大同小异，因此，我也只能概括地谈谈几个普遍的事例。

据说广东有三百万“丝农”，大多数都住在这个三角洲地区。这里大约有一百万亩桑树种植地，这些种植地通常是一部分用来种桑，一部分用来养鱼。该地区的稻田都改种桑树，农民以捞网打鱼或购买粮食维持生活。但是因为粮食越来越昂贵，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现在都以白薯为生。

大规模的缫丝厂和织绸厂已在该地区的中心建立起来，这些是在南洋发了财的商人兴办的。全省共有一百六十个注册的蒸汽机缫丝厂，其中大多数都在该地区。然而，由于现今腐朽政权的统治，中国的工业已濒于崩溃，因此大多数厂都被迫倒闭。纺织工业几乎完全毁了。

有趣的是，这里也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工业在倒退，而不是在前进。蒸汽或电气缫丝厂和一些纺织厂已经纷纷倒闭，一些小企业主或个体农民又回到了旧式手工织布生产。在原始的利用脚踏纺车进行生产的小型缫丝厂里，可以看到在日趋腐朽的社会制度下所存在的一切肮脏丑恶的东西，这些肮脏与丑恶甚至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都难以见到，它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没落的中国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两年前，在缫丝业中，大约有七万五千名缫丝女工，四千五百名男工，这还不包括脚踏纺车缫丝厂的工人和织绸工人。奇怪的是大多数织绸工人是妇女。在中国许多其它地方，织绸是男人们的职业，而这里却正好相反。现在雇用的工人比以前少得多，因为在目前腐朽的制度下，中国的丝绸工业似乎注定要消亡，而且，织绸工业确实已濒于绝境，生产的生丝也仅仅是为了供给美洲市场。

大多数缫丝厂和织绸厂的工人仍然属于农民阶级，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成千上万的农民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靠着妻子或女儿的这份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妇女在生产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力地冲击了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这从缫丝工人那种单纯、自尊和独立的气氛中也可以看出。

几年前，缫丝工业曾一度呈现兴隆繁荣的景象，即使在工

业凋敝的今天，仍能看出往昔繁荣的痕迹。一年中，大约可以缫丝八九次，有时也可能只有五次。看起来次数倒不少，但农民们说，现在他们从前三次中一文钱也赚不到，况且近年来灾难接踵而至。七年中，一担 $133\frac{1}{3}$ 磅的生丝价钱就从二千四百

港币跌到不足六百港币。过去虽然卖高价的好处总是被广州和香港的投机商获得，但农民总算还能勉强度日。今天，尽管蚕丝商们怨声载道，但从他们的架势看，肯定不愿意赔上血本。

但看看农民，便能一目了然，是谁在承受工业凋敝所带来的负担。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男男女女究竟如何度日的呢？有些女孩子不得不寻找工作，甚至有的卖身为奴，到富人家里去做女佣或当外妾，有的则沦为华南和南洋歌舞厅里的妓女；男的去南洋谋生，然后寄回一星半点可怜的工钱，或者当兵吃粮。在某些地区，数以万计的以蚕丝为业的农民要靠海外亲戚的汇款维持生活。很清楚，这个地区的农民经济，和中国大多数其它地区一样，既不能独立发展也无利可图。

在产丝地区，有一些城镇，如容奇镇、台山镇、惠州镇等。光是容奇镇就有大约十二万五千人口，农田层见叠出。这里，也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城乡之间没有西方那种明显的界限。

容奇镇在兴旺时期，有十二个现代化的蒸汽机缫丝厂，大量的脚踏纺车缫丝厂，一百个收购点，一百四十个蚕茧货楼和四十个织绸厂，其中四家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电气设备；而且还有大规模的桑叶、生丝、蚕茧、蔬菜和生猪市场。此外，还有为那些好逸恶劳的人开设的鸦片烟馆。在这些烟馆里，穷人和

游手好闲之徒只需花几文钱就能抽一次鸦片，然后躺在硬榻上吞云吐雾，进入梦乡，暂时忘掉生活中的辛酸苦辣。这些鸦片烟馆对任何人都开放。政府，军阀和官僚都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容奇镇，和该地区其它城镇一样，也有多种多样的生活。狭窄的街道上铺有石板，纵横交错的运河上有用花岗石建造的石板拱桥。街上是一排排光着膀子，挑着蚕茧担子的农民，他们边挑边哼着，那吃力而富有节拍的哼唷声就是这个市镇的主旋律。

在蚕茧、生丝和桑叶市场上，我们和成群的农民进行了交谈，然后又去访问了他们的家，这些家里几乎没有人类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更谈不到有舒适之感。地面是泥土铺成的，除了几个锡镬炊具外，屋里只有一条板凳和一个木板床。

其中一家只有一个老农和他的老伴，两个人的牙齿几乎都脱光了。老头子的脚象牲口的蹄子一样又黑又硬，可以肯定地说，他至少四分之一世纪没有穿过鞋了。全身上下只穿一条几乎快破成碎片的旧棉布裤。他对自己穷困潦倒的境遇以及空空如也的房子感到十分羞愧，所以当我们问他每个月吃饭花多少钱时，他说了个谎。他思忖了很久，想出了一个觉得应该花的数目之后，才告诉我们。然后，他扭过头去，凝视着远方，坐在他家唯一的长凳上，缩回那双脚，似乎要竭力把贫困隐藏起来。我们不愿意再使他伤心，于是告别了这户人家，继续访问其它的农户。然而，这位老头那种竭力想保持尊严的言谈举止却永久也不能使人忘怀。

我们常常会碰到十来个农民一面卖桑叶一面在聊天。他们

常常会围着我们，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对土地价格、土地所有权、地主制度、高利贷和农民的疾苦了如指掌。如果中国有土地问题专家的话，那么就在这些农民当中而不在政府机构里。这些桑蚕市场上的男男女女是中国最聪明能干的一部分人——有时似乎是群绝顶聪明之辈。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体格都很健壮。就广东人来说，许多人似乎显得格外高大而且强壮有力。他们光着膀子，卷着裤腿，只有少数人光脚上穿着草鞋。他们有帽子的话也都是破旧不堪。几乎每群农民中都会有一些人出来替大家说话，态度既坦率又诚恳。

有时，和我一起的那个年轻官员本能地回避一些他听到的东西，每次都是在我一再催问之后，他才不得不把农民的话讲给我听。原来，这些农民毫不隐讳地告诉我们，在他们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农民当中，大约百分之九十九是佃农；放债人要收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的年利率；没有土地做保的贫苦农民根本借不到钱，即使借到钱则要付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利息；而那些有土地做保的农民也会在这种高利贷盘剥过程中丧失其土地。

在南面，政府称之为“模范区”的中山区也是如此。这里是孙中山的诞生地，那些“模范”条件，如新铺的公路，都是为军阀、商人以及政客的利益而建造的。这些人拥有土地，希望开辟自己的汽车运输路线，勒索高昂的通行税；便于他们把产品运出去。在容奇和惠州以西以北的城镇和乡村，地租都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之间，没有任何地区低于百分之八十的。

我请农民给我讲讲一九二七年以前的革命年代里蓬勃发展的农会的情况。这些农民废除了高利贷和敲诈性的租税，并且通过斗争，成功地创建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使广大农民群众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一九二七年反革命开始后，这些组织被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为农会的斗争中惨遭杀害。农会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还乡团。然而现在，当我们请农民给我们讲这些农会时，他们的反应是令人深思的。开始他们谁也不答话，后来有些人神色不安地面面相觑，但仍然默不作声。

那年轻官员转过身来对我说：“你知道，农会是共产党！这些人和共产党毫无关系——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这些农民饱尝辛酸，对其它一切问题都那么直言不讳，对这件事竟会一无所知！假如果真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回答——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好转到一些他们愿意谈的问题上——谁租给他们土地，在祖传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说不出谁是租给他们土地的主人，因为土地转手很快；新地主从老地主那里买来土地；一般来讲，地主不直接把土地租给农民，而是租给比自己小的地主，这些小地主再把土地转租给更小的佃户。等到这一道道转手的租到了贫苦农民这一层，他们就得承受以上这些中间人的层层剥削。

他们很了解祠堂公田的情况，广东的农民尤其如此。正如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在广东，这种土地也不是归任何小家庭私有，而是由一个大的宗族所有。这种大宗族通常由五十户或更多的人家组成。有的大宗族就是一个村庄，而且都是同一个姓。每个宗族按照古老的传统都要留出一些土地作为公用：一

部分用于宗族内外的慈善事业，一部分用于宗族后代的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于孝宗祭祖和其它一些杂项开支。这最后一部分土地就是所谓“祖坟地”，但在广东，“祖坟地”通常包括以上三方面的用途。

祖坟地的收入本应用作族内的公共福利，然而近几年来，却落进了那些主要经管人，即族长的腰包里。富有的族长总要想方设法插手祖坟地，并且凭借其财富和地位，最后，达到完全占有这些土地的目的。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反革命卷土重来后，这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和族长就成了本地的政府官员和收地租者。他们把祖坟地的收入据为己有，只可怜那些穷苦的本族成员对他们“富有”的亲族连吭都不敢吭一声。

另外，还有属于国家所有的公有土地。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些官僚和军阀开始侵占这些土地，并为自己定了每英亩或每亩一角到二角伍分的购买价格，然后以他们的妻子、儿子或家庭其它成员的名义把土地登记入册。中国资本家的公司也干这种勾当。他们也按照几分钱一亩的价格，买下大片土地，并企图把帝国主义政府统治下的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种植园制度搬到广东。新兴的中国资本家似乎专门看中了这个世界上野蛮、最惨无人道的制度，并力图把它们引进中国。但由于某种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和农民们都不清楚，这些种植园都以失败而告终。

不管这些农民的话题是什么，最后总会转到他们无法忍受的境况上去。他们没完没了的抱怨租税高，不景气的收成，还有高利贷放债人。他们付的租税是惊人的，每亩地要付三十至四十元，在容奇和惠州的西部、南部和北部，每亩要付

十五到三十五元，现在，由于土地贫瘠，虫害蔓延，毁坏蚕茧，普遍收成很差。即使这样，仍然必须交租税。农民或者交租，否则就得退还租地，别无其它选择。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避免向高利贷放债人借钱：先典当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或衣物。但最后，他们还是逃不脱借债的陷阱。

非常贫困的农民则借债无门。为了交租还债，他们只能把女儿卖给放债人、地主、商人或官员。儿子一般不卖，因为他们被看成是一笔财产；在一些有可能在工厂或纺织厂找到工作的地区，女儿也不出卖。几年前，男的到南洋谋生以助家庭生计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条路也几乎断了，南洋的帝国主义统治者近年来一直在把成千上万的这类人赶回中国。

在广东的每一个村庄里，人们可以看到两三个或更多个高墙方屋顶的当铺，四周则都是穷苦人的简陋棚屋。当铺也是放债人，并和地主、官僚以及经营蚕茧和桑叶的商人都是串通一气的。现在，随着经营洋油或化肥等商品的商人的出现，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吸血鬼。象外国化肥这样的商品只是统治阶层进行剥削的一种武器，商业资本家把化肥卖给农民，但由于农民拿不出钱，他们就得象借钱那样要以年利百分之三十六到百分之百的代价赊购化肥。这样，帝国主义又以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打入了中国经济。

我们向北走，又来到了产粮区。我们发现一些商人正在投资建立碾米厂。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但是，大批的农民却因此而失业。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失业的农民，流入城镇当苦力，或者当兵，为军阀们争权夺利充当炮灰；或者到城市的工厂里去找工作。那些工厂要不就是徒有虚

名，要不就发展极其缓慢，而且，由于统治阶级重利盘剥的强盗本性，还纷纷倒闭。

事实上，找遍广东的每一个角落，也不会发现有哪一项发展是为占该省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谋利益的。甚至缫丝厂厂主和一些美国教会学校企图改善一些条件的尝试也显得愚蠢可笑，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美国丝绸商人对高质量生丝的需要。

商业传教士企图通过改进蚕茧来复兴蚕丝工业，恢复其繁荣，这种企图是要把中国引向毁灭的一种典型心态。和我一起的这位青年官员所热心的正是这种勾当。当然，他的经济学是在美国教会学校的教授那里学来的。他跑遍三角洲地区，竭力向农民推销无病蚕子，还把一套法国设备引进到一家缫丝厂，以改进纺丝技术。他对我说，蚕茧收成连年歉收是由于病蚕茧孕育出来的蚕子造成的，现在所有大城镇的蚕茧市场上都有无病蚕子出售；如果使用这些蚕子，就会结出健康的蚕茧，蚕丝工业就会复兴，农民就会富裕起来。

但是要想得到这种健康的蚕茧，必须有三个条件：卫生的大楼、良好的通风设备和充足的桑叶。这些条件不能脱离农民的社会地位来谈。农民住的简陋房舍不卫生，没有通风设备——通常小屋里只有一扇门，并且他们总是要用尽可能少的桑叶喂养尽可能多的蚕，而这一切又都是由于他们处于无法忍受的贫困所致。

我的这位年轻旅伴，由于曾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所以坚信蚕丝工业可以通过无病的蚕子得到拯救和恢复。他派了两个同僚到三百万丝农当中去，向他们作卫生条件、通风设备以及喂

养技术的示范，并组织农民俱乐部以宣传这些思想。这两位年轻的助手设了两个示范点，其中的一个还组织起一个有六个农民参加的俱乐部。这两个青年人对这六个农民以及其他愿意来的人慷慨陈词，大力鼓吹卫生条件、通风设备、充足的桑叶以及无病蚕子的奇妙功效。但是中国的农民不是傻子，他们可能不识字——但这对发表那些胡说八道的文章来说倒有好处——然而，他们很聪明，他们比中国的任何教授和官员都更清楚，只有生活条件的改善，蚕丝工业才能复兴和繁荣。

他们知道这些饱食终日的年轻先生们属于社会反动阵营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高谈阔论只不过是泼在沙滩上的一勺水。蚕丝工业所以衰退是因为农民陷入了贫困的深渊；工业要复兴，只能通过彻底打碎奴役农民的邪恶制度，使所有农民获得社会解放，而不能靠几张无病的蚕子。

我们经过乡下的时候，访问了大约有一万人口的洛春镇。我们发现这里百分之二十的男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移居南洋去挣钱，家里的人就靠着他们的汇款来维持生活。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这里的农业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农民终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结果只是使那些惨无人道的高利贷者、军阀、地主等统治阶级作威作福。

这就是当时广东盗匪活动的背景——也是我们乘坐的那艘船全副武装的原因。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领导的农会是曾经把农民武装起来求得自身解放的唯一组织。农会被取消了，农民们除了做强盗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和很多人谈过话，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曾和强盗说过话，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已逼得每一

个农民都有可能成为强盗了。然而唯一令人费解的是，强盗竟如此之少；唯一发人深省的是，在其它省，大量的农民都投奔了红军和共产党以改变自身的穷苦状况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军阀力量如此强大，任何类似的组织都没有存在的余地。所以，这里的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强盗。

如果就广东农民向我谈的或者教导我的情况来下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的话，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在当今最上层统治集团中，有种种迹象表明，是要将旧的封建地主制度向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殖民制度转化。从这种旧的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如果不是一个完全殖民地的话）的国家，统治阶级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而已。

掠夺成性的广东统治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的共同之处远比同本省居民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两者都以人民大众为敌，因此，他们联合起来镇压工农的解放运动是很自然的事。

人民群众本身将处于更加贫困和绝望的境遇中，即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变化也只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奴役转向另一种形式而已。在广东东江地区，农民和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红军队伍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广州的统治者凭借香港帝国主义的力量，对他们进行了血腥残酷的镇压。然而，这种民生凋敝的困境将使人民大众积郁的怒火，有朝一日会以更有组织的形式爆发出来。

十八、澳门——

“东方的明珠”

远在过去的昏暗年代里，半岛城市澳门就是中国通向所谓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前哨站。葡萄牙海盗式的鸦片走私商选择了这块从广州乘船只需六个小时的地盘，作为他们利用鸦片侵蚀中国人民的据点。

当时，还没有香港，澳门便当之无愧地戴上了“东方的明珠”的桂冠，为自己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并用葡萄牙语给街道起了“幸福胡同”、“幸福大街”这样的名字。

尽管今天澳门的自然景色仍然美丽动人，然而，在这个城市最初兴起时建立的一些优美建筑物，如那古老的大教堂，已变成了废墟。这教堂的遗迹坐落在一个小山上，在阳光明媚的天空下，可以清晰地看见其轮廓。而现在，在它的脚下竖起了一个方形、黄色

的木质建筑，其尖塔笔直耸立，就象白兰地瓶颈，也许有人会说象红葡萄酒瓶颈，因为在澳门人们习惯喝红葡萄酒。

葡萄牙的旗子总是在俯瞰大海的要塞上空高高地飘扬，这是统治的象征；从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雇用来的黑人军队也说明了帝国主义的这一特征。这就给人们的心灵上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在亚洲的外国势力都是殖民统治者。这里，外国人的别墅环绕在小山群里，城里的街道呈逐渐升高状并镶有宽石面台阶，两旁是高大的绿色格子窗，可以使人联想到葡萄牙的街道。在宽阔的广场上，一些中国妇女常聚在古老的石井周围或港口沿岸的林荫道上聊天似乎总有周末下午特有的闲散气氛，人人都是那么轻松自在；一些渔船，挂着彩色的帆，安详地停泊在港口里。

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葡萄牙想竭力保持早已消失了的称霸世界的威严和传统，这未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因为，今天的葡萄牙与过去极盛时期残酷却又道貌岸然的远洋海盗截然不同了，过去的那种海上抢劫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走私犯和腰圆体胖、肥头大耳的商人。海盗们曾带着沉重的武器，发出“叮咣”的响声耀武扬威地穿过澳门的街道，而他们的后裔今天却蹒跚而行，象鸭子一样一走三晃。现在葡萄牙温柔的少女长到十六岁时，不但有五英尺高，而且腰围也有五英尺粗。其原因也同中国各地情况一样：那些所谓上层社会的先生和女士们以低价为自己雇用了许多中国仆人，他们只需要躺在安乐椅上颐指气使，一切都有人侍候。结果，随着年月的推移，他们的安乐椅也必须加固和加宽了。确确实实，帝国主义的伴侣是——肥胖。

然而，既不是迷人的自然风景，也不是葡萄牙人的魁梧——尽管这些都名不虚传——使得澳门变得如此吸引人。这颗“东方的明珠”每年吸引了大约二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香港和广州来的中国人。这是因为澳门是鸦片走私、赌博和卖淫的天堂。那些从香港和广州来的非常有钱的人，不仅是为了到这里换换空气，而主要是为了更现代化的寻欢作乐和从事鸦片贸易。

一天，我决定去国家鸦片垄断局调查一下澳门的鸦片生意。许多中国朋友事先告诉我说，去也是白搭，从那里不会得到任何真实可信的材料。他们还说，这个局是专为“国际联盟鸦片委员会”通风报信的。在中国，该委员会被称为“鸦片走私联盟”。

尽管如此，我还是走了一趟。这是一幢大楼，门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澳门国家鸦片垄断局”。这几个字人人都认识，并且都很清楚这儿就是出售鸦片的的地方。

门口的一个印度门房向我招招手，示意应该继续沿着街向前走，后来我才知道他以为我是到零售处购买鸦片的。在他所指的地方，我找到一个澳门极为普通的商店，货架上摆着雪茄烟、卷烟和鸦片。那个有点不耐烦的中国店员，拿出三罐不同型号的鸦片搁在柜台上，让我挑选。我可以买一罐，也可以买三罐，如果我心血来潮的话，还可以把整个商店都买下来。这三罐鸦片上贴有同样的商标：澳门鸦片垄断局。我拿起这些鸦片罐颠来倒去地审视着，可每次那位店员都从我手里把它们拿走，放回柜台上。三次之后，他发话了：“必须竖着放，这东西很娇。”我买了一罐这种“娇气”的鸦片作为样品，又返回

到鸦片局。

在穿过门廊上楼的时候，门房一直和我嚷嚷，想阻拦我，但我还是来到了二楼的一扇门前。令人惊讶的是，在走廊里，我碰上了一个显然是葡萄牙和中国血统的混血种，他对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是一位鸦片官员。我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没有葡萄牙内政部的介绍信，他是绝对不会向我透露任何有关澳门鸦片垄断的消息的。我有这样的介绍信吗？非常遗憾！因此他什么也不告诉我！

怎么办呢？我开始模仿亲眼看见过的柏林警察惯用的方式，压低嗓门，粗鲁地说：“嘿，你们是害怕公众了解你们这里鸦片贸易的真相，对吗？”

这番话震撼了他那敏感的神经，几乎昏倒在我的怀里，但他恢复了镇静，挺起那五英尺二英寸高的身子，用力把身后的门拉开，打了一个威严的手势：

“我们什么都不怕，请吧！”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我进了门，仍然摆着柏林警察的那副架子，环视着四周，就象要来搜查这个地方似的。两个打字员和两个记帐员一时放下手中计算鸦片帐目的工作，好奇地盯着我。我注意到他们都很苗条，这说明他们是中国人，或者至少是半个中国人，因为葡萄牙人一旦和中国人结婚，其后代就会表现出中国人的体形。

那位官员让我坐下，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并且把一大摞卷宗放在我面前。他打开卷宗，给我看那一页一页用葡萄牙文记下的帐目。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解，经过他的讲解，我对以下几个问题似乎开了点窍：

第一，葡萄牙是一个高贵的民族，就澳门的鸦片问题而言，至少有着很大的误解。第二，在澳门，鸦片实际上已消灭了——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的财政年度里，鸦片所得的收入只达一百二十万元，这笔可怜的收入比五年前减少了百分之六十；而香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惨过。第三，澳门和香港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国际纠纷。

似乎称为“南海宝库”的香港已把劣质的印度鸦片冒充为好货，贩卖到“东方的明珠”澳门，在澳门，只有最昂贵、最有劲的波斯鸦片才够格出售。然而还有比这种可耻行为更甚者，广东的一些中国鸦片贩子还伪造澳门鸦片垄断局的商标，并把这些商标贴在劣质的广西和云南鸦片罐上。谈到这些事情时，这位官员气得浑身发抖，因为他们憎恶剽窃，鄙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

第四，他还告诉我，吸鸦片者既不登记也不受任何控制，但在市里大约只有七千人吸鸦片。澳门有十万中国人和二千外国人，我赶紧计算了一下，吸鸦片者的实际数目想必有十万零一千人——这样说，可以留一点余地，因为也许有一千外国人不吸鸦片。原因是鸦片对外国人是禁止的，一旦发现有吸鸦片者，就要革官免职。鸦片只是对亚洲被奴役的民族来讲才是“好东西”。

听完他的讲解后，我顿开茅塞，决定离开这里到城里去走走，以便了解一些鸦片的真实情况。这位官员把我送到门口，半带诡秘半带恐吓地对我说，他和葡萄牙当局将密切注视我写的任何关于澳门鸦片垄断方面的文章——如果文章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订购几份；但是如果对他们不利，那么——他意

味深长地沉默了！我回想起，在葡萄牙极盛时期，这种沉默，常常会以暗杀来打破，然而今天已力不从心了，因为，葡萄牙人的便便大肚在他们和他们想谋杀的人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后来商会会长到我的旅馆来拜访我。据说，此人是华南主要的鸦片商之一，对鸦片业了如指掌。这位中国绅士年纪轻轻，气色很好，穿着一件米黄色的丝绸长衫，他战战兢兢地坐在椅子边上，手里拿着礼帽，似乎随时都准备跳起来逃走。他死盯着我，就象一条蛇盯着一只鸟，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脸。

他问我为什么想打听有关鸦片的情况。为了在报刊上发表，我欣然回答道。

他向前探了探身子，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接着说：“据说，你能为我提供有关鸦片的所有情况。”他回答道“但愿你对澳门的一切都感到满意。窗外的景色多美呀，不是吗？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身体好吗？澳门是一个多么迷人可爱的地方呀。你到过南京吗？噢，我常去，我有个哥哥在那儿……”

他答非所问地说了半天。最后，我反问他一句：“你不敢告诉我鸦片贸易的事，是不是害怕了？”他蓦然站起来，微微欠了一下身子，蹦出了一句：“到鸦片垄断局去！”这句话令人莫名其妙，听起来象咒语一样。然而他转过身去，猫着腰跨过后门栏，经过走廊离去了。

关于他，就谈到这儿吧！

后来，一位年轻的中国银行雇员和他的朋友们带我游览了这个城市。这位雇员不抽鸦片，他那八个月的小娃娃也不抽。他们把所知道的烟馆和赌场的事全告诉了我。随后，我们看了

许多家烟馆和赌场，又小又脏为劳工们开设的；富丽堂皇为富人开设的。许多赌场都建在妓院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他们还告诉我，妓女是奴隶，都是从广东的一些穷人家里买来的。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赌场的阳台上，这里许多人都在玩番摊〔一种赌博方式——译注〕。侍者给我们端来了茶水，问要不要陪我们赌。那天是工作日，来澳门的广州和香港的阔佬寥寥无几。因此赌桌四周是一些穷困潦倒的劳工和渔民。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是多么贫困，因为他们常常只是往赌桌上放一个铜板；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渔民输了一个铜板后嚎啕大哭的情景。我们还看到，一个渔民脱下外套，拿去卖了，然后只穿着一条蓝布短裤，光着上身，又回到赌桌边来。

苦力当中还有着一个人孤独的外国人。他衣衫褴褛，穿着一件破毛衣，瘦骨嶙峋的腿上裹着一条破裤子。他没戴帽子，由于多年的颓废生活，头上的黄发脏乱得象鸡窝，皮包骨头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眼皮红肿得发亮，鸦片带来的致命创伤深深地烙在他身上，把他摧残得活象一具骷髅。他身无分文，趴在赌桌上，一只膀子在不停地抽搐，他抬了一次头，发现了我，有那么一会儿功夫，红着脸，难为情地缩回了身子，似乎有些慌乱；但是，很快，就把我忘到脑后，又趴到赌桌上，再也没有看我。

我的几个新朋友给我念了篇葡萄牙官方文件。澳门的赌博垄断公司以一百二十二万四千美元的价格将一种番摊赌博卖给了一个辛迪加，期限是五年。这个辛迪加是由商会会员组成，主要是中国人，会长就是来看过我的那个人。番摊只是许多赌

博中的一种，政府从赌博中可以得到大笔收入，而鸦片则是另一种主要收入来源。赌博垄断权以高价卖给辛迪加，而辛迪加老板们又可获得更大的利润。这些利润之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年轻的中国朋友还告诉我，尽管国家对鸦片实行垄断，但旧的系统仍继续发挥作用，鸦片买卖依然如故，这是因为商人们都和垄断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垄断公司仅仅是一个掩盖他们经营鸦片买卖的合法招牌而已。澳门商会，是一个中外联营的组织，几乎专门从事鸦片买卖、赌博和卖淫业。这只不过是遍布亚洲海岸的交易网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所谓“年轻的中国”在政治上已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且得到外国列强的承认和援助。出于想进一步了解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我对商会会长的家庭发生了兴趣。这个家庭非常富有而且很有势力。一天晚上，我和朋友们一起，穿过几道门，进了他们那个闻名遐迩的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湖，四周环绕着四、五座白色的宫殿——这就是这户人家的住宅。从其中的一座宫殿里传出了噼噼啪啪的麻将声——即使在家里他们也赌博。

这个澳门特别有权有势的中国家庭的主人有八个妻妾，三十个子女，他利用鸦片大发横财、扩大势力。现在，他的儿子们也开始经营赌博业，据说还经营卖淫业。这个家庭还开设有银行、旅馆和许多其它类似行业。他们的子女有一个在广州当教授，一个在香港当经纪人，一个在澳门开银行，一个在上海的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地方法庭法官。这家的男男女女都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上学，开着自己的汽车。他们到日本度暑假，到

马尼拉过寒假，到欧美旅游、学习，在国外被看作是“年轻中国”的代表，被人誉为“进步和摩登的典范！”他们是中国许多这类处于统治地位的家庭的象征。

终于要离开澳门了。我向“东方的明珠”鞠了最后一躬，登上了开往广州的一艘英国轮船。在船上蹒跚的时候，我进了一间看上去象休息间的房子——其实它不是。在房间的头上，一个中国人坐在锃亮的木凳上，身边摆满了鸦片用具，在房间内壁里面，整齐地摆着抽鸦片用的床。这是英国船上的一个鸦片烟窟，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去，在吞云吐雾的鸦片梦境中度过开往广州的六个小时。坐在鸦片用具旁边的那个中国侍者劝我也去抽一会。

“但是，小姐”他劝说道：“只用八角钱，味道可好哪，舒服极了！人人都抽，你为什么不抽呢？”

在澳门，葡萄牙国旗迎风飘扬，它曾是过去西方文明的卫士；在我们所乘的船上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它是今日华南的主宰；而我们正在驶向广州，那里的国民党旗帜是今日东西方腐朽堕落事物的保护人。每一面旗帜都庇护着鸦片贸易，庇护着赌博，庇护着对人的奴役。在东方，人们唯一的选择是：在哪一面旗帜下走向灭亡。

十九、沈阳的妇女

这是沈阳城内的一个夜晚。这里同雄伟的城墙外面国际租界和日本租界里的生活以及中国南方地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似乎有着天壤之别。入夜以后，城墙上的四扇大铁门就关上了，直到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才开放，外界的生活也就感到更加遥远了。沈阳人的思想和行事方式同外界相差足有几十年的距离。

这时洁白的月光照在冰冻的大地上，万籁俱寂。只有站在我们大院石墙门外的一个女乞丐的哭叫声不停地哀号着——

“行行好吧！恭喜你们年年发财！”

我们这些住在小灰房大院里的人没有给她食物，那女人终于走了。她离去后，院子里唯一的响声就是沿着灰色石墙堆得高高的高粱秸上的干叶子迎 飘动

着的声音。

我们坐在家里听一个小巧玲珑的中国妇女在讲关于她的丈夫、警察、债务、所谓的“法庭”和张学良等方面的故事。距离我们只有两条街远的张学良家那座坚固的城堡在月光下显得更加高大而威严。你走到跟前，只见那石头砌成的大墙足有二十英尺高，门口站着神情冷漠，穿着灰色制服的卫兵，手持插上刺刀的枪，威风凛凛，使人望而生畏。

这个讲故事的女人年纪不算大，乌黑松软的头发梳着一个发髻。她的脸上和那双机灵的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奇怪的表情。

“她很漂亮，”我对我的中国朋友说道。

“不，她不漂亮。”一个学生答道；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补充说：“是的，她漂亮，但不是通常的那种美。”

或许同一个比她大五十岁的丈夫长期在满洲的生活使她具有一种机灵，忍耐和镇静自若的表情。她安详地坐着，双手放在腿上，娓娓动听地说起她丈夫李欣仁的事。

九个月之前，李欣仁的朋友在北面的吉林被捕。在严刑拷问下这个朋友终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同时还供出了她的丈夫也是沈阳的国民党员。然而李欣仁后来却作为一名“共产党”被捕了。他的命运比其他许多无影无踪消失掉的人要好多了。逮捕他时，除了他朋友的口供和他多年从事社会活动，例如山东饥荒时的救济工作等外，没有别的证据。但是“证据”是种新思想，那时满洲的官员谁也不管这一套。

为了营救她的丈夫免受严刑折磨和判处死刑，这个有着一张漂亮面孔的小巧玲珑的女人就到处奔走求助于亲朋好友。亲

友们凑了一些钱给她拿去贿赂官员和狱卒。但官员的贪婪是个无底洞，他们只得不断地借钱和贿赂。既然现在已实行新的现代法律，他们得借到六百元钱请个律师要求对李欣仁开庭审判。

从法律上说是“公开”审判，我就天真地表示我要去参加。但在房间里有人提出令人震惊的抗议：

“如果你出庭，我们都会作为共产党而被捕的……审讯都是秘密的……他们会问你对这方面有什么兴趣，你是从哪里听到的等等问题。”

李欣仁的妻子就起身离去了，斯文地鞠了个躬，说声“再见”，但从她的脸上表情可以看出她在思想上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她一走，房间里又寂静了，只有我们院子里的高粱叶子迎风飘动的声音。

我的女主人是一个矮小的旧式中国妇女，上身穿一件短袄，下面是裤子。她身体很虚弱，是由于生养子女过多而造成的，一共生了十二个，其中六个都夭折了。看见丈夫走进房里来，她总是起身让坐。她不认识字也从未出过远门。她有一双明亮聪明的眼睛，会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问起其他国家妇女的情况。

问题很有见地，正如任何聪明的妇女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每当我感到她的问题有些奇怪时，她总是叹气或沉思不语。西方的妇女是很幸运的，她说，她们可以自食其力，只有自己想要时才生孩子。她对她本国南方的现代妇女也一无所知。她怎么会知道呢？当她十五岁时就离开吉林省，嫁给了一个她从

未见过面的男人。岁月流逝，苦难无边，吉林处于边远地区，她的生活只是生儿育女，埋葬死去的孩子。

现在她已经人老珠黄，身体衰弱，她的丈夫准备要买一个十六岁的歌女，弄回家来当妾。我那小个子女主人不敢反对，但她的大儿子是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现代学生，他表示反对。他对父亲说，只要他把小老婆带回家来，他就出走再也不回家了。

“你是我的儿子……要象个做儿子的样子！”他的父亲对他吆喝道。

但那儿子是个有头脑的人，不肯盲目听从父命，于是一个星期前他父亲给了他几个耳光。有人说中国的儿子热爱父亲，但我见到的儿子并非如此。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的眼睛里充满着象我女主人的大儿子眼里的那种仇恨。在客人面前他很少说话，但当他的目光投向他父亲时，那眼神就很说明问题了。父子之间的摩擦层出不穷。

“在过去”那当父亲的对我吹嘘说，“公婆吃饭的时候，儿媳妇得站在一边侍候。”

那儿子插话道：“就因为这个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闭嘴，你这个蠢货！”那父亲吆喝着。

但那儿子并没有闭上嘴，那父亲也不敢把第二个老婆带回家来！因为那是许多地方都在发生叛乱的年月。中国当儿子的似乎一向都是这样叛逆成性，否则为什么有必要发明出那些严格的尊敬长辈的规矩呢？

* * *

一个穿着蓝布制服，留着男孩一样短发的年轻女教师坐着

同我说话。她是一个美国留学生。我们曾经设法要去了解沈阳女牢里的情况。那监狱长对这个年轻女子说：

“告诉那个外国女人，监狱长病了。没有他的许可，什么事也办不成。”然后他又对她悄悄说，“她不能参观这个监狱。里面不干净，让一个外国记者来看不合适。”

这个教员则可以参观，因为她是中国人，同时还是女青年会的一个成员。

她告诉我满洲的妇女仍处于半奴隶的地位。男人仍然可有许多妻室。妇女无权安排她们自己的生活。离婚这种想法的本身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男人可以“休掉”妻子，或者纳妾，大老婆也不得反对。她还要强颜欢笑同新人友好相处。

“这里的女犯人都犯了什么罪？”我问道。

“谋杀，”她答道。“大多数是谋杀案。”

“谋杀！为什么……谋杀谁……？”

“她们的丈夫，”她回答道。

* * *

有些妇女逆来顺受，有些则不这样。我见到过一个被人认为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她的形容憔悴，缠着一双小脚走从山东逃荒来这里以求乞为生。她步履蹒跚地迈着那双小脚走在天寒地冻的街面上，不小心滑倒在地上，正好倒在街中心。一小口袋馒头撒了一地。

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看到这个场面，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一帮忙。大伙反而起哄地笑了，站在街角的那个警察看着这般情景也跟着笑了起来。三个年轻的公子哥儿，穿着缎子面的长袍黑马褂，头带缎子的小黑帽也挤进人群一起哄堂大笑。

那农村妇女倒在街上一动也不动。但她用双手撑起身子环顾周围这人群，那目光就好象一位将军在巡视战场一样。然后她开始破口大骂，骂那围观的人群，骂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骂他们的徒子徒孙。她这一破口大骂，笑声停止了，就好象受到一股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人们开始匆匆离去，有的甚至惊愕得不知所措。人群散了，那农村妇女还在不停地咒骂。新走过来的人看到她坐在街上不禁失笑，她就朝着他们破口大骂，笑声哑然止住，人们赶紧匆匆跑开。

过了一会，她极力挣扎着站了起来，一个始终站在一旁照顾她的男孩拣起撒在地上的馒头，两个人摇摇晃晃地消失在远处街头那边。

街上都是男人，很少看见女人。偶然汽车里或人力车上坐有穿着考究的女人从街上穿梭而过。有时也有三三两两剪着短发，双手插在裤兜里的摩登姑娘招摇过市，从那自由自在的神态，自信而又骄傲的气派，一眼就可看出她们都是学生。

有一次，一个穿着一身蓝布制服的女学生同一个年纪大的妇女一起上了电车。显然她俩是母女，两人相差几十岁。那母亲缠着小脚，留着长发，脑后梳着一个发髻。那女儿长得象中国北方男子一样高大强壮，剪着短发，一双天足，脸上充满着机智。

电车上坐满着男人，没有一个空位。那姑娘一手抓住上面的木头吊环，另一只手扶着她的老母亲。电车里五十来个人中只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让座给那老太太。从穿着看，他显然是个学生。那老太太又惊又喜，连声道谢。其他男乘客则以藐视

的目光看着那个学生，笑他没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他和那高大的姑娘都用一种蔑视的眼光回敬他们。在五十个人中只有他们两个有新派的思想。这个比例在中国南方是太低了，但在满洲却是很高了。

二十、五卅示威游行

“五卅”之前一星期，上海的学生和工人组织已在准备纪念一九二五年南京路上大屠杀的纪念活动。那是国际租界里的英国警察对中国人的一次大屠杀。

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这两年上海各地曾举行过有五万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中国人民要求英国人向受害者赔偿损失——其条件如一名英国人在中国被杀后提出的要求相同——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此外，今年一个曾在印度当过统治者的英国人当上了南京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蒋介石要在南京接见英国公使及其随员以及其他外国代表。这批英国驻华人员是来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葬礼，但上海仍然是一块英国的殖民地。“五卅”即将来临了，英国的这些举动丝毫没有改善群众的情绪。

然后在五月十九日一个名叫张绪良的中国卖挑水的人在上海被一名英国士兵杀害。那天一名英国士兵把一个中国小男孩拉进沪西的一个英国军营里，企图加以凌辱。这孩子仓皇逃脱，跑到大街上惊呼救命。他的父亲，一个贫苦的向附近商店以卖水为生的人，上前援救，双方在殴斗中这个父亲被那英国士兵杀害了。中国的报刊发表了事情的原委；外国报界则把这一事件说成是一个中国小孩想从一个外国士兵那里“偷鞋”而引起的一场“争吵”。上海的一家外国周刊把外国人的报道称之为“卑鄙无耻之极。”

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下令在五月三十日不准举行群众集会或游行，也禁止罢工。上海的中国人宪兵司令奉命贯彻这项命令；同时控制上海国际租界和法国租界的外国人也发表了类似命令。中外政府当局制定了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以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

然而在“五卅”之前一星期，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同时在工厂门前，邮局和大学里举行了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提出了以下要求：取消治外法权，将法租界和国际租界归还中国；推翻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被害家属给以赔偿。

面对这些要求、外国人办的报刊掀起了一阵愤怒的嚎叫，同时上海的警察和海军陆战队也动员起来准备采取行动，在外国人地区和中国市区之间设置路障，街上拉起了铁丝网。

“五卅”那一天清早，我同一位中国朋友乘坐一辆出租汽车沿着国际租界的中国街道疾驶而过。《申报》馆的玻璃窗给打碎了，国民党官方的《民国日报》已被封闭，全体印刷工人

举行了罢工。在《民国日报》被打碎的玻璃窗上挂着一张用中文写的布告：

“查国民党出版的《民国日报》勾结帝国主义，为反动派和卖国贼作宣传。它把枪口对准人民，发表了许多反动文章……罪行累累。该报背离了新闻报刊的根本宗旨，罪责难逃。上海的革命群众已经将它封闭以警效尤。望各阶级兄弟察鉴”。

我们往前开到街角处被一大群人挡住了去路。那条又长又宽的大街和两层楼的中国商店和住房的十字路口交界处，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多数人头上没有带帽，身穿长衫，偶然也有一两个穿着西服的人，大街上人声沸腾。开过来一辆公共汽车，响起了一片喊叫声，听上去很奇特。不远处有人在散发传单，突然间满街伸出千百双手争先恐后地去抢传单。街上又传来愤怒的吼声——

“罢工！打倒帝国主义！”

我的中国朋友喊道：“快，你赶快离开……这里可能会开枪打起来，这是“五卅”示威游行的队伍。”

相反，我跳下出租汽车走到大街上，这时我只是独自一人了，因为我的朋友已坐着汽车逃跑了。

从街上又驶过来一辆公共汽车。

“罢工！”喊声又起，我只见一群学生和工人愤怒地走向那辆汽车，赤手空拳打碎了车窗的玻璃。他们用肩顶起汽车想把它推翻。一名中国警察奔向这群人，用棍子朝他们的背上乱打。他们一哄而散，跑到大队人群中不见了，那辆汽车可悲地停在那里动弹不得。

远处街那头喊叫声又起，又是满天飞舞的传单。周围的人

都往那方向跑去，我也跟着他们跑过去。从我身边飞奔过去的三个学生欢庆雀跃地大声喊叫着“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一个工人跳到一家商店的柜台上拿着一大把传单撒向空中，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然后又混入人群里去。一名人力车夫拉着满满一车传单跑在人群中，人们一面跑一面抓把传单往天空中撒，满街都是传单和口号声。

我来到福建路和汉口路的交界处。在交界处和街角上都挤满了人群。在交界处中间的空地上站着—个英国武装警官，手里拿着一根大棒。他一圈圈地转游着，目光对着群众，身子猫着腰，好象随时准备扑向人群。这场面使我联想起凶猛好斗的野兽。

每个街角上都有人在喊口号，街上又飞舞起传单。那警官就象一头发怒的公牛，东南西北来回转着，哪怕能抓住一个喊口号或撒传单的也好。但他无论转向哪边，无论从商店里或大街的阳台上，只见万头攒动的人群，抓不到一个人。

过了一会，从那边街中心走过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故意愤怒地喊着——“打倒英国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那警官象—头野兽—样向他猛扑过去，但人群迅速围了上来，那工人钻到人群中不见了。那警官怒不可遏地叫骂着，但中国人群只是站着看他那—会儿奔向这边，—会儿奔向那边的歇斯底里疯狂劲。离我不远的一个店员不禁失声大笑。那警官听见后就冲向他去，把他从柜台里拉了出来，用棍子敲他的头。店里连忙跑出人来把他给救走了。

口号声此起彼落，气得那警官象—头红了眼的公牛，怒气冲冲地用他那根棍子朝着四面八方的群众挥舞。他从街心广场

疯狂地追赶一个人，一直追到街那头，那个人钻进了人群不见了，警官只好满腔怒火地往回走，气得他碰到什么人就想拿起棍子狠揍一通。

他跑着追赶人时，我发现他不只是一个为了驱散群众的警官，他还流露出一种残暴的种族仇恨。谁也没有威胁他，但他象一头野兽般地追逐人群，不停地吹着他那个警官的哨子。凡是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他都要打。但每当他要动手打时，人群就围拢过来把人给救走了。他象个疯子一样想用他那根棍子把这汪洋大海般的人群赶回去。

两名中国警察也跑到这块空地上来，帮助对付群众，但却有点半心半意。其中一个伸手抓住一个学生让他站到街中心。这个学生的年龄大约有十八岁，清瘦的身材穿着一件廉价的灰布长衫。头上没有带帽，脸长得很俊。他没有抗拒就走过去了，站在那里等那个英国警官过来。这个白人警官赶到后，不由分说举起他的棍子就朝那孩子的头正中猛击一棍。那孩子立即晕倒在那中国警察的身上了，警察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看着他发呆。

那警官又挥舞着棍子不分清红皂白地往人群的头上打。看到人变成野兽的这股疯狂劲，我慌忙跑开了。街上血流满地。我背靠着墙站在那里看，这时那警官朝我的方向飞奔过来。一个大约只有十岁的中国孩子站在我的面前。他转身象一条虫那样躲到我身后，害怕得浑身直发抖。

那警官在我面前停住了。他满头大汗，眼睛里充满着血丝。

“你是谁？”他象一头野兽那样朝我吼叫。

“新闻记者。”

“你要我帮忙吗？”他问道。

但当他在问我时，看到我身边有个学生。他就举起棍子狠狠地打去。那学生两腿一发软，一头栽倒在他身上，鲜血直往外流。有个人弯下身去把那学生拖回倒人群里去。

然后从街那头过来一队锡克族骑警。马队在人行道上奔跑，把人们驱赶到商店里去。惊恐万状的店员砰砰啪啪纷纷推上门板。我离开了墙把我身后的那个孩子往商店里推。那孩子从我的腰间往外看，锡克骑警过去了。

马队过后一个外国人来到这时已经空荡荡的大街中心。他穿着一身白色的服装，悠闲自在地吸着雪茄烟。一只手挥舞着手杖，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他是带枪的。他在街中心一群英国警官身旁停下。他用傲慢的目光扫视空荡荡的街道和附近的商店，店里挤着几千名中国人。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些英国人。很清楚究竟是谁在主宰今日的上海。那外国人沿着空旷的大街逍遥自在地走过来，这时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在街上走路。他突然停住步，看到我在一家中国人的商店里，十分惊讶。

“你要我帮忙吗？”他在街中心喊道。我回答说：“不用。”“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他高声说道。“这些中国人在打外国人！”

那个疯子一般的警官抓着一个工人的脖子走了过来。他在我和那个外国人之间停下来恶狠狠地朝我说：“我看你是个共产党——对吗？你干吗在这儿——还带着一架照相机？”

他站在那里骂我，又过来另一名英国警官。“你在这儿干

什么？”他问道。“我是个记者。”“你会遇到危险——中国人在打外国人！”

我们默默地互相打量着。我感到身后的那个孩子不再探头往外看了，紧紧地躲在后面。我知道那英国警官在考虑是不是要把我抓起来。

“这里还有个记者。”他用大拇指指着站在街中心的那个外国人。“你最好离开这里，同他一起走，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的话。”

“不，”我回答道，仍然站在那里不动。

他转过身去同街上的其他几个警官商量，中国人开始从商店里走出来，沿着街道朝四面八方散开。因为我不象个帝国主义者的样子可能会被逮捕，也就悄悄地从商店里出来沿着大街走开了。那孩子跑在我的前面，过了两个街区一转弯就沿着一条小巷奔跑逃生了。

来到南京路，只见满街都是传单，大楼旁边也撒满了传单。周围站着一群群的英国警察。一辆满载着武装人员的卡车疾驰而过，车上是穿着英国制服的白俄。所有商店都大门紧闭，神色紧张的中国人默默地站在那里观望。两个穿着破衣服的人力车夫拉着两名英国警官从街上走过。从旁边街上走过来六个人，他们弯着腰低着头，嘴里哼唷哼唷地喊着，象一群牛马般拉着一辆沉重的货车。从空荡的街中心过来一辆人力车，那个拉车的还是个不到十四岁的小孩子，车里坐着一个年轻漂亮，打扮时髦，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外国姑娘，头上打着一顶精美的绿色阳伞。

整整一天我都奔跑在国际租界的华人区和租界外的华入市

区。墙壁上，电线杆上和高楼大厦上到处都张贴着标语口号。我能认出“工人”，“学生”，“群众”，“英国佬”，“帝国主义”和“罢工”等等中国字。满街都是传单和斗争的口号。我看到所有的人弯下腰去拣起传单往口袋一装就匆忙离去。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街头纷纷议论。

我出去察看那个被害的卖水人的灵柩，门口英国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后来我又到城外看“五卅”烈士之墓。我在华人市区里转游着，来到了国民党党部所在地，就走了进去。两个年轻英俊，穿着西装的中国先生接见了。下面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你们看到街上的示威游行和殴打的场面了吗？”

“没有。本党反对任何示威游行。”

“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散发传单搞宣传。”

“你们害怕这种宣传吗？”

“有危险性。”

“为什么？”

“他们的宣传蛊惑人心！”

然后我说：“我看到外国警察用棍子打你们中国人的脑袋。”

“他们都是共产党，”那两位先生回答道。

“你们为什么不纪念这个日子？”我又问道。

“我们纪念——今天早晨我们还在这里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呢。”

我感到挺有意思，就问道：“有很多人参加吗？”

“是的，很多，”他们回答说。

“有多少？”

“有一百多人。”

我没有听明白。“一百？你是说十万人吧？”

“不，”他们答道。“一百人。”

我只怕自己听错了，反复地问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回答前后都相同。

为了打破沉默，我问道：“请告诉我有关那个卖水的中国老头的事——他是怎样被杀害的？”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笑了。然后其中一个说道：“我们要求英国人给他的家属一些赔偿，并要求他们从上海撤出他们的士兵。”

“你认为他们会撤兵吗？”我问道。他没有回答，只是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板。

我回家时已经很晚了。各晚报登载了白天所发生事件的有关新闻：好几辆汽车被砸了；政府的报馆被砸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因为罢课大学关门了；大约有五十名学生和工人被抓到临时法庭受审。一名学生严重受伤，他的头部被打破。警察指控那个学生先打的他，他是在被迫还击时打了他！五名外国人也出庭了，衣着整齐，没有受伤，但却说他们被中国人打了；有一个说他的手臂上给重重地打了一拳。各报都用通栏大标题写着——“外国人在街上横遭暴徒袭击。”另些报道则说医院里住进许多受伤的中国人。

我接着看在“五卅”这个历史性日子里对外国人会感到十分有趣的新闻：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外国驻华外交人员并祝各

国首脑政躬康泰；孙中山的家属一直为这位已故领袖守灵，蒋介石夫人身穿考究的绸缎衣服，但孙中山夫人只穿着黑布衣服，黑色袜子；她的丈夫安葬完毕，在南京她一天都不愿多呆。

我继续翻阅着报纸。那份英国大报带头的社论是讨论学习中文是否会削弱外国人的思维能力。惯常的跑狗比赛将于晚间九时如期举行，外国人和中国有钱人的许多狗将前往参加比赛。一个年老的中國苦力自杀——死因不详。挪威王子和他的新娘收到大批珍贵礼品。南京政府的一名高级军官在上海马路上被击毙——原因不明。国际饭店的茶座舞会照常举行。一名十二岁的中国男孩企图率领一家英国工厂里的童工伙伴举行罢工，但他的“煽动性”活动因遭到解雇而被粉碎了。今年夏季的新式女时装将是长线条的，可以勾划出一个美人的苗条身段，如果用柔软的丝绸作衣料尤为理想。身体肥胖的女士们每天花十五分钟坐在地板上，双手抱着膝盖，然后以这种姿式来回运动就可以减去不必要的脂肪以保持体态苗条。

二十一、贫贱者粪土不如

这是满洲同中国其他部分联合的日子，富家店市飘扬着国民党的旗帜。

我们的周围是一片繁忙而热闹的城市生活。来自华北的身材高大、强壮英俊的苦力，低着头拉着人力车上的男男女女奔跑着。满洲的矮种马，就象当年成吉思汗横扫亚洲、直捣多瑙河流域的马队曾经骑过的那种烈性骏马，蹄声得得地拉着四轮马车。穿着考究绸缎棉袄的男绅士女士坐在汽车里疾驰而过。穿着破棉袄的外地农村妇女怀里裹着小孩跪在大街旁求乞。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她们不停地喊着，因为她们非常穷苦，想不出比这更美好的祝福了。她们的小孩跪在地上，或者在街上爬着向过路人号叫，哭泣。但这种事情已司空见惯，多数人对此不屑一

顾，甚至没有看见小孩那双象夜空中星星那样闪光的大黑眼睛或者叫喊着的那张小嘴巴。小孩喊着：“给点吧，给点吧！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

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乞丐，身子靠在那根棍子上，站在一家店铺的门口，朝着里面的店主人叫着：“老板，恭喜发财！恭喜你升官发财！”没有人答理，他就把嘴凑到门边，高声喊叫着：“老板，恭喜你当将军！”

一个人力车夫拉着一辆沉重的车跑着。天气很冷，眼睛流着泪，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头上裹着一块很薄的白布，好象是结冰了似的。由于没有看见，他一头撞在路边的一辆汽车上。汽车上的一只前灯给碰碎了，插在车前的那面国民党旗也撞歪了。这是一辆私人汽车，前座上跳出一名中国绅士，开始狠狠地揍那个人力车夫。那车夫吓得只是用手抱着头任凭挨打，也不敢还手。没有一个人过去干涉，有些人甚至看都不愿多看一眼。

两小时过后，一个外国人开着一辆轿车突然在街角停住了。一个中国司机开的出租汽车一时来不及刹车从后面撞到了那辆轿车上。那外国人从车里跳将出来直奔那辆出租汽车，一把拉开车门一拳又一拳地猛揍那司机，一面用中文咒骂着——外国人尽管没有学过中文，但都会骂人的话。

过路行人没人过问，也没有人想着对这种平常的事出面说话。

一个洗衣服的中国人肩上挑着两筐衣服在街上走。到了拐角处他一不小心滑倒在地。那根长扁担绊倒了一个过路行人，那人很快站起来，也未受伤，臭骂了一通那洗衣服的也就走了。

但一名警察看到这桩事就走了过来。那洗衣服的，好象从经验中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就诚惶诚恐地跪下，合着手掌，可怜地苦苦求饶。那警察象踢一只狗那样把那个洗衣服的踢得前滚后翻，他跌倒了又爬起来跪在那里求饶。他不敢还手，只是举起手挡着，不让往头上踢。除了街对过的一群人力车夫外，谁也不关心这类事。

街上过来一支队伍，由一支中国乐队开路。乐队里有西洋乐器和一面大鼓，吹奏着外国的曲子，乐队一面吹打着，一面摇头晃脑，尽量想引人注目。那个打鼓的使劲地敲打着，把其他乐器的声音都淹没了，于是，洋洋自得地好象说，“你们看我怎么样？”乐队后面是一个车队，汽车上饰着彩色的纸花。第一辆汽车里坐着一对新郎新娘，那新娘穿着中国新娘子通常穿的红绸子衣服，身子几乎淹没在后面的一大堆鲜花里。因为这是西式的婚礼。

结婚的队伍过去了，那个各打各的鼓，各吹各的号的奏乐声也渐渐消失了。

接着过来的是行军的脚步声。人们你推我挤地奔跑着，谁也不说话。或许又是结婚的队伍！但不是的，大街上过来两队穿着灰色军装，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那长毛绒帽子上的帽耳朵随着脚步来回搦动，有点象动物走路时的耳朵那样轻巧自如。队伍中间是一辆由两匹东北马拉的马车，车里坐着一个带着手铐的人，背后插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罪行，他是被拉去砍头的。

人们围拢过来，他们屏住气息睁大眼睛盯着他的面孔。他们似乎出于原始的本能想要看一桩能使他们感到恐怖的事情；

或许是想看看一个人在临死以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

那个带着手铐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蓬头垢面，好象在满洲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了。他木然地坐着，两眼盯着前方，显然什么也没有看。在那堆长头发的下面是一双粗眉大眼，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使人想起在边境地区同中国人杂居在一起的哥萨克人。他的眼睛很美，但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就象拉着他的囚车的那些马的脸一样。或许这是因为他十分无知，或许是因为他的脑袋都快要搬家了。他的脑袋将被装进笼子里挂到城门上去示众，而他的躯体则将扔到城外去喂狗。

当我们看着这支队伍转向另一条街朝刑场的方向走去时，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氛笼罩着我们所有的人。然后出现了一场对话，这段对话代表着今日中国到处存在着的矛盾。同我在一起的两个中国朋友，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商人。下面是他们的问答：

“这真可怕！”那学生痛苦地感叹道。

“他是个土匪，”那商人答道。

“或许是个共产党，被人说成土匪的。”

“都一样。”

“你知道那是不一样的！即使他是个土匪，谁知道他就是犯罪的那个人。真正的土匪可能给警察一大笔贿赂而获得自由；或许警察随便抓了个穷人去顶替。”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

“这是可怕的，”那学生又很动感情地说开了，“即使他是个土匪，也不是生来就如此。他也曾是个孩子。是什么使他变成土匪的？”

“你太感情用事了，我的朋友，”那商人不耐烦地说道，“想想他杀了多少人。他必须受到惩戒。”

“惩戒！可能他是学的省长、总督的例子——许多省长早先都是土匪。或许他也想成为一个大人物。”

“最好不谈政治！”

“这不是政治。几千年来我们都是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现在的土匪不是比过去更多了吗？”

“如果不杀那么多人，今天的世界更是盗匪横行了！”

“今天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盗匪横行，那些省长和富翁都是些什么人！”

“我再次对你说，不要谈政治，否则给人听到，你会招惹麻烦的。”

“当出现霍乱时，”学生继续说道，不在意地低着头走着，“我们请来卫生专家找出产生的原因。我们想法把产生的原因排除掉。但当我们有社会弊病时，我们反而不去寻找原因，也不想去铲除产生的原因。我们对人还不如对细菌来得重视……看，今年土匪就少些了，因为今年满洲的收成较好。”

“你说话象个共产党，我的朋友！”商人恼怒地说。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的！”

二十二、五年中的变化

他们五个是朋友。朋友这两个字的意义在中国要比在其他国家里更有份量。在中国，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仅次于家庭关系的一种联结力量。这五个朋友就象一只手上的五个手指头。

在北京大学的五年里，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他们又是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战友。作为共产党人，他们可能会否认他们的友谊里会有中国封建色彩的那种效忠个人的因素。他们会强调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他们母亲的乳汁里就把古老中华的那些东西灌注到血液里去了。

从儿童时代起，他们在民间故事和民歌民谣里听到的那种朋友之间生死与共的忠诚，就象听到树林

里的风那样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被接受了。这种古老的效忠个人观念从过去的封建时代一直流传到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在革命运动中人们之间有着这种友谊就会显得坚强无比。这五个朋友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

这五个朋友中，有一个名叫王一平，是河北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他是一个形容憔悴的瘦高个，头发长的象马鬃似的，也不梳，更不上油，从来不带帽子。作为一名学生和出身于受人尊敬的阶级，他穿着一件长衫，走路时就象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子。他的胳膊太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的那双手和脚都长的太大，没有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上的那种斯文气派。他的家庭想把他培养成斯文之辈也是徒劳。只有多年后，他病魔缠身，给折磨得气息奄奄时才开始象外国人有时称之为“高等华人”的那个样子。

他的家庭未能把他培养成一个绅士，也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听话的儿子，同时指望他日后能成为学者名流或升官发财的梦想也落了空。他进入大学后，北方发生了连年不断的饥荒，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军阀官僚都向土地征收多种新税，剥削人民的手段更残忍了。

王一平家的土地也因此急剧减少，从二百亩减到五十亩，原先要由十几户佃户耕种，现在只需他的父亲和两个叔伯耕种就行了。使他们更担心的是，王一平拒绝同父母为他挑选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结婚，也不愿以经商盈利为业。最使他们不知所措的，是他对父母说他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去。他们那些新名词，什么“中华”，“民族”，“群众”，还有什么“自由恋爱”——这指的是他有权选择自己的妻子，等等，传到这个

小小的世界里，就好象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敌人投来的炸弹。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类胡言乱语。

但是王一平曾经学过历史，而中国的历史是充满炸药味的，尤其象王一平这样经历过一九二六年以前那些岁月的人更是如此。中国的工农曾遭受外国人的屠杀，也发生过使外国人陷于瘫痪的总罢工，也有过对毫无设防的中国城市的狂轰乱炸和迫使中国人民遭受无穷尽耻辱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俄国革命的解放信息也在中国传播开了，人们要求在压迫和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王一平曾学习过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现在他决心要把学到的这些知识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中去。

第二个朋友是高新田，也是象王一平一样是个学历史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北方人。他是地主的儿子，出身于乡绅之家。他的个子不象王那样高，头发上擦了油，梳得平平整整的，白皙的皮肤，穿着一身很合体的长衫，带着一副象美国人那样的角边眼镜。他的朋友从来不戴帽子，高新田则总是带着一顶外国帽——夏天是草帽，冬天是毡帽。

王沉默寡言，态度强硬，但高动不动就要掉眼泪。当听说中国受到新的屈辱和新的屠杀时，他会愤怒得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在北京的抗议示威游行中，他常常满腔怒火，浑身发抖讲不出一句话来。但一旦警察朝着游行人群开枪时，他也同大伙一样想要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高新田在生活上从来没有受过穷，但一直到他毕业，他都是同朋友们分享他所有的一切。他在反对同一个他从来未见过面的姑娘结婚的家庭斗争中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这种斗

争使他经常要回家去，但如果他不是个独生子，事情也不可能这样顺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他同自己看中的一个女同学在北京结婚并且写信告诉家里，说她很快就有孩子了。这是真的。这个姑娘身材高高且长得很漂亮。她认为爱情就是生命。为了顺从高新田的意愿，在没有得到双方家庭同意的情况下，她就同高结婚了。她怀孕后不得不辍学，但她每天都坚持几小时的学习，高和他的四个朋友都是她的老师。她是个聪明的姑娘，但当她心满意足地看着她的丈夫时，显然，丈夫对她来说就是革命的化身。

当最后一个学期将近结束时，高新田把妻子送回老家去。她在那里生下一个儿子。几个星期后，他回到仍然充满着流言蜚语的老家，直截了当地对家里说：“现在有个孩子可以替代我了，我要出走了，你们的媳妇也跟我一起走。你们很有钱，也有充裕的时间去抚养孩子。我们一无所有。”

添了个孙子全家都很高兴，但一个做儿子的居然有这种态度和行为真使家里人又恼又气。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那身体虚弱，脸色苍白的媳妇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激动得全身发抖，但当她听到丈夫说了那样一番话，再看看他那充满激情的黑眼睛，她就坚决地把孩子放到婆婆的怀里，跟丈夫出走了。

五个朋友中的第三个叫胡成春，是一个身高六英尺的大高个，但却生性腼腆。他那开朗的脸一看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说话和行动慢慢吞吞的。他出身山东一个很穷苦的农家，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们全家的人都在一场饥荒中死去了。有人就

把他放在传教士家门口的台阶上，他是在基督教的孤儿院里长大的。

反对满清的第一次革命后两年，他成为一个国民党员，并参加了反对复活帝制的运动。五年以后他在一次文学比赛中得到一笔奖学金使他得以到北京来学习。现在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年满三十了。

胡深受朋友的爱戴。对高来说，他就是北方诚实、勤劳农民的化身。他对女人很腼腆，还没有结过婚。有时高的妻子就故意逗他。

“你为什么不找个心爱的人？”她会这样问他“我替你介绍一个朋友吧？”他会象个姑娘那样涨红了脸，总是回答说

“我？我要姑娘干吗用？象我这样一个大老粗，碰一下他们的胳膊就会给碰断的。哪个姑娘愿意结识一个随时都会把她留下当寡妇的人？”

根据党的指示胡成春同他的两个朋友高新田和王一平将一起奔赴广州这个南方的革命中心去参加北伐战争。

钟华山，这第四个朋友来自南方的江西省。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排行第三，中等身材，长的瘦猴一样，生性聪明，有点神经过敏而且爱挑剔。他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小商贩，另一个以务农为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才凑够了钱让他上的学。正因为他在经济上有困难，高新田才计划将五个朋友的钱凑到一起大家平分享用。

钟华山在十六岁时就同一个缠着脚的旧式妇女结了婚，她把丈夫看成菩萨一样，日夜供奉侍候。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他在江西的老家。钟同他的朋友一样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想同

他们一道去广州，但他知道他的革命任务是在江西，他现在准备回到家乡去找一个工作或谋个一官半职。江西是在封建军阀的手中，但他将要在哪里为北伐革命军取得胜利奠定基础。江西是他的故乡。他的口音同当地人一样，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了解农民群众和手工艺人的需要和问题。

他很少提起那个旧式的妻子，只说她是个良家女子，说她无知是真的，但对他始终忠实如一。

身边有个摩登的女同志也许会更有意思，但他不是一个喜欢罗曼蒂克爱情的人。毕竟象他妻子这样的女人，是革命需要塑造的典型材料。他将带她一起去参加斗争。

五个朋友中的最后一个叫张敏生，出身于上海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外表上他是一个典型的学生，穿着一件蓝布长大褂，平底布鞋，带着眼镜和外国帽。但他不仅是一名学生。在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和远东殖民地的反动中心，他一直是为工人开办夜校的组织和教员；同时他也是工会的组织者之一。

成千上万的工人为反对残酷奴役的斗争也使他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他的民族觉醒又促使他形成深刻的阶级觉悟。中国在外国列强手中遭受到的每种耻辱，首先总是落在工人的头上，每次民族和劳工的斗争都使他受到直接的教育，而他那四位朋友就没有这种亲身感受。他已从泛泛地谈论社会主义进而去直接组织共产主义。在北京时他曾学过俄文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凡是能够找到的他都如饥似渴地去阅读。在他同钟华山和王一平合住的那间房子的一角，堆满了英文、俄文和中文的书刊。

张敏生现在以一个党和劳工组织者的身份回到上海。正如钟华山要到江西去帮助准备迎接来年的革命军一样，张也是以同样的目的来到上海。钟是回到敌人的营垒里去，张则回到双重敌人的营垒里——上海的中国军阀傀儡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用砲舰保护着他们自己及其傀儡，并使上海的千千万万工人遭受残酷的奴役。

这五个朋友同时在大学里毕业，乘同一条轮船来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分别时，十只手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高新田的妻子用她那双白皙的纤手不好意思地放在拳头的上面。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高的眼睛里闪烁着无法形容的激情之泪。

那位山东农民胡成春说：“五年后中国和我们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们是站在革命的十字路口。让我们五年以后再相见——五年后的六月。到那时再看看我们的命运如何。”

对此他们都相约再聚。

五年过去了。下面就是这五个朋友的变化。

去广州的那三个人，王一平，北方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高新田，地主的儿子和胡成春，那个山东的农民，都在他们到达的当月就参加了革命军，并跟随革命军进军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汉，这里曾一度是国民革命政府（至少是这样称呼）的所在地。

王一平成为国民党农民部的一个成员，当时国共两党曾一度合作共事。

高新田带着他的妻子两人形影不离，留在革命军某师的一个政治部里工作。他的工作之一是组织每周一次的军人大会讨论有关军队和革命的各种问题。在这种大会上普通士兵也享有

同军官一样的权利，每次会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阶级冲突。

士兵们要求北伐军提出的革命口号应当变成现实：他们要求公布各种经费开支的帐目；责问为什么军官不发给他们军饷；为什么当官的用他们的钱拿去做投机生意；为什么尅扣军需费用。封建军阀声称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革命军队是要为新的主义而斗争。当官的不得不公开回答这类问题乃至指责。他们一再被迫屈服也只好忍气吞声。政治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恨的东西。共产主义！他们在自己人圈子里慷慨激昂地说，军队里，农民和工人中都有共产党！

高新田曾对他当时的工作说过：“政治部是普通士兵的父母”。在中国的历史上，士兵从未有过权。士兵不过是军官的走卒和工具，施在土地上的肥料。革命将赋予他们以人权，这就是他们如此英勇战斗的原因。

那个山东农民胡成春在进军到武汉之前一直留在军队里。然后他被党派到北方的几个省份去组织农民以迎接革命军进一步向北进伐。他是共产党内最早的农民组织者之一。当反革命开始时，他回到武汉接受指示，但他被派回北方去组织公开的社会革命。不能再让国民党利用共产党的口号去获取群众的支持。因此胡成春又回到了北方，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同他的朋友失去了联系。

这五个朋友克服了种种困难才保持着他们个人之间的联系。王一平只收到在江西西北部发出的一封来信。钟华山在这封信里只说他还活着，在从事他们的工作。反革命开始后，南方各省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屠杀，钟华山的名字在国民党的新闻报道中曾被报道过两次，把他称作为“赤匪”的头头。此后他

就无声无息了。他似乎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他知道王一平和高新田的家庭地址，但一个字也没有给他们写过。

王一平收到过张敏生从上海寄出的一封信。那是一封小心翼翼，没有留下半点痕迹的信，但从中足以使他知道这位朋友在做些什么事。反革命开始后，王和高逃到上海，他们经过一番查访终于找到了张敏生。张那间只有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的小房子就成为他们暂时的栖身之处。此后这间简陋的小房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中心；他们从这里奔往遥远的外地，又从外地回到了这里。张敏生已经结婚。他的妻子是一个长有一双大黑眼睛的姑娘。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总是坐在门口负责送往迎来。

张敏生把一九二七年四月开始的对上海工人大屠杀的详细信息告诉了他的朋友。当革命军快到来时，工人们起来了，并用他们仅有的少数武器把旧军阀赶出了上海，南军到达上海时，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在革命工人的手里了，还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但南军不但害怕和痛恨农民，也害怕和痛恨工人，痛恨军队里的新思想。军官们提出工人应解除武装，重新回到工厂里去当牛当马。上海的银行家和黑社会的帮会头目以及外国人都支持军官们提出的这个要求，他们都要求将工人赶回他们原来的地方。但工人们已经得到新的权力，他们对今后的工作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反动派于是就向工人开火了。这股反动势力是帮会分子、外国警察的密探；还有对军官俯首帖耳的那部分军队的大联合。大约有五千名装备很差的工人被屠杀了，工会被粉碎。工人们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们刚获得的那些权利又被剥夺了，

重新被赶回到他们原先的可悲处境。

张敏生站在工人队伍的一边。这时所有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现在也不动摇。

王一平，高新田离开上海去广州。几个月后，广州公社被粉碎，他们又回到张敏生的那间小屋里来。但现在王一平身体消瘦，脸色苍白，行动缓慢而吃力。他肩上的伤口愈合得很慢，经常不停地干咳着。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参加公开场合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只是留在房间里不停地写着。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他的工作能力却在逐渐衰退。他常常躺在硬板床上睁着那双干瘪而发亮的眼睛，有时也想到干燥的高山去养病，但他从来没有说出口过。在中国象他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还有几十万人被关在监狱里，都是这样慢慢地等着死亡。他的党没有钱送它的党员去山上休养。他的生命只有这样慢慢地消逝。

这五个朋友在北京分手后的第四年，张敏生被党派去汉口。汉口党的执行委员会全部人员先后两次被捕惨遭杀害。所以党员都受到严刑拷打，然后被砍头示众。汉口的街头响起了国际歌的声音和男男女女走向刑场时的口号声。只有那些舌头被割掉的人才是无声地走向刑场。这些嘴里流着鲜血的人在刺刀的驱赶下走过大街，然后被踢倒在地砍头处决。

张敏生被派到这个恐怖的城市去帮助建立党的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以挽救革命。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被捕了。一个从前同他一起在国民党里工作过的人把他出卖了。他被带到军事司令部，先是以金钱和官位利诱，遭到抗拒后，就被捆绑起来，用细竹条抽打，竹条在空中呼呼作响，打得他全身都是斑斑血痕，死去活来。苏醒过来后，还问他是不是“够受用了”，又

迫使他供出他的同志。遭他拒绝后，密探又把他按倒在地，往他鼻子里灌尿，还用这种脏水往他身上泼。但他仍然不肯出卖同志，于是就被拖到街上去，在刺刀和枪托的驱赶下，推到街上被杀害了。他的头颅落地，滚到离他的身体好远的地方。当兵的拣起了那个头，恶作剧地把它放在尸体生殖器的部位，发出阵阵狂笑。

他的尸体同其他一些尸体一起放在街上好几天——这是对工人的警告，说不定他们可能也会碰上这样的命运。外国报纸不满了，倒不是针对杀人的这件事本身。他们抱怨是因为外国的女士们在去跑马场的路上常常要经过这些尸体，感到惊恐。外国人提出杀人的地方应当离市中心远一些，或者砍头后就把尸体拉走。

王一平和高新田得知他们朋友的命运后，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来。高早都不哭泣了。张敏生的妻子彻夜不眠，木然地坐在那里两眼发愣地凝视着远方。白天王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不说一句话，夜里他穿着布鞋心神不安地在房子里走着。谁也睡不着。黑夜里，这房子似乎也在倾听，观察，充满着痛苦。

第四个年头还没有过去，天津报纸上发表的被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中有胡成春这个名字。他被在北大时认识的一个国民党左派认出后给出卖了。否认他的姓名和身份都是无济于事了。他也没有否认。他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于是很快就被拉出法庭。

他被关在一个小铁笼里，既不能躺下也不能坐直。三个月中他象动物那样蜷曲着，大小便都在里面，吃的东西是从铁栅栏递进去的。他的身体消瘦了，蓬头垢面，眼睛象是一头被折

磨过的野兽。国民党逮捕他的人决心要看看他的信仰能坚持多久。

当王一平和高新田得知胡成春被捕后，就开始为营救他而四处奔波。王从病床上起来，把桌子上的毛笔搁在一边不再写东西了。这两位朋友设法通过中国社会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封建关系去营救他们的同志。他们日以继夜地去寻找同北方的军阀官僚有个人交情的朋友，向他们作长时间的反复解释、辩护、请求。王精疲力尽地从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求人说情。这两个朋友把什么都典当光后，又到处借贷。他们要有一千元钱就能买通天津的监狱长——但他们没有一千元钱。他们的党也没有钱。有成上万象胡成春这样的人被关在监狱里。

第五年快完时，有关胡成春的消息传出来了。在天津监狱的大院里有一根水泥柱子——一个绞刑架。胡成春被吊在这根柱子上先是用鞭子一顿毒打然后被处以绞刑。

高新田和他的妻子不愿把消息告诉王一平。这消息可能会加速他的死亡。但如果不告诉他，他每天都会从病床上挣扎起来为营救他如此心爱的朋友而作新的努力。王听完这噩耗，然后挣扎着想从床上爬起来，还没有站稳脚，就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半夜里他苏醒过来几分钟。他那些朋友的面孔就象迎风燃烧着的火焰在他眼前摇曳不定，忽隐忽现。高新田就劝慰他：

“休息吧，一平。医生说你的病没有那末严重。再过几个月你就会好了。”

王一平用缓慢而颤抖的声音回答道：“他们不怕……严刑拷打。我们为什么要怕……死呢。”

高新田紧紧抓住王一平那双骨瘦如柴的手。那修长洁白的手一再按着他的手，好象是在示意，然后静静地停住不动了。王一平就这样悄悄地秘密死去了，好象最后的这一行动也要避免引起在街上巡逻、监视、偷听着的密探。

第五年结束了，第六年开始了。高新田和他的妻子同张敏生的妻子无声无息地住在那间小屋里。他们的行动要尽量不引人注目，进进出出都得先用目光朝街上扫视一番。赣南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消息传到了上海。那天是十一月七日。有六百多名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一天晚上，这三个人在一起埋头阅读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一个报告。他们如饥似渴地默默读着，时而兴奋，时而感叹一番。高新田的妻子突然喊了一句“华山！”她的手指着报告中的一个人名。看，在这儿！钟华山是赣西北苏区的一名代表！三个人长时间地看着那名字，好象看着早已遗忘了的一个人的面孔。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这个名字使他们想起那已不在人世的三个人。

五年就这样过去了。第六年也快结束。幸存的这两个朋友的未来命运是凶是吉也还难以预测。

二十三、“升官发财之道”

两个人在广州的一条街上走着。其中一个对另个人说：“跟我一起穿过大牌楼到凉棚那边去看看。”

“干吗要我跟你到那边凉棚里去？”另个人说道。那是七月的炎夏，热得路面都发烫，而这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凉快歇息。

第一个人温和地笑着说：“因为到那边，朋友，你可以看到最近被暗杀的那个中国将领！”

虽然将军被暗杀在这个文明时代的中国决不是罕见的现象，但每起新的暗杀事件仍然会使一些人感到好奇，某些人感到害怕，成为许多人的趣谈，而使所有那些骑在工农脊背上作威作福的人不得不加以深思。

因此这两个人，那个怕热的和那个爱热闹的来到

高大的丧葬牌楼。牌楼很大，看上去好象是为了举行婚礼而不是为了哀悼一个被暗杀者。这条道路一直通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的大院，院子里挂着几千幅对联，上面写着中国的古代诗词和至理名言。所有这些对联上的词句都是称颂已亡人的高尚道德，从挽联上的这些言词来看，似乎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如此伟大，谦恭，真诚和公正的。凉棚里还悬挂着几千盏纸灯笼，也都写有这类溢美的言词。万一你想发笑或表示怀疑，两边围着草席的路上有不少士兵，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枪上还带有刺刀。

在那长长道路的尽头竖着一条格外精致的草席，无疑那里躺着那位被杀害的将军，四周摆着过去封建时代陪葬用的豪华的随身用品。墙上还有更多的对联，棺材上面盖着绣花的红绸，前面摆着水果和点心等供品，香烟缭绕。道士和尼姑有的跪着，有的站着不停地在诵经。一开始不愿来的那个人此刻觉得不虚此行，因为那尼姑又年轻又漂亮。虽然人们在为死者致哀，但活着的人仍然也应受到重视。

在这个被害将军遗体前表演的都是中国古老的封建迷信和腐朽堕落的一套。每天举着他的魂幡祝他走向另一个世界去的旅途中一路平安：有纸糊的马，房子，人力车，船，还有一辆名牌汽车，甚至连汽车牌照号码都有。当高级官员和亲友前来吊唁时还要奏乐。丧葬事宜大张旗鼓地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尽管盛况空前，但也难免有人指责，例如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的穷苦人。而这些批评者指出的无疑是正确的，说如果凉棚附近不设赌局半夜里听不到麻将声可能对死者更为尊敬。但这是罕见的场面，葬礼上花了很多钱。南京政府为这次丧礼电汇

来二万元，广州政府也给了几千元。

最后抬着遗体穿过大街出殡那天，整个广州市都轰动了。的确没有人民群众沿街为他送葬，但至少也象往常那样有几千个瘦骨嶙嶙，破衣烂衫的人力车夫和其他苦力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热闹。店员当然也会出来看个究竟，他们对什么事情都是爱看热闹。送葬队伍有几千人：亲戚，文武官员，警察局长，海陆空军武装队伍。大街上都是武装人员，夹在中间的是穿着白色丧服坐在高级汽车里，有武装人员警卫的高官。

遗体最后安放在城外黄花岗，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烈士们葬在一起。这里同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被外国军队打死的四十五名学生和士官生的坟墓相距不远；同为革命英勇奋斗而牺牲的其他革命者的坟墓也不远。在中国，爱国主义的格局已经变了，这个被杀害的将军居然也同烈士们安葬在一起。

死者是位桂系将领，桂系同中国其他派系一样，名声都不太好。不错，这个人是一位知名人物，确实知名度很高。因为在过去两年里他改变了四次立场：第一次他为桂系打仗；后来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就改换门庭为蒋效劳；不久看到他从前的盟友可能要赢了，他又重新加入桂系；最后蒋介石给了他一个省长的官职和大量的金钱，他再次改变立场。这样的人物无疑是很出名的。他的升官发财之路终于在为蒋介石卖命时结束了。

六月底他来到广州谈判一些事情。在市内的军官俱乐部里参加了几次很长的会议。据说广州一个最有势力的将军计划要把他推翻，而用他自己的密友去取代广西省府主席的职位。那位已故的将军表示反对；他还提出过该省的所有赋税都要经过他的手。不过在这种会上，你搞不清楚哪是真的，哪是假

的。

然而有件事是非常清楚，毫无疑问的：一个夜晚这位将军参加完这类会议后回到旅馆，一名他自己的贴身警卫追上一步从背后给了他一枪。虽然他一辈子都以胆小出名，而且是一个有奶便是娘的腐败堕落的人，他还是个鸦片鬼和好色之徒，光外妾就有七八个之多，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会长生不老，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背上中了一弹后，仍能站起来追赶那个暗杀者，他从房间里一直追到旅馆宽敞的楼梯口，然后他那升官发财之路突然停止了。

那警卫被抓住了。据说这个将军的反对者付给那个贴身警卫一万块钱，并答应提升他为军官。那位反对者是谁始终是个谜。香港的报刊提到白崇禧的名字，他是桂系的一名主要将领，当时正在湖南作战。但另些报刊指出反对者就在广州。那暗杀者经过长期监禁后，最终被枪决了。替那位已故将军如此大张旗鼓办丧事，而且还把他埋葬在革命英雄公墓之林不免使人疑窦丛生。

有位批评者说在死者身上花那么多钱，是因为他的罪孽深重需要向为数众多的阎王小鬼贿赂赎罪。

那两个人，那爱看热闹的和那个盼望早点回家凉快歇息的议论着那位去世的将军和这桩暗杀命案。其中一个回想起捷克好兵帅克的理论，说瘦子比胖子更难以打中。但另一个列出过去两三年里被杀或被刺的文官武将的一长串名单加以反驳。确实一些瘦子躲过了子弹，但那去世的桂系将军是个瘦子，他却被击中了。不久前一个福建的瘦子将军耳朵上给子弹穿过去一个洞，而另一名福建的胖子将军则躲开了。一名广州的将军两

年来一直一瘸一拐，然而他也不是个胖子。中国各地还有许多胖子官僚也被击毙或重伤，死后也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这两个人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并且进入政治经济学和相对论的领域里去了。但最终他们却回家凉快去了。

二十四、烈士的遗孀

邓寅初在南京的监狱里等待处死，他回顾了同他妻子度过的那些困苦年月。她每次来探监都使他重新回忆起这些往事。往事并不愉快。现在她付给监狱长一百块大洋以便能同他谈几分钟话，她告诉丈夫说，她已经筹集了三千元钱来营救他。有了这笔钱她已经同监狱长和法官谈妥想法让他逃走。他满怀希望地在监狱里等着实现她的诺言。

邓想到过去他对待华娟的态度就感到良心上的责备。但是他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多年来他一直同她作斗争。革命把他俩推到两个不同的方向。他们虽然是奉父母之命的结合，婚后到也相亲相爱。这种爱情一直没有破裂，直到一九二五年，即他被捕之前一年。他们的三个孩子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虽然

他爱她，却从来不了解她。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同人喝茶聊天或打麻将上面，爱时髦好打扮。但或许女人都是如此。

她也爱金钱，或许这也不算太坏，因为他自己对金钱的价值没有什么概念，在他结婚的十年中，他把全部薪金都交给了她。她把这笔钱以她自己的名义存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并通过一个经手人放高利贷，这些年来连本带利几乎翻了一番。她以一个赌徒的贪婪目光看着这笔日益增多的钱。邓原谅了她，心想这只不过是为了家人日后免受拮据之苦。此刻他感到肯定她是用这笔积蓄来营救他的生命。

他回忆起他曾经如何设法使她对公共事务感到兴趣。他先是买了书报给她看，并热情地将他的一些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她。但她把他买来的书和杂志装在库房的一个箱子里让它们发霉变烂。当他想向她灌输他的思想时，她就对他怒目而视，很不耐烦。

“谁统治中国管你什么事？”她抱怨说。“你现在有地位，薪水也高。如果你参加到这些危险的阴谋中去，只会连累我和我们的孩子。”

对那些来看她丈夫的男人，她先是怀疑，当她听到他们谈的就是邓想方设法要灌输给她的那种思想时，她就采取敌对的态度，把他们一个个都赶了出去。

邓曾幻想华娟能够做到既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朋友和同志。他一再要以他和朋友们的那些丰富思想和秘密计划去说服华娟。他的朋友们比他明智些，一再警告他这些事情要向她保密。但他爱她，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同妻子的冲突也增多了，但看到她泪流满面时，他又感

到后悔。他会把她抱在怀里，倒在床上，在柔情脉脉中答应要保护她，同他那帮朋友和要牵连到她的种种活动一刀两断。她会满意一阵子，他们的生活也会平静一个时期。然后他又会回到他自己那些思想和计划中去，家庭的矛盾重新又起；这些思想再次又会在他妻子的怀抱里和哭泣声中烟消云散。他在她怀抱里又会向她作出新的许诺。

有时半夜里他也会醒过来想到这种烦人的斗争，认为他的朋友是对的，他的妻子不对。然而他又没有勇气和力量去坚持自己的信仰。有时他还会想到同他睡觉的第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他父亲花了几千元钱买来的小妾。她的年龄差不多比他大十岁，就是这个小妾教给他所谓做爱的秘密。

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此后的四年里他总是暗地里听从她的召唤，犹如一条夹着尾巴的狗听从主子的命令一样俯首帖耳。他总是以妒忌的眼光看着她，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愁眉不展，被病态的情欲和犯罪心理的精神重压所折磨的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后来他的父亲似乎终于意识到有点不正常就突然送他到国外去深造。即使此后不久他就得知这个姘妇患病后神秘地去世了，但她对他的支配力始终未消失。他在遇见的每个女人中去寻找她的影子。后来他同意父母之命结婚后，他也只是把妻子想象成那第一个女人的化身。

邓回忆起他如何常常在半夜里从床上坐起来，凝视着熟睡中的妻子，想从那模糊的面孔中找到同先前那个女人的相似之处，但却是徒然。他妻子身材矮小，白皙的皮肤，长着一双小眼睛。这是一种毫无生气，愚蠢的美，长着一张象洋娃娃般的脸孔，但她竭力要保持某种魅力。但他的第一个女人身材颇

长，有两只明亮的大黑眼睛。她是他的第一个情人也是最后的一个情人。然而在他妻子身上也可以使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当他搂着她时，他的脑子里又涌现出过去的回忆，仿佛仍迷恋在那个情人的怀抱里。这种珍贵的回忆使他多年来怠慢了他的朋友，也疏远了革命。

邓回忆起他最终使自己摆脱了妻子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一种新的激情取代了他的怀旧的恋情。那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晚上，当时上海大屠杀的消息象闪电般传遍全中国。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到处都在议论罢工，抵制和战斗的消息。那天他很晚才回家，希望从他妻子那里也能发现象他一样激动和坚决的心情。她见到他，妩媚地微笑着。她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当他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无动于衷地看着他的脸。

“这些人一直干坏事”，她厌恶地说。“他们总想制造麻烦！”

“你指的是什么人？”他惊愕地问。

“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他们没有责任感。你的朋友也一样，他们对你产生了不良影响。”他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她那张空虚的面孔。

“怎么了？”她说，嘴唇有点发颤，眼圈也红了。她用双手抓住他的手臂。但他仍然发愣地盯着她，仿佛她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然后他缓慢但坚决地放开她的双臂，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就离开了这个家。

从此以后他就秘密地进行工作，在她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她的烦躁，愤怒和眼泪凝结成一股强烈的仇恨用以对付他的朋友

和席卷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南京她见到朋友就诉说她的痛苦，她的这种背后议论也传到邓寅初朋友的耳朵里。邓只对他们说：“她对我们的工作毫无所知。我从未同她谈过我们的事。”但他们担心，因为她是个多嘴多舌的女人。

最后，一个急性子的姓吴的人决定采取行动。有一天他出现在她家，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已听说你在背后对邓的政治活动说三道四。我警告你——你这样做会断送他的性命。如果你的这些闲言碎语传到军阀的耳朵里，他就得被捕杀头。”

她气得脸色发白。“你们都是赤色分子！是你们在断送他的性命。你们有什么权利要他去干这些活动。他是我的丈夫！”

“我严肃地警告你，军阀到处都有耳目。除了你没有别的人在抱怨他。”

“你是个坏蛋——立即从我家滚出去！”她尖声叫喊道。

华娟又在整个南京城里兜售她的新创伤。那个姓吴的赤色分子侮辱了她！吴听到她的新攻击，不声不响地卷起铺盖搬走了，担心他自己也呆不长了。当邓用坚定的语言对她的行为提出抗议时，她就对他怒骂，从屋里跑了出去。

接着邓就被捕了，在几个小时内就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华娟受到的打击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痛苦。当她的朋友来访并要她以妻子的身份去监狱同当局商量通过贿赂营救他时，她开始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等她骂完了，就直截了当地要她想一想，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使她的丈夫获得释放。这只有她才能做到，因为他的朋友没有一个敢于冒他们的生命去为他谈判。

“那末谁来付这笔贿赂的钱呢？”她怒冲冲地问道。

“我们会付的，”他们对她保证。

说到他们会付钱时，她的怒气缓和了些。最后她终于同意了。

华娟在南京到处找门路，最后谈成要用三万元才有可能使邓寅初出狱。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邓的朋友们都很穷。华娟在上海银行里的存款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但她一句口风也不露。这是邓的朋友们造成的灾难，这笔钱理应由他们来付！后来钱开始给她送来了。首先是邓寅初的老父亲从四川电汇来一万五千元，并准备亲自来南京帮助救他的儿子。邓的朋友们东拼西凑，这里凑起一千，那里凑成五千。

最后整个数目都交到华娟的手里了，她看着这一大笔钱，心想把这样许多钱交给当局真有点舍不得。华娟感到她有权了，金钱就是权力。她开始同法官和狱吏进行谈判，犹如她到商店里买东西时讨价还价一样。

“三万元太多了——我们是穷人……没有这么多钱……我只出得起五千元……那末七千如何？”

日子一天天过去，威胁也越来越临近，后来她出价一万元。两次宣布处决，两次都推迟了，当局是在等那笔钱。但他们要求三万元，一分不能少。此外，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她的讨价还价使得他们丢失面子，好象把他们看成是普通老百姓而忘了是有权有势的高官。

那些朋友们急得满头大汗，经常出入华娟的家门。就给他们三万元，朋友们恳求她把全部三万元都付给他们。华娟看到他们要依靠她，开心地笑了，这些人在一周之前还对她如此之

坏！

“如果我把寅初放出来，”她说，“你们能答应将来不再来找他去干你们那种造反的勾当吗？”那些人看着她，黑眼珠里充满着担心和痛恨。

“好，我们答应，”他们回答说。“我们什么都答应——只要你付了这笔钱把他释放出来。”

“我会付的”，她说，“不过这些当权的少给点也行，如果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我知道怎样同他们打交道。”

对华娟来说这整个情况是非常有趣和激动人心的——正如她读过的一些小说里的情况一样。她常常把自己比作小说中的女主角——一个掌握着皇朝命运的绝代佳人。她记忆起历史上的一些美貌女子如何采取狡猾和利用性爱的手段使得她们的家庭爬到显赫的地位并使她们的敌人遭到毁灭的。她记起了一部现代的小说中一个叛徒被枪决。那叛徒的朋友们把他的身体抢救走后发现只中了一颗子弹，而且不在致命处。他们使他恢复了知觉，养好了伤口。华娟想入非非地认为自己也可做同样的事情。她还以女色取悦当权人物——从而省下一万或五千元——她要粉碎邓的朋友，他们要对邓的入狱负责，而如果最终她的丈夫被枪决，她将用汽车把尸体运到一家医院去把他救活。

华娟着手去实现她的梦想。一天她在讨价还价毫无成果之后从监狱里回来，一面喝着茶，一面感到她应该采取一些新办法。她去到一家绸子店，买了几件旗袍料子，然后坐上人力车到她的裁缝那里要他赶着做衣服。她将穿着崭新的旗袍出现在当权人物面前。从裁缝铺里出来，一想到回家要碰到那些满头大汗白天黑夜到她家里来催促，请求她的人，就感到忍受不

了。每天没有这些烦人的来客，她的生活已经够受的了！她肩负着要营救邓的生命和省下一半贿赂钱的重任！在重重困难中，她乘车到一个水果店，挑了一篮子上等芒果。她提着芒果到一个朋友的家里，她在朋友那里消磨了一下午好几个倦人的小时，一面吃着芒果，一面诉说着她的苦楚和困难。

第二天早晨懒洋洋地起来又要去面对她的难题，但外面，全城都在传播一个消息，说邓寅初当天要被枪决。有人给华娟写了一个条子告诉她这个消息，但她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说，“这是第三次威胁了。他们只不过想从我这里压诈出那三万元钱而已！”

一小时之内南京街道两旁挤满了人。人群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街头。外国人也混在好奇的人群里。街那头过来一大队士兵——在队伍中间瘦高身材的邓寅初双手倒绑着。他光着脑袋，那瘦削而敏感的脸上流露出苍白而绝望的神情。面对着那些张口结舌的围观者，那些没有动一个指头去营救他的成千上万的人群，他高喊着：“我要给枪毙了！我是个国民党！我为革命出过力！打倒孙传芳！打倒一切压迫者！”从一条街到另条街他发哑的嗓子高喊着。

人们瞪大了眼睛看着，偶然有人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队伍后面跟着成千上万的人，挤到士兵的跟前，争着要看看一个走向刑场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密密麻麻的人群把刑场围成一个半圆形。他们以看旧戏那样激动的心情看着士兵们排成行，等待口令开枪。人们争着站到前排去以便看得更清楚。

邓寅初被带到一块空地上，后面站着一排士兵。他孤伶伶地站在行刑队面前，脸朝着张嘴结舌站在那里围观的成千上万

男男女女，他抬起了头，朝着中国这片精神上的沙漠高喊：

“打倒孙传芳！打倒压迫者！革命万……！”

一梭子子弹把他的最后一句打断了。他的身体动弹了一下然后扑倒在地上，他的头栽倒在土里。接着又打了长长的一梭子子弹。然后一名军官走上前去，把身体踢翻过来让死者的脸朝上，举起他的手枪，对准死者的嘴又打了一枪。

在人群中有人跌倒在地，不省人事。四周的人闪开留出一块空地，然后呆呆地站着看他，还发出一些笑声。没有人弯下身去扶他。有人还用脚踢踢他的腰，看看他是否死了。倒在地上的人一动也不动。一小群人围着看了几秒钟，然后又转过身去看更热闹的那场戏。……

士兵的队伍开走了，邓寅初的尸体留在那里喂狗。因为邓是一个革命党，他的尸体不准搬动。群众往前移动，眼睛仍然盯着那死者的身体，然后向四面八方散开去对亲友和家人讲述他们亲眼所见的这幕戏剧。

最后剩下一小群好奇到家的人，那个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人，还有一个两眼发愣呆若木鸡站着的人。这个发呆的终于清醒过来了。他的眼睛盯着倒在地上的那个人。他抽泣着跪到地下，把地上的人翻过身来不觉“呜……呜”地大哭起来。那个不省人事的苏醒过来了，那个呆若木鸡的叫了一辆人力车，抱起那个象瘫痪了的人，给拉走了。

转身从目瞪口呆的人群中匆匆离去的人中，有一个是邓寅初的妻子华娟。当她终于听到邓要被拉出去枪决的消息时，她打了电话要了一辆汽车。在她脑子里装的是那个小说里的故事，一个被枪决的人被他的朋友救起后又养好伤恢复了健康。

她也要以同样戏剧化的方式救活她的丈夫！但当她到达行刑场地时，她无法挤进那围得严严实实的人群中去。她听到的不是一声枪响，而是一排枪声。接着又扫射了一阵子，就好象整个部队在打仗。最后又用手枪打了一枪。一个身子趴在另一个人肩膀的人说：“嗨，这家伙完蛋了！”惊慌失措的华娟转身上汽车急速回到了家。当那司机要四毛钱小费时，她对着他大声嚷嚷：“你头脑发昏了！”即使司机坐在那里伸着手，也不给。

那天晚上，几个黑影子趁着袭击南京的一场狂风暴雨，摸黑来到躺着邓寅初尸体的地方。他们停下来，交头接耳议论了一番，抬起了一个东西，匆匆忙忙往前走去。邓的尸体被埋葬在一长条干土地上，外表上同四周的黄土没有区别。第二天新闻报道说那卖国贼的尸体在夜里被盗。南京狼狗的一顿美餐给抢夺走了。

邓寅初的父亲在邓被枪毙两天后到达了。他在南京住了一周。在最后一天他回到华娟的家中，收拾好他的行李，然后板着脸对她说：“是你杀害了我的儿子！”

华娟开始哭泣。“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姓吴、姓蔡、姓王他们一伙干的。他们把寅初引入歧途。我想要营救他……我象奴隶一样不分昼夜地奔波。现在他们可以随便指责我。我只不过是个女人，一个寡妇。我带着三个孩子无依无靠！如果寅初活着，他们就不敢这样欺侮我！”

那位老父亲等她诉完了苦，又再次说：“你害死了我的儿子！你甚至不肯拿出我寄来救他命的那一万五千元钱！”

她的眼睛都哭红了，这女人伤心地抽泣着：“现在你大概

想把这笔钱要回去……甚至要从寅初的孩子手里把钱要回去！”

那老人转身迈着痛苦的脚步离开了她的家。

华娟只剩下孤伶伶一个人了。过去经常出入她家门的那些邓寅初的朋友，现在都无影无踪了。她只好对那少数几个前来安慰她的女友诉说衷肠。她的丈夫是邓的那些赤党朋友给害死的！她一再指名道姓地提到那些人。当她的这些咒骂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后，他们一个个卷起铺盖离开了南京。

* * *

在这个时期的大历史事件中，邓寅初被害的细节已经被人遗忘了。他的名字，一个国民党烈士的名声仍然流芳千古。华娟作为烈士的遗孀和烈士儿子的母亲也慢慢开始出名了。

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南方的军队占领了南京，旧军阀的部队纷纷逃跑。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继续往前发展，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尖锐冲突中爆发了。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在南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国民党把所有人都清除出去了，留下的只有军阀，地主和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邓的许多朋友过着惊弓之鸟一样的生活。

新军阀宣布邓是他们的一位烈士并决定他的遗孀和子女有权享受终身的年金。他们给了这个遗孀一大笔钱用于补开追悼会和葬礼。当她唠叨着说这笔年金只够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之用，他们又给了她一大笔钱以便她的子女日后可以送到外国去上大学。

华娟这个遗孀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忠贞不渝的妻子而闻名遐迩，她一直毫不动摇地伴随着她的丈夫身旁，帮助他开展各方

面的工作。她也经常谈起自己过去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官僚们来拜访她，对她又是请客，又是送礼。她还被请去参加各种活动以增添政府的光荣——去完成邓寅初的未竟之业。”

有了新的官方职务后，烈士的遗孀不能再受到邓寅初的子女们的拖累。她写信给在四川的邓的老父亲，建议他将孙儿辈带去抚养。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寡妇，靠她那点微薄的工资很难维持她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她说毕竟孩子是属于邓家的。因此四川老家派了一个人到南京来，把三个孩子接回老家去了。

华娟现在可以自由地去“完成邓的未竟之业”了。为了这一艰难重任，她先去上海买了几件新的旗袍，许多外国香水，冷霜，粉和胭脂。她烫起了头发，再加上一番精心的打扮，她就可以消除过去苦难的所有痕迹。

她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以致一位年事已高的官员不禁对她投以爱慕的眼光。老头子过去曾在湖南当过官，是一名国民党的老资格党员。他的名字叫傅光川，是个巨富。华娟一想到他时几乎连心脏都停止跳动了。作为新军阀的一名仆从，当反革命开始时，他也曾参与湖南省的清党工作。当时的报刊报道“他曾在自己的区里反对过赤色分子——并实行残酷打击。”

华娟也频送秋波以回报傅光川的爱慕眼光。确实老头子曾同一个旧式的女人结了婚，但他把妻子留在湖南的老家；确实他有十个子女。但在这革命的岁月里离婚对一个官僚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此后不久，傅光川的司机告诉傅所在机关里的茶房一点内幕新闻。那茶房又告诉了另外一个朋友，那朋友又告诉了一名

低级官员。他说有时候他的上司晚上去拜访华娟，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离去！这条新闻不胫而走，最后也传到华娟的耳朵里。有一天她去拜会了那位有权有势的傅长官，她走过走廊时，许多争吵不休的职员都偃旗息鼓了。有人发出了笑声，她愤怒地转过脸去盯了一眼。到了那个月底，被她的眼光不幸而落到头上的两个人接到他们上司的通知说，他们工作做得很不好，请他们另谋高就。那个犯了过错的司机也失去了工作，那茶房也终于流落街头了。

后来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事。傅光川属下的一名分局局长到上海去过周末，看最新的电影，上跳舞厅，玩歌女。有天晚上他回到旅馆迎面碰到那个老官僚和华娟。他们刚要走进一个房间，听到脚步声，就转过身来。他诚惶诚恐地发愣了好一会。第二个星期一他回到南京后马上被召去见那位有权有势的上司。那老头先讲了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类的话，并对这个年轻人的克尽职守表示欣赏。忠于职守在新革命政权下应给予奖励。这个年轻人被提拔为该部一个主要局的局长。今后如能继续作出贡献，还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那年轻的官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并向他的上司保证为了革命和他们的国民党，甘愿献出他的生命。在任何危急情况下他的长官都可以信赖他。

接着，该部的会计开始遇到许多麻烦。开销与月俱增。该部采购供应品的上海公司方面寄来一笔总账，有时是一些假账。最近这里有两笔账要他支付。一笔是逐条列明的，包括十二条女用手绢，每条三元。第二笔包括两块桌布和餐巾，一匹绸子和一箱丝袜。

那老官僚看到这些账目惊讶不已。弄错了吧！他得调查清楚。几天以后，把会计叫了进来，给了他两笔新账。把手绢那笔账改成部里用的一打毛巾，第二笔是各类杂货的总账。在这同时，傅光川站起来发了一通小小的演说。他很高兴手下有他这样一个会计能注意照管部内的开支。正如最近蒋介石所说的，在当今的官场中这种诚实是罕见的。因此该会计的薪金每月增加四十元，今后再有贡献还可以得到类似的奖赏！

那会计对提薪表示感谢，并说他工作不是为了金钱，为党效劳领取薪水已感到很惭愧，但由于饥荒，水灾和共党在内地的掠夺，他不得不依赖金钱才能生存下去。他在将来，也将一如既往，一定继续无私地为公众效劳。

华娟是国民党里的一朵香花，能在许多方面“去完成邓的未竟之业”。有一次她在大街上面对面遇见了邓从前的一个姓吴的朋友，也就是曾警告过她的流言蜚语将会使邓置于死地，并在看到邓被枪决以后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的那个姓吴的。他现在穿着一件破西服，一顶帽子，在他的上嘴角有块伤疤，好象有人在他嘴上猛击过一拳。华娟穿着一件时髦的上海旗袍，停下来对他亲切地微笑。他却没有笑，而是带有讽刺意味地用她的全名对她说：“我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了，孙华娟！”

她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他，然后愤愤地说：“我是在尽自己的天职！”

“就同过去一样地尽职！”他指出。

华娟由不满变成恼怒了。“我听说你同过去一样仍是一个赤色分子！仍在干反政府的勾当！”

吴微笑着。华娟怒火中烧，为了显示她消息灵通和握有权力，她说：“实际上我在政府要处决的一份人名单里看到过你的名字！”

“或许你也会同过去一样充当他们的帮凶，孙华娟！”吴回答说。然后他轻蔑地从她身边走过，朝着一条小街走去。

那天晚上华娟哭了。傅光川看到他的小宝贝流眼泪就心痛。这都是因为她在街上遇见的那个姓吴的人给气哭的。吴是个赤色分子，也是使邓被捕的一个人。现在他居然又在南京的大街上侮辱她！

那老头子忿怒了。这个人得在第二天天亮之前就让警察去抓起来！但是他的宝贝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土匪而哭得死去活来。她应当有她日夜盼望的那种宝石耳环，她应当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眼泪还是不断地流着：“这都是因为我是个穷女人，又孤身一人，别人才敢这样对待我，”她一面哭泣一面诉说着。

“如果邓寅初活着，他会保护我……不过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供你玩弄的一个寡妇。你的老婆可以受到你的名誉地位的保护——我什么也没有！”

傅光川竭力争辩，说他爱她。他的老婆已经老了，是十个孩子的母亲。不过要他娶个年轻妻子面子上过不去。

“是的，”她哭泣着说，“我只是烈士的遗孀！我只配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革命，但是不配同你结婚。”

那老头走过去把她的眼泪吻干。最终他倒在她的怀抱里，满口答应她要什么就给什么。

过了一阵，华娟又向他抱怨：“人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俩

的事。但我知道谁在捣鬼，就是那个文富安教授。他想抵赖他不是个赤色分子，但邓寅初秘密地告诉过她，他是个共党。这就是他在背后造我们谣的原因！”

几天以后，一个朋友去访问文富安并警告他应当立刻离开南京，否则将作为一名共党而被捕。文富安大惊失色。他说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那也没有用，那朋友说，有鉴于谣言的来头不小，当文富安听到傅光川的名字，他就回想起邓寅初死在旧军阀手里的事。旧军阀是几十名几十名杀，新军阀是成千上万地杀。当天晚上他就乘夜车逃往上海。

华娟长为革命受苦受难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傅光川同老婆离了婚，把他的财产分给她一份，分给子女一份。他给华娟一大笔钱和他在上海的一些房地产。这些都在他跟她结婚之前办妥，因为除非这笔财产划归她自己的名下，他的子女有一天会对她拥有这笔财产的权利提出异议。她不是说他会死在她前面——她死也不会想到这种可能性！但万一他先去世，最好还是先有个准备为好。

离婚和财产分割完后，华娟走到举行现代婚礼的一张桌子旁，那老头骄傲地站在她身边，把一位革命烈士的遗孀占为己有了。发表了许多有关现代婚姻（一种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的好处以及有关一个新社会的诞生等等在这类结婚的场合经常要说的这些话。“在这桩婚姻上”，有一个人诗意盎然地高声说着，“我们看到把爱情置于革命之上。还有什么比这对中国的未来更具有希望的了么？”

有个发言的是那老头子机关里的一名年轻官员。这个人从傅光川的所有雇员那里筹集款子买了一份重礼送给他的上司。

他代表同事发表了一通颂扬傅长官在官场上如何自律的美德。
他说得许多客人连眼圈都发湿了，甚至那老头自己都哭了。

婚礼后，华娟感情深切地对前来贺喜的朋友们说：“现在我感到我可以对革命更好地效劳了！”

二十五、广州的气氛

一个幽灵在广州徘徊，它就是广州公社的精神。

五年过去了，但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军阀和政客们在他们姘妇的床上也辗转难寐，商人们巧取豪夺，似乎感到每捞一把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外国商人和领事馆的官员们回忆起成立公社的那些日子，他们的眼睛里就充满着仇恨。他们经常提到公社，并以此为他们的胡作非为作辩解。

城外的万人坑里埋葬着数以千计的工人、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曾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起来粉碎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残酷压迫锁链。三天之内在他们新建筑的街道上血流成河。在这些血泊中也有五名白种男人和一名白种女人的鲜血——他们是敢于涉足灾难深重的中国这片丛林中来的苏联人。现在他们

同中国的同志牺牲在一起，埋葬在一起。但公社在历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就同斯巴达克、格拉西、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农民战争、巴黎公社、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和十月革命一样流芳千古。

象历史上其他国家里的奴隶和农奴斗争一样，公社是从基层群众中的星星之火点燃起来的燎原烈火——这是人道主义的火焰，求解放的火焰。公社失败了，湮没在其创始者的血泪之中。反动派又取代了革命工人和农民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动派胜利了。反动势力象丛林中的野兽占领了广州，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在他们的队伍里也有白种人替他们窥测方向，出谋划策，提供帮助。在这两个对立的阵营里种族的界线都消失了。这是阶级反对阶级，旧秩序反对新秩序，反动派反对革命派的斗争。

现在反动派不必象工人们武装起来的那些日子里那样有所顾忌了。今天军阀们可以为所欲为，坐在汽车里从街面上呼啸而过，贴身警卫站在汽车两侧的泥板和车后，手里拿着左轮手枪可以随时瞄准开枪。军阀经过时所有交通规则和信号都形同虚设了。他们坐着汽车可能是去赴宴，或同沙面的一个帝国主义者喝茶，或者是去鸦片馆，或逛妓院。军阀出游全市都得屏住气息！因为他的宴请、茶会、吸鸦片或嫖妓都代表着今日广州的精神，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沙面的一个帝国主义领事官员似笑非笑地干咳了一声，然后说道：“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路枪击事件后，苏俄的领事官员指责我们开枪击毙无辜的中国人。但我总算活着看到了这一天，中国人把他们象狗一样打死在街头！”很明显

中国人打死他们，不是因为痛恨他们，而是痛恨俄国人把解放的思想带进中国来。

另一个人说：“我同白人一同乘车进城去时，看到他们在街上遇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就把他杀掉。他们在两天里用机枪扫射了四千名犯人——他们根本不问犯人的姓名，职业或是否为公社战斗过，只是一概杀光。不过这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做买卖的。”

社会局局长说：“我负责防止工会和罢工事件。但问题成堆，我想辞职。我自问干吗要冒被人背后打一枪的风险？”他总是神经紧张地搬家，不得安宁。他坐车外出时，由自己开车而让司机坐在后座，这样刺客的子弹可能会先打中司机。

国民党的一位主要官员说：“一九二七年和二八年我们国民党进行了清党，现在我们不准吸收新党员，以免共产党工人混进来——所有工人都是赤色分子！任何想入党的人都须经过仔细审查。某些机械工会的会员可以吸收参加。”

然后黄色工会，机械工会的主席走上前。他已被任命为一名政府的高官。他是个愚蠢而又反动的老头，还是叫花子院的院长。据说这也是工会官员的责任。这个老头说：“我这个院里有一百个乞丐。如果我一年能吸收五百个乞丐，十年之内广州就没有乞丐了！”

这就是他的改造社会思想！在广州就有几千个乞丐。他们象臭水坑里的蛆虫是反动社会的产物，只会日益繁殖越来越多。

这个机械工会主席在他的总部里展出了一座印刷厂。他神秘地窃笑着说：“一九二七年印刷工会站在赤色分子一边。他

们拒绝印刷任何不维护红色政权的東西。所以我们工会里的一些人就秘密利用这座印刷厂以帮助白军。”

这样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中国的一些隐藏着的事。他在吹嘘他的背叛。作为酬报，他得到高官厚禄。他和他们工会里的头头被授予警察的权力，在他的工会工人中查处共产党嫌疑分子。在工会礼堂的布告牌上经常贴有被追查人的照片：“侦破共产党嫌疑分子！赏金——”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他们企图用金钱买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头。他们除了用金钱买卖外不知有其他办法了。

一名官员说：“是的，我们必须严密监视我们允许存在的工会。他们必须向我们提供工会官员和会员的全部姓名、地址，并且执委会里必须要有国民党官员参加。我们定期搜查工会和工会领导人的家以便掌握他们的活动。

“当然不搜查机械工会，但要查看海员工会那样的组织，因为一九二七年前它是一个赤色分子的中心。我们已做过清理和改组，但仍然经常出问题。就在这几天，它们还在背后支持码头工人的罢工，要求得到一九二七年时同样的工资，但却要求少装一些煤。就在昨天一个煤炭商人的代表团来向我们求援，我们不得不派军队去促使码头工人讲道理，停止破坏法纪。法律吗？罢工是非法的——他们已经破坏法纪！……其次印刷工会是共产党的组织。现在我们在本市禁止成立任何印刷工会。”

印刷工会——它的名声仍然很响亮，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海员工会仍然使人既怕又恨。这些工会和所有工人总是商人、军阀和政客们的眼中钉。他们等着有朝一日能镇压所有的工

会。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一位中国的教授对一名调查人员说：“中国没有关于土地使用和广东农民运动的具体事实和出版物。据说，两个苏联人在中国学生的帮助下，曾对一九二七年广东的土地状况作过一次完整的调查。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可靠的研究工作。但十二月十一日白军占领了广州后，他们烧毁了能找得到的所有这类文件。苏联领事馆被洗劫时，两名外国领事发现了这些文本就给拿走了；据了解一份落到了一名中国印刷工人的手中。

“一名中国印刷工人？”

“是的，一个印刷工会会员。”

“这个印刷工人现在在哪里？”

“啊，当然他跑了并带走了那份材料。警察一直在搜捕他——如果抓到就得砍头。”

“白军为什么要焚烧这本书？”

“因为书中的事实对他们的政权不利。”

“他们害怕真理吗？”

“当然啰！”

但在中国某个地方住着一名印刷工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一份有关广东土地和农民状况的科学研究材料。一位中国工人保护着关于农民兄弟的一个真理的火焰！这就是那些为广州公社而奋斗的印刷工人。

*

*

*

一名建设厅的官员吹嘘他在领导一项“农业研究工作。”他说他已经给广州郊区的三个村子发了优良种子。他以主人的姿态视察了那三个村子。他的单位已经购买了一台抽水机。在

整个广东就此一台抽水机。而且这台机器尚未安装，也不能运转，不过总有一天能运转起来的。有了这台水泵就算是“建设”了。村里的一些农民围观着他。

有几个走上前去对他说：“你看到那个跑马场了吗？再过一个月，有钱人又要来看赛马了。那片土地是属于我们的！政府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我们三个村里的六千人只有三千八百亩地。但政府用武力夺走了我们五百亩地并把它改成了跑马场。他们总是说“我们会付钱的，会付钱的，但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有付过！他们掠夺了我们的土地！”农民们咬牙切齿地诉说着。

这就是新政府的“建设”！这就是反动派的丑恶灵魂。

* * *

机械工会子女小学的一个穷教员说：“我们这所学校里只有一百名学生——但他们是工会官员和高工资工人的子女。低工资工人的子女上不起学。工人子女根本不能上公立学校，所以我们让他们上这所学校。”

“为什么工人子女不能上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太少，此外也不是免费的。工人们付不起学费；他们的子女也没有供上学穿的体面衣服。在中国只有富家子弟才上得起学！”

“富有之家？你指的是什么人？”

“我是指有钱和有特权的人家。这个政府只为富人办学。”

有人感到吃惊地说：“但你任教的机械工会支持这个政府，并帮助这个政府掌了权！”

“我不是这个工会的会员——我是一个领薪水的教员！”

“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工人的子女能上学吗？”

“能上的——但现在富豪在掌权。工人们什么权利也没有。名门望族根本没有把工人当人看待！”

这就是一名穷苦教员神色慌张说的话，似乎想透露一点真情，又怕被人听见。

* * *

统治广州市的一些主要将领互相在争权夺利。各人都有自己的军队，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小政治集团，为他们造舆论作宣传，出谋划策。

一个集团里有留美的学生，另一个集团里则有留日的学生。一个掌权，另一个就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他们斗争的唯一目的。谁掠夺人民，是你还是我？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双方都学会了现代的词句，双方都掠夺和残杀人民群众。他们也都痛恨和害怕公社那些记忆犹新的所作所为。

广州的市长本人不是将军，只得听命于一名军阀。他自己手下的将军不掌权，但为了避免公开的武装冲突，他这个集团里的人也得到一些装点门面，没有实权的地位。所以市长说起话来总是反对那位大权独揽的军阀。

“五年来我们什么建设也没有搞！我们只有破坏！我们的多数军事将领无知无识，对技术和经济一窍不通。有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广州市每月的收入只有五十万元，但警察一项就花去了二十万元，只剩下三十万元可用于教育、公共卫生、财政和建设。我们全省的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于军事方面，而军队将领还要不断增加新的税收和强迫要求新的贷款。”

在广州市的官方统计数字中有这些不加掩饰的收入项目：“对妓女的附加税——用于筑路——五万八千元。”或许这些

是通向娼妓区的道路——需要能通行汽车的好路，适合于跑高级轿车，漂亮马车的马路。另项收入是：“鸦片和赌博一千二百二十八万五千元。”一个中国的税务官，眼睛盯着这些数字，用一种嘲弄的语气说道：

“对妓女的附加税！税收，附加税，更多的附加税。从农民家里买来的妓女，大多数早已沦为奴隶；现在还要在她们身上抽税。如果妓女不算是奴隶，而能留下她挣来的一部分钱，那未能留下百分之二十就算幸运了——其余部分则必须交给政府和她的主子。……”

“但是关于鸦片税的后一笔数字是个谎言。从鸦片上弄到的钱比这要多十倍。政府拿到这一千二百二十八万五千元，但其余部分存入军阀、官僚和商人的银行存折里。我说出真相但不愿被人引用。”

* * *

一名图书馆员说：“是的，想在广州当官的人必须要为谋取这份工作付出一大笔钱。但他很快可以从中得到补偿还可以通过中饱私囊而发财致富——只要他的帮派不被对立的军阀所推翻。有许多办法可以买到官职——其中之一是向掌权人的外妾们送‘礼’。这是很花钱的事情，因为这些大人物的外妾都非等闲之辈。……”

“主要的财源是盐、丝绸、大米、鸦片和土地税。政府采取招标办法授予向农民征税的权利。买到这种权利的商人和官员必须付出一大笔钱，但当他们向农民征税后，可以把全部支出弥补上而且还能在香港的银行里存上一笔可观的数字并在香港购置起房地产。”

这是一个中国的图书馆员对这个政权的描述。

这个政权推翻了公社同时把它的魔爪伸向了人民。这就是他们说到的那个其反动本质已经暴露无遗的统治阶级。接着他补充道：

“军阀官僚掌权后得拚命搜刮——在位两年对他们来说就算长的了。”

* * *

广州公用事业厅的一名高级官员同朋友们乘着一艘飘扬着国民党政府旗帜的游艇沿着珠江顺流而下。他挥动着手，指着珠江中的一个海岛。在岛上树林后面露出一座监狱的高墙。

“那是，”他扬扬自得地说着，“为年轻一代造的。”

“年轻一代——什么意思？”

他解释道：“这年轻的一代是彻头彻尾中了共产主义的毒。二十岁以上的我们统统枪毙了；二十岁以下的就把他们关在这里。”

“那个监狱里现在有多少‘年轻的一代’？”

“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我听说有一千六百人，后来又听说是三千。”

“你们怎么抓住这些人的？”

“嗯，知识分子，我们有时是通过学校抓来的。指示教授或教师研究所有考卷或作文中是否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如果学生有不良倾向，他们必须向警察报告。”

“他们报告吗？”

“有的报告——有的没有。”

“你认为这种办法好吗？”

“嗯，有些帮助，但年轻一代仍然中毒很深。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时，其中有些人简直坏透了。”

广州市银行行长，一个吃得很好，穿着西装，那双圆圆的眼睛里投射出严厉的目光，他是一所美国大学的产物。他也说起了这“年轻的一代”。

“我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他说，“但共产主义里想必有些很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把共产党员拉出去枪毙时，他们昂首阔步走向刑场还高喊：“我们不怕死——我们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甚至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如此！”

“你不认为中国应有这种勇敢精神吗？中国难道不需要这类青年吗？”

“得把他们枪毙掉——他们是共产党人！”

“杀了很多人吗？报上什么也没有刊登。”

“啊，是的——我们杀了不少！有时女的最坏！报界不准发表逮捕和枪决的消息……会引起人们的震惊。如果那些无知的工人听到这些共产党如何被处决了，他们又会象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起来聚众闹事。”

“除了处决以外你们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了吗？”

“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只得处决！”

公社的幽灵就这样笼罩着广州，使这个丛林里的人连睡眠也不得安宁。这片丛林里的野兽出来捕食了，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涂抹掉的斑斑血迹。

二十六、士兵们的遭遇

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入侵上海。四十多家医院里挤满了受伤的中国抵抗者。中国的学校和私人住宅也都成了特殊的医院。

医院里躺着一长排一长排的伤兵。还有更多的人倒在战场上，有的已经死亡，有的伤势太重已毫无救活的希望，中国战场的后面，高高地堆放着许多用新木板做成的棺材。上海一些医院的外面也堆放着棺材，有些是空的，有些里面装着死者。有些棺材里躺着赤身露体的尸体——因为死者的衣服也不得浪费，除非是位军官。

一位富有的中国医生的私人医院已经改成收容伤兵的地方，这位医生的名字叫做纽医生，他是统治南京的所谓宋家王朝的一位亲戚和家庭医生。在这所医

院里有很严格的阶级界线。轻伤的军官躺在单独 的房间里，受到悉心的照料。但是伤势很重的士兵有的缺腿少胳膊，有的已经神志不清，却一个挨一个地一排排躺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同志慢慢死去，听着那没完没了的呻吟声，“妈呀！妈呀！”

士兵们对得不到照料十分恼怒。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贱民，没有任何权利，但有一个义务——去死。“这里的照料会惯坏他们的，”一位医生则抱怨说。

一家普通医院的轻伤病房里躺着一排排的伤号——农民、工人、苦力们。他们的眼睛东张西望，似乎有些迷惑不解。昨天他们是贱民，今天一瞬间成为英雄了；明天他们又会成为贱民。有一排里躺着三个人，其中两个还不过是孩子，只有一个年纪稍大点。头一个是个十九岁——按外国人算法是十八岁，有着一副憔悴而又可怜的脸；第二个年纪稍大，是个典型的当兵的大老粗，由于流血过多而脸色苍白；第三个也年轻，大约二十岁或稍大一点，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他们依次叙述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1. “是的，如果你要我谈，我愿意谈。我是第八十八师的一个二等兵，祖籍是凤县，但我出生在南京。我的父亲在南京拉了二十年的人力车。我今年十九岁，我也是个拉了近十年车的人力车夫。我不会读也不会写——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读会写。

“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这个军队。我的父亲和我都找不着工作。只有我母亲工作——她是南京一户有钱人家的佣人。两年前，一位外国大人物来到南京，政府不想让他看见那些穷人居

住的小房子……是的，我想那个洋人是一位王子……是丹麦人。你说丹麦在哪里？……所有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道。一天晚上，政府派军队和警察将那位大人物要经过的沿街所有穷苦家庭的小棚屋都给拆掉。他们也拆掉了我家的小房子。

“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钱造一座新的小房，我的父亲只好把我的姐姐卖给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当女佣。我们用这笔钱造了另一座小屋，才算有了落脚之处。去年发生了大水灾，谁也找不到工作。许多乡下人来到南京拉车，有这么多的人力车夫，谁也无法靠此为生。我的母亲有工作，我的姐姐是有钱官员家的厨子，但我的父亲和我无法找到工作。我的父亲年纪大了，跑不快了，谁也不要他。

“我的父亲和我参加了八十八师。我们是蒋介石部下的军队。当日本人向我们开战时，我们师的一些部队在上海，就同十九路军的士兵们一起把日本人给打退了。我过去从未打过仗，我的父亲同我并肩作战。他现在哪里？恐怕已经被打死了。假如果真如此，我将……你下次再来时，我将谈谈——我的父亲……

“你又来了，请坐。我整天哭，因为我总是想到我的父亲。我们在闸北前线一起打仗，我差点给打死。一月二十七日的夜里，我们部队冲进日本人的防线，摧毁了其中的一部分。我猛烈地把所有的手榴弹都投掷了过去。结果那里的日本不多，他们早都跑开了，我们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半小时后，一大股日本人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打回来了。我们要求增援兵力，要求补充更多的弹药，但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已经掷完了发起进攻时给我的所有手榴弹。

“我们撤退了，我们不能在日本人的大炮下等死。我的大腿这里受了伤。我知道自己受了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是清楚的。我的父亲从他的水壶里给我倒水喝并且安慰我说，伤势不要紧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来的……接着我就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时，我已经在这里了，孤单单一个人，我不知道我父亲怎样了……谁也不知道。如果他有……我将……。”

那孩子的嘴唇又颤抖起来了，就不往下讲了。

那个年纪大些的，还有躺在这孩子旁边的那些人都默默地听着这段叙述。他咕哝了一两声，但嘴唇始终是紧闭着的，他听到过千百个这类故事了。他的手指上带着五个金戒指，有象外国女人用的那种宽边不带花纹的戒指。这些当兵的到处抢劫，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这些兵大部分是从江西来的，他们曾在那里同革命工农的红军打了一年仗。他们在城镇或乡村烧杀，无所不为。许多当兵的都带着金戒指，有宽边的，有细条的。

现在轮到那个年纪稍大的士兵讲了。

2. “你要同我谈话？为什么？你是哪国人？美国在哪里？你多大年纪了？我们的军官说，美国人会帮助我们打日本人——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允许日本人利用外国租界作基地，反而把我们赶出来？”

“我是十九路军六十师二十一旅的一等兵——瞧，你可以看到我符号上写着。我已当了十九年兵，今年三十三岁了。我的老家是湖南弋阳，家里有两个儿子。但他们都是笨蛋，他现在能帮我什么忙？”

“我十四岁就当兵了，我们家只有七亩地，不够吃。第一次革命推翻了满清，但没有给我们增添土地，只有军阀发了

财……

“我在吴佩孚、谭延闿、李宗仁和何健的军队里都当过兵。现在我在蔡廷锴的部队里当兵，我对这些军队的看法是：吴佩孚发给我们的钱最多。他给我们八块钱一个月，我每月都可以寄回家四、五块钱。他的军官不象我们现在的军官那样克扣得厉害——他妈的！现在我们是十二块钱一个月——但你以为我们拿得到吗？哎唷，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到现在已五个月了，我们连钱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们真的发给我们时，我只能拿到大约三块钱一个月——其余全都装进他们的腰包。三块钱连零花钱都不够。

“我住进医院后，他们告诉我世界各地的人都寄钱给我们——三百万元钱！因为我们在打日本人。但你以为我们看到过一分钱吗？哎唷！蒋介石他这个狗娘养的！”

“我替这个军阀，那个将军打了十九年的仗，我得到了什么呢？你看我——断了一只腿。他们可能会把我送回老家去，不过也不一定。他们会说我家里人能养活我的！但我为将军们打仗为的什么呢？正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不饱肚子嘛。”

“我记得一九二八年我在湖南何健部队里的情况。我们的连长是一个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有很长的军龄。每个士兵每月的伙食费定为六块钱，但实际四块钱就够了——他每月从我们每人的伙食费里扣下两块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那年他把我们从正月到四月的军饷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去了。后来我们当兵的联合起来要求发回我们的军饷。你以为他会发给我们吗？他抓住两个带头的，每人给抽了两百鞭子。

“师长、营长、连长都有控制财务的大权。他们对部队里

的财务保密，以便从中榨取更多的钱。旅长和团长也一样。每个军官都剋扣我们。他们甚至连我们买袜子和草鞋的钱也不发，他们买来的鞋袜每双要我们付二、三毛钱……但是这是骗人的，我们在市面上花一半钱就可以买到了。”

“我们打红军时曾在江西住过一年，所以我对共产党的情况有点了解。我说，在平等待人方面我们得佩服共产党。他们官兵之间的待遇几乎是一样的。他们穿一样的军装，领同样的饷，吃住也都相同。他们部队里的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士兵们把他们的钱存入小金库，甚至还有利息。士兵也同军官一样了解部队里的财务账目，可能正因为这样才有人对我们说他们是土匪！我是个笨蛋，因为我没有同我们部队里有些人那样去投奔他们！”

“我们十九路军从红军那里学会如何去打日本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上海这一仗中打得这样好的原因。红军中有中国最好的军队。我们和日本人可以一个顶一个，但一百个日本人也顶不上一个红军。他们是疯狂的人，他们不怕死……江西的所有人，除了有钱人外，都帮着红军。我们的军队有飞机和无线电台，但你认为我们能找到红军吗？哎呀！一整师红军开过赣南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的人走出村子十步远，红军就知道了！”

“人人都是他们的奸细。他们的妇女来到我们的营地，哭着说她们是难民。其实她们是来搞情报并在我们之中作宣传。我们的军官抓住了三个这样的妇女，发现她们是红军里的护士。她们是十五、六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这三个人带到了上海。我们的军官把她们留在司令部……干什么？哎呀——他们

需要女人。知道吗？如果你想看，你到市区就可以看到那三个姑娘。

“在共区里监视我们的不只是有男有女——甚至还有儿童。有一天我们正在兴国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吃饭，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突然来到我们面前，用恳求的口气壮着胆子说‘给我们一碗饭，白军兄弟。我们有三天没有吃饭了，因为我们的房子被你们给烧掉了，我的爹妈都已逃跑了，也不知道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我们的军官发现这个儿童是个奸细，就杀掉了他。他是一个多么聪明伶俐的孩子啊！他们要杀他时，他也不害怕，看到他我就想到我那两个儿子……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但他们都是笨蛋——现在他们能给我帮什么忙？哎呀！”

“我们的军官下令要把这里的一切全烧光。我们就把兴国三百里以内烧得精光。接着又命令我们把村子里的人都杀掉。他们说这是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我们就执行命令。我们把农民留下来的所有鸡猪和牛羊都杀掉吃了。我们把他们的稻米收割来吃掉了。老百姓恨死我们了。我们进去时，他们早已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跟着红军一起后撤了。谁也不帮助我们。他们甚至连口水都不给我们喝，并且还在撤离之前往井里和河里放入毒药。我们有很好的飞机大炮，甚至还有毒气，但我们害怕他们。我们翻山越岭行军时尤其感到害怕。山路只有三英尺宽，一连好几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规定行军时不少于四个连一起行动。两连充当先锋，其余殿后。如果我们是小分队行动就会遭到农民的突然包围，还会被缴械。即使我们大部队行动，有时红军也会从那寂静的山林里突然出现，象潮水一般冲向我

们，把我们分割包抄各个歼灭。

“他们把枪支看得比生命还值钱，所以在队伍的前头是拿着锄头、斧子、红缨枪的农民，只有少数几条枪。后排的枪要多一些。走在最后的是每人一把步枪还有一把手枪的人。到了这最后一批接近我们面前时，我们已经有点厌战了。武装人员就可以缴获我们的枪支弹药和机关枪。我们就得撤退，否则就会被俘。我们从未缴获过他们的枪，但他们缴了我们许多枪。他们对政府军有种讽刺的说法：‘给我们送弹药的运输大队来了！’他们就这样嘲笑我们。

“在江西人人都会打仗，他们有非常好的组织。他们的组织很管用，即使我们占领兴国好几个月了，他们仍然秘密地控制这个城里的政府。我们总是提心吊胆。进出县城的每个人都要受到检查，得有一份特别的通行证。我们杀了他们许多人，但共产党仍能知道我们做的一切，仍然控制着这个县城。挑菜进城来的小贩也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这个城里的所有人，除了富人以外，把我们的一举一动，有多少枪支弹药都告诉了他们。

“红军非常会做宣传，他们到处办学校。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村子里他们也办起了小学。到兴国的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小茅屋里的学校。尽管他们很穷，却有许多书和标语。他们的目标是把每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他们出版他们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在每一页上都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内容。我们部队里有些认识字的有时会念给我们听，但我们的军官下令要把这些书烧掉。我们总是捣坏并烧掉他们的学校，因为我们的军官说它们是红军的中心。”

“有时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些歌本，我还记得一首歌中的几句，大意是：‘蒋介石，你这个卖国贼！你把广州的工人和农民都骗了！’另外一些是歌唱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有一首叫‘国际歌’——那是颂扬全世界穷人的歌，有时我们设法把这类书和歌本塞在衣服里保存起来，但如果被抓住，就要被枪毙。

“红军到处都留下大标语以便在白军里作宣传。他们把传单和小册子撒在我们经过的路线上。我还记得他们一些标语口号的内容：

“你们为谁打仗？”

“士兵不打士兵！”

“穷人不打穷人！”

“你们为什么要打工农劳苦大众？”

“你们打仗——你们的军官尅扣你们的钱！你们送命——他们活命？”

“在他们的传单里写着有关工农苏维埃政府的许多情况。这些传单上说红军里的每个战士都分到了土地。他去打仗时，别人替他代耕。这是真的，我们亲眼见到过。每个农民和战士都分到了土地，并在木板上写着该农民或战士的姓名和苏维埃分给他们多少亩地。我们到处都见到这种木板。

“他们抓了许多我们的士兵，然后放一些回来向我们说红军里的情况。他们对待普通士兵很好，但要杀掉我们的军官。当他们抓住一个士兵就同他说话并要他参加红军。如果同意，他会得到象其他人同样的权利。如果他不愿留下他们会发给他路费和一张在苏区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这样一张通行证，他就无

法通过赣南，因为这一带人人都是红军，各村和所有路口都有红军的巡逻队。但如果有了这种通行证，他们就会提供帮助，发给免费的食物。”

“我们的指挥官对红军的宣传非常不安，因此蔡廷锴曾多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拨款以补发我们的军饷。有次我们在一个星期里就发了三次钱。然后他们假装也相信平等，我们的军官曾经来同我们当兵的一起赌博。他们对红军关于平等的宣传很害怕。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是在白区。现在他们又对我们神气起来了，动不动就说：“往后站，你这狗崽子！”

“我们的一些人不太愿意去打红军。有一天，我们在前线打仗，大伙都不积极。我们的团长来视察了，他要我们鼓起精神。我们的一个同志问：‘你命令我们去打谁？’那团长大发雷霆，就下令把他枪毙了。我们谁也没有执行命令。后来我们这个同志是在司令部里给秘密处决的。有时我们的军官还把被红军抓走过又放回来的士兵枪毙了——他们说他们是作为红军的代理人给派回来的。

“有一次我们的另一个团在前线打仗，天渐渐黑起来了，他们的司令长官命令他们卧得更低些，把机枪对准红军的阵地，保持沉默，不能出声，一听到命令就开火。他们默默地等着，过了一会，他们从很近处听到女红军喊话的声音。在黑夜里他们朝着我们喊着：“白军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们工人农民啊？我们是在为你们的利益而战斗——到我们这边来吧！”

“‘开枪’！军官发出命令，但没有一个开枪的，军官就象一条疯狗那样发怒了。当兵的说那可能是鬼的声音。哎

呀！他们知道不是鬼而是红军的声音！那声音不停地喊着：‘过来吧！白军弟兄们——我们是穷人，你们也是穷人，我们是在为你们打仗！’

指挥官大声喊叫要当兵的开火，但他们非但没有照办，反而转过身去把他杀了，然后直奔红军而去。他们带走了自己的步枪和子弹，还有一挺机枪。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此后我们的军官变得很紧张了，×他妈的祖宗！现在离开红军了他们感到很高兴！

“我们现在是打日本鬼子。这不象在江西那样，人人都帮助红军。这里的老百姓都帮着我们。现在我明白为了什么——我们是在为人民打仗，但在江西我们打的是反对人民的仗。哎呀！我现在明白了，但只有一条腿了！现在他们会发给两块钱打发我回家去！我保住了一条腿……我们的军官则中饱了所有的钱！”

第三个当兵的插话道：

3. “蒋光鼐的太太（十九路军总司令的夫人）到这里来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桔子，想笼络我们，”他们把人家捐给我们的钱拿走了，却用几个桔子来糊弄我们。如果他们付给我们五个月的饷，我们就有钱买吃的粮食和穿的衣服了。他们拿走我们的钱还要变了法子让我们去感谢他们给的几个桔子！

“我打过七次仗，这是我第五次受伤。瞧——这是我为李宗仁将军挂的花。日本人在我脸上留下的这块花一辈子都抹不掉了！民国十八年我替李宗仁去打陈济棠，可我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这两个将领现在是朋友了，但李宗仁欠我六个月的军饷，我想是给他拿去买烟抽了。”

“大军阀之间打仗是开玩笑，他们今天是敌对的双方，要我们去为他们打仗，但明天他们又变成朋友了。我们今天是他们的兵，明天又是他们敌人的兵。从民国十五年起我就当兵了。

“我记得当年汪精卫在武昌做过一次重要演说。他用很高的声音反复讲了好几次，说他决不帮助新军阀，并将同他们奋斗到底，一直把蒋介石打败为止。我信了他的话就去打蒋介石，但现在汪精卫是蒋介石的走狗了，蒋任命他当行政院长。汪帮助蒋向日本人讨价还价。他们不给我们派增援部队和弹药……

“我老实告诉你，我认为：过去的牺牲和流血都没有意义。从现在起我想再也没有人能命令第十九路军去打我们自己的同胞了。他们让我们去打江西的共产党——但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是今天跟这个将军，明天跟那将军翻来覆去来回变。除了政府官员和有钱人外，全体人民都支持他们。在江西我们看到人人都是共产党。我们知道谁对谁错，但我们当兵的太听话，不敢反抗任何人。我们只注意钱。”

第二个当兵的插话道：“我们为什么不要钱？我们参加军队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或那个将军吗？如果我们有钱的话，你想想看我会断了一条腿躺在这里吗？”

第三个当兵的谈了他的观点：

“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想到群众的利益。你还记得江西的人民是怎样组织起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吗？你认为他们是出钱让他们替党牺牲的吗？你还记得替我们当过两天向导的那个农民吗？当我们进村时，他正在地里刨地。他说红军经过时我躲了起来，现在白军来了他就可以耕地了。我们的军官让

他当我们的向导，他是怎么带路的？他把我们领进了无路可走的山里，我们得不到吃的和喝的，后来我们的军官把他吊起来，说他是红军的一个奸细。

“我是共产党员！”他很自豪地说：“杀死我吧，人民的敌人！”

“军官们把他割成碎片扔在那里。说心里话，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并不坏。无论男女，甚至小孩都这样为之奋斗牺牲！”

“在江西人人都恨我们，谁也不会给我们食物和水，没有人看护我们。但江西的所有女人都帮助红军烧水做饭，并当他们的护士。我们的人生病，只得躺在路边等死，但红军里不一样，他们不自私自利，而是为群众打仗。红军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南京政府不相信这句口号所以对红军开战。我老实对你说，谁也不能使我再去打共产党了！”

四周的伤兵都在听着，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似乎都在思索、比较、考虑。

二十七、拿活人当靶子

日记摘抄。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两位德国朋友从豫北旅行回来，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是去洛阳参观那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佛雕的。驻守洛阳的六十八师派了八名士兵作我们的警卫人员。我们一起站在龙门的一个小山坡上眺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田野，当兵的看到田野里男男女女的农民弯着腰在锄地。其中一个就说：‘我敢打赌，我的枪法比你们谁都强。’

“牛皮已经吹出去了，所以他就举起枪，把枪托顶在肩上，对着在地里劳动的农民的手指瞄准。地上飞起一片尘土——没有打中。那伙当兵的就嘲笑他那蹩脚的枪法。接着他们一个挨一个地举起枪把农民当

活靶子碰碰自己的运气。农民们一片惊慌，抱头四处逃窜就如一群惊弓之鸟。当兵的看到那些活靶子听到枪声后惊慌失措，丧魂落魄的样子，个个哈哈狂笑。末了两个当兵的走到我们跟前，递给我们枪，要我们试试枪法。我们是外国人，他们想看看是不是外国人的枪法比中国人要来的强。”

这两位德国朋友为人诚实可靠，所以我对他所讲的这段故事的真实性，深信无疑。

* * *

一九三一年四月三十日。上海最大的一家英国报纸大言不惭地说出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实行控制的思想。消息是这样写的：

“美国水手同英国和日本的水手一道在长江上游每天以活人当靶子练枪法，这些在长江上的巡逻队将会成为海军里的神枪手。汉口以上长江沿岸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使航行在从汉口到宜昌和重庆的这段航线上的每艘轮船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消息就公然这样写！那末反过来，在纽约或伦敦的一份中文报纸是否也可以发表以下的一则消息：

“中国的水手同菲律宾和印度的水手一道在密西西比河和泰晤士河沿岸每天以活人当靶子练枪法，这些在密西西比河和泰晤士河上的巡逻队将会成为海军中的神枪手。这两条大河沿岸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使航行在这段航线上的每艘轮船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 * *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一位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中国航空邮包的飞行员对我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两天前我降落在汉口的一个停机场，照例有一些武装士兵前来守卫。飞机场就建筑在农田的旁边。机场四周没有筑上篱笆，但禁止农民在机场上穿行。不过我不知道农民是否知道禁止通行的规定。

“我看到两个农民从他们的地里朝机场这边走来。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挑着一副重担。显然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就抄近路越过机场。站在我飞机旁边的两名警卫没有发出一声警告，举起枪就向他们开枪！一颗子弹打在一个农民的脸上，另一颗打在挑着的担子上。两个农民惊恐地站住朝我们这边张望。当兵的破口大骂着朝他们跑过去，手里提着枪。那两个农民放下担子，发愣了几秒钟，然后拔腿就跑，丧魂落魄地逃窜到田野那边去了。两个当兵的跑到担子旁边，用刺刀挑开盖子，在里面查抄了一番，然后将不要的东西点上一把火烧了。”

那位飞行员从座椅上站起来，用眼睛凝视着前方，似乎在看他所讲的那个场面。接着他又往下说：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类事情。两个星期以前，当我准备离开时，又看到一个挑着重担穿越机场抄近道的农民，一个戴着有国民党帽徽的帽子，穿着一身漂亮的卡叽布军装，系着武装带，穿一双高筒靴的中国军官站在我的身旁。他没有带枪，怒气冲冲地吆喝着朝那个农民奔过去。

“那个挑着一副重担的农民转过身来看看。显然有点莫名其妙地站住了。农民见到军官来势汹汹，就放下担子，往后退了几步，转身要跑。那军官追上去一把抓住了他，二话没说就用他那沉重的皮靴往农民身上踢。那个农民光着脊背只穿有一条短裤，头上没有带帽，脚上没有穿鞋，可以想象，那军官

的靴脚踢上去有多重。

农民被踢倒在地，军官就朝在地上打滚的农民身上踢。那可伶的农民爬起来又被踢倒在地。我不知道要踢多久才能把人踢死。军官没完没了地踢着农民，直到他躺着动弹不得为止。他似乎再也吃不消了。

“军官拍拍身上的尘土，在机场旁边的草上擦擦他那双皮靴，他为了行使“职权”累得满头大汗，走回到我们身边……我看完了这一幕，然后准备起飞返回上海——但虽然半小时过去了，褐色的土地上仍然留着那个黑影子，那农民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

* * *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一位参加“剿共”——即南京的军阀及其帝国主义帮凶对内地工农革命军队的战争——的中国军官昨天对我说：

“要消灭江西的红军事实上不可能。所有农民都是赤色分子，即使我们占领了村庄，烧掉房子，人们等到一有机会还是去投靠红军。通常大多数人都跟着红军跑了，少数留下来的不是别的，都是奸细！”

“我们的许多高级军官现在说，要消灭赤色分子的唯一办法是把江西的男女老少杀个精光。我们要将所有的村子和地区包围起来，投下毒气弹。那当然要杀死二千万人——但我们可以将西北灾区的农民移到江西来。”

另一个在听这位军官说话的中国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为什么你们不把要杀掉的这些江西农民分批运送到人烟稀少的西北灾区去垦荒呢？”

那位军官回答道：“那太危险了！那里离苏联太近，他们准会去投靠苏联人，不行！要消灭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江西的最后一个农民。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防止其他地区受他们的思想毒化。”

几天以前一个胖子朋友，南京财政部的一位顾问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个人是在上海一家帝国主义刊物的编辑，他靠财政部给的“津贴”发了大财。他说道：

“解决中国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是干脆把江西的全部人口统统消灭光！”

有一人插问：“那以后怎么办？整个省都没有人烟了！”

“对，以后重新出现的农民就不会是赤色分子了。”

上海的反共刊物《剿共》双月刊，在二月号那期里以下面的这段话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如果政府无法找到比目前所采取的更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得采取将红军势力很强的所有地区孤立起来，用毒气弹把他们统统杀光。”

一位从事反共宣传的国民党官员对我说：

“在这次同江西红军的战争中我们抓到了几千名赤色分子——但他们只不过是农民！”

“你们怎么处理他们？”有一个人问他。

“啊，当然是杀掉了——因为，你要知道他们都是赤色分子！”

“他们本人就是红军！我们做什么也不起作用。我们在军队里派了国民党宣传人员，每人带着小册子和传单，还有自卫的手枪。他们走到那里都给当地人民散发小册子和传单但不产生

效果。所以我们唯一可行的就是采取其他手段。

“在有些苏区里我们把留在村里的人抓了起来，要他们人人都来登记并保证过去没有帮助过红军。那些能够找到地主、商人或其他有身份的人作保的就发给一枚证章，证明他没有问题。其余的都杀掉。我们对全区课以重税还要让当地的全体人民认购反共公债。我们要强迫他们支付剿共的费用，让他们把所有的土地退还给原来的主人，恢复过去的旧秩序。采取这些手段是使他们的头脑清醒清醒！”

以上就是中国统治阶级集团中，中国和国外的决策者用以解决产生工农红军的土地问题的“建设性”思想。

二十八、南京的现实和 梦想

在南京古老城墙的里面有一座高山，山顶上有座庙，庙里的和尚开有一家茶馆，从这山顶上放眼眺望，一望无际的青葱翠绿尽收眼底。人总得生活。在这家茶馆里你可以看到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南京融合在一起，同时还可以幻想出未来的南京。

通过茶馆的两侧你注目远望可以看到宽阔田野那边象龙蛇飞舞一般蜿蜒起伏的三十二公里长的古老城墙和那碧波粼粼的玄武湖以及东北方向筑有明太祖和已故孙中山陵墓的紫金山。在城墙外北面，扬子江边的下关是烟囱林立的英国工厂，谁也不准去那里调查该工厂二千名女工的情况。有时你可以看到一两个美国人在旧城墙上走——据说他们一天就可以走完全程。茶馆里的中国人悠闲地看着他们。如果美国人能

在步行方面创纪录，富有的中国人也可以在坐功方面创纪录，更不用说磕瓜子了。

黎明似乎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那些悠闲自在，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茶馆里的中国人也沿着古老的城墙去跑步了。因为南京已经变得美国化了，穿长衫的改穿灯笼裤，磕瓜子改成抽香烟了。

那个认为要取得这种奇迹的绅士是今天在南京掌权的人物。他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政客，说起英语来带有美国音。通常他是一个地道的基督教徒，他对帝国主义者非常温顺，尤爱美国。他预言美国那种摧毁工会代之以“公司工会”的做法是中国最理想的楷模。

除了前北洋政府的老官僚外——他们已经移居南京并在现政府里占据了官职，同时也把他们的长指甲和腐朽与低能带到了南京——南京的大多数现代派熟悉美国的歌曲，美国的历史，写出的英文比中文还要好。这位现代派总是到上海去过周末，“休病假”兼做买卖。他的家实际上是在上海，那里有他的买卖，还可以做股票和证券的投机生意；如果不做买卖，上海仍然是长江流域的中心，市中心则有夜总会，跳舞厅，妓院，赛狗场，跑马厅和证券交易所的黄金美钞交响乐。

这座十七世纪的南京城对这位现代青年来说：一如既往，毫无变化。或许更差了，因为这里曾经不止一次成为有过一百万人口的繁华的京城，而现在却只有五十万人口，并且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上。南京也同其他许多中国城市一样，觉得广大长江流域里的财富好象是滚滚流入大海的长江水都被外国人控制和占有的上海给吸走了。帝国主义上海的巨大影子笼罩着整个

华中，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使人民的生活陷于黑暗和贫困之中，无孔不入地指挥着政府官员们的思想和行动。

旧南京是在该城的最南端——越过宽阔的农村——几英里的农田和四周树叶成荫的池塘——越过马可·波罗提到过的旧鼓楼，越过金陵大学周围用灰砖盖成的“高级住宅区”。中山路广阔的碎石路以南一带的街道又窄又不卫生，两边没有人行道。街上行人，驴子和车辆争先恐后，混乱不堪。市内沟渠纵横交错，有些是露天的污水沟。一排排临街的一层楼木房门前不是摆摊就是开铺。天黑以后，店里就亮起一盏昏暗的电灯或一盏灯笼，那微弱的灯光使店里呈现出一点发红的光亮，这些店似乎整天开业，也没有星期日。这些店既是做买卖，开作坊，相互交往的场所，也是做饭和吃饭的地方，到了晚上全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有的小孩和男人还在门口蹲着或站着，安详地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这个大千世界。

店里的人可以一边揉着面，一边看街上的热闹。如果街上灰尘飞扬在馒头或其他食物上积下了厚厚的一层土，他就会用那种世代相传的老办法，拿起一个鸡毛掸子掸去尘土。在一家成衣店里，一个男孩手里提着一一条裤子，唱着价钱高声叫卖；看到过来一个外国人，那叫卖声立刻停住了，好象嗓子眼里卡住了一个土豆。另些商店里有的坐着缝纽扣，织蓆子，编筐子，做供人力车夫用的草鞋，还有用非常准确和娴熟的技巧在做木雕的。这种能工巧匠曾经创造出古老的中国艺术的奇迹。

街上是一片卡嗒卡嗒的织布声，一排排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利用老式的梭子在织布，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每月可挣四到八元钱。偶然在简陋的小土屋里，可以看到穷苦的老妇人用

古老的手织机在织精美的织锦缎以供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太太或先生们享用。另一些房子里，有的在做棺材，有的光着脊背抡着大铁锤在使劲地打铁，从那红得发亮的铁块里飞溅出一片火花。在小巷子里有时发出旧式中国学校里的喧闹声，孩子们在齐声朗读课文。南京城的一个区里有一些中国的老房子，里面是训练国民党工作人员的地方。

你越往南京城内的南面走，环境就越加原始。小巷里是泥土路，两边是用破洋铁皮，蒲蓆和破布连起来象狗窝一样的小土屋。土屋的门前妇女或姑娘们在钉纽扣或缝鞋底——这些是从大商店里承包来的，一天只能挣几个铜板的活计。她们的丈夫大多是拉人力车、推独轮车或干其他重活的苦力。这里还有种老规矩，有的苦力只须付几个铜板就可以把小店和旅馆里的剩饭剩菜拿走，他们的孩子都是皮包骨头，有的刚生下来就夭折了。这里的贫困是无法形容的。实际上除了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外，整个中国都笼罩着贫穷，这里只不过在程度上更严重些罢了。

这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两极——一端是那些勉强可称作是人住的小破土屋；另一端是金碧辉煌的银行和掌握着上海命脉的中外人士的豪华住宅。

旧南京的有些情景是鲜为人知的。在小土屋的后面有一块空地上，有个人每天用竹杆和布搭起一个大棚。在这个凉棚下经常蹲着二、三百个男人和孩子——人力车夫、劳工、清道夫、小修小补的人——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人，他们付上一两个铜板就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默默坐着，颇有兴味地瞧着面前的那个人。

这人是个专业的说书人。他身材修长，五官端正，穿着一

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衫，风度翩翩。他口若悬河，配上端庄自然的动作更显得有板有眼。他的声音随着伴奏音乐忽高忽低，抑扬顿挫；有时在故事里插进一段歌颂主人公的唱。他一手拿着一副莲花板，一手轻轻敲打着小鼓。他不是用梅兰芳那种尖声的假嗓门唱，梅兰芳是个名气很大而富有的演员，主要是为了取悦中国的封建遗老遗少、日本皇宫和美国富翁们。这个来自群众的说书人是用清新悦耳的天然声调唱的。他的说书艺术可以使盛行戏剧的欧洲甘拜下风。他说的古代历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个个义深情长，英勇无敌，加上背景气氛的烘托，忽而风云突变，忽而鸟语花香，听得苦力和士兵们乐不可支，忘乎所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在这古老的南京，有美好的事物也有痛苦和不幸；繁重的劳动中也有片刻的闲暇，也还有可以逗人一乐的东西。这里的人无论男女都爱打听，看热闹。要证实这点，你只需在一个街角停下来，给人递过去一张名片向他问路。不用一分钟就会围上一大群人，名片从这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不是因为他们能帮忙，甚至他们连名片上的字都不认识——但如果要想知道点什么，总得先看看；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洋鬼子是什么样子的，他想干什么，必须要围上去仔细看个究竟，就象一位动物学家研究昆虫一样；不是抱有敌意，也没有偏见，只是客观而又认真地默默看着。正如一位动物学家看到一个昆虫转过身来朝他笑笑，会感到又惊又喜那样，这些人看到外国人转过脸来对他们笑笑，也同样会感到又惊又喜。

这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会停下来打听消息的习惯，使得报纸在十七世纪时的南京就没有必要了。如果报纸落到一

个普通老百姓手里，他会把它带到有很多人花上一个铜板在喝茶的茶馆里去。这时聚在茶馆里的人就会看透那些现代编辑们的无知，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但茶馆里什么都知道，在大街上什么都可以打听到，消息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传播开去。

他们知道有关军阀官僚的最新的桃色新闻，例如南京市市长在同他的女友结婚之前送给她十万元钱；蒋介石的夫人去年冬天买的狐皮大衣；他们也知道，我这个外国人住在一家中国破旅店里，会见过什么人等等；所有这一切他们都了解得很详细。他们知道有天早晨六点我在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的情况下离开了旅店，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又是街上空无一人的时刻回到旅店。当我在附近商店里付钱给苦力时，突然间从黑暗处走出一群人围着个灯光昏暗，由一个孤老头开设的铺子。这开店的站在门口告诉这群围观的人我什么时候离开，去过什么地方，我是何许人等等。这群人默默地听着，然后转过身来象看动物那样看着我。因此他们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

假如你是个急性子的，就不宜呆在这古老的南京。比如一个妇女坐在门口缝衣服，她的一双脚伸在大街上，你得绕着她走；如果有人在她商店门口晾着裤子，你就得拐弯绕过去，一个乞丐四脚朝天睡在马路正中间，你只好绕道走；如果有人牵着他的猴子到街中心去打滚，交通也会停下一阵子，这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些掌权的政客说，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或者说他们正在改变这种面貌。但如何改变，例如城里的一幢深宅大院里有一座美丽的古庙，庙的两边在建筑两座方形的象工厂一样的楼房，窗户也全是方形的。或者再往前走，坐落在紫金山麓的庄

严肃穆的明孝陵也正在修建。有的建筑物上精美华丽的中式老窗户已经改成工厂里的那种四方形玻璃窗。古代的玉带桥现在看上去象是一个咖啡厅的入口处。甚至由美国培养出来的建筑师设计的中山陵都可以用作展览芝加哥标准石油公司的产品。

南京的政客们还决定要把古老的城墙拆掉，夷为平地。劳工们已开始在工作，有时使人感到似乎整个国家也得把它夷为平地。后来，几个美国设计人员出面制止了。市设计厅忙于提出各种设计方案竭力要将南京建成一座可与上海媲美并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现代化城市。

顾问人员——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对这项所谓“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当然是非常兴奋。他们说这里的城墙可以建成“世界上最古老、最长、最高的城墙，同时还能从城楼上看到“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色！”南京可以成为一座模范城市，一所具有中国式建筑而不是灰色呆板的那种所谓现代建筑的城市。城墙内外的建筑要有着眼于今后一两个世纪的未来眼光去构思设计。建成后的“大南京”就象“大纽约”一样，要扩展出二、三百平方英里的范围，要有一个供水和排污系统，五个民用机场，从长江底下筑隧道同京浦线和已经在规划的京广线相联接。紫金山可以改建成一个国家公园，筑起盘山公路，公路沿线可以建起供“富有阶级”居住的别墅。他们十分自然地想要住在离那拥挤的市中心远远的地方，在市区里的穷人则只好听天由命不得不在那里拥挤了！

这个计划蓝图的核心是，新南京将根据美国和中国的设计家的蓝图进行建筑，而这些设计家的出发点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世长存的。另一个已在付诸实施的中心思想是没有人说

出口过的；但是军阀、官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们已把南京市里最有利可图的一些临街地面统统都买下了。

国家公园已经种上了树。城外的一个庞大军营将要花费三千二百万元建筑费用，但蒋介石已经批准拨款。另外五千万元将在五年内用于改造城市。钱来自更多的税收——向农民征收更多的税。但不为改善农民生活花费一文钱。

新南京将成为模范城市，据说它将对上海的一个打击。也许会这样，但也许还有更快更有希望的办法使中国现代化。至少全国各地的中国人会这样告诉你的。他们指责高级将领们的豪华生活和他们妻子的社交活动；他们声称，由于军队花了如此大量的钱，就没有钱干其他事了；并认为如果不是为统治国家的将领和他们的军队，政府是希望向美国借款并由国民收入偿还的。他们还保证中国的革命并没有结束。

天空中充满了不祥之兆。南京及其他城市的街道上布满了士兵，成千上万一班班、一连连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他们装备有冲锋枪、手枪，准备随时射击。甚至他们的手指就放在扳机上，只要一举枪就可以射击。这些士兵沿着大街，每隔五十或一百英尺布着岗哨。

有一次我在两排士兵中间走过。我问一位军官，士兵们要对谁开枪——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将领、鸦片走私犯——还是工人和农民？他似乎不喜欢这个问题，我也就不便再追问下去了。

二十九、攻克上埠

在赣南，上埠这个名字对当地百万农民来说简直就是个恶魔。不错，在江西省其他地方和其他省也有这种四面围着城墙的城市，但这一情况并不令人宽慰。因为城内住着大地主，它们是十八个有权有势的豪门望族，拥有周围几百个破烂村子里的几十万亩土地。

住在城里的地主和他们的家族总共有三千人。他们是地主、银行家、放债的人、地方官和税务官、商人、国民党员和商会会员，他们家的人则是民团或民兵的军官或警察。除这些家族外，城里还有两万多人。这两万多人也和其他地方的千百万农民一样，只靠这十八户豪门望族的恩赐下苟延残喘。

这些家族中最有钱的住在一所深宅大院里，里面有一进进的四合院。家里老老小小几十口人阖家住在

一起。屋顶上的滴水嘴造成龙或其他怪兽形状，显得很华丽；象城堡一样的又白又高大的外墙上则装饰着各种图案和色彩。这里有雄伟的祠堂，祠堂里供着地主家五十代先人的牌位，祠堂前还竖立着历代中举、当大官的人的石碑。

这些大家族统治着上埠和上埠的一切。有五个城门的坚固城墙保护着他们。在动乱年代，譬如在一九二六和二七年农民组织农会时，城门口就架上机关枪，民团则守卫在城头上。后来，反革命势力背叛了大革命，在南京成立了政府，上埠的地主就从南京、上海或赣北的大城市吉安、南昌等处获得了机关枪、新式步枪、子弹和其他武器装备。城内地主开办的小兵工厂原来只有一些修理步枪的设备，现在厂里的工人甚至能造单发步枪了。

城外的农村里种三种主要作物：鸦片、黄菸和水稻。对地主们来说，最主要的商品自然是鸦片了。他们就是靠着它发财和掌权，靠着它把孩子送到南京、上海和外国去念书，并靠着它外出遊山玩水。鸦片，使他们在政府中获得了现有的实权地位；鸦片使他们每人能讨上十个到三十个小老婆，使他们家拥有大量女奴仆、盖房子造祠堂。而种鸦片的则是种他们地的几十万农民。他们当中很多人也沉湎在这一令人忘乎所以的烟味里。有些村子全村的男女老少人人都抽鸦片。

大地主家的房子极为富丽堂皇，因而很自然，村子里的房子就只能是用烂木头和土石堆起来的小破房，四周围着生了锈的洋铁皮和破布。村里的路实际上就是排水沟。一些猪和头上长着疥疮，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在里头嬉戏。债务就象一具几百年的僵尸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

虽然农民从前也有过地，但现在有地的却极少了。近年来征税一直非常重，还有无数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年饷。虽说这些赋税都由地主缴付，但他们却用增加佃农地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农民作为地租付给地主的农作物往往达到百分之五十，甚至高至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农民们没法靠剩下的收成维持一年的生活，不得不借债，而借钱给农民的债主就是地主自己。由于农民越拖越无法保证还债，利率就飞涨起来。这样，如果一个人借了二十块钱，他到年底要付的利息就有五至十倍，以致他根本付不起。他那一小块地就落入地主手中，他的女儿就成了地主的家奴，他自己也就成了长工、农奴、甚至真正的奴隶。

鸦片麻醉了許多人，使他們不知忧愁，但也有不被麻醉的。这些人就被叫做“坏人”。在动乱年代里，就说他们是“肇事分子”。所谓“肇事分子”，就是说他们还一直想念着一九二六和二七年的农会，说农民必须联合起来反抗地主。

看看上埠周围的农村，简直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它们就象是病人的一场恶梦，似乎只有作牛当马的人才能生活在这样的深渊里，甚至连牛马畜生也活不下去。对此农民们的黑眼珠里充满着忿怒的火焰。这些农民都是“坏人”。上埠城墙上就常常悬挂着许多这种人的头以儆效尤。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九年春，〔原文如此一译注〕中国红军首次向上埠这一据点进军。消息传来，说几十里外有个叫麻凹池的小镇落入了红军之手，那里所有的地主都给杀了。

这个消息给上埠的地主带来了一阵恐慌。他们马上开会，派人连夜赶赴吉安、南昌，再到南京、上海去购买枪支、军火

和无线电器材。其余的人留在城里作防守准备。另一些人开始行动起来。就在当天，他们的手下人就到附近一带村子里去贴告示。

告示说，根据已故敬爱领袖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政策是以关心人民生活为其宗旨。因此地主们以仁慈为本，宽大为怀，决定把地租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降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告示结尾处说得天花乱坠，最后还盖着一颗大红官印。

当晚，农民们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还加上大量酒的刺激，因为地主还把大坛大坛的酒送到许多村里去。他们还把猪送到另外一些村里去，以备第二天宰了作庆贺之用。

但第二天，上埠地主的手下人又到各村去张贴新告示。告示说，一股沿路杀人放火的匪军快来了，愿意参加打土匪的身强力壮的人要进城去；其他人紧闭家门，不要外出，或在土匪来时逃进山里去。

几千农民进城去了。大批农民逃入山中，惊恐度日。另外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小茅屋里等着，也不管土匪从哪来。还有一些人思考后，认为他们反正没有什么可丢的，因为他们有的那一点点早就被地主拿走了，所以他们就敞开门，好奇地注视着四周小道，看土匪是不是真的要来。因为说到底，地主从来就是骗人的，而且他们自身就是匪徒！

“匪军”来了，可能有四千人，还举着大红旗。这支军队开进了村子，可它不抢不杀，还到处走走看看，并开始召开群众大会。它甚至还向闭塞的农民宣布说，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进军上埠，是来执行消灭地主、解放农民的特殊使命！它甚至

还动员农民加入工农红军！

村里有些“坏人”马上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工农红军。还有许多从别的村子跑来的农民。他们当中很多人开始问红军：消灭了地主之后该怎么办？万一白军从西边赣州开回来，会不会又象两年前那样在上埠城墙上悬挂起许多参加过农会的农民的头？红军能留在这里守卫上埠和村子多久？

红军回答说，他们要组织农会和各行各业工会。农会和工会要组成自己的赤卫队和自卫队，把武器从民团手中夺过来，接收兵工厂。工农必须把上埠和农村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这是革命的道路。

一些农民听了这些话，想了很久。很多人感到没有信心，另外有不少人又不想打仗，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被鸦片毒化了。他们说，“我们穷人就是苦命。我们八字不好。我们现在要知足。地主已经降了四分之一的地租，有些方面降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好的了，我们不能不顾命。”

另一些人不谈命。他们只是说，“你们一走，白军就来了，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枪，怎么使用这种一分钟打无数颗子弹的东西呢？不行——你们一走，我们就糟了。”

红军劝他们说，“看，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农民。从前我们村子里有人讲的也跟你们一样。地主在骗你们。他们只是因为害怕才降低地租的，因为我们快来了。”

农民还是争论说，“让我们再等一等、看一看。你们走了，看他们还怕不怕你们。”

这一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红军说，没有群众支持，攻打上埠也没用。由于拖了很长时间而农民依然害怕，

红军就放弃了打上埠的想法。最后红军走了，就让那些农民用地主的告示去自我安慰。

红军走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上埠的情况仍然摸不清。又过了几个星期后，有人捎信来说，这支红军在福建和白军打起来了，地主们认为，红军少，白军多，群众又没有武装，帮不了红军的忙。他们的使者又从南京带回了新的武器、军火和无线电器材。很快，所有村子里又都贴上了新告示。告示说，由于时局艰难，新添重税和内债，年景不佳，国家又面临饥荒，水灾，因此，必须恢复老地租。告示结尾处也说得天花乱坠，最后也有一颗大红官印。

农民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抱怨、抗议，有的人甚至哭得象个小孩。地主们不是许过愿的吗？他们不是讲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吗？这些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人们派出代表去上埠求情，甚至下跪。但收获季节到来时，地主和他们的手下人仍然坐着轿子，在武装民团的护卫下，到地里来监督收割，拿走他们的老份子。剩下来留给农民的甚至不够半年吃的粮。有些村里的农民拒绝按老份子交租，可他们除了长矛、锄头、大刀外别无他有。而民团则有从南京买回来的最新速发步枪，地主或他们手下人的后屁股上还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一些村子里发生了真正的战斗。这都是那些“坏人”领头干的。可斗争结果他们被逮捕了，象牲口似地被赶进上埠，带上手铐，关在这些大家族的空房子里。那些特别倔强的就被砍了头，他们的头被挂在竹竿上，竖在村子里，表示杀一儆百。

但这些人头并没有使人闻风丧胆，反而刺激了农民。一些地主或地主手下人被神秘地杀掉了，有些被农民狠狠地鞭打了

一阵。最后，上埠城内不得不向赣州发报求援。

白军开来了。他们很快就给了农民一番教训——一些村子被烧光杀光。暴动结束了，“法律和秩序”又恢复了。农民们在旧日沉重的压迫下低下了头，弯下了腰，但他们的黑眼珠中发射出杀气腾腾的仇恨。

两年过去了。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一年〔原文如此一译注〕秋收即将到来。又一整师红军开到了上埠城下。上埠有了从南京运来的新武器，而红军打败了南京的部队，缴获了武器，也改善了自身的装备。红军现在有了正规制服，军帽上有了红星；脚上穿着江西妇女编织的草鞋。印着镰刀和斧头的红旗在他们头上骄傲地飘扬着。对一个从前衣衫褴褛、赤脚的游击部队来说，现在已经是一支服装整齐、有纪律并有良好武装的队伍了。农民们不再逃入上埠城内去了，现在聚集到大红旗下的农民之多好象是地球上的火山里迸发出来的一样，那些无路可走的穷人们都成群结队地来找红军了。

地主关闭并加固了上埠所有的城门，禁止出入。城墙又高又厚，轰不垮。因而红军和农民决定对它进行封锁和围攻一个月。远近农民几乎全都参加了战斗。

农民的大刀、锄头和长矛对坚固的城墙毫无用处。当农民和红军试图在黑夜爬上城墙时，敌人就点起巨大的火把，在火光下向攻城者射击。红军曾试图用大砲轰垮城门，但也无用。农民们从来没有真正打过仗。开始时，他们对枪砲声有点害怕；过不久，他们就惊奇而又仔细地观察和研究起来了。他们用那粗糙的手抚摩枪砲，就象一个人抚摩他心爱的东西。

于是一帮农民跑进深山砍下大树。他们把树干的一头烧空、

挖空，另一头不动。然后他们靠近烧空和实心之间，从树皮往下钻出一个小洞——一个点火眼。他们在这些木砲的砲口里装进炸药，前面再装进一些废铁钉、碎洋铁皮、钢花、玻璃碴子和尖石块。有的从他们的茅屋上扒下标准石油公司的洋铁筒皮，有的熔化了他们的锄头。然后他们就往点火眼里装炸药，点火放砲。砲声震天动地，吓得民团心惊胆战。有的砲炸裂开大缝，给农民造成的损伤和敌人的伤亡一样大。可他们只管造新砲，并热情地继续砲轰。

农民们纷纷上山砍树，然后一大群人就抱着这些大树干，有节奏地呼喊，冲向城门，用树干撞城门。他们选择漆黑的夜晚作这种攻击，可敌人在黑夜里点亮火炬，城墙上该死的机关枪就往下扫射。一大群农民倒下了，死的死，伤的伤。但新的一群几十人又冲上去，就这样一直不断地围攻。

农民们在围攻上埠的战斗中经历了一场奇事。红军曾从白军那里缴获了七架飞机。进攻上埠的红军师有一架。农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一天，当飞机装上炸弹，象鸟一样地飞上天空，围着上埠盘旋并投下那些致命的炸弹时，农民们惊呆了，捎信的人发疯似地跑过山头去传消息，说红军能征服天空，红军能飞上天。

红军内部对轰炸上埠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认为，炸弹不光杀了地主，也杀害了无辜的老百姓。此后就只使用了一次而这次飞机只向城里撒传单，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地主的反，开城门把他们的兄弟迎接进去。

城内发报向白军呼救。但赣南全都掌握在群众手中。远近村镇都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工农红军把守着通往苏区的所有

道路。白军要想通过就必然要碰上红军。红军不怕死，更不用说那些白军士兵了。

可有一天，从西部赣州方向飞来了一架白军飞机。赣州因为是沿江城市，当时还掌握在白军手中。农民害怕了。但红军里的神枪手们却选择在一些最高的小土丘和小山头上从四面八方空中来的敌人进行射击。飞机被打中了，栽到了地上，机头埋到田土里去了。

这架飞机没有装炸弹，却装着运给上埠地主的一袋袋的盐和一箱箱的子弹！这下子红军知道了，城里缺弹缺盐。于是又有几千农民向城门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

第二天，又有三架飞机从西边飞来了，飞得很高，在上埠上空盘旋几圈后就往下投物资。但每投下一百袋盐和一百箱子弹中，总有八件落在围攻者的阵地上。于是阵地上响起了一片闹哄哄的欢笑声。

红军战士们笑着喊，“我们的运输大队又给我们送东西来了。”

这一天终于到了。城里的老百姓和民团打开了上埠城门。手执大刀、长矛的农民首先冲入城内，并冲向大地主的家。有的地主自杀了，但多数地主和他们全家都落入了农民手中。红军想由他们自己来处理这批俘虏，可农民不同意，说这些俘虏是他们的。

农民喊道，“既然他们杀了我们的弟兄，我们也要把他们杀掉！”红军反对说，“等一等，只能经人民审判后才能处决他们。”

红军正是用这一方式才制止了一场对豪门望族和民团军官

的全面杀戮。

豪门望族成员又肥又壮。他们在被围困期间并没有吃多少苦。可城中将近半数的老百姓都已经饿死了。满街都是尸首，红军来后才把他们埋了。有些穷人在开始围攻的头几天里就死了，而豪门望族的仓库里还贮藏着大量的米和其他食品。农民们掌管了这些房子、祠堂和仓库时，看到了这些存粮。他们的仇恨更深了。这些粮仓由红军的财产没收委员会接管，他们还从这些房子的墙里和地下挖出了近二百万银元金币。

农民群众的仇恨象扑不灭的火焰，转向地主家的一切东西。农民们开始捣毁地主的全部财产。他们把房子砸得千疮百孔，扒下墙上所有的字画，拿到城外草地上烧掉。他们拿走了全部家具、布料、从厨房里拿走了所有的盘子和碟子。还有那些古老的花瓶、大的雕花烛台、古老的油灯、古色古香的陶瓷器皿和象牙筷子——所有这一切不是被扔到熊熊的烈火里，就给砸得粉碎。可怜的妇女甚至宁可赤身露体也不穿敌人的旗袍。

仇恨使他们失去了理性，农民们甚至把这些房子里抄出来的步枪，也急急忙忙拿去给砸碎、烧毁。红军急得大喊，“把枪支留下——可以武装你们自己！别当这种傻瓜！”当农民带着那些地主用来与南京和赣州通话的可恨的无线电器材从屋内往外跑时，红军不得不从他们手中夺下这些器材。

这里还有祠堂。祠堂里祖先的牌位表明这些人家世世代代都是有钱有势的。农民们对此怀有刻骨仇恨，气得有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们现在抱走牌位、画轴、雕花桌子和供桌，把它们全部投入火中。农民们蜂拥到祠堂前为从前的大官树立的石碑旁边，花儿小时的劳动，把这些石碑砸碎。最后只剩下一堆

堆花岗石碎块，偶尔还可看到几个大字。

在深宅大院里，在一些祠堂的屋子和仓库里还发现豪门望族收藏的主要财宝——鸦片。整整有一万担。没收委员会惊呆了。当男男女女抱着这些鸦片跑到草地上扔进火堆里去的时候，委员会不表示任何反对。鸦片烧了好几天，火焰照亮了通往解放的道路。

红军把守了整个城市，所有的公共建筑、城门和城墙。当大地主的房子几乎全部被摧毁时，红军就进驻，控制局面并保护建筑物以便将来使用。

攻克上埠的消息闪电般传入山村和深山老林。第二天天未亮，所有通向原来地主城堡的小道上就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成千上万的人源源不断地蜂拥而来。男人和小孩赤着膊，光着头，赤着脚；妇女衣衫褴褛，满身补丁擦补丁；老人甚至幼儿的身心上都留下明显的鸦片流毒。消息传到四面八方，说哪天要开群众大会；哪天要成立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妇女协会、学生协会，天晓得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协会以及哪天上埠要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前所未闻的，农民们都亲身体会到了。

城墙上飘扬着有劳动人民标志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人们从城门涌进来，兴奋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红军，就是那些帽子上戴着红星的战士吗？一点不错。他们站在那里，微笑着，开玩笑。过去从未见过红军的农民发现他们完全和自己一个样。

上埠的街道实在容纳不了这拥挤的人群。草原和田野里也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到处搭起了高台，群众喊着：“看，红军多聪明啊！他们在我们当中搭起了讲台！”好象这是他们从

未见过的奇迹！如果一个红军战士走过，人们就以敬佩的眼光看着他，好象他们从未见过用腿走路的人似的。那些参加围攻上埠的村民同志们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感到那么自豪，简直难以控制自己。妇女们央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们是怎样攻占上埠的，是怎样最后突破城门的。简直太精彩了。

人群中还有那些富豪之家的奴婢。她们眼光淡漠，脸上和身上常常带着伤痕。她们一边走一边问：“你们碰见过凉水村陈仲华家的人吗？”她们就这样寻找自己的亲人。

太阳还没有升起，群众大会就开始了，直到天黑还没有结束。看来人们一旦张开嘴就有说不完的话。当然是红军战士，特别是政治部的人带的头。因为讲话是他们仅次于枪的一种武器。而且他们多会说啊！他们说的似乎说到了农民的内心深处，他们提出的主张正是农民一直所要求的——土地、废除债务和苛捐杂税、大米。啊，甚至还有孩子和大人能学文化的学校。还有农会、工会和保卫他们自己的武装赤卫队。

演讲时，这些红军鼓动农民上台来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有几个胆子大的上去试了试，可他们怯场，没说一句话就跳下台。最后有个人开始说：

“过年时，地主甚至抢走了我们的猪和鸡。他们拿走了我们三分之二的收成，还放高利贷。这还不够，他们要把我们剥得精光。我们就剩下几颗牙了。但是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牙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讲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壮了其他人的胆。一位勇敢的老农在围攻上埠后曾首先冲进城门，他现在手持红缨枪站在讲台上说：

“地主对我们说，他们有地有钱是因为八字好，我们穷是因为八字不吉利。他们骗人。我们现在懂了，好命和革命是一码事。我们就要用革命来革出我们的好命。”

讲得多好！脑子多清楚！

另一人插话说，“地主假装把地租降低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这是因为红军已经打到城墙根了。他们骗我们，我们上当了。我们农民过去是傻瓜，但我们现在不傻了！我们要杀掉地主，分他们的地！”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接着一个妇女在群众中讲了起来。人们把她架到讲台上，她在讲台上接着说：“是的，我们把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收成交了地租，政府还把各种苛捐杂税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了大户人家的鱼肉。我们说个不字就要挨鞭子，被杀害。我们的儿子被杀了头。地主们是杀人凶手，是骗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一个上年纪的人说，“听我说，两年前红军来时，我和一个姓吴的邻居说，‘老吴，我们蠢得象头猪。我们应该帮助红军。’但姓吴的说，‘不，这是命，是我们八字不好。’现在我问你们大家是我对，还是那姓吴的对？”

听众嚷嚷说，“姓吴的蠢得象头猪！”

他们就这样说了整整一天。有些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讲话才能，就从这个讲台说到另一个讲台。他们有时尽量重复红军讲的话，当然说法不一样。他们在讲演结束时总要求杀死地主。

如果群众要求杀死地主，红军指挥员是同意的。但他们有

个要求：他们说，该处死的只有豪门望族的主要头头；妇女和儿童应予宽大；地主的儿子也不该杀，因为他们是儿子。红军在上埠一天到晚都这么说。开始农民难以置信，还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他们喊道，“怎么回事？他们一家子人都占有土地！”

的确——家庭是单位，而不是单个的人。家庭拥有土地和一切。一家之主只是大树上的一个枝干。而红军指挥员却提出了这一新奇的想法。他们讲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将改变环境，使人不能把别人赖以生存的任何东西占为己有。但农民听到的只是不该把豪门望族的人全都杀掉。

“你是说我们只杀死这些家庭的头面人物——那就是说我们还要把根留下，让它复活长成大树啰！”

另一人打断他的话说，“不，你这是留下小蛇，让它们长成大蛇！天底下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馊主意的呢！”

另一人更实际。他说，“白军就在那边，如果他们来了，就会把土地还给这些大户人家。即便只剩一个人活下来，也要把土地还给他，他就要替他死去的父亲报仇。如果白军找不到活下来的人，也就不能再把土地从我们手中夺回。”

一些红军指挥员走出来向人们作解释。第一位来的是红军里的共产党书记、司令员毛泽东。他的名字就象是神话。但他讲话时也是讲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他讲得很长，主意也很好。但在对待那些大户人家的问题上他全错了！听众里有人气愤地指责他企图保护地主不让农民杀他们。他再怎么回答也难以使他们平息下来。

“难道我们忘了地主是怎样用竹鞭抽打我们的吗？难道我

们忘了我们是怎样带着镣铐被关在他们的深宅大院里的吗？难道我们忘了他们是怎样把我们的兄弟、儿子的头挂在城墙上示众的吗？难道我们忘了他们怎样长肥，我们怎样变瘦，我们的孩子怎样饿死在母亲怀抱里的吗？难道我们忘了欠下的债、地租和地主从我们手里夺走的土地了吗？忘了他们说谎、骗人的勾当了吗？”

于是他们就埋怨起红军指挥员来了。这些指挥员听了农民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之后，回过来说，“我们干吗要保护大户人家呢？这三千人比起被地主残酷压迫致死的成千上万人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其他人插话说，“我们党的命令是只处决大家族的头头。”

“理论上是好的，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农民说些什么，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但我们有党的命令。”

“是的，但我听到我们的一些战士也在说。他们也是农民，他们说农民是正确的，地主必须处死。他们说他们支持农民！如果我们再采取压制态度，将在自己的队伍里面临兵变。”

是的，情况确实如此！红军里的农民士兵支持农民反对他们选举出来的上级委员会和他们的指挥员。还有，地主现在已在农民手中，农民自称地主是属于他们的，就象过去地主说农民的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一样。因而红军最终保持沉默了。这样，就把豪门望族交给农民群众，任凭他们去处理。

那天已是黄昏，太阳已经下山了。十八户富豪家族的人被拉去游街，然后被带到讲台前。男女农民纷纷控诉，都要求处死他们。会上要求同意处死他们的人举手。这一要求就象大海

的吼声一样在群众中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除了地主、他们的家人和站在后面观察保持沉默的红军指挥员外，人人都举起手来。俘虏们站着，男人被反绑双手，就象他们过去绑农民那样。许多人脸色刷白，一个人说着，不停顿地高声呼喊。

接着，俘虏们被带到外面草地上。人们在每个讲台上控诉他们都要求处死他们。一个大地主吓得两腿发软跪倒在地，赤卫队就用脚把他踢起来。

有时，一位农民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站在一个地主家的头面人物面前。

“我是龙桥村的杨玉青。你还记得我兄弟吗？你还记得把他的头挂在东门上示众的事吗？还记得你们民团在杀他前扒掉他的上衣吗？听着！我也要扒掉你的衣裳，让你光着身子去死，跟我兄弟一样！”

杨玉青开始用他那骨瘦如柴的手剥掉这个地主身上的衣服，把钮扣撕掉，扯到反绑的手臂。这个胖子俘虏光着上身，被赶到草地上。

草地上集中着三千名俘虏——大户人家的头头，他们的儿女妻妾、叔侄兄弟、孩子和民团军官。几千名农民卫兵手执红缨枪，把他们整齐地排好，再押着他们跪下，拒绝跪下的就踢倒在地。

有次，一位象只冬天孤独的饿狼一样憔悴而又发狂的农妇冲进这帮人当中。她奋力挤到一个跪在地上的地主跟前。地主没有看见她，因为他恐惧地低着头跪着。但这位妇女认识他，旁边围观的农民也认识这位妇女。他们记起来她生过八个孩子，但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里。八个孩子里七个死于襁褓之

中。一个长大了，和爸爸一起在地里干活。两年前，父子俩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他们被这个地主逮住，押到上埠，被砍了头，还把头挂在城门上示众。从此，这位憔悴的妇女就失魂落魄象幽灵一样在各村游荡。人们待她很好，因为据说狂人能说出明智的语言。

她恢复了理智，但精神上的疯狂更令人可怜。她费劲地从人群中来到这个杀死她丈夫和儿子的地主面前。她走过他身旁，站在他大老婆前面。这个大老婆跪着，双手紧抱着一个婴儿。这位农妇伸出双手，凶猛地把孩子从母亲手中夺走，把它举过头，朝地上摔去。她一遍遍把它拾起来，又摔到地上。直到累坏了，她才高声喊着，转过身来，挤了出去。她已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为儿子报了仇。

接着，农民赤卫队怀着严厉的、充满仇恨的决心动手了。他们用红缨枪一枪接一枪地刺杀。到处是一片恐怖和痛苦的喊声。一些俘虏不等红缨枪刺到他们身上就吓死了。草地上到处是尸首，整夜暴露在那里。第二天天亮时，农民才把它们拉到田里，埋入生土，成了庄稼地里的肥料。有人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为别人作好事。地主处死后，这百万农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对红军说：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现在听你们的吩咐。你们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上埠出现了农民、学徒、手工业工人、军火工人、妇女、渔民、运输工人和其他许多工种的工会。儿童团、共青团、少先队、共产党也活跃起来了。农民赤卫队取代了民团并用民团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这些组织的代表选出了

上埠第一届苏维埃政府。

全城充满了新的生命力。红军指挥员在城外草地上训练新的赤卫军。军火工人怀着新的精力和热情在砧子上和机器上努力操作。从前富豪之家的住宅里现在挤满了人，因为这里成了各种人民组织的总部。蔡氏大家族住宅成了苏维埃政府总部，屋顶上飘扬着一面红旗。三个家族的房子变成了学校，教师来自北部的新口。带来了新的教科书和新的思想。跟着医生也来了，祠堂成了医院。攻城时受伤的人就在这里治疗。人人都可得到免费治疗，顶多花几个铜板买药。

这样红军就深得人心了，并开始进行农民梦寐以求的创建工作。有的人就说，“看，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一定会有个医院的吗？”其实他根本没说过——只是似乎说过，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最最重要的是分配了土地。男人、女人、青年都根据他们的耕作能力分到了土地。分配中出现严重的问题，就把它们提交给工会和苏维埃政府去解决，因为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新问题发生时，也采取通过讨论解决的办法，直到群众习惯于考虑、讨论并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

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法令是关于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第二项法令自然是反对种植或贩运鸦片。由于鸦片是地主手中的一项重要武器，因而勒令吸鸦片的人在限期内戒掉烟瘾并命令贩运鸦片的人另谋新的职业。对小贩运者进行教育，对大的则予以逮捕、判刑或处以死刑。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是地主和南京白色政权的代理人。

攻占上埠六个星期后，选出代表参加在瑞金召开的第一届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十一月七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它是成立中华苏维埃的第一年的第一天。会上有成百名象上埠那样来自城镇和乡村的代表，那里的群众也已经奋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上埠派去了一位军火工人、一位农民、一位女教师，还有许多人陪同他们一起去，组成了一个非正式代表团去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出发这一天，上埠披上了节日盛装。成千上万农民和工人从邻近各村赶来。赤卫队员们立正站着，为自己的新责任而感到自豪。他们是上埠的骄傲。他们一班班把守着远近的所有通道。

代表团整装待发时，他们把三角小红旗插在他们面前的大行李卷上。这些行李卷里裹着村里妇女编织的大量草鞋，新苏维埃区的妇女们响应了为红军编织草鞋的运动，她们为自己的这些礼物而感到自豪，但她们对代表们却只是说：“向我们的红军兄弟们问好！请转告他们，这次的草鞋太少，也编得不好，因为最近忙于打仗和收割庄稼了。”

身材魁梧的男人只是笑笑，把小红旗插到两头的行李上，然后用竹扁担挑着担子，在一片热情的再见声中起程了。他们以缓慢节奏的小跑步伐穿山越岭奔向瑞金。

上埠的农民和工人就是以这种方式，这种手段，在这奇特的时刻终于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

三十、凄凉悲切的歌

一天晚上，在中国内地的小旅店里，一位广东姑娘躺在一张中式雕花大木床上，讲起她童年时代的故事。姑娘的名字取自中国一首古老的民间歌谣，这是一首她从小就会唱的歌。她把两只纤细的手枕在脑后，委婉动听地唱起了这首歌谣。

同许多民间歌谣一样，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分段叙述故事。在这种民歌音乐里没有中国古典音乐中那种晦涩难懂的成份，这是一首最西方化的人也能理解的歌谣。它不仅是一首歌谣，也是一种民间传说，同时也反映了今日中国的种种社会现象。但是，从字面上来说，这是一个悲痛欲绝的妻子泣诉她的丈夫在公元二百年前修筑长城时死去的一首哀歌。

这首歌的开头是这样的：

正月里来是新春，
家家户户点红灯。
别家丈夫团圆聚，
我家丈夫造长城。

二月里来燕双飞，
双双燕子飞南墙。
对对成双歇画梁，
我家空空好凄凉。①

这首歌一共有十二段。三月里来桃红柳绿，家家户户去上坟。四月里来蔷薇开，采集桑叶养蚕忙。五月石榴是黄梅，家家田中黄秧栽，万家田中草成堆。六月里来荷花开，七月里来采蜜忙，家家窗下做衣裳。八月里来桂花开，孤雁足下带书来，奴夫死在千里外，那有书信捎家来。九月菊花是重阳，重阳美酒菊花黄。十月芙蓉稻上场，牵砮做米纳官粮。十一月里雪花飞，枯草上面长白霜。十二月腊梅过年忙，可怜奴夫死长城，哭动天庭倒长城。

这首古老的歌谣是用委婉动人的语调唱的。这首歌谣似乎流行于中国的每个角落。

人们可能会问原因何在，许多中国人都会对你说：这是因为当年建造长城，千家万户几乎无不遭殃。二千五百英里长的雄伟壮观的长城是花了二十年时间造起来的，象埃及的金字塔

① 这里的孟姜女歌是根据原文，参照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出版的《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所搜集的有关歌曲翻译的。——译注

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样都是用奴隶的血汗劳动修筑起来的。

据说当年在秦朝每十个人中就有三个要被召去修建长城。他们在监工的皮鞭下象牛马那样劳动。当他们由于劳累过度，受伤或病入膏肓而一命呜呼后，他们的尸骨就埋在长城的脚下。造长城的传说世代相传，在这首民谣以及其他民歌中都留下了这些记载。

这首在中国无人不知，脍炙人口的歌谣，不仅是建造长城的苦难象征，而且也是所有人间苦难的哀鸣。今天，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可以听到劳工们也在唱这支歌，但歌词是经过改编的，已经变成一支革命的歌谣。它保留着整个原来的曲调和一部分原有的歌词，但其余部分则是叙述那个人民所开创，后来又被国民党出卖了的革命。

歌中还指出，现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天怒人怨的局面，有朝一日终将冲击长城，使之不摧自倒。歌词音韵优美动听，铿锵有力，但整个音乐旋律，同所有民歌中那种沉重的呻吟一样如诉如泣，凄凉悲切。